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 托洛茨基言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上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 说 明

为了适应批判修正主义的需要，我们根据已收集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要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编选了这部丛书，按人或按专题分册出版，每册书都有编者加的前言，按语，并根据需要附有年表或其他参考资料。

材料的选择和编译，如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 前 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托洛茨基是个专搞分裂、擅玩阴谋的派别活动老手，又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经常打着“左”的旗号，喊着“革命”的词句来贩卖机会主义货色，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破坏革命和建设事业。

托洛茨基原名列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1879年生于南俄草原一个富农家庭。九十年代末在中学学习期间，因从事工人运动曾被捕流放。1902年自西伯利亚逃脱，侨居国外，开始为列宁创办的《火星报》撰稿。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身分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围绕党纲和党章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中，托洛茨基都站在机会主义一边。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宣扬只有无产阶级成为“民族多数”、党同工人阶级“接近于等同”的前提下，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在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他和马尔托夫一起反对列宁提出的条文，不承认参加党的组织是党员的必要条件。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十七名少数派分子会议，攻击代表大会的决定，扬言要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来“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托洛茨基是这次会议决议的起草人之一，也是会议选出的“少数派委员会”的成员。会后，孟什维克先后篡夺了《火星报》、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因此，《火星报》从第52号起成了孟什维克的派报。

接着，托洛茨基出版了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反对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阐述的组织原则，否认组织上建党的必要

性，攻击党的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党的纪律。列宁称这本小册子为新《火星报》即孟什维克派的“信条”。

1905年2月，托洛茨基回到俄国，曾在短期内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所谓“不断革命”论，否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鼓吹“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同年12月初，托洛茨基被捕，1906年9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初从西伯利亚逃往国外。

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已成为资产阶级君主国，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要求抛弃“三条鲸鱼”，即争取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而代之以“结社自由”的口号，也就是争取诸如结社、罢工、集会的自由。这是不触及沙皇制度而诱使群众脱离革命斗争的取消主义口号。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里，托洛茨基打着“中派”的旗号，进行了紧张的派别活动。他靠取消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的资助，在维也纳办了一个《真理报》，鼓吹各派无原则的联合。他利用德国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在《新时代》杂志、《前进报》上发表署名和匿名文章，歪曲俄国党内斗争真相，混淆国际工人视听。他越过中央，进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分裂活动。托洛茨基表面上标榜“不偏不倚”的“非派别性”，实际上处处站在取消派一边，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曾对此痛斥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sup>①</sup>列宁把他叫做“厚颜无耻的小犹太”<sup>②</sup>。

1912年1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宣布把取消派开除出党。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0—411页。

<sup>②</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

托洛茨基一方面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破口大骂，一方面纠合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崩得分子于同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结成臭名昭彰的“八月联盟”，导演了一场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合唱。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个联盟“是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sup>①</sup>。果然，不到两年时间，“八月联盟”就土崩瓦解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紧跟考茨基，打着中派主义的旗号，口头上高喊“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实际上搞的是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他用“不胜不败”、“为和平而斗争”的口号反对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列宁把托洛茨基的口号斥之为“夸夸其谈的典型”，指出托洛茨基的口号是要现在的政府、现在的统治阶级不胜不败，这不过是“保卫祖国”这一口号的另一种说法罢了！<sup>②</sup>

1917年5月，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区联派，即“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际组织”。鉴于区联派当时基本上采取了同护国派断绝关系的立场，列宁主张同他们联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狱中的托洛茨基也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初，托洛茨基获释出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从10月初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把武装起义提上了日程。托洛茨基虽不直接反对起义，但是却主张把武装起义、夺取政权问题推迟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去解决，认为起义与否要取决于大会通过夺取政权的决定后临时政府是否采取对抗行动。列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并一再指出应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6页。

当立刻夺取政权，不能因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而耽误时间，错过时机，列宁认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的背叛。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列宁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向各交战国提议举行和平谈判。由于英、法等国拒绝谈判，苏维埃政府只好单独同德、奥两国进行和谈。苏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起先是越飞，后为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胜利，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方立即发生革命上，他把和谈仅仅看作是一种宣传手段，一种促进德国革命的手段，因而在德方提出最后通牒时，拒绝执行列宁的指示，宣布“不战不和”同时全面复员军队。托洛茨基的行径，使苏维埃俄国最后在签订和约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这时托洛茨基挑起了工会问题的争论，转移了全党的注意力。他提出“拧紧螺丝”，实行“整刷”，主张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强迫命令，对工会各级干部实行“更新”，企图把那些担负工会领导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停职和撤职。他主张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把工会变成“工人国家的机关”。列宁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这套主张和做法，指出这会造党同工会和工会内部的分裂，从而造成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葬送无产阶级专政”<sup>①</sup>。列宁指出，工会不是国家机关，而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鉴于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反党集团的派别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宣布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集团。这一决议是对托洛茨基派别分裂活动的严重打击。

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不能视事，1924年1月21日列宁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页。

逝世。当时国内在经济上也出现某些困难，托洛茨基把这看作是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妄想当“列宁的代理人”，“继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3年底至1924年初，托洛茨基抛出《新方针》等一系列反党文章，把矛头指向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制造青年同老干部的对立，攻击党的机关，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的自由。1924年夏秋，他又抛出《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小册子，肆意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抬高自己，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的言行激起了全党的愤慨，斯大林代表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战斗号召。1925年1月中央全会决定解除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然而，托洛茨基不思悔改，1926年夏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结成了臭名昭著的托季联盟。他们纠集了在历次党内斗争中遭到破产的反党集团残余分子，一起向联共党发起猖狂进攻。托季联盟成了“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的集中点和策源地”<sup>①</sup>。

托洛茨基一伙发表大量反党纲领和宣言，利用各种会议的讲坛，攻击列宁主义，否定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他们大搞阴谋活动，召开秘密集会，举行政治示威，散发反党传单，私设地下印刷厂，建立秘密联络点，直至发展到成立第二党——这个党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有边区、省、市和区的各级组织，有办事机关和出版机构，自行征收党费，等等。

他们配合国际反动派的挑衅，公然扬言要搞“克列孟梭式的实验”，即在发生外国武装干涉、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国内外反动派“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1页。

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sup>①</sup>。

托季联盟的反党派别活动受到全党的谴责和抵制，不断地遭到失败。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曾不断向党做出不再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的保证，但是保证的墨迹未干，他们又变本加厉地向党进攻。1927年11月7日，他们利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一场反苏游行。托洛茨基一伙的所作所为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联共（布）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托季联盟的一批骨干分子开除出党。正如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的，在思想方面，反对派已经从策略性分歧转到纲领性分歧。在策略方面，他们的活动不仅越出了党章的范围，而且越出了苏维埃法律的范围。在组织上则已由派别活动发展到建立托洛茨基党。因此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不能相容。”<sup>②</sup>

托洛茨基一伙利用列宁病重和逝世进行的篡党夺权活动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团结全党，为捍卫列宁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1月，苏联政府决定把他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和挪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在国外，他写了大量攻击和污蔑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著作，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和《新国际》等刊物。1938年9月，托洛茨基在巴黎拼凑了一个“第四国际”，来同共产（第三）国际相对抗。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住地遇刺，于21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18页。

日死去。

托洛茨基一生用来同列宁主义对抗的主要理论是“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论歪曲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盗用“不断革命”的词句，是孟什维克的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加上极端革命的词藻拼凑而成的。它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名反对俄国的民主革命，以“世界革命”为名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期间提出来的。他否认当时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主张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认为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俄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手工业，因而没有形成一个象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充当激进民主派的手工业阶层，而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革命民主派，在托洛茨基看来，无非是“一股暴乱的自发势力”。托洛茨基断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政党来领导，而俄国却不存在能够领导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可能形成他们的独立政党，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能够充当革命领导者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一旦领导革命，夺取政权，革命就只能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把托洛茨基的这套理论叫做“空洞的革命词句”<sup>①</sup>。列宁严格区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同时辩证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论证了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列宁指出，当前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农民是人数众多的革命民主派，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革命的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只有走完了这一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8卷第262页。

命。列宁把要求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叫做“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指出“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sup>①</sup>。

但是，主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实际上并不认为俄国单独一国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俄国面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时候，他又打出“世界革命”的旗号来反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揭示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sup>②</sup> 这个结论推翻了革命只能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旧公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托洛茨基却墨守过时的公式，坚持先进国家一起革命、同时胜利的理论。他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为发展不平衡只是个别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水平越来越趋于均衡化。他在《和平纲领》中写道：“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社会革命业已成熟的资本主义‘欧洲’了。”因此，在他看来，西欧各国完全能够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认为，俄国不属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因而也不属于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俄国经济落后，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俄国革命最多只能是欧洲革命的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21、522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



“序幕”，否则，即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如果西欧各先进国家不发生革命，不给予落后的俄国以经济技术支援，那么胜利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必然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出现“前有欧洲的反动派，后有国内的反革命”的可怕局面，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垮台。“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的暂时的统治变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他攻击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声称“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

列宁早在1915年8月就否定了“欧洲联邦”的口号，认为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就是反动的。列宁警告说，把“世界联邦”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会把它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会产生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见解。但是，时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还喋喋不休地在鼓吹“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的口号，声称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托洛茨基的这个口号是直接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他断言，今后的“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全欧洲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

1917年10月，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配合，俄国这个帝国主义矛盾的集中点，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了，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革命实践宣告了托洛茨基理论的破产。

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托洛茨基又以生产力的世界性和国际分工为借口，否认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认为落后的俄国如果得不到西方的经济技术援助，就不能长期保持这

个政权，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1922年，他在为《和平纲领》写的跋中叫嚷：“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基本倾向是集中化，是建立统一的不受民族框框和国家关税限制的世界经济，因此，他认为单独一个国家“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盘”，“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的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把苏联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而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叫做“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到底能不能保持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

列宁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时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也能够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但是它的命运又是同世界革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列宁反复指出，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sup>①</sup>。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本来是一条真理，但不应把它变成空谈，不能指望欧洲能立即或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即使世界革命延迟爆发，苏维埃政权也仍能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互相协议，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把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实现全国电气化。1919年，列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页。

宁根据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实践经验指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现已获得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sup>①</sup> 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说，苏维埃国家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这就是：“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sup>②</sup> 同时，列宁又始终保持警惕，看到“国际关系”即帝国主义的存在，看到国内资本主义力量复辟的可能性。显然，托洛茨基的论调是同列宁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的。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总结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他说：“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sup>③</sup> 列宁的这一重要总结，也是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判决。

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列宁对小资产阶级作了透彻的剖析，他指出，小资产者“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87页。

② 同上，第682页。

③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84—685页。

律性和坚定性”<sup>①</sup>。这种人在革命高潮中往往表现得极端革命、极端激进，似乎“比一切人都更革命些”，而一旦革命浪头过去，转入低潮，他们又会迅速转为灰心丧气，悲观失望，或表现为冒险主义，不惜孤注一掷，或表现为投降主义，向统治者卑躬屈膝。

托洛茨基是一个惯于用“左”的言词来掩盖机会主义实质的两面派，他“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sup>②</sup>。他的一生总是“摇摆，欺诈，装得象一个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sup>③</sup>。他正是依仗这种两面派手法，喊着极端革命的词句，在革命中招摇撞骗，曾迷惑了一部分人，而在世界各地也有某些影响，至今仍有一些信徒在活动。

列宁历来重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列宁在谈到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时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sup>④</sup>在反对“左”倾的斗争中重要的是透过其“革命”的词句，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而不要被激进的假象所迷惑。列宁在批判“比一切人都更革命些”这类口号时指出，“我们根本不想追赶这种人的革命性；恰恰相反，我们对于这种革命性永远采取批判态度，揭露字句的真义，指出被美化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同时教导人们在革命最紧张的关头清醒地估计各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各种派别。”<sup>⑤</sup>

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时也一再揭露它的机会主义实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79页。

④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8页。

⑤ 《列宁全集》第8卷第260页。

质：“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姿态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sup>①</sup>

托洛茨基是国际共运史上不可多得反面教员。研究和学习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经验，在目前仍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编选了托洛茨基从1903年到1928年，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他被驱逐出境期间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托洛茨基在俄国三次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一贯反对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也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生和不断破产的过程。看一看托洛茨基的言论，看一看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对于识别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揭露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骗子是会有所裨益的。

1978年12月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0页。

# 目 录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03年 7—8月) .....	1
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7月22日〔8月4日〕) .....	2
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8月1日〔14日〕) .....	3
讨论党章问题时的发言(8月2日〔15日〕) .....	3
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1903年9月13—20日之间) .....	6
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1904年8月) .....	10
序言 .....	11
组织问题 .....	16
对话(仿苏格拉底) .....	16
分工 .....	19
“民主主义” .....	27
纪律和集中制 .....	33
几点结论(信件摘编) .....	47
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	60
不是雅各宾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而是雅各宾派分子或者 社会民主党人 .....	60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	75
社会民主党和革命(1905年11月) .....	85
需要建立党(1905年11月) .....	91
三十五年以后(1905年12月) .....	95
一 国家和争取政权的斗争 .....	97

二 共和制和无产阶级专政 .....	99
三 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 .....	100
四 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	105
五 无产阶级和农民 .....	108
六 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和目的 .....	112
<b>总结与展望(摘录)(1906年) .....</b>	<b>115</b>
191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重印本序言 .....	116
七 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	122
八 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 .....	137
九 欧洲和革命 .....	143
<b>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提案</b>	
(1907年5月) .....	151
讨论大会议程时的发言(5月2日〔15日〕) .....	152
讨论社马党团工作报告时的发言(5月8日〔21日〕) .....	156
讨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时的发言(5月12日〔25日〕) .....	165
关于恢复两个中央的提案(5月19日〔6月1日〕) .....	174
<b>1905年(摘录)(1908年) .....</b>	<b>175</b>
第一版序言(1922年1月12日) .....	176
俄国革命的动力 .....	181
<b>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1908年) .....</b>	<b>198</b>
——论孟什维克的俄国革命理论	
<b>我们的意见分歧(1909年) .....</b>	<b>211</b>
——1905年,反动和革命的前途	
<b>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向(1910年9月) .....</b>	<b>230</b>
<b>致尼·谢·齐赫泽(1913年4月1日) .....</b>	<b>246</b>
<b>致莫·索·乌里茨基(摘录)(1915年) .....</b>	<b>250</b>

我们斗争的任务和方法(摘录)(1915年5月15日—6月6日) .....	253
三 分裂和统一 .....	254
民族和经济(摘录)(1915年7月3、9日) .....	261
军事溃败和政治前途(摘录)(1915年8月26日,9月1、2日) .....	265
二 失败和革命 .....	266
为政权而斗争(1915年10月17日) .....	272
和平纲领(摘录)(1917年5月25日) .....	280
一 什么是和平纲领? .....	284
二 Status quo ante bellum .....	288
三 民族自决权 .....	291
四 欧洲联邦 .....	295
跋(1922年) .....	302
回顾与展望(摘录)(1917年8月) .....	304
一 发生了什么事? .....	304
国际主义策略(1917年9月) .....	310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声明 (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 .....	315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 2月18日) .....	319
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 的发言(1918年3月7日) .....	320
第二次战争与和约的签订(1918年5—6月) .....	330
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 .....	333
——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初稿	
工会的作用和任务(1920年12月25日) .....	341
代序 .....	341



一 工会组织的危机 .....	341
二 工会在党纲上和实际上的地位 .....	343
三 在工会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	347
四 生产准则和生产教育 .....	349
五 工人民主和生产。军事方法,官僚主义,专家和“工人化” .....	351
六 实际的结论 .....	356
<b>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b>	
(1921年3月14日) .....	362
<b>致米·奥里明斯基(1921年12月6日) .....</b>	<b>370</b>
<b>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报告的结束</b>	
语(摘录)(1923年4月21日) .....	373
<b>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摘录)(1923年9月) .....</b>	<b>377</b>
<b>党的艺术政策(1923年9月8日) .....</b>	<b>392</b>
<b>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1923年9月) .....</b>	<b>401</b>
<b>四十六人声明(摘录)(1923年10月15日) .....</b>	<b>408</b>
<b>新方针(1923年12月) .....</b>	<b>412</b>
序言 .....	413
给党的会议的信 .....	416
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 .....	424
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 .....	432
党的社会成分 .....	439
官僚主义和革命(作者未能发表的一个报告提纲) .....	444
传统和革命政策 .....	450
关于“低估”农民的问题 .....	458
<b>附录 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1920年2月提交党中央的</b>	
<b>建议) .....</b>	<b>465</b>
<b>计划经济(一〇四二) .....</b>	<b>466</b>

论军队和其他方面的因循守旧 .....	479
论结合(或论结合与谣言) .....	484
<b>论列宁(摘录)(1924年4月) .....</b>	<b>491</b>
十月前后 .....	492
2.变革 .....	492
3.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	498
5.政府工作 .....	507
<b>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4年5月26日) .....</b>	<b>518</b>
官僚化的危险 .....	519
关于两代人的问题 .....	523
派别和小集团 .....	525
计划问题 .....	527
关于错误 .....	530
<b>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摘录) .....</b>	<b>535</b>
——1924年6月21日在全苏医务和兽医工作者第五次代表 大会上的讲话	
六 德国革命的教训 .....	536
<b>十月的教训(1924年9月15日) .....</b>	<b>543</b>
必须研究十月 .....	544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	550
反对战争和反对护国主义的斗争 .....	556
四月代表会议 .....	560
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 .....	565
十月革命前后 .....	571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 .....	582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 .....	593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 .....	600
<b>多余的热心(1924年10月) .....</b>	<b>604</b>

致俄共(布)中央全会(1925年1月15日).....	622
关于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1925年7月1日).....	627
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摘录)(1925年11月).....	634
——苏联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	
序言.....	635
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	639
六人声明(1926年10月16日).....	655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1月1日).....	659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	
年12月9日).....	693
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1927	
年6月).....	710
第一次发言.....	711
第二次发言.....	729
战争的危險——保卫政策和反对派(摘录).....	739
——1927年8月1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	
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关于“中派主义”和烂绳政策.....	742
反对派声明(1927年8月8日).....	750
苏联和美国.....	753
——1927年8月19日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	
反对派政纲(摘录)(1927年9月3日).....	764
第一章 前言.....	765
第五章 苏维埃.....	775
第七章 党.....	779
第九章 我们的国际环境和战争危險.....	792

第十一章 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 .....	805
第十二章 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	810

###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

的发言(1927年10月23日) .....	818
------------------------	-----

###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

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一)(1927年11月) .....	829
一 引言 .....	830
二 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	833
三 关于农民的分化 .....	840
四 土地国有化 .....	850
五 合作社 .....	852
六 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	855
七 苏维埃 .....	856
八 税收和存粮 .....	858
九 必须端正政治路线 .....	860

###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

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二)(1927年11月) .....	865
必须先提出的一点意见 .....	865
一 中央委员会提纲的主要缺点 .....	866
二 苏联的经济计划和阶级斗争 .....	868
三 官方的乐观主义是对敌人的帮助 .....	872
四 “本来的情况” .....	874
五 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和商品荒 .....	878
六 基本投资 .....	881
七 工人状况和向七小时工作日过渡 .....	883
八 我们困难的根源 .....	891
九 资金从哪里来? .....	898
十 两条道路 .....	901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摘录)(1928年6月).....	904
——对根本原则的批判	
一 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 .....	905
5.党的理论传统 .....	905
6.“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何在? .....	920
7.苏联对世界经济的依赖 .....	923
8.产生反动的乌托邦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 生产力和国家疆界的矛盾 .....	930
9.这个问题只能在世界革命战场上解决 .....	938
现在怎么办?(摘录)(1928年7月12日) .....	943
四 群众的激进化和领导问题 .....	943
五 苏联共产党目前这种向左转的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	950
六 进一步,退半步 .....	957
七 是机动手段还是新方针? .....	966
八 目前危机的社会基础 .....	973
九 党的危机 .....	979
注释 .....	987
人名索引 .....	1009
托洛茨基年表 .....	1054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3年7—8月)

## · 编者按语 ·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分子围绕着党纲和党章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党内从此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

在党纲问题上斗争的焦点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托洛茨基在发言中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民族多数”，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接近于等同”（即政党同阶级的界限消失）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托洛茨基为无产阶级专政规定的这种“先决条件”，实际上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唱着同一个调子。这也是他后来反对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根据之一。

在讨论党章问题时，马尔托夫等人反对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认为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不必要的。托洛茨基站在马尔托夫一边，以党章不能防止机会主义，列宁的条文会使工人同知识分子“处于不平等地位”为借口，要求“否决”列宁的条文。托洛茨基一伙实际上是主

张建立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和没有定形的党。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时指出，他的论调是“十足的尾巴主义”，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否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炼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根源愈深，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0页）。

## 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

（7月22日〔8月4日〕）

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在这里对《火星报》<sup>1</sup>和《曙光》杂志<sup>2</sup>的纲领草案发表了最原则性的意见。但是，对于前者的发言大家已经指出，他的总的气魄与最后结论完全不相称。用谢德林的话来说，他扬言要搞大屠杀，结果却吃了只小黄雀<sup>3</sup>。阿基莫夫同志的气魄也很大，但是，很遗憾，与纲领草案毫无联系。阿基莫夫同志只在一项条文上非常明确地在原则上反对现在讨论的草案，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他说草案的错误在于它非法地把重点从日常斗争转向革命专政，从阶级转向党。……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讨论的草案包含的最低纲领，不亚于——按改革总数来看——其他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为改革而斗争的时候，就在实行其主要改革——准备实现革命专政的无产阶级头脑中的改革。我们不能过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因素，因为改革本身不是无产阶级自由的政治创造活动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它只有在社会革命的威胁之下才能实现。阿基莫夫同志试图使现在讨论的草案接近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的立场。他的责备可以百倍地奉还给他。正是社会

革命党人“把重点”从他们称为“幻想的跳跃”的社会革命“转向”被他们看作是“逐步升入”社会主义王国的日常斗争。我可以举出有关引文给阿基莫夫同志看。无产阶级专政象雅各宾派<sup>4</sup>的行为那样吓住了他。他忘了只有当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两者的对立使他如此不安——最接近于等同的时候，这种专政才是可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工作者“夺取政权”，而是构成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阿基莫夫同志否认专政，从而陷入了通常的社会改良主义。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5—136页。

## 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

（8月1日〔14日〕）

我想向阿基莫夫解释一下。在“人民”专制下，专政的是资产阶级。只有当社会主义者获得多数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才会到来。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55页。

## 讨论党章问题时的发言

（8月2日〔15日〕）

当普列汉诺夫同志建议投票赞同列宁同志的条文，把它当作



反对机会主义的可靠手段时，我深为惊奇。我不知道，居然可以创造出一种反对机会主义的规章符咒。我认为，机会主义是由更为复杂的原因造成的。<sup>①</sup>最后，我不知道，机会主义者本质上是必定不会有组织的。我知道饶勒斯派<sup>5</sup>的党是有组织的机会主义。我没有忘记我们经济派的组织。不，我认为争论的原则意义要小得多。既然某某人承认我们的纲领，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加入我们的组织呢？——普列汉诺夫同志问道并接着回答说：显然是因为有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对它应当进行斗争。可是，反对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列宁条文完全打到另一个目标上去了，问题就在这里。不管怎样已是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更容易自行列入党员名单。中学生联合会、红十字会组织，特别是大学学生会比任何广泛的（lose<sup>②</sup>）工人组织要经久得多。学生会能存在好多年，而广泛的工人组织却受罢工、危机、工人群众流动的影响，每天都在遭到破坏。这样，列宁同志的规定就使知识分子与工人处在不平等的条件之下。这一规定的作者断言，它使我们能够随时了解，我们能把哪些力量投入战斗。但是我担心，当列宁同志在紧急关头翻阅自己的名单时，他会在其中找到大学学生会和聚集在红十字会里的社会民主党的漂亮小姐们，……我决不赋予章程以神秘的含义，也不认为它将把我们工作的重心转到大学学生会和红十字会的小姐方面

---

① 这句话有不同的记录，现将这次代表大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这段记录的有关发言摘译如下：

“普列汉诺夫（主席）：我这里记下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是：‘机会主义是由无产阶级发展的客观条件造成的。’我希望记录中漏掉的这句话能保留。”

托洛茨基：我否认在我的发言中有这样的话。我说的是：‘据在我看来，机会主义是由比章程的某种条文更为深刻的原因所决定的。不，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的相对发展水平、由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及其他的复杂原因所引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89页）——编者注

② 德语：松散的。——编者注

去。不，我们工作的范围当然仍旧是无产阶级。但是，如果法律规定必须符合实际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予以否决。再说一次，它没有打中目标。它的作者，特别是它的辩护者普列汉诺夫同志想把这个条文变成对付“知识”界那些在政治上蜕化并在腐化别人的人物的绞索，即对付自称社会民主党人、把青年聚集起来出卖给彼得·司徒卢威的人物的绞索。同志们，请相信，任何能成为套住这些先生的绞索的条文，我会第一个去抓住它，我会第一个使劲勒紧它。但是，难道这些先生不会加入某种广泛的（lose）党组织？难道他们不会自己去建立这种或那种组织？你们说，中央委员会不会承认它。为什么？显然，不是由于组织本身的性质，而是由于加入组织的人的性质。这就是说中央会了解作为政治人物的某某和某某。这样他们就不可怕了。这样就可用全党抵制的方法把他们除掉。但是，我说，限制那些站在党纲的立场上并在党组织领导下单独为党效劳的知识分子的权利，这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中央委员应当对住在奔萨城的每一个这样单个的社会民主党人回答说：“在行使你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权利以前，你必须同萨马拉和卡卢加的这类单个人物建立联系。因为现在想出了一条消除你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条文。”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74—275页。

# 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 · 编者按语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代表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少数派分子（孟什维克）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十七名少数派分子聚会在日内瓦，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商讨了反对中央委员会和夺取中央机关报的计策。会议声明要同“畸形集中的倾向”、“戒严”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决定抵制中央机关报，拒绝撰稿，宣布拒绝在中央委员会内担任工作，并扬言要在最短期间“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会上成立了少数派的秘密中央，即孟什维克常务局，由马尔托夫、唐恩、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托洛茨基五人组成。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这是第一个孟什维克的派别性文件。决议的前半部分即原则部分是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后半部分即条文部分是由马尔托夫执笔的。

然而到1927年，托洛茨基这个孟什维克常务局的成员、第一个孟什维克文件的起草人竟公然宣称：“我从来不是孟什维克。”（《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见本书第730页）正如列宁所说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

鉴于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急剧改变《火星报》<sup>1</sup>原有的策略，把报纸的思想教育作用和思想组织作用置于新编辑部的法定权力控制之下这样一种倾向，这个倾向很明显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占了上风；

鉴于这种倾向体现在成立按一定方式组成的委员会上，这个委员会只是《火星报》新编辑部行政权力的传送装置和它监督中央委员会的工具，因而把中央委员会贬低到只起单纯的服务性的技术机构的作用；

鉴于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要把党分裂为闭塞的、片面配备人选的中央组织和广大分散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这两个方面，从而败坏统一战斗、严格集中的党的思想，——

我们认为，为了保持和发展我们党的统一，必须同上述畸形集中的倾向进行坚决的原则斗争，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好党的舆论准备。

另外鉴于经常的思想斗争采用党内通常用的手段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表现在显然人为地配备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以及总委员会的人选上的“戒严”倾向表面上的胜利只不过是意味着尽可能地完全取消党内思想斗争，而代之以行政措施。

鉴于这样组织党的最高机构，象代表大会上所形成的那样，是适应于严格执行“戒严”策略，同代表大会以前起领导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实行新方针的著作力量和实践力量决裂是采用这一策略的开始，而用逐出、开除和贬谪的手段取代较为复杂但唯一有益的系统地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施以感化的工作只是这一方针的直接运用。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用有组织的力量进行实际的组织上的斗争，我们采取的措施不致

使我们置身于党外，也不致使党本身和党的中央机构的思想受到损害，但却能使我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从而保证党有可能自由地从事思想上和组织上教育党的工作。

一、为了达到我们确定的目的，应当采取一切办法扩大我们的影响范围和促使我们的观点灌输到党员的意识中去，同时又不致使我们置身于党外。

二、鉴于决定在代表大会上破坏组织的倾向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地方委员会软弱和它们的党员觉悟不高，我们应当担负地方的组织工作，并通过地方组织去影响党的中央机构，以便对它们进行改造。

三、在中央的人选未作上述变更以前，在地方工作的反对派拒绝在中央委员会担任职务，因为只有这种变更才能保证中央有工作能力和使这一机构发展成为党的真正领袖的能力。〔删去：在这方面的起码保证是接纳两名反对派参加中央委员会。〕<sup>①</sup>

四、因对代表大会工作进行批评而作的宣传应当给自己提出如下实际任务：（1）各委员会要对“戒严”政策和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机关报根据这一政策的精神采取的实际步骤表示反对态度；（2）同党中央旨在压制个别党员和组织的行动或意见自由以及在党组织中加强〔家庭式的〕小圈子作风的各种倾向作斗争；（3）揭露代表大会建立的党的机构缺乏工作能力〔和无独立性〕，因为这种情况将在它们的政策中表现出来；地方委员会要施加压力以便迫使改变这些机构的人选。

五、对现在这样的中央机关报，反对派采取抵制态度，拒绝任何撰稿工作，拒绝〔积极地〕协助提供材料等等。

附：进行抵制并不排斥利用中央机关报这一正式的党的机构

---

<sup>①</sup>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会议在讨论决议时所作的修改，以下同。——编者注

来刊登决议、给编辑部的信、反驳文章等等，也不排斥履行党员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寄送地方出版的小报、报告等等的义务。

六、只有在《火星报》旧编辑部仍由原班人员工作或者在中央委员会使《火星报》旧编辑部有可能作为单独的团体在党的报刊方面完成那些现在《火星报》编辑部无力完成或从“戒严”政策的观点出发拒绝完成的任务之后，对中央机关报的抵制才能停止。

七、由《火星报》旧编辑〔和撰稿人〕组成著作家团体，请求中央委员会准许它独立出版一切有关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问题的小册子和小报。该团体提出的自己的特殊任务应是：（1）成立著作家中心，在未争得党的中央机构〔增补：或改变现状〕以前，〔拟〕在党内集结“反对派分子”，（2）宣传使“反对派”同“多数派”分手的策略思想和组织思想并在书刊上同“严苛”和“戒严”倾向进行斗争，（3）通过相应的出版机构或通过帮助委员会组织出版事宜来为地方组织的鼓动工作需要服务。

八、如果中央不准成立这样的团体，出路是：（1）自行组成著作家团体，附属于某地方委员会，（2）自己把自己的著作送到某些委员会以便在地方出版，（3）不用党的招牌出版自己的著作。

九、如果中央机构对自己的权利作任意的和明显非法的解释，使我们——违反我们的意志——在党内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反对派则公开反对中央机构的策略，拒绝服从非法的决定和继续自己的工作〔增补：并诉诸下属代表大会〕。

写于1903年9月13—20日之间。译自《列宁文集》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6卷第246—249页。

## 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

### · 编者按语 ·

这是托洛茨基专为反对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反对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而写的小册子，由孟什维克的新《火星报》编辑出版。托洛茨基在题词中说明是献给他“尊敬的导师”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的。

托洛茨基在书中处处反对列宁关于党和党的纪律的观点。他把政治策略同组织任务对立起来，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提出“独立的组织任务”，说组织问题将在政治斗争中“顺便得到解决”。无产阶级不应统一在自己的党组织周围，而应当统一在“一定的政治口号”周围。托洛茨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反对建立一个组织严密、有战斗力的党，使无产阶级在强大而有组织的敌人面前解除武装。

托洛茨基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建立铁的纪律，声称只有在党的决定不与那些有义务服从党的人的愿望和观点相抵触时，才应当服从党的纪律。这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组织原则。

列宁把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叫做新《火星报》即整个孟什维克的《信条》。它清楚地表达了孟什维克的观点，从而使布尔什维克便于揭露孟什维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说这本小册子从多数派利益的角度来看是非

凡的。

1928年，在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高潮中，这本小册子曾以《1904年托洛茨基论党，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的书名，由联共（布）党史委员会作注，作为反面教材重新出版。

## 序 言

去年是我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年。

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就行了。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期待我党披荆斩棘，一举消灭世界反动势力，这是历史赋予我党的伟大任务。在这样一个时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却似乎是，它不懂得除了进行偏狭的党内争吵外还有其它任务，不懂得除了法律权限外还有其它问题，看不到除了党的分裂外还有别的前景。这种情景确实可怕！

相当多的党员在已经远远地听到即将来临的历史性暴风雨的雷鸣声时，仍然翻来复去地讨论组织方面的琐碎问题，怀疑走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前列的杰出的、久经考验的同志犯了理论错误——而这些错误连原告自己都说不清楚——，号召对半个党进行声讨，在自己的伙伴赞成同“反对”派和解时就同他们疏远，并且最后准备宣告不仅同积极的“调和派”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且还同一切他们断然认为是“调和派”的人作斗争。这一事实包含着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悲剧。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我们度过了这整整的一年。分裂有时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大家都感到局势可怕，几乎所有的人都懂得分裂的罪恶，但是没有人能够从历史的铁腕下解脱出来。



然而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维护党的统一的人有充分的理由放心地展望未来。个别的狂热主张分裂的人——不久前他们的“不妥协态度”还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甚至遇到了他们昨天的盟友的顽强抵抗。

显然，我党处在一个内部发展的转折关头，我们认为这个转折关系到党的全部革命活动。这个转折将必需以缔结一项和约为标志，缔结了和约，才有可能把全部能胜任工作的力量集中到党的总任务上去，我党所有的健康力量所渴望的和平解决必定同时意味着所谓“少数派”在组织上的死亡。

我们——“少数派”的代表，不会为这种死亡担忧，因为这种死亡尽管初听起来很新奇，但这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计划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曾想把全党拉到“少数派”那边去。否则这就同我们的名称的语源学的意义相矛盾了（“党”不能存在于“少数派”之中），况且这会导致对任务的破坏，“少数派”的组织是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显得荒谬：“少数派”，即一个正式党的非正式部分反对党内某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产生于对党的发展道路的简直是梦幻的想法。按照这些想法，党不是在那些策略和组织上大多是进步的派别维持存在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而只是通过受托协调、领导党和无产阶级的中央委员会（或者中央机关报或者委员会）根据已知的前提合乎逻辑地作出策略和组织方面的新结论来得到发展。这种纯理性的思想方法产生了一种偏狭的妄自尊大的严格主义，对于这种严格主义说来，由于存在思想方法不同的分子而引起的任何“充血”都是一种病态，是一种组织上的肿瘤，需要授权外科专家动用手术刀加以切除。

我们既不需要在序言中也不需要在小册子里对历时将近一年的组织混乱的种种插曲加以说明。已经有大量的著作谈到这个

问题,这些著作卓有成效地磨钝了全党的牙齿。<sup>①</sup>对我们来说,在现有条件下重要的只是,“少数派”为自己争得了公民权——而由于这一斗争是在原则上进行的,因此这一点对未来的反对派也适用。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声明——它可以说是总结了党的意识中出现的变化,而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的话,这是党走向真正统一的决定性步骤——彻底地并且但愿是永不更改地把“戒严状态”的行动和方法送进了档案馆。然而这样看来,党的那种体制的取消同时也就意味着“少数派”在组织上的死亡。

“安息吧”,当少数派在党内消失的时候,它可以安心地这样说了,“安息吧……”

同反对某种党内政治的斗争有关,“少数派”——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少数派的一个处于特别有利条件下的小部分——使党的政治实践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并且寻求新的策略道路。“少数派”组织上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它在这方面争取到的成就失去了意义,而是相反。我们形成了坚定的信念:摧毁在党的两部分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墙,才有可能使他们的全部力量集中用于改造我们党的实践,用于共同解决由我们特殊的政治发展而出现的策略任务。

由于进行简直是经院式的组织争论,同志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不言而喻,这本小册子试图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那些政治策略问题上去,而这些政治策略问题同我们党今后的整个命运是联系在一起。

但是这一著作的内容并不仅仅是策略问题。去年的重大的内

---

<sup>①</sup> 此外,最近有一个独出心裁的人用德文以八十五页的篇幅出版了一部表明他非常无知的书,他在其中向欧洲公布了我们党内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的全部错误和详情。如果有任何德国人去读这一部惊人的著作,我们将不惜付给他很高的代价,如果有人从中了解到某些东西,我们将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  
——托洛茨基注

部意见分歧只是使“内政”<sup>①</sup>的某些实践方法声誉扫地，——这些实践方法没有经受住客观的生存考验。然而，同这些实践方法相联系并且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则的偏见依然在党的思想领域中广泛地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怀疑这些偏见最终将会灭绝，但是我们认为，积极地促进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

因此，我们必须用我们这本小册子的一部分来论述列宁同志的新书《进一步，退两步》，在他这本书里，有许多这类偏见被提高成一种体系。我们承认，我们非常不喜欢完成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尽管在该书出版之前确信列宁同志对维护他的立场说不出什么值得注意的话，因为他的立场是完全没有出路的，然而我们确实没有料到他的思想会象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贫乏。我们阅读这部书的最初的反应是要简单地撇开它而转向列在议事日程上的那些问题。然而，当我们更加理智地深思熟虑的时候——这种思考的核心我们将在后面阐述——就发现不能简单地转向这些问题，必须说明理由，因为党的意识的这种不幸的状况不允许简单的转移。

当然，自认为绝对没有沾染组织官僚主义的、“雅各宾派”的偏见的读者可以只看小册子的前两部分。

本书是在最近几个月内断断续续写成的。在这期间，“没有时间”的想法一再使我搁笔。在这一时期，垂死的沙皇制度竭力讨好化身为日本而在它面前复活了的资产阶级复仇女神，在她的祭坛上把受欺凌的民族的兵力和生活资料付之一炬；在这一时期，在下面，在人民的底层，进行着看不见的、然而不可避免的革命愤怒蓄积的分子过程，这种愤怒也许明天就会以不可抗拒的狂暴力量爆发出来，就象湍急的雪水冲决桥梁和堤坝一样，不仅会冲垮警察的路障，而且也冲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全部

---

① 即党内政治。——编者注

机构；在这一时期，似乎只有一种学说，即起义的学说，是合乎时宜的，似乎只有一种艺术，即街垒的艺术，是可以允许的——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为了组织方面的偏见而争论，清理理论上的诡辩，对新的策略问题表示态度，寻找无产阶级自主行动的新形式，要想在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时刻做这些事情，革命的直觉就会愤怒地抗议说：“没有时间！”

否，正是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可以信赖的声音这样回答，而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正是时候！始终是时候！

谁也不能预先知道时机和时刻。在决战的日子来到前剩下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我们都必须利用它来进行自我批评，来进行自己的政治准备，才能在参加决定性事件时无愧于同我们的革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伟大阶级。

谁也不能预先知道时机和时刻。如果出乎预料，专制统治的死期还要拖延下去，如果出现一个风平浪静的时期，这时起义时期产生的反对集团和革命集团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将留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我们的位置上，并且完成我们的巨大工作。反动也好，革命也好，都不能使我们背弃我们的历史任务。

当然，如果伟大的事件开始了——也许就在明天——我们共产主义者作为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先驱一定会尽我们对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的义务。我们将在资产阶级的街垒上战斗，我们将为资产阶级争得自由，没有我们，他们是不能争得这一自由的。

但是即使这一时刻迫在眉睫，我们共产主义者也不想和不应忘记或者抛开我们的无产阶级任务。我们必须使我们的革命策略服从这些任务，不仅在平凡的日常政治生活中，而且在革命爆发的前夕和在革命本身的狂风暴雨的日子里都是如此。我们必须不仅越过罪恶的沙皇制度，而且越过革命的街垒和彼得保罗要塞被摧

毁后的废墟，向前眺望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道路！

H·托·

1904年8月23日

## 组织问题

### 对 话

(仿苏格拉底)

“请您说说，”如果谈话对手是善意的，他就会同情地提出问题；如果他是恶意的，他就会咬牙切齿地提出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他是恶意的），“请您说说，您是不是反对列宁的组织计划？”

“您所说的列宁的组织计划是什么呢？”

(片刻的难堪。)

“章程吗？”

“不，绝对不是，”谈话对手有点感到受了侮辱，“只有那些把我们看成‘集中制官僚’的‘少数派’才认为，对我们来说章程就是一切。这与章程无关，说的是整个组织计划。……”

“您是说列宁写给彼得堡一位同志的‘信’吗？”

“嗯，是的。那封信也是一个例子；在《怎么办？》这本书里也阐述了所谓的组织计划。”

“但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对不起，您说什么，……”对手已经完全畅所欲言了，“什么，内容是什么吗？组织计划……列宁的计划？”

“嗯，是的，计划，列宁的计划！”

“妙极了！老是听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组织计划，列宁有一个计划……而现在却突然问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的，人们也总是这样说特罗胥将军（那是在巴黎被包围时的事）：他有一个方案，特罗胥有一个方案。不过他的整个方案就是要把巴黎拱手交给普鲁士人。不，你一定要明确地对我说，列宁的组织计划是什么。”

“唉，我说不出……这太突然了……您读了《怎么办？》吗？”

“我读过了。好吧，如果您说不出整个‘计划’，请您至少讲一讲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分工……秘密活动……纪律……整个集中制……为了使中央委员会能够监督……喔，那个所谓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以及反对民主主义——原则就是这一些。”

“很好，您说到分工。我同意这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它对社会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不过难道这个原则是列宁宣布的吗？对不起，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已经说明了分工的优点。您翻开亚当·斯密的书就会发现，他为一根针展示了多么迷人的远景。您认为列宁象某些神话中的人物发明农业、畜牧业和商业一样发明了分工，这种看法我确实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我知道，我知道，您想说，列宁在即将进入‘第四个时期’的时候宣告要采用这个原则。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们真的认为‘少数派’反对分工的‘原则’，或者说反对秘密活动的‘原则’吗？”

“我不知道……不过阿克雪里罗得毕竟写到了‘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列宁说，当‘少数派’由于反对中央领导下的分工而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时，就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我想列宁是对的。”

“关于‘少数派’的‘嚎叫’，我马上就要讲到，而且要详细地讲。”

不过在这以前，我要先提一个问题：分工能够简单地成为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所拥护的原则吗？或者说人们能够把它当作这样的原则吗？分工在技术上讲是有益处的，它不仅对社会民主党有好处，而且一般说来对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部门和任何一种行业都有好处。如果说分工能够被看作是组织原则，那么这仅仅对手工工场适用，而一般地说对一个政党，尤其对我们的政党是不适用的。对于一个本身的任务就是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组织来说，分工的‘原则’绝不能代表它的特点，这难道不是任何人都很清楚的吗？如果抽象地就这个原则本身来说，它会使我们党简直成为一个复杂的联合会，因此使我们党失去了个性。再说秘密活动吧，这已经是一个比较狭义的原则，它仅仅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但是秘密活动也绝不是同社会民主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党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秘密地进行工作，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秘密活动就本身来说不应该成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关于集中制也可以这样说；工厂是集中制的，国家是集中制的，秘密结社也是集中制的。集中制中的‘正统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没有在您的愿望表上提到领导集中和责任分散这些列宁主义‘原则’<sup>①</sup>。我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些原则。我只是说，在我看来，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同西哀士神父想作为他的宪法的基础提出来的思想一样：‘信任必须来自下面（责任分散）；而权力必须来自上面（领导集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也不能认为实现这些原则是它自己的使命。简言之，如果人们把您称之为列宁的‘组织原则’的所有一切综合在一起，就会得到一个通过秘密活动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复杂的集中制联合会。但这还不会成为社会民主党。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下定义还不意味着它作为社会民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7页。——编者注

主党的自我否定，只是表明它的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组织上的代数公式，如果用具体的数值代替公式中的字母，这一公式是可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内容的。但是‘纲领’并不包括这些具体数值。

一位同志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把《给一个同志的信》这一整篇文章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词都换成了社会革命党人一词。这样做的结果，一次也没有出现矛盾。如果您把同样的办法用在我们的党纲或关于策略的决议上，那您就要吃苦头了。由于这个原因，《给一个同志的信》里阐述的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模式中社会民主党在哪里呢？你们会回答说，它是一个内在的前提。它也许是一个主观上的前提，却决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前提。但是只有当它是客观存在时它的长处才能表现出来。”

## 分 工

印刷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宣言，并不是非由社会民主党人承担不可的，散发或粘贴宣言也是同样。当然，在俄国的条件下，只有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党性很强的党员，才能完成这一类工作。但是正因为这项工作具有纯技术的特点，所以不必向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提出特殊的政治要求，这项纯技术性工作本身并不会使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得到发展和加强。因此必须开辟党生活的另一领域，在这里印刷工作者、分发者、图书馆员和组织员互相来往，他们并不是作为党的技术部门的局部工人，而是作为党的政治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互相接触的。在我们的组织工作的实践过程中，这一准则到处都被人们忽视了，而党的工作的内容被理解成为仅仅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各种不同的技术职能的总和。



这种紊乱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党，当然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在内，都在党的活动舞台的后台完成印刷、散发、粘贴等工作，但在我们党内，这些工作占最首要的地位，占去党的绝大部分人力和物力，因而使人们对这些工作高度重视，发挥了最大的创造性，付出了大量艰苦劳动。我们不断地同警察的压制进行斗争，它在几小时内就把我们用几个月的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毁坏掉；我们不断地同我们的低劣的非法的印刷工艺进行斗争，这种工艺在我们的石器时代借助于蒸气和电气开辟了沙漠绿洲——在上述这些不知疲倦的斗争中，政治工作的纯技术性的前提条件开始僭夺党的政治任务的整个领域。毫无疑问，在这些部门紧张工作的有思考能力的人，愿意促使分工成为革命的（正统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这就是下述情况的物质的先决条件：用组织技术的任务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的任务，用同政治警察的隐蔽的周旋这个问题来代替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问题。

在这里需要附带多说几句：新的“政治派”倾向是在同老的“经济派”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派”倾向在组织上表现为所谓的“手工业方式”。一次突如其来的“开窍”可以影响手工业者的思想，他们对自己的空白（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无论在组织上或其他任何方面）痛感羞耻，在这样一些手工业者的思想意识里，分工就是一种救命的、解放的原则，在他们心目中，光辉灿烂的理想境地就是工场手工业，而不是大工厂（在论争的文章中提到过的那种大工厂）。这是因为大工厂是以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前提的，这种高度技术使劳动分工的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是建立在“手工业方式”的技术基础上的，是把劳动分工看成为理论崇拜的对象的。

“……每个小轮子修整得越好，从事共同事业的做零碎工作的人数越多，我们的网也就会越密，而不可避免的破获在我们的总的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

就会越小。”①

在这几行字里，同一身兼备手工业的所有技能的原始“手工业者”相对立的是工场手工业的真正的“做零碎工作的人”（局部工人），同复杂机器的“小轮子”相对立的是完整的个人。在这个组织系统里，昨天的手工业者的缺陷——无知、缺乏首创精神和政治上的原始性——变成了一种长处，因为“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②

“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③

列宁在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就在头脑深处埋下了这样的想法，即知识分子害怕大工厂，他们“反对中央领导下的分工”的嚎叫只是暴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把马克思的下一段话同列宁的这一想法对照一下。

“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中央’），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④

然而，我们担心，我们的对话伙伴（我们在这一节的开头已经不理睬他了，他与其说以意识清晰而出名，无宁说以顽固不化而出名）将会从这一节引出如下的坚信不疑的结论，即“少数派”反对分工，赞成复活“手工业方式”。但是，我们却真正想引导读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到：分工尽管有那么多益处，却仍旧是一项纯技术的原则，换言之，谁不是在技术工作和党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76—377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7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400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395页。括号内的“中央”两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的生活中间划等号，那么谁就不可能把分工视为党组织的基本原则，相反他必须得出结论：党的生活就是减掉“分工”后所剩下的东西。

既然经济力量的需要迫使我们不得不依靠我们所能掌握的可怜的技术，在我们工作的一定领域，采取一种纯粹工场手工业式的分工，那么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到：第一、尽最大力量限制这一技术领域；第二、不要把熟练和最熟练的局部工人即修整得很好的“小轮子”的理想从技术领域搬到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工作领域来，在后一领域里，我们的模范并不是那些“为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规矩地、迅速地和唯命是从地“在一个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手足活动”的“零星细小”的人物，在这一领域里我们的模范应当是完整的政治的个人，即党的成员——他们对党的生活的所有问题都很敏感，他们在一切“中央”面前都能坚持自己的意志，为此不惜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采取抵制的办法！

“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很对的，但是难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多数派”的读者也许要这样提问。他在十分钟前还相信，“少数派”是拒绝分工的；“难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这毕竟是不言自明的啊！”

这一回答更加令人不解，因为站在对立面的双方所有党员，从下到上，从特维尔委员会<sup>①</sup>到列宁同志<sup>②</sup>，都不断地重复这一回答。我们说的是这样一种绝对的必要性，即绝对必须造就党的成员、自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不是造就单纯的技术熟练的“局部工人”。然而，人们回答我们说：“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对谁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呢？这种“自明之理”又

① 参见《火星报》第66号上的该委员会的决议。——托洛茨基注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0页及以后各页。——编者注

在何处得以实现呢？“这”在我们党的工作内容里是不言自明的吗？换言之，造就政治方面善于思考的党员同志是党的工作绝对必要的构成要素吗？或者，在列宁的所谓的组织计划中这项任务是“不言自明的”吗？或者，对每个社会民主党员来说，这项任务归根到底仅仅在主观概念上是“不言自明的”吗？后一种看法无疑是对的，尤其是当安祥地沉睡着的“自明之理”，一旦被谴责和控告的雹子惊醒的时候，更是如此。但这还不够，绝对必要的是：正是这项“完全不言自明的”任务必须成为明确意识到的目的，并且在党的工作中切切实实地被执行。迄今，这一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微乎其微。更有甚者，目前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组织拜物教驱使许多同志直接反抗任何一种正确提出这项“如此完全不言自明的”任务的尝试。这是不言自明的。

把分工的技术原则提高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从这一思想中有意无意地产生出最终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即意识同实行的分离、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同技术职能的分离（只有依靠技术职能才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更精确地说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意识的中央而出现，而在这个中央下面有着严守纪律的、执行技术职务的人。

列宁用如下的经典的公式表示这一组织的理想：

“但是……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事情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的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有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坚强的、由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组成的组织。”<sup>①</sup>

在这一方面，列宁同志从来没有想到给自己提出这样一项“如此完全不言自明的”任务，即让每一个局部工人参与整个党的政治工作，借以补偿分工的拙劣的方面——相反，他把“担负”零碎工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9页。——编者注

作的“人”同中央领导人物对立起来，而由于领导人物具备他们个人独有的自觉、洞察力、创造性、耐性和坚定性，他们就给所有“零星细小的人物”灌输这样的信念：共同事业需要这样的“零星细小的人物”。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我们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场呢？

请比较一下：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我们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手工业者’，他们本身执行他们原始的‘经济’工作的一切职能〕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党〕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中央’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作为被集中起来的职能〕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相对立。”①

那封《给一个同志的信》中所阐明的理想的、几乎以几何学的尺度制定出来的计划，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斗士、这些未来的“职业革命家”应当怎样地被培养出来。革命的积极分子、印刷工作者、担任职务的党员，……“教皇、将军、妇女、群众、禽鸟和蜜蜂——所有这一切组成一个强大的合作社”②，是按照由社会民主党的职业革命家所制定的计划组成的。然而，哪里有后备力量可以用来补充这些短命的斗士阶层呢？手工业学徒几乎都可以变成师傅；但是局部工人几乎没有机会成为手工业工场的场主。人们自问：今天的“局部工人”借以上升为政治活动家阶级的桥梁在哪里？有了政治活动家的身分，局部工人不仅可以执行零碎的职责，不仅必须“相信”，职业革命家的眼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  
——编者注

② 摘自赫尔岑给巴枯宁的一封信。——托洛茨基注

是盯着他们的行为的；不，不限于此，他们还能够在政治形势中独自地掌握方向，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发挥首创精神。

在一系列的委员会里，普遍采用了举行所谓的“辩论会”的办法，在这些集会上，会计、分发员和印刷工人不是以他们的职业身分出现，而是以讨论党务和一般政治问题的党的成员的身分出现。当然，这仅仅是对发育不良的部分补偿（在我们这种野蛮情况下实行劳动分工势必产生这种发育不良），而人们正是从这个观点指出“辩论会”内容贫乏和有局限性。但是，只有在这样的“辩论会”中开始培养党的成员，在目前的工作状况下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辩论会才能搭上一个十分狭窄的桥梁，使这些“零星细小的人物”通过它可以上升到“一”这一特殊阶层（这里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零”，他们只是错误地为这些“一”奔跑）。而到时会怎样呢？列宁同志在他的“计划”中以令人羡慕的彻底性把这些“辩论会”处理掉了——“辩论会”不适应秘密活动的要求，并且破坏计划的统一和协调。这是对的，那么辩论会究竟有何用处呢？人们可以用一种更为廉价得多的手段获得“辩论会”应当得到的结果。这只需要：

“应当使一切参加工作的人和每一个小组有权把自己的决定、愿望和要求反映给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即使不成立‘辩论会’这种不灵便不秘密的组织，同样也能召开一切党工作者的完整的会议。”①

列宁以何等蔑视的态度谈到这些“手工业方式的”委员会、工人小组和学生小组。这些组织都是由“没有专门经验”的成员组成的，都是不去“获得专门经验”而是忙于开“无休止的包罗一切”的会议的。② 只有中央才有资格考虑和讨论“一切问题”，而所有的分组、小组和个别代办员考虑问题，则必须与他们的专业相吻合；他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09—210页。——编者注

② 参见上书第218页。——编者注

们讨论问题，也必须与他们的地位和分工相适应。党的意识要集中起来，剩下的只是把局部工人的零碎的经验变成中央的财产（“反映”给中央）——这样，所有局部工人的实践就丰富起来了，局部工人会得到意识到自己使命的中央的培养。

把这一模式作为信条接受下来的实际工作者，最后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周围只存在着相信中央的“零星细小的人物”时，社会民主党人从何而来？党的杰出的战士谢韦里亚宁同志的信（载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主编时的《火星报》<sup>1</sup>第五十一号）表明：许多实际工作者得出了何等不可置信的、实在是悲剧性的结论。信中写道：

“各位看见吗？现在那些老练的有才干的同志常常放弃委员会的工作，转而承担专门职务。这是一种可恶的症候！必须成立一个特殊组织，专门来完成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训练。当委员会的工作领域不包含对革命的学校说来是主要的那些要点之后，这个特殊组织将归属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力量的分配权理应由中央委员会掌握，绝对必需把委员会的战斗性工作同新组织从事的准备工作尽可能彻底地分开。”<sup>①</sup>

事情就是这样摆着的。没有人做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所有的人都退回去，干零碎的职务，而在党的工作不允许“完全不言自明地”去完成培养积极的和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一任务之后，剩下的只有在党的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直接由中央委员会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教育机构。社会民主党在它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没有教育和培植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必须在这以外造就社会民主党人。战斗性工作同准备工作分离开来了，说得更准确些，革命的行为同社会主义的行为割裂开来了。人们还需要以更加浓厚的色彩来描绘工场手工业式的组织理想的破产吗？

<sup>①</sup> 载于《火星报》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第51号。——托洛茨基注

## “民主主义”

各委员会同我们老的、相当笨拙的、近乎民主的组织存在形式进行了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使集中制获得了彻底的自我解放，使它摆脱了各委员会所属人员的任何约束。委员会的三个或五个委员是“工人的社会机体的统一和意志”的化身，他们做决定，他们“制造”党内的新方针，他们把“经济主义”存档，他们使“集中制”发生作用，他们承认或否认《火星报》，总之一句话，他们执行着整个党内政策。在他们下面是局部工人，这些人编纂宣言、收集经费、散发小册子（当然，如果制定方针的委员会能够供应他们小册子的话）。在近三、四年来尖锐的党内意见分歧中，许多委员会里发生了一系列性质类似我们十八世纪宫廷革命的政变。在上面，在很高的上面某处，某人把某人赶到某地，某人取代某人、压倒某人，某人号召干某件事，最后，委员会的警卫了望台上出现了一面旗帜，旗上写着：“正统性、集中制、政治斗争……”。

在委员会“承认”《火星报》是自己的领导机关报或是后来又“拒绝”给它这一称号之前，委员会有责任使这一决议在所有隶属于委员会的由“局部工人”组成的小组中得到通过（不仅仅是形式上“塞了下去”，而是真正灌输到分发者、出纳员、组织员、辅导员、鼓动员和所有其他的“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的意识中去）。但是我们怀疑哪怕只有一个委员会曾经履行了这一职责。一个如此复杂的“民主的”过程已被或将被一个单一的“集中的”命令所取代。但是如果这些隶属于委员会的小组表示反对并且不同意根据 *Par ordre du moufti*① 承认新“方针”呢？那就解散这些小组，而这一

① 法语：穆夫梯的吩咐，意即上面的命令。——编者注



地方的整个工人运动随之消失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我引一段话为例，看看一个参加过前一时期的斗争的人在他的一封给国外的信中怎样描写《火星报》精神上的胜利。

“1902年11月6日——本地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一份表示和《火星报》完全一致并承认它是理想的党的机关报的决议在委员会宣读了。委员会承认这一决议，不过有一点小的保留，它谴责尖刻的笔战。最后决议被撤回了，在这以后提案才未加补充而得到通过。于是几乎丝毫不差地重演彼得堡发生过的情况：对此不满的人挑动那些特别有野心的分子反对‘专制的知识分子’，由此证明（原文如此!!!），鼓动和教育直至现在恰恰几乎完全是由这批不满分子掌握的，因此他们的影响毕竟是十分强大的。现在斗争已白热化。老的鼓动员几乎必须全部离开（到哪里去?!?），合适的补充人员很少，因此我们很不轻松（当然不!!!），但是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一个月之后，这位无畏的战士又写道：

“1902年12月4日——这里的情况如下：《工人事业》杂志6的拥护者显然以双倍的注意力对付我们。11月24日，星期天，委员会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委员会7的建议并保证尽一切可能给予支持。但是第二天，五个家伙——《工人事业》杂志的拥护者——利用了若干同志缺席的机会在委员会内发动公开的政变。他们提议，把缺席者从委员名单上除名并给《火星报》写信①，不许它刊登已经寄出的承认它是党的机关报的文件。您大约已经知道这一消息，但是大家委托我通知您，您无论如何一定要登出这一文件。它将是和这里的笨人进行彻底清算的信号。

对大家说来，全部事件发生得相当突然，虽然以前已经发现，他们已成功地使许多工人——包括极有影响的人——产生思想混乱。

目前面临一场激战。不管怎样，这里愈来愈多的人相信这一看法，即事态最终将导致分裂。最近证明(!!!!)，地方工作主要是由‘经济派’进行的，事实上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到处，这里以及彼得堡，听说还有哈尔科夫都

① 《支持人民还是反对人民？》，载于《火星报》1904年1月15日第55号。——编者注

遇到挫折。”①

人们看出，不能把这位积极的同志看成是跟在群众后面慢吞吞地走的人，或者看成是拜倒在群众自发性面前的尾巴主义者。他不当尾巴，但是可惜他后面也没有尾巴跟着！他在空无一人的地方打手势。这位同志固然肯定是超出一般水平——他后来在戒严状态<sup>8</sup>的实践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使形成这一整个时期特征的做法发展到荒谬的、漫画式的地步，正如我们从那些信上所看到的那样，“的确是到处：这里以及彼得堡，听说还有哈尔科夫”，都发生了这种情况。这个特征就是“职业革命家”摆脱了对那一阶级的觉悟分子的一切义务，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庸俗习气”！），而且是政治上的义务（“尾巴主义”），而从政治上为那一阶级服务是我们生存的目的。随着各委员会在集中制的“原则”中找到支持，它们也就不再需要依靠工人了。

人们注意到：新方针已经制定了，已经“狂热地”宣布第四个时期开始了<sup>9</sup>，《火星报》已经当了领导，这时突然“大家都相当吃惊”地看到，鼓动和宣传“几乎全部”是由对《火星报》不满的分子进行的；没有人可以代替这些分子；这些人挑动特别“有野心的”和——出人意料的怪事——最有影响的工人反对《火星报》。从这件事得出这一教训：如果“笨人”妨碍你的行动自由，要搞高级政治是确实很费劲的。②

---

① 出处不详。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② 遵循这一原则的敖德萨委员会在一个声明中提出这个口号：“俄国人民的解放者（原文如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万岁！”这是一件怪事！

敖德萨委员会已经公开地把人民的解放只能是人民自己的事这一不重要的思想当成尾巴主义的残余扔到一边。人民的“解放者”、敖德萨委员会万岁！它已经把敖德萨工人从自己解放自己这一任务中解放出来了。有一个所谓的“人民英雄”许诺说将由军国主义的组织为人民带来自由；人们只是要问，敖德萨委员会的口号在哪一点上比这一谎言好些或者坏些。——托洛茨基注

但是，用各种形式（从最野蛮的到完全具有议会活动能力的形式）实现代理思想——为无产阶级代理——的方法，那时在《火星报》整个时期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遇到过来自“火星派分子”的自我批评。用什么来解释这个事实呢？

从前面的叙述中，读者已经找到了解释。为无产阶级、为它的原则、为它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任务是由《火星报》的全部工作来承担的，也就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进行的。

在“火星派分子”的意识中为政治代替积累心理学因素，这一工作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说明。但是同样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工作是有局限性的，它在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总的发展中只是一个次要过程。而无产阶级普遍的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过程在比我们这里更高的一个阶段上也会表现出它自己的各种内在倾向：自己的各种思维方式、自己的各种策略方法、自己的各种独特的口号和自己的独特气质。每一个局部过程都努力超越它的性质给它规定的界限，并且把它的策略、它的思想、它的口号加给由这一局部过程创造出来的总的历史运动。手段违背目的，形式违背内容。

我们早从上文看到过这些“代替”方法的典范，而我们刚才引用的好战的“火星派分子”的那些信又为“党内”政治领域的代替方法提供了例证。这些方法是一整个时期的普遍现象。它们的这种或那种、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掌握零零散散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允许慢吞吞的方式，就不允许和“笨人”没完没了地纠缠，换句话说，要动员无产者来支持阶级政策的口号，其速度远远比不上革命知识分子围绕着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原则团结起来的速度。但是，如果人们借口维护运动的原则纯洁性和“正统性”的利益，而把代替方法的缺点强加于运动，那么这就是破坏整个运动的基础，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使党防止任何一种意外。但是，“笨人”（无产者）会在决定性的时刻抛弃我们，使“大家都相当吃惊”，这一悲剧性的意外恐怕是确定无疑的。为了避免一个如此肯定的悲剧性的前景，绝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组织上加强我们和工人阶级觉悟分子的联系。我们的每一个原则性决定必须是他们的决定。

《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严厉地谴责“经济派”努力把地方组织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委员会的决议只有经过所有的小组通过之后才能生效”<sup>①</sup>。我们绝不拥护由委员会举行全民投票这一合法主义清规，问题不在于“民主的”职能，但是委员会必须考虑到，它的决议只有表达出所有从属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有觉悟的意志才能“生效”。一定要不动摇地力求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为了这种或那种“民主的”偏见，而是为了党的巩固和活力。

我们在这里不去详细谈论怎样达到这个目的这一问题的技术性方面，我们介绍读者去看切列万宁同志写的小册子《组织问题》，我们认为，它的主要内容不在于这个或那个“组织计划”，不在于效能很有限的委员会的“自治”原则，而恰恰在于那一简单的、几乎是浅显的、但在我们看来已被过分坚决地“清算掉”的思想，即通过加强领导组织同技术机构的“做零星细小工作”的人员之间的极其紧密的集体思想纽带来取得发展的思想。象在别的地方已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必须“从党的基础那里，也就是在积极主动的无产者当中去寻找党的稳定性的保证，而不是从无产者的组织领导那里去寻找这一保证，那些领导认为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认为革命对无产者来说是无法预见到的，他们能够用他们的翅膀出其不意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51—352页。——编者注

地把革命扫掉”<sup>①</sup>。

“难道这是简而言之吗？尽管‘少数派’不拒绝‘分工’，但是他们把分工看作祸害，他们想用另一种更坏的祸害来纠正它。‘少数派’干脆回到‘民主主义’，虽然是一种隐蔽的民主主义，‘少数派’要求委员会决议由从属于委员会的小组通过，他们使‘职业革命家’从属于运动的觉悟不高的分子，用这种方式削弱委员会工作的首创精神和锐气，这样就打开了通向‘经济主义’、工联主义、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大门，最终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民主投降！”<sup>②</sup>

我承认，我是有些怀着憎恶之情来重复这种夸大不实之词的，但是必须习惯这一点！面对当前这个严酷的时期，如果列宁同志在他下一部“大作”（也许已经写好了）里给自己出一个题目，要证明“少数派”在向讲坛社会主义<sup>10</sup>发展，那么我们决不会吃惊。你们以为难证明吗？一点不难！

“‘少数派’难道不是嚎叫”（请原谅，我稍微用一会儿可敬的列宁同志的笞帚！），“不是日夜嚎叫，说我列宁宣布的分工原则使他们畸形化，使他们变成小螺丝钉和小轮子<sup>③</sup>，说我设计的体系剥夺了革命家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这些特点是那些可怜的、被我从中央位子上赶走的知识分子们所不可缺少的）吗？可怜的家伙！很明显，他们读过德国教授施穆勒的东西，这位教授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和不幸的‘少数派’的候选人一样痛切地抱怨分工，说分工‘一再不断分裂人、把一种思想和内容都空虚的专门活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军事”讨伐》，载于《火星报》1904年3月15日第61号。  
——编者注

② 用讽刺方式编述的列宁的话，原文开头没有引号。——编者注

③ “……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进一步，退两步》第147页（《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编者）。——托洛茨基注

动——没有思想的、枯燥无味的专门活动——强加于许多人（应读为：“党员们”——按马尔托夫同志的机会主义的说法），使人在思想、理智和肉体上都枯竭憔悴’等等，等等。没完没了地发展你们的原则吧，‘少数派’先生们，你们将很快投入施穆勒先生的怀抱！”①

可惜的是列宁同志还没有足够的思想上随机应变的本领，否则他会利用同时代人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文献写出更多的惊人的文章！

我们当然不会不回敬列宁同志。让我们翻开他最近发表的小册子的随便哪一页，例如第一五九页！这里谈到“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并在括号中说：“实践总是（注意）走在理论前面的。”②总是？我们不顾这是加着重号的字而开始大叫起来，真的是总是吗，列宁同志？我们倒是认为，理论是过去几个世纪的普遍经验的总和，它也能够预见明天的、甚至整整几十年后的实践。但是按照列宁同志的“理论”（人们不得不相信这一理论是反映他自己的“实践”的），理论总是（总是？？）实践的尾巴，跟在实践背后蹒跚而行。这难道不明明白白是从理论上为“尾巴主义”作假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这样来开始并不那么糟糕吗？

## 纪律和集中制

“党的纪律”，这是“多数派”的火气十足的口号之一。早在这

---

① 以讽刺方式编述的列宁的话。——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0页。括号内的“注意”两字是托洛茨基加的。  
——编者注

个问题从地下冒出来之前，我们这些“少数派”的成员就有足够的机会听到关于纪律的种种议论，非常遗憾的是，对于人类来说，所有这些议论都已一去不复返了；也有例外，那就是，人们还会在乌拉尔的原始森林里，或者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丛莽中，遇见一个高尚的，但却在灭绝的、具有特殊品质的“顽强的雅各宾派”种族，也就是象太阳的光线般纯粹的雅各宾派的种族。但是使人心涣散的批判和怀疑的幽灵最后还是光顾他们，不过雅各宾派会勇敢地同这个幽灵作斗争，努力把它从乌拉尔逐回西方，从而拯救由接近我的西伯利亚联盟<sup>①</sup>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亚洲。当然，所有这些努力将由历史来作出判断，但是英勇的乌拉尔人始终如一的胆量仍然赢得了尊敬。由于他们的这种特点，为我们写历史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使他们不被人遗忘，定会给他们的“宣言”写上几页，这宣言是大胆而恰如其分地表述了“多数派”的立场的；下面我们还必须研究纯粹列宁主义者的这一“信条”。现在我们且只看看“宣言”的某些直接与“纪律”问题有关的考虑。

乌拉尔<sup>②</sup>的三个委员会的“代表们”说：

“只有一个全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才能够预见(?)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才能够充当群众的领导，各地方委员会完全受它支配。各委员会和每个党员能享有很广泛的充分权力，但是这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加以规定。相反，在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和有益的时候，它有权解散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个

---

① 作者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西伯利亚联盟的代表。人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写了这几句话之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都表明自己远远落在敖德萨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后面，而后者所达到的愤怒的程度，证明了他们那一“派别”的临终痛苦。

现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同志们已把他们的全部愤怒从针对“少数派”转向针对“多数派”本身的妥协思潮。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最近作出的痛斥中央委员会的“妥协主义”的决议使我们生动地回忆起一位严厉的雅各宾派分子在雅各宾俱乐部里说的话：“我谴责人民代表们，因为在人们只应当用斧头和长矛来对待叛逆者的时候，他们却和叛逆者称兄道弟。”——托洛茨基注

其他组织，它可以剥夺任何一个党员的权利。否则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就不能合理地组织起来。”<sup>②</sup>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实际上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单个的和完全独立的委员会，整个党的生活是以它们为中心而组织和发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彻底改变了党的面貌。通过举手或者投票表决这样简单的做法，结果表明，党内已经存在一个“集中制的组织”，“各地方委员会完全受它支配”。显然，“集中制”不应理解为复杂的组织政策上或组织技术上的任务，而仅仅是人们常常引述的“手工业方式”的对立面，人们授予中央委员会以解散一切妨碍它的组织的权利，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回避实际的任务，即在集体工作的过程中，在全体党员中间发展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责任感。因此要实现这一“集中制”理想，就必须有这样的条件，即一切实在的、还没有由于任何事情和任何人而受到纪律制裁的分子不能反抗中央委员会解散他们的组织的企图。按照乌拉尔的同志们的意见，“否则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就不能合理地组织起来”。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真的能够这样地组

---

② 列宁同志在他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多次重复这一思想；对各委员会即承担全部理论工作的党组织的原则性决议进行的批评，就是在理论上“行乞”。关于同盟在党内的地位的讨论有多大价值，这一问题由这些委员会的各个代表投票表决，再根据表决作出图表，当然算是运用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了。我们一直试图去理解，但是不能理解，怎么委员会的一个代表的意见竟会比委员会本身的意见更为重要。

关于真正的科学方法还有一些情况：列宁的“图表”列出四十四票，其中“少数派”二十票，“多数派”二十四票。后面这二十四票中已有三票转向“少数派”，第四票甚至转向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阿克雪里罗得之流，而是巴枯宁之流。我们迫切要求列宁同志，在继续制定他的图表之前作出这些绝对必要的更正。——托洛茨基注

③ 《乌法、中部乌拉尔和彼尔姆委员会对中央机关报来信的答复》，载于《火星报》1904年4月1日（13日）第63号副刊。着重号是我加的。——托洛茨基注



织起来吗？回答只能是：不，不能这样！

事实就是如此！这个文件的作者无疑设想，唯有“经济派”、“机会主义者”以及——用他们十分笼统的提法来说——居民中的其他阶级的代表才会妨碍由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工作。我们甚至承认，彼此敌对的派别永远是这样给对方划定阶级的。但是人们将在哪里找到一个如此愚蠢的派别，哪怕它是“机会主义的”派别，会听任别人“解散”它，“剥夺”它的派别成员的“权利”，而不首先进行它有能力进行的一切反抗呢？一个哪怕只需要最低程度的严肃对待的、重要的派别（无论如何不值得同微不足道的、不需要严肃对待的派别作斗争）在面临要么“按照纪律而默默地自行解散”，要么“无视任何纪律，为生存而斗争”这两种抉择时，毫无疑问将选择第二条道路，这难道当真是那么难以理解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当纪律允许人们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人们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才接受纪律的）而斗争的时候，纪律才有重要意义。但是当派别面对着自己的“权利”要被“剥夺”的前景时，也就是说，为施加思想影响而斗争的可能性要被剥夺时，对于这一派来说，它的生存问题就从一个权利问题变成一个权力问题。

反对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形势的特点和尖锐程度，或者分裂党，把对于他们自己的原则的实际纪律看得比形式上的纪律的“原则”更为重要；或者他们继续留在党内，企图依靠他们的影响，把党的纪律这一桎梏的约束降到最低限度，以保证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和反对被认为起阻挠作用的趋势的自由。只要他们有意地摆脱党的缰绳的束缚（为了他们所理解的党的利益），只要他们的影响容许他们这样做，那么对方靠经常重复纪律这个字眼来控制他们的任何企图都会是可怜的幻想。没有比在决定性关头求救于这类符咒的政治“领袖”的形象更加可鄙的了。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上述这种做法。如果纪律一方面表现为强制性

的义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威胁，这种状况在党内当然不能认为是正常的，相反，这表明了党内的深刻危机。不过人们毕竟不能“通过喊叫来打退”一次危机，尽管有人准备喊破嗓子。

那么怎么办？需要超出正在瓦解的纪律的范围，查明运动的真正需要和必然性，这些需要和必然性是大家共同的，以它们为中心，人们可以使党的最宝贵、最有威望的分子团结起来。随着这些力量都聚集在运动的生气勃勃的口号的周围，双方给党的统一造成的创伤就将平复，人们不会再谈论纪律，因此人们不会再破坏纪律。谁试图从这一着眼点去分析两个争吵的派别的工作，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是哪一派在导致真正的团结。

如果在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少数派”不得不破坏“多数派”认为是纪律的东西，那么结论只能是，这种妨碍运动的现实利益的纪律是要瓦解的！历史本身不容争辩地得出这个结论。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相反，历史不会死守这一唯心主义原则的基础：让世界灭亡吧，纪律万岁！历史作为辩证唯物论的大师，在党内冲突中最后总是承认胜利的一方是正确的，因为胜利最后总是属于对革命事业的任务能够更好地、更广泛地和更深入地理解的那一方。因此我们满怀信心展望未来。但是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我们的主张集中制的形而上学者和神秘论者的队伍中，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同盟的冲突是一个错误，是一件蠢事，是一次过失，或者至少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他们的导师<sup>①</sup>那一方面的轻率行为。但是这一轻率行为无论如何不应当由那个除了“剥夺权利”和“解散”以外就不懂得其他“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方法的组织负责！这件事本来是从前提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结论，却被描述成偶尔的过失，个别人的轻举妄动，这样一来，人类

---

① 指列宁。——编者注

思维的情性就有权利继续坚定地相信这些“前提”了。无论就整体还是就细节来看，某些思想体系的瓦解通常是经过这样的途径的。首先崩溃的是直接受到实践打击的结论。意识排除这些合乎逻辑地得出的、但实际上是荒谬的结论，并且依靠诡辩从荒谬的前提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这种诡辩方法本身已经是衰落的标志。思想纠缠在自我矛盾之中，终于不能自拔。我们的“多数派”的思想正处于结论同前提相斗争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认为不能排除这一情况：甚至乌拉尔的同志们（前面引用过他们的话）现在也愿意承认，对联盟的十字军讨伐是一次令人遗憾的“误会”，尽管在他们看来，确实是“否则人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合理地组织起来”。

上面我们说过，没有比暗示性地重复纪律这个字眼、企图把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推到敌人方面去的“领袖”的形象更加可鄙的了。列宁显然感到他的处境窘迫，试图“在哲学上”给他的符咒建筑基墙。我们看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意志薄弱的、神经不稳定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害怕严格的纪律。“……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参看①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②从这个故事得出的教训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正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那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③

按照列宁（他自从写了小册子《怎么办？》以来几乎连一双鞋

---

① 最好不要去“参看”，因为人们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里当然找不到相同的话！——托洛茨基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490页。——编者注

子还没穿坏)的新哲学就是说,经过“工厂学校”的无产阶级就足以给一直在党内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以政治纪律方面的教训!每一个不是把党看成一个大“工厂”、反而觉得这样的设想“凶恶可怕”的人,每一个不相信机器有直接的政治教育力量的人,按这个新哲学的说法,“一下子就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天生就不能把工厂的消极方面(“建筑在饿死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它的积极方面(“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sup>①</sup>)区别开来。

我们不怕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我们首先主张,促使无产阶级采取集体的、步调一致的斗争方法的条件,不是在工厂里,而在于无产阶级的一般的社会生存条件;我们还认为,在这些客观条件和一项政治行动的自觉纪律之间,要经过一条进行斗争、犯错误和吸取教训的漫长道路——我们的无产者只能在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好的或坏的)指导下进政治生活的学校,而不是进“工厂学校”;我们认为,由于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发挥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因此不管工厂已经怎样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中训练了他们,他们还没有能力去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给以纪律方面的教训,这一情况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是不幸的,对于追求“独裁”的先生们来说则是幸运的。我们丝毫不害怕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还要进一步宣布我们完全拥护这一思想:“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兵营式的,不是自觉的政治上的!)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6页。——编者注

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sup>①</sup>

列宁把俄国无产阶级的纪律当作一个实在的量而乞灵于它，但是用他自己下的定义来说，实际上他是把一个政治问题同一个“哲学”问题混为一谈了。“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最终创造了政治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治纪律性的物质条件，就象资本主义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一样。但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视同仁是没有理由的，同样，把无产阶级的工厂纪律和革命的政治纪律完全等同起来，也会是荒谬的。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也正是在于，它鼓动无产阶级反对那种以物质运动的节拍来代替人类思维劳动的纪律，它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军队来反对这种僵死的和令人呆笨的纪律，这支军队是依靠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的共同性而脚挨着脚、肩并着肩地结合在一起的。俄国无产者还没有具备这种纪律，工厂和机器自发地赋予他们的这种特性比给他们造成的职业病要少得多。

我们的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正如党不能把工厂当作榜样一样。可怜的实际工作者同志，他表达了这种思想并且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那个吓人字眼（工厂）一下子就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sup>②</sup> 可怜的列宁同志！命运竟把他置于这样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也“没有料到”，实际工作者同志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无产者，他进过工厂这个有益的学校……

列宁的追随者到处都向俄国无产阶级隐瞒党内危机问题，而这同一个俄国无产阶级明天却必需在列宁同志的叱责下给予“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以严厉的教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4页。着重号和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6页。——编者注

读了这几行可恶的、无纪律的煽动性文字的人一定会多么愤怒啊！人们昨天还对无产阶级说它会“自发地趋向工联主义”，今天就已经号召这同一个无产阶级在政治纪律方面去教训人了。教训谁呢？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在昨天的模式中还承担着把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的觉悟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使命！昨天无产阶级还在尘土中爬行，今天它已经被抬到出人意料的高度！昨天知识分子还是政治觉悟的体现者，今天工厂纪律的藤鞭已经向他们抽来了！

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确，要比列宁更加厉害地用讥讽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最优秀的精神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求巨大理论义务的科学研究方法，不是的，——如果需要擦脚，它就是一块破抹布；如果他想在它面前显示自己的伟大，它就是一块白色亚麻布；如果他必须表现自己的党性，它就是一根可以折叠的测量杆。

“少数派”反对集中制，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起来反对集中制，因此“少数派”是机会主义的……！这种三段论法——甚至从形式方面说也是错误的——构成列宁最近一本书<sup>①</sup>的好斗的主题思想，如果人们撇开这本书中一大堆粗暴地、不正当地根据一套间接证明的方法而编造出来的控诉词来看它的话。列宁以千变万化的方式重复他的三段论法，力图通过集中制的手势暗示性地影响读者。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反对集中制——海涅在柏林反对集中制——饶勒斯在巴黎反对集中制；海涅和饶勒斯是机会主义者，因此阿克雪里罗得是同“机会主义者”为伍的——很清楚，他也是“机会主义者”，而比这还要清楚的是：“少数派”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考茨基在柏林拥护集中制——有一

---

① 指《进一步，退两步》。——编者注

个瓦西里也夫，中央委员，以集中制的名义解散了同盟；列宁同志曾经是这场为维护集中制的荣誉而进行的战役的伟大导师，因此……等等，等等。

在列宁用这种“乌拉尔的”方式“解散”了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后（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就这一问题给我们提供图表！），他就认为他已经给了他的听众以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了：通过败坏对方名誉的三段论法而造成的错觉。

我们认为，列宁对他的追随者的评价比他们应得的要坏。我们相信，甚至列宁同志的最谦卑的追随者也会想到这一问题：目前在全世界起来反对集中制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代表人物，他们在社会政治世界观的领域里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也就是主张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对于这一情况应当如何解释呢？

他们在认真考虑了这样提出的问题之后会回答说，假如人们认为组织上的集中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强大武器（毫无疑问，它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武器），那么，就可以理解海涅和饶勒斯怎么会把集中制当作一种被他们认为是敌对的组织体系而同它发生冲突了。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组织上的集中制是伴随一个派别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而来的，这个派别把运动的整体利益置于局部利益之上，而且竭力保证后者对前者的监督。集中制是党对其各个部分实行政治监督的组织形式。机会主义不是在争取运动的总的目的即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其全部历史规模而言）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争取工团主义的、市政的、地方选举权的局部和一时的目的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集中制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机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或纲领策略立场相敌对的。不过，甚至列宁同志也不会断然宣称（虽然他的勇气十足），“少数派”的纲领策略观点是机会主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少

数派”怎么会反对集中制呢？反对什么样的集中制呢？考茨基、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同志都是海涅和饶勒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怎么会采取反对列宁同志的“集中制”的立场呢？那种本来是追求音响效果的三段论法，即使重复一千次，当然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考茨基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组织观点（反对集中制、反对纪律、反对“紧密结合的多数派”）是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怕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心理相联系的。这一分析是中肯的，有价值的，只需要补充一点：考茨基还说，欧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本能地”倾向于改良主义和纲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sup>①</sup>。在知识分子的组织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之间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内在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两者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社会生存条件所决定的同一种集团心理。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或者与此同一类型的）心理背景，以时间和地点条件为转移，是能够容纳不同的而且有时绝不相似的政治图案的。

对我们现在的情况必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们是同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还是同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在以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一方和以俄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另一方的组织观点之间进行类比，却不考虑前者与后者隔着一条资产阶级革命的“卢比孔河”<sup>11</sup>，那就陷入了最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的肤浅的类比，与唯物主义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这些或那些组织观点决不代表知识分子本身的世界观的基本的和必然的特有因素，这些观点绝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来自（当然要经过复杂的途径）对变化不定的政治形势变化不定地作出反应的政治心理。

---

① 例如，请参看卡·考茨基的《社会革命》（卡尔波夫译自德文，尼·列宁校订，日内瓦1903年版），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同盟出版，第42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注



今天的明智的“雅各宾派分子”就他的政治心理即他的思想方法来说，是可以同昨天的明智的改良主义者相一致的。取得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民主保证这一点把雅各宾派分子同改良主义者分开了。

因此，如果同样的社会心理性格所产生的光谱会对立到如此程度，那么，在这里还提到组织问题这一局部的领域，有什么意思呢！知识分子可以主张联邦制或者主张集中制，可以转向自治制或者专制制，转向民主制或者专政，却丝毫也不会改变他的本性或他的政治利益的性质。

列宁同志本来是很容易避免机械的类比的，只要他注意到如下的想法就行了：根据他自己下的定义（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sup>①</sup>。就算情况是这样；但是，列宁打算自比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雅各宾派分子，而典型的雅各宾派分子毕竟也正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愿列宁在谈到法国大革命和略加改变而谈到我们的民意党的时候不否认这一点。列宁十分赞叹的雅各宾派的“集中制”和“纪律”，不是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受过工厂的纪律训练的无产阶级那里搬用来的，而是他们“从他们本身”直接地发展出来的。因此，正是新的“中等阶级”的社会成员已经和正在以民主派的形象，放射出彩虹般的种种异彩，从无政府主义到米勒兰主义<sup>12</sup>应有尽有。知识分子的性格正是这样的富有可塑性和弹性，要一劳永逸地把他们关进安排好的图表的牢笼是不行的！

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奉行雅各宾主义并加入用炸药或者用人民起义“计划”武装起来的密谋的集中制的组织，革命后的知识分子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注

奉行改良主义而磨钝阶级斗争的锋利的刀刃，这都是由同样的特点(这是应当牢记在心的)造成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不过说到辩证法，那是对列宁同志无可奈何的。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对待严格的刑法条款一样：他首先找出“合适”的条款，然后一头扎进起诉状的材料中去，并寻找形式上符合刑法条款的推定罪证。

说到辩证法，那是对列宁同志毫无办法的。他知道得很清楚，“机会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它的本性，不只是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sup>①</sup>。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连我们的大胆的论战者也下不了决心把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全面地塞进机会主义者的范畴(从明白直率这一点来讲这是多么令人跃跃欲试!)，因此他给他们造出一个称号：“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概念的运用在这里失去了任何政治内容，它变成了吓唬小孩的“魔鬼”。

把辩证法降低成诡辩术，破坏马克思主义精神大厦的全部有生气的思想，把社会历史的“典型”变成用来衡量尘世罪孽的不可改变的、超社会的标准，这些就是为进行对“少数派”的斗争而付出的代价！“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由三分之二的成员进行补选，却没有提出有理的抗议，——这一问题上的吉伦特主义<sup>②</sup>！中央委员会是否有权决定同盟行政机关所在地这一问题上的饶勒斯主义！——还能比这更加厉害吗？可列宁同志还有更厉害的呢！

革命方法(“起义”和“暴动”)曾经完全被看成是小组习气；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必须由纪律来统治；破坏无产阶级的党的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361页。着重号和惊叹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② 指党领导层中关于补选问题的辩论。——编者注

纪律的分子的行动本身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在列宁同志就这个题目写出一整部书来之后，在他通过一百五十多页的篇幅虽然没有顺利地用全部哲学说服读者，但是毕竟顺利地把读者弄得头昏脑胀之后，突然，他一板一眼地用下面这种晦涩的箴言把读者打得目瞪口呆：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本是一件好事情。革命派实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也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实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不妙了。”①

对于列宁同志的所有崇拜者来说，在这里设身处地去考虑一下他的“论据”，会是很有用的：“少数派”受不了党的纪律。正是从这一点（注意：正是从这一点！）暴露了“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和“饶勒斯主义”。因此“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别。这是顺定理，现在接下去是逆定理：由于“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别，因此“少数派”的起义是一件很坏的事。如果“多数派”能够起来反叛，那会是另一回事，而“多数派”的革命立场是由于这一立场受到机会主义的“少数派”的反对而得到证明的。象顺定理所指出的，“少数派”本身之所以是机会主义的，是因为他们破坏纪律。从两条定理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在两个方向上都可以任意行动。这就是要证明的。

列宁怎么能够在这里决定用不多几句话对他的整本小册子踢一脚呢，解答这一问题不用费多少脑子。情况要求这样！我们的总司令的军队在减少下去，“纪律”又大有用自己的反面来对付他的势头。不过既然列宁为了同“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作对比，而描述了（用他引用的考茨基著作中的话来说）“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理想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毫无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2页。——编者注

怨言地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既然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sup>①</sup>，而且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sup>②</sup>；既然列宁同志具有一个守纪律的党员（这种党员不怕处于少数地位）的这一切极可宝贵的品质；所以他认为还必须及时给自己的著作“装配”支持党的分裂的哲学辩护词，而党的分裂是他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残部而搞起来的。他做这些事的轻率态度只不过从反面证明他对于自己的思想上的同志非常轻视。

如果别人反对我，那是很坏的。如果我抬高自己，那是好的。

这就是从一本冗长无味的、用长长的引文、“国际”的类比、精心编造的图表和其他精神麻醉的小手段装配起来的书得出的简短而令人愉快的格言。

## 几点结论

（信件摘编）

—

1904年3月……

昨天是鼓动员（十一个人）和一个组织员的会议。会议的目的一般地介绍一下组织计划，特别是介绍一下我们的组织计划。这个组织员在解释这一组织计划之前，说了一些关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话。他本人属于“多数派”，并且承认由列宁同志提出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原文如此!!!）组织计划。这个组织者说：“少数派指责‘多数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你们会看到，这是毫无根据的指责。‘少数派’根本提不出它自己的计划来对抗列

① 我们相信，被列宁同志写上这几个字的那张纸会在他的笔下感到害臊。——托洛茨基注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17页。托洛茨基的引文与列宁的引文有出入。——编者注

宁的计划。”此外他说，在“少数派”中有“国外联合会”<sup>13</sup>的残余、“民主主义”的残余。当列宁在《给一个同志的信》和《怎么办？》中提出组织计划的时候，人们对组织计划问题漠不关心，这位组织员对这种态度感到遗憾；他同时还提到，托洛茨基和查苏利奇已经同意(?)《信》中的那个计划；最后他开始讲述这一计划：

“一个小组不是组织，甚至还不是一个组织的胚细胞。胚细胞是工厂委员会（至今哪里都还不存在这种委员会）。这样的细胞是绝对必要的。在我们这里，完全不报道工厂和企业中的生活，而那种生活是提供丰富事实材料的。简短地说，鼓动员们没有立脚点。

回过来讲一讲工厂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起组织员作用的工人，此外委员会里还有五、六个在组织上是优秀的和有影响的人（但是人们由于工作缺乏连续性还未能发现这样的人）。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是：传播书刊，设立储金会，开设讲座，搜集情报，散发传单。”<sup>①</sup>

他详细地说明了怎样组织小组去分发传单，到现在为止，这一工作还没有管理好，其次说明了怎样组织鼓动集会和学习小组。工厂委员会的委员是：一个组织员、一个技术员、一个会计、一个图书馆员和一个通讯员。这一城市分七个区，此外还要加上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区组织由这个区组织员和区辅导员、区图书馆员、区通讯员、区会计各一人组成。而地方委员会则由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关于这个组织人们以前一点也没有讲到）、一个技术员、一个负责的辅导员、一个组织员、一个编辑和一个秘书组成。（匆匆忙忙，说得很乱，请原谅。我没有时间；如果有必要，我将详细告诉你。）

报告者详细地讲解了整个工作的技术，说明为了保密和有效必须怎样组织。关于所有这些小组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它们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没有讲什么；他只是说明了表面形式。

最后，报告者提出在这个计划中是否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

---

① 引文出处不详。——编者注

一问题；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都倾向于认为不存在这类危险。

关于意见分歧，辅导员们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没有文献。现在为他们设立了一个阅览室，摆出最近几期《解放》杂志<sup>14</sup>、《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册(?)和巴甫洛维奇的小册子。

不久前开了二十五个人的会议，他们是在技术领域工作和学习的。也把这个组织计划告诉了他们。在这以前，根本没有同他们开过会，人们说：“为什么同你们开会？研究你们的医学吧。”

紧紧地握手①……

## 答 复

1904年3月……

亲爱的朋友：您的上一封信特别有趣，引起了种种想法和考虑，以致有一个问题使我作难：不知道应当从何说起。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这件无可辩驳的事实：不仅是某地的有组织的工人，不仅是辅导员，而且连委员会的委员，至今都还没有弄清楚使党分裂的那些意见分歧的意义。目前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一种说法，“集中制的思想(1)必须成为我们工作的基础”(巴统委员会的决议似乎就是如此，可参看)。在明格列里亚委员会和在彼得堡委员会也好，在里加委员会和在赤塔委员会也好，人们到处都在谈论集中制。而且人们认为，集中制应当是指中央委员会；如果有了一个中央委员会，那就是说，也就存在集中制了。但是象某地的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由于既缺乏文献又不关心，对于党的中央机关报要做到什么，同盟想望什么，五六个同中央机关报团结一致的俄国委员会想望什么，它是无法设想的，而这一事实却没有使某地的同志

① 信是摘要，着重号是我加的。——托洛茨基注

们认为，在我们这里根本没有集中制；可见集中制所指的——人们毕竟至少必须懂得这一点——不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或委员会，而是比这远为重大的某种东西：首先，一切党员积极参加全党的生活就是它的先决条件。当然，我说的是“欧洲式的”集中制，不是亚洲式的专制的“集中制”。后者不仅不以这样一种参加为先决条件，甚至排除它。人们向你们展示的组织“计划”，“本身”也许是很不错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实际上这个计划已经存在两年，按照列宁的《给一个同志的信》而“生活”（按字面的意义1）的整个一代形成了，看来集中制是会繁荣昌盛起来的。但是事实上，某地的委员会（不是波尔塔瓦委员会或乌法委员会）在碰到这些显然已使最有影响的党的工作者分裂一年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轻蔑地耸了耸肩膀就走开了。难道这不是意味着，某地的委员会无非是一个完全象三年前一样毫无起色的微不足道的手工业者团体吗？这些手工业者如您信中所说无法胜任百分之一的地方工作，而且象那时一样，对全党的问题完全抱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甚至明显地表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有什么差别呢？它表现在哪里？这表现在：人们使革命行话的某些术语重新活跃起来，干净利落地发誓要搞集中制；把一切希望从“自发增加任务”转移到“集中制的思想”上，或者转移到由随便哪一个人在随便什么时候所实行的组织计划上（如果瓦解组织的人不加阻挠的话），于是“森林和山便开始跳起舞来”。有什么差别呢？它表现在哪里？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疑是以一切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为先决条件的，为此，首先必须了解情况。在你们那里，至今只有代表大会记录第一册（是谁和为什么把记录分作两“册”？）和巴甫洛维奇的小册子，既没有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也没有马尔托夫的小册子或《火星报》。成了党的工作的基础的“集中制思想”的良好结果究竟在哪里？有了中央委员会决不等于有了集中制，即使按照这个词的最狭隘的技术方

面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这难道不清楚吗？而且某地的委员会本来不应当向你们这些辅导员解释这样一个组织计划（这个计划已由三代或四代的委员会中的“集中派”引起了三代或四代辅导员中的“集中派”的注意，当然并没有因此使党的财富有任何增加），也不应当三番五次地重复那种对意见分歧问题一点也没有说明的工作，你们的委员会本来应当对下面一点加以论述并仔细地考察：它自己是怎样产生的，它变成了什么，它拥有什么；这难道不清楚吗？如果这样做了，它就会看到，在一切神速的变态和变化中，它只保持了唯一的一个特性，即古老的手工业习气的残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事情的关键真的在于一个组织“计划”吗？虽然已经把“集中制的思想”塞进所有人的头脑里，甚至在一些人的头上干脆露出了列宁的《给一个同志的信》的一角，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难道我们不是经常地踏步不前吗？党的停滞的原因是否比在哪一个地方必须有多少会计、簿记员和“集中制思想”的其他体现者这一问题更深刻呢？

一旦这个委员会开始按这一方向（而且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方向）去思考，它就不会有兴趣象你们的“上司”那样去问“少数派”：“你们拒绝列宁的计划，但是你们拿来代替它的计划在哪里？”因为这个委员会将懂得，“少数派”不是拒绝把某一个自满自足的计划当作救治手段，而是拒绝打算搞出这样一个自满自足计划的那种计划本身。

他们在他们从前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很少举行辅导员会议，因为所有的人都躲在自己的角落里，每一个人都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秘密工作束缚着大家的手脚。但是现在召开了一次这样稀有的会议，出场的是一位领导同志。他对你们说，“少数派”（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不了解少数派的）表现出“民主主义”的残余，根据这一理由他向你们这些辅导员解释了组织“计划”。但是



下一步怎么办呢？从这一计划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位同志对你们的教育工作给了哪些指示呢？他通过什么使你们的意识充实起来呢？你们在散会以后是否着手使这一计划变为现实呢？怎样，用什么方式？从哪一点开始？要不难道是，这一工作是由其他随便哪一个人完成的，例如，由可以把这一计划的一切秘密告诉你们的那一位组织员来完成的吗？这位同志是否也向你们说过，他想怎样着手使他的计划变为现实？难道他想解散一切现有的集团和小组，并且按照集中制建筑术的全部规则在打扫干净的场地上由特别挑选出来的分子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吗？或者难道他想逐步取消已经成立的组织的那些残缺不全的机构吗？通过什么道路？他打算从何开始呢？对于你们这些辅导员来说，对组织工作的参与必须表现在哪里呢？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清楚，这位同志关于这些“小事”没有说一句话；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你们的对话便是白白消耗时间。

“一个小组不是组织，甚至还不是一个组织的胚细胞。胚细胞是工厂委员会，至今哪里都还不存在这种委员会。”这一计划妙极了，连官僚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但是，一方面这一计划固然是自在地存在着，另一方面某地的社会民主党却也独立自在地存在着，对于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你们的组织员难道真正没有费神去考虑一下吗？你们的组织这样糟，以致宣言成灾，比“民主主义”时期还要糟；专门为某市制定的，由某市委员会提出的和被某市的同志们，不分“年老的”和“年青的”，直到细枝末节都认真地研究过的那一计划，仍然哺育着某市“集中派”完全无私的激情，虽然在这两年的集中制的柏拉图主义之后列宁“计划”的胚细胞即工厂委员会还是哪儿都不存在。但是，按照“计划”仅仅处于最后的、不显著地位的学习小组，却同计划相违背而占据了全部中心地位，而且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唯一的“胚细胞”，只有在那里你们的组织员才有可

能去解释他的那些组织计划。

当你们这些辅导员在你们小组的这次会议以后回到你们所领导的小组去的时候，你们将同工人进行讨论，题目也许是：工厂委员会遍及全城的那一天将会到来；每一个工厂委员会包括一个组织员、一个技术员、一个会计和一个通讯员；工厂委员会之上将设立区委员会，它们常常包括一个区组织员、一个区辅导员、一个区图书馆员、一个区会计和一个区通讯员；在区委员会之上将设立地方委员会和作为一切委员会之委员会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那时将命令所有的地方委员会遵守纪律，而地方委员会将命令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将命令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将命令工人遵守纪律。于是整个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文件斗争就会爆发；只要“瓦解组织的人”不加干扰，这一斗争就会爆发！

在这里我又深思起来，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这个组织员向你们解释他的“计划”？我试图从心理学上向他解释他的行为；我想起了“最初的”小组学习的时代：当时一个辅导员给自己提出一个目标，要向帕尔或马克苏埃尔工厂的工人讲述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他从宇宙学讲起。他成功地说明了人是从猿变来的。他翻来复去讲了文明史以后，偶尔也讲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在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愚昧的无产者变为具有成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这种可敬的空谈的骑术已经过时了并且永远被遗忘了，但是正如已经表明的，它以最荒唐的漫画形式重新表现了出来。

我们党在“手工业方式”破产时期成长起来的党员，产生了一个异常贫乏的想法，这就是集中制的思想必须成为我们的工作的基础。对世界结构作唯物主义解释的思想让位给了按集中制制订“计划”的思想，向组员解释他在神的宏观世界中的地位这一包罗万象的、但是教条主义的任务让位给了向组织的成员解释他在列

宁的微观世界中的地位这一没有生气的官僚主义任务。

早期的教育的一个目标是在小组内解决帕尔或马克苏埃尔的一个工人怎样准确地说明他自己的地位这一问题，尽管达到这一目标的情况很少，但他毕竟了解到人类经历过一个一妻多夫的时期；所有这一切对理解现状和过去的状况都是有益的和正确的知识。但是，某地的以一百三十个工人会计、一百三十个簿记员、一百三十个通讯员为基础的世界结构，事实上是列宁同志在作一次官僚主义的阐释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绝对不存在的。而且如果你们向某地的这个工人说明他在这一世界结构中的地位，那么，你们就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某种“往往是不存在的、从来是不存在的东西”。亲爱的朋友，“少数派”对我们党内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责难“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难道不清楚吗？

紧紧地握手……

## 二

1903年<sup>①</sup>7月……

尊敬的朋友：

现在是详细地探讨组织问题的时候吗？伟大的事件在缓慢地出现，而革命的到来会比我们敢于期望的要快得多。我们正在讨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与委员会工作直接有关的那个三分之一……如果群众坚决地上街闹革命，那么，我们会懂得这是革命到来了吗？群众将看到与此有关的必要的口号吗？而军队呢？一次街头斗争的结局实际上要取决于军队的态度；我们是否做了某些工作使它同革命群众更加接近呢？革命是“象黑夜里的小偷那样”

---

<sup>①</sup> 刊误，应为1904年。——编者注

到来的，现在真正是我们为这一革命作准备的刻不容缓的时候了。根据我的观点，我们必须准备革命在夏末开始，并使每一次“拖延”都有利于我们的党……是时候了，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 答 复

1904年8月……

尊敬的朋友：我同意您的这些意见，革命可能比我们设想的要临近得多；我们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开展集中和分散的政治鼓动工作，并且绝对必须把当前的战斗口号交给尽可能广泛的群众，使他们可以带着这些口号上街，而现在不是费力去制定组织问题细节的时候。但是，如果您提出这些想法来非难“少数派”所进行的工作，那我是不同意您的；即使您不直接这样说，但人们只能这样来理解您的意思。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象黑夜里的小偷”那样到来，为了使它不致在熄灯以后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绝对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清醒。但遗憾的是，从政治上看来我们党是睡着的；它在沉睡中做梦看到一些组织上的幻影，有时这种幻影变成沉重的恶梦。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力气，唤醒党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它在政治上的睡眠就会变成政治上的死亡。

如果您说：人们必须为革命作准备，全党的意见将同您是一致的，但四分之三的同志将这样理解您的意思，似乎您说的是组织技术方面的准备。里加委员会将说：“建立一个严格集中制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是绝对必要的。”其他十个委员会同样会发表某些类似的意见。对它们来说，为革命作准备，已经不是发布命令和提出口号以及确定为“起义”发出“号召”的日期和时刻，但无论如何毕竟是一种内部的组织建设，或者还不如说必须称之为一种“瓦解组织”的建设，因为它是从破坏已经存在的组织形式开始的。但是，在当前的刻不容缓、时不再来的决定性时刻，任务在于，吸收一

切现有的有组织分子，使他们联合起来进行系统的集中的而不是分裂的和分散的工作。这一工作的目的是通过适当的策略方法使群众保持政治张力，这种张力必须愈来愈高，直到最后迸发出来，——不管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暂时的反动时期，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迸发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的任务总的说来是在政治策略方面。我们这些所谓的“少数派”没有提出单独的组织任务，我们认为，最紧迫的组织任务会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自行解决。在这一特殊的意义上，我们确实表现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只是人们必须考虑到，针对我们的机会主义而提出的组织上的严格主义，无非是政治上糊涂的另一种表现。

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说过的话：只要多数同志的思想象捕鼠机中的耗子一样在一俄寸见方的组织章程的鸡毛蒜皮中挣扎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那么就不可能提出实际的政治任务。从原则上看来，“少数派”的“论战”工作同“详细地”推敲“组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破坏组织拜物教，为政治策略问题清理场地。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革命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整个命运，就取决于政治策略问题是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解决。对于聪明人，这样说就足够了！

我们必须立刻展开的这一战役的出发点当然只能是战争，我们在这一战役中要依靠我们这里存在的一切个人的和有组织的力量。战争向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清楚的，即和平与自由！提出这一口号，不仅表明了我们对战争的原则立场，而且表明了我们打算直接达到的目标。我们不是简单地为了和平的利益而示威游行，我们实际上希望在“结束”独裁统治的同时也使战争结束。我们对于这一点必须抱有希望，而且这一点必须在我们的鼓动的内容和调子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我们还根本没有学会向群众提出战斗的口号。同我们的政治思想的形式主义相适应的不是切实有效的口号，而是某些千篇一律的提法，这些提法是随时随地都适用的，因为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眼里它们也往往只具有修辞的意义。

里加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声明提出如下口号：“我们对独裁者集团企图煽起我们身上的兽性并把它指向我们的日本兄弟的一切尝试的答复，应当是号召：打倒资产阶级！消灭战争！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兄弟般的团结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很清楚，这里提出的不是一个积极的战斗口号，人们不能把为了回答“独裁者集团的”冒险政策而发出的“打倒资产阶级”的号召看作是口号。目前的战争的命运在这里是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说过：“我们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反对工人阶级。我们现在不能避免战争，但是我们强烈地抗议这一不必要的、破坏性的、冒险的战争！”<sup>①</sup>

这样一种观点会大大败坏我们的革命立场的声誉。我们必须考虑到，沙皇制度的命运现在是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如果明确地认为我们进入了独裁统治彻底崩溃的时期，那么，就必须由此得出这样的策略结论，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战争，我们必须要求立即结束战争。

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任何一个声明、任何一次鼓动讲话都是以这样的口号开始和结束的；人们绝对必须考察战争的全部后果，并使群众都看到这些后果。必须把简单的、明确的和尽可能简短的声明传遍整个俄国，而且在每一个确定的鼓动阶段所有这些声明都必须口径一致。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号召所有的人去实现这一口号！“你们要将这个号召传播到每个工场、每个乡

<sup>①</sup> 声明中为斜体。——托洛茨基注

村、每个茅屋里去！让城市工人把他们较高的见解和教养灌输到农村工人那里去。你们要随时随地无休止地争论、讨论……你们的呼声越是得到千百万倍的响应，这种声音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变得不可抗拒。”<sup>①</sup>

人们绝对必须在失业者中根据这一号召开展最艰苦的工作。让那种只给人民带来不幸、失业和死亡的战争结束吧。在一定阶段上，鼓动必然具有复杂的性质，因为人们把统治阶级的社会机构对待战争的态度当作鼓动的主题。工人必须要求地方自治局、杜马、大学、科学团体和报刊发表有重大影响的意见反对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这些机构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要求如何反应。

由国家救济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以及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人！必须在适当的时刻竭尽全力地提出这第二个口号。在这一基础上，鼓动才能导致无产阶级特别是失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为了战争的需要而掠夺人民的财产。

反对战争的运动愈深入和广泛，这里的处于两面夹攻之中的独裁统治遇到的困难就愈大。“立宪会议万岁！”这个口号，必须响遍整个俄国，它为摆脱困难指出了根本的出路。这一口号同上面提到的两个口号结合起来，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立宪会议既要结束战争，也要清算罗曼诺夫王朝的全部家业。

地方自治局、杜马和大学的代表的“呼吁书”不应当使我们感到出乎意外，大吃一惊。这样的呼吁容易引起很多同志的忧虑，忧虑人们行动得太晚（对什么来说太晚了？对号召起义吗？）。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立宪”改革毕竟遏止不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相反，它会成为这一运动的前奏。杜尔哥的改革就迎来了法国大

---

<sup>①</sup> 《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42页。——编者注

革命。

我们必须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权的口号来对抗杜马和地方自治局“自上而下”的呼吁！我在上面已经谈了一些，这就是，为了使群众支持这一口号，我们必须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通过一切其他口号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他们同地方自治局和杜马这样的以等级和财产为标准而建立的社会机构对立起来。企图预先确定提出这一或那一口号的次序，或者预先确定用那些形式来支持这些口号，当然是荒唐的。我只能为我们面临的革命工作提出一个标准的样式。但是，不管我们的策略方法怎样改变，也不管这些策略方法会以什么样的综合形式出现，这一策略的方法本身必须保持不变，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在政治行动中对抗独裁统治和统治阶级的一切社会机构，特别是对抗象杜马和地方自治局这样的不久也许被“号召”来决定俄国自由命运的社会机构。

在进行这一错综复杂的革命前的战役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想一想拉萨尔在 1863 年向德国工人讲过的原则：

“取得实际成就的全部艺术在于：任何时候都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在最重要的一点上——而不要左顾右盼。你们不要左顾右盼，对一切不意味着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或者同它没有联系，不能促使它实现的事情都要置若罔闻！”<sup>①</sup>

不管革命使我们处于运动的哪一个阶段，统一在一定的政治口号周围的无产阶级总会在革命中作出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本身又将极大地推进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一。因此，围绕着基本的革命口号把无产阶级动员起来，是我们为临近的决定性事件作直接准备的内容。即使由于历史的意志这些事件要无限期地推迟下去，那么我们的努力也不致有一丝一毫付之东流。这些

---

<sup>①</sup> 参见《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43页。——编者注



努力将完整地列入我们伟大的历史任务即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任务。

目前，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准备工作；而这一准备工作我是了解的，并且看到了它的全部复杂性、艰苦性和巨大性。更明白一点说：任何其他的准备工作必须是这一准备工作的补充。我站在这里，我就不能说别的。每一个有觉悟的“少数派”拥护者最后也将这样说。人们尽管可以由于他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是不会认输的。即使在十字架上，他一定会准备喊叫：“你们这些盲人！你们赶着蚊子，你们却看不到骆驼！”……

## 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 不是雅各宾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 而是雅各宾派分子或者社会民主党人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①

这一公式一定会使我党的列宁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一切占领合法化；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公式中，隐藏着关于党章的倒霉的第一条和关于所有策略问题的意见分歧的根源。我们无论如何一定得详细谈谈它。

列宁在刚才引用的公式中，不仅仅是为了玩弄词句，而是完全有意识地 and 严肃地在谈论“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但是他的解释并不包含异端邪说，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注

简单的同义反复。当然，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相联系的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在列宁的定义中，雅各宾派分子这个词也可以用自由主义者、民粹派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门诺派分子<sup>15</sup>来代替——什么正好合适，就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因为，正是在雅各宾派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门诺派分子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发生联系的那一时刻，他们就不再是雅各宾派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和门诺派分子，倒不如说是变成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了。

如果列宁打算用他的定义来表达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毫无内容的思想：社会民主党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人们就得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个思想：一个雅各宾派分子尽管他一般说来在政治思想和方法上，尤其在组织观点上依然故我，但是只要他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发生了“联系”，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只要历史把他托付给革命的无产阶级，他就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当列宁在理论上阐述他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定义时，他答复了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对于列宁本人和他的追随者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比对我们党来说更为重要。

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中，人们常常求助于山岳派<sup>16</sup>和吉伦特派<sup>17</sup>的比拟。当然，这种比拟在这里不仅没有制造出雅各宾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一致性，而且甚至没有制造出二者之间任何内在的相似之处。

谁不是用词句和表面的比拟来思考，而是以生动的概念来思考，谁就自然会理解，社会民主党距离雅各宾主义至少同它距离改良主义一样遥远。罗伯斯比尔距离倍倍尔至少同饶勒斯距离倍倍尔一样遥远。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成为雅各宾派分子呢？在思想上吗？教义上吗？政治斗争的方法上吗？党内政治的方法上吗？冠冕堂

皇的演说的方式上吗？

雅各宾主义不是超越社会的“革命的”范畴，不是的，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解放的紧张的历史时代里，雅各宾主义是革命精力高涨的顶峰，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它的内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而是在它受排挤和压迫的过程中——在理论上通过诉诸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公民的权利，在实践上通过断头台而能够达到的激进主义的极限。为了使雅各宾主义能够保持权力，历史必须停顿下来，因为每一个向前的运动，都必然会使积极或消极地支持过雅各宾派的各种不同的分子互相对立，并以这种方式，在内部摩擦的过程中削弱革命的意志，而在革命意志方面，山岳派是站在最前列的。雅各宾派分子没有相信也不可能相信：他们的真理会一天天地越来越赢得人心；事实却说明正好相反：阴谋家、伪善者、“特权分子”和“调和主义者”从各种缝隙里，从各个地方爬出来了。昨天，他们还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真正的雅各宾派分子，而今天，人们看到了动摇的态度。雅各宾派分子和所有其他人之间不仅是原则性的而且是私人的隔阂每减少一点，都意味着解放出对他们的瓦解组织工作的离心力。通过“戒严状态”使革命发动达到最高点的那一时刻永远维持下去，并且通过断头台的钢刀来确定分界线——这种政治策略是由政治上自我维持的本能决定的。

雅各宾派分子是空想主义者；他们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理性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他们要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共和国，他们要在阶级剥削的范围内建立理性和道德的共和国。他们的斗争方法来源于他们革命的空想主义。他们站在一种巨大矛盾的刀刃上，他们求助于断头台的刀刃。

雅各宾派分子是最纯粹的唯一主义者。象他们之前和之后的所有唯一主义者一样，他们承认“普遍道德的原则”是“首要的”；他

们相信“真理”这一思想的绝对力量。他们认为，为了给这一真理建立基座而屠杀一些人作为牺牲，并不是过分昂贵的代价。同他们所宣布的普遍道德原则相背离的一切，都是邪恶和虚假的产物。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在著名的热月8日演讲（这是他最后几次伟大的演讲之一）中说道：“我只认识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sup>①</sup>对活着的人的绝对怀疑是和对形而上学思想的绝对信仰相适应的；怀疑不可避免地是为“真理”服务的方法，也是“真正爱国者”最高的公民义务。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解成一种控制着意见和观念冲突的社会的机械作用，因此并不存在这样的历史的前景和这样的确实性：“意见和观念”领域的某些对立不可避免地要加深，而另一些对立则相反，当被革命解放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发展起来时，它们必定会相应地逐步缓和。

为了使雅各宾主义能够更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历史必须停顿下来。但是它并没有停下来；所以只好残酷地开展反对自然力的斗争直到精疲力尽为止，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每一种停顿，最微小的让步都意味着死亡。

罗伯斯比尔热月8日在国民公会和当天晚上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的演说是在多么没有出路的历史悲剧中进行的：

“在我们所处的道路的终点之前停下来，就意味着完结，”这个已经站在深渊边缘的独裁者说道：“而我们很可耻地退却了。你们下令惩处几个罪犯即我们一切非正义行为的罪魁祸首；他们却敢于反对民族的正义——于是人们为他们牺牲了祖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那么就让我们等待正在不受惩罚地进行着的阴谋可能引起的一切灾难吧……你们只要暂时把革命的缰绳放松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暴乱的专制主义将怎样抓住它，阴谋的头头将怎样推翻沮丧的国民政府。一个内战和穷困的时代将使我们的祖国糜烂，而我们

---

<sup>①</sup> 1794年7月26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雅各宾派的结社。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历史文件汇编》，弗·奥拉尔编，1897年巴黎版第6卷第254页。——编者注

将走向灭亡，这是因为，我们不想掌握人类历史中那一注定要为自由奠定基础的时刻。我们把祖国委弃给一个灾难的时代，人民在纪念我们的同时将诅咒我们，而这一纪念对于人类来说本来应当是很宝贵的。”<sup>①</sup>

在这个历史的命运之路和社会民主党这个具有最乐观前景的党的命运之路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对立；未来保证社会民主党的“真理”的追随者将会增多，因为这一真理不是突然的革命的“自白”，而只是无产阶级的日益扩大和日益加深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确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然要成长，而且也确信党内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必然要取得胜利。第一个确信的根据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推动无产阶级自发地在政治上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二个确信的根据是：这种组织起来的客观趋势和策略任务，在革命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表现得最好、最完整和最深刻。

我们能够把党在形式上的界限规定得宽一些或窄一些，“软”一些或“硬”一些——这取决于一系列客观的原因，取决于政治敏感，取决于对政治效果的种种考虑。但不管我们将以多大的半径来划定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党却将无可怀疑地始终描绘出一系列无产阶级的同心圆，从中心向外围，人数逐渐增加，觉悟逐渐降低。最觉悟的也就是最革命分子在我们党内将“始终处于少数”。如果我们同这种状况“妥协”——而我們是在同它妥协——那么这一点只能用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命运”的信赖来解释，换句话说，也就是相信他们必然“获得”对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来说“最合适的”革命思想。我们信赖的是，被马克思主义照耀的阶级实践将提高觉悟较低的分子的觉悟，并使那些昨天还完全没有觉悟的分子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照耀。我们和雅各宾派

---

<sup>①</sup> 《雅各宾派的结社》第6卷第278页。——编者注

分子之间的深刻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怀着革命的信念，面对各种社会原动力——也就是说面对着未来。雅各宾派分子却合乎逻辑地充满了阴沉的怀疑。同一种原动力引起雅各宾派的分化和瓦解，却产生了促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且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倾向。

两个世界，两种教义，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隔着一道鸿沟。

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雅各宾派分子呢？他们是空想主义者，我们想成为客观倾向的代表；他们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是唯理论者，我们是辩证论者。他们相信一种超阶级的真理的疗效，在这种真理面前所有的人都得俯首听命；我们只相信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他们自相矛盾的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引起他们政治上的怀疑态度和无情的猜忌；我们的理论上的唯物主义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历史的“意志”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们的方法是对最轻微的背离也要砍头，我们的方法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扬弃意见分歧。他们砍掉人的脑袋，我们用阶级觉悟来充实人的头脑。

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雅各宾派分子呢？

的确，他们是不妥协的，而我们也是不妥协的；雅各宾派分子知道一种可怕的政治罪名，它以调和主义者这个词来表达。我们知道机会主义的罪名。不过我们的“不妥协”具有另一种性质。我们在我们和机会主义之间打进了一个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手段的楔子，阶级斗争的每一次原则性的打击都使这个楔子越来越深入。我们以这种方式“清洗自己”，摆脱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者不是从我们这边跑到别的阶级的政治阵营中去，就是服从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革命的、完全不是机会主义的逻辑。每一次这样的“清洗”都使我们强大起来，并且往往直接地扩大我们的

队伍。

雅各宾派分子在自己和调和主义之间放置了断头台的钢刀。阶级运动的逻辑是反对他们的，而他们企图扼杀这个逻辑。愚蠢这个九头蛇的头的数目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为真理和道德的思想而献身的头颅却一天比一天少下去；雅各宾派分子以使自己削弱的办法来“清洗自己”。断头台只是政治自杀的机械工具，而自杀本身却是他们绝望的历史地位（私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的宣告者、阶级剥削范围内的普遍道德的预言者的地位）的极其不幸的后果。

某一个不著名的雅各宾派分子在 1792 年 10 月说过：“为了弄干净被大火烧伤的机体，大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拯救身体，人们必须把四肢切掉。只要有坏的领袖，我们就会被引向歧路。但是有朝一日当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雅各宾派分子时，他们将成为我们的领袖，我们将同丹东和罗伯斯比尔联合起来拯救这个国家。”<sup>①</sup>

但是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当丹东和很多别的“真正的雅各宾派分子”被当作大火烧伤的四肢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另一个雅各宾派分子在同一个俱乐部又重新以几乎同样的话谈到了“清洗”。

“如果我们清洗自己，那是因为要取得清洗法国的权利；我们不容许任何异物留在共和国里；自由的敌人一定会发抖，因为棒槌已经举起来了，国民公会将使他们很快地滚开。我们的敌人不象人们想使我们相信的那么多；人们会很快把他们公布于众，他们将出现在断头台上。有人说，我们要消灭国民公会，不对，国民公会将不受侵犯地存在下去；但是我们要把这棵大树上的枯枝砍掉。我们贯彻的高尚措施有点象疾风，疾风刮走了虫子咬过的果实，把好的留在树上；那些留下来的果实我们可以在以后采摘，它们会又熟又甜，它们将使共和国获得生命力。如果树枝尽管很多却被虫咬得乱七八糟，这有什么用处呢？不如少留一些，只要它们新鲜，没有毛病，那就要好得多。”<sup>②</sup>

<sup>①</sup> 《雅各宾派的结社》1892 年巴黎版第 4 卷第 372 页。——编者注

<sup>②</sup> 同上，第 6 卷第 47 页。——编者注

两个世界，两种教义，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隔着一道鸿沟。

毫无疑问，如果在一个革命法庭上控告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就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另一方面，同样无可怀疑的是：每一次要把雅各宾主义的方法用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中去尝试，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最纯粹的机会主义，也就是为了获得想象出来的暂时的兴旺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这就意味着，用一些渺小的手段去冒充崇高的历史性冲突。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自己的发展中、也只有从自己的发展中吸取力量）面前，断头台和消费合作社都同样无足轻重，雅各宾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都一样是机会主义的。

当然，如果您试图把雅各宾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策略方法搬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领域，那么您得到的只会是雅各宾主义的一个可笑的漫画像，却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不是雅各宾主义，当然也不是雅各宾主义的漫画像。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相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最终会（人们一定得这样希望）脱离无产阶级的组织。但只要他同这个组织保持形式上的联系，只要他同时保持着对无组织的无产阶级基本力量和未来时代怀疑猜忌的那种雅各宾主义心理状态，他就根本不可能对他所属的那个党的发展过程作出评价。“我只认识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好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这种觉悟是高是低，这是完全无所谓）今天是以其有利的一面倾向于我的“计划”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和偶然的局面需要确定下来。坏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今天背离了我的计划的这些或那些细节。人们必须教育他们吗？不——压迫、削弱、消灭和排除。不是按照动力学，而是按照静力学来理解党。用作衡量党内各种分子的标准，不是



他们在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中的作用问题，而是他们目前对待这个或者那个“计划”的态度。因而得出了这样的令人惊异的结果：在列宁看来，扮演我们党的“落后”派的是“劳动解放社”<sup>18</sup>、《火星报》编辑部、国外同盟<sup>19</sup>、组织委员会，而“进步”派是由一批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还没有分化的群众组成的。人们不得不希望从这些新来的人中间将来会产生一些极其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当然将会被我们的党在漫长的、艰难的道路上面碾得粉碎。

“我只认识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这个政治格言已经铭记在马克西米利安·列宁的心中，而且我们要补充说，这个格言粗略地概括了旧《火星报》的策略智慧。

毫无疑问，怀疑和猜忌是《火星报》同事们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是在那些通过各种“偏向”表现出反无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中间工作的。如果说，总的说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把没有组织的基本力量组织起来，同时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联合起来，那么旧《火星报》的工作则是同没有组织的基本力量进行斗争，同时排斥知识分子，不让他们参加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瓦解活动。任务不仅仅在于启发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而且也在于从理论上威胁他们。对那些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正统观念”是很接近鼓舞过雅各宾派分子的那种绝对真理的。正统的真理能事先看到一切，甚至看到补缺选举的问题。谁驳斥这一点，就必须被开除，谁怀疑这一点，就接近于要被开除，谁提出问题，就是准备怀疑了。

列宁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他特有的方式对他关于党的发展的“雅各宾派”观点作了经典式的表述。他，列宁，知道绝对的组织方面的“真理”，他有“计划”并且在努力使计划实现。如果他，列宁，没有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阴谋、诡计和陷阱的包围，如果不是

大家似乎都密谋反对他和他的“计划”，那么党就会进入繁荣的状态。反对他的不仅有老的敌人，而且也有些“火星派分子同《火星报》作斗争，使《火星报》遭到种种困难，阻碍《火星报》的活动”<sup>①</sup>。哪怕他们是直接地公开地进行斗争也好！“不，他们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悄悄地、秘密地进行活动”<sup>②</sup>……“总的印象（不只是对组织委员会全部工作的印象，而且也包括对代表大会本身的印象）……是：我们一直同阴谋诡计作斗争。”<sup>③</sup>

列宁得出了这样理直气壮的结论：“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工作，必须清除一切捣乱分子，使他们处于不能损害党的地位<sup>④</sup>。”<sup>⑤</sup>换句话说，为了党的利益，建立一个“戒严状态”的政权是绝对必要的。用罗马的术语来说，领导这个政权的应该是一个 *dictator seditionis sedandae et rei gerundae causa*<sup>⑥</sup>。但是恐怖的政权在一开头就表明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平定叛乱的独裁者既不能使“瓦解组织者”服从他的权威，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党的大门，或者是用纪律的害人的圈套把他们束缚起来。“落后分子”是什么也不怕的，相反，他们却毫不含糊地占领一个又一个阵地。而我们垂头丧气的罗伯斯比尔却只有重复他怀着无意识的诚挚之情去模仿的那个人所说的那些悲观主义的话！

“阴谋经常战胜真理，正义成了谎言，最卑劣的感情和最可笑的恐惧占据了人类神圣利益在心灵中的位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活着是为了什么？……”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将长久地不能理解他们失败的原因，正如

---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6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同上，第66页，括号内的文字和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④ 我们提醒读者，“使之无能为力”这一公式在雅各宾派的日常生活中是常常用来对付共和国的“内部敌人”的。——托洛茨基注

⑤ 《列宁全集》第7卷第66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⑥ 拉丁语：平定叛乱和处理必要事务的独裁者。——编者注

他们不理解这种思想一样：人们不仅不可能给整个社会，而且也不可能给个别的党规定它发展的道路。人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历史条件推论出这样的道路，并通过孜孜不倦的批判工作来扫清它。政治上的唯理论者——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很多，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还没有能做到积累策略上的智慧，并由于一连串的失望而指责领导人的意见——唯理论者和形而上学者认为：只要“代表”全党“反映”发展，以官方权力的鞭子装备自己，就足以在这以后由他们这一伙来推动发展，而发展也就会继续进行下去了。但是，一旦具备了繁荣的一切条件，就会出现预计不到的障碍和反抗。“阴谋”和“圈套”的时期就会开始；有一些人不理解，并且会问“为什么”，也有一些人坚持他们认为是最好的道路，或者是指出这条道路。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看出第一种人的不理解，第二种人的坚持，于是寻求能够使党的进步运动的工作便于进行的策略方法。政治上的形而上学者在区别这两种类型方面天生是无能的；他不分析，不分门别类，不说明细节，也不解释，不提出“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而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想象看到一个反动的一帮在阻碍他去领导党。我们的雅各宾派分子通过思想上这种唯理论的逻辑越来越跟党的发展的历史逻辑相背离，而经过他的意识的反映，党的发展成了恶意的对手、瓦解组织的人、党内的冒险家和阴谋家成长的危险过程；而最终，这个可怜的“领导人”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党是“怀着恶意陷害”他的。发展水平不同的个性、各种世界观上的差别以及不相同的性格等等的总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党自身的物质的形体，最后成了这个可怜的“领导人”自身的根据唯理论先验地臆造出来的发展的障碍。列宁失败的秘密就在这里，他的狭隘的怀疑态度的原因也在这里。

列宁这种恶意的、道德上令人厌恶的怀疑态度，是对雅各宾主义的悲剧性偏狭态度的拙劣模仿，正象人们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它

代表了旧《火星报》的策略遗产，同时又是这种策略的蜕化的结果。这些方法和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却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消灭，因为不然的话，它们就有使我们党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理论上彻底崩溃的危险。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非常具有特征的事实：我们党反动的一派的领袖，列宁同志，为了维护经过歪曲的雅各宾主义的策略方法，在心理上不得不给社会民主党下个定义，这个定义无非是对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一次理论上的谋害。是的，是一次理论上的谋害，它的危险性绝对不下于某一位伯恩施坦的批判性观点。

事实上，伯恩施坦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采取了什么样的理论上的行动呢？他主要是致力于抹杀它们的鲜明的阶级界限；他致力于把它们变成通过一个内在的逻辑纽带互相结合的两种超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饶勒斯和他的忠实朋友米勒兰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的同样是这种行动。回忆下列情形是无用的：谋求一个部长席位的非常实际的投机行为是同这种理论方面的夸夸其谈的空论相适应的，或者是（如果人们进一步理解这种关系的话），把无产阶级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附庸的实践，是同把社会主义当作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中产生出来的逻辑附庸这一观点相适应的。

同样的工作——到目前为止限于在理论的领域——在我们这里是由一度信奉过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批评家”进行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通过唯心主义哲学的炼狱促使社会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学说。布尔加柯夫先生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理想必然是来源于哲学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sup>①</sup>但是，自

---

① 《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从1896年到1903年）1903年圣彼得堡版第Ⅳ页。——托洛茨基注

由主义的政治遗言和誓愿充当了绝对的、也就是不受阶级分析影响的唯心主义原则。别尔嘉也夫是这样解释的：“自由主义根据它的理想提出了发展个性、实现天然权利、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目标，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只是展示了顺理成章地贯彻这些永恒原则的种种新的方式。”<sup>①</sup>《解放》杂志（人们始终必须从这本杂志中寻找我们这里繁荣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天书的政治释文）最终以如下的强有力论点强调了唯心主义在理论上的占领：“决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分割开来或者简直彼此对立起来，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和不可分离的。”<sup>②</sup>

资产阶级民主想把无产阶级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的这种政治倾向，要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不是表现为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和集体主义的世界，资产阶级的世界和无产阶级的世界）的原则，而是表现为两种抽象的制度，其中的一个（自由主义）包含着另一个（社会主义），正象整体包含着局部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如象代数的公式包含着它的各项算术的值一样。从这种观点看来，资产阶级的阶级躯体的肌肉的粗暴“活动”完全消失了，社会现实的清晰轮廓在意识形态的影子戏的范围内消失了。毫无疑问：伯恩斯坦、饶勒斯和米勒兰也好，明天在自由俄国的别尔嘉也夫、布尔加柯夫诸位先生、也许还有司徒卢威先生也好，都会欣然同意以这样的公式来下定义：“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有联系的自由党人（或者民主党人）。”

面对着这样一个公式，列宁同志将会说些什么呢？他会说：这个

---

① 《从哲学唯心主义看伦理问题》（见《唯心主义问题（论文集）》1902年莫斯科版第91—136页）第118页。着重号是我加的。——托洛茨基注

② 《论农业问题》，载于《解放》杂志第9期（总第33期）（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托洛茨基注

公式在逻辑上是没有意义的，它在政治上表达了一种无可怀疑的倾向：要给无产阶级蒙上一种异己的、与它的阶级利益敌对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政治心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同一个列宁同志做了些什么呢？他试图一丝不差地完成与伯恩斯坦、饶勒斯和我们的“唯心主义者”所做的同样的工作，只是有一个区别：根据他的革命的地位，他用自由主义的极端革命的新芽也就是雅各宾主义来代替自由主义，而雅各宾主义却是自由主义的肉中之肉，血中之血。列宁同志用大胆的斜体字宣称：“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就必须也承认另外一个公式，即《解放》杂志的公式，当然是在人们用自由主义的左翼即雅各宾主义代替这一公式中的自由主义以后；这一来公式就成了这样：“决不能把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互相分割开来或者简直彼此对立起来，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不仅是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而且也是就革命策略的方法和它们的政治心理的内容来说都是如此；于是剩下要做的就是总结了：雅各宾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变种，社会民主主义是雅各宾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变种。

如果列宁不想从由他提出的唯一的、无畏的原则性的“口号”“退两步”的话，那么他就不得不从他的定义出发“进一步”，如果他接受由此而得出的全部结论，他就必须向党内的同志送上拜访的名片。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列宁同志！

要不您就象从马克思主义中产生的自由派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建立一座桥梁那样，在革命资产阶级的（雅各宾主义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之间建成您的理论上的桥梁，要不您就放弃促使您去搞这样一种理论上的谋害的

实践。

要么是雅各宾主义，要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要么从您在您同“少数派”的斗争中真正采取过的唯一的原·则立·场·上退回来，要么从您在反对少数派时似乎捍卫过的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上退回来。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列宁同志！

我们听到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声音：“难道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不是给了我国自由派一个文坛上的领袖①吗，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出一个领袖给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呢？”②

那又怎么样呢？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只能是雅各宾派分子。他在严厉的“独裁”、铁的“纪律”、“号召起义”等响亮口号下召集了他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会是庞大的和强有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所起的有局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派的）作用之间的妥协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意识形态上的外壳，当然不是用它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内容，而是用它的形式的框框，这种框框是如此支离破碎，以致人们可以把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同雅各宾主义结合起来，得到一种“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

按照列宁的论断，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我们党内正统（就是这么写着的！）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革命资产阶级的，也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倾向”。③阿克雪里罗得丝毫不能证明，既不能证明“经济派”（他是第一个起来反对他们的）也不能证明我们雅各宾主义的科长们（他在政治上描述了他们的特点，并从而在同盟代表大会的

① 指司徒卢威。——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页。——编者注

③ 同上，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历史性决议中揭露了他们)有某些倾向。阿克雪里罗得“丝毫不能证明”，他描绘不出象样的图表，他综合不出歪曲的罪证，因此他“丝毫不能证明”。他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他阐述了一种在党内出现的倾向。要做第一项工作，必须是一个敏捷的统计学家和一个马马虎虎的律师，要做第二项工作，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敏锐的政治家。另外一些人则关心“文件方面的”证明。关于这些对于列宁说来如此重要的证明，在我们的宫廷雅各宾派分子、国家雅各宾派分子和真正的国家雅各宾派分子的党内实践中是多而又多的，在我们的各个委员会的决议中是很多的，而著名的乌拉尔《宣言》是首屈一指的。所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手工业方式的”谋害，由列宁“自己”在他的小册子<sup>①</sup>里加以“集中”以后，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的顶点就是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雅各宾派分子的不朽“公式”！

##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啊，生活的逻辑多么有力！它“把一粒沙子放在路上，过分聪明的人就一个跟头跌倒在地”。在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某个组织计划中，曾经抚育了这个党的团体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而这个“微不足道的”事实竟成了一场巨大的党内斗争的根源。人们不得不对自己说：这个组织计划显然有一个错误，产生这个计划的思想显然有某种本质上的缺陷。“计划”的作者把同社会民主党精神格格不入的方法运用到党内政治中来，他认为，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不得不“扩大”社会民主党人的概念，把它同雅各宾派分子这一概念结合起来。生活显示出它的有力的逻辑，迫使无足轻重的、不

---

<sup>①</sup> 指《进一步，退两步》。——编者注



彻底的和折中主义的人们无论如何达到合乎逻辑的结局，——愈快愈好。

当列宁在炮制他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雅各宾派分子的“公式”时，他在乌拉尔的志同道合者制定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公式”。主观上乌拉尔的雅各宾派分子同列宁一样依然想留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但是政治生活中有很多震动和冲击，足以迫使他们“扩大”这个范围，或者当这个范围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时完全脱离它。这种情况迟早总要发生。

乌拉尔宣言说：“1871年巴黎公社遭到了失败，真正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公社中存在各种不同流派，它们往往代表互相对立和互相矛盾的利益。每一流派都往自己方面拉。结果是争论很多，行动很少。因此应当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说，必须使无产阶级对于保持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作好准备，无产阶级自己也必须为此作好准备（!!!）。使无产阶级为专政作好准备是一项重大的组织（!）任务，其他一切必须服从这一任务。这种准备也包括创造有利于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的精神状态，说明这种组织的全部意义。有人可能反驳说，独裁者（!!!）过去和现在都是自行出现的。但是，过去并不总是这样的，而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这种情况不应当自发地、机会主义地出现。

这里必须把最高程度的自觉同绝对的服从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必然引起另一方面（对绝对必然性的了解就是意志自由）。”

在我们俄国，面对着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组织问题，即严格集中的、秘密的、能够前进并实行自己任务的党的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任务同最终任务是一致的”。

这就是三个委员会（乌法委员会、中部乌拉尔委员会和彼尔姆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哲学。这个哲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论点：

1. 使无产阶级为专政作好准备是一项组织任务，这项任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准备保持一个以一个独裁者为首的强大组织。

2. 必须绝对自觉地为这个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而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独裁者的出现作好准备。

3. 拒绝这个纲领就是机会主义。

不管怎样，这一文件的作者有勇气公开声明，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就是说，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将不是把社会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具有主动精神的工人阶级，而是统治无产阶级并通过它统治社会的“坚强有力的组织”。

为了使工人阶级为取得政治统治作好准备，必须发展和培养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并使他们养成对革命的全体执行人员经常地积极地进行监督的习惯。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雅各宾派分子”，即政治代替制度的勇敢代表的观点，使工人阶级为取得国家统治作好准备这一巨大的社会政治任务却被建立一个权力机构这一组织策略任务所代替。

第一种提法的重点是，在吸引无产阶级愈来愈广泛的阶层参加积极的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用种种方法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改造。第二种提法归结为在“坚强有力的组织”范围内选择严守纪律的执行者，为了省事起见，这种选择是仅仅通过机械地排除不合适的人、通过“解散”和“排除右派”来进行的。

我们重说一遍，乌拉尔的同志们在用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对阶级的有组织统治代替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点上是始终一贯的。然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性，而是雅各宾派分子的一贯性，或者把它“翻译成”社会主义的语言，是布朗基主义者<sup>20</sup>的一贯性，当然带有乌拉尔文化的天然色彩。

我们因此指责乌拉尔的同志犯了布朗基主义<sup>21</sup>的错误。说到这里，我们就想起，伯恩斯坦恰恰指责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犯了布

朗基主义的错误。这似乎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说明应当把乌拉尔人看作是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把我们看作是伯恩施坦主义者<sup>①</sup>。

因此，我们认为，引证恩格斯的意见是极为有益的，恩格斯认为，布朗基主义者对于自己在发生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扮演什么角色是这样设想的：

“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敢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sup>②</sup>

大家知道，布朗基主义者并没有按照他们学说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行动，而是按照执政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行动。公社没有号召无产阶级“自觉”服从专政（按照我们的乌拉尔辩证法学家的见解，工人阶级的“自由意志”必须表现为这样的服从），它一开头就懂得：

“……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sup>③</sup>

从这两段引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并不一定是伯恩施坦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们补充一句，有的人可以是彻

---

① 这一章的大部分是在列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发表之前写的。事实表明，我们没有弄错。不出所料，列宁对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这种指责反驳说：“……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名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477页——编者）。阿克雪里罗得“附和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了对他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罪名（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托洛茨基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编者注

③ 同上。——编者注

头彻尾的反伯恩施坦主义者，而同时却距离马克思主义十万八千里。普列汉诺夫有一次写道，我们的“经济派”同米哈伊洛夫斯基、克里文柯和其他人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漫画相似，就象一滴水同另一滴水相似一样。我们的主张集中制的代替派同俄国“经济主义”理论家和欧洲伯恩施坦主义者为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所描绘的漫画相似，也象一滴水同另一滴水相似一样。要了解革命社会主义策略的全部秘密，凡是机会主义者用负号的地方，用正号去代替，凡是机会主义者用正号的地方，用负号去代替，这是决不够的。

反对机会主义者的人决不意味着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点在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得清清楚楚。在我们俄国盛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在社会主义的其他问题上一样，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观点，只存在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或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这是不正确的。还存在第三种观点：机会主义的布朗基主义观点。我们的“正统派”决不怀疑和害怕这种异端，但是这种异端同我们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比伯恩施坦主义同我们的关系密切得多。

改良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是由民主主义知识界带到无产阶级运动中的特殊成分决定的。当他们还呼吸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醉人气息时，他们热衷于通过密谋方式夺取政权，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传统逐步成为历史陈迹，他们就愈来愈倾向于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雅各宾主义的机会主义是同目前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心理相适应的，正象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同目前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相适应一样。

对于欧洲社会主义来说，雅各宾主义倾向是一种已经过时的

观点，一种早已结束的发展阶段。在那里，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过是修正主义者和伯恩斯坦主义者口中用来吓唬人的东西。我们这里则相反，修正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开始明确地变为“正统派”口中和笔下用来吓唬人的东西，而这些“正统派”是公开倾向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

因此，如果在我们已经历过的革命准备时期，由于我国普遍的落后，我们对雅各宾主义比对改良主义更加容易接受，那么，对于我们俄国革命者来说，骄傲地以此夸口，那是荒谬的。无论是雅各宾主义还是改良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都同样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任务是多么巨大（不是指组织密谋活动方面的任务，而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将提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任务），换言之，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装饰我们形式主义“正统性”的党内斗争的一句空话，而是通过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日益发展和日益加剧的社会斗争而得到的一个生动概念，那么，我们就不会同乌拉尔人一起作出愚蠢的结论，说什么公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它没有独裁者，或者指责公社“争论很多，行动很少”，或者事后向它推荐通过“解散”和“排除右派”来消除“好斗者”，即策划阴谋的人、瓦解组织的人和恶意反对公社的人。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竞争，通过长久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几十个、几百个新的、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问题时，这些派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为了加快这一过程和使它简单化而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因为，当无产阶级能够对社会实行专

政时,就不会再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这是非常清楚的。

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无疑会把许多政治残废包括到自己的行列中去,在它的行装里会带着许多思想包袱。在专政时代,工人阶级将绝对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意识摆脱错误理论和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并且把政治空谈家和抱着陈腐观点的人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正象它在今天绝对必须这样做一样。但是,不能通过把经过精心挑选的、拥有“解散”和降级的权力的一批人,或者更恰当地说,把这样的一个人置于群众之上,来代替这一复杂的工作。

马克思用几句话描绘了公社中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内部敌人”。但马克思知道,不能通过从上面颁布一个法令来摆脱这些人。马克思写道:“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sup>①</sup>只有通过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从而使无产阶级愈来愈少地被这一个或另一个“领袖”的这一种或另一种错误和错误估计所支配,才能摆脱他们。<sup>②</sup>

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两天就对它作了意义重大的评价。马克思想必没有料到,那些自称他的学生的人在三十三年之后会重复当时学理主义的雅各宾主义对于公社所抱的偏见。

公社恰恰表明,一切主张密谋的学理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页。——编者注

② 《火星报》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看法,它写道:“在德国,指挥棒问题也随着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而直接相应地丧失其意义。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虽然是缓慢地、却是不断地在实现自己的事业。”

乌拉尔的同志们对此回答说:“《火星报》把这样一个纯粹机会主义的观点看作是党在组织上成熟的一个明确目标。”这就是说,把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缓慢地、但不断地提高看作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 and 它的党成熟的唯一“明确标志”,就不多不少地意味着陷入“纯粹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注

级运动的逻辑是多么愚蠢，多么束手无策。它恰恰表明，能够在非冒险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基础上存在的，只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一个把赞成凌驾于阶级之上的坚强有力组织的“精神状态”移植到自己身上的阶级。

先生们，必须懂得，整个一个阶级的发展是不断地、但缓慢地实现的，除了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外，我们的政治的前进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基础。人们必须永远放弃用政治代替来“加速”的种种方法。谁不接受这一点，谁企图不是在阶级基础上，而是在组织密谋活动的上层中寻找其他的保证，他现在就可以离开我们。因为“缓慢的但不断的”无产阶级发展的逻辑明天反正要把他赶走。赶到哪里去？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改良主义者那里？这一点谁能预言呢？

对此我们并不怀疑。有人说，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同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又把组织问题同及时准备一个独裁者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乌拉尔的纯粹地方性的蠢事。然而我们要问，为什么这种蠢事的出现如此“合乎规律”？它怎么会如此精确地证实了少数派著作中所作的预言？

难道不是在乌拉尔的文件出现以前很久，西伯利亚代表团<sup>22</sup>就已经写道，根据“戒严状态”的逻辑，社会民主党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意味着某一个人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还写道：也许列宁不知道，在乌拉尔社会民主主义的“布朗热主义”<sup>23</sup>体制中，中心的角色是为谁安排的？也许他对于这样歪曲社会民主党并且把这种歪曲上升为理论的做法提出了抗议？没有，他沉默着。不仅如此，他对这个问题的沉默是意味深长的，这使大家觉得，似乎他陶醉在预感之中，并且在内心里美化自己。

不对，乌拉尔宣言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而是威胁着我们党的严重危险的征兆。我们应当在政治上向我们乌拉

尔的同志们深深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大多数志同道合者所突出表现的抽象的怯懦，作出了甚至使并不胆怯的人感到不寒而栗的结论。

他们将离开我们。我说的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上述观点已经或多或少是一个完全形成的世界观，而不再是一种普通的发育过程中的疾病，他们将离开我们，因为这种形式上的革命性，这种组织形式上的革命性，而不是政治内容上的革命性，本身就包含着使它不可避免地迅速衰退的因素。

即使我们党在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可以建立那一种理想的大厦（这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它会使这个大厦经得起专制统治瓦解时期给我们带来的一切考验，但是，在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民族上升时代，如果由于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而陶醉的俄国资本主义暂时能够使无产阶级离开尖锐的政治斗争，使他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即工团主义组织和经济组织的道路，那么，“坚强有力的组织”将象一幅不能被风鼓起的帆一样死气沉沉地悬挂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之上。

于是，所有那些把指靠“阶级觉悟缓慢的但不断的提高”看作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的人，所有那些在思想上对于这一或那一组织“计划”的官僚逻辑比对于阶级运动的历史逻辑更加重视的人将突然惊惶失措，而政治失望的浪潮将不可避免地使许许多多这种迷信组织形式的人脱离我们的队伍。要知道，这种失望所损害的将不仅是组织形式，不仅是集中制思想，而且是作为革命世界观基础的集中制思想。

对于他们的政治觉悟来说，组织拜物教的垮台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垮台，意味着“正统派”的垮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全部马克思主义是具体表现为一些原始的组织条文的。不仅如此，这也将意味着对于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信念的破灭，因为



无产阶级不愿意被人引向专政，虽然人们已向它指出了通向专政的如此明确和直接的路线。

由于感到失望，他们将离开我们，一些人走向改良主义，另一些人走向无政府主义。如果结果我们发现他们处于两条政治道路的交叉点上，我们将提醒他们想起这一预言。

写于1904年8月。译自《论革命组织》（哈尔特姆特·梅林厄尔编译）1970年汉堡德文版第7—11、75—134页。

# 社会民主党和革命

## · 编者按语 ·

1905年俄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在这一年，托洛茨基伙同帕尔乌斯歪曲篡改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抛出了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用以对抗列宁制定的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策略路线。列宁把托洛茨基在这个时期的表现概括为一句话：“1905年返回孟什维克那里，用最最革命的词句自我炫耀了一番。”（《列宁全集》第16卷第391页）

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曾发表在孟什维克的《开端报》上。托洛茨基歪曲俄国的社会现实，否定俄国存在革命民主派，把农民诬蔑为“一股暴乱的自发势力”，断言无产阶级只能孤军作战，搞“纯社会主义”，胡说他的“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保全的规律”。这篇文章包含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一些基本论点。托洛茨基以后连篇累牍地论述“不断革命”的文章，无非是这些论点的进一步发挥。

俄国社会民主党如今已成为人们普遍注意的中心。它是理应占据这个地位的。

自由主义把它的活动看作是对“自由”和“秩序”的一种危险。反动派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生存的一种威胁。两者的看法都是对

的。昨天我们还是一个地下的小组。诚然，警察对我们的注意大大超过了对我们有利的限度，但是，警察的工作实际上是要灭绝地下的“阴谋分子”。民主派知识分子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他们仅仅是把我们作为敌对意识形态的代表来同我们进行斗争的。今天的情况大大改变了。社会民主党完全站起来了。它领导着站在革命事变中心的无产阶级。这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切报刊——反动的、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报刊的敌视中心。

昨天人们还从各方面责备我们把欧洲的学说和欧洲的策略搬到俄国的独特条件中来。今天他们又向我们拚命地叫喊，说我们不配享用我们现在的光荣名称，因为我们的策略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毫无共同之处。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在这些问题上颇有威望的司徒卢威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变节分子断然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同雅各宾主义的混种”。

《新时报》<sup>24</sup>如今在一切主要政治问题上同司徒卢威先生意见一致，它引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深信不疑地声称，社会民主党“如果是地道的、德国式的——不仅是容忍的，而且在德国政党中可能是最光荣的”。据该报报道，在俄国也存在这种“诚实的、和平的社会民主党”团体。但是它受到“硬把诚实的德国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排挤。

躲在立宪民主党报纸《我们的生活报》<sup>25</sup>马车脚镫上的神秘“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合唱中也不甘落后，指责我们是社会革命的冒险主义。这家资产阶级报纸认为，“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在反对我们“一举埋葬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意向。根据《我们的生活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对它充满信任，并准备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它”。知识分子同情社会民主党的理想。民主派资产阶级会跟着知识分子

走。社会民主党会成为领袖，并能领导民族走向胜利。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得有一种“集中”一切民主力量的、似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遵循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党却没有这样做，它使无产阶级孤立起来，使它成为孤家寡人，从而为民主挖掘坟墓。

民族主义的《新时报》对于我们丢掉“诚实的”德国样板表示愤懑，这对我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反动的蠢人们总是把本国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党人同别国的“爱国主义的”社会党人对立起来。当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需要对社会党人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实行镇压时，它总是以“爱国主义的”和忠于祖国的德国社会党人来为自己辩解。

尽管毕洛夫公爵禁止饶勒斯到柏林作宣传旅行，但是，他认为自己出于大臣的贤明有责任把倍倍尔和其他“不知祖国”的社会党人同象饶勒斯这样一类具有高超“国家”风度的法国社会党人区别开来。曾为沙皇政府服务过数十年的《新时报》的御用文人曾经连一句欧洲社会党人的言论都不让入境，现在为了消灭我们的党，竟把我们欧洲同志的才略和政治上的虔诚拿来反对我们的雅各宾主义，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反动报刊都对那位以无知的自信责备我们把欧洲的理论搬到异己的俄国特殊条件中来的加邦先生的忏悔性赞歌表示同情，同时又对司徒卢威说我们无政府主义地弃绝欧洲样板的那番自由派-检察官的讲话表示喝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追求半官方报刊的光荣地位而丧失任何尊严的司徒卢威先生，在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颇有远见地放开了手脚，这一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彼得堡的检察官只是在对“战斗组织”案件的起诉书中恭敬地引用自己这位未来庇护人的话时，才发现这种报效的意义。

因此，我们且不管反动派的可耻袭击，而只来谈谈《我们的生

活报》的“进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疑虑。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如此。德国兄弟党所走的道路是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把他们联合成一股社会革命力量。我们的道路也完全如此。作为争取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从右的到最左的，都毫无类似和共同之处，而我们同国际社会民主党却血肉相连。但是我们的策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是有区别的，正如革命时期同反动时期是有区别的一样。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四十年是紧张的资产阶级反动时期。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公社被粉碎了，红旗被资产阶级汪达尔人<sup>26</sup>扯了下来，到处是呆板而傲慢的军国主义象征——普鲁士钢盔，沾满公社战士鲜血和蒙受普鲁士凌辱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参加了同沙皇俄国的联盟。过去曾进行过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供养着亚洲的专制制度，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充当世界反动派岗警的理想角色。资本主义在无数默默牺牲的人们的白骨堆上创造自己的“和平”业绩；资产阶级的民主已不再关心本身的存在；过早流逝的1848年所留下的革命传统已被叛卖性地忘却，——资本主义盘剥致富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乌烟弥漫着欧洲的政治气氛。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反动气氛中形成和成长起来的。它过去既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阶级斗争经验，又没有直接的革命传统，但它以惊人的坚定步伐前进着，一砖一石地垒起现在国际社会主义为之骄傲的党的民主的壮丽大厦。

俄国无产阶级的全部政治步伐所迈过的是一条“超法律”的道路。对“合法性”的崇拜在俄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政治教育中是最不得人心的。

相反，专制制度在无产阶级看来是一种笨拙的、公开暴力的国家制度的象征，它立刻使无产阶级相信，编纂的“法律”是统治力量

加在企图取得统治的力量身上的枷锁。革命的斗争方法向无产阶级表明了直接“超法律的”革命较量的全部优越性。

红色无产阶级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年复一年地在议会策略的框框里徒劳地反对三级选举制，而“农民”俄国的无产阶级只用革命的一击就把关于国家杜马的基本法扔进了垃圾堆。现在，由于这个时期的革命性，俄国无产阶级比起英国无产阶级及其强大的工联可能更接近于实现八小时工作日。

工人们掌握了革命的方法，他们不会自愿放弃它。社会民主党把工人阶级的根本要求变成革命的口号，从而以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毅力充实了革命。

在这种条件下，“集中民主力量”的策略会怎样表现呢？或者是无产阶级应该放弃自己的阶级要求，或者是——实际上都一样——放弃独立的策略。如果民主派的“集中”不单纯是一种说法，那么它就意味着使无产阶级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但是这将使我们倒退半个世纪。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革命中，曾经出现过《我们的生活报》的民主派所说的那种政治“集中”。革命民主派违背阶级斗争的逻辑，力图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拉萨尔曾号召工人为了统一而放弃共和的要求。但是，企图用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分裂的民族联合起来的民主派，最后表明它既不能引导自由资产阶级前进，又不能阻止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不定形的阶级磨擦使“集中”策略变得虚弱无力，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政治上的依赖性使无产阶级没有可能利用自己的阶级力量去独立地组织革命。英雄的维也纳无产阶级通过公开的战斗粉碎了君主制。但是资产阶级不愿要这一胜利取得的共和成果，他们挑不起民主的担子，而无产阶级也未成熟到能够独立地去维护这些成果的程度。

在我国，资产阶级民族的阶级解体的情况比 1848 年的普鲁士

和奥地利的情况更严重得无可比拟。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革命最高潮以前就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我国的知识分子民主派每当危机时刻都只能表现自己的无能。农民整个说来是一股暴乱的自发势力，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那种力量才能使之成为革命服务。

剩下的就是无产阶级。

专制制度表现出来的可怕的反抗力量进一步加强了我国革命所发展起来的、至今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计划性。俄国工人阶级在克服专制国家的强有力的反抗和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中，发展成为一支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任何一个阶段能使这支为阶级利益的钢铁逻辑所驱策的战斗力量平静下来。不断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保全的规律。

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地位，它同革命农村直接建立的联系，使军队听命于它的那种魅力——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推动它去夺取政权。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意味着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实现民主的基本任务，直接为巩固政治统治而斗争的逻辑，也在一定时刻向我们提出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存在着革命的不间断性。这不是一次“打击”，这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月，这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要想预测这个时代有多长，那是荒唐的。

写于1905年11月。译自《我们的革命》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68—173页。

# 需要建立党

## · 编者按语 ·

这篇文章曾发表在孟什维克的《开端报》上。托洛茨基继续鼓吹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遭到列宁痛斥的“自发论”。他抹杀党同工人阶级的差别，否认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基本原理，号召“尽可能把党的大门敞开，而不要害怕无产阶级的自发性”，不承认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入党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显然，按照托洛茨基的方案建立起来的党是一个组织上涣散、缺乏战斗力的党。托洛茨基的论调只不过是每个罢工者都有权自行“列名”入党的机会主义论调的翻版。

的确，需要建立党。

革命把无产阶级从上到下都发动起来。无产阶级的政治注意力被激发出来了，他们的敏感性非常强，革命的干劲很大，以至于领导机构常常要约束群众，而不是去推动他们采取某种积极步骤。我们最低纲领中最根本的要求是：共和国、八小时工作日、民兵制，在无产阶级群众看来，这些要求似乎是同他们自身一起产生的。在工人区——在会议上，在集会中——我们到处都占优势。我们的报刊享有很大声望。

所有这一切赋予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彻底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建立群众的党。完全的、无条件的、从上到下的联合，现在仅仅



是个技术问题。党响亮而明确地声明，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联合起来，并在地方和中央都着手促其实现。

联合起来的党所面临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成为工人群众的组织。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中，是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出现的，为此所必需的联系是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在民众集会上的鼓动建立起来的。报刊应当接受党的监督。俱乐部和民众集会应当受党组织的管辖。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都必须向党报告工作。所有这一切使我们面临组织联系和组织关系的问题。

党依靠的是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但通常只有政治组织才能参加制订党的纲领和策略。

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如果他想影响党的方针，他就必须是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

入党条件是：一、承认党纲；二、参加政治组织；三、按期缴纳党费。

对这三个条件，没有也不可能有分歧意见。关于党的可能的“容量”方面的全部疑问，实质上可归纳为一个问题，即什么叫做承认党纲？

革命促使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政治领导，他们阅读我们的报纸，因此很自然，他们纷纷靠拢我们的组织。只要在某一个城市号召工人入党，立刻就会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工人报名申请。这可能会引起、有时也确实引起人们对党今后命运的忧虑：党是否会溶化到自发势力中去？

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同这种自发势力划清界限而又不失掉同它的联系？用什么样的特征来鉴别一个真正的党员？

党费吗？党费本身是不提供任何保证的。参加组织吗？但是要知道，这个问题本来就是由于大量工人要求参加组织而引起的。

剩下的是承认党纲。但问题是绝大多数投奔到我们这里来的工人并不了解我们的纲领。把党的意志置于以他们为转移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意味着使党的全部政治生活遭到危险呢?必须对党纲,起码是对它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订出一定的认识标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去,那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为所有希望入党的人规定某种考试。

但是另一些同志指出,存在着相反的、而且是不小的危险。

为了力求保持自己的原则的纯洁性,党严格地把自己同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区别开来。但是,工人希望参加组织,我们党如果不吸收他们,他们就会在党外自己组织起来。我们对党的纯洁性的过分关心会促使群众去建立独立的,即无纲领、无原则的工人政党。应当尽可能把党的大门敞开,而不要害怕无产阶级的自发性!

如果党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或者是溶化在群众之中,在他们中间广泛宣传我们的基本要求和国际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声望,但失掉集中的政治组织的性质,或者是站在群众之外,保留自己对群众口号的“最高”政治监督;如果我们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那我们就说,这两种做法都是同样的冒险,实际上会造成同样的后果:使得给自己提出一定任务并发展独立的策略以解决这些任务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归于灭亡。

但是,这样严峻的选择是没有的,这一点正在间接地为下述事实所证明:两种社会民主主义派别以前在分歧中所打的旗帜就是上述两种对立的革命发展趋势,现在到处合并了。

毫无疑问,党应当尽量广泛一些,但同时,它应当是定形的,它应当由一定的组织所组成,这些组织应当对自己的成员实行监督。党是由地方政治团体组成的。党同组织之外的革命群众的经常密切的联系是通过不定形的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和社会民主主义报刊建立起来的。

关于入党的政治“考试”就不用说了，这样的考试不解决任何问题，能够说出党纲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绝不能说明政治上成熟。在接受入党的工作上应该坚持的唯一保障就是要有一定数量的、两名或三名党员的介绍。另外，只要有入党愿望和服从党的决议的决心，以及按期缴纳党费，也就够了。

在一开始时，无疑在加入组织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但是，真正的成员可以通过对按期缴纳党费的监督来确定。任何人如果在一定的时期内不缴纳党费（如果未按期缴纳不是因为失业而造成的话），就得被除名。

党的团体是依靠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来进行工作的。这种俱乐部是一种比政治组织小、但比普通民众集会大的组织。在俱乐部里不仅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而且通过它来贯彻党的当前的一切政治口号和党的一切战斗号召。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俱乐部实际上成为社会主义的讲坛；在战斗时刻，俱乐部就变为革命的策源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把我们比较狭小的党组织挤到第二位。

社会民主主义报刊是一种战斗性的、遍及各地和多样化的报刊，它从四面八方把工人阶级吸引过来；它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它天天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最后，它满足工人阶级的各种文艺、科学和哲学要求，用一种无形的但是很有力的联系把全国的无产阶级连结在一起。

需要建立党。刻不容缓。任务是巨大的。我们面临的前景具有全世界历史性质。以无产阶级打头阵的我国革命正在粉碎世界反动派的枢纽。

我们的党应当无愧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无愧于那个阶级所肩负的使命！

写于1905年11月。译自《我们的革命》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73—176页。

## 三十五年以后

### · 编者按语 ·

这是托洛茨基为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即《法兰西内战》)一书俄译本写的序言,是他鼓吹“不断革命”论的早期著作之一。

托洛茨基否认俄国面临的民主革命任务,提出“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同社会主义变革联系起来”,即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断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是不能实现的”。因为照他的说法,“这类联合必须有个前提,这就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农民,或者农民建立了强大的独立政党”,而“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后来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的这种错误论调时指出,“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列宁还用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驳斥了托洛茨基关于“前提”的说法,指出“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的存在为前提,也决不是以一般政党的存在为前提。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和党的问题混淆起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4页)。

“……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败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sup>①</sup>

（见1871年3月18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宣言）

俄国读者可以通过利沙加勒的书了解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搞错，这本书很快要出几种版本。根据附有恩格斯极重要导言的马克思的不朽著作，俄国读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哲学。我们知道，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实质上对马克思有关公社的说法没有任何补充。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不值一提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自然就说不出什么来了。直至最近为止出版的一切译成俄文的著作都是拉杂地转述国际反动势力的软弱无力的诽谤，其中还点缀着岗警梅姆烈佐夫<sup>27</sup>哲学和道德上的论点。

不仅警察的书报检查条件妨碍了我们对公社的关注。在我国进步人士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由派、自由主义民粹派和民粹社会主义派等思想）的特点也是完全与这场永志难忘的无产阶级斗争所表现的相互关系、志趣和激情的和谐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在几年以前，我们似乎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缺乏巴黎公社的传统，那么现在，通过我们自己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斗争使我们的革命成为不断革命、不间断的革命以后，我们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为直接地遵循1871年公社的遗训。

公社的历史现在对于我们不单是全世界解放斗争的一幕壮烈悲剧，不单是某种策略原理的实际例证，而是一个直接的教训。

<sup>①</sup>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1—372页。——编者注

## 一 国家和争取政权的斗争

革命就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较量。人民群众是激于简单的切身的动机和利益而起义，常常对于运动的道路和目的却一无所知；这个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权利和正义”，那个党写着“秩序”；革命的“英雄”是受“职责”感的驱使或者是贪图功名；军队的行为是取决于不容反对的纪律，取决于对于纪律的恐惧，最后，或者是取决于克服了纪律和恐惧的革命觉悟；热情、贪财、墨守陈规、想入非非、迷信、自我牺牲精神，这无数的感情、思想、情绪、能力、激情统统投进了强大的漩涡，卷走了，消亡了或者扶摇直上了；然而，革命的客观目的就是为了改造陈旧的社会关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

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所掌握的一架机器。国家就象任何机器一样，有自己的发动、传动和实施等机构。动力是阶级利益；它的机构是鼓动、报刊、教会宣传、学校宣传、党、街头集会、请愿、起义。传动机构是借口执行神的意志（专制制度）或者国家意志（议会制度）而代表种姓、王朝、等级或阶级的利益的立法组织。最后，实施机构是设有警察的行政机关，设有监狱的法庭，军队。

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是组织、破坏和改造社会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它可以成为深刻变革的推动力，也可以成为策划停滞不前的工具，这就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中。

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力图掌握政府权力，以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党，自然力图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壮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走向专政的发展。然而，在什么时刻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不是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国际局势，最后，还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如传统、主动精神、战斗准备……

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可能比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一些。1871年，无产阶级自觉地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亲手掌握了公共事务的领导”（见序言开头的语录）——实际上只有两个月——，但是它一刻也没有在英国或者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取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自然有某种依赖关系，这个观念乃是极端简单化的“经济”唯物主义偏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巴黎工人夺取政权不是因为1871年3月26日生产关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已经成熟了，甚至不是因为工人当时觉得这些关系好象已经“成熟”，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保卫民族时的叛变行为使他们不得不夺取政权。马克思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武装无产阶级才能保卫巴黎以及整个法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对资产阶级的威胁，而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是手持武器的威胁了。梯也尔政府关心的不是使劳动的法国起来反对包围巴黎的大批俾斯麦军队，而是使法国的大批反动军队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巴黎，是为了其阴谋诡计而躲到凡尔赛，放弃那些渴望本国自由、渴望自身和人民幸福的工人所占有的首都。无产阶级看到，自己应当挽救国家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它不能不执掌政权，各种政治事件的汇合使得它不得不这样做。政权的取得是出乎意料的。尽管如此，当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时候，它仿佛是由于本阶级的重力所致，仍然走上（虽然有这样和那样偏向）正确的道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它的阶级地位迫使它首先有目的地改革

国家政权机关，它的地位也使它执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如果说公社失败了，那也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而是由于一系列政治方面的因素，如巴黎被封锁而与外省隔绝，国际形势极端不利，本身犯错误等等。

## 二 共和制和无产阶级专政

1871年的巴黎公社自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公社；它的制度甚至还不是成熟的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制度。“公社”仅仅是个序幕。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巴黎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时期，并不是因为它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而是因为它选派的九十名代表中有七十二名是工人，是因为它受到无产阶级近卫军的保卫。更确切地说，共和制本身只不过是事实上已经建立的“工人政权”的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反映。

亚历山大·米勒兰作为“社会主义的”人质在已故的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内阁里，同已故的镇压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位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提出一个政治格言说：“共和制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公式，社会主义是共和制的经济内容。”应当承认，这个“政治公式”毫无任何“社会主义的内容”。现代共和制形式上是民主组织，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实质上仍然是有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公式”。脱离了瑞典的挪威能够顺利地保持脱离之后所处的那种状况，就是说，它能够依然是共和国而根本没有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公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不会有损于施托克曼市长和其他“社会栋梁”的一根毫毛），但是挪威却宁愿找一个国王（至尊的候选人的后备队伍非常庞大！），以完成自己独立的临时共和国大厦。



有一位格里姆先生，从一切迹象来看是个教授，并且是个自由派的作家，另外还是《北极星》杂志<sup>28</sup>的撰稿人，他不久前向我们这些“书本迷的学理主义者”解释说，“民主共和制”既不是“包治一切的药方”，也不是“绝对完善的政治组织形式”。格里姆先生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书本迷”所依据的那些学说，也就会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对“民主共和制”包治一切病症的性能没有抱任何幻想。为了不说得太远，我们把恩格斯为《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地引在下面，作为例证：

“人们常常认为，放弃对世袭君主制的信仰而接受民主共和制作为自己的纲领，就是非常大胆的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制并不亚于君主制。”<sup>①</sup>但是格里姆先生提出一个毫无价值的思想，似乎整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的各种机构的正确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不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一样好，而国际社会主义则认为，共和制是社会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但得有个条件，就是无产阶级要使它不再为资产阶级掌握，使它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变为以社会主义来解放全人类的工具。

### 三 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报刊曾介绍了不断革命的思想，说明不断革命就是通过一系列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新的群众阶层的起义，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不断进攻而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农

---

<sup>①</sup>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编者注

奴制度同社会主义变革联系起来，这时我们的“进步”报刊便掀起了一致的愤怒若狂的叫嚣。很多事情它都容忍了呀，但是这一点是不能允许的。它叫嚣说，革命不是一条可以“合法化”的道路！采用特殊的手段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解放运动的目的是使革命永无止境，而是要尽快地把它纳入权利的轨道，等等，等等。这是大多数所谓“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该党政论家司徒卢威、盖森、米留可夫等先生在任何自己的计划、预见或警告上都无法自禁地丢了丑，他们为了夺得的“权利”早已起来反对革命了。在十月罢工之前，他们竭力把革命（借助于哭诉！）纳入布里根杜马<sup>29</sup>的轨道，声称同布里根杜马的任何直接斗争都有利于反动势力。10月17日宣言颁布之后，他们事后补发了革命还有两个半月（从8月6日至10月17日）的证明书并慷慨地把十月罢工收为义子，取名“光荣”。然而，为了使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学会了些什么，他们以惊人的灵巧方法要求革命允许把自己放在维特宪法的普罗克鲁斯特的床<sup>30</sup>上，声称同维特宪法的任何直接斗争都有利于反动势力。这些只是在事后让革命延期三个月的先生们，咬牙切齿地起来反对革命无限期的思想，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有立宪制度充分稳定的局势，即很少进行选举，可能的话以非常法来整治社会民主党，有条件地自由主义地抗议这些法律，死气沉沉地提出反对派的质问，积极地进行幕后交易（所有这一切是以对人民大众的不断的资本主义剥削为基础的，是以依靠君主制的立宪主义的驯顺的两院和皇帝的军队为基础的），——只有这样的“权利”局势才能使他们由于他们所造成的一切凌辱而受到奖赏，给他们提供扮演“国家”角色的舞台。事件充分地嘲弄了这些领袖，无情地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和无能，早已使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向他们请求革命要继续存在的权利。

这个民主派的腐化较轻的代表没有冒险从已经取得的立宪

“成果”的角度去反对革命：甚至在他们看来，在议会制度产生之前的这种议会制呆小病在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不是有力的武器。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立足于权利，而是立足于他们认为的事实，立足于历史的“可能性”，立足于政治的“唯实主义”，最后……最后甚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干吗不这样呢？威尼斯的笃信宗教的资产者安东尼奥就准确地说过：

“要记住：魔鬼也会引证圣经上的论据”……①

这些先生往往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具有宝贵的自由精神，只是没有任何完整的世界观，他们都乐意在“批评”的掩盖下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结论，并且利用马克思主义本身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他们都坚决指责我们奴隶般地遵循陈腐过时的学说，好象我们根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

不断革命？社会主义变革？可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导说，每一种社会制度在无法维持其本身的生存，其固有的趋势发展到最大限度之前，不会让位于新的社会制度吗？难道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衰竭了吗？或许社会民主党象主观主义者那样认为，可以靠思想来铲除资本主义？云云，云云。有时连最执迷不悟的、甚至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够温和的自由派，都从乐于引用“圣经上的结论”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习这种论证方法。例如，亚历山大·考夫曼先生非常严肃地在《北极星》杂志上声明说：“我们之中有很多人相信，社会主义理想会最后胜利，但是我们同洛贝尔图斯一起认为，同时代（同谁？）的人类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天堂’的地步，我们同马克思一起深信，生产工具的公有化只能是人民和国家的生产力逐渐发展的结果。”（第2期第132页）这位考夫

---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曼先生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而向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教皇和路德同时发誓，他是象自由派批评家们那样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常常炫耀恶意无知的活样板。

资本主义应当在无产阶级能够掌握国家政权之前就“衰竭”。这是什么意思？生产力发展到最大限度？生产集中到最大限度？这样，到哪里是最大限度？它的客观特征是怎样的呢？

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表明，资本主义不但使主要的生产部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在大型经济机体周围设置寄生性小型工商业企业的分枝。在农业上，资本主义有时一下子就扼杀了小生产，使农民变为雇农，变为产业工人，变为街头小贩，变为流浪者；它有时要保存农民经济，但用自己的铁钳来加以箝制；它有时造成许多小的和更小的农户，使农民劳动力沦为大地所有者的农奴。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交织在一起的大量现象和事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主要社会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大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与小企业创造的价值相比，前者在不断增加，这样，主要经济部门实行公有化就越来越容易了。但是，在我们的批评家看来，这两部分社会生产应当各占百分之多少才可以说，资本主义衰竭了，无产阶级才有理由决定，现在我亲手摘取成熟了的果实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的党并不想在夺取政权以后就从自己的社会主义意愿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它在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并且打算完全依靠客观经济发展，因为，即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这种经济发展也不会停止。但是问题在于，——这是问题的极端重要的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早已使社会主义成为客观的有益的制度；第二、这种经济发展中完全没有这样一些客观时机，只有从这种时机开始，才能对自发的演变进行有计划的国家干预，以使用公有经济去排挤私有经济。

当然，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所遇到的资本主义

发展形式愈高级，它也就愈容易解决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也就愈能够直接着手组织公有经济，社会革命的时期也就会愈短（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但是问题在于，——这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选择可以亲自夺取国家政权的时机，这绝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演变的基础上发展着的阶级斗争，正象这种经济演变本身一样，是一种具有各种必然内在趋势的客观过程。

可惜，阶级斗争的逻辑在所有资产阶级政治家，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卖弄马克思主义，以便“更独立地”同它的政治表现即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的人看来不过是个空谈。任何根据阶级斗争所作的论证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是一掠而过，就象在磨平的玻璃上滑一下一样。他们还勉强记住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个别原理，但是就涉及阶级斗争及其客观逻辑的各方面来说，他们仍然是原始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当回答不断革命思想（在我们看来这是从社会政治关系中得出的结论）的时候，他们诉诸“客观的社会发展”，他们忘记，这种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演变（他们非常肤浅地理解这种演变），而且包括阶级关系的革命逻辑（他们甚至不能强迫自己思索一下这种逻辑）。

社会民主党应当并且希望成为客观发展的自觉体现者。但是，如果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在革命的某个时机向无产阶级提出，在两条道路中必须选择一条：是承当起夺取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还是放弃自己的阶级阵地，那么社会民主党就把夺取国家政权当作自己当前的任务。同时它丝毫也不忽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发展和集中的过程，然而它要说：如果归根到底以经济发展的进程为依据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促进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结束”自己的经济使命（它几乎没有触及政治使命）之前就实行专政，那么这也只是意味着，历史使无产阶级肩负起非常艰巨的任务。或许，连无产阶级也会由于斗争而精疲力尽，由于沉重负担而垮台，

——也许会这样。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由于畏惧阶级分化和整个国家陷入野蛮时代而放弃这些任务。

#### 四 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革命不是可以用鞭子抽着向前转的陀螺。它也不是顺从的红海，自由主义的摩西<sup>31</sup>之流可以用权杖一击或者大喝一声海水便分成两半<sup>32</sup>。当我们谈论不断革命时，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我们把工人运动引到“权利”（什么样的权利？专制的？维特先生的权利？杜尔诺沃先生的权利？司徒卢威先生的权利的预先规定？什么样的权利？）的岸边的愿望，我们的出发点是对正在开展的革命斗争中的阶级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我们已作了几十次。我们是从各方面来看待问题的。事实每一次都证明我们的政治分析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总是抱怨我们，然而一次也没有从实质上答复我们。

最近一年来革命表明，它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孜孜不倦的精神，但却没有建立一个国家机关，作为实际的支柱、“自由”和“保障”。8月6日的杜马被扫除了。10月17日—12月11日的杜马遭到了覆灭。总是迫不及待地盼望革命的大山最终为他们产生一只老鼠的自由派，由于看到革命的“无结果”而畏怯不前。然而，革命有权利为这种“无结果”而自豪，因为这只不过是它内在力量的外部表现。每一次当专制制度企图与张惶失措的有产阶级代表实行妥协并依靠他们着手绘制立宪图纸时，一场新的、比过去都更加汹涌得多的革命浪涛就将图纸冲走，抛了回去，或者把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绘图员卷了进去。

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用推翻专制制度的办法去争取议

会制度。而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则阻止资产阶级通过与专制制度妥协的办法去取得立宪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领导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已经非常成熟，不会跟它走；无产阶级要使它跟着自己走。民主派看来比自由派还要软弱。民主派象自由派一样，与人民是隔绝的，它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优势。它是微不足道的……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和**主要**战斗力量。它控制着革命的整个战场，任何一种让步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使它满足，它将通过喘息和暂时退却把革命进行到取得胜利，从而使它掌握政权为止。

我们在这里没有用近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可以请读者看看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著作。<sup>①</sup>

在这里我们只谈谈在争取议会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内部软弱无力的一个实例。

人民代表制是资产阶级与君主制勾结的代价，同时也是这种勾结的固定舞台，每一次当它准备诞生时，就被革命扼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种历史性制度还在萌芽之中，更确切地说，还在被想到的时候就被扼杀了。这就是民兵制。

民兵制（国民自卫军）是1789年和1848年在巴黎，在意大利各公国，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一切革命的**第一个**口号和**第一个**成果。在1848年，国民自卫军（即有产者和“有教养者”的武装）是所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甚至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它的任务不仅是保证所获得的自由或者说完全应当“赏赐”的自由不

---

① 我们可以列举我们的小册子《1月9日之前》，特别是帕尔乌斯同志为它所作的序言。其次我们请读者看看《开端报》<sup>33</sup>的几篇文章，以及我们为拉萨尔的《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所作的序言。1905年7月所写的这个序言的命运很复杂，只是现在才得以刊印出来。——托洛茨基注

受从上而下的变革的影响，而且保证资产阶级所有制不受无产阶级的侵犯。可见，实行民兵制是资产阶级强烈的阶级要求。一位研究意大利统一史的英国自由派历史家说：“意大利人非常明白，武装民兵就会使专制制度不能继续存在。此外，在统治阶级看来，这是制止内部深藏的各种无政府状态和一切混乱情况的保证。”<sup>①</sup>当权的反动派在中心城市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无政府状态”，即对付革命群众，便把资产阶级武装起来。专制制度起初让资产者镇压和压制工人，而后再把资产者缴械，把他们也压制下去。

在我们这里，民兵制作为一个口号，没有任何象在资产阶级政党那里所享有的那种威信。自由派实质上不可能不了解武装的重要性：专制制度使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一些具体教训。他们也明白，在我们这里完全不可能建立抛开无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民兵制。俄国工人和1848年工人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后者当时口袋里装的都是石头，手里拿的是铁棍，而小店主、大学生和律师则肩扛着国王的火枪，腰挎着马刀。

武装革命在我们这里首先意味着武装工人。自由派了解这一点，也害怕这一点，他们绝不要民兵制。他们不经战斗就把这个阵地交给专制制度，象梯也尔的资产阶级那样把巴黎和法国交给了俾斯麦，就是不肯把工人武装起来。

吉维列戈夫先生在《立宪国家》文集里，在这篇自由民主派同盟的宣言里，在论述国家变革的可能性时十分正确地说：“社会在需要的时刻本身就会显示出保卫自己宪法的决心。”既然由此自然产生人民武装的要求，那么自由派的哲学家在这里便认为“必须

---

<sup>①</sup> 博尔顿·金《意大利统一史》1901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20页。——托洛茨基注



补充”一点，就是为了反映变革“完全没有必要所有人都准备好武器”<sup>①</sup>。所需要的只是社会本身准备给予反击。通过什么途径，不得而知。如果说从这种支吾搪塞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那就是在我们的民主派的心里对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恐惧胜过对专制士兵的恐惧。

这样，武装革命的任务便十分繁重地压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民兵制，这个 1848 年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在我们这里一开始就成为人民的要求，甚至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武装的要求。这个问题可以影响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

## 五 无产阶级和农民

目前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方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将是如下政治任务：巩固自己的地位，武装革命，解除反动派的武装，扩大革命的基地，改造国家。在完成这些任务特别是最后一项任务时，俄国无产阶级是不会忘记巴黎公社经验的。消灭常备军和警察，武装人民，消灭官僚，实行所有官员选举产生的制度，规定他们的薪金平等，实行政教分立，这就是按照公社的范例首先应当实行的措施。

但是，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地，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许多劳动群众阶层，特别是在农村，将第一次卷进革命中来，他们只有在革命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组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资助进行。最后，立法权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

<sup>①</sup> 《立宪国家》文集第 1 版第 49 页。——托洛茨基注

同时，我们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特点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重担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这不仅将为工人政府造成巨大的困难，而且也会使它具有不可估计的优越性。这一点将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

在 1789—1793 年和 1848 年的革命中，政权首先从专制制度转到资产阶级温和派分子手中；资产阶级在革命民主派取得或者准备取得权利之前，就解放了农民（怎么解放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被解放的农民对“市民”的政治举动即对今后的革命进程，失去了任何兴趣，它一动也不动地作为“秩序”的基础，把革命出卖给篡权的专制制度或者原来的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

如上所说，俄国革命不容许建立任何资产阶级立宪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只能解决最简单的民主任务。至于维特式的官僚改革家，他们文明的努力由于自己争取生存的斗争而付诸东流。因此，农民的（甚至整个农民这个阶级的）最起码的革命利益是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休戚相关的。

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者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

象公社一样，它将有充分的权利向农民说：“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

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将不仅意味着实行民主的平等，自由的自治，整个赋税负担转到有产阶级身上，常备军化为人民武装，取消教会的强制勒索，而且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作的革命安排（成就）。无产阶级将使这种安排成为国家今后在农业方面采取措施的出发点。在这种条件下，俄国农民由于切身利益的关系从一开始，在初期最困难的时期就对无产阶级的（“工人民主”）制度所作的支持并不亚于法国农民由于切身利益的关系对向新的所有主保证用武力使其地产不受侵犯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制度所作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在预先获得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

的领导下召集会议的人民代表制无非是工人民主制统治的民主形式。

农民或许会排挤掉无产阶级并取而代之吧？

这是不可能的。整个历史经验说明，这种假定是不成立的。经验证明，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sup>①</sup>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农村依附于城市的历史。欧洲城市在工业上的发展当时使得农业生产方面的封建关系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农村本身产生不出能够完成消灭封建主义这一革命任务的阶级。使农业依附于资本的城市，却产生了这样一些革命力量，它们掌握了对农村的政治领导权并把国家和财产方面的革命扩展到农村中去。农村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彻底陷入在经济上依附于资本的境地，而农民则彻底陷入在政治上依附于资本主义政党的境地。资本把农民变为自己的政治财产，变为自己竞选的场所，使封建主义在议会政治中得以复活。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国库和军国主义

---

① “农民协会”的产生和发展的事实能否驳倒这些以及更进一步的设想呢？丝毫不能。“农民协会”是什么组织？就是某些寻找群众的激进民主派分子同农民中的——看来，不是其最下层中的——最有觉悟的分子为了民主变革和土地改革而联合在一起的组织。

“农民协会”无论发展得多么快，无疑，也根本不能成为农民群众的政治组织。革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就根本不能指望（暂不谈其他一切设想）“农民协会”能够在即将最后推翻专制制度和政权转到革命手中的时刻成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重要竞争者。同时还应当忘记，主要的革命战役是在城市里进行的，单是这一点就决定“农民协会”只起辅助的战斗部队的作用，这也就决定了它在政治力量等级表上的位置。

至于使“农民协会”有其存在意义的土地纲领（平均使用土地），应当说，土地运动发展得越广泛深入，它发展到没收和分配土地阶段的速度越快，“农民协会”由于成千上万的阶级矛盾、地区矛盾、风俗习惯的矛盾、技术的矛盾而瓦解得越迅速。它的成员将会在农民委员会、地方土地革命机构里起自己那一份影响，然而，农民委员会，经济管理机关当然消灭不了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之一的农村对城市的政治依赖性。——托洛茨基注

把农民推进高利贷资本的陷阱，而通过国家牧师、公立学校和营房腐蚀，使农民成为高利贷政治的牺牲品。

俄国资产阶级将把自己整个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它势必要交出对农民的领导权。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形势下，农民只得依靠工人民主的制度。即使农民这样做并不象它通常依靠资产阶级制度那么自觉，那也好！但是每个资产阶级政党一旦控制了农民的选票，就急于利用政权来盘剥农民，用各种希望和诺言欺骗它，随后，在对它最不利的情况下就让位于其他的资本主义政党，而无产阶级则是依靠农民，动员一切力量来提高农村文化水平和发展农民的政治觉悟。

马克思说，法国农民的偏见“抵不住公社关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的号召。地主非常明白（他们也最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sup>①</sup>

从上述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思想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为它原则上是可以允许的，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还是“不愿意”要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直接的意义上说来，它是不能实现的。

事实就是如此。这类联合必须有个前提，这就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农民，或者农民建立了强大的独立政党。正如我们竭力说明的那样，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将是农民的（不只是农民的，而且是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切进步势力，一切实际利益的代

---

<sup>①</sup>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1—382页。——编者注

表。马克思说：“公社乃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此，它是真正的国民政府。”<sup>①</sup>

但是它依然是无产阶级专政。

## 六 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和目的

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革命组织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巴黎公社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1848年3月的维也纳革命使大学生占了统治地位，因为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唯一还能实行革命政策的一部分人。分散的、没有政治经验和独立领导的无产阶级则跟在大学生后面。在所有紧要关头，工人们总是向“脑力工作的先生们”提出帮助“体力工作”的人。大学生们有时把工人召集起来，有时又自己切断工人由郊区到市区的道路。他们有时运用自己另外依靠大学生军团的武器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威信来禁止工人提出自己独立的要求。这是对无产阶级实行善意的革命专政的典型的鲜明的形式。

在巴黎公社，一切都以工人的政治独立性为基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公社的无产者选民们提出，不要忘记，只有从工人自己当中选举出来的人才会很好地为他们服务。中央委员会写道：“要摆脱有产者，因为有钱人愿意把工人看作亲兄弟的事是绝少有的。”公社是无产阶级的事务委员会，国民自卫军是它的部队，官员是它的担负责任的公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1906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完全不象1848年的维也纳工人阶

<sup>①</sup>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级。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全俄的实际活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不是在激奋时刻夺取了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统治权的现成的密谋组织。这是群众自己为了协调它的革命斗争而有计划建立的机构。这些由群众选举的、对群众负责的苏维埃，这些绝对民主的机关实行的是最坚决的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精神的阶级政策。这还远不是临时政府，它们有时甚至可以化为乌有，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地方上的临时政府的未来的基础。工人苏维埃的全部活动也清楚地表明，掌权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政策同 1871 年公社相比将大大前进一步。

马克思说，巴黎工人没有向公社要求奇迹，现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用几道法令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那就荒谬绝伦了。经济制度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尽一切力量运用国家政权，来促使经济朝集体主义方向发展，并缩短它的道路。

无产阶级将从包括在所谓最低纲领中的那些改革开始，并由于其地位的缘故将不得不直接从这些改革向集体主义的措施过渡。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累进所得税将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虽然这里的重心不在于颁布“法令”，而在于组织执行这些措施的实际行动。但是主要的困难（即向集体主义过渡！），在于国家在厂主为对付所颁布的法令而关闭的工厂中靠国家资金来组织生产。

颁布取消继承权的法律并付诸实施也将是比较容易的事。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形式的遗产也不会使无产阶级为难，或者成为它的经济负担。但是作为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继承者，工人国家必须承担由社会组织经济的任务。

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上说，没收（无论有偿或无偿）也是这样。

有偿的没收有其政治上的好处，但在财政上有困难，无偿的没收则在财政上有利而在政治上有困难。但是比这些更困难的将是经营组织工作。

我们重述一遍：无产阶级的政府并不是能够创造奇迹的政府。

生产社会化要从困难最小的部门开始。在最初时期，社会化的生产将通过商品流通规律同私营企业联系的沙漠中的绿洲。社会化经济占领的领域愈广，它的优越性就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会愈感到稳固，无产阶级进一步的经济措施也就愈大胆。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并且一定会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依靠国际的技术，正如实行其革命政策时一样，它不仅依靠本国阶级关系的经验，而且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

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握革命赋予的政权时，将采取一切所能采取的办法立即把本国事业的命运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联系起来。<sup>①</sup> 不仅无产阶级政策的一般国际主义原则要求这样做，阶级自卫的庄严呼声也驱使走这条道路。

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冲破我们伟大革命的民族框框，使之成为劳动者取得世界胜利的序幕的条件下，才不会被击退，才能够把自己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写于1905年12月。译自马克思《巴黎公社》  
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I—XXI页。

---

<sup>①</sup> 关于国际的革命命运，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拉萨尔演说的序言里已经概括地谈到了。——托洛茨基注

## 总结与展望(摘录)

### · 编者按语 ·

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打着“总结”革命的幌子,把他的“不断革命”论系统化,到处兜售。《总结与展望》就是一本代表作,托洛茨基自吹这是当时对“不断革命”论所作的“完备的论证”。全书共十章,前几章是对俄国历史及社会状况的分析。这里选收了最后三章和1919年重印本序言。

托洛茨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认为既然是无产阶级参加并且领导的革命,那么革命就要跳过民主革命阶段,其结果必然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最低’和‘最高’纲领间的界限便立即不存在了”。

托洛茨基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一再扬言俄国“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地,他把农民看作反社会主义的力量,硬说他们迟早要“背弃”无产阶级。因此,托洛茨基给俄国无产阶级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它一旦掌握政权,就会“前有欧洲的反动派,后有国内的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上。他写道:“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的暂时的统治变为长期的社



会主义专政。”这就是说，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不预先夺得政权，俄国无产阶级不仅不能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不能保持政权（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9页）。

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粉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但是，托洛茨基在本书1919年重印本序言中依然大言不惭地宣称，可以“毫无更改地重印这本小册子”，并继续鼓吹“从西欧革命寻找直接及时的支持”。

## 191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重印本序言

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是使俄国革命运动的各种思潮和政治团体形成派别的根本问题。甚至在社会民主运动内，自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时候起，就因这一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从1904年起，由于这些分歧而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我们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也就是说革命的自然结果将是政权转归资产阶级并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创造条件。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则是：承认就要到来的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同时提出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革命的任务。

孟什维克的社会分析是极端肤浅的，这种分析实质上只是粗俗的历史类比，这就是那些“有教养”的市侩们的典型方法。不论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两极造成极大矛盾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降至无足轻重的事实，或者是后来实际形势的教训，都没有能使孟什维克停止对“真正”、“现实”的民主派的不倦寻求，他们认为这种民主派将会领导“民族”并创造议会制的、尽可能民主的资

本主义发展条件。孟什维克总是竭力到处去寻找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展的迹象，在找不到的时候就加以臆造。他们夸大一切“民主”宣言和表现的重要性，同时轻视无产阶级的力量及其斗争的前景。为了使俄国革命取得所谓历史规律所规定的“正当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是如此狂热地拚命寻找这种主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期间，当找不到主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孟什维克便自己来执行这种力量的任务，并且多少有些成就。

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锻炼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革命形势下的行动当然不可能同二月革命中扮演“主要”政党的孟什维克有什么两样。资产阶级民主派缺乏真实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也表现在孟什维克身上，因为他们很快就夭折了，在革命进行了八个月之后便被阶级斗争抛在一边了。

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决不相信俄国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权和力量。它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决定性的重大意义，但是说到革命纲领本身，布尔什维克在最初把它限于千百万农民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或者和农民对立，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们（暂时）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至于对革命内部力量和革命前景的估计，作者在那个时期没有附和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派别中任何一方的意见。他那时所支持的立场可以概述如下：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其首要任务的革命开始以后，会很快引起强大的阶级冲突，并且只有当政权转到唯一能领导被压迫群众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才能赢得最后胜利。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它不仅不愿而且也决不能把自己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那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连同它的国家界限将被抛弃，俄国工人阶级的暂时的

政治统治也将发展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如果欧洲依旧停滞不前，资产阶级反革命将不会容忍俄国劳苦大众的政府，并将迫使这个国家倒退，倒退到远远不及一个民主的工农共和国的地步。因此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内。它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须打破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并从西欧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这种观点在现在重新发表的这篇原写于1904至1906年间的文章中要加以发展和论证。

但是十五年来作者在坚持不断革命观点的同时，在估计社会民主运动中敌对的派别的时候陷入了错误。由于双方的出发点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作者曾认为它们之间的分歧不致深刻到引起分裂的程度。同时，他希望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清楚地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和微不足道，另一方面还会证明无产阶级客观上不可能受民主主义纲领的限制。他认为这一点足以根本消除派别分歧。

、作者在侨居国外期间一直处在两派之外，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当时非常重要的情况：实际上，沿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战线，许多顽强的革命者正集中到战线的一边，而愈来愈陷入机会主义和调和泥坑的分子则集中到战线的另一边。在1917年的革命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组织，团结了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一切最优秀的分子；布尔什维克（经过一些内部斗争）明确采取了旨在达到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策略，这完全符合俄国的整个国际形势和阶级关系。而孟什维克派那时的成熟程度仅仅足以担负我前面说过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

现在在向公众发行本书重印本的时候，作者不仅希望解释一下促使他以及其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同志有可能

在1917年初同这个党共命运的理论原则(这样一个人的理由并不能成为重印此书的充足理由),同时也希望追述一下对俄国革命动力的社会历史分析;从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可能而且必须成为俄国革命的任务,远在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既成事实之前就是如此。我们现在可以毫无更改地重印这本写于1906年而其基本路线在1904年已经形成的小册子,这一事实就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在替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孟什维克方面,而是在实际执行工人阶级专政路线的政党方面。

一种理论的最后考验是实际经验。我们现在所参加的事件,以及我们参加的方式早在大约十五年前就在我们的基本路线中预见到了,这一事实就是我们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们重印了发表在1915年10月17日巴黎《我们的言论报》<sup>34</sup>上的一篇题为《为政权而斗争》<sup>①</sup>的文章作为附录。这篇文章具有一个论战的目的,是对孟什维克领袖们写给“在俄国的同志们”的纲领性“信件”提出批评。在文章里我们得出结论:1905年以后十年中的阶级关系的发展已经进一步摧毁了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抱的希望,因此很显然,俄国革命的命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地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在所有这些年来的思想斗争面前,如果有人说十月革命是“冒险主义”,那他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白痴!

谈到孟什维克对革命的态度,不能不提一下考茨基的堕落成为孟什维克,他现在从马尔托夫、唐恩和策烈铁里的“理论”中找到了他自己的理论和政治堕落的词句。在1917年10月以后,我们曾听见考茨基说,虽然应该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民主党

---

① 见本书第272—279页。——编者注

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俄国共产党并没有通过考茨基为它规定的具体途径和具体时间表取得政权，所以苏维埃共和国应该让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去纠正错误。对于考茨基的反动陈腐的批评，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并读过考茨基在1905至1906年间所写的文章的同志们一定更感到意外。在那时候，考茨基（他确实不是没有从罗莎·卢森堡得到有益的教训）充分理解到并承认：由于国内阶级斗争所达到的水平和资本主义的整个形势，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告终，而必不可免地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那时坦白地写过关于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工人政府的文章。他甚至没有想到根据政治民主派的不断变化和外表上的结合情况来决定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的问题。

在那时候，考茨基懂得，革命将会第一次开始唤醒千百万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下子唤醒，而是逐渐逐渐地，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唤醒，因此当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广大的农民群众仍处于很幼稚的政治发展水平而会把选票投给仅仅反映农民阶级的落后和成见的中间政党。那时考茨基懂得，由夺取政权的革命逻辑所引导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任意无限期地延迟夺取政权的行动，因为自己否定这项行动只会为反革命清扫地盘。考茨基那时懂得，无产阶级一旦夺得革命政权，它不会把革命的命运寄托在最没有觉悟的、一时尚未觉醒的群众的心血来潮之上，而是正相反，无产阶级会把政治权力集中在从事启发和组织这些落后和无知的农民群众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手中。考茨基懂得，如果把俄国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限制它的任务，那就意味着不了解世界上进行的任何事情。他同俄国和波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正确地承认，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欧洲无产阶级之前夺取了政权，它必定会利用作为统治阶级的形势给予欧洲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强有力的援助，而不是

把它的地位迅速让给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充满马克思主义原则精神的世界范围的前景，都要看农民在1917年11月和12月的所谓制宪议会选举中怎样投票和投谁的票而定，这一点并不是由于考茨基或是由于我们的缘故。

现在当十五年前概述的展望变成了现实的时候，考茨基却拒绝给予俄国革命以出生证，原因是它的出生没有及时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办公室里登过记。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糟蹋！人们可以完全正当地说，从第二国际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对俄国革命所下的这个市侩的判断（一个比1914年8月4日赞成军事拨款的投票更丑恶的表现）已经可以看到第二国际的堕落了。

几十年来考茨基发展并坚持了社会革命的概念。现在革命变成了现实，考茨基却在革命面前惊慌地退却了。他被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吓坏了，并且对德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强大运动采取敌视态度。考茨基很象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师的一生，他多少年来一直在他的沉闷的教室里向学生们重复春天的描述，可是最后当他结束他的教员生活，来到新鲜空气里的时候，他却不认识春天，因而大为生气（如果这个小学教师可能生气的话），并且力图证明春天并不是春天，而只是自然的大混乱，因为它的发生违反了自然历史的规律。幸运的是，工人们并不信赖这位甚至是最权威的腐儒，他们信赖的是春天的声音！

我们马克思的信徒和德国工人们一起坚持我们的信念：革命的春天已经充分按照社会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律到来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小学教师的脱离历史的教鞭，而是对实际正在进行的历史发展的方式方法所作的社会分析。

我对两篇文章（一篇是1906年写的，另一篇是1915年写的）

的原文都没有作任何更改。原来我打算为原文加注，使它适合于目前之用；但是在通读原文的时候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如果我要详细加注的话，那会使本书的篇幅增加一倍，我现在没有时间这样做。而且这种“两层”的书籍对读者来说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本文思想系统的主要不同处与我们当前的情况很相近，愿意更彻底地熟悉本书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从目前的革命经验中找到补充本书所说明的观点的必要资料。

写于1919年3月12日。译自《不断革命和总结与展望》1962年伦敦英文版第161—167页。

## 七 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但是这并没有防止“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乌托邦。

罗日柯夫在发言反对社会主义化和合作化纲领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为未来制度断然规定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罗日柯夫问道：“现在难道已经具备了这种制度的物质的客观先决条件，包括这样的技术发展，它足以使个人追求利益和金钱(?)、个人努力、进取和冒险的动机减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会生产提到首要地位？同这种技术水平密切关联的是，大生产在一切(1)经济部门中差不多占完全(1)统治的地位。难道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结果了吗？现在连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提高——提高到足以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达到精神上统一的程度这样一个主观心理上的先决条件都还不具备。”罗日柯夫继续说：“其次，我们知道现在有象在法国阿耳比的著名的玻璃工厂和法国的几个农业协会这样一些生

生产者协会的例子……法国的经验再好不过地表明：合作生产甚至在法国这样一个先进国家的经济条件下，都还没有占统治地位。这些企业只是中等规模，它们的技术水平也没有超过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现在它们还没有站在工业发展的前列，并没有领导工业发展，而只是接近中等水平而已。只有当个别生产者协会的经验表明它们在经济生活中起领导作用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接近了新制度，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确定，这种新制度实现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sup>①</sup>

我们尊重罗日柯夫同志的好意，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所谓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问题上，即使在资产阶级的文献里也很难找到象他那种混乱的概念。谈论一下这种混乱是值得的——如果不是为了罗日柯夫，那么也是为了弄清问题。

罗日柯夫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发展，它足以使个人追求利益和金钱(?)、个人努力、进取和冒险的动机减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会生产提到首要地位”。这段话的意思很难明白。显然罗日柯夫同志是想说，首先，现代技术还不足以消除工业中的人力劳动；其次，为了消除这种人力劳动，首先需要大国营企业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差不多”占完全统治的地位，也就是说国内全体人民“差不多”已完全无产阶级化。

据说这就是“马克思断然规定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先决条件。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罗日柯夫认为社会主义将会碰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情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企业在一一切工业部门中差不多占完全统治的地位”，正如上面已经说过，意味着工农业中所有的中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但是机器技术在这些大企业中占完全统治的地位，会使人力

---

<sup>①</sup> 罗日柯夫《论土地问题》第 21、22 页。——托洛茨基注



劳动减到最低限度，因此国内绝大多数人口（譬如说百分之九十）会变成劳动后备军，在济贫院里靠国家维持生活。我们说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但谁也不能说我们不合逻辑，也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去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整个生产是一部自动化机器，属于一个辛迪加，只需要一个有训练的猩猩作为一个活劳动力。我们知道，这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一贯持有的堂皇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不仅占据“首要地位”，并且支配一切方面。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全国除了百分之十拥有托拉斯的人以外，都靠公费生活在济贫院里，当然也就只限于社会消费了。因此，我们在罗日柯夫同志身后看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熟悉的面孔。社会主义这时候可以登台了。人们从济贫院里跑出来，剥夺剥夺者集团。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就都不需要了。

据罗日柯夫说，表明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成熟的第二个经济方面的信号，是国内合作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可能性。甚至法国阿耳比地方的合作玻璃工厂的水平，还没有超过其他任何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当合作社站在工业发展的前列，成为领导企业的时候才有可能实行。

这个论据从头至尾是因果倒置的。合作社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领先的，这倒不是因为经济发展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而是因为经济发展已向前走得太远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会为合作化创造基础，但是是为哪种合作化创造基础呢？是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合作化创造基础，——每一家工厂都呈现出这种资本主义合作化的图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合作化也越来越重要了。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究竟能以什么方式把合作社推到“工业中的前列地位”呢？罗日柯夫同志希望合作社能够挤掉辛迪加和托拉斯，并且取代它们在工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他这种希望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显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时合作社将只

需自动没收一切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只需相应地把工作日减少到足以为全体公民提供工作的程度，并且规定各部门的生产数量协调一致，以避免危机。这样就可以得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这又一次明显地表明，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都完全没有必要。

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心理方面的条件：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到足以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达到精神上统一的程度。”在这一点上，精神上统一的意义显然必须认为是自觉的社会主义团结，也就是说罗日柯夫同志认为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组织在社会民主党之内，是社会主义的心理方面的先决条件。因此罗日柯夫显然假定：资本主义把小生产者投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把大部分无产者投入劳动后备军的队伍，就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在精神上的统一和启发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人民群众创造可能性。

罗日柯夫的假定不可能在残暴的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也和合作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竞争领域占统治地位一样。但是如果这个假定能够实现的话，那么自觉地在精神上统一起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当然会毫无困难地粉碎少数几个资本巨头，并且在没有任何革命和专政的情况下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这里我们又会碰到下面的问题。罗日柯夫是以马克思为师的。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的马克思，认为1848年的革命是表明社会主义迫近的前奏。当然现在，过了六十年，人们无需多少洞察力就可以明白马克思是错了，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依然存在。但是马克思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的呢？当时大规模企业并没有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生产者合作社也没有站在大企业的前列，绝大多数人民也还没有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难道这些他都没有看到吗？如果我们现在看出还没有这些东西，那么马克思又怎么看不出：在1848年这类东西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呢？显然，1848年的

马克思如果同当代许多不会错的马克思主义机械人相比，可以说是一个幻想的青年！……

因此我们明白，虽然罗日柯夫同志决不属于批评马克思的那伙人，但是他却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由于罗日柯夫一贯表达了我们党内两个派别中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所共有的观点，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他错误的原则上的、方法论上的基础。

附带说一下，罗日柯夫关于合作社的命运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我们还从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既相信生产的集中和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这种简直无法抗拒的过程，同时又相信生产者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前会起领导的作用。在实际经济发展中使这两个先决条件统一起来要比在人们头脑中统一它们更困难得多；虽然甚至在人们头脑中统一它们在我们看来也永远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还要讨论形成更典型的成见的另外两个“先决条件”。

毫无疑问，生产集中、技术发展和群众觉悟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但是这些条件的发展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它们不仅相互促进，而且也相互妨碍和限制。其中任何一个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过程，都需要另一个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过程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任何一种过程的充分发展同其他过程的充分发展都是不调和的。

技术发展的理想的极限无疑是只使用自动化机器，这种机器从大自然取得原料，然后把制成的消费品放在人的脚旁。如果资本主义的存在不受到阶级关系和从阶级关系所产生的革命斗争的限制，我们就有理由可以假定：接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只使用自动化机器这一理想的技术水平，会从而自动地取消资本主义。

从竞争规律引起的生产集中，有使全体人民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单就这个趋势而论，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假定：如果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不被革命所打断，资本主义会把它的工作进行到底。但是到了阶级力量对比达到某种程度，革命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把大多数人变成幽禁在监狱里的后备军之前就是如此。

其次，由于日常斗争的经验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自觉努力，觉悟无疑会不断提高，单就这一过程而论，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过程的发展可一直进行到大多数人民都参加了工会和政治组织、由于团结的感情和目标一致而联合起来为止。如果这个过程真能在数量上继续增长而在质量方面没有改变，那么社会主义可以通过二十一世纪或二十二世纪的一致自觉的公民法案而和平地实现。

但是全部问题在于：在历史上先于社会主义的这些过程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并且在达到某一阶段的时候（受到许多情况的支配，但是这已远远超过这些过程的数学限制），会经历质的变化，并在彼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造成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我们从最后一个过程，即觉悟的提高开始。如所周知，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学院里，在那里可以把无产阶级人为地抑制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而是发生在不断有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可以改造这种阶级斗争，使它具有更深刻、更具原则的性质，并引起统治阶级相应的反动。早在大企业开始支配一切经济部门之前，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愈来愈尖锐的阶级斗争就会达到它必然的结局。

此外，政治觉悟的提高又取决于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必须增加到足以克服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抵抗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绝大多数”人民必须先变成无产阶级，而“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也必须先变成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下面这一点当然也很明白：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革命大军必须比资本家的反革命大军更强大；而人民中的中间、可疑或冷淡的阶层所处的情况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能够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而不是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不用说，无产阶级的政策必须有意识地考虑到这方面。

这一切又必须先有工业对农业的领导，城市对农村的支配地位。

\* \* \*

现在我们将尽力按一般性渐减规则和复杂性渐增规则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1.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平均分配的问题，同时也是有计划生产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即大规模的合作生产，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大企业能比小企业生产出更多产品的阶段才可能实行。大企业愈胜过小企业，也就是技术愈发达，生产社会主义化在经济方面的优越性也就愈明显，因而在以计划生产为基础的平均分配的情况下，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也必然愈高。

社会主义的这个首要的客观先决条件已经早已存在了。自从社会分工引起工场手工业中分工的时候起就存在了；到了工场手工业被采用机器的工厂所代替的时候，这个条件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大企业已愈来愈显示出优越性，这一点也意味着如果对大企业实行社会主义化，那就可以使社会愈来愈富足。很明显，如果把所有手工业作坊变为全体手工业工人的共有制，那并不会使手工业工人略为富足些，而当工场手工业转变为各业工人的共有制，或者工厂转到厂里的雇佣工人手中（或者不如说把大工厂的生产资料转给全体人民），那么无疑会使人民的物质水平有所提高；大规模生产所达到的阶段愈高，物质水平也提得愈高。

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常常引用英国下议院议员贝勒斯的建议，贝勒斯早在1696年，也就是在巴贝夫密谋<sup>35</sup>之前一个世纪，就曾经向议会提出一个建立独立供应自身一切需要的合作社的计划。根据这个英国人计算，这种生产者合作社将由二百到三百人组成。在这里我们不能试验他的论断，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重要的只是，即使是一百人、二百人、三百人或五百人组成的集体经济，早在十七世纪末叶就已显示出生产的优越性了。

在十九世纪初，傅立叶设想了他的生产消费者协作社“法朗吉”<sup>36</sup>，每一个协作社有两千人到三千人。傅立叶的计算决不能说是很精确的，但无论如何，当时工场手工业发展情况已向他指出了一个比上述例子更大得多的经济集体化单位。但是很明白，无论是约翰·贝勒斯的合作社或者是傅立叶的“法朗吉”，在性质上都同无政府主义者所梦想的自由经济公社十分接近，自由经济公社的乌托邦性质不在于它的“无法实现”或“违反自然”的特点（美洲的共产公社证明它们是可能的），而在于它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一百年到二百年。

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生产，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现在能够大规模利用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唯一合作体就是国家。此外，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社会主义生产在个别国家闭关自守的范围内是容纳不下的。

一位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阿特兰蒂库斯，在上一世纪末曾经计算过象德国这样一个单位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阿特兰蒂库斯并不以好发奇想闻名。他的想法一般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常规的范围。他的论据是以现代权威的农学家和工程师的著作作为根据的。这一点不仅不能削弱他的论据，而且正是他的论据的有力的方面，因为这使得他不致于过分乐观。无论如何，阿特兰蒂库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适当地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在运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技术能力的条件下，工人们收入可以增加一倍或两倍，而工作日可以缩短一半。

当然我们不应该认为阿特兰蒂库斯第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方面，大企业的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为经济危机所证明的实行计划生产的必要性，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比阿特兰蒂库斯为社会主义所算的账更具有说服力。阿特兰蒂库斯的功绩只是在于，他以近似的数字表明了这种优越性。

从以上所说的，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人的技术力量的进一步增长将会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愈来愈明显，那么足以实行某种规模的集体生产的技术先决条件已经存在了一二百年，而在目前，实行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世界规模内都具有技术上的利益。

但是，单是社会主义的技术上的优越性还不足以使社会主义得以实现。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不是以社会主义形式而是以资本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贝勒斯的计划和傅立叶的计划都没有能实现。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还不存在准备并能够实现它们的社会力量。

2. 我们讨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技术上的先决条件，现在再来谈社会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这不是一般的而是更复杂的条件。如果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阶级对抗的社会，而是能自觉地选择其经济制度的统一协作社，那么阿特兰蒂库斯的计算无疑已很足以证明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阿特兰蒂库斯这个很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劳动的。

在目前条件下，这样一种观点只能适用于个人或股份公司之类的私人经济范围内。我们总可以这样假定：任何经济改革计划，如采用新机器、新原料、新的劳工管理方式、新的报酬制度，只要这

个计划证明能提供商业上的利益，总是能被厂主接受的。但是这里我们所谈的是社会经济，那就很不够了。在社会中对立的利益彼此冲突着。对一个集团有利的事往往对另一个集团不利。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不仅同另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对立，并且也违背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的阶级中有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其客观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且强大得足以克服敌对的利益和抵制，以便实现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功绩之一，在于它从理论上发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并且表明这个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救；无产阶级的整个地位驱使它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学说最后将必然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因此不难了解，当阿特兰蒂库斯相信下述情况时，他离开马克思主义后退了多远：一旦证明“生产资料转到国家手中，不仅全体人民的福利可以得到保证，并且工作日也可以缩短，那么有关资本集中和社会中间阶层消失的理论是否会得到证实，便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

根据阿特兰蒂库斯的意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旦得到证明：“就无需把希望寄托在对经济发展的迷信上了，为了从私有生产向国家或‘社会’生产过渡，我们应该作广泛的调查并开始(1)作全面而彻底的准备。”<sup>①</sup>

阿特兰蒂库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对立的策略并建议立即“开始”准备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时候，他忘记了社会民主党

---

① 阿特兰蒂库斯《未来的国家》1906年圣彼得堡事业书籍出版社版第22-23页。

——托洛茨基注



人仍然缺乏为作这种准备而需要的权力，而威廉二世、毕洛夫和德国国会的大多数议员虽然大权在握，却丝毫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意愿。阿特兰蒂库斯的社会主义计划对于霍亨索伦王朝并不比傅立叶的计划对于复辟的波旁王朝更具说服力，虽然傅立叶的政治乌托邦主义是基于经济创造方面的热情幻想，而阿特兰蒂库斯的同样乌托邦主义的政见则是基于有说服力的、庸人的清醒计算。

社会分化必须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得到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呢？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必须达到怎样的比重呢？它是否必须达到全人口的一半、三分之二还是十分之九呢？

企图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确定一个数字上的限度是完全无望的事。首先，按这个公式，我们必须确定哪些人该归入“无产阶级”。是不是应该把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的广大阶层包括进去？是不是也该把城市无产阶级的后备群众（他们一方面搀和在乞丐和小偷的寄生无产阶级中，一方面作为小商贩充斥街头，对整个经济制度来说是起着寄生者的作用）包括进去？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无产阶级的意义完全决定于它在大规模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在为政治统治地位而斗争的时候所依靠的是它自己的经济力量。它在能够取得政权之前，必先把国家的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手里；这也就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但是无产阶级尽管有种种合作的幻想，在实际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一直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它所以具有社会力量，是由于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才能运转起来。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阶级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它同其他工具一起构成一架完整的机器。但是无产阶级是这架机器中唯一非自动的部分，不论资产阶级尽了怎样的努力也不能把无产阶级变成自动的部分。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能够按自己的意志通过局部罢工或总罢工部分地或完全地

停止社会经济的正常活动。

从这里可以明白，无产阶级(假定其数目不变)的重要性是随着它使之运行的生产力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工厂的无产者在社会上的地位比一个手工业工人更为重要，城市的无产者比农村的无产者更重要。换句话说，随着大规模生产支配小生产、工业支配农业和城市支配农村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是愈来愈重要了。

英国或德国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同现在俄国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相同，如果我们以这一时期为例，那就可以看到，它的无产阶级不但没有起到俄国工人阶级在今天起到的作用，而且按照它的客观地位也不可能起到今天俄国无产阶级起到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城市的作用。当德国的城市人口同俄国今天的情况一样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时候，自然不能想象那时的德国城市能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到俄国城市在今天起到的作用。大工业和商业机构集中在城市，以及城市和各省由铁路系统联接起来，这些情况使城市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城市居民所占的比重；城市重要性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城市人口的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超过了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在 1848 年，意大利的手工业工人(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还有独立的工匠)的数目达到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也就是差不多同俄国手工业工人和无产阶级在今天所占的比例相同。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比现代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所起的作用要小得不知多少。

从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出，企图事先确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时刻究竟应在全部人口中占有多大的比例是徒劳无益的。相反，我们要提出一些粗略的数字来说明目前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

级的相对数字。

1895年德国各行业的人口是二千零五十万人（不包括军队、国家官吏和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在这个数目中，有一千二百五十万无产阶级（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中的雇佣工人和家庭仆役）；工农业工人的数目是一千零七十五万。至于其余的八百万人，许多人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例如家庭工业中的工人、家庭中的劳动者等等）。单是农业中雇佣工人的数目就有五百七十五万。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我们再说一遍，这些都是1895年的数字。从那时以来的十一年中，无疑已有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朝着一个方向：同农业人口相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增加了（1882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与全国人口相比，无产阶级的比例增加了，与农业无产阶级相比，工业无产阶级的比例增加了，最后，与1895年相比，每一工业无产者的生产资本也增加了。但是，即使是1895年的数字也已表明，德国无产阶级老早已经成为国家的主要生产力。

比利时有七百万人口，是一个纯工业化的国家。在每一百个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当中，有四十一人是在纯粹的工业中工作，只有二十一人受雇于农业。在三百多万自立的人口当中，大约有一百八十万，也就是百分之六十左右是无产阶级。如果我们在急剧分化的无产阶级中再加上与它相近的社会成分，如只是形式上独立而实际上受资本家奴役的所谓“独立”生产者、低级官员、士兵等等，那么这个数字就更具有说服力。

但是，在经济工业化和人民无产阶级化方面占第一位的无疑是英国。在1901年，英国农业、林业和渔业中所雇用的人数是二百三十万，而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雇用的人数是一千二百五十万。

因此，我们看到，在主要的欧洲国家中，城市人口在数量上超过了农村人口。但是城市人口的优势不仅在它所构成的生产力方

面，而且在它的质量方面都大得多。城市把农村中最刚强、最能干和最有知识的分子吸引了来。要从统计上证明这一点很困难，虽然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为此提供了间接证明。而年龄构成本身也具有独立意义。例如，1895年德国有八百万人受雇于农业，有八百万人受雇于工业。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按年龄分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中从十四岁到四十岁的最有工作能力的人比工业中少一百万人。这一点表明，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这一切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发展（工业的增长，大企业的增长，城市的增长，整个无产阶级的增长，尤其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增长），不仅已经为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并且为夺取这个政权准备好了战场。

3. 现在我们来谈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先决条件和主观先决条件互相交叉的场所。一个阶级会自觉地根据一定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来提出既定的目标——夺取政权；它需要团结自己的力量，衡量敌人的实力并估计形势。

但是，即使在这第三个方面，无产阶级也不是绝对自由的。除了主观的因素，如阶级觉悟、准备程度、主动精神（这些因素也有它们发展的逻辑）以外，无产阶级在执行其政策时会碰到许多客观因素，如统治阶级的政策、现有的国家机关（军队、阶级学校、国教教会）、国际关系等等。

我们首先来谈主观条件：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观点来说，技术水平已经使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优越性，这一点当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技术基础上发展的

社会分化已经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由于其人数和经济作用而成为主要阶级，并且在客观上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点也是不够的。还需要这个阶级认识到它的客观利益，需要它认清除了社会主义一途外别无出路；需要它团结成为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公开斗争中夺取政权的大军。

在目前否认无产阶级有这样准备的必要是荒谬的。只有旧式的布朗基主义者<sup>20</sup>，才会指望依靠脱离群众的叛乱组织的主动精神获得拯救；或者只有和他们正相反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指望目的谁也说不上来的群众自发大暴动。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夺取政权是革命阶级的自觉行动。

但是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名声很坏、把一切都弄颠倒的思想家）所说的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进行的准备是指精神上的改革。无产阶级以及整个“人类”，都必须先抛弃旧的自私性，让利他主义的动机成为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东西等等。由于目前我们距离这种情况还很远，由于“人性”的改变非常缓慢，因此社会主义的到来还要推迟几个世纪。这种观点看起来是很现实和渐进的，等等。但是这实际上只是肤浅的道德说教而已。

有人设想，在社会主义到来以前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心理，换句话说，群众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可能形成一种社会主义心理。在这里，不应当把自觉地趋向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心理混淆起来。后者要求首先摒弃经济生活中的自私动机；而趋向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所产生的。不论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和没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心理之间具有多少共同之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反对剥削的联合斗争，在工人的心中引起了许多光辉的理想主义幼芽、同志式的团结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同时，个人的生存斗争，永远敞开的贫困的深渊，工人队伍本身的分化，来自下面

的无知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蚀活动，却不容许这些光辉的幼芽充分发展。

但是主要问题在于：尽管一般工人还有小市民的自私残余，尽管他们在“人的”价值上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一般代表，他们都从生活经验中确信，他们最起码的愿望和本性的要求，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才能得到满足。

理想主义者完全象基督教徒描绘第一个基督教团体的成员一样，来描绘配得上享受社会主义的遥远的后代。

不论第一批基督教新教徒的心理如何（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知道有侵吞公共财产的事例），但无论如何，到了基督教更流行的时候，基督教不仅没有能使一切人的灵魂获得新生，而且连它自身也堕落了，变成贪图财物和官僚主义的了，它从兄弟相传的惯例变成了教皇政治，从流浪行乞变成了修道院制度，总之，基督教不仅没有能征服它所流行的环境的社会条件，它自己反而被这些条件所征服了。这并不是由于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缺乏才能或贪得无厌，而是由于人的心理是从属于社会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无情规律。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表明了他们自身的这种从属性质。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旧社会的范围内创造新的人性，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只不过是道学家的乌托邦的新的翻版……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心理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活条件来作为社会主义心理的先决条件。

## 八 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为

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先决条件。但是，在这方面，关于俄国，我们能够怎样说呢？我们能不能希望，政权转归俄国无产阶级，会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改造的开端呢？

一年前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受到了我们党的两个派别的机关报的严厉批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说了下面一些话：

“马克思说，巴黎工人没有向公社要求奇迹，现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用几道法令来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那就荒谬绝伦了。经济制度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尽一切力量运用国家政权，来促使经济朝集体主义方向发展，并缩短它的道路。

无产阶级将从包括在所谓最低纲领中的那些改革开始，并由于其地位的缘故将不得不直接从这些改革向集体主义的措施过渡。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累进所得税将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虽然这里的重心也不在于颁布‘法令’，而在于组织执行这些措施的实际行动。但是主要的困难（即向集体主义过渡！）在于国家在厂主为对付所颁布的法令而关闭的工厂中靠国家资金来组织生产。

颁布取消继承权的法律并付诸实施也将是比较容易的事。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形式的遗产也不会使无产阶级为难，或者成为它的经济负担。但是作为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继承者，工人国家必须承担由社会组织经济的任务。

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上说，没收（无论有偿或无偿）也是这样。有偿的没收有其政治上的好处，但在财政上有困难，无偿的没收则在财政上有利而在政治上有困难。但是比这些更困难的将是经营组织工作。

我们重述一遍：无产阶级的政府并不是能够创造奇迹的政府。

生产社会化要从困难最小的部门开始。在最初时期，社会化的生产将是通过商品流通规律同私营企业联系的沙漠中的绿洲。社会化经济占领的领域愈广，它的优越性就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会愈感到稳固，无产阶级进一步的经济措施也就愈大胆。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并且一定会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依靠国际的技术，正如实行其革命政策时一样，它不仅依靠本国阶级关系的经验，而且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sup>①</sup>

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同它在经济上受奴役的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论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政治旗帜下取得政权，它都必须走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如果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内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能够（即使是希望）把自己的使命限制在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创造共和民主的条件这一点上，那是最大的乌托邦。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即使是暂时的，也要把资本（它是经常需要国家政权支持的）的抵抗削减到最低限度，并且要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提供广阔的场所。工人们不能不要求革命政权支持罢工者，而依靠无产阶级的政府也不能拒绝给予这种支持。但是这一点意味着劳动后备军不再起作用，意味着工人们不仅在政治方面占统治地位，并且在经济方面也占统治地位，并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虚有其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后果，早在政治制度民主化完成以前就会很快地显露出来。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最低”和“最高”纲领间的界限便立即不存在了。

---

<sup>①</sup> 见本书第113—114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的制度一开始便必须处理与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攸关的土地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正和解决其他一切问题时一样，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作为出发点，就是说，要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占领尽可能大的领域。在土地问题上的这种政策的形式和速度，应当决定于无产阶级所能拥有的物质资源以及不要把可能的盟友推到反革命队伍中去的必要性。

土地问题，亦即农业的命运及其社会关系的问题，当然并不仅仅是土地问题，亦即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使并不预先决定农业发展，至少会预先决定无产阶级的农业政策；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就土地问题所作的事，必然同它对农业发展的方向 and 要求的总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因此，土地问题占着首要地位。

有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社会革命党人给了这种办法一种决非无可非议的名声），是实行全部土地社会化；社会化如果去掉它欧洲的特征，意味着的无非是“平均使用土地”或平分土地。因此要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必须首先没收一切土地，不仅是一般私有土地、农民的私有土地，而且还要没收村社的土地。如果注意到这种没收必须是新政权首先实行的步骤之一，而商品资本主义关系仍然完全占统治地位，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没收的第一批“受害者”将会是农民（或者不如说农民会感到自己是第一批受害者）。如果注意到农民几十年来一直偿付赎金使份地成为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如果注意到有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已经取得了大片土地（无疑是通过相当大的牺牲，这种牺牲目前生存的一代仍然承受着）作为私有财产，那么就很容易想象把村社的和小块私有土地归国家所有，会激起多么巨大的抗拒！新政权如果这样做，那么在开始时就会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对。

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要把村社的和小块的私有土地转为国家所

有呢？是为了用某种办法，使土地供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现在的无地农民和雇农实行“平均”的经营。因此，新政权没收小块私有土地和村社的土地在经济上并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因为在重新分配以后，国有或公有的土地都要作为私有财产来耕种。这样做，新政权会在政治上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这会立即使农民群众反对作为革命政策的领导人的城市无产阶级。

此外，要实行平均分配土地还必须先以法律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取消雇佣劳动能够而且必须是经济改革的结果，而不能事先由法律来加以禁止。禁止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雇用工人是不够的，必须首先使无地雇农可以生活，并且从社会经济观点来说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根据平均使用土地的纲领，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将意味着一方面国家要迫使这种无地雇农定居在小块土地上，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供应他们必要的牲畜和农具，以从事对社会来说是不合理的生产。

不用说，无产阶级干预农业的组织工作，当然不是从把分散的劳动者捆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开始，而是从由国家或公社经营大片土地开始。

只有等到生产社会化站稳了脚跟，进一步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才能向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方面发展。这样将会使小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成为不可能，但仍为种谷物或半种谷物的农户留有土地，强行没收这些土地无论如何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计划。

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执行平均分配的纲领，这种纲领一方面要求无目的地、纯粹形式地没收小片土地，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大块土地完全分割成小片土地。这种政策从经济观点来说完全是浪费，它只能有一种反动乌托邦的别有用心的动机，而尤其重要的是它会在政治上削弱革命的政党。

但是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政策在遇到国家技术落后的阻碍之前很久，就会碰到政治上的障碍。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另一方面，也毫无疑问，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使我们能够把工人阶级的暂时的统治直接变为社会主义专政。

1904年考茨基在谈论社会发展的展望和估计俄国早日实现革命的可能性的时候写道：“俄国革命不可能立即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一点来说，这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还远没有成熟。”但是俄国革命一定会有力地推动欧洲其余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由于剧烈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德国取得统治地位。考茨基继续说，“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对整个欧洲发生影响，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在西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并使东欧的无产阶级有可能缩短其发展阶段，仿效德国的例子，人为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人为地跳过某些发展阶段，但是社会的某些组成部分可能通过模仿先进国家来加快落后的发展，这样做它们甚至可以站到发展的前列，因为它们没有古老国家拖累自己的传统的累赘……”。考茨基又说，“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我们离开了必然性的范围而进入可能性的范围，因此，完全可能发生其他的情况”<sup>①</sup>。

这些话是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在讨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会首先爆发革命的问题时所写的。

后来俄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巨大的阶级力量，甚至超出了最

---

<sup>①</sup> 考茨基《革命展望》1906年基辅版。——托洛茨基注

乐观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料之外。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由其基本特点决定了。在两三年前可能或者看来可能的事，已经接近于十分可能；一切情况表明，这种十分可能的事就要变成必然的事了。

## 九 欧洲和革命

1905年6月我们曾经写道：

“自1848年以来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不断进行征服的半个世纪，也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和封建阶级反动势力‘有机地’互相勾结的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资产阶级暴露了它夺取统治权的疯狂贪欲，表明它决心为这种统治权进行凶残的战斗。

正如追求永动机的幻想技师碰到层出不穷的障碍，为克服这些障碍而搞了一个又一个机械一样，资产阶级在避免同敌对势力发生‘法律以外’的冲突的同时，一直在改变和重建它的统治机器。但是正如永动机的追求者终于会碰上能量守恒定律这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样，资产阶级最后也会在它的道路上碰上终于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必然要通过冲突才能加以解决的阶级矛盾。

资本主义把它的经济方式和往来方式强加给一切国家，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和经济机体。现代信用以无形的纽带把成千上万个企业拴在一起，使资本具有令人惊异的流动性，从而防止了许多小规模的地方的破产事件，但同时却引起空前规模的经济总危机；与此相似，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活动，它的世界贸易，它的巨大的国债体系，以及把各种反动势力集合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合股公司似的国家政治集团，不仅阻止了一切局部的政治

危机，而且为空前规模的社会危机准备了基础。资产阶级把一切病态发展过程都蒙蔽起来，并回避种种困难，拖延国内和国际政治上各种影响深远的问题的解决，掩饰种种矛盾，因而推迟了最后结局的到来，但也因此为在全世界根除其统治作了准备。资产阶级贪婪地紧紧抓住一切反动力量，而不问其渊源如何。教皇和苏丹并不是它最不重要的朋友。它所以没有和中国皇帝建立‘友谊’联系，其唯一原因是因为中国皇帝没有任何力量。对资产阶级说来，掠夺中国的领土，比用自己的钱支持它使之充当世界宪兵更为有利。由此可见，世界资产阶级已经深深地依赖资产阶级时期以前的反动堡垒的稳定，来维持它国家制度的稳定。

这一点从一开始就使当前事态的发展立即具有国际性，并且打开了最广阔的远景：俄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政治解放事业，将会把这个领导阶级的地位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使它掌握巨大的力量和资源，使它成为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的首倡者，历史已经为资本主义的消灭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sup>①</sup>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暂时取得政权后，不主动把革命推进到欧洲土地上去的话，那么它在欧洲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逼迫下也不得不这样做。

当然现在要就采用什么方法把革命推向衰老的资本主义欧洲作出决定，那是徒劳无益的事。将来采用的方法可能完全出人意外。现在我们以作为革命的东方和革命的西方之间的连接环节的波兰为例来加以说明，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而不是作为预言。

俄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波兰革命必然胜利。革命政权在俄属波兰的十个省份的存在，必然导致加里西亚和波兹南的起义，这是

---

<sup>①</sup> 见我为斐·拉萨尔的《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所写的序，铁锤出版社版。——托洛茨基注

不难想象的。霍亨索伦政府和哈布斯堡政府面对这一局面将派遣军队到波兰边境，以便随后越过边境，在敌人的中心（华沙）粉碎敌人。十分明显，俄国革命不能把它的西方前卫阵地置于普奥军队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威廉二世政府和弗兰茨·约瑟夫政府的战争就会成为俄国革命政府的自卫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和德国无产阶级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很明显，它们看到本国军队进行反革命进军的时候，它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德国对革命的俄国的战争，必然导致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愿意请那些认为这个断言过于武断的人，不妨考虑一下是否还有任何其他历史事件更有可能推动德国工人和德国反动派作一次公开的实力较量。

当我国十月内阁突然宣布在波兰实行戒严的时候，到处流行着一个似乎颇有根据的谣言，说这个行动是按照柏林的直接训令而采取的。在杜马解散的前夕，俄国政府各报发表了关于柏林政府和维也纳政府为武装干涉俄国内政以镇压暴动而举行会谈的消息，并说这是对俄国的威胁。内阁所作的任何否认，都不能消除这一消息所引起的震惊。很清楚，这三个邻国的宫廷里正在筹划一次血腥的反革命报复行动。实际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当革命的火焰蔓延及这些半封建君主国领域的边界时，它们能袖手旁观吗？

俄国革命虽然距离胜利还很远，但是它已通过波兰对加里西亚产生了影响。达申斯基在今年5月波兰社会民主党利沃夫代表大会上喊道：“在一年前谁能预见到目前在加里西亚发生的事情呢？这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它震动了整个奥地利。兹巴拉日选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地方议会副议长。农民出版了一份名叫《红旗》的农民社会革命报纸，三万农民举行了群众集会，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的游行队伍在一直非常平静、死气沉沉的加里

西亚各村落到处游行示威……当土地国有化的口号从俄国传到这些穷困不堪的农民耳中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两年多以前，考茨基在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柳斯尼亚争论的时候指出：现在决不能再把俄国当作是波兰脚上的镣铐，而把波兰看作革命的欧洲楔入野蛮的莫斯科草原的一个东方支队。用考茨基的话来说，一旦俄国革命得到发展并取得胜利，“波兰问题将再度尖锐化，但不会象柳斯尼亚所想象的那样。革命矛头不会针对俄国而会针对奥地利和德国，既然波兰将为革命事业效劳，其任务将不会是保卫革命使其不受俄国的侵犯，而是把革命从俄国进一步推向奥地利和德国”。现在看来，这个预言要比考茨基原来所想的更接近现实得多。

但是革命的波兰决不会是欧洲革命的唯一可能的起点。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几十年来资产阶级一直故意不去解决许多复杂而尖锐的国内和国际政治问题。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虽然已把大批人武装起来，然而它们并没有断然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的决心。一国政府只有在感到根本利益受损害的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或是由于丧失了立脚基础因而绝望地铤而走险的情况下，才会把数十万人投入战争。在现代政治文化、军事科学、普选权和普遍兵役制的情况下，只有深刻的信心和疯狂的激情才能使两个国家发生冲突。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俾斯麦为德国普鲁士化而奋斗，即仍然争取德国的民族统一，这是每一个德国人所认识到的基本要求；而另一方面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鲁莽、无能、遭到人民的鄙视，它准备进行任何冒险，如果有可能再把它的使用寿命延长十二个月的话。在日俄战争中也可看到双方扮演的类似的角色。一方面是日本的天皇政府为日本资本在东亚建立霸权而奋斗，它还没有碰到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反对；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衰老腐败的专制政府拼命争取国外的胜利来挽救国内的

失败。

在一些老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存在这种“民族”的要求，亦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统治的资产阶级将是这种要求的保卫者。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都不能发动民族战争。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或一个邻国的野蛮的国内政策，都不能驱使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去进行一场具有解放意义的、因而是民族性质的战争。另一方面，常常诱使这个或那个政府在世界面前挥刀跃马的资本主义掠夺利益，也完全不能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同情的反应。因此，资产阶级既不能也不愿挑起和发动民族战争。在现代条件下反民族的战争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已从最近两个事件，即南非事件和东亚事件看到。英国帝国主义保守主义的惨重失败，并不是由于英国布尔战争的教训。帝国主义政策的更重要、对资产阶级更有威胁性的后果，是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活动，这种活动一旦开始，就会大踏步向前推进。至于日俄战争给彼得堡政府带来的后果，大家已经十分清楚，这里无需详述。但是，即使没有最近这两次事件的经验，欧洲各国政府自从无产阶级开始站起来的时候起，就愈来愈害怕把战争或革命的选择摆在无产阶级面前。正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起义，资产阶级政党即使在投票赞成拨付巨额军费时，也不得不庄严地宣称赞成和平，梦想国际仲裁法庭，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当然，这种可怜的宣言既不能消除国家之间的对抗，也不能消除武装冲突。

普法战争后欧洲出现的武装的和平，是建立在欧洲的均势上的，保持这一均势的条件不仅有土耳其的不可侵犯，波兰的瓜分和奥地利这个穿民族外衣的丑角的保存，而且还有充当欧洲反动派宪兵的武装到牙齿的俄国专制制度。但是日俄战争给了这个专制制度在其中占首要地位、人为地维持的均势一个严重打击。俄国暂时退出了所谓列强大协奏。均势被打破了。另一方面，日本的



胜利燃起了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在现代政治中起巨大作用的交易所的掠夺本性。欧洲领土上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冲突的危机到处在趋于成熟，虽然到目前为止，由于外交手段的抑制，冲突并没有爆发，但是不能保证最近的将来不爆发。不过欧洲的战争必然意味着欧洲的革命。

在日俄战争期间，法国社会党宣布如果法国政府进行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干预，它就要号召无产阶级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甚至举行起义。1906年3月，当法德因摩洛哥即将发生冲突的时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sup>37</sup>通过决议：一旦发生战争的危机，“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所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规定最有效的行动方针，以防止战争”。当然这只是一项决议。其实际意义需要等待战争来考验。资产阶级有一切理由避免这种考验。然而对资产阶级来说不幸的是，国际关系的逻辑比外交手段的逻辑更为有力。

俄罗斯国家的破产，不论是由于官僚们长期当政的结果，还是由于拒绝为旧政权承担罪过的革命政府的宣告，都会对法国有巨大影响。现在掌握法国政治命运的激进派，在执掌政权时也承担了一切保护的职能，其中包括保护资本利益。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有一切根据认为，由于俄国的破产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在法国将会直接转化为尖锐的政治危机，这个政治危机只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情况下才能结束。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或者通过波兰革命或者由于欧洲战争，或者由于俄国国家的破产），革命将进入旧资本主义的欧洲领域。

但是即使没有象战争或破产这类事件的外界压力，革命也可能由于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而在最近的将来在某一个欧洲国家内发生。这里我们不打算推测欧洲哪个国家会首先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无可怀疑的是，在最近几年所有欧洲国家的阶级矛盾都发展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半专制制度的宪法范围内的巨大发展，必然使无产阶级同封建资产阶级的君主制发生公开的冲突。用总罢工来抵制政变的问题，一年来已经成为德国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在法国，由于政权转移到激进派手中，无产阶级双手彻底被解开了，过去无产阶级在对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进行斗争中很长时间受到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关系的束缚。有过四次革命的不朽传统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同戴上了激进主义假面具的保守资产阶级面对面地站立着。在英国，两个资产阶级政党整整一个世纪来一直有规律地在议会制的秋千上荡来荡去，而无产阶级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一直到最近才走上独立的政治道路。在德国，这个过程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和丰富经济斗争经验的英国工人阶级，可能经过几次跃进就能赶上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大军。

俄国革命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次革命除摧毁彼得堡的专制制度这个欧洲的主要反动势力外，还在欧洲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情绪方面创造了革命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惯性。在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中，首先是在其中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中，随着广大群众日益接受社会主义并变得愈来愈有组织和有纪律，保守主义也愈来愈发展了。结果是，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公开冲突的直接障碍。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宣传家的保守主义，可能在某个时刻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表明，它会打破党的常规和保守主义，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公开实力较量的问题提到日

程上来。奥地利、萨克森和普鲁士所进行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俄国十月罢工的直接影响下已经尖锐起来。东方的革命将把革命观念传播给西方的无产阶级，并引起一种以“俄语”向敌人发言的愿望。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只是由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暂时形势而执掌了政权，它将会遭到世界反动势力有组织的反对，受到世界无产阶级极愿给予的有组织的支持。俄国工人阶级如果孤立无援的话，那么它必然会在农民背弃它的时候被反革命势力所击溃。因此它除了把它的政治统治的命运也就是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同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外，别无他途。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暂时形势所给予它的巨大的政权力量，将会大大促进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俄国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掌握在手中，前有欧洲的反动派，后有国内的反革命的情况下，将向全世界的同志发出那个在这次作为最后一次进攻号召的老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写于1906年。译自《我们的革命》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259—286页。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提案

(1907年5月)

## · 编者按语 ·

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一起合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孟什维克都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提案。

托洛茨基在会上装腔作势，标榜自己是“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以“中派”发言人自居，妄图扮演中派领袖的角色，实际上处处站在孟什维克和崩得一边。他鼓吹不同心也能“协力”，认为行动一致的前提不是思想一致，而是“妥协”，以此“造成党的合力”，鼓吹“‘中派’的趋向应成为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财富”。托洛茨基以“统一”和“挽救”党的叫嚷来掩盖他维护孟什维主义的立场。

托洛茨基同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大会讨论诸如对时局的估计、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说什么他不需要“关于我国革命现阶段性质的一般的哲学观点”。列宁在批驳这类论调时说：“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取消理论问题，而是把我们党的全部实践提到从理论上阐

明工人政党的任务的高度。”（《列宁全集》第12卷第427页）

在杜马党团工作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主张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孟什维克则要求肯定党团的活动。托洛茨基为孟什维克帮腔，攻击布尔什维克提出了“难以接受的”决议，公然用分裂，用杜马党团要退出大会相威胁。列宁就此指出：“居然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单是这一点就说明我们党内有某种非党的东西存在。”（《列宁全集》第12卷第437页）

## 讨论大会议程时的发言

（5月2日〔15日〕）

同志们！听了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的发言，我终于明白了，我想你们也都明白了，为什么他是那样地渴望讨论“理论”问题。他受这种神圣的渴望的支配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眼下讨论议程的时候，他就已经按捺不住地在讨论理论方面作了一番回顾，显然是要表明，他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他给我们念了被大家遗忘的《信使报》<sup>38</sup>、《评论》文集<sup>39</sup>等等上面被遗忘的文章里摘下来的大段大段的引文，——这是一个为文字骷髅举行的长长的送葬行列，它要同时展示阿列克辛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博学多才和唐恩同志的充满致命矛盾的著作事业。在我们从实质上来探讨问题之前，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某一天唐恩说“是”，而另一天同一个唐恩说“否”。至于坚持原则的阿列克辛斯基则总是说“否”，甚至在需要讲“是”的时候也是如此。单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当阿列克辛斯基将来讲到“当代革命的性质”或“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时，他在我们面前将会发挥多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和多么渊

博的学识。对于我来说，单是这一个前景就足以投票赞成从议程上取消这类问题了。

我所希望的是代表大会能自始至终开成一个政治性的代表大会，一个革命政党代表们的集会，而不是爱好争论的可疑的或者甚至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俱乐部。我需要的是政治指令，而不是你们关于我国革命现阶段性质的一般的哲学观点。如果我通过诚实的脑力劳动所得出的对革命的整个观点和你们的观点不一样，那么你们可以相信，你们的决议不可能迫使我按照你们的观点来思考。如果你们通过一项明确的政治指令，那么不管我是否同意它，我将本着我作为一个党员所承担的自觉纪律加以贯彻。给我们一个行动的公式吧！这就是我所要求的。而且我想，派你们到这里来的工人们也会这样要求你们的。阿列克辛斯基喊道：但是不事先形成思想的统一，怎么能形成行动的统一呢？这是他的原话。这是非常准确的话，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话把你们的观点引到了荒谬的地步。同志们，思想的统一不是在代表大会上造成的；你们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思想统计罢了：持这种观点的有多少多少代表，持另一种观点的有多少多少代表。仅此而已。至于那种不是形式上的，不是决议上的书面的思想统一，而是归根到底没有它党的存在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实际统一，那么它不是在伦敦这里，在这个教堂里，在对哲学题目匆匆忙忙的辩论中，而是在我们的各种判断和事件的实际进程的经常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你们相信你们对革命的总估计是正确的，那么就请耐心地等待，让事件有可能参加争论，而如果需要的话，就请用你们的理论论战来帮助事件的物质批判，但是不要急于在每一个具体时刻机械地估量党对每一个理论问题的认识状况。同阿列克辛斯基的意见相反，政治行动的统一在形形色色的思想下是可能的。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要知道在相反的情况下政治活动

将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的行动统一的基础是客观关系的统一，首先是阶级斗争的统一。我们的全部智慧在代表大会上应当表现在善于从各种事实的这一客观的统一，通过形形色色的主观观念，走向政治行动的统一。有人反对这一点说：不错，但是你们想使实践脱离理论。对你们来说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你们没有建立必要的理论前提，就去着手解决政治问题。我回答说，很好，我接受异议。但是请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底。请建立前提吧！但要知道这需要方法。你们的方法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内容是什么？让我们就在这里建立“思想的统一”吧！在议论革命性质或阶级任务之前，首先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分析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并作出决议说明有多少多少人对它作如此这般的理解。你们同意吗？其次，你们要求实践不脱离理论。但是要知道正是你们把它们分割开来了，而且是从根本上分割开来了。你们靠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在洁白的那一面是你们的革命和阶级任务的哲学，而在乌黑的那一面你们放上关于杜马鼓动或工会问题。你们害怕不能在政治问题上展开你们的意见分歧。可是我要说，这是对意见分歧的最好的考验。如果你们的意见分歧有某种价值的话，它们在讨论党应当怎样做和做些什么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反映。谁不想讨论“原则”问题，照阿列克辛斯基看来，谁就是有意在实际政策的“小水洼”中搅水。但要知道这些话正是你们的最好的自我谴责。你们说：我们的实践是那么渺小、狭隘和可怜，以致在讨论它的时候我们不能显示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灿烂光辉。你们不是把如何使党的工作提高到应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度的问题作为代表大会的重点，却公然骂我们的全部实践活动，换句话说就是党本身，是小水洼，而自己则走到门面讲究的理论练习的那一面去。你们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呢？你们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免罪符来安慰你们提出抗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良

心。而我对你们说，你们的这个免罪符我看只值六便士，不会再多了。但是我担心你们的派别的良心会更强烈地反抗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良心。你们担心，你们有一些人会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无法用政治问题来向群众解释，为什么你们本身作为不断地折磨党的两个派别而存在着。如果你们不能用政治问题来解释这一点，那么群众就永远也不会了解你们。只要事变对你们的意见分歧还没有感到需要，这些意见分歧就只具有书面上的，充其量也只具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意义。如果你们相信你们的派别的生命力，那就请等待事变吧！但是你们没有耐心。马尔托夫同志出来宣称，他那一派准备接受竞赛。他威胁说要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建立一道筑有可怕的炮楼的马克思主义城墙。瓦连廷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回答他说：“我们不怕分裂！”他以挖掘一条深深的壕沟相威胁。马尔托夫同志！你们将用你们的论战性著作来建立你们的城墙，别的材料你们是没有的。瓦连廷同志，而你们将用你们的决议的纸锹来挖掘你们的壕沟。你们还是不能互相分开。因为分裂需要的东西比堆积如山的论战文件要多。如果你们认为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请你们等待着事变而不是决议来把你们分开吧。请不要赶到事变的进程之前去！难道你们还没有经历过正式分裂的时期？而结果怎么样呢？你们并排地干同样的事，脚踩同一块土地，互相踩对方的脚。你们是怎么收场的呢？被迫统一，起初是在联合的基础上。你们从联合委员会转到统一代表大会。你们从统一代表大会回到修正你们的意见分歧。为了“思想的统一”，你们“不怕”从意见分歧重新转向分裂，——显然，这仅仅是为了以后重新需要联合委员会而已。这就是你们为党安排的理想生活：从“原则的”辩论走向分裂，从分裂通过原则的辩论走向统一代表大会，并通过新的“思想的统一”走向新的分裂。不，同志们，够了！



## 讨论杜马党团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5月8日〔21日〕)

同志们！我应当首先声明，我本来打算对我们杜马党团提出批评，但由于布尔什维克同志刚刚采取的步骤而使我感到为难了。他们提出了一个实质上是对杜马党团投不信任票的决议案。如果这个决议案为代表大会的多数所通过，它就意味着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杜马代表们辞去自己的席位和党失去自己的杜马党团，或者是党团同代表大会的多数决裂并给党带来分裂。很难说布尔什维克决议案的这两种后果中哪一种更可悲一些。如果布尔什维克同志用正面指示的形式向党团提出政治要求，并且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就决议的性质同所有那些认为必须促使党团走上奉行更为坚决和更为独立的政策的道路，但同时认为不容许给党带来分裂的集团进行协商，他们的做法就会具有大得多的政治意义。布尔什维克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提出明知不仅孟什维克，而且连所谓的中派集团也难以接受的决议。

这个步骤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孟什维克大概会提出使代表大会同样不能接受的决议。中派将否决这两个决议，由于没有可能同各派就一项共同的决议达成协议，中派将不得不建议直接转而讨论下一项问题，对此你们大家将势必给以支持。杜马党团将依然得不到指示。你们为自己提出的目标还是达不到。你们的派别的不妥协性，将打击看来作为你们这一派的基础的政治任务。

讲了这段开场白使我感到轻松一些，现在我就来直接谈一谈杜马党团的策略问题。

同志们！在杜马策略之前有一个选举策略，前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后者的直接后果。孟什维克在选举运动时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呢？在有黑帮分子危险的一切场合，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在没有这种危险的地方，也就没有协议，党就完全独立地行动。我应当说，同志们，我不但不赞成这种策略，而且简直不理解它。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宣传团体参加选举，而不希图直接确定人民代表的政治面貌，——那样一来，任何协议，包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协议就都是不适宜的了。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党进行斗争，目的是不仅使思想，而且也使关系直接革命化，这样一来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局限于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有人说，这种协议的目的只可能是孤立反动派，这是一种多么冠冕堂皇的回答！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十月党人<sup>40</sup>，意味着孤立反动派，而把革命民主派置于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的地位，难道这不意味着给同一个反动派以坚决的打击？为什么我们参与政治斗争要受这种人为的局限？为什么我们不走到底，不在使立宪民主党人取得对黑帮分子的优势以后，使劳动派<sup>41</sup>和社会革命党人取得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优势？

你们孟什维克往往反对在政治关系方面加强政治斗争。你们要求把那种客观地存在于我们革命之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合作”，用政治思想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难道在无产阶级和以农民为首的人民群众之间这种“合作”要少吗？或者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抗要比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更厉害？你们无法说明这一点。但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你们承认这些相互关系不仅是容许的，而且也是必需的，那么你们在达成选举协议的实践中就应当考虑到所有这些相互关系。否则你们将陷入致命的矛盾之中。如果你们同自由派达成反对反动派的协议而不同革命的农民达成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协

议，你们就会破坏全部现实的前景，如果你们不是独立地干预政治关系而使之革命化，就只会完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说在选举时实际上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援军的地位。幸而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孟什维克的策略没有被采取。所谓的左派联盟在选举时所起的作用，比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的协议要大得多。使激进民主派摆脱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的过程，是在社会民主党起领导作用的“左派联盟”的旗帜下完成的。这一事实的征兆性的意义，要比它的直接后果大得多。

我们的杜马党团是在选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它把选举运动的错误的前提搬过来作为自己的策略。“必须孤立反动派”，因此必须注意使反对派在投票时尽可能地齐心协力。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外，社会民主党拥有充分的自由来在同等程度上进行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图谋和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要求的斗争。这里的错误同选举时所犯的错误的是一样的。杜马党团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使自己的行动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配合一致，它认识不到有必要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斗争以影响农民代表。但即使在这里，也象在选举时一样，局势的逻辑要比荒谬的前提更加有力。拟议中的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合作让位于同他们的残酷斗争。

策烈铁里同志在作关于杜马党团活动的报告时正是以自己的荒谬的历史哲学前提开始的。他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是一股听候民主派资产阶级调遣的盲目的自发力量，因而革命没有它的份。在1848年，它独立地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并在斗争中倒下了。我们的无产阶级应当开展可能成为这两个时代的策略的合题的活动。完全独立自主，但在同资产阶级社会所有现存阶级合作中的完全独立自主！遗憾的是，合题这一思想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因为它使策略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并且是被作为抽

象的图式来运用的。两个革命时代的策略的合题！但是，也许你们会给我们提供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条件的合题吧？或者你们已经忘记了，在1848年革命以后已经度过了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六十年，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已经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比1848年的德国、奥地利或法国分化得更加厉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我们资产阶级革命的——我准备同你们约定这样称呼它——主要动力。我们依靠阶级斗争。我们的全部活动就是要使这一斗争具有政治的表现形式。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我们革命的这一基本事实中作出一切结论，并为这些结论所产生的全部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就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合作是从属于它们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一事实的。杜马党团不应当把“孤立”反动派的全体反对派行动的统一和一致摆在自己活动的首位，而应当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统一、发展和深入摆在自己活动的首位。

同时，你们孟什维克在你们的政治活动中，确切些说，在你们的政治活动的哲学前提中，——幸而你们不是前后一致的，因为你们干的事情通常要比你们的言论好一些，——你们孟什维克太经常地脱离实际发展的阶级斗争，并企图扮演检查历史的角色。你们预先规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它的合力，并且你们不是力求依然作为这一过程的一种力量，即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是企图监督整个历史发展，企图凭借可能的合力来安排自己的活动。这一策略使你们在选举运动中犯错误，它也正在威胁着你们在杜马中的活动。

检查历史！你们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在一个时期提出了纯粹表面的目标：孤立反动派，而你们却完全脱离了作为历史过程的实际内容的各阶级、集团和政党的复杂斗争，并且你们企图用纯粹人为的界限把自己的政治积极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检查历史!** 你们参加杜马并决定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孤立反动派的同一种思想基础之上。你们担心“孤立”无产阶级,你们争取过全国反对派的行动统一,于是你们相应地安排和布置了你们自己在国家杜马的行动。确切些说,你们想这样做。但是我问问你们:如果这种统一不是虚构,不是你们的想象的产物,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设想那些立宪民主党人会追求反对派的行动统一呢?为什么他们不向你们靠近呢?为什么恰恰是向右派看齐呢?为什么你们要用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无关的考虑,用以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情绪为出发点的考虑来限制你们的活动呢?为什么恰恰是你们承担替一切人和一切事思考和对你们认为是反对党的一切政党进行监督的任务呢?(马尔丁诺夫:“因为我们是先锋队!”)因为你们是先锋队?但是难道先锋队的作用是取决于对后卫队的迁就吗?难道你们对民主派的领导,就在于在每一个特定时刻,把你们自己摆在从属于民主派最落后的代表人物的地位吗?我的关于先锋队的概念和你们的不同,马尔丁诺夫同志。我认为,我们“先锋队”的作用就是要使我们习惯于不怕我们在杜马可能遭到孤立,如果我们以在杜马中的孤立作为我们党团采取坚决行动的代价,那么我们采取这种策略就只会使人民群众摆脱那些拒绝支持我们的政党的领导,而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普列汉诺夫:“在这种情况下这就不是什么孤立了!”)啊,当然,革命的策略是不可能使我们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使我们孤立于“全国反对派”各政党之外。我希望我们不怕这一点。(策烈铁里:“难道我们怕这一点吗?”)幸而,策烈铁里同志,很少这样。不过我已经声明过,我准备对你们在杜马中采取的大多数行动表示赞同。我感到惋惜的只是你们没有把你们打算做的来同你们实际上做过的事对照一下。你们曾经打算在保持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我们全都要求这样!)有时同这一个政党,有时同那一个政党一起投

票。而在实际上你们每天都在为争取对民粹主义民主派施加影响而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你们自己承认这是事实。请你们全面考虑这一事实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策略结论。诚然，你们用暂时的革命低潮来解释你们目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这种暂时的革命低潮把立宪民主党人推向同旧政权进行反革命调情的道路。你们表示，希望新的政治高潮会使立宪民主党人重新返回到他们的反对派的立场，从而改变你们对他们的态度。

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否现在你们就认为必须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民主的、反革命的政策？当然是！你们是否认为，这种揭露会使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所依靠的民主集团的心目中受到损害？你们是否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时刻，这些集团会背弃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在杜马的策略实际上不正是要达到这一点吗？请把你们的意图和你们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吧！

在少数派为选举这次代表大会而提出的正式纲领中说，社会民主党在同等程度上进行着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意图，又反对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反动倾向的斗争。这个总公式规定了党对立宪民主党人和民粹派的态度。但我们在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们依靠民粹派投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你们为影响民粹派而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你们参加全体反对派的会议，以便在民粹派面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用策烈铁里的话来说，你们“规劝”劳动派。你们是否“在同等程度上”“规劝”立宪民主党人呢，策烈铁里同志？不，你们在同他们作斗争。请看看你们的报刊。社论在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小品文在歼灭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诗歌也在写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在工人会议上也是如此。难道你们也这样地同民粹派进行斗争吗？没有的事。（柯斯特罗夫：“这可是很坏！”）不管这是坏是好，但这是事实！你们必须承认它并作出解释。（马尔托夫：“我们在这里正在同民粹派的偏见进

行斗争!”) 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你们在这里的活动没有反映出你们在全国的活动呢? 这是否再一次证明, 你们的政治行动不符合你们的策略意图? 你们尽可以懊悔你们自己没有执行你们的政治纲领的规定, 但你们无法人为地移动政治关系的轴心。局势的逻辑迫使你们——为了这一点应赞扬你们的政治敏感性——放弃你们的检查员的观点并为全国反对派带来分裂, 从而使革命民主派脱离自由资产阶级, 并同民粹派一起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只是希望你们能做到使你们的前提同你们的实践和谐一致。

布尔什维克的竞争性的策略是同孟什维克的这种监督历史的未定形的策略对立的, 而我要说, ——不是从任何“中派政策”的考虑出发, 而是凭良心和真诚的信念, ——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缺点, 经常在于纯粹形式主义的过分严峻态度和“不妥协主义”; 它经常成为孟什维克策略的单纯的对立面, 缺乏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局限于表面上革命的无所作为。这不是政治的革命性, 而是表面的革命性。它利用的是文件而不是事实和关系……这里曾不止一次地提及达尼洛夫同志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喝的那杯茶, 它被看作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我倒从另一方面想起来, 毫不妥协的革命家阿列克辛斯基在选举之后是怎样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代表在一起照相的。不管你们怎么想, 如果说自由派的一杯茶(看来达尼洛夫同志喝这杯茶终生毒害了自己的政治肠胃) 是企图建立一个全国反对派的不坏的象征, 那么没有能够摄取阿列克辛斯基同志革命形象的照相底版, 就是他铁面无情的革命不妥协性的不坏的写照。这两种策略有其接近之处, 并且互相转化。为了说明我的想法, 我要引用一个纯粹表面上的革命性的例子, 从这个例子看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一回都是有过错的: 这就是要求拒绝把预算案移交给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本应从一开始就声明完全不能接受专制政府的预算案,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它把自己对

预算案的原则态度同把预算案移交给委员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错误。我们本身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详详细细地批评预算案，以革命的方式揭露沙皇的经济。拒绝委员会就意味着放弃非常宝贵的宣传鼓动材料。我们的问题的提法实际上引起了什么结果呢？我们——除了我们没有别人——认为把预算案交给委员会是对专制制度的财政投信任票。而当委员会得到了赞同时——这在事先就已经清楚了，——交易所认为这一事实正是信任的表现，因而我们的无期公债涨了。

既然我们在这里已经谈到了预算案，我想再三言两语地谈一谈我们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

我想，预算问题将是最近一个时期政治危机的中心问题。至于我们将投票反对预算案，这一点我就不用了。但是我担心，我们的投票会变成仅仅是一种“无目的的示威”——用司徒卢威先生的巧妙的话来说。事先早就知道预算案会被杜马的多数通过，而又投自己的六、七十张反对票，这就意味着在当前情况下多少无非是一种无目的的示威而已。社会民主党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把自己的作用变成这样。我们应当尽我们一切力量使杜马无法通过预算案。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很清楚：利用杜马讲台和在杜马外进行宣传鼓动的一切手段，在“不给政府一分钱！”的口号下组织广泛的运动。（柯斯特罗夫：“正在这样做！”）我听说了，柯斯特罗夫同志，在高加索正在这样做，那里正在为给杜马的一份有关的声明征集签名。但是需要全党在全国各地围绕这一个问题组织有计划的运动。很难预言我们的直接成绩会有多大。但是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来至少使劳动派同中派的可耻的政策决裂，中派的政策就是把一个又一个阵地交给敌人。

我现在就用一开头所讲的来结束我的发言。

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我们杜马党团的活动进行坚



决的全面的批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我们的党团指出，它的意图往往同它的行动不一致，它的行动通常总要超出它的意图，可是它的意图却常常阻碍它的行动。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党团整个行动的政治价值，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党团诚实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理应得到党的信任。我并不认为你们之中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你们既然拒绝信任党团，那么你们就应当从这种拒绝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要求党团辞去自己的席位。但这就会是分裂，因为有半个党在支持代表们，完全赞同他们的全部政策，而且它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sup>42</sup>上给他们作出了实行这种政策的指示。表示不信任实质上会是不公正的，而就后果来说对党会是致命的。但是你们布尔什维克同志由于提出了你们的决议案而恰恰走上了这条道路。你们在需要极端谨慎地对待的问题上表现了不能容许的派别性。你们提出的决议不是别的，而是对我们杜马代表的活动的谴责。如果说这不是你们的纯粹派别性的狂妄行为，那就是说，你们认为代表大会会利用自己的表决来支持你们的决议。但要知道这正好意味着党团的辞职或分裂，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党的最大的危机。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进行派别报复呢还是促使杜马党团走上奉行更坚决、更革命的政策的道路呢？如果你们为自己提出的是第二个目的，那么你们就应当懂得，党要利用的正是由这些成员组成的、具有这些思想以及个人的传统和联系的这一党团。我们可以通过代表大会的决议责令它执行一定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能象阿列克辛斯基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在党团内部建立“思想的统一”。如果你们用一切办法获得一个有力的多数来支持政治决议案，你们就会显出政治上的成熟，而我个人同你们的接近就会远远超过同孟什维克的接近，但是既然你们承认，党在今后还要利用党团的工作，那么你们就无权要求对党团提出不信任的表决。你们用你们的行为来瓦解代表大会和败坏党。促使你

们提出你们决议案的同样的派别逻辑，现在正促使孟什维克提出同样为多数派所难以接受的示威性的反决议。双方都将使代表大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完全无法提出会得到相当大的和有权威的多数、会为党保存杜马党团并责令党团执行团结这次代表大会多数的政策的决议案。正是在这里要求最有分寸和最高度的党的责任感。你们既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你们甚至没有试图同如此接近你们的波兰代表团达成协议。对你们来说重要的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派别示威，而不是党在国内的行动统一。布尔什维克同志，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珍视你们为之斗争的那些政治任务，那就使你们的派别偏执性服从这些任务，收回你们的决议案，同那些整个来说是接近你们立场的派别和集团达成协议，并提出能团结多数和为党团创造进行系统工作的可能性的决议案。（列宁：“请您提出来吧！”）怎么？您要求我向代表大会提出调和的决议案，而与此同时您却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破坏妥协的可能性。您想要在有三百人的代表大会上为每一个字讨价还价，而不是真诚地尝试在委员会里进行协商。列宁同志，您想要我提出妥协的建议，而我却希望您自己懂得和承认这种决议的必要性，并同我一起提出来。不理解妥协的必要性，妥协本身将成为新的斗争和败坏的根源。只有在各个派别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党的行动统一的约法凌驾于完全合法的派别要求的竞争之上时，妥协才会富有生气和内容！

## 讨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 态度问题时的发言

（5月12日〔25日〕）

同志们！情报局把我作为“特殊派别的代表”，给了我十五分

钟的时间。我应当说一下，我个人并不希图在代表大会上充当特殊派别的代表，这个决定是情报局主动作出的。我可以满意地指出，卢森堡同志代表波兰代表团在这里所发挥的观点同我过去和现在坚持的观点是极其相近的。如果说在我们之间可以找出差异的话，那么与其说是政治倾向上的差异，不如说是个性色彩上的细微差别。我们的思想是沿着同一条唯物主义分析的轨道前进的。

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应当声明，在使党分裂的政治问题上，我决不是象某些同志强加于我的那样，持某种“中派”的特殊观点。据我看来，中派的立场就是要求清楚地认识到妥协的必要性，把它作为必须普遍奉行的策略的前提。但是，如果说我认识到并强调妥协的必要性，这并不等于说，我自己在某一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是用妥协，用求取两种矛盾意见的平均数的办法拼凑成的。我们看到，这种思维方法的典范是这里的崩得<sup>43</sup>代表团的代表阿布拉莫维奇同志，他从这里取一点，从那里取一点。我同这一类“东拼西凑的马克思主义”是永远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我不希图充当特殊派别的代表，简言之，第三派的代表，那么我坚决要求有权对每一个问题拥有自己的一定的观点。行动的统一是以妥协为前提的，它要求造成党的合力，但是我拒绝事先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这种预定的合力的荣幸，我保留全力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权利。

我对思想斗争的意义的理解并不比派别的学理主义者差。后者和我不同，他们全然不了解使党内斗争服从于党的政治行动统一的客观必要性。我们各派在捍卫运动的需要、要求和原则的时候，却无视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阶级斗争的统一。

党的不幸在于要由某一个在这里称之为中派的特殊集团来保卫这一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标志着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中派”

的趋向应成为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财富。否则党将会没有行动能力。这里有人指出——完全正确地指出——“中派束手无策”。但这种束手无策只不过是整个代表大会束手无策的外部表现而已。我不知道有能拯救我们的专门药方。只有普遍提高党的文化,提高党员的成熟性,提高党的领袖的责任感——只有这个复杂的过程才能使党摆脱目前的不正常状态,从而消除中派作为党的统一的体现者的必要性。

现在谈谈实质问题。同志们都知道,我同那种在前一个时期作为我们党的正式哲学的关于我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分歧。

孟什维克同志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观点是异常复杂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他们指责那种关于俄国革命进程的简单化概念。但是,尽管极端不定形(这种不定形是复杂的一种形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定形,——孟什维克的观点正在变成一种甚至连米留可夫先生也能理解的非常简单的图式。

在不久以前问世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后记中,这位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

“至于狭义上的左派集团即社会主义和革命集团,要同他们搞到一起将是比较困难的。但就是在这里,即使没有一定的正面的理由,也还是有一些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接近的很有力的反面理由。他们的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批判和破坏威信;单是为了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存在和活动。我们知道,不仅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而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这是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的变革。世界上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准备去占据该民主派的位置……如果国家把他们如此大量地派到杜马去,那当然不是为了在目前实现社会主义,或者为了亲手实现预备性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样一来,让我们扮演议会社会主义者的角色,比起他们因担任这个角色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来说,对他们要有利得多。”

你们看到，米留可夫立即把我们引到了问题的核心。这段引文包含了孟什维克关于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社会民主派相互关系的观点的全部基本内容。“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而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这是第一。资产阶级变革“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这是第二。社会民主党不能亲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它起的纯粹是反对派的作用：“批判和破坏威信。”这是第三。最后，第四，要使社会主义者有可能继续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和活动”。

如果没有“我们”呢？如果没有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那就只好把它臆造出来。孟什维主义得出的正是这个结论。它用自己的想象来创造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性和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应当为自己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些阶层或阶级？

大资产阶级谈不上是革命的力量，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某些里昂工业家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也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而这次革命是最广义的民族革命。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中等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然而这个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呢？

雅各宾派<sup>4</sup>依靠从手工业行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民主派。小工匠、帮工和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小市民组成了革命的长裤汉<sup>44</sup>大军，即领导政党山岳派<sup>16</sup>的支柱。正是这个经过长期的行会手工业历史学校的密集的城市居民群众，承担了革命变革的全部重担。革命的客观后果是建立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正常”条件。但是历史过程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条件是由平民、街头民主派和长裤汉创造的。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社会清除了旧的垃圾，然后资产阶级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

主派的专政，取得了统治。

我问你们（唉，这可已经不止一次了）：在存在着无产阶级这个反对派的情况下，哪一个社会阶级能够把我们这里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扶植起来，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有可能完成巨大的工作。这是中心问题，我再次向孟什维克们提出这个问题。

不错，我们有大量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少数派同志知道得不比我差，农民不管如何革命，但不能起独立的尤其是政治领导的作用。农民无疑可以是为革命服务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如果认为庄稼汉的政党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变革，能够以自己的主动精神把国家的生产力从古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城市是现代社会的领导者，也只有它才有能力起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作用。而我们的有能力领导全国的城市民主派在什么地方呢？

马尔丁诺夫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着放大镜来寻找它了。他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彼得堡的律师和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他和他的所有志同道合者一样，只是不愿意看到，在俄国革命中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占居了十八世纪末手工业半无产阶级民主派长裤汉所占居的地盘。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不是从手工业中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我们城市的经济史根本不知道行会时期。我们的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逼迫下产生的。它占据的实际上是原始处女地，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的反抗。外国资本通过国债的渠道和私人创业的孔道流入我国。它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支工业无产阶级大军，不让手工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城市中的主要力量是极高的社会类型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一事实必须作为我们全部革命策略结论的基础。

如果少数派同志相信革命能够胜利，或者哪怕仅仅承认有这种胜利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否认，除了无产阶级，我们这里就没有革命政权的历史竞争者了。正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领导了革命的民族一样，无产阶级这个我们唯一的城市革命民主派，必须在农民群众中找到支柱并掌握政权，——一旦革命取得胜利。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还不是社会主义专政。我现在不去谈无产阶级政府以后的前途。

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如同雅各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扫清地盘。我只想肯定一点：如果我们这里的革命运动象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了胜利，那么革命的胜利在我们这里只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或者是革命根本不可能胜利。

我完全有决心坚持这个结论。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社会矛盾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后者，无产阶级本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就必须得出结论：我们的革命是注定根本不能胜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自然结局必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妥协。这是决不能否认其可能性的一种结局。但是很清楚，这是由于革命内部软弱而造成的革命失败道路上的结局。

实际上，孟什维克的整个分析——首先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同农民可能有的关系的评价——必然使他们走上革命的悲观主义道路。

但是他们顽强地要离开这条道路，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加强革命的乐观主义。

他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就是由此而来的。对于他们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

就是革命政权的天然竞争者。

马尔丁诺夫同志从这个观点出发创立了一整套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哲学。要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平静的时期是右倾的，而当革命趋于高涨时则向左转了。因此，他们对革命的未来保有竞争权。

然而我要断定，马尔丁诺夫描绘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是带有偏见的、迎合某种道德的历史。

马尔丁诺夫提醒我们说，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人曾经签名表示同情罢工工人。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但是在这种空洞的同情之下掩盖着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在街头恐怖面前表现出来的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革命运动刚一发展起来，立宪民主党人就被完全清扫出政治舞台了。米留可夫在我已经引证过的那本小册子里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这种被清扫的原因：

“当10月17日以后在俄国第一次出现自由政治集会的时候，其情绪自然是左的……甚至象立宪民主党这样一个在当时刚成立几个月并准备进行议会（着重号是作者加的）斗争的政党，在1905年的最后几个月要发表讲话也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责备党在那时没有通过举行群众大会来抗议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和‘布朗基主义<sup>21</sup>’旧病的那些人，根本不懂得或不记得参加群众大会的民主派大众当时的情绪。”<sup>①</sup>

你们看，米留可夫先生对我真是过誉了，把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引文的有趣之点不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确定一点：在10月和11月间立宪民主党人唯一可以进行的工作，就是同革命的“幻想”即实际上同群众的革命运动进行斗争，如果说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一工作，则只是因为害怕人民

---

<sup>①</sup> 《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1、92页。——托洛茨基注



集会上的民主派大众。而这是在他们党度成立蜜月的时候！而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刻！

马尔丁诺夫同志回忆了立宪民主党人向罢工工人表示的无关痛痒的敬意。但是，作为一个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他忘了提一提立宪民主党人领导的地方自治派十一月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他们参加人民运动的问题吗？没有，它商讨了同维特内阁妥协的问题。当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代表大会立即坚决地右倾了——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只是当米留可夫先生说了谢天谢地，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这番话以后，立宪民主党的地方自治派才重新走上立宪的轨道。你们可以看到，对马尔丁诺夫的总论题要作极大的限制才行。

其次的一个情况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作为。不用说，这是自由派政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但是怎样来解释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兴旺景象呢？

我们对抵制策略的评价可以不同。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毫无疑问的一点应当是，恰恰是这种策略人为地因而也是暂时地把民主派的广大阶层推到了立宪民主党人一边，把许多激进分子推入立宪民主党代表团的怀抱，从而把立宪民主党变成了“全国”反对派的机关；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一特殊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维堡宣言<sup>45</sup>的发表，这也就是那个马尔丁诺夫援引过的宣言。但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就已迫使立宪民主党人采取他们所固有的同“革命幻想”进行斗争的立场了。

立宪民主党的历史编纂学家阿列克塞·斯米尔诺夫先生是这样描绘在立宪民主党人最有影响的城市里的选举运动的：

“在城市选民中没有拥护政府的人……因此会上斗争的中心就转到另一方面——人民自由党和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争论。”<sup>①</sup>

<sup>①</sup> 《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0页。——托洛茨基注

第一届选举中反对派的混乱，在第二届选举中让位于按革命民主主义路线的分化。立宪民主党人动员自己的选民反对民主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口号。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基础变得更狭小和更缺乏民主性了。而这已经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瞬息的情况了。它标志着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真正严重的分裂。米留可夫对第二届选举的这种结果看得非常清楚。这位立宪民主党领袖指出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拥有多数——“也许是因为没有竞争者”，——而在第二届选举中他们丧失了这个多数，然后他说：

“然而现在我们在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我们，他们表示拥护我们的策略，反对革命的策略。”<sup>①</sup>

少数派同志不能不希望这样明确地评价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是否认为，往后事情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立宪民主党人会把民主派重新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并变得革命一些？你们是否认为，情况恰好相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民主派彻底脱离自由派并把后者抛入反动阵营？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策略难道不是正在导致这一点吗？难道你们自己的策略，你们在杜马的言行，你们在报刊和集会上的揭露不正在导致这一点吗？你们相信立宪民主党人还会振作和崛起有什么根据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不，是根据你们的图式！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但除了立宪民主党人以外一无所获。于是你们就靠他们发扬惊人的乐观主义精神，你们替他们乔装打扮，你们想使他们起一种他们不想起、不能起、将来也不会起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提出来的根本问题——我已多次提过了——，我没有

---

<sup>①</sup> 《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 286 页。——托洛茨基注

听到回答。你们缺乏革命的预见。你们的政策缺乏远大的前景。

因此，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可以用代表大会应当永志不忘的随机应变几个字来表示。无产阶级不是为争取影响人民群众而进行不断的斗争，他们不是用把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和领袖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监督自己的策略步骤，——他们实行随机应变的政策。他们在原则上正在失去为了长远的胜利成果而不顾暂时利益的可能性，——他们凭经验掂斤估两，他们施展其随机应变的商业-政治巧计。普列汉诺夫同志问道：“我为什么要对金发女人比对黑发女人更喜欢呢？”那么我得承认，既然说的是金发女人和黑发女人，这无疑属于德国人所说的 Privatsache<sup>①</sup> 的范围，即由个人自由处理的范围。我想，甚至以在原则性问题上铁面无情著称的阿列克辛斯基同志也不会要求代表大会在这一方面确立“思想的统一”，以作为行动统一的前提。

## 关于恢复两个中央的提案

(5月19日〔6月1日〕)

中央委员会只有在得到党代表会议的同意后才能撤换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sup>46</sup>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8—51、257—266、397—404、592页。

---

① 德语：私事。——编者注

## 1905年(摘录)

### ·编者按语·

这本书是《总结与展望》的姊妹篇，有些章节从内容到文字都极其相似。这里只收了1922年为俄文第一版写的序言和《俄国革命的动力》一章。

托洛茨基打着阶级分析的幌子，信口开河，夸大欧洲资本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否定俄国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声称“欧洲资本扼杀了萌芽状态中的俄国手工业，从而也就抽掉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根据这个错误的前提，托洛茨基完全否定在俄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作用，鼓吹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由俄国无产阶级单枪匹马地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西欧革命上。托洛茨基很欣赏老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的说法，“欧洲的任何斗争都不会成功，除非它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斗争”，宣称“只有沿着拉萨尔在1849年提出的那条道路才可能取得胜利”。这充分表明拉萨尔同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

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地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赢得了国内战争和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伟大胜利，并胜利进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托洛茨基却继续坚持他的“不断革命”论。他在1922年初为本书写的序言中宣称，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然会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并大言不惭地说，事隔十二年，他的“估计”“被全部证实了”。

斯大林在揭露托洛茨基这种论调的实质时指出：“‘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9页）

## 第一版序言

1905年事件是1917年革命剧的有力序幕。在反动派取得胜利的多年时间里，1905年在我们的意识中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俄国革命。现在它虽然失去了这种独立性，但一点也没有降低它的历史意义。1905年革命是从日俄战争中直接发展起来的，就象1917年革命是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直接产物一样。因此，无论就起源和发展来说，序幕本身包含了我们现在作为其见证人和参加者的那出历史剧的一切成分。但这些成分是以一种简单的、未展开的形式包含在序幕之中的。1905年在斗争舞台上表演的各部分力量，现在被1917年事件的反光照耀得比以前更为清晰。红十月（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称呼它的）经过十二年发展成了另一个更强大无比的、真正胜利的十月。

在1905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这就是在革命序幕的时

期，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用认识历史过程的科学方法武装起来了。这样便有可能从理论上来搞清楚那些历史的物质过程只给予某些暗示的关系。南俄 1903 年的混乱的七月罢工已经提供了作出下列结论的材料，即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是那种随后转变为武装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总罢工。明显地证实了这一预测的 1 月 9 日事件，要求具体地提出革命政权的问题。从这时起，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尖锐地提出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部阶级动力的问题。正是在 1905 年 1 月 9 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虽然事隔十二年，但这个估计被全部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完成。它必须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如果说工人阶级在 1905 年还无力夺取政权，那么它的壮大和成熟

不是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靠六三政变<sup>47</sup>后在沙皇制度下进行的地下活动。无产阶级凭借其老一辈在1905年获得的经验，在1917年掌握了政权。青年工人应当掌握这些经验，应当知道1905年的历史。

\* \* \*

我决定收入两篇文章作为本书第一部的附录，其中一篇是评论切列万宁一书的，曾于1908年在考茨基的《新时代》杂志<sup>48</sup>上发表过，另一篇是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并同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占优势的观点进行论战的文章，曾在波兰党刊上发表过（好象是在1909年），这个刊物的鼓舞者是罗莎·卢森堡和利奥·约吉希斯。我觉得，这两篇文章不但有助于理解紧接第一次革命后到来的那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思想斗争，而且也会使今天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得到澄清。夺取政权绝不象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1917年10月的即兴之作，而胜利的工人阶级实行工厂国有化，也绝不是不听从孟什维克及时警告的工人政府的“错误”。这些问题十五年来经过讨论，原则上得到了解决。

围绕俄国革命性质问题的斗争，在那个时期就已经超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范围，吸引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切列万宁的书中得到了最认真的，即最平淡、最直率的叙述。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在那时就已抓住了它。按照考茨基的建议，我在《新时代》上发表了对切列万宁一书的评价。考茨基当时完全同意这个评价。他本人象已经去世的梅林一样，是坚持“不断革命”的观点的。考茨基现在倒把自己算作孟什维克。他想把自己的过去贬低到自己现在的水平。但是这种由于理论上的肮脏心思而进行的伪造，却遇到刊印文件的作难。考茨基在其从事科学著作活动的最好时期里所写的东西（如他对波兰社会主义者柳斯尼亚的答复，他关于美国和俄国工人的研究文章，他

对普列汉诺夫征询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意见的答复,等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孟什维克主义的无情批驳和对布尔什维克以后的革命策略在理论上的有力辩护,但是以现在的考茨基为首的一伙蠢人和叛徒却指责布尔什维克是冒险主义、蛊惑煽动和巴枯宁主义<sup>49</sup>。

我把《为政权而斗争》一文收入本书作为第三个附录,这篇文章于1915年发表在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sup>34</sup>上,其目的是要论证这样一种思想,即在第一次革命时显然已经初具轮廓的政治关系,应当在第二次革命中最终形成。

\* \* \*

关于形式民主问题,在这本书中同在它总结的运动中一样,还缺乏必要的明确性。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党即使在十年以后的1917年,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不十分明确。但是这种模糊不清或阐述不完整的情况本身毫无原则意义。我们在1905年就把民主的神秘主义拒之于十万八千里之外;我们所设想的革命进程不是绝对民主准则的实现,而是各阶级为了自己暂时的需要而利用民主口号和设施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在当时直接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我们不是从“民主”选举统计的希望中,而是从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中得出必须夺取政权的结论。彼得堡的工人们早在1905年就已称自己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政府了。这个称呼当时已经广泛通用,并且列入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纲领。同时我们提出了广泛的政治民主的纲领(普选权、共和国、民兵制等等)来同沙皇制度对抗。我们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政治民主是使工人群众开展的一个必要阶段,需要说明的极重要的一点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度过这个阶段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使群众摆脱政治民主的偏见,要比在实际上实现这些政治民主的设施还早些。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国家制度



(1917年3月至10月)，在民主还没有来得及取得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的时候，就已使民主声名扫地了。但就是在这个直接处在无产阶级变革之前的时期，我们虽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在形式上却仍在民主的口号下前进，我们不但不给群众而且也不给自己最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形式民主的齿轮同苏维埃制度的齿轮不相吻合，那会怎么样呢？在写这本书的时代，同更晚得多的克伦斯基执政时代一样，任务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就在于工人阶级要实际掌握政权，——这个过程的形式的、法律的方面退居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而在还面临着以战斗来克服物质障碍的时候，我们干脆就没有花力气去解决形式方面的矛盾。

解散立宪会议就是以革命的粗暴的方式来实现本来可以通过推迟和适当筹备选举就能达到的目的。然而正是这种藐视按法律手续进行斗争的态度，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革命政权的问题，而无产阶级的武力解散立宪会议也同样要求完全重新考虑民主和专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样做，无产阶级国际归根到底只会取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胜利。

\* \* \*

本书的来历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它是1908—1909年于维也纳为德累斯顿出的德文版而写的。德文版的基础是俄文版的《我们的革命》(1907年)的某几章，但已作了很大的改动以适应外国读者。本书大部分是重新写的。现在只好一部分根据保存下来的俄文手稿，一部分通过从德文版翻译来恢复原样。同时我得到了鲁麦尔同志的帮助，他非常仔细地做了这件工作。全文都经过我的审阅。我相信读者将不会遇到那些在我们出版物中司空见惯的错误、错字、曲解和误植。

列·托洛茨基

1922年1月12日于莫斯科

## 俄国革命的动力

我国在欧洲占五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在亚洲占一千七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五千万。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存在着各个时代的人类文化：从北方森林中吃生鱼、向园木祈祷的原始野蛮状态，直到资本主义城市的最新社会关系，那里，社会主义的工人意识到自己是世界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并密切注视巴尔干的事态或德国国会的辩论。我国有建筑在欧洲最落后的农业的基础上的欧洲最集中的工业，有世界上最巨大的国家机器，它利用技术进步的一切成就来阻碍本国历史的进步。在前面几章中，我们想抛开一切细节，对俄国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勾画出一个总的轮廓。这是社会各阶级所由产生并在其上生存和斗争的土壤。在最紧张的斗争时期，革命使我们看清了这些阶级。但是，在政治生活中，直接起作用的是有意识地成立的团体：政党、联盟、军队、官僚集团、报刊和它们上面的部长、领袖、蛊惑家和刽子手。阶级是一下子看不出来的，它们通常处在幕后。但是，这不妨碍政党、它们的领袖、部长及其刽子手仅仅充当阶级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好是坏，对事态的进程和结局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部长仅仅是“客观的国家理性”的短工，这无论如何不是说在他们的颅骨下就不必有脑髓，——这是他们经常忘记的情况。同样，从另一方面说，阶级斗争的逻辑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利用我们的主观逻辑。谁不善于在经济必然性的范围内找到发挥首创精神、毅力、才能和英雄主义的广阔天地，谁就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秘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掌握整个政治过程，这里指的是革命，我们就应当善于在政党和纲领的五光十色的外衣下，在某些人的狡诈

和凶残背后，在另一些人的勇敢和理想主义背后，揭示扎根于生产关系的深处、开花于意识形态上层领域的社会各阶级的真面目。

## 现代城市

资本主义各阶级的性质是同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着的。的确，俄国的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不象其他国家那么一致。除了仅仅在形式上不包括在市内的城郊厂区以外，还有农村中的几十个相当大的工业中心。大体上说，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和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不在城市。然而，资本主义城市仍是新社会的最充分的体现者。

现代城市的俄国，这是近几十年来的产物。在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内，俄国城市人口为三十二万八千，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1812年，城市居民共一百六十万人，仍然只占百分之四点四。在十九世纪中叶，城市共有三百五十万居民，即占百分之七点八。最后，根据1897年的统计，城市人口已经有一千六百三十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自1885年至1897年，城市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八；而农村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七。个别城市增长得更快。莫斯科的人口在最近三十五年内从六十万四千增至一百三十五万九千，也就是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三。敖德萨、罗斯托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巴库等南方城市的增长速度还要高。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城市数量和规模增大的同时，城市的经济作用和内部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彻底变化。

欧洲行会手工业城市为把全部加工工业集中到城内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斗争取得了胜利，而旧的俄国城市则相反，它同亚洲专制国家的城市一样，几乎完全不履行生产职能。这是一些军事行政点、军事要塞和某些情况下的商业中心，它们享受

一切现成的东西。它们的居民是由那些靠官饷维持生活的官吏、商人以及到城里来寻找庇护所的农夫组成的。甚至莫斯科这个旧俄的最大城市，也不过是同沙皇的庄园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村庄。

手工业在城市里占着微不足道的地位，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时的加工工业以手工业的形式分散在农村。四百万手工业者（1897年的统计数字）的前辈履行了欧洲城市手工业的生产职能，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完全没有参与建立手工工场和工厂的过程。当手工工场和工厂出现时，它们使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无产者，并使其余的手工业者直接或间接地受自己支配。

俄国工业没有经过中世纪手工业时期，俄国城市也没有第三等级在行会、公会、公社和市政局中的逐渐发展。欧洲资本在几十年内建立了俄国工业，而俄国工业则建立了基本生产职能由无产阶级来执行的现代城市。

## 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

这样，大资本未经战斗就取得了经济统治。但是，外国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所起的巨大作用对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但是，在欧洲国家掌握着领导权并毫不费力地把沙皇政府变成自己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贵族，不能也不想成为俄国国内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组成部分，因为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都不能象沙皇制度那样保证它有如此高额的利息。但是，不仅外国金融资本，而且外国工业资本一方面开发俄国的自然资源和剥削俄国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在俄国以外，即在法国、英国或比利时的议会中兑现自己的政治实力。

但是，本国资本不能领导全国性的反沙皇的斗争，因为它很快

同人民群众，即同它直接剥削的无产阶级和通过国家掠夺的农民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情形尤其适用于重工业。后者现在到处依赖国家的设施，主要依赖军国主义。固然它对“强硬的民事法制”感兴趣，但它更需要集中的国家政权这个财富的伟大布施者。冶金业企业主在自己的工厂里碰到的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和最积极的部分，这部分人每当沙皇制度削弱时就趁机向资本进攻。

纺织工业比较不依赖国家，除此以外，它同群众购买力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要提高购买力，不进行广泛的土地改革是不可想象的。因此，1905年，纺织业的莫斯科使一个反专制官僚制度的反对派发展起来了，这比冶金业的彼得堡的反对派要激烈得多，甚至有力得多。莫斯科市杜马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好意观望正在高涨的浪潮。但是，当革命在它面前展示出自己的全部社会内容，同时把纺织工人推向冶金工人的道路的时候，它就更坚决并“更有原则地”转向坚强的国家政权方面去了。同反革命地产结合的反革命资本，找到了莫斯科商人、第三届国家杜马多数派首领古契柯夫充当自己的领袖。

## 资产阶级民主派

欧洲资本扼杀了萌芽状态中的俄国手工业，从而也就抽掉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是否可以把现在的彼得堡或莫斯科与1848年的柏林或维也纳，尤其是与还不能设想铁路、电报并带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场看作最大企业的1789年的巴黎相提并论呢？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那种经历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自治和政治斗争的锻炼，然后和年轻的、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壮实的小市民阶层。代替它的是谁呢？“新的中等阶层”，职业知识分子：律师、记者、医生、工程师、教授、教师。在社

会生产中失去独立作用的、人数不多的、经济上不独立的这个阶层，正确地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始终不渝地在寻求可以依靠的壮实的社会阶级。事情妙不可言！这种靠山起先不是在资本家那里，而是在土地占有者那里找到了。

领导头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是1905年由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sup>50</sup>和解放社<sup>51</sup>合并而成的。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的不满捣乱，一方面表现了大农业主对政府的骇人听闻的工业保护关税政策的不满，另一方面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土地占有者所持的反对派立场，因为俄国土地关系中的野蛮状态妨碍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解放社联合了一些由于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以及因此享受温饱生活而妨碍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在地方自治派这个反对派身上总是带有怯懦虚弱的印记，而当至尊的贵胄在1894年把它的政治愿望叫做“无意义的幻想”时，他只是道出了痛苦的真理。另一方面，享有特权并在物质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依赖于国家所庇护的大资本或自由派的注册地产的那些知识分子也无力发展成多少有点威力的政治反对派。

因此，就其起源说来，立宪民主党是地方自治派这个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和各方面都软弱无力的有学位的知识分子的结合。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的浅薄在1905年年底当地主在农民骚动的影响下急剧转向旧政权的时候就已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含着眼泪离开地主的庄园（在这里他们实质上只是个养子），到他历史的故乡，即到城市中去寻找归宿。但是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呢？保守的大资本、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及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

也就是这种对抗在小生产还具有意义的一切部门彻底粉碎了小生产。手工业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的环境中发展的，因而和工厂无产阶级没有多少差别。受大工业和工人运动排挤的俄国手工

业工人是个愚昧的、半饥饿的、凶狠的阶级，它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是黑帮的示威和蹂躏……的打手。

结果，在一片社会主义的诅咒声中诞生的、无可挽回地迟到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悬浮在阶级矛盾的深渊之上，他们身受地主的传统的重压和教授的偏见的束缚，没有主动精神，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对明天毫无信心。

## 无 产 阶 级

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没有身躯的(非常糊涂的)头脑的那些世界历史性的原因，也为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发挥杰出的作用准备了条件。但是，首先，它的数量有多大？

1897年的极不完全的数字为我们提供了下列答案：

### 工 人 数 目

一、采矿工业和加工工业，交通 运输业，建筑业和商业 .....	3 322 000
二、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 .....	2 723 000
三、短工和帮工 .....	1 195 000
四、仆役，看门人，庭院看管人 等等 .....	2 132 000

共 计(男和女) 9 272 000<sup>①</sup>

1897年，无产阶级连同家属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即稍微超过四分之一。在这些群众中，各阶层的政治积极性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而革命的领导作用几乎只属于第一类工人(见上表)。但是，用俄国无产阶级的相对数量的大小来衡量它在革命中的实际的和可能的作用，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是说，没有看到纯

<sup>①</sup> 原文如此，应为 9 372 000。——编者注

数字背后的社会关系。

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由它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国家最强大的生产资料是直接依赖于工人的。三百三十万劳动力（第一类）所生产的不下于每年国民收入的一半！情况表明，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这个唯一能把广阔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整体的铁路，是无产阶级手中无比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阵地。在这里还应该加上邮政和电报事业，它们虽不是那么直接，然而却是非常确实地依赖于无产阶级的。

农民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而无产阶级却大量地被动员到工厂和工厂中心来了。无产阶级构成了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都很重要的每一城市的居民的核心，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所具有的一切优势：生产力和资金的集中，居民中最积极的分子同最巨大的文化财富相结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优势。它的阶级自觉已经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俄国无产阶级从诞生以来，就面对着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和高度集中的资本的力量。行会传统和手工业偏见丝毫不能支配它的意识。它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道路。

因此，手工业，一般小生产的微不足道和俄国大工业的极其发达在政治上使无产阶级民主派排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生产作用外，工人阶级还夺取了它过去的政治作用及其在农民阶层从贵族-国库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时代中领导农民群众的历史抱负。

土地问题是历史使城市各政党经受考验的政治试金石。

## 贵族和地产

立宪民主党关于把大、中地产按“公平的”估价强行割让的纲



领，或更确切些说，立宪民主党过去的这一纲领，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是通过“立法的创造性工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但是，实际上，自由派通过立法的途径来剥夺大地产的尝试只是导致政府去剥夺选举权和实行六三政变（1907年）。立宪民主党人把消灭土地贵族看做纯金融业务，并真心实意地竭力使自己的“公平估价”尽量为地主所接受。但是，贵族却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它立即以自己绝对正确的本能理解到，这里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出售五千万俄亩，那怕是按高价出售，而是要取消它作为统治等级的整个社会作用，因此，它断然拒绝拿自己来拍卖。在第一届杜马期间，萨尔蒂柯夫伯爵对地主高喊道：“愿你们的座右铭和你们的口号是：决不让出我们的一寸土地，我们原野上的一粒沙子，我们草地上的一棵草，我们森林中的一根树枝！”这不是旷野的呼声，不，革命年代正好是俄国贵族等级集中和政治上巩固的时期。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最黑暗的反动时期，贵族是一个等级，虽然是第一等级。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独立的专制制度，一刻也不放松对贵族进行警察监督的箝制，甚至给贵族的等级私利的嘴巴戴上自己监督的嘴套。现在贵族是名副其实的发号施令的等级：它迫使省长随着自己的笛声跳舞，威吓大臣并公开撤换他们，给政府下最后通牒并使之实行。它的口号是：决不让出我们的一寸土地，决不让出我们的一点特权！

在年收入超过一千卢布的六万名地主手中，集中了约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这些土地按市场价格为五百六十亿卢布，每年为土地所有者带来四亿五千万以上的纯收入。贵族得到这笔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

官僚制度同地产是密切联系着的。每年几乎有二亿卢布用作收入在一千卢布以上的三万名官吏的薪金。在这些中上层官吏中，恰好又是贵族占了明显的优势。最后，正是这些贵族独占了地

方自治机关和与此有关的收入。

如果在革命前，在足足半数的地方自治局里担任领导的是在“文明的”地方自治工作的基础上提升上去的“自由派”地主，那么，革命的年代使这方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结果站在前列的是毫不留情的地主反动势力的代表。权力无限的贵族联合会在萌芽时期就把政府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益而使地方自治局“民主化”或减轻农民的等级桎梏的尝试压了下去。

面对这些事实，作为立法协议的基础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毫无希望的空想，如果立宪民主党人自己悄悄地放弃了它，那也毫不奇怪。

社会民主党主要在“公平估价”方面对立宪民主党的纲领进行了批评，这样做是正确的。仅就财政方面来说，赎买凡是每年能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一千卢布以上的一切地产，会在我们九十亿国债上又增加一笔五十至六十亿的可观数目；这就是说，单利息一项每年大体上就要吞噬七亿五千万。但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问题的财政方面，而是政治方面。

所谓的 1861 年解放改革条件所规定的过高的农民土地赎金额实际上是为赎买农奴而给予地主的补偿（数额约为二亿五千万，即占赎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在这种情况下，靠“公平估价”确实消灭了贵族的巨大的历史权利和特权，而贵族也能够适应半解放的改革并顺从这种改革。当时，贵族表现了一种正确的本能，就象现在它坚决拒绝以等级自杀来结束自己一样——即使是按“公平估价”。决不让出我们的一寸土地，决不让出我们的一点特权！在这一旗帜下，贵族最终掌握了被革命所动摇的政府机关，并表明，将以统治阶级在生死关头所能使出的全部凶狠劲头来进行战斗。

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靠同这个等级达成议会协议，而只能靠群众的革命进攻。

## 农民和城市

俄国社会政治野蛮状态的症结在农村，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农村才能推出一个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症结的阶级。分散在欧俄五百万平方俄里的广大土地上（在五十万居民点中）的农民，过去一直没有培养出任何协同进行政治斗争的习惯。在1905—1906年农民骚动时期，造反的农民的任务是，把地主从本村、本乡，最后从本县赶出去。当地的贵族则有现成的集中的国家机构来反对农民的革命。农民只有通过同时举行的和坚决的起义才能战胜它。但根据它生存的各种条件，它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地方性呆小病是农民起义的历史紧箍咒。农民起义要摆脱它，只有不再是纯农民的起义并同新的社会阶级的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才行。

早在十六世纪头二十五年德国农民革命时期，尽管当时德国城市在经济上力量薄弱，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农民就已自然而然地处于城市政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农民就其客观利益来说是社会革命的力量，但政治上是分散的和软弱无力的，它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因此，它因地制宜，或者使城市里的市民反对党占优势，或者使平民革命党占优势。这个能够保证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后的、唯一的力量，虽然依靠当时社会最激进的阶级，依靠现代无产阶级的胚胎，但本身完全缺乏全国性的联系和对革命目标的明确认识。由于国家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和国家割据，这两点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骚动的农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合作的任务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经过三个多世纪，同样的相互关系在1848年革命中重新出现

了。自由资产阶级不仅不想发动农民并把它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对农民运动的发展极为害怕，这正是因为农民运动首先使那些反对自由资产阶级本身的城市平民激进派的地位得以加强和巩固。另一方面，后者仍然没有克服自己社会政治上的不定型状态和分散性，因此，它没有能力推开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农民群众。1848年的革命遭到了失败……

但是，比这再早六十年，在法国，正是靠农民和城市平民，即那个时代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流氓无产者的合作，革命任务才得以胜利实现。这种“合作”采取了国民公会专政的形式，即城市对农村、巴黎对外省和长裤汉<sup>44</sup>对巴黎专政的形式。

在现代俄国的条件下，工业人口对农业入口的社会优势，比起旧的欧洲革命时代来，大得无法比拟，同时，在目前俄国城市中，杂乱的平民的地位已为轮廓清晰的工业无产阶级所代替。但有一点没有改变：在革命时期能够象过去一样依靠农民的只有这样的政党，它率领着城市中最革命的群众，并且不会出于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敬畏而害怕动摇封建所有制。现在只有社会民主党是这样的政党。

## 俄国革命的性质

俄国革命就其直接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力求把资产阶级社会从专制制度和封建所有制的束缚和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因而就其方法而言它是无产阶级的。许多学究都无法领会这种矛盾，他们用数学统计的推算，或用形式主义的历史类比来决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的领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至于实际上在革命高涨的各个时期站在事变前列的无产阶级，这些学究却企图裹在

他们自己的轻率的理论襁褓之中。对他们来说，某一资本主义民族的历史只是在多少有点偏离的情况下重复另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没有看到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过程，这个过程吞没在其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国家，并且在联合当地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一般条件中造成一种社会混合物，其性质不能用死板的历史公式、而只能用唯物主义的 analysis 来决定。

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英国，在几世纪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形式及其代表者——强大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的殖民地，欧洲资本把现成的铁轨、枕木、钉子和瞭望车厢装在准备好的装甲舰上运给那里的殖民当局，然后用步枪和刺刀使土著居民脱离他们的原始状态，把他们驱赶到资本主义文明中去。在英国同现代殖民地之间，在历史发展上没有任何类似之处，虽然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新的俄国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这是因为它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受到了欧洲资本的资本主义洗礼，欧洲资本这时已达到其最集中和抽象化的形式——金融资本。欧洲资本自身过去的历史同俄国过去的历史毫无联系。为了使欧洲资本能在自己的故乡达到现代交易所的高峰，它首先应当跑出手工业城市的狭窄的大街小巷（它曾经学习爬行和行走的地方），它应当在同宗教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发展科学技术，把整个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通过反对封建的和王朝的特权的起义来夺取政权，为自己清扫广阔的舞台，断送它自己所产生的独立小生产，以便后来脱离民族的脐带，离开父辈的遗骸，抛开政治的偏见，摆脱种族的好感，不顾地理的间隔——野心勃勃地在地球上空翱翔，今天用鸦片毒害已被它弄得破了产的中国手工业者，明天用俄国水域上的新装甲舰发财致富，后天攫取非洲南部的金钢钻矿床。

但是，当英国或法国资本这一许多世纪的历史凝结物在顿涅

茨矿区的草原上出现时，它完全不能施展它不断积蓄的社会力量、关系和热情。它不能在新的地区重复它已完成的发展过程，而要从它在故乡所达到的水平上开始。它把机器运过大海和海关，便立即不经任何中间阶段，把无产阶级群众集中在机器周围，它还把凝结在它身上的老一代资产阶级的革命能量倾注到无产阶级身上。

在法国历史上的英雄时期，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尚未暴露出自己地位的矛盾，历史把领导争取事物的新秩序的斗争任务交给它，这个斗争不仅反对法国的陈旧制度，而且也反对全欧洲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各个派别，彻底地认识了自己并成了民族的领袖，它把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给他们口号并授以战斗策略。民主派用政治意识形态把民族联合起来。人民——小市民、农民和工人——选送资产者为自己的议员，公社给他们的委托书是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救世主任务的资产阶级的语言写出来的。在革命时期，虽然暴露了阶级对抗，但是革命斗争的势不可挡的惯性不断地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抛离政治轨道。每个阶层在把自己的能量转移给随后一个阶层之前是不会离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继续以愈来愈尖锐和愈来愈坚决的手段为自己的目标而斗争。当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脱离运动中的民族核心并同路易十六结成联盟的时候，旨在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要求，便采取普选权和共和国这一逻辑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制形式。

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次民族革命。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制度争取统治地位、政权和完全胜利的世界性斗争，也在这里，在民族范围内得到了典型表现。

在1848年，资产阶级已不能起类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能承担起以革命的方式清除妨碍它统治的社会制度的责任。它的任务是（这一点它也看得很清楚）使旧制度增添一点必要的保证，不

是保证自己的政治统治，而是保证同旧势力共掌权力。它不仅不带领群众向旧秩序冲击，反而依靠旧制度，向推动它前进的群众进行反击。它的意识背离它取得统治的客观条件。民主设施在它的心目中不是它的斗争目标，而是对它的安宁的威胁。革命不可能由它来进行，而只能是反对它的。因此，在1848年，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一个能在不顾资产阶级和违抗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领导事变的阶级，需要一个不仅能以其压力推动资产阶级前进，而且能在紧要关头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僵尸从自己的道路上抛开的阶级。

无论是小市民还是农民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小市民阶层不仅敌视过去，而且敌视未来。它仍然为中世纪的关系所束缚，但已经不能抗拒“自由”工业；它仍然给城市留下自己的印记，但已把自己的作用让给了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它浸透了成见，被事变隆隆声震得惘然若失，它既剥削人又受人剥削，既贪婪又毫无办法，穷乡僻壤的小市民阶层是不能领导世界性事变的。

农民在更大程度上缺乏独立主动精神。农民分散，被排除在作为政治和文化神经中枢的城市之外，他们迟钝，视野只限于寨墙，对城市所想到的一切漠不关心，他们不可能起领导作用。他们一旦解除了压在肩上的封建义务的负担便立即心满意足，对曾经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城市忘恩负义：解放了的农民变成了“秩序”的狂热拥护者。

知识分子民主派缺乏阶级力量，它一会儿充当它的老大哥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尾巴，一会儿在紧要关头又离开它，从而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它自己给没有成熟的矛盾搞得混乱不堪，并把这种混乱带到各处。

无产阶级太弱，缺乏组织、经验和知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足以使消灭旧的封建关系成为必然的地步，但还不足以使工人

阶级这个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已严重到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大胆担任民族领导人的角色，但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承担这一任务。

奥地利为革命时期这种未最终完成的政治关系提供了极其显著的和悲剧性的例证。

维也纳的无产阶级在 1848 年表现了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和巨大的革命毅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赴汤蹈火，推动他们的只是一种模糊的阶级本能，他们缺乏对斗争目标的总的概念，摸索着从一个口号转向另一个口号。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令人惊奇地转到了大学生手中，这个唯一的民主集团由于其积极性而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事态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虽然大学生能够在街垒中勇敢战斗，并且能够真心实意同工人交朋友，然而他们完全不能领导革命的总进程，虽然革命把街头“专政”交给了他们。当整个工人的维也纳在大学生们的号召下于 5 月 26 日起来抵制解除“大学生军团”武装的时候，当首都居民事实上控制了城市的时候，当国王在逃并失去作用的时候，当最后几支军队在人民的压力下撤出首都的时候，当奥地利的行政权因此成为一份无人继承的财产的时候，却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起来执掌政柄。自由资产阶级有意识地拒绝享用这种以强盗的办法取得的政权。它一味梦想从无人照管的维也纳跑到提罗耳去的皇帝再回来。工人有足够的勇气打败反动派，但在组织上和觉悟上都还不足以承继政权。没有能力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无法推动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完成这一历史功绩，后者象往常一样在最紧要的时刻躲开了。总而言之，出现过一种形势，对于这种形势，一位同时代人说得对：“维也纳实际上建立过共和国，但不幸的是，没有人见到它”……拉萨尔从 1848—1849 年的事件中吸取了如下不可动摇的教训：“欧洲的任何斗争都不会成功，除非它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斗争，任何



斗争，如果社会问题在其中只是个模糊不清的因素并处在次要的地位，如果表面上是在民族复兴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旗帜下进行，它就再也不会成功了。”……

历史安排在 1905 年开始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第一次在自己的旗帜下为自己的目标而行动。同时也毫无疑问，没有一次旧的革命象迄今为止的俄国革命那样耗费了如此大量的人民的精力，而提供了如此微小的积极成果。我们远不是想要预言在最近数周或数月事变将如何发展。但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沿着拉萨尔在 1849 年提出的那条道路才可能取得胜利。从阶级斗争回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团结是办不到的。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只不过是其深刻的社会性质的暂时反映。在这个没有革命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事物的内部进程推动无产阶级去领导农民并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由于庄稼汉政治上的迟钝而失败了，这些庄稼汉在自己的村子里搞垮地主老爷，以便占有其土地，但一旦穿上士兵的上衣，却又去向工人开枪。一切革命事件都可以看成一系列无情的具体教训，通过这些教训，历史使农民深刻意识到其地方性的土地要求同国家政权这一中心问题的联系。在严酷的冲突和惨重的失败的历史学校中锻造了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在 1852 年写道：“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去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

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积蓄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sup>52</sup>（《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sup>①</sup>

写于1908年。译自《1905年》1922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第3—9、44—61页。

---

①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607页。——编者注

# 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论孟什维克的俄国革命理论

## · 编者按语 ·

这篇文章继续鼓吹“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否定俄国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宣扬俄国无产阶级要“打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求得西方的支援，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A. Tscherewanin, Das Proletariat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Stuttgart 1908. Verlag Dietz.)<sup>①</sup>

每一个善良的欧洲人(不单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俄国是个出乎意外的国家,原因很简单,当你不知道原因时,总是觉得结果是出乎意外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旅行家们曾说过,俄国的大街要靠一堆堆篝火来御寒。二十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当然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却都认为俄国的气候太冷,致使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在那里得到发展。而相反地,有一位法国小说家,不知是欧仁·苏,还是大仲马,硬要自己的主人公在俄国 sous l'ombre d'une kljukwa (酸果蔓的阴影下<sup>53</sup>)喝茶。当然,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现在知道,围着茶炊坐在酸果蔓下面几乎象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但是,俄国革命的巨大事变完全意外地迫使很多西方社会主义者刹那间相信,不久前还需要在街上升火御寒的俄国气候竟获得了使北极生长的矮小植物变为非洲高大的猴面包树的能力。正因为如此,当第一次强大的革命冲击被沙皇制度以武力镇

<sup>①</sup> 切列万宁《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1908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编者注

压下去之后，很多人便急忙从酸果蔓的阴影下面转到了悲观失望的阴影之下。

值得庆幸的是，俄国革命使社会主义西方产生了要弄清俄国关系的真诚愿望。而我很难决定是什么更有价值：是这种思想上的兴趣还是第三届国家杜马，须知第三届国家杜马同样是革命的赠礼，它至少象一条死狗由于落潮而被遗弃在浅滩上，可以说是大海的“赠礼”一样。

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应当受到无庸置疑的感谢，该出版社为适应革命所引起的要求最近出版了三本著作<sup>①</sup>。但是必须说，它们的价值远不是相同的。马斯洛夫的书对俄国的土地关系作了颇有价值的研究。这本著作的科学价值之大，使人不仅可以原谅作者这部著作形式上的极端不完善，而且可以原谅他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进行毫无道理的修改。帕日特诺夫的书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是独立的学术著作，它提供了相当多的说明俄国工人状况的材料，其中有工厂、矿山、住宅、医院方面的材料，也有一些工会方面的材料，但是没有国家的社会机体方面的材料。作者也没有给自己提出这后一个任务。因此，他的著作作为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所能够提供的材料也就寥寥无几了。

不久前出版的切列万宁小册子的德译本想阐明这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

切列万宁是从阐明革命的普遍原因出发的。他认为革命是国

---

<sup>①</sup> 彼得·马斯洛夫《俄国农业问题》、帕日特诺夫《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切列万宁《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托洛茨基注

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抗拒的需要与国家和法的农奴制形式之间冲突的产物。他写道：“经济发展的铁面无情的逻辑最终导致所有的居民阶层，除了封建贵族以外，都不得不对政府采取敌对立场。”（第10页）

在这个反对派力量和革命力量的集团里，“无产阶级无疑起了中心作用”（同上）。但是它本身只有作为整个反对派的一部分才具有意义。在为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争取解放的共同斗争的历史范围内，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是因为它得到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它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支持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反之，每当无产阶级因自己的行动欠温和（也可以说，因历史地过早行动）而使自己脱离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就遭到失败并阻碍革命的发展。这就是切列万宁的历史观的实质<sup>①</sup>。他在自己的这本小册子里满篇都在不倦地同夸大革命力量和过高估计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进行斗争。

他分析了1905年1月9日的大惨案，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写道：1月9日工人们到冬宫去不是请求，而是要求，他这样说是错误的。”（第27页）他指责党组织过高估计了1905年2月彼得堡无产阶级在施德洛夫斯基参议员的委员会<sup>54</sup>问题上表现出的成熟性，当时当选的群众代表要求公开的法律保障，由于得不到这样的保障，他们就退了出来；工人们为自己的代表被捕举行了罢工。他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下十月大罢工，同时用下列方式表述了自己的结论：“十月罢工由哪些人参加以及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弄清了。我们完全肯定，无产阶级不是单独地，也不是全靠自己的力量给了专制制度以如此沉重的，也许是致命

---

<sup>①</sup> 费·唐恩不久前在《新时代》杂志<sup>48</sup>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里也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是他在立论的勇气上，至少在对待过去的事情上，是赶不上切列万宁的。——托洛茨基注

的打击。”（第56页）十月十七日宣言<sup>55</sup>颁布之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渴望安静。因此，从无产阶级方面来说，走上革命起义的道路是“疯狂行为”。本来应该把无产阶级的精力引导到选举杜马上来。切列万宁对一些人进行了攻击，只是因为这些人指出，目前杜马还仅仅是诺言，至于怎样和什么时候进行选举，以及一般说来是否进行选举，还不得而知。他援引了我在颁布宣言那天写的文章说，“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sup>56</sup>上，刚刚获得的胜利被完全不正确地贬低了，宣言一发表，他们就立即写道：‘宪法是给了，但专制制度仍然保留着。一切都给，但什么都没给。’”

情况越来越糟。无产阶级非但不支持提出在杜马选举中实行普选权要求的地方自治派代表大会，反而突然同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宣布决裂，去迎合新的“可疑的同盟者”：农民和军队。以革命方式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以十一月罢工作为对在波兰实行戒严的回答，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这条道路导致十二月份不可挽回的败局。而这种败局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以后的错误，就为第一届杜马的破产和以后反革命的得势作好了准备。

切列万宁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德译者为了使切列万宁的指责和揭发的劲头缓和一些，真是煞费了苦心，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切列万宁的著作也仍然更象是一份关于无产阶级反对“真正现实的策略”的革命罪行的起诉书，而不象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真实描绘。

切列万宁以形式演绎代替了对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应当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协助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它应当协助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策略不相容的；无产阶级的实际策略，势必引导它去为争取国家政权而斗争，因而是错误的。

在经院哲学家那里大概叫做联锁法的这种漂亮的逻辑结构，把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力量及其阶级结构这个主要问题放在一边了。我们知道一种典型的革命例子，在那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条件是由胜利了的长裤汉<sup>44</sup>的恐怖专政准备好的。这是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由手工业-商业市民组成的时代。雅各宾派<sup>4</sup>率领了他们。目前俄国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是工业无产阶级。仅仅这一类比就可以使我们想到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历史形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革命是否会因此而不成其为资产阶级革命呢？又是又不是。这不取决于形式上的定义，而取决于事变的继续发展。如果无产阶级被各个资产阶级的，其中包括为无产阶级所解放的农民的联盟所抛弃，那么革命将保持其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并善于把自己政治统治的全部手段动员起来，以打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么俄国革命就能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激变的序幕。关于俄国革命将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自然只能给以相对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单纯规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等于根本没有谈其内部发展的类型，而且这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使自己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把它看作是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的追求者。

## 二

首先，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政治派别是什么呢？当人们谈到这个名称时，心里总是把在革命过程中的自由派同人民群众，即首先同农民等同起来。但在实际中（问题的根子也就在这里）这种等同并没有出现，而且也不可能出现。

立宪民主党近两年来在自由派里居领导地位，这个党是在1905年由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sup>50</sup>和“解放社”<sup>51</sup>合并而成的。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的不满捣乱，一方面表现了大农业主对政府的骇人听闻的工业保护关税政策的不满，另一方面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土地占有者所持的反对派立场，因为俄国土地关系中的野蛮状态妨碍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解放社”联合了一些由于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以及因此享受温饱生活而妨碍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这些先生当中有许多人都是进过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预备学校的。在地方自治派这个反对派身上总是带有怯懦虚弱的印记，而至尊的贵胄在1894年把它的政治愿望叫做“无意义的幻想”时，他只是道出了痛苦的真理。另一方面，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也无力发展成多少有点威力的政治反对派，这些人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声望，在物质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依赖于国家所庇护的大资本或自由派的注册地产。因此，立宪民主党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成为地方自治派这个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和各方面都软弱无力的有学位的知识分子的结合。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的浅薄在1905年底当地主在农民骚动的影响下急剧转向旧政权的时候就已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含着眼泪离开地主庄园（在这里他们实质上只是个养子），到他历史的故乡，即到城市中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如果对三次选举运动进行一下总结，那就可以看出，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那里有选举资格的居民都是立宪民主党的支柱。然而，俄国的自由派却未能摆脱无足轻重的状态，只要看看他们那可怜的举止，情况也就清楚了。为什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过火行为，而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和欧洲革命的动力，其核心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商人和知识分子。十



九世纪下半叶是小资产阶级完全衰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扼杀了西方的手工业民主派，并且不让它在东方形成。

欧洲资本在俄国碰到了农村家庭手工业者，它不让他们脱离农民而变成手工业者，就立即用工厂来摧残他们。在这里，它把我们旧的古老城市，其中包括莫斯科这个“大村庄”，变成了最新工业的集中点。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手工业时期，没有行会的传统和偏见，一瞬间就成了大量集中的阶级。在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大的和最大的资本没经过任何战斗就夺去了中小资本的立足点。没有可能把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同 1848 年的柏林或者维也纳相比，更不用说同 1789 年的巴黎相比，那时那里对铁路、电报连想都想不到，那时一个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场就算是最大的企业了。但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工业就其集中的程度来说，不仅能同欧洲国家相媲美，而且远远地把它们抛到了后边。下面这个小统计表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德意志帝国① 1895年统计		奥地利② 1902年统计		俄国③ 1902年统计	
	企业数	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
51—1000名工人的企业	18 698	2 595 536	6 334	993 000	6 334	1 202 800
超过1000名工人的企业	255	448 731	115	179 876	458	1 155 000

五十名工人以下的企业我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在俄国对这类企业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但是这两行数字表明，从生产集中

① 《德意志帝国的手工业和商业》第 42 页。——托洛茨基注

② 《奥地利统计手册》1907 年维也纳版第 229 页。——托洛茨基注

③ 波列查耶夫《俄国工人人数和成员统计》圣彼得堡版第 46 页和以后各页。  
——托洛茨基注

的角度看，俄国的工业大大地超过了奥地利。虽然大中企业（五十一至一千工人）的总数碰巧完全一样（六千三百三十四），但是俄国大型企业（一千工人以上）的数量却比奥地利多三倍。如果我们不仅把落后的奥地利，而且把象德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拿来比较，结果也是一样。德国二百五十五个大型企业工人人数略少于五十万人；俄国四百五十八个大型企业的工人人数为一百多万人。把俄国各种类型的工商业企业带来的利润加以对比，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企 业 数	利 润 总 额 (百万卢布)
利润在1 000—2 000卢布的	37 000—44.5%	56—8.6%
利润超过50 000卢布的	1 400—1.7%	291—45.0%

换句话说，在全部企业中近一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还不到总利润的十分之一，可是全部剩余价值几乎有一半都落到了六十分之一的企业手中。

这几个小小的数字足以雄辩地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过晚这个特点使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这两极之间的矛盾尖锐到极点。无论是在社会经济中，在城市居民的成分中，还是在革命斗争的经济中，工人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在西欧相应的时代从行会和同业公会中出来的手工业-商业民主派所处的那种地位。我们没有那种曾与年轻的、尚未形成阶级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壮实的小市民阶层。

不错，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管在哪里始终是极不定形的，但是在它最顺利的历史时期它曾发挥过巨大的政治积极性。而在俄国，无可挽回地迟到了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悬浮在阶级矛盾的深渊之上，身受地主的传统和教授的偏见所束缚，诞生于社会

主义的诅咒声之中，想都不敢想去影响工人，没有力量越过无产阶级并在同地主利益的斗争中去掌握农民，这样，这个不幸的、断了脊梁的民主派变成了立宪民主党。甚至不醉心于民族自豪感也可以断定，俄国自由派的短促的命运就其暴露出来的内在劣根性和极端迟钝来说，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任何一次旧的革命都不象这次革命那样耗费了大量的人民的精力，却提供了微小的客观成果。我们无论从哪种观点看待事变，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和革命的“无所成就”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联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绝不会使我们得出悲观的结论。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不过是它深刻而拖延的性质的另一面而已。我们的革命就其直接的、它所引起的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由于工商业居民的激烈的阶级分化，没有一个能把自己的社会威望和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结合起来的、率领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能独立行事的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应当在无情的冲突和惨重的失败的严酷教训中，为了自己的胜利而创造政治前提和组织前提。他们没有别的道路。

### 三

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手工业民主派的工业职能的同时，也夺取了它的任务，其中包括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夺取的是它的任务，而不是它的方法和手段。

官方社会组织的整个编制：中小学、大学、市政局、报刊、剧院，都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服务的。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优势：甚至我们患佝偻病的自由派在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如通过决议、请愿和竞选的时候，就自动组织起来并掌握

现成的机构。除了生产过程本身赋予无产阶级的那种联系之外，无产阶级没有从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任何文化和政治遗产。它不得不在这个基础上在革命战斗的硝烟中创建政治组织。它出色地克服了这种困难，它的革命力量高度集中的时期，1905年年底，同时也是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出色的阶级组织的时期。然而，这只是任务的一小部分，工人不仅应当战胜自己的无组织性，而且应当战胜自己敌人的有组织的力量。

总罢工是无产阶级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尽管相对地说人数不多，但是俄国无产阶级还是使国家政权的集中化机器和国家大量高度集中的生产力依赖于自己。这就使它的罢工有了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1905年10月专制制度不得不举手行礼。但是很快就清楚了，总罢工仅仅提出了革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它。

革命首先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而罢工，就象分析所提示的和事变所表明的那样，是对现政权施加压力的一种革命手段。顺便说说，从来不越出钦赐宪法一步的立宪民主党自由派，正是因此而赞成把总罢工当作一种斗争手段，诚然，只有在一瞬间，并且是在事后，正当无产阶级认识到罢工的局限性，感到必然也有必要越出它的界限的时候。

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与此同时，新型的俄国工业，没有有力而壮实的小资产阶级（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来说，工人只不过是辅助部队），所有这些使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力并使它面临着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经院哲学家们只是因为通过刊印马克思的书的那张纸看待世界就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能够引用随便多少“原文”来证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不适时”，而现实的俄国工人阶级，在纯阶级组织的领导下在1905年年底投入了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而大资本和知识分子则充当了这一方和另一方的决斗副手，就是这个无产阶级随着自己的全部革命发展碰

到了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军队两者的对质成为不可避免的。对质的结局取决于军队的行动，而军队的行动则取决于它的成分。

工人在国内的政治作用比他们的数量要大得多。事变证明了这一点，以后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显示了这点。工人还把自己的阶级优越性(技术训练，文化修养，团结行动的能力)带到兵营里去。

在军队的一切革命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工兵部队中技术熟练的士兵或炮兵，他们的故乡是城市，是工厂区。在舰队起义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轮机小队，无产者即使占全体舰员的少数，他们掌握了机器，即装甲舰的心脏，也就掌握了全体舰员。但是建立在普遍义务制基础上的军队，自然表现出农民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军队会自然而然地克服庄稼汉的生产分散性，而把它的主要缺陷，政治上的消极性，变为自己的主要优点。无产阶级在1905年的一系列发动中，有时忽视农村的消极性，有时又依靠它的自发的不满情绪。但是，当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成为当前现实的要务时，问题的解决就操在组成俄国步兵中坚力量的武装的庄稼汉手里。1905年12月俄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更实际的因素：农民军队的人数。

## 四

这个简要的分析使我们大可不必详细谈论切列万宁的起诉书的个别论点。切列万宁没有透过个别步骤、声明以及策略“错误”，从无产阶级的社会联系和它在革命中的发展去认识无产阶级本身。如果他拒绝1月9日工人上街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这一毫无疑

义的思想，那么这是因为事变的外表掩盖了实质。如果说他那样尽心地强调知识分子在十月罢工中的重大作用，那么他这样做丝毫也没有降低下列事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才使左翼民主派从地方自治派的尾巴变成了革命的暂时的辅助部队，强迫他们接受了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即总罢工，并使他们依附于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代表苏维埃。

在切列万宁看来，宣言颁布之后，无产阶级应当把力量集中于杜马选举。但是要知道当时不存在任何选举。选举的日期和性质谁也不知道。而且一般地说，是否进行选举也没有任何保证。

在10月，在颁布宣言的同时，我们遭到了全俄性的大摧残。怎么能令人相信不会用第二次大摧残来代替杜马呢？在这种情况下，以自己的进攻冲决了旧警察堤坝的无产阶级能干些什么呢？只能干它实际上已干了的那些事。自然，它夺取了新的阵地：摧毁了书报检查机关，创建了革命的报刊，夺取了集会自由，保护居民免受那些穿礼服的和衣衫褴褛的流氓无赖的迫害，建立了战斗的工会，团结在自己的阶级代表机关的周围，同革命的农民和军队建立了联系，他竭力在这些地方掘壕固守。当自由派那伙子人嘟哝着什么军队应当置身于“政治之外”时，社会民主党却在军营里进行不倦的鼓动工作。它做得对不对呢？

虽然地方自治派十一月代表大会（事后切列万宁建议支持它）一听到舰队和塞瓦斯托波尔尔起义的风声就急急忙忙地向右转，只是在获悉起义已经被镇压之后神经才重新镇定下来，代表苏维埃却正好相反，热情洋溢地向起义者表示敬意。它做得对不对呢？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并且到哪儿去寻求胜利的保证：是在地方自治派自由派的安心之中呢，还是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军队的联欢之中呢？

自然，由工人展开的没收土地的纲领把地主推向右转。然而

它却把农民推向左转。自然，强有力的经济斗争把资本家抛进了维护秩序的阵营。然而它却唤起了倍受折磨和愚昧无知的工人投身于政治生活。自然，在军队中的鼓动加速了同政府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究竟该怎么办呢？是把在自由的蜜月里帮助了蹂躏者并枪杀了工人民兵的士兵置于特烈波夫的绝对指挥之下吗？切列万宁自己也感到，除了已经做过的以外，不能再做什么了。

他在结束他的分析时说：“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并立即补充说：“即使假定说，当时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策略。那也无关大局，并且丝毫也改变不了最终的客观结论——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第92页）切列万宁创立他的策略就象斯宾诺莎创立伦理学一样，用的是几何学的方法。他自己也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运用他的策略的，这自然也就说明，为什么有他那样想法的人在革命中不起任何作用。然而，对于缺点只在于不能运用的这种“现实的”策略能说些什么呢？对于它，我们可以借路德的话来说：“神学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不应当只是按照理性的法则去思索和考虑神的事情……”

任何艺术，不管是为家庭生活服务的还是为世俗事务服务的，如果它变成一种思辨并且不能在实际中运用，这就表明它是不可救药的和毫无用处的（ist verloren und taugt nichts）。”

写于1908年。译自《1905年》1922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第257—269页。

# 我们的意见分歧<sup>①</sup>

——1905年，反动和革命的前途

## · 编者按语 ·

这是一篇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进入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革命转入低潮。这时，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猖獗，托洛茨基则打着“非派别性”的中派旗号，标榜自己凌驾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上，实际上处处站在孟什维克一边，猖狂攻击布尔什维主义。

在这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大骂什么“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胡说什么到革命胜利时，这种反革命特性就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他所谓的“危险性”也就是所

---

① 本文载于波兰杂志《社会民主党评论》，当时是俄国极端反动的时期，是工人运动几乎死一般的暂时沉寂和孟什维克叛变性地抛弃革命及其方法的时期。

本文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在关于革命的性质和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问题上的正式立场，也提出了批评。

对孟什维主义的批评至今还有它的意义：俄国孟什维主义对它在1903—1905年时期，也就是实际形成的时期所犯的致命的错误，现在正自食其果；世界孟什维主义现在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

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批评，现在只具有历史意义。过去的分歧早已消除了。

在本书第一版中，这一章有一些空白，因为当时我们手头既无完整的俄文手稿，又无登载该文的波兰杂志。在本版中，空白已按波兰文本补齐。——托洛茨基注



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无法克服国家经济落后状态，也无法解决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敌对冲突等等。他鼓吹说，无产阶级只有实行“革命的进攻政策”，推动西方革命，然后取得西方的援助，才能摆脱国内的种种矛盾。“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彻底粉碎了托洛茨基的诬蔑。在铁的事实面前，托洛茨基一方面佯称“过去的分歧早已消除”，另一方面却在附注中颠倒黑白地说，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能摆脱“反革命特性”，是因为在1917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完成了“思想上的重新武装”，也就是说似乎布尔什维主义用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改造和重新武装。

列宁在1918年年底曾明确指出：“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84页）

事情很清楚，列宁始终坚持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布尔什维主义根本不存在什么“重新武装”的问题。

拉萨尔在1854年，在世界极端反动时期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至于现今的消沉无法靠理论来克服，这一点你完全正确。我

甚至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任何时候都没有单靠理论战胜过消沉，也就是说，靠理论克服这种消沉虽然产生过信徒和宗派或不成功的实际运动，但从未引起过现实的世界运动或普遍的群众性的思想运动。群众只有受实际事态的沸腾的力量的吸引，才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精神上投身于运动的洪流。”

机会主义不理解这一点。如果说，机会主义的主要心理特点是它不善于等待，这可能是奇谈怪论。但确实是如此。同盟的和敌对的社会力量由于它们的对抗和相互影响，在政治上造成一种死一般的沉寂的状态；经济发展的分子活动在使矛盾加剧的同时，不仅不打破政治平衡，相反地，却使它得到暂时的加强，似乎使之永世长存了，在这个时候，由于不耐烦而苦恼的机会主义在自己的周围寻找“新的”途径和手段，以便立即实现那个历史还不能使之实现的东西。它被一片埋怨自身力量不够和不可靠的声音弄得苦恼不堪并开始寻找“盟友”。它迫不及待地扑向自由主义的粪堆。恳求它，呼吁它，为它发明了专门的行动公式。但后者只是向它发出政治腐烂的臭气作为回答。于是，机会主义开始从粪堆里啄出几颗民主的珍珠。它需要盟友。它东奔西跑，在十字街头抓住了他们的后襟。它向“自己人”呼吁，劝导他们对可能的盟友采取十分客气的态度。“掌握分寸，多掌握分寸，尽可能多掌握分寸！”它患了一种特殊的疾病，对自由主义的谨慎癖，分寸狂，于是，它在狂乱中给自己的政党带来侮辱与创伤。

机会主义想要弄清那些尚未成熟的关系。它想立即“成功”。当反对派盟友帮不了忙时，它就跑到政府那里去劝说、请求、威胁……最后它在政府中给自己找到一个职位（内阁主义<sup>57</sup>），但这无非证明，不仅“靠理论的途径”，而且靠行政，都是无法超越历史的。

机会主义不善于等待。正因为这样，大事变对它来说总是出

乎意料的。这些事件突然袭击它，把它打得倒下，使它象木片一样在漩涡中打转，然后把它冲走，叫它一会儿一头撞在这个岸边，一会儿又撞在那个岸边……它企图抗拒，但徒劳无益。这时，它便听天由命了，装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挥动手臂，表示在游泳——而喊得比谁都响……一旦飓风疾驰而过，它便爬到岸上，厌恶地抖抖身子，诉说头痛骨酸，并在浑身不舒服的状态中不惜对革命的“幻想家”使用严厉的字眼……

## 一

莫斯科的不无名气的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不久前出版的《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在11月和12月（1905年）获得胜利的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策略。”（第200页）孟什维克策略的半官方哲学家马尔丁诺夫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sup>58</sup>上，也提到“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幻想理论……，这个理论在我们十月的日子里，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时期，取得了短暂的胜利”（第4—5号第17页）。造成月份上的不同说法的原因只是马尔丁诺夫把日历搞错了，他把苏维埃的“十月的日子”理解为10月、11月和12月的日子：众所周知，哲学家在引用重大的历史时期时，很容易把月份弄错。然而，作为“幻想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切列万宁回答说：“是打算把俄国从半野蛮状态直接引上社会主义的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显然轻率的观点。”（第177页）切列万宁用几页的篇幅毫不费力地揭露了这种打算的轻率。什么是俄国无产阶级？充其量就是百分之二十七点六的人口。但是，应当从革命的算盘上去掉农业工人，因为他们愚昧和落后，去掉仆人和短工，因为他们分散，这就剩下三百二十

万人的工商业无产阶级。“总之，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至十一，这就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打算用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且他们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第179页）切列万宁的胜利是无庸置疑的。糟糕的只是他效法那些报纸上的骗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来描绘自己的论敌，这些人尽量把不断革命这个魔鬼涂抹得粗鲁一些，蛮横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提出问题：能否把俄国“直接引上社会主义”。这样提问题要有十分特殊构造的头脑才行。

我们问的是俄国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俄国正在进行的革命的阶级动力。

这些问题足以表明，应该如何来写处于革命后不舒服状态中的机会主义者的历史。但是，更有意思的问题也许是他们是怎样制造历史的。关于切列万宁，可惜我们对他在这方面的情况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关于他在革命事变中的作用，我们没有丝毫印象。但是关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的观点（也许还有活动），我们手头是有文据可查的。他们之中有人写道：“你们问，我们在立宪会议上将要求什么？我们明确而肯定地回答：我们要求的将不是‘社会化’，而是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使用土地，而是一切（着重号是原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诚然，“庸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反驳说，我们这里“在最近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在技术上是是不可能的”。然而，作者得意洋洋地驳倒了他们的意见并断言：“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目前敢于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只有这一个党会引导群众取得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谁写的？是著名的孟什维克。不错，我们听马尔丁诺夫说过，在“十月的日子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后来也是他告诉我们，“孟什维克发出了警告的声音，他们没有那么快地（？）冲昏头脑，他们有时顶住自发势力，继续顽强地（顽强地！）恪守俄

国社会民主党的誓言。”（《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4—5号第16页）毫无疑问，这种勇敢精神是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的。但是……但是上面援引的那篇把不断革命思想庸俗化的文章毕竟是孟什维克写的（见《开端报》<sup>33</sup>第7号和第11号社论）。这个被革命严重地冲昏了头脑的孟什维克也许是“不可靠的”、“不地道的”孟什维克？啊，不！这是孟什维主义的彼得，是它的基石。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

这就是机会主义政治生理学中的一页。如果在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如此丧失其前提的人现在凶狠地反对不知悔改的人的“轻率”和反对……革命本身的疯狂，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 二

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诞生并走向革命。它在所谓和平发展时代的全部策略归根到底是积蓄力量，这些力量只有在公开的革命冲突时期才充分发挥作用。“正常的”、“和平的”时代，这是统治阶级强迫无产阶级接受它的法律和它的政治抵抗形式（法庭，受监视的政治集会，议会制度）的时代。革命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为其政治愤懑找到了一种其革命本性得以充分表现的形式（集会自由，新闻自由，总罢工，起义……）的时代。“但是在革命目标好象快要实现的革命狂热（！）中，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是很难开辟道路的……”（切列万宁，第209页）。“革命狂热”妨碍了社会民主党策略的运用。革命狂热，这是多么美妙的术语啊！全部问题原来在于，“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要求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暂时的力量联合”，而革命的疯狂行为妨碍了这一救命的行动……

当你重读那警惕地站在了望台上(一位较年轻的在柏林,两位最强有力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伦敦),全神贯注地环视着政治地平线,指出每一个可以证明革命迫近的现象的我们卓越的经典作家的通信的时候;当你重读这些书信,从字里行间听到向外喷射的革命熔岩的滚滚轰鸣的时候;当你感受到这种焦灼地而又毫不懈怠地期待革命到来的气氛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对严酷的历史辩证法的憎恨,因为它为了自己的瞬息即逝的目的,使那些理论上、心理上平庸的说教者也搞起马克思主义来了,而这些人却把自己策略上的“理智”同革命狂热对立起来!

拉萨尔 1859 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在革命中群众的本能通常比知识分子的明智正确得多……正是由于群众素来缺乏教育,才使他们不致碰上明智的做法的暗礁……。”拉萨尔接着说,“归根到底,只有依靠群众和他们充满激情的自我牺牲才能进行革命,但正是由于群众‘愚昧无知’,由于他们缺乏教育,所以他们完全不了解可能主义,同时,因为任何不发达的头脑只承认极端,只知道是和否,而不知道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所以他们只对极端,对整体,对直接的东西感兴趣。这最后必定造成一种情况:在那些(明智的-聪明的)革命的统计员面前本应是跟随自己的朋友,而不应是上当受骗的敌人,但最后却相反,在他们面前只有敌人而根本没有拥护其原则的人。因此,似乎是最高的理智实际上却是最无理智。”

拉萨尔有充分的权利把无教养的群众的革命本能同革命统计员的“明智的-聪明的”策略对立起来。对他来说,朴素的本能当然不是最后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有的,这就是“对历史规律和各族人民运动的完整认识”。他作出结论说:“只有现实的英明才能自然超越现实的明智并凌驾于它之上。”在拉萨尔那里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薄纱的现实的英明,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唯物辩证法。它

的全部力量在于，它不是把自己的“理智的策略”同群众的实际运动对立起来，而是使运动定形、净化并加以总结。正因为革命从社会的基本面上揭去了神秘的外罩并使阶级同阶级在广阔的国家舞台上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觉得自己在革命中如鱼得水。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或者更糟糕，那个本身把自己不成功的原因归咎于“革命狂热”并有意识地一直等待这种状态消逝，即等待群众的革命精力消耗殆尽或将来被机械地镇压下去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 三

普列汉诺夫头一个具有可悲的勇气把革命事变看作是一系列的错误。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说明怎么会在二十年内不倦地捍卫唯物辩证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事说教的教条主义和唯理论的空想主义，而在以后的实际革命政治中却成了真正的教条主义者-空想主义者。你们要在他革命时代的所有作品中找到最主要的东西，如阶级关系的内在结构，群众革命发展的内部逻辑，那将是徒劳的；普列汉诺夫用来代替这些的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异曲同工的空洞的三段论式，其大前提是：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结论说：对立宪民主党人应当讲究分寸。在事变这部巨著的页边既没有写下理论分析，也没有写下革命政策，而是些惹人厌烦的专事说教的注释。这种批评的最高成就是寓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形而上学者，那么，我们在1905年底的策略就会全然不同了。十分奇怪的是，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他在二十五年中宣传了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却仅仅促进了革

命的“形而上学者”的政党的建立；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而上学者”又怎么能够把工人群众引上邪路，并居然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处于孤家寡人的说教者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普列汉诺夫没有掌握从作为一种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过渡到革命行动的秘密，或者“形而上学者”在革命条件下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有某种不容置辩的优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推行普列汉诺夫的策略，事情也丝毫不会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反正会被非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形而上学者”排挤掉的。普列汉诺夫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不可避免的抉择。但是切列万宁这个普列汉诺夫式的专事说教的诚实的桑科<sup>59</sup>抓住了牛的犄角，或者更接近塞万提斯的说法，抓住了驴的耳朵，并勇敢地宣布：在革命狂热的条件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是无立足之地的！

切列万宁不得不作出这一结论，因为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被他的老师小心翼翼地回避的任务：对革命进程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一完整的论述。当普列汉诺夫明智地仅限于对个别步骤和个别现象作游击式的批评而不顾事态的内部发展时，切列万宁问自己：如果历史按照“真正的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发展，历史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呢？他在小册子《革命中的无产阶级》（1907年莫斯科版）中对此作了回答，这本小册子是用短浅的目光写出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勇敢的文件。但是，当他纠正了一切错误并按“孟什维克”的方式来安排全部事件，使得这些事件不断地把革命引向胜利的时候，他问自己：为什么历史仍然误入邪途？于是他用《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这本小册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又一次可贵地证明：目光短浅的坚定不移的勇敢甚至也能够揭示一点真理，虽然不能经常……从头开始。

切列万宁说：“革命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把失败的原因归之



于无产阶级的某种错误是根本<sub>不</sub>行的。”他认为：“很明显，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某种更深刻的原因。”（第174页）大资产阶级重新同沙皇制度和贵族结成联盟，在革命的命运中起了致命的作用。在这些力量联合为一个反革命整体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起了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过去，现在可以说，这也是它的<sub>不</sub>可<sub>避</sub>免的作用”（第175页，着重号都是我加的）。在头一本小册子中，他跟着普列汉诺夫，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布朗基主义<sup>21</sup>。现在，他的诚实的短浅目光起来反对这一点了，于是他说：“让我们设想一下，无产阶级（如果）一直处于真正的孟什维克领导之下，并且（如果）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动<sup>①</sup>，那时，无产阶级的策略就会有所改善，但它的基本企求不会改变，而这些企求必然导致它的失败。”（第176页）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够把孟什维克的自我限制用到自己身上的。当它开展阶级斗争时，它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阵营去。策略上的错误只“加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sub>可</sub>悲的(!)作用，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可<sub>悲</sub>的作用”是由它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决定的。结论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向那些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患了自由主义呆小病的一切责难彻底投降。然而在这个可耻的政治结论中却反映出一点点历史真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是不行的，这并不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思想上的毛病，而是由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深刻分化。俄国无产阶级处于他那轮廓分明的社会形态之下，处于他那种觉悟水平上，只有在他自身利益的旗帜下才能发挥自己的革命能量。但是，对他的利益，甚至对眼前利益所抱的激进主义，

---

① 请注意这种思想方法：不是孟什维克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事。而最好是这么说：假定历史按切列万宁的方式发展……——托洛茨基注

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向右转。

切列万宁懂得这一点。但是他说，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很好。但是，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社会民主党还能做什么呢？打算用诸如普列汉诺夫的代数公式去蒙骗资产阶级吗？束手坐待无产阶级遭受不可避免的失败吗？或者相反，承认想同资产阶级长期合作是徒劳的，从而去挖掘无产阶级的全部阶级力量，激起农民群众的极大的社会兴趣，向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军队呼吁，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这上面，在这条道路上寻求胜利？胜利是否可能，第一、这无法预言，而第二、不管胜利的可能性是大是小，这无论如何是革命政党能走的唯一道路，除非它认为立即自杀比失败的一种可能性要好。

切列万宁只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时才探索到的这个革命的内部逻辑，早在决定性的革命事件开始之前，被他斥责为“轻率”的人就已经看清楚了。

我们在1905年7月写道：“现在对资产阶级的主动性和决心可能抱的希望比1848年更小了。一方面，障碍大得多，另一方面，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分化也严重得多。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共同缄默抵制，给多灾多难的解放过程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他们力图不让它超出有产者同旧制度的代表达成协议的范围，为的是镇压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主义策略确实只有在同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发展。对这一点应当看得十分清楚。不是虚假的民族‘统一’反对民族敌人（沙皇制度），而是深刻发展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道路就是这样……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能够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但只有阶级斗争能够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无产阶级虽然靠压力克服了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但在一定时刻，当事变完全按部就班地展开的时候，仍旧会同碰到直接的障碍一样，碰到这种保守性。能够战胜这一障碍的阶级，将来一定

能做到这一点，从而也一定能承担起领导的作用，——如果总的说来全国注定要出现激进的民主复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会出现‘第四等级’的统治。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会象当时资产阶级那样依靠农民和小市民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领导农村，把它吸引到运动中来，使它关心自己的各项计划的成就。但是，领袖必然仍旧是无产阶级本身。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活动当然不会限于一国的范围。它将立即被自身状况的逻辑抛向国际舞台。”<sup>①</sup>

#### 四

党的各个不同派别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它们都指望获得完全胜利，即通过革命夺得国家政权。切列万宁现在用算盘大致算了算革命的力量和反动的力量，在进行结算时得出一个结论：“革命的任何成就都会包含着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萌芽。”（第198页）他用什么资料来计算的呢？罢工的盛行，农民骚动的性质和形式，三届杜马选举的数字。因此，斗争的进程和结局，他不是从经济关系中直接得出的，而是从革命斗争的形式和插曲中得出的。使他得出俄国革命注定毫无希望的结论的，不是经济特征，也不是对各阶级的统计，而是对这些阶级的现实斗争，对它们的冲突，对使它们力量的公开配合的研究，当然，切列万宁的“研究”是拙劣的。但是，即使为了让切列万宁能够着

---

<sup>①</sup> 拉萨尔《〈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的序言》铁锤出版社版。某些说法有意含糊其词，这是由于该文是为“立宪前”时期的合法出版物写的，即1905年7月写的。——托洛茨基注

手拙劣的研究，必须有席卷全国的罢工，爆发起义，庄稼汉捣毁几个省，最后，进行国家杜马选举。不然怎么办呢？比方说，任何波斯的切列万宁不可能把巩固起来的沙皇制度同英国自由党政府的联盟将对波斯革命必然产生的作用预先告诉自己的同胞。如果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预言家，并且他打算根据自己的推算阻止人民群众参加最终会导致他们失败的一系列起义，那么，波斯的革命者最好是劝这位聪明人暂时呆在疯人院里。

革命在切列万宁对它的借方和贷方结算之前就在俄国开展起来了。对我们来说，革命是一个我们必须在上面表演的现成的舞台。我们没有创造事变，但我们应当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它们。既然我们参加了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指望取得胜利。但是，革命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作为革命政党，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向群众揭示夺取国家政权的必要性。

## 五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整个说来一向是不明确的。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都说“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双方都是纯形式主义地把这理解为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然后应当开始一个在民主环境下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时代。不过，“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是推翻沙皇制度和把国家政权转到革命的社会力量手里。转到什么社会力量手里呢？孟什维克回答说：资产阶级民主派。布尔什维克回答说：无产阶级和农民。

但是，孟什维克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什么呢？这不是某种实际存在的和可以感触到的社会力量的名称，这是新闻记者用演绎法和类推法创造出来的超历史的范畴。因为革命应当进行

“到底”，因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在法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是民主派革命者——雅各宾派<sup>4</sup>，所以俄国革命只能把政权交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他们毫不动摇地规定了革命的代数公式，然后竭力赋予世上不存在的算术意义。他们指责别人夸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自己却对“协会联合会”<sup>60</sup>和立宪民主党寄予无限的希望……马尔托夫满怀希望地欢迎“人民社会党人”<sup>61</sup>，马尔丁诺夫则抱住库尔斯克的人民教师的大腿。孟什维克懂得，在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居民、动力、知识、社会生活和政治经验日益集中在城市，在那里农民不能起领导革命的作用。历史不能把解放资产阶级民族的任务托付给庄稼汉。农民由于分散，政治上落后，特别是由于使农民分化的深刻的内部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只能从背后给旧制度若干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通过引起混乱和惊慌的农村自发的起义，另一方面，通过把不满情绪传给军队。但是，在资本主义城市里，在新历史的发源地，应当有一个坚定的政党，它依靠城市的革命群众并善于利用农民起义和军队的不满情绪，以无情的打击把敌人从一切阵地上赶出去并夺取国家政权。这样的政党，孟什维克是无法找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抽象的“把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变成了仍旧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而他们当中最彻底的人士，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得出结论说，对孟什维主义的异样的策略来说革命气候是太无情了。

孟什维主义的矛盾是历史本身的矛盾的曲折的反映，历史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革命化任务，却事先在全世界范围内用大工业的铁扫帚扫除了作为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与“民粹派”相反，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不承认我们的“独特性”，

以致弄到原则上把俄国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等同起来的地步。这离最荒谬的结论只有一步之差。

当唐恩仿效马尔丁诺夫，抱怨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是“我们的最大的不幸”的时候，我们只能同情地耸一耸肩膀。这些人真的懂得他们为什么而悲伤吗？让我们设法对他们讲清楚这一点：使他们伤心的是，大资本占领了国际经济的地盘；它不容许在俄国形成有力的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中的突出作用已转到现代无产阶级身上。孟什维克不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派软弱的社会原因同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相反地，他们认为这是使革命软弱的基本原因。我们且不说，从国际社会民主党这个世界社会主义变革的政党的角度来看，这种思想是多么可怜。对我来说，我们革命的条件象现有的这个样子就足够了。哭诉不能使第三等级起死回生。只能得出结论：只有农民群众服从作为革命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 六

布尔什维克说，完全正确！我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共同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sup>62</sup>第二期上说，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sup>①</sup>其活动的内容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使经济和政治关系民主化。列宁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和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即

---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38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之间规定了原则性的区别。他觉得这种逻辑上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推论完全能解救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人阶级统治之间的物质上的矛盾。他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会遭到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既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执政,确认其专政具有“民主主义性质”,那么一切都得救了。从1904年起,列宁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正确一些。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因此政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会是个极大的不幸。孟什维克是这样说的。列宁回答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进行的只是民主革命,这也许是对的。换句话说,在列宁看来,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条件的矛盾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并且由于理论上认识到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这种自我限制是必然会出现的。列宁把客观矛盾转到无产阶级的认识中去,用一种不是来源于宗教信仰而是来源于“科学”公式的阶级禁欲主义来解决它。只要清楚地想象一下这种设计,就足以了解它那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性质了。

在另一个地方我已详尽地指出<sup>①</sup>,在“民主专政”的第二天这种准马克思主义的禁欲主义牧歌就会烟消云散。无产阶级无论在何种理论标志下执掌政权,它不能不马上,即第一天就面临失业问题。在这一点上,解释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专政之间的区别未必能帮他多大的忙。执政的无产阶级必须立即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共工程等等)由国家开支来保障失业者的生活。这种做法本身立刻会引起强大的经济斗争高潮及一整段罢工的历史:这一切在1905年年底我们已经小规模地见到过了。而资本家将会以当时

① 《我们的革命》第249—259页。——托洛茨基注

回答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那样来回答它：关闭工厂。他们在大门上锁上一把大锁，并对自己说：“我们的财产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已经规定，现在无产阶级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民主专政。”面对着关闭的工厂，工人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它必须打开工厂，并由国家开支来恢复生产。但是这难道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吗？当然是！你们难道能提出别的道路吗？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你们描绘的是无限制的工人专政。其实，这里讲的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好吧，就把这种反驳也考虑在内。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是如何违背其理论家们的善良意愿，在实践中消除那种本应把他限制在民主专政范围内的逻辑界限的。现在有人建议用合作的庄稼汉给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加上一个客观的反社会主义的“保证”。如果想以此说明，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执政的农民政党不会允许由国家开支负担失业者和罢工者，也不会允许打开资本家关闭的工厂供国家生产，那么这就是说，就在第一天，即远在完成“联盟”任务之前，我们就会看到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府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以农民政党制服工人告终，也可能是以前者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而结束。这两种情况都和联合“民主”专政很少有共同之处。全部不幸在于，布尔什维克只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革命胜利的时刻：此后斗争就暂时消融于“民主”合作之中。而只有在最终建立共和制之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以纯粹的形式重新进行，——这一次是在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形式下进行了。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种抽象概念出发，得出使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直到自由资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的思想，布尔什维克则从“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这种同样空洞抽象的概念出发，得出使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我限制的思想。不错，两者之间在



这一问题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sup>①</sup>。当然，孟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经常谈论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前者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后者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这一点丝毫也不改变下列事实，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是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为阶级斗争的后果所吓倒，而想用自己形而上学的设计来使斗争严守秩序。

## 七

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给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兵的政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能用“只是民主专政”的天真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出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政权面前摆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和国家的经济落后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工人政府一开始就面临下列任务：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去实行革命的进攻的政策，并且打算转向有限的、只是民族的

---

<sup>①</sup> 对本版的附注。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在1917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不是没有内部斗争地）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托洛茨基注

和民主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将会毫不迟延地向它表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政权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平上去。

写于1909年。译自《1905年》1922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第270—286页。

##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向

### · 编者按语 ·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托洛茨基不仅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在党内各派之间招摇撞骗，为公开的取消主义张目，而且勾结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头目考茨基等人，利用他们控制的报刊《新时代》、《前进报》发表署名或匿名文章，歪曲俄国党内斗争情况，攻击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向》就是1910年9月托洛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正如列宁所揭露的，“托洛茨基以‘学术性的’文章为幌子，为所欲为地大肆造谣和撰写诬蔑性的文章”（《列宁全集》第34卷第437页）。

托洛茨基避开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胡乱解释党内斗争的原因，说什么斗争的原因是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事情的实质是一场“影响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篡改历史，公然造谣说，“抵制主义倾向贯穿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为了抬高自己，托洛茨基不择手段地贬低党，说什么俄国的“工人群众”认为“社会民主党是站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提出什么“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之类的谬论。

列宁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后极为气愤，立即表示对于这种“极其惊人的谬论和歪曲”“不能置之不理”（《列宁全集》第36卷第160页），并当即写了《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对托洛茨基的谬论进行驳斥，同时揭露了托洛茨基多年来不断动摇而实际上站在孟什维克一边的丑恶历史。列宁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是一窍不通的”，他“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是凌驾两派之上的人物。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没有一点同意取消派和召回派，而在实践中在一切方面都同意呼声派和前进派”。托洛茨基代表了党内的“‘整个反党的’倾向”（《列宁全集》第16卷第389、391、392页）。

—

科学社会主义，按照它的创始人的解释，是欧洲先进国家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产物。但是，后来它是作为一种必须用于实践的现成理论公式出现在工人运动的领袖面前的。社会主义体系的那些已被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克服了的内部矛盾，在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又以民族的政治矛盾的形式重新出现。甚至最好的社会理论，也就是把世界经验概括得最正确的那种社会理论，也无法代替经验本身。每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必须自己重新去领会马克思主义，以便掌握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不仅表现在每个国家都从先进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还在于它会重复这个国家的错误。

国际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整个来说是社会革命阶级对资本

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和法律规范的适应过程中的矛盾的反映。这一整个的发展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一方面是从无政府主义观点“否定”任何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这样一来，经济基础就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僵化物，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又用纯粹革命意志的炸药来反对这种僵化物；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的软弱无力，它把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限制都看成是绝对的东西——唯一的理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按照他们凶狠的意志有先见地把这些限制变成了“法律”。既然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新阶段上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偏向来片面地满足工人运动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为了保存自己而在理论上同这些偏向进行斗争，在实践上使之屈服，而最后，当这些偏向的拥护者威胁到党的活动能力时就把他们从党内开除出去。

不存在这种谬误的普遍公式，因为谬误正是由于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产生的。

似乎已被国际完全克服了的无政府主义正在工团主义的昌盛中重获自己的再生。同样，尽管社会主义内阁主义<sup>57</sup>在法国遭到完全破产，也无法阻止内阁主义倾向在另一个法语国家即比利时盛行起来。

理论不能代替经验。但是在所有的西欧国家，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这些革命将群众卷进了漩涡，产生了各种党派，造成了种种幻想并使之破灭，这样就积累了政治经验。尽管1848年德国革命的实际成果是如此贫乏，但它在制造六十年代普鲁士宪制冲突的同时毕竟为拉萨尔的活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拉萨尔和李卜克内西都是从1848年的学校中出来的。

但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在很多方面要更加困难和更加复杂。它在这里不是在一次民族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出现的，而是

在关于未来革命的原始的思想观点(“民粹派”、“民意党”思潮)破灭之后出现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治自决的武器，而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缺乏任何自觉的群众斗争传统的、政治上不开展的环境中预先确定社会方向的武器。

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完全被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所掌握，是西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全面瓦解的时代中俄国无产阶级巨大革命作用的结果。和历史上初试身手的无产阶级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优越性是，拥有较多的政治知识，与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物质上的联系。这种优越性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当他们加入工人政党的时候，他们给党带来了自己的全部社会特性：宗派主义情绪，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拜物教；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他们的这些特性。因此，俄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工具，用它来使任何一种片面性发展到极端。谁要想懂得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他就不能忽视革命前和革命期间我党领导组织的社会成份。

如上所述，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内的分裂和意见分歧是由于社会革命阶级适应议会主义、工会斗争等等有限的条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造成的。但是由迄今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所引起的派别首先是由于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而产生的。这个适应过程的实际政治内容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是这样有限，而这个适应过程的形式是这样不可抑制，所投射的思想阴影又是这样巨大。

## 二

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所带来的每一种新的需要，都造成一

个独特的派别，它是满足这种新的需要的工具，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适应工人运动进程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派别又都创立它自己的关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哲学。“经济主义”是在工业高涨时期必然出现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任务是彻底地，或者尽可能地把政治从运动中排除出去。后来，经济危机开始了，国内政治生活活跃起来了，“政治派”才趁机完全排斥了“经济派”（唯工会主义者）。紧接着，政治派自己又分成了两派，即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裂的原因是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不同，实质上是党组织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

尽管这两派一开始就斗争得很激烈，然而两派之间实质上的差别最初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这时革命爆发了并且展示了它的重大问题。革命利用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现成的组织形式，迫使两派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运动的各种迫切需要服务。这时，政治历史是以月计算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自极其迅速地制定了不同的革命观点和不同的策略。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持其他思想的知识分子之间剧烈地展开了影响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各派之间也进行着斗争，这个斗争包含了一旦条件具备，就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从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解放出来的萌芽。

布尔什维克把初期的、原始的党组织提到原则的高度，并且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最适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同时又具有革命情绪。

与此相反，孟什维克极其激烈地批评党的两层结构，揭露知识分子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资产阶级雅各宾主义本质，并且说，这是在不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掩盖下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孟什维克的激进一翼终于产生了勇敢地自我否定的思想，要求原有的党消融于群众之中。然而，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在孟什

维克越来越明确地提出这一自我否定的思想时，它自己却完全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组成一个严密的派别来作为与布尔什维克相抗衡的力量，这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组织，它在一般地反对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口号下，实际上为争取自己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而进行着斗争——正象那些超群的个人主义者为了共同地孤芳自赏而建立起会员众多的协会一样。知识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领导作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独立的前提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向群众提出了革命的口号，满足了群众的建立强大革命组织的基本需要，所以这些群众就以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转移，时而拥护布尔什维克，时而拥护孟什维克。群众从两派中都取得对自己的阶级斗争有利的东西，因而在一个时期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两派都深深地扎根于无产阶级之中。

### 三

1908年至1909年间，党不断遭到瓦解，其原因是：第一、反革命时期的环境和情绪；第二、原有的党组织的形式与工人运动的已经变化了的需要之间普遍的不相适应。

工人们由于巨大的希望遭到破灭而变得麻木不仁，受到反革命残酷打击的镇压，被十年的经济危机弄得贫困不堪，因而大批地离开了党。这是对过去年代全力以赴的高度紧张状态的自然的反动。这个过程是自发地按照它本身的必然性而完成的，思想上几乎没有反应。最落后的、但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工人暂时地跑到黑帮那边。另外一小部分加入秘密教派。个别头脑发热的人脱离群众，单独或成群地进行反对警察的游击战，或者冒险去搞毫无意义



的剥夺，结果丢了自己的性命。另一些人企图脱离自己的阶级，闭门读书，演算代数，准备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但是，大批工人却是处于完全消极状态，沉湎于赌博、酗酒以及各种放荡生活。只有觉悟较高、性格坚强的工人才竭力团结在工会、教育协会等等组织之内。

那个时期，民主派报刊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疯狂攻击。这个党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曾经为“有教养的社会”开辟了通向“人民”的道路，现在却受到谴责，说它在有教养者和人民之间造成了不和。这个党只不过把革命的客观趋势用政治口号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因为对立加剧了，它自然受到谴责，说它不知分寸和缺乏责任感。社会民主党走在革命的前列，正因为如此，革命失败的记事就成了对社会民主党的起诉书。革命所引起的阶级对立的加剧，归根到底只会对社会民主党有利，但最初却使它受到某些沉重的打击。那些半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昨天还作为一群坚定的同情者和同路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今天摇身一变，回到了哺育他们的母亲即资产阶级的怀抱。这种转变阵线的思想形式与其说是有教益的，不如说是可笑的：工团主义、神秘主义、两性关系上的混乱状态、约翰福音、万达·扎赫尔-马佐赫的《回忆录》，所有这一切都被动用起来对付社会主义的诱惑。

党的最优秀分子，1905年的领导人那个时期分散在狱中、流放地和国外。秘密组织中残存的知识分子完全不知所措了。政治前景日益暗淡。下面群众离去了，上面从前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队伍中涌向这个党的财源枯竭了。党的组织陷入了死胡同。它的成员面临着为生存而斗争的一些平凡问题。不久前无非是党的抽象的范畴的体现者的职业革命家、宣传鼓动家、组织者、秘密书刊的传递人等，以及禁欲主义者、策划密谋的幕后人、除需要假身份证而无其他需要的人，所有这些人在反革命的气氛下很快就物质化

了，并且完全世俗化了。在他们那里，突然出现了最合法的需要：家庭、妻子、孩子、襁褓和喂小孩的牛奶。他们飞速地同过去的地下状态一刀两断，或者回到大学，或者穿上律师的燕尾服，或者当了店员和企业主联合会的秘书，或者占据资产阶级报刊编辑部的位

置。一部分老的党内知识分子顺着阻力最小的路线，把他们的活动交给合法的工会去进行，工会同党组织不一样，还得到自由资产阶级的关怀。还有可能在工人俱乐部中进行活动，而不致同警察或工人阶级的自由派朋友发生冲突。但是，为了保证这一活动的可能性，似乎必须保护工会，使它们不致因为与党的关系而信誉受损。于是很快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社会民主党人。

在这种混乱和低潮的气氛中，孟什维克通过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所作的批评在知识分子本身那里引起了强烈反响。政党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东西，现在被说成是阻碍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灾难。知识分子根据这一哲学而脱党，现在可以说不再是一种背叛，而是一种政治义务。

因此，在我们党的术语中所说的“取消主义”（“取消”党组织的愿望）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它首先包括政治背叛的理论及其实践上的结论即“打倒党！”。其次，它包括对合法活动阵地的渴望，这种渴望甚至发展到准备牺牲纲领和策略的革命精神。最后，它包括——并且是其他一切情况的原因——群众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这种态度是巨大失败的直接后果。

同孟什维主义的瓦解相平行，布尔什维克派也在瓦解，这样就保持了发展的对称性。为了在群众运动低潮时期不失去对工人阶级积极分子的影响，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名义批准了抢劫战、剥夺等策略，其实这种策略只不过是用无政府主义

来消除革命心理状态的表现。在这个基础上，革命以前时期党所固有的、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派所固有的密谋倾向充分发展了。背着党做了一些与群众政治生活毫无关系的事，这些事情就其全部实质来说也是无法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的。冒险分子钻进了党组织。责任重大的党内职务往往交付给一些在一个与党的运动无关的领域内显示出组织才能的人物。对于任何工人组织的独立性，碰一碰“好运气”的英雄行为，对“二等”党员保守秘密的冒险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在助长放荡的个人主义，助长对党章和党纪的“成规”的蔑视，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在本质上完全与工人民主气氛格格不入和敌对的政治心理状态。当孟什维克批判主义的哈姆雷特<sup>63</sup>迫于政治发展的矛盾而以其取消主义的“死亡！”来回答党的存亡问题时，主张权威的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在自我保存的本能的压力下力图使党离开阶级，使派别离开党，使派别的核心离开它的外围，而他们按照命定的必然性做到了把他们的全部政治实践纳入施泰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这一公式。

群众风潮的浪头愈低落，布尔什维克队伍的组织由于知识分子的坚决离去而瓦解得愈厉害，布尔什维克中某些分子对本派之外存在的一切的不信任就愈严重，企图通过“以党的名义”发出指示、训令、最后通牒式要求来使工人组织保持服从的倾向就表现得愈明显。

这些分子，即所谓最后通牒派<sup>64</sup>只知道用一种方法来使杜马党团或工人合法组织接受党的影响：以同它们断绝关系相威胁。这种抵制主义倾向贯穿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抵制工会、抵制国家杜马、抵制地方自治机关等等——它是害怕“淹没”在群众之中的宗派心理的产物，是“不调和的弃权的激进主义！”这种倾向在第三届杜马时期加强了，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形成一个特殊派别，这个派别本身又表现出各种不同色彩：从完全地、带有无政府

主义色彩地拒绝任何议会活动到以某种蔑视的、无所谓的态度容许这样的活动。

在我们党的语言中被称为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sup>①</sup>的那些相类似的派别的因素和组成部分是：革命感情对于斯托雷平法制压迫的直接抗议（人们在急风暴雨时期之后曾经不得不对这种压迫屈服）；政治上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认为，不可能把反对六月十六日政制的革命斗争同在六月十六日议会中的活动结合起来；象迷信一样地深信，由于坚决拒绝合法斗争的可能性，结果革命情绪必然会重新高涨；最后（这是一切其他情况的原因）工人的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使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团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和软弱无力，也使一切公开的工人组织的情绪低落。

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却不屈服于最后通牒主义。相反，它坚决地，或者更正确地说，激烈地反对最后通牒主义。同时，孟什维主义与取消主义发生了冲突。对严密的党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策略上的混乱，每当阶级的情绪发生变化时胆怯地对这种情绪屈服，——所有这些特点取消主义都具备了，这就使孟什维主义的一切革命分子可以自由选择道路。这一过程的后果是两个旧的派别接近起来；当然，它们最初接近时还是互相很不信任的，手里还拿着枪。

## 四

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问题上的分歧和孟什维克在对党的态

---

① 召回主义坚持主张召回杜马党团，或者使之拒绝接受委托书。——托洛茨基注

度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方面有可能达成统一的心理上的必要条件，而且因为党的派别分裂再继续下去就会使派别斗争的进行显得极端荒谬，所以统一已经是可能的了。但是，新的派别在旧的派别中的形成过程，本身只不过意味着党进一步走上瓦解的道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是下面这两种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现象：工人运动的形式与方法的多样化和从先进的工人队伍中产生的新型政党。这两种现象都是革命的直接遗产。

我们在革命以前曾见到，在秘密的党的小组的组织专政的领导下，爆发过一些没有确定形式的偶然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在革命以后，我们在群众当中看到一个虽然缓慢、却是不停顿的定形过程。各种各样的非党工人组织成立起来，它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工人在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和禁酒协会等领域走上了有计划地进行斗争的道路，并且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协会网。党不能从外面来领导这些团体，因为党会使它的一般纲领性要求与这些团体的细小工作对立起来。党首先必须学会通过日常实践来迂回曲折地实现这些要求。在新的活动条件下，党不能停留为一种理论上志同道合者的与世隔绝的团体，即一个站在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之上的指挥部。党本身必须成为阶级的核心，必须转变成这样一个群众性组织，它的触角深入到无产阶级各个团体，并从内部来领导它们。对于这种工作，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由于它们从前那种思想方式和组织结构，是完全不能胜任的。这两派作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上一致的单纯的同志团体，在议会、市政机关和工会的实践领域既无明确观点，又无经验和相应的组织。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部门总是在个别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者组成小组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两派范围以外进行的，并没有受到它们的组织影响。

孟什维克首先积极参加了公开活动（所有三届杜马的社会民

主党党团、工会机关报刊编辑部、工人俱乐部理事会等主要是由孟什维克组成的)。但是,孟什维克派开除了在工会和俱乐部等等积极活动的各个小组,于是它便自行瓦解了。非党的工人组织陷于孤立:它们虽然在党的队伍中找到了领导者,但是没有得到党的领导。缺乏一个统一的策略。甚至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极其重要的合法组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也是在完全不受孟什维克派的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它们经常得到个别老练的然而大都处于派别之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但是,在党的个别组织看到自己面临全部阶级任务(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杜马中的社会立法问题、工人代表在各种会议上与资产阶级政客的冲突等)的一切地方,缺少一个协调一致的党的领导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在孟什维克本身的队伍中,对党的需要产生了。

当分散的孟什维克集团的合法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则在全力保卫党的秘密机构,以防反动派的打击,他们重新恢复了国外的出版活动,并且召开了一次党的全俄代表会议。初看起来,似乎两派找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活动领域,从而使分裂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但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直接着手党的统一。

布尔什维克在各种非法组织中感到日益孤立。派别当中最独立的无产阶级分子都追随工会和俱乐部等等中的孟什维克。革命时期曾经使党的规模一下子大大扩大起来,却在非法的秘密活动领域留下一个可怕的遗产——人数众多的奸细。群众的情绪越受压抑,加入党组织的新成员越少,这些奸细的破坏作用就越大。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出色的鼓动。在非法的秘密组织的四周完全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条件下,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所有积极分子来说,显然必须把地下活动领域和公开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把公开的工人组织统一起来,把新的血液输入到秘密组织中去。如果从旧的党

组织范围内来考虑，这项任务首先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策略上的协调，以共同改进党的工作和改组党的机构。

过去的发展已经为这种新的机构准备了一批新的人员。

在革命以前，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完全把先进工人排挤在后面。先进工人不仅处于一个制定理论公式和政治口号的相当小的实验室之外，而且完全处于任何组织之外。他们现成地从一个站在他们之上的党那里接受这些口号和公式。

革命行动的要求造成了一些拥有几十万工人的强大组织。这是俄国第一个严肃的工人民主学校。但是这些革命组织不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不仅在形式上是如此，甚至在下述意义上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政治口号是由党、由党的总司令部提出的，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只是传播和实现这些口号的机构。党对工人群众来说现在也是不言而喻的事物，一开始就是，而且永远是既定的事物，但它是站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工人就是抱着这种对党的看法在1906—1907年参加公开组织的。他们有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觉悟，党的感觉在他们身上已经根深蒂固，并且由于社会民主党工人自然会成为工会和俱乐部内最有威信的成员，因此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足够保证。他们是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后来，在1909年，当党几乎已不再对工人起领导作用，而工人感到要依靠他们自身的孤立的力量时候，工人才突然地——而且这一次也是完全彻底地——认识到必须通过党统一起来。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不再是那种浮在群众之上的职业革命家；他现在是一个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的以钳工或纺织工为职业的人。这个钳工或纺织工在革命以前就常常处在党及其各派的影响之下，但是，他从党及其各派中接受的只是那些符合无产阶级运动要求的東西。他经历了革命这所政治学校，在公开的组织中掌握了阶级自治的必要方法，并

且通过斗争进程本身认识到，必须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把利用杜马讲坛和利用革命传单结合起来。然而，分裂成派别是妨碍党的重建的，所以他不能去赞扬派别。他需要一个统一的有活动能力的党。

一年半以前创办的工人报纸《真理报》置身于两派之外，并力图表现这种正在出现的统一党的趋势，它所看到的正是这一新的党的因素。《真理报》从创办时起就给自己规定了如下任务：阐明斗争的迫切需要，同不管处在何种岗位上的先进工人建立起政治联系，从而促进克服党分裂成派别的现象。

## 五

派别斗争的方法——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论战、用相互对立的实践口号向群众发出号召、相互抵制——所有这些，其实质都是要消灭党内的对手。每一个派别都把其他派别看作是异端的化身而设想未来的党是单单由它一派组成的。如果布尔什维克战胜孟什维克，或者是孟什维克战胜布尔什维克，——正如当年“政治派”战胜“经济派”一样——那么这种结局就历史地证明这种斗争方式是正确的。因为能取得胜利的那种方法就是好的方法，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但是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经过七年旨在直接消灭对手的斗争，两个派别都认为非签订某种协议不可。这就意味着他们中间没有一方是无产阶级运动一切方面的体现者，而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联合——克服极端性——社会民主党才能得到发展。这一结论是从协议这一事实本身得出的。

这种协议的内容如下：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全部转移到俄国；侨居国外的人只可能保持思想影响。大力促进党内各派



别在组织上和财政上瓦解。改组中央机关报，使党内各种思潮获得较大的自由，从而使各派别的机关报成为多余的东西。在《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最后，决定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合法工人组织应当有大批代表。

联合的基本文件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活动任务的策略决议。这一决议宣告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基础无论在革命高潮时期还是在和平的“有组织的”发展时期始终是一样的，这样，决议便彻底地消除了两个派别的策略哲学，并引导两派走上了发展党的广阔道路。

第三届杜马是遮盖旧的野蛮的沙皇制度的拙劣的议会制装饰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拙劣的装饰品不是简单的政治手腕和偶然的东<sub>西</sub>，它说明了沙皇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适应过程的特点。这一适应过程将前进多远，或换句话说，在这条道路上积累起来的革命矛盾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关于这一问题，党作为一个政党拒绝作出预言。但是它认为，必须利用第三届杜马和与之相联系的合法团体的各种形式——结社法、合法报刊等等，以加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把它在中立的工会和在杜马中的全部组织的活动统一起来的政治整体，不能不保持非法的状态。我们的决议把合法的和非法的活动方式的有计划<sub>的</sub>结合（这会使德国同志想起他们在反社会党人法<sup>65</sup>时期的特殊策略）提到首位。无论是以有组织的党在斯托雷平法制的俄国没有存在的余地为理由而主张取消它，还是以貌似革命的态度轻视杜马讲坛和其他合法活动的可能性，这两种极端都同样地被通过的决议排除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既不限于街垒，也不限于消费合作社的柜台。它利用一切活动形式和方法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团结成一个独立的组织。这是唯一的真正革命工作，并且只有这一工作才能够使党一劳永逸地消

除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宗派。

但是最近的将来怎么办呢？中央委员会里的各派代表缔结的协议本身是否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呢？又是又不是。假如协议归根到底只是各个具有影响的党内小团体的代表之间缔结的个人协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这样了），那么这一协议便是以个别人物的善良意愿和政治洞察力这些不可靠的因素为转移的。心理状态一般说来是历史发展中的保守因素，而个别集团、派别的心理状态则比任何其他心理状态更加保守。

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在目前俄国缺乏广泛的工人运动的情况下，派别活动的过去还是会不止一次地引人注意的，并且完全可能会有人企图利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巩固旧的正在瓦解的派别或者建立新的派别。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甚至因为派别争吵的旧病复发和再一次出现而陷于绝望和束手无策。迫使一切集团高喊党的统一的词句的那些趋势正在加强，这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独立性的加强一样，都是以不可战胜的力量进行的。再也没有一个派别能违背有觉悟的工人阶层的意志而取得群众的拥护。

写于 1910 年 9 月。译自《新时代》杂志第 28 年卷（1910 年 4—9 月）第 2 卷第 50 期第 860—871 页。

## 致尼·谢·齐赫泽

### ·编者按语·

为了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12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同年8月，托洛茨基纠集了被开除的取消派、召回派等机会主义派别集团，组成了臭名昭著的“八月联盟”。他们“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一唱一和、异口同声”地大骂布尔什维克是“篡夺者”、搞“政变”，演出了一场反列宁主义的大合唱。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八月联盟原来是一个空中楼阁”，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列宁全集》第20卷第338页）。

在导演反布尔什维克党的丑剧时，托洛茨基故伎重演，打着“非派别性”、“团结联合”的旗号，私下里却给齐赫泽和乌里茨基写信，完全撕下了他的“不偏不倚”的假面具，对列宁、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恶毒的攻击，甚至无耻地谩骂，而对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齐赫泽之流和取消派报纸《光线报》则竭尽吹捧之能事。托洛茨基所干的完全是“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1913年4月1日

亲爱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首先，我要向您致谢，因为您的

一些演说，尤其是您关于流氓行为的最后一篇演说不仅使我得到政治上的满足，而且也使我得到美学上的满足。的确，一般地应该说：读读我们议员的发言、工人致《光线报》<sup>66</sup>编辑部的信件，或者记录记录工人运动的事实，心情总是高兴的。无聊争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经常掀起无聊的争吵，是一种毫无意思的煽动勾当。任何一个智力未受损害的欧洲社会主义者都不会相信，列宁在克拉科夫制造的那些所谓意见分歧可能造成分裂。

列宁的“成功”本身，无论这是怎样一种障碍，都不会使我感到更多的忧虑。现在不是1903年，也不是1908年。列宁用从考茨基和蔡特金那里挪来的“来历不明的金钱”<sup>67</sup>办了一个机关报，给它挂了一块通俗报纸的招牌，打出了一面“统一”和“非官方”的旗帜，招徕了许多工人读者，这些读者一见出版了工人日报，自然就认为是自己的一个巨大收获。而后来，当报纸站住了脚，列宁就把它变成小集团阴谋活动和无原则分裂行为的堡垒。但是，工人自发要求统一的情绪是势不可挡的，于是列宁不得不经常同读者玩捉迷藏的游戏，一面高唱自下而上的统一，一面推行自上而下的分裂，用小集团的和派别的定义来解释阶级斗争的概念。总而言之，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使自己分化的毒素。无庸怀疑，只要另一方措置得当，不久的将来列宁分子正是会在统一还是分裂这个问题上开始激烈的分化。

但是我重说一遍：这要以另一方措置得当为条件。如果列宁主义本身不使人担忧，那么应当承认，我丝毫不相信我们的取消派朋友不会帮助列宁重整旗鼓，卷土再来。

现在可以有两个政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破坏各种过时的派别隔阂，而这就意味着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本身，因为列宁主义同工人的党的和政治的组织是势不两立的，然而却会在划分派别这

种粪便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或者相反，通过细心培植策略分歧的办法，对反列宁派的人（孟什维克或取消派）进行派别网罗。一部分孟什维克分子——最保守的——正是倾向于这第二个政策。依我看来，主要的忧虑也就在这里。

就我所了解的杜马党团的大多数成员的情绪来说，我觉得他们对党的发展现在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但是我以为，这些成员对于如何使党了解他们对党内危机的看法的工作却做得太少了。党团的相应的行动（决定双方机关报进行合作等等）是很重要的，但毕竟是临时性的。《真理报》在党团的周围制造了一团混乱，在这种局面下，对于（党团的）广大人士说来，真相消失了……它应当以坚决的、权威的形式宣布，它将一如既往，捍卫既定的内部的任务（这首先就是统一），而且绝不打算作为小集团进行实验的消极材料。如果党团发表这样的宣言，就会得到广大工人最热烈的响应，并且立刻会使党团成为社会民主党一切进步分子和积极分子的核心。但是具有主要意义的是另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即警惕地监督《光线报》。《光线报》在最近两三个月的作风正象波兰人那种小题大做和吹毛求疵的作风，热中于形式上保卫纲领，而不是努力在政治上运用它；用八月代表会议的威信来保护过去的全部取消主义，甚至把《光线报》和大多数杜马党团成员同取消派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大大便利了列宁在破坏党和瓦解党团方面的活动（最近时期以来《光线报》大有改进）。这样一来，就在把党团大多数成员和《光线报》当作旗帜的工人的思想上造成了许多混乱。这种混乱不仅笼罩着报纸，而且也笼罩着党团，因为工人不知道编辑部，他们只知道报纸由八个代表负责，这些代表曾经宣布自己同《光线报》的纲领是一致的。只要考察一下上述一切，就一定会这样说：在社会民主党建设事业中要取得任何成就，现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杜马党团大多数人的更积极的“内部”政策。所谓积极的意思并非去

干预那些无谓的争吵(上帝饶恕吧),而是:一、坚决提出自己的“旅行指南”——例如用宣言的形式发表在《光线报》上,二、警惕地监督《光线报》,以便彻底清除那个应当成为党团机关报的机关报上的“隔代遗传的”策略方法,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明后天会有新的“变卦”。这种变卦对列宁来说是救星,而对我们大家来说则是煞星。

还有,党团也可以利用德国人在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上的主动性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如果您个人可能在复活节到柏林来,这的确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对高加索社会民主党)。

祝您一帆风顺,并热烈地握您的手。

列·托洛茨基

通信处:维也纳,25—II, 罗得列尔加塞XIX, 列·勃朗施坦收。

译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94—296页。

## 致莫·索·乌里茨基(摘录)

1915年

……我很想请您就下面的问题给罗兰-霍尔斯特写封信。一个多月以前,拉狄克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与罗兰-霍尔斯特和潘涅库克领导的杂志合作。这个杂志本应包括“中派”和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sup>68</sup>中极端主义的左翼(即马尔托夫否定其存在的那两个集团),而马尔托夫现在所代表的那个集团不在其内。在原则上我自然接受了建议,并且向罗兰-霍尔斯特作了必要的查询。我自己是这样设想的:罗兰-霍尔斯特是自己在编辑部中的代表,在她的周围有一大批撰稿人,他们整个说来都是志同道合者:《我们的言论报》<sup>64</sup>集团、国际派<sup>69</sup>集团中的德国人、某些法国人、拉柯夫斯基等等。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保证他们在合办的杂志中占必要的地位,极端主义者在这里的代表将是潘涅库克。根据杂志的宪章,两个编辑中间只要一人赞成,文章就可以刊登。

但是,结果杂志却被迁往瑞士出版,而且选定拉狄克为秘书,他在这一年完成了从粉红色国际主义向列宁派的极端主义的演变。在这种情况下,罗兰-霍尔斯特和潘涅库克这两个编辑就形同虚设,实际上列宁却掌握了编辑的实权。这样一来杂志就只会是《共产党人》<sup>70</sup>的德文版。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同这种杂志合作无异于替它的狭隘的小集团性质打掩护,成为诱骗个别国际主义者上圈套的钓饵。所以,梅尔黑姆无论如何也不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清一色的列宁派刊物,但是却同意跟合办的机关报合作。罗兰-

霍尔斯特用自己白璧无瑕的名字替列宁作了一扇屏风，不言而喻，她对将在伯尔尼出版的杂志是不会有影响的。另外还需要提一下拉狄克这个人，许多德国同志，包括国际主义者在内，都对他采取了极端否定的态度。作为合作者，虽说也是亲密的合作者，但这是一方面。而作为编辑部的秘书则……在德国，最靠拢杂志的无疑是博尔夏特，但德国代表团一致拒绝把他算作自己的成员，他在代表会议上炫耀过自以为了不起的愚蠢。参加这样一伙无异于自败名声。罗兰-霍尔斯特对新杂志预示给她的那些远景没有认识。但是我们俄国人可以告诉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杂志将在荷兰出版，真正由罗兰-霍尔斯特和潘涅库克主编，那时我们大家、《我们的言论报》派，都会全力支持刊物，在这种场合下，梅尔黑姆、莫纳特、罗斯梅等人就会对出版刊物保证给予合作。或者是杂志仍旧在瑞士出版，这样就得保证它在瑞士有一个能够取得完全信任和保证它具有真正联合性质的秘书处或编辑部。请您写信把这一点告诉罗兰-霍尔斯特。她最害怕被极端主义者孤立，说什么这些极端主义者最热衷于走极端，把我们交给机会主义者去任意宰割。在这件事情上荷兰的条件给她的印象太深了。对俄国来说，也存在这样的条件。但是如果您用德文出版国际的机关报，那么我们应当注意的首先就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和英国。德国的极端主义者微不足道。然而列宁的杂志所依靠的正是他们。在法国和英国，列宁根本没有志同道合者。如果罗兰-霍尔斯特不惜以任何让步为代价，硬是不愿“脱离”列宁分子，那么就可能使得她脱离自己在俄国、德国、英国和其他各国的真正的同志和朋友。如果她在民族的荷兰的条件影响下采取了特别有损于她的国际政治行动的立场，那就会犯巨大的错误。费心请把这一点写信告诉她。您可以引用我这封信的某些部分。



我们至今没有从她那里收到过任何文章。但是如果她能就一些迫切问题写点东西,那是无任欢迎的。

紧紧地握您的手,并祝万事如意。

您的 托洛茨基

译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  
莫斯科俄文版第297—298页。

## 我们斗争的任务和方法(摘录)

### · 编者按语 ·

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从战争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工人掉转枪口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大多数倒向资产阶级,号召工人去保卫“祖国”,堕入了社会沙文主义泥坑。托洛茨基则采取所谓“非派别性”的中派立场,提出“不胜不败”的口号,实际上完全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正如列宁指出的,托洛茨基“原则上对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点也不赞同,但是实际上对他们的一切都赞同”(《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2页)。

这篇文章是1915年5月写的,曾发表在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报》上。托洛茨基在文章中,一方面高喊国际主义,另一方面鼓吹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无条件地统一,攻击布尔什维克坚决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划清界限的立场,说什么“划清界限的口号”就意味着同“无产阶级群众隔离开来”,是一个“自我孤立的口号”,在目前时期,分裂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不适宜的”。

列宁曾尖锐地指出,托洛茨基是危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在理论上用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在实践上则在机会主义面前卑躬屈膝，或者表现软弱无力（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1页）。

### 三 分裂和统一

在老的社会主义政党内，国际主义者处于少数，在俄国，则明显地处于多数。无论在那里或在这里，他们为了摆脱旧的派别集团或力图掌握这些派别集团的形式，都同社会爱国主义派别的分子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状态。如果在平常时期，即在社会生活发生缓慢的分子变化的时期，对时代的不同评价和不同预测所产生的政治分歧，会由于以下的情况而得到缓和：双方都维护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以等待时机而使自己的分歧接受未来事变的检验。而现在，在战争的条件下，各个国家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每天都有数千万卢布被吞没，人类被拖进贫困和野蛮的深渊，在这种条件下，在对待战争的态度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矛盾——赞成或者反对，肯定或者否定——必然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不容许长时间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拐弯抹角的解决办法，因此注定要把对立的双方推到两个根本无法调和的阵营里去。

当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集团——民族改良主义集团和革命国际主义者集团充分发展和壮大以后，它们之间今后的组织政治关系将会怎样呢？国际主义者当前为了争取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优势和统治而进行斗争的组织方法又应当怎样呢？这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绝不相同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的不容争辩的目标，就是要使国际摆脱社会民族主义，就是要创造条件，使革命社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不会受到民族主义多数的压制，而且不会受到那种珍惜同

资产阶级民族的联系甚于珍惜无产阶级组织纪律的反对派的麻痹。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

主要是同组织委员会<sup>71</sup>有联系的那些人，过去和现在都指责我们报纸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在整個国际内执行分裂主义的路线。另一方面，聚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sup>72</sup>周围的同志们则指责《我们的言论报》<sup>34</sup>采取所谓“模棱两可”的态度，不愿意从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思想政治斗争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倾向于组织分裂的结论。这两种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摒弃一切过早的、人为的分裂尝试，即对群众来说不是从他们自己的政治行动中必然产生的分裂的尝试（在这方面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存在着意见分歧），同时我们（在这一方面同我们另一个阵营的批评家们也有深刻的区别）决不认为我们国际主义的批评和鼓动的坚决性、充分性和不调和性的问题可以服从于担心会从这种工作中产生组织分裂的情绪。

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在整个国际中都有政党和派别这些旧的组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它们的统一现在正经受着历史的考验。现在就已可以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大批社会主义活动家干部正在从工人运动中永远消失：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机构结合在一起的那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简直会成为废物，另一部分人将被事变的逻辑抛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阵营。其次很有可能的是，如果说基督教工会、自由工会甚至黄色工会都搜罗到一定数量的工人，那么在无产阶级的某些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中，或者在其思想最落后的阶层中，现在也会有一些人由于自己同资产阶级国家或爱国主义思想有联系而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不经过内部的组织震动而进入新的历史时代，这将会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使整个工人阶级毫无痛苦地觉醒的奇迹，使休特古姆之流和帕尔乌

斯之流在政治上全部复活的奇迹。但奇迹是不会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严肃的政治活动家——不仅是左翼的，而且还有右翼的，都把分裂看作最可能的前途。至少就左翼而言，的确是看作前途，而不是看作口号。德国的国际主义者并没有想把分裂当作他们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政治工作的先决原则。相反地，从留有李卜克内西的国会党团和留有克拉拉·蔡特金的监察委员会，直到任何一个选区的工会，他们都竭尽全力争取留在旧组织的范围之内。为了什么呢？为了夺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的机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投票反对拨款的李卜克内西并没有退出国会党团，而是留在党团之内，以便促使吕勒投票反对预算，并以自己的行动使三十来个不大坚决的议员便于至少做到在表决时弃权。莫纳特当时退出了法国工会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勇敢的宣言，这是战争时期法国的第一个严肃的国际主义文件。但是五金工人联合会书记和莫纳特的志同道合者梅尔黑姆却继续留在联合委员会内，那里现在有八个工会支持他。不仅如此，莫纳特所代表的最强大的外省组织——罗纳省工会联合会完全赞同他的宣言，但是劝他回到联合委员会，以便坚持贯彻自己的观点。不言而喻，走上国际主义道路的上维埃纳联合会根本没有想到退出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从战争一开始就激烈地反对工党的爱国主义政策，但是不认为在组织上退出工党是适当的，尽管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组织机构。

因此，关于组织上划清界限的问题，最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原则教条，而不管国际主义派赖以吸取养料的唯一来源的工人群众组织的内部生活状况如何。现在，当广大工人群众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组织屈从参战国的后果时，现在，当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在新的基础上只取得了初步的重大成果时，在组织上划清界限的口号就意味着仅仅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为数不多

的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组织上同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隔离开来。这是一个自我孤立的口号。如果阶级组织的统一不是什么绝对的原则，那么它也决不是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形式。统一的原则表达了被压迫阶级团结自己力量的深切要求，即使这种要求是建立在反击阶级敌人的最起码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以往的全部经验和阐述这一斗争的全部宣传工作，使无产阶级习惯于这一原则。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会把无产阶级的这种思想状态看作是小事或有害的累赘。今后我们还将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建设。因此，国际主义者必须把在政治上争取这些组织而不是把分裂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目标。既然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斗争造成同他们在组织上的分裂，那么这种分裂首先应当让工人群众看清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结论，是局势的唯一出路；其次，在群众的认识中分裂的政治责任应当完全落在目前把无产阶级组织的纪律和统一的原则完全用来为我们的阶级敌人服务的那些人身上。

我们国际主义者现在处于少数，但我们坚信，给群众带来最严酷的考验和失望的局势的逻辑是有利于我们的，现在已经动摇的爱国主义的幻想，明天或后天将会烟消云散，而无产阶级的阶级不妥协性将更彻底地发扬起来。现在处于少数，——不仅在上层，而且可能在国际的工人群众组织中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我们的明天，正因为这样，不管危机多么悲惨，我们的工作仍充满着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乐观主义。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自我感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已不再珍惜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另一些人自己也为把自己的党拖进去的那个深渊所吓倒。在他们中间可能而且必然还会出现决定性的变动。正是由于自己的地位不稳定，国会党团才不敢开除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利用了国会党团的这种犹豫不决，自己作为批判、揭露和推动

的因素而留在它的队伍里，这是完全正确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处于多数，他们由于感到立足点正在脚下消失，因此在自我保全的斗争中明天会不得不实行分裂，以便为自己保持住那时在身边还剩下的东西。不过这就由他们那个正在走下坡路而不是走上坡路的缺乏胜利信心的派别去干吧。

我们坚决拒绝用某种最高的组织准则来对待一切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国际主义分子目前面临的巨大工作。我们使同社会爱国主义斗争的组织方法问题服从政治上是否适宜的考虑。我们深信，在目前时期，当国际主义者只能在旧的工人组织的范围内实施自己的纲领的时候，分裂在绝大多数场合下看来是不适宜的。

只有在一个基本条件下，即在不调和地同各种各样的社会爱国主义划清思想政治界限的条件下，这一总的组织方面的考虑才能起作用。如果李卜克内西由于害怕可能会被开除或考虑到党团关于它的内部纪律的决定，而仅仅限于默默无声地弃权，那么他要犯的政治错误无疑将会比他主动退出党团、放弃在党团内进行内部斗争的政治错误更大。对于我们来说，最高标准就是在工人阶级面前坚持和积极传播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的可能性。对这一政策在工人组织内部产生的组织上的后果，占少数的反对派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承担责任。我们现在不知道，也不能预先决定和预测什么时候以及究竟沿什么路线发生分裂。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权利由于害怕分裂或由于对纪律问题抱盲目崇拜的态度而削弱或缓和我们反对腐化无产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如果说国际主义者退出德国或法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是一种荒谬的行为，是从工人队伍中直接开小差，那么接受考茨基的建议，放弃凭借这些工人组织来在目前战争时期立即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最坚决、最不调和的斗争，简直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用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最后这一点上绝不会破例。因为，

如果不允许为了工人群众组织统一的原则而磨掉社会主义中新  
的、决定性的矛盾的锋芒,而与此同时,这一组织的整个历史命运  
又取决于问题的有利于这一方或另一方的解决,那么就更不允许  
为了保持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各派别集团的统一而模糊或掩饰  
使我们区别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那些问题。由阿克雪里罗得签署  
的国外书记处的声明说,《我们的曙光》杂志<sup>73</sup>的社会爱国主义立  
场似乎是不反对同沙皇制度进行革命斗争,我们根据上述观点认  
为,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极端有害  
的。有个集团越过组织委员会本身而给王德威尔得写过一封起了  
国际重要政治文件作用的信,对于组织委员会对这个集团应当采  
取什么样的组织措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不能怀疑  
的:对这个集团赞同普列汉诺夫和正是由于它自己“接受战争”而  
享有同工人阶级取得合法联系的垄断权的总立场作出辩护性的思  
想评价,只会使它便于在政治上进行瓦解工作,同时给那些真诚地  
力求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与组织委员会有联系的人和组织带来  
思想混乱。

当约诺夫同志想使恢复国际的斗争服从于“(各旧政党)不惜  
任何代价的统一”的原则时,他只不过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  
及其“不惜任何代价的分裂”的方式作了机械的补充而已。两者都  
把绝对的组织原则置于十分复杂多样的政治工作之上。我们不能  
同约诺夫同志一起闭眼不看下列事实:在最老的社会主义政党中  
多数不站在我们一边,而是站在社会爱国主义者一边,因此他们掌  
握着统一和组织纪律的钥匙。如果国际主义者,被驱逐的少数自  
愿不惜任何代价以纪律和统一的框框来限制自己,那么这样一来  
他们就会预先使自己的斗争的整个命运从属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  
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如果德国反对派出于党的统一的考虑而规避  
参加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会议和联合组织,那么这从它那一方



面来说就会是一种优柔寡断的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它参加了这种团结以后就宣布退出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那么这从它那一方面来说就会是一种无可辩白的轻举妄动的行为。

发表于1915年5月15日—6月6日。译自《战争与革命》1925年俄文版第2卷第89—96页。

## 民族和经济(摘录)

### ·编者按语·

这是发表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口头上“承认”民族自决，实际上却不主张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的分离而斗争。托洛茨基大肆宣传生产力同“民族框框”的矛盾，声称民族国家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现在是打碎它的时候了”，“要在作为世界组织中心的欧洲联邦的广阔舞台上组织经济”。所谓生产力同民族框框的矛盾是托洛茨基一贯用来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重要论据之一。

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曾谈到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指出从《民族和经济》一文可以看到“托洛茨基那套用惯了的折中主义：一方面，经济使各民族融合，另一方面，民族压迫又使各民族分离”，却“没有触及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接近实际的问题，即对于受‘我的’民族压迫的民族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托洛茨基之流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支持了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4页）。

## 二

目前的战争，从它所显露的发展趋势来看，威胁的不是民族本身，而是作为民族在历史上居住场所的国家。资本主义很少实现民族团结，正如很少实现民主一样。它造成了民族团结的需要，但是也产生了不容许实现这种需要的倾向。民族也是人类文化的强有力的和极其稳定的因素。民族正在经历的不仅是目前的战争，而且是资本主义本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摆脱了国家和经济的依赖性的民族，将在长时期内成为精神文化的极重要的发源地，因为民族掌握着这种文化的极重要的工具，即语言。国家则是另一回事。它是由于王朝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以及各种物质力量的暂时对比关系而形成的。国家比起民族来，是一种不稳定得多的历史发展因素。在过去的时代里，经济发展是在非常勉强地被称为“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通过国家机构剥削或者力图剥削其他民族的、几乎总是被分裂了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是在这个被称为祖国的国家中进行的。由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变得很狭小，这个国家就用兼并和附设殖民地而扩充起来。为了夺取殖民地，即为了蹂躏落后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构成了所谓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争夺殖民地的竞赛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一个国家的范围最后已经容纳不下生产力了。如果说现在的“民族”国家正处在危险中，那么这种危险是由于它的疆界同已经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而产生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是来自内部，来自经济发展本身，因为经济发展用世界大战的语言告诉我们，“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发展的障碍，现在

是打碎它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保卫祖国，即保卫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意识形态。既然社会爱国主义者把民族的命运（民族本身决不瘫痪经济发展，决不妨碍经济发展采取全欧洲的和世界的规模）同闭关自守的国家-军事组织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国际主义者就不得不起来反对民族的保守的“爱国主义的”卫士们，而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发展的历史权利。

资本主义力图把民族和经济都纳入国家的框子里。它建立了强有力的机构，这种机构在整整一个时代中成为民族和经济的发展舞台。但是无论民族和经济都陷于矛盾之中，它们既同国家发生矛盾，彼此之间也发生矛盾。对于经济来说，国家变得太狭小了。国家为了竭力扩张，就蹂躏民族。另一方面，经济拒绝使自己的力量和资源的自然运动服从于地球上民族集团的划分。国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组织，它一定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先进国家在消灭一切关税壁垒的基础上实行的广泛的民主联盟，必然会取代闭关自守的民族国家的地位。由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民族共同体，不但不会因此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各先进国家结成共和国联盟的基础上，才能臻于完善。作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使民族框子摆脱经济框子和经济框子摆脱民族框子。要在作为世界组织中心的欧洲联邦的广阔舞台上组织经济。政治形式只可能是共和国联盟，在这个联盟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范围内，每个民族都可以非常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力量。

同德国的以及其他的社会兼并分子相反，我们决不打算抛弃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相反地，我们认为，民族自决权最后付诸实现的时代快要来到了。另一方面，我们完全不是要把每个民族集团和小集团“拥有主权的”权利同经济的集中化需要对立起来。但是我们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使民族的和经济的这两种“自发势力”辩证地调和起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在我们看来，必

须以一切先进民族实行民主联盟的口号，即欧洲联邦的口号作为补充。

发表于1915年7月3、9日。译自《托洛茨基全集》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9卷第214—216页。

## 军事溃败和政治前途(摘录)

### · 编者按语 ·

这篇文章写于1915年9月,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机会主义派别纷纷破产,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政策,认为对俄国来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对人民害处最少的是使沙皇政府在军事上失败,因为这种失败将削弱沙皇制度,有利于工人阶级推翻沙皇政府,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和帝国主义战争。

托洛茨基则继续坚持其“不胜不败”的口号。他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失败主义立场是“拿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失败进行投机”,断言失败会“使整个社会生活,首先是使工人阶级组织涣散”,而革命从战争失败中获得的遗产只是“被战争破坏得混乱不堪的经济生活,是耗费一空的国家财政和困难重重的国际关系”,而失败却会“巩固对方的国家组织”,总之,本国政府失败对革命毫无“好处”。

托洛茨基的这种立场受到列宁的多次批驳。列宁指出,“战时的革命就是国内战争;一方面,政府在军事上失利(‘失败’),就容易使政府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另一方面,竭力实现这种转变而又不促使政府失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拒绝失败,就是把“革命性变成空话或伪

善”，使本国政府失败根本不存在什么巩固对方国家组织的问题。列宁尖锐地指出，所谓“不胜不败”的口号，只不过是“保卫祖国”口号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这正是把问题转移到政府间的战争方面……而不是转移到被压迫阶级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方面！”（《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4、256页）

## 二 失败和革命

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测验，它检验阶级社会物质基础的力量、各阶级之间物质联系的牢固程度、国家组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胜利——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显示一个国家制度的相对的牢固程度，提高它的威望，从而使它得到巩固。反之，失败损害国家组织的威信，从而使它受到削弱。

· 反革命势力已经获得胜利的俄国，将不可能胜利地发展帝国主义，它在战争中将会暴露出自己在社会和国家制度方面的一切弊病，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前都不曾怀疑过。而我们党是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们的革命的或改良的政治希望同沙皇制度在军事上的失利联系起来，虽然我们毫不怀疑，一旦爆发战争，失利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跟现在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诽谤者一样，认为一个革命的阶级盼望本国政府在军事上遭到破产是“道义上不能容许的”。这也不是出于盲目的民族和国家的本能（这种本能在俄国一些革命者当中具有能大大抵消对沙皇制度的仇恨的充分强大的力量）。最后，这也不是出于对战争必然带来的种种苦难的一般人道的考虑。数百年以至数千年来阶级社会的“正常”生活，都

是建筑在群众遭受最骇人听闻的苦难之上的，战争只不过是再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些苦难集中起来而已；如果战争是求得解放的一条最可靠的或最简捷的道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就会象外科医生下决心一样毫不犹豫地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当外科医生认为应当开刀时，他是不害怕痛苦和流血的。

如果说我们拒绝拿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失败进行投机，那么这并不是根据民族的理由，也不是根据人道的理由，而是根据国际以及国内方面的革命和政治上的理由。

既然失败——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会动摇某一种国家制度，那么由此方失败所决定的对方的胜利就会巩固对方的国家组织。而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欧洲的社会和国家机体，巩固这种机体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们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也不能让俄国担任这样一个被遴选国家的角色，即欧洲其他民族发展的利益都应服从它的利益。问题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现在未必需要更详细地来谈它。

但是即使不超出狭隘民族发展前景的范围，俄国社会民主党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计划同军事溃败的革命化影响联系起来。

只有当内部改革的必要性在社会内部根本找不到能够实现或者被迫实行这些改革的新的历史阶级时，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失败才是无可争辩和不可代替的发展动力。在这种条件下，溃败以后由上面实行的改良，就能够有力地推动进步的社会阶级的发展。可是战争是一个异常矛盾的、很能引起两种相反后果的历史发展的因素，以致认为自己是站在牢固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政党，也不能把失败的道路看作是自己获得政治胜利的道路。

失败使统治的反动派组织涣散和士气沮丧，同时，战争也使整个社会生活涣散，首先使工人阶级涣散。



其次，战争不是革命阶级能够加以控制的“辅助”因素：不可能在它提供了预期的革命推动力之后就随意把它取消，如同历史上完成了自己工作的摩尔人<sup>74</sup>那样。

最后，从失败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所获得的遗产，是被战争破坏得混乱不堪的经济生活，是耗费一空的国家和困难重重的国际关系。

如果说甚至在反革命势力大获全胜的暗无天日的年代里，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断然反对冒险主义的战争投机，那么这正是因为战争即使能够推动革命，它也会造成一种使得人们很难从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利用革命胜利的形势。

然而现在我们必须不仅估计到战争和失败会朝着什么方向影响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首先必须在失败所造成的那个基础上进行活动。因为，不管战事在将来发生什么样的波折，有一点可以十分肯定：要在短期内把自己的实力恢复和增加到这种程度，以致在这一次战争中就可以实现世界性成就的计划，那是根本谈不到的。沙皇的军队已被击溃。它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胜利。但是它打输了这场战争。目前的一些失败标志着军事溃败的开始。我们要再重复说一下：社会民主党无法任意给自己创造历史形势。它只是历史过程的各种力量中的一种力量。它只能站在历史为它所创造的基础上。

现在，在俄国的一切政党中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的一代，完全是以我国发展中最近十至十五年来经验教育出来的。仅仅由于这一点，在考虑军事溃败可能造成的国内后果时，就必然情不自禁地同1903至1905年间的事变进行类比。1903年，群众性罢工的狂浪震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把这些事变看作是革命的序幕。1904年1月，日俄战争爆发了。它立即使革命运动停止下来。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国家就象失去了知觉一样。战场上的失败灭了

政府政权的威风并使它受到削弱，同时有力地助长了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基础上，革命急剧地向前发展了。

在1912至1913年间，象在1903年一样，群众运动的增长主要又表现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罢工。这时，工人运动依靠着俄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内容最丰富的十年的经验，在更加高得多的水平上开展起来了。又如上次一样，战争爆发之后，立即就使革命运动的发展停止了。国内几乎是一片沉寂。政权在最初几次胜利、而且是极其有限的胜利之后，就神魂颠倒起来，采取了革命前俄国所没有见过的反动方针。但是“胜利”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使统治集团完全晕头转向了，使资产阶级地主联盟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愤懑情绪，这样一来，就为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根据过去十年的情况，可以设想，在有产阶级的“反政府”动员之后，民主派的、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动员一定会随之而来，其结果将是革命的震荡。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散布俄国失败会起拯救和解放作用这种希望的人，正是那些原来最殷切地盼望俄国胜利的人。英国的一位大臣劳合-乔治已经看到被溃败惊醒了的俄罗斯巨人在怎样扔掉反动派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王德威尔得在战争开始时曾劝说我们的杜马党团去相信将来俄国胜利的进步意义，现在却以权威的口吻滔滔不绝地大谈俄国失败的好处。爱尔威在写文章谈论痛苦遭遇的好处，说它是推动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最后，在俄国获胜的那几个月里按照“先胜利，后改革”这个公式进行推理的某些社会爱国主义的投敌分子，在华沙失守之后到处奔走呼吁大赦……。在这种明显的“失败主义”之中，当然没有任何革命性的成分。劳合-乔治也好，王德威尔得也好，爱尔威也好，他们无非都是希望军事失败会唤醒俄国统治阶级的“治国理智”。他们内心深处全都轻视俄国，在对俄国所持的态度上都是赤裸裸的失败主

义者，他们指望不用革命阶级的直接干预，军事破产会有一种独立的和自动的力量。而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对于俄国最近将来的命运具有中心意义的，正是关于战争和失败如何影响革命力量的觉醒、团结和积极性的问题。

从这种观点看来，必须首先说明，在战争对人民群众情绪的影响方面，如果把过去的经验简单地搬到当前的时代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前的溃败，按其规模之大来说，也就是按其对于国内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破坏作用来说，根本不能同日俄战争那一次殖民冒险相比拟。一方面，这当然一定会使现在的失败对人民群众的意识产生更加广泛和深刻得多的影响。在这里，社会民主党拥有进行革命鼓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种鼓动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明确，耗尽居民的经济和精神力量以及资源的军事溃败，只有达到某种限度才能引起积极的愤怒、抗议和革命行动。超过某种界限，耗费就会太大，以致摧残人们的精力和麻痹人们的意志。绝望、消沉和精神颓丧就会开始产生。失败和革命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性质的，而是辩证性质的。

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人希望俄国统治者会在失败的独立的力量下面发出自由主义的“智慧之光”，如果说这种希望散发出绝望的自由主义的庸俗气味，那么，另一方面，根据错误解释的“日俄”战争经验断言军事失败对群众会自动产生革命化的影响，则是一种幼稚的糊涂思想。正是这次战争的巨大规模，在它不定期地拖延下去的情况下，会在长时期内阻碍整个的社会发展，因而，首先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因此，必须为争取尽快地停止战争而斗争。接二连三的失败进一步发展下去，对革命并没有好处。相反地，争取和平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是革命的自我保全的信条。动员劳动者反对战争的工作开

展得愈强有力，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对失败的经验就会估计得愈充分，它就会愈快地变成革命运动的推动力。

发表于1915年8月26日，9月1、2日。译自  
《托洛茨基全集》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  
版第9卷第146—151页。

## 为政权而斗争<sup>①</sup>

### ·编者按语·

这是一篇表面上同孟什维克争论，实际上贩卖“不断革命”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并因此得出结论说：农民的革命作用一定会减少，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已“无济于事”；“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没有这样一支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起来同无产阶级并肩行动，无产阶级就只能单独作战，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工人政府”。

列宁在《论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文中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这些论调。列宁指出：“弄清楚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阶级对比，是革命政党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解决得不正确，他只是重复他那1905年的‘独创的’理论，而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列宁揭露说，“托洛茨基的独创的理论是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

---

① 原载1915年10月17日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报》<sup>34</sup>。我们现在把这篇属于稍后时期的文章重新发表出来，因为它对第一次革命（1905年）向第二次革命（1917年）过渡的条件作了扼要的说明。——托洛茨基注

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们的忙,这些政治家们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399页)

我们面前有一张论纲领和策略的传单,题目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致俄国同志们的一封信》。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巴·阿克雪里罗得、阿斯特罗夫、亚·马尔丁诺夫、尔·马尔托夫和谢·谢姆柯夫斯基。

这封“信”对革命问题作了极概括的叙述。当传单的作者们从说明战争造成的局势转而谈到政治前途和策略结论的时候,分析的明白性和准确性便消失了;连术语也变得模糊不清,社会的定义也变得含混了。

初看起来,在俄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流行着两种情绪,第一种情绪是关心国防(从罗曼诺夫到普列汉诺夫),第二种情绪是普遍的不满(从反政府的官僚分子的捣乱行为到街头爆发的叛乱)。这两种流行的情绪也造成一种关于将来人民革命的幻觉,以为这种革命会从国防事业中产生。但是这两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于“人民革命”问题的提法的含糊性,即使这个提法形式上是同“国防”事业对立的(象在马尔托夫等人那里一样)。

战争本身以及战争的失败,既没有引起革命的问题,也没有造成解决这个问题的革命力量。我们的历史完全不是从华沙向巴伐利亚大公投降开始的。无论革命的矛盾或者各种社会力量,仍然和我们在1905年第一次碰到的相同,不过最近十年来的事件使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战争只是以机械的直观性暴露出政府客观上的软弱无能。同时,战争也使社会意识发生了混乱,似乎“所有的人”都沾染了反击兴登堡的愿望和敌视六三政制<sup>75</sup>的情绪。但是,

正象组织“人民战争”的工作一开始就碰上了沙皇的警察，从而表明俄国的六三政制是事实，而“人民战争”是虚构的一样，进行“人民革命”的工作也一开始就碰上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果普列汉诺夫后面不是站着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一般说来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民族民主派和民族自由派的话，的确可以把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所有追随者都看成是虚构。

这封“信”当然不能无视以阶级来划分民族，民族应该用革命的手段从战争的种种后果和现政权下拯救自己。“民族主义者和十月党人<sup>40</sup>、进步党人<sup>76</sup>、立宪民主党人、企业家、甚至还有一部分（1）激进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官僚制度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他们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封信完全正确地作出了关于这种立场具有反革命性质的结论，因为这种立场的前提是“同俄国目前的统治者——官僚、贵族和将军们联合起来保卫国家”。这封信也正确地指出，反革命立场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爱国派”的特点，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社会爱国派也有这个特点，这是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到的。

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不单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而且是国内唯一的革命政党；和它同时存在的不单是一些不那么坚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而且有一些不革命的政党。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从革命角度提出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十分孤立的。这是第一个结论，我们必须最清楚地认识到。

当然，政党还不是阶级。政党的立场和它所依靠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之间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后可能发展为深刻的矛盾。政党本身的行为在人民群众的情绪的影响下可能有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谋划时就更需要不依靠象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步骤这样一些比较不稳定和比较不可靠的因素，而依

靠比较稳定的历史因素，如民族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发展的趋势。

然而这封“信”的作者们完全回避这些问题。对于什么是1915年俄国“人民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只告诉我们说，它“应当”由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来完成。什么是无产阶级，这我们知道。但是什么是“民主派”呢？是政党吗？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来：不是。那么是人民群众吗？什么样的群众呢？显然，是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只能是指这些人。

我们在若干篇题为《战争危机和政治展望》的文章中，对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作了一般的估计。我们根据上次革命的经验探讨了1905年的力量对比情况在最近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呢，还是对它不利呢？在讨论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策略时，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问题：1905年以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强大了呢，还是更加衰落了昵？我们以前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命运问题，至今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人现在都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也象民族战争的时代一样，已经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内政制度。它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手工业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最近十年来这个阶层的社会意义已经无可争辩地变得更小了，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对付中间阶级的办法比老的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要残酷得多和剧烈得多。



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无疑是增长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增长了。但同时，他们以前那种虚伪的“独立性”也最终消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完全决定于他们在组织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舆论方面的作用。他们同资本主义的物质联系使得他们充满了帝国主义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封信说：“甚至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而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说，不仅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大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夸张知识分子的特性未必会扩大“民主派”的队伍。

总之，工商业资产阶级进一步没落了，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的立场。城市民主派谈不上是革命因素。剩下的是农民。但是就我们所知，不论是阿克雪里罗得还是马尔托夫，都从来没有对农民的独立的革命作用给予过分的希望。他们是否得出了在最近十年来农民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已经增强了的结论呢？这样的假定既明显地违背理论见解，又明显地违背全部历史经验。

然则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派”呢？所谓“人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

立宪会议的口号需要有革命形势作为前提。存在这种形势吗？存在。但这丝毫不是指下述情况：仿佛俄国终于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民主派现在准备并且能够和沙皇制度进行清算。相反地，如果当前的战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什么的话，那恰恰是表明了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

六三政变<sup>47</sup>后的俄国企图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解决国内的革命问题。这种企图遭到了明显的破产。这并不是说，六三政变的那些负责或半负责的政党会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意味着：由于

军事上的惨败而暴露出来的革命问题(这个问题将驱使统治者进一步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将使这个国家里唯一革命的阶级加倍地重要起来。

六三政变集团动摇了。它的内部有倾轧和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面前提出了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且准备冲击官僚制度和联合的贵族。但是这意味着政府抵抗革命冲击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削弱了。

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信誉扫地了。这不是说它们不经战斗就会交出政权。杜马的解散和最近内阁的更迭,向一切需要证明的人说明:离开这种情况还很远。但是官僚制度的不稳定的政局(这种不稳定还将进一步发展),会大大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动员。

城市和农村的下层人民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受欺骗,越来越不满,越来越顽强。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一支独立的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起来同无产阶级并肩进行活动。这支力量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领导成员。但是这无疑意味着,下层人民中间深刻不满的气氛会有助于工人阶级实行革命的冲击。无产阶级越是不等待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出现,它越是不迁就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被动性和局限性,它越是坚决地和不要妥协地进行斗争,它打算走“到底”即夺取政权的决心越是让大家看得清楚,那么在决定性的时刻它就越有可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当然无济于事。对于关系着国家政权的成败的军队说来情况尤其如此。只有当军队群众深信革命的阶级不单是表示不满和举行示威,而是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且有可能夺得政权时,军队的大多数才会倒向革命的阶级。

国内存在着一个客观的革命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战争

和败北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统治者越来越趋于瓦解。城乡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而能够利用这种形势的革命因素只有无产阶级，现在这种情况和1905年比较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信”里有一句话似乎接近全部问题的这个中心点。这句话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应当“在推翻六三君主制的全民斗争中带头”。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全民”斗争可能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上面所引的“带头”一词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进步的工人们不弄清楚后果究竟如何，就比谁都慷慨地流血，而应当理解为他们应该担当整个斗争的政治领导（这场斗争首先将是无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那么很明显，这个斗争的胜利一定会使政权落到领导斗争的阶级手上，即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上。

因此，这不单是关于“临时革命政府”（这是空洞的形式，历史进程将用某种内容来充实它）的问题，而是关于革命的工人政府的问题，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

全民立宪会议、共和国、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地主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口号，它们将和立即停止战争、民族自决权和欧洲联邦等口号一起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革命首先是政权的问题——不是国家的形式问题（立宪会议，共和国，联邦），而是政权的社会内容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直接准备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么立宪会议或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在目前条件下便会完全失去直接的革命意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从君主制手中夺取政权，那就谁也夺不了。

革命进程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是特殊问题。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延缓发展或加快发展，保证革命的胜利或再一次导致失败。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看清楚自己的道路，并且自觉

地走这条道路。首先它必须摆脱幻想。无产阶级在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最坏的幻想始终就是指靠别人。

发表于1915年10月17日。译自《1905年》1922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第287—293页。

## 和平纲领<sup>①</sup>（摘录）

### · 编者按语 ·

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8月，即十月革命前夕出版的。按内容来说，它只不过是托洛茨基1915—1916年间发表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一些文章的重述。

1915年8月，列宁根据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同时批判了“欧洲联邦”的口号，指出“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这一科学结论，鼓吹全欧同时革命，建立“欧洲联邦”。他宣称“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经过时了”。“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否则，“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1922年，托洛茨基为《和平纲领》写了跋，尽管他的谬论在历史面前遭到了破产，但他仍狡辩说，苏维埃政权

---

① 这篇文章的现在的稿本是1917年5月写成的，但实际上是1915—1916年间刊载在《我们的言论报》<sup>34</sup>上的文章的改写稿。——托洛茨基注

“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宣称“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斯大林在批驳托洛茨基的谬论时指出，这是一种投降主义方针，而它的思想根源就是“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8页）。

第二届临时政府在其宣言中声明，它谋求不割地、不赔款和保障民族自决权的和平。这种说法会使许多天真的人觉得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特别是在米留可夫先生无耻的帝国主义行径之后。但是，谁熟悉英法（劳合-乔治—白里安—利鲍商号）炮制的说法或者即使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主义说法，他对临时政府的宣言就不能不抱有有益的怀疑态度。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统治阶级撒的谎从未有象这次战争时期那么多。“这次战争是争取民主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争取和平和民族联合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最后一次战争”。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这些口号的掩饰下进一步唆使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目前这场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历史含意愈露骨和愈无耻，统治者及奴颜婢膝的政治家就愈加竭力用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饰它的内容。美国资产阶级参加了战争，以维护向欧洲输出军备和靠欧洲的鲜血来赚得几十亿的神圣权利，因而对民主派伪君子威尔逊来说，就更需要挥舞全部和平主义的大旗。

社会爱国主义者特别致力于提供麻痹人们思想的说法，他们在目前这次战争机器中的主要作用也就在这里。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向群众提出诸如“保卫国家”，或“成立国际仲裁法庭”，或“解放被压迫民族”的目标时，他们使群众在思想上把这些任务的解决同

本国军队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他们孜孜不倦地提出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唯心主义口号。

战争进退维谷的持久性质，普遍的经济破坏，下层不满和不耐烦情绪的增长（它已在俄国革命的壮丽序幕中第一次表现出来），这一切迫使两个同盟集团的当权者寻找结束战争的途径。

当然，结束的最好办法就是所谓的“决定性胜利”。德帝国主义者证明，不取得胜利以及从胜利中捞到一切好处，整个社会制度就会发生危险。法国民族主义者同样有力地证明，对法国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战争拖得愈长，“决定性胜利”就愈难实现<sup>①</sup>，统治者，其中包括他们的社会爱国主义一翼的情绪就愈惊慌和缺乏信心。通过签订肮脏的协议（主要靠损害弱小民族的利益）来结束战争，成了官方外交的任务，正象通过互相赦罪的办法来恢复国际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外交任务一样。

统治者感到强烈要求和平。但同时他们害怕和平，因为和平谈判开始之日将是作出总结之时。正因为如此，官方外交不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外交家最先踏上和平谈判的薄冰。官方政府在自己和他们之间有远见地确定了一定的距离，以防完全失败。即将召开的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人”代表会议<sup>77</sup>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半官方地探索和平谈判的基础。

这次代表会议的内部矛盾最明显地暴露在俄国临时政府及其组成部分的政策上。为了同一个“不割地的和平”纲领，我们听说，捷烈申柯劝告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改用正当的生活方式，克伦斯基没有坐待这一劝告的结果，就部署俄国军队进攻，策烈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则打算在斯德哥尔摩进行非官方的和平谈判。对捷烈申

---

<sup>①</sup> 在《我们的言论报》根据对两个欧洲阵营力量对比的估计而作的军事状况的这一说明中，没有把北美合众国的作用估计在内，它的参战导致了德国的溃败。  
——托洛茨基注

柯先生的规劝，意大利政府发表了一个对阿尔巴尼亚实行保护的声明当作回答，利鲍先生则又强调取得完全胜利的必要性，并拒绝给本国的社会党人签发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而他们是利鲍先生的俄国执政的同僚邀请去的。不管怎样看待“不割地的和平”之类的纲领——是当作劝说协约国的话题，当作战略进攻的口号，还是当作策烈铁里、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间谈判的题目——，这个纲领得不到我们的丝毫信任。列诺得尔现在已经向自己的政治主子们即统治阶级讲清楚，他打算去斯德哥尔摩首先为的是揭露德国社会党人并且向法国和协约国的工人证明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应当认为，在万不得已时，谢德曼也是用这类计划来武装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向我们保证，代表会议将真正成为即使是资本主义外交的和平谈判的序幕。它倒有可能成为沙文主义狂热死灰复燃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使工人群众相信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通向和平和各民族的兄弟情谊的唯一正确的即革命的道路上转移开，从我们方面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

召开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主动权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手里。这就使整个事情具有极大的两重性。苏维埃不是社会主义组织，然而它代表很革命的群众说话。同时由于这些群众的意识尚未充分定形，担任苏维埃领导的是一些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不相信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家。

《苏维埃消息报》<sup>78</sup>在国际主义者批评的压力下说，“召开企图在办公桌前订立有关改制欧洲地图的和睦协议的社会党外交家的代表会议，那是没有用的。这样的代表会议不仅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而且当各国社会党人的视野没有超出民族任务的时候还会使分隔他们的鸿沟更加加深。

只有另一种代表会议，即只有每个与会派别从一开始就感到



自己是国际劳动大军中的一支队伍，为了用共同的努力来从事共同的事业而聚集在一起的代表会议才能真正产生成果。”

《消息报》得出结论说：“执行委员会的信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里《消息报》勾销了这样一个情况，即执行委员会自己就同俄国资本主义外交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而通过后者又同协约国外交保持同样的关系。执行委员会“原则上”表示赞成打破民族统一，却更坚决地力求巩固自己家里的民族统一。

建立在这种原则之上的代表会议，即使得以召开，也不能不在一开始就暴露自己的完全无能。在群众面前对那种基于模棱两可和毫无原则之上的措施承担责任，是轻率的或盲目的。

对我们来说，和平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国际革命斗争的纲领。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革命的社会党人相当明确地制定了这个斗争的总的原则。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没有理由离开这些原则而转向克伦斯基或策烈铁里的“原则”。我们进入了革命大动荡的时代。政治动摇性，尤其是政治冒险性将迅速消逝。只有把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建筑在指靠世界的，首先是欧洲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斗争的发展上的政党，才能跟上历史的运动。

1917年5月25日于彼得格勒

## 一 什么是和平纲领？

什么是和平纲领？从统治阶级或为它们效劳的政党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必须以军国主义的力量来保证其实现的那些要求的总和。例如，为了实现米留可夫先生的“和平纲领”，必须手持武器占

领君士坦丁堡。王德威尔得的和平纲领要求事先把德国人从比利时赶出去。从这种观点看来，和平的条文只不过是对于用战争的武器所做的事情作出总结。换句话说，和平纲领就是战争纲领。但只是在第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国际）的干预之前事情才是这样。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和平纲领并不是意味着应由本国军国主义实现的那些要求，而是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准备用自己反对全世界军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强制实行的要求。国际革命运动越发展，和平的问题就越成为不单纯取决于各方军事状况的问题，和平条件可能被群众理解为战争目的的危险越来越小。

这在关于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问题上最明显地向我们暴露出来了。

战争是从德军向比利时和卢森堡发动毁灭性进攻开始的。在由于摧毁小国而产生的反应中，除了敌对阵营统治阶级虚伪的和自私的愤怒外，还听到人民群众真诚的愤慨，他们的同情是由那些仅仅因为处于两个交战大国之间而被摧毁的弱小国家的命运所引起的。

在战争初期，比利时命运之空前悲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但是，三十四个月的军事行动表明，比利时的插曲在解决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任务——使弱者服从强者的道路上仅仅是第一步。

资本主义把它用来“调整”各个民族内部经济生活的那些办法搬到了国际关系方面。竞争的道路就是中小企业不断垮台和大资本凯旋得胜的道路。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竞争意味着大的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不断征服中小民族和落后民族。资本主义技术越发展，金融资本所起的作用越大，军国主义提出的要求越高，那么，小国对大国依赖的程度也就越深。作为帝国主义机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这一过程，在和平时期也在通过国债、铁路及其他租让权、

军事外交协定等等手段不断地进行。战争暴露并加速了这一过程，对它注入了公开暴力的因素。战争破坏了小国最后残留的一点“独立性”，而这完全不取决于两个主要阵营之间的军事比赛的结局如何。

比利时仍然在德国大兵的压迫下呻吟。但这只是它丧失独立的流血惨剧的表现。比利时的“解放”根本不是摆在协约国面前的独立的任务。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比利时将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大规模争夺的一个小小的从属的组成部分。没有第三种力量——革命的干预，比利时在战后可能仍受德国的箝制，受大不列颠的奴役或被两个同盟集团的大国强盗瓜分。

关于塞尔维亚，能说的也完全是同样的话，塞尔维亚民族的毅力成了世界帝国主义天平上的一个小小的砝码，这个天平向哪一边摆动，塞尔维亚独立的利益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中部帝国使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这两个国家不论仍将是德奥帝国主义集团（“中欧”）的东南组织，还是变成算总账时的辅币，无论如何，战争会写完它们独立史上的最后一章。

最明显的是，在俄国革命开展起来以前，波斯独立随着1907年英俄协定的签订而基本丧失。

罗马尼亚和希腊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帝国主义托拉斯的斗争向小国商号提供的选择“自由”是多么有限。罗马尼亚宁肯作出自由选择的态度，它打开了自己的国家中立的闸门。希腊以消极的顽抗精神竭力使自己呆在“家里”。好象为了更清楚地暴露争取自我保全的“中立”斗争完全是徒劳的，整个欧洲战争，通过保加利亚、土耳其、法国、英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迅速转移到希腊领土上。选择的自由在最好的情况下发展成自我取消的形式。归根结蒂，罗马尼亚以及希腊，都将得到同样的归宿：成为大赌棍手中

的赌注。

在欧洲的另一端，小小的葡萄牙认为应当加入协约国方面作战。如果在参加斗殴的问题上，受英国保护的葡萄牙会有比特维尔省或爱尔兰多得多的自由，那么，它的决定就会是无法解释的了。

荷兰和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资本主义上层由于战争而捞到了一座座金山。但西北欧的四个中立国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主权”的虚幻，这种主权即使熬得过战争，在和平状态下，也会受到大国的“算计”。

在帝国主义的欧洲，“独立”的波兰只有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奴隶般地依赖大国集团之一，才能保持住自己独立的招牌。

瑞士的国家独立在强制规定的进出口细则中暴露了自己的全部内容。小联邦共和国的特派员常常手里拿着帽子到两个交战的阵营去求告，他们很明白，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建树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它的独立和中立会意味着什么。

如果战争由于战线和参加国增加而变成一个未知数很多的方程式，使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说出所谓的“战争目的”，那么，小国却有非常相对的优越性：他们的历史命运可以认为是早已注定了的。无论哪一个阵营取得胜利，也不管胜利的规模如何，要退回去，回到小国独立的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是德国还是英国取得胜利，所能解决的问题只不过是谁将是弱小民族的直接主宰。只有骗子或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才会把弱小民族的自由问题同这方或那方的胜利联系在一起。

第三种结局，也是最可能发生的战争结局是平局，它也会产生完全一样的结果：交战阵营中的一方没有取得对另一方的明显优势，这只会使得每个阵营内部强者对弱者的优势和它们双方对帝国主义的“中立”牺牲品的优势更清楚地暴露出来。不分胜负的战

争结局本身不会给任何人以任何保障，战败的反正是所有的弱小国家，既包括那些在战场上流过血的，也包括那些试图在中立的阴影下躲避厄运的。

对我们来说，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等的独立并不是协约国战争纲领的组成部分（象盖得、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韩德逊等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包含在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纲领之内的。

## 二 Status quo ante bellum<sup>①</sup>

无产阶级能否在目前条件下提出自己独立的“和平纲领”，即对那些产生目前战争或在目前战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现在没有力量实现这个纲领。指望他们经过目前战争就能实现本身的和平纲领，是空想。争取停止战争和争取不割地的和平，即恢复 status quo ante bellum，恢复战前秩序，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比较现实的纲领。例如马尔托夫、马马丁诺夫和一般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论点就是这样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坚持的不是革命的观点，而是保守的观点（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恢复阶级斗争，不是第三国际，而是恢复第二国际，不是革命的和平纲领，而是恢复 status quo ante bellum，不是争取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而是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然而，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争取停止战争和争取不割地的和平有“现实性”呢？战争迟早会停止，这是毫无疑义

---

① 拉丁语：战前秩序。——编者注

的。在这种坐等的意义上说，停止战争的口号无疑是很“现实的”，因为这是有十分把握的。而在革命的意义上说呢？可以这样反问一下：指望欧洲无产阶级能够靠它现有的力量违背统治阶级的意愿去制止军事行动，这难道不是空想吗？那么，是否就因此拒绝停止战争的口号呢？其次，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停战呢？从理论上推断，这里可能有三种典型的情况：（1）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2）在哪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情况下，敌对双方都搞得精疲力尽；（3）革命无产阶级的干预制止军事活动的“自然”发展。

十分明显，在第一种情况下，即战争由于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要求不割地的和平是天真的幻想。如果全力支持本国军国主义活动的谢德曼和兰茨贝尔格之流在国会上发言“赞成不割地的和平”，那正是因为坚信这一类的异议不会阻碍任何“有益的”兼并。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总司令阿列克谢也夫将军，那个宣布不割地的和平是“不切实际的空话”的人，十分有根据地断言，主要问题是进攻，只要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其余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sup>①</sup>。为了从全副武装的获胜的一方手中夺取割地，显然，对无产阶级来说，除了善良的愿望以外，还需要有革命力量和公开使用它的直接准备。无论如何，它还没有掌握任何“省力的”手段来使获胜的一方不去利用取得的胜利。

第二种战争结局，即主要是“不割地的和平——仅此而已”的有限纲领的拥护者所指望的结局是，战争没有被第三种力量的革命干预所制止，已消耗完交战国的一切储备，以疲惫不堪而告终——既无胜者，也无败者。当军国主义无力征服，无产阶级无力革命的时候，消极的国际主义者就以其残缺不全的“不割地的和平”

<sup>①</sup> 阿列克谢也夫将军的辞职丝毫没有破坏他的论断的充分根据。——托洛茨基注

纲领来适应这种状况，他们常常把这一纲领说成是恢复status quo ante bellum，即恢复战前秩序。但是就在这里虚假的现实主义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实际上“平局”的战争结局，正象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根本不排除割地；相反地，是以割地为前提的。如果两个大国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获胜，这完全不意味着塞尔维亚、希腊、比利时、波兰、波斯、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正是靠牺牲第三者即最弱者来实行割地的。为了阻止这种互相“补偿”（犒劳），国际无产阶级应当进行反对统治者的直接的革命起义。报纸上的文章，代表大会的决议，国会的抗议，甚至街头示威，过去和现在从未阻止统治者——通过胜利或者协议——掠夺领土和蹂躏弱小民族。

至于第三种结局，那是最清楚不过了。它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在这次战争还打得火热的时候就全力奋起，从下面使战争瘫痪和得到制止。十分明显，在这个最有利的情况下，有力量制止战争的无产阶级最不能和最不想局限于反对割地的纯保守的纲领。

我们看到，真正实现不割地的和平，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以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前提。但是，以这一运动为前提，那么要求恢复战前的和战争所由产生的秩序的上述纲领，对它来说就十分渺小了。欧洲的status quo ante bellum是战争、掠夺、暴力、正统主义、外交迟钝和人民软弱无力的产物，也仍是“不割地的和平”的唯一积极的内容。

无产阶级在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以恢复旧的欧洲版图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它应当提出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时代的革命性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相符合的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关系纲领。

孤立地提出的“不割地”的口号，首先没有提供从政治上帮助理解战争进程中提出的某些问题的任何标准。如果设想，法国今

后占领亚尔萨斯和洛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必须追随谢德曼去要求把这些省份归还德国呢？我们是否要求把波兰王国归还俄罗斯呢？我们是否主张日本把胶州湾……还给德国？是否让意大利把它在特兰提诺所占领的那部分归还原主？这是荒谬绝伦的！这样，我们就成了热衷于正统主义的人，也就是按照极端反动的外交精神来捍卫王朝的和“历史的”权利的人。不幸的是，这个“纲领”需要革命来使它得到实现。在根据具体现实而产生的上述一切和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显然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原则：有关居民的公决。当然，这个标准决不是绝对的。例如，法国“社会党人”大多数把全民公决（亚尔萨斯-洛林）归结为可耻的把戏：先占领即用武力侵占，然后要求同意兼并。十分明显，真正的公决要求以革命的条件为前提，即居民可以不在左轮手枪（德国的或法国的都一样）枪口下来作回答。

因此，“不割地”的口号唯一可以接受的内容就是把它归结为反对新的强占，即消极地提出民族自决权。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无可争辩的民主“权利”，对强大民族来说，必然变为和将要变为侵占和蹂躏的权利，而对弱小民族来说，则变为和将要变为软弱无力的愿望或“一纸空文”，直到在欧洲的政治地图上民族和民族的残余被关闭在那些被海关彼此分割开来并在帝国主义斗争中不断发生冲突的国家的范围而与世隔绝的时候。而要克服这种制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以想象的。把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同社会革命的纲领结合起来，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 三 民族自决权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没有民族自决的原则，社会民主党在解决



民族国家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建立方面的具体问题时就会寸步难行，因为这个原则的最后结论就是，承认每一个民族集团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命运，也就是说有权脱离该多民族国家（例如俄国，奥地利）。了解民族“意志”的唯一民主办法，是通过全民投票作出公决。这种回答从民主上看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上述方式下仍然是纯形式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民族自决的现实可能性、途径和办法。然而，问题的核心正在这里。

对许多被压迫民族、民族集团和民族残余来说，甚至对其大多数来说，自决就是废除现存的疆界和肢解目前的国家。同时，这一民主原则也导致殖民地的解放。然而，帝国主义的整个政策是不顾民族原则地扩大国界，把弱小民族强行纳入关税范围之内，攫取新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扩张的和进攻的，它的特征正是自己的这种性质，而不是反复无常的外交手腕。

因此，在许多场合导致国家和经济分散（肢解、分裂）的民族自决原则，同手中掌握着国家组织和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的强大的集中趋向发生敌对冲突。的确，在许多场合，民族分立运动在邻国的帝国主义阴谋中得到了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有通过武力才具有决定意义。而一俟事态发展到两个帝国主义组织发生军事冲突时，新的国界就不是根据民族原则，而是根据军事力量对比来确定了。迫使获胜的国家放弃对新夺得的土地实行兼并，同强迫它给以前占领的省份以自决的自由是同样困难的。最后，即使出现了奇迹，象爱尔威一类的半幻想者-半骗子所夸夸其谈的那样，欧洲被武装力量分成了完整的民族国家和小国家，这丝毫不能使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在“公平的”民族的重新划分以后的第二天，资本主义扩张活动就会恢复，只要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民族原则，完全破坏民族原则的冲突、战争和新的掠夺就又会开始。所有这一切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如果说狂热的赌棍在赌博时不得不在彼此之间

“公平地”重分金子，那是为了接着以加倍的疯狂来重新进行这种赌博。

但是，对我们来说，决不能因为帝国主义集中趋势非常强大，就对这种趋势采取消极屈从的态度。民族共同体是文化的实际发源地，正如民族语言是它的实际工具一样，并且它们还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自己的这种作用。为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社会民主党想要并且应当保证民族共同体有发展（或溶化）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从革命资产阶级那里汲取了民族自决的民主原则作为自己的政治义务。

民族自决权不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中抹去，但是它不能妄求绝对的意义，相反地，对我们来说它受到历史发展中所碰到的深刻进步趋势的限制。如果说这种“权利”必须——通过革命力量——同奴役弱小和落后民族并蹂躏民族文化发源地的帝国主义的集中化方法相抗衡，那么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能允许“民族原则”阻挡现代经济在我们整个大陆，甚至在全世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不可抑制的和深刻进步的趋势。帝国主义以资本主义掠夺表现了这一经济趋势——彻底摆脱愚昧的民族局限性，如同它以前摆脱愚昧的农村和地区的局限性一样。社会主义在反对经济集中化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同时，不仅不反对这种趋势本身，而且相反地要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观点来看，现代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基本的，必须确保它有充分可能完成其真正解放的历史使命：建立统一的世界经济，不受民族界限和国家海关的限制，而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资源、气候特性和劳动分工的需要。波兰人、亚尔萨斯人、达尔马提亚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以及还没有被占领的欧洲其他弱小民族，只有在民族集团不再成为经济集团，不再同国界联系在一起，不再在经济上彼此隔离和彼此对抗的情

况下，才能复兴或者第一次在他们所向往的民族范围内立足，而主要的是，只有达到这种地步他们才能保留在民族范围内并自由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换言之，为了使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等能够建立真正不受拘束的民族统一，必须消灭目前把他们分割成各个部分的国界，必须扩大作为经济组织而不是民族组织的国家的范围，使之包括被海关和疆界所割开、被目前战争所撕裂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本身的国家统一是欧洲大小民族自决的前提。只有在摆脱了国家关税壁垒的民主统一的欧洲家庭里，建立在真正自决基础上的、排除了民族经济对抗的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才是可能的。

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直接取决于欧洲整个制度的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不可能离开欧洲革命而提出诸如波兰的独立或全体塞尔维亚人的统一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和平纲领组成部分的自决权具有不是“空想的”而是革命的性质。这种见解是针对两种人的：一种是德国的大卫和兰茨贝尔格，他们从自己的帝国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诬蔑民族独立原则为反动的浪漫主义；另一种是我们革命阵营中那些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的人，他们宣称这一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以此使自己摆脱必须对战争所直截了当地提出的民族问题作出原则性回答的处境。

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状态和社会主义之间还要经历一个社会革命的大时代，即无产阶级为国家政权而进行公开斗争、夺取政权和运用这个政权使社会关系彻底民主化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地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和解和平静的时代，正相反，而是社会斗争高度紧张的时代，是人民起义、战争和扩大实验无产阶级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对今后民族存在的条件以及民族同国家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作

出实际的即直接而有效的回答。

## 四 欧洲联邦

上面我们试图确定，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统一是民族自决成为可能的必要前提。没有在巴尔干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政策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作为补充，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等等的民族独立口号仍然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同样，在全欧范围内，自决“权”的原则只有在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有血有肉。

但是，如果民主联邦的口号在巴尔干半岛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口号，那么对于存在着深刻得多的资本主义对抗的欧洲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对资产阶级政治来说，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是消灭欧洲“内部的”海关，而不做到这一点，国际仲裁法庭和法典将不会比例如比利时中立更加稳固。企求统一欧洲市场，同企求掠夺落后的非欧洲国家一样，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这种企求遇到了各农业的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本身的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在他们手中，同军国主义机关相结合的海关（没有前者，后者就等于零）是剥削和发财的不可代替的工具。

匈牙利的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同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奥地利搞经济统一。奥匈资产阶级对同比较强的德国实行关税联合的思想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另一方面，德国大地主永远也不会自愿取消粮食的关税。中部帝国的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英、法、俄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一致，目前的战争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在协约国内部，资本主义利益的不一致和

不可调和，比在中部帝国还明显。在这种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政府的协议从上面达成欧洲的稍微彻底的经济统一，是纯粹的幻想。在这方面只能局部妥协和采取不彻底的办法。因此，预计会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整个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好处的欧洲经济统一，成了欧洲无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及其工具——军国主义作斗争时的革命任务。

因此，没有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的欧洲联邦是无产阶级和平纲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德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止一次地（特别在战争初期）提出了欧洲的或至少中欧的（一方面排除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排除俄国）“联邦”的纲领。强制统一欧洲的纲领能够说明德帝国主义的倾向的，正象强制肢解德国的纲领能够说明法国的倾向一样。

如果德国军队取得了在战争初期德国所预期的决定性胜利，德帝国主义无疑会大规模地进行实现强制性的欧洲各国军事—关税同盟的尝试，即完全是建筑在取消和妥协基础上、从而把欧洲市场统一的进步意义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同盟。不必说，在这种条件下，也就谈不上民族自治了，因为这些民族是被强迫联结为冒牌的欧洲联邦的。有一些反对我们所维护的欧洲联邦纲领的论敌为了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一思想可能以“反动的”君主帝国主义来体现而提出的前途就是这样。然而，这个前途正是联邦口号具有革命生命力的最明显的证明。如果德国军国主义真正得以强制实现欧洲的半统一，如同普鲁士军国主义当时实现德国的半统一一样，那么欧洲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会是什么呢？是废除强制实行的欧洲统一和让一切民族返回到孤立的民族国家的家庭去吗？是恢复“自治的”海关、“民族的”货币、“民族的”社会立法等等吗？当然不是。欧洲革命运动的纲领将会是，在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已实现的统一的基础如完全消灭关税壁垒，统一立法，首先是统一工人立法等等

的同时，消灭这种强制的和反民主的统一形式。换言之，没有君主制和常备军的欧洲联邦口号在上述条件下就会成为欧洲革命的统一和指导性的口号。

拿第二种情况——形成“平局”的战争结局来说吧。早在战争最初时期，著名的李斯特教授，“统一的欧洲”的宣传者就证明，如果德国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欧洲统一反正也是会实现的，照李斯特看来，甚至会比德国获胜的情况下实现得更加彻底。在扩张（扩大）的要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互相敌对但同时无力互相取胜的欧洲国家，继续互相阻挠完成自己在近东、非洲和亚洲的“使命”，并且到处受美国和日本的排挤。照李斯特的想法，正是在“平局”的战争结局下，欧洲各大国达成经济和军事协议以反对弱小和落后民族，首先当然是反对本国工人群众的必要性就提到了首位。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过，在实现这个纲领的道路上有多么巨大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哪怕仅仅克服一半，就会意味着建立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托拉斯，掠夺性的股份公司。这个前途有时毫无根据地被提出来当作联邦口号的“危险性”的证明，事实上它倒是这个口号有实际的革命意义的最明显的证明。如果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结合成帝国主义托拉斯，这当然是比目前状况前进了一步，因为它首先为工人运动建立了统一的全欧物质基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也不应该争取退回到“自治的”民族国家，而应争取把帝国主义的国家托拉斯变成欧洲共和联邦。

但是，战争（它暴露军国主义完全无能对付引起战争的各种问题）拖得愈久，关于这些从上面统一欧洲的广泛计划谈得就愈少。出来代替帝国主义“欧洲联邦”的，一方面是德奥的经济统一计划，另一方面是四个协约国的经济统一计划，两者都有互相对抗的战斗的税率和作为其补充的军国主义。上述一切足以说明，在实现这些计划时，在两个国家“托拉斯”的无产阶级政策中，反对他们所

建立的关税和军事外交壁垒、争取欧洲经济统一的斗争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但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们有一切理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这次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全欧洲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德国军国主义威胁着俄国革命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欧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且会找到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换言之，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军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对目前的战争如何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纲领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已经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把建立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

“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进行自卫的纯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内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问：“为什么是欧洲的统一，而不是全世界的统一？”这里顺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且是某种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没有德国的革命，俄国或英国的革命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现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革命的问题也就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两个中枢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枢将是美洲联邦。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稍微具体的历史性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sup>72</sup>归结为以下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sup>73</sup>。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



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瓦扬至死还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的福地，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主张护国到底。连施等人（有的是虚伪地，有的是真诚地）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社会革命基础的破坏。最后，我们的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在我国条件下重复法国内阁主义<sup>57</sup>的极为悲惨的实验时，发誓说他们的政策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因此同盖得和桑巴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不应当全然忘记，在社会爱国主义中，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还有民族革命救世论在作祟。这种救世论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工业水平或者民主形式和革命成就而负有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或“民主”的使命。如果革命在一个比较有准备的民族的范围内取得胜利是确实可以想象的话，那么同护国纲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救世论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但是事实上这种依据并不存在。用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的办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挖革命的墙脚；革命虽然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上和军事政治上的相互依赖从未象目前这场战争中这么明显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民族基地上完成的。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协同一致的相互依赖的表现。

社会爱国主义在原则上（甚至经常在事实上）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应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改良主义，它建议我们在目前的世界灾难中追随交战集团之一，使无产阶级政策沿着“祸害最小”的路线进行。我们屏弃了这种方法。我们说，由过去全部发展准

备好的欧洲战争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各民族部队的行动路线不应当由次要的政治的和民族的特征来决定，不应当由某一方军事优势的不大可靠的利益（而且为了这些可疑的利益必须以预先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作为代价）来决定，而应当由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对抗来决定。

这个唯一原则性的问题提法，其实是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只有它才能在理论上和历史上证明革命国际主义的正确性。

国际主义不是以一个宣传小组的名义，而是以一个最重要的阶级的名义拒绝在大灾祸期间支持国家，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单纯消极地避开“罪恶”，而是说明，对我们来说世界发展的命运已不再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但如此，这种民族国家已经成了发展的障碍，必须加以克服，即必须用更广阔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经济-文化组织来代替。如果社会主义问题同民族国家的框框是能够相容的，那么它也就同民族防御相容了。但是，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问题是在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本身不得不强行打破它自己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框框的条件下提出来的。

正象我们竭力指出的，无论是一个大国集团取得了另一集团的决定性胜利，还是出现最无分晓的战争结局，帝国主义的欧洲半统一都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欧洲的统一都意味着完全践踏一切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原则以及保存和集中欧洲反动势力的一切力量和手段：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

真正能够保证民族发展自由的民主共和的欧洲统一，只有通过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王朝的集中制的革命斗争，通过各个国家的起义，通过把这些起义汇合成全欧洲的革命才有可能。但是，胜利的欧洲革命——不论个别国家的革命遇到什么样的波

折——由于没有其他的革命阶级，只能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此，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 跋

(1922年)

《和平纲领》按其内容来说，是同编在第一卷中的《战争与国际》有密切关系的。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接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和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使生产力大为下降；而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sup>80</sup>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欧洲不仅是地理名词，而且是经济政治名词，最近几年的事件

——欧洲的衰落，美国实力的增长，劳合-乔治靠帝国主义方法与和平主义方法同时并用来“拯救”欧洲的尝试——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欧洲工人运动处在防御、积聚力量和准备的时期。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战斗的新时期必然会提出革命欧洲的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国家关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纲领性的办法是欧洲联邦。既然俄国的经验提出了苏维埃国家这一最自然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既然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原则上接受了这种国家形式，那就可以设想，在恢复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欧洲无产阶级将提出欧洲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纲领。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极有教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同经济上的集中制是完全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以苏维埃国家来表述的欧洲联邦口号不仅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意义，而且看来还刚刚开始预示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的巨大意义。

译自《战争与革命》1925年俄文版第2卷第477—503页。

## 回顾与展望(摘录)

### · 编者按语 ·

《回顾与展望》、《国际主义策略》两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不久，在十月革命前夕发表的。托洛茨基后来曾声明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已经把托洛茨基主义放在党的门口了。事实证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这几篇文章里，托洛茨基继续宣扬他的“不断革命”论，同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唱反调。托洛茨基强调帝国主义时代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同狭小的民族框框的矛盾，断言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欧洲的命运，说什么“欧洲工人的失败”将使俄国“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还要变为英美的殖民地”。托洛茨基在这些文章中高喊“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完全否定俄国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一 发生了什么事？

谁也说不清楚，莫斯科会议<sup>81</sup>是为什么召开的。而且，所有将要参加会议的人都声明(真诚地或伪善地)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请他们到莫斯科去。与此同时，这些人差不多都对会议抱着怀

疑或轻视的态度。可是，他们都正在动身前往。怎么会 出现这样的怪事？

如把处在极其特殊状态的无产阶级放在一边不说，那么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人可分为三类：各资本主义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和政府。

立宪民主党最充分地代表了有产阶级。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有地主，工商资本组织，金融集团，教授团体。其中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政治面貌。但是，害怕工农兵群众的共同心理使有产阶级结成了反革命联盟。贵族官僚集团和参谋将军集团没有停止其保皇的阴谋和倾轧，但认为必须暂时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则心怀疑虑地看待保皇集团，但很珍视他们对反对革命的行动的支持。因此，立宪民主党正在变成所有各种大中有产者的共同代表。现在，米留可夫的资本主义厚颜无耻和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径汇合了有产者的各种野心和剥削者的各种贪求。米留可夫的政策是窥伺革命制度的一切挫折、一切灾难和困难，暂时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用这种合作来破坏他们的声誉，并等待自己的时机。而古尔柯则躲在米留可夫背后等待自己的时机。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一假民主派依靠的是农民群众、城市小市民与落后工人；而且时间越长，越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是主要力量，而孟什维克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两党的领导下，起初由于群众的半自发性压力而被抬得很高的苏维埃，随时都在丧失自己的作用，并化为乌有。原因何在呢？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市民中渺小的“伟大人物”，当历史使他们碰了钉子的时候，从来不从他们自己的无能当中寻找失败的原因，而一定要去发现什么人在捣鬼或搞阴谋。策烈铁里怎能不抓住7月3—5日的“阴谋”来说明他全部政策惨败的原因呢？当李伯尔、郭茨和沃伊廷斯基之流在从“无政府

状态”中(其实这种状态对他们并无害处)拯救秩序的基础时,这班先生们居然真心相信自己会象拯救卡皮托里的鹅群<sup>82</sup>一样得到奖赏。而当他们发现资产阶级对他们的轻视同他们镇压无产阶级的努力成正比地增长时,他们大吃一惊。策烈铁里这个善弹老调的大巫师,就被当作过于革命的包袱抛弃了。十分明显,机枪团“破坏了”革命。

如果策烈铁里和他的党站在反间谍机关、波洛夫策夫和士官生的阵营内,帮助他们为反革命的利益而解除工人的武装,那么罪过不在于策烈铁里的政治路线,而在于被布尔什维克引入歧途的机枪团的发动。这就是小市民政治破产分子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7月3—5日所以成了革命发展的转折点,是因为它们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政党完全没有能力夺得政权。在联合政府可怜地垮台之后,除了由苏维埃来掌握全部政权以外,似乎没有其它出路了。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下决心。他们议论说,夺取政权就是跟银行家和外交家绝交,而这是冒险主义。尽管7月3—5日的事件具有威胁性,而苏维埃的首领们却在继续追逐叶弗烈莫夫,这样有产阶级就彻底明白了,苏维埃的政治家们在他们的面前就象小商贩在银行家面前那样打躬作揖。这正好给反革命打了气。

在这以前的整个革命时期都处在所谓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标志下。这种来自自由派的说法,实质上是很肤浅的。问题不仅在于执行许多政府职能的苏维埃跟政府并存。要知道唐恩和策烈铁里之流正在尽其所能来“无痛苦地”消除政权一分为二的局面,使政权完全归于政府。但是,关键在于在苏维埃和政府后面的是两种依靠不同阶级的不同制度。

在苏维埃后面的是工人组织,这些工人组织在每个工厂内排除了资本家的专制制度,并在企业内建立了共和制度,但是共和制

度跟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求对生产实行全国性的监督。资本家为了保卫财产所有权，在上层即在政府内寻找支柱，推动政府加紧反对苏维埃，并使政府相信，它还缺乏独立的机构，即镇压工人群众的工具。反对“两个政权并存”的号叫即由此而来。

在苏维埃后面的还有军队中选出的组织，以及全部的士兵民主制度。临时政府跟劳合-乔治、利鲍和威尔逊采取一致的步调，承认沙皇制度的原有义务，并按秘密外交的老办法行事，它不能不遇到军队新制度的敌对反抗。这种反抗在上边也通过苏维埃极轻微地反映出来。由此产生了对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怨言，特别是将军们有了怨言。

最后还有农民苏维埃，尽管它的领袖们犯了可怜的机会主义和愚蠢的沙文主义，农民苏维埃却受到底层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在这里政府越是抗拒，侵夺所采取的形式就越激烈。政府成为大私有制的工具到了何等程度，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得最清楚：策烈铁里最近的警方查禁告示跟李沃夫公爵的那些告示丝毫没有差别。由于各地苏维埃和农民委员会试图建立新的土地制度，就跟“革命”政权发生了尖锐矛盾，这个政权越来越变成了私有制的看家狗。

进一步发展革命，就是要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并利用这个政权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私有者。但是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必然要使最坚决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在劳动群众中起头等重要的作用。在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方面，无产阶级可在西方，首先是在德国的所谓“军事社会主义”中找到极有价值的榜样。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和真正革命政权的领导下进行这种组织工作，所以监督生产和逐步组织生产就会是完全反对资本利益的。当有产阶级力图通过临时政府建立起“坚强



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制度时，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它无论如何将会摧毁资产阶级的抵抗，并且根据现有生产力和西方形势来引导和改造经济生活为劳动群众谋福利。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以后，革命就会成为不断革命，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运用国家政权来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终胜利将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俄国的革命越是坚决和英勇地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会越有力地推动西方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

但是，庸俗的幻想家却把这种前途看作是“空想的”前途。他们想要什么呢？他们自己从来也没有说清楚。策烈铁里翻来复去地大谈“革命民主”，但显然并不懂得它是什么。不仅惯于卖弄民主词句的社会革命党人，而且孟什维克也一样，一到阶级标准开始过于明显地揭露他们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时候，就把阶级标准完全抛到一边去了。用“革命民主”的制度来说明一切，论证一切。甚至老牌侦探把肮脏的手指伸进布尔什维克的口袋，也无非是为了“革命民主”……。但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派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或用联合的办法使政权“中立”，实际上就是使革命失去领导。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保卫作为自己机关的苏维埃，实际上阻挠了政府在各地设立行政机关。政府不仅无力作好事，而且也没有多大力量去干坏事。苏维埃有一些颇大的计划，可是其中任何一个计划都不可能付诸实施。由上面制订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制度和由下面形成的工人民主制度使得彼此陷于瘫痪。凡是它们接触的地方，都产生了数不清的冲突。部长和委员们压制革命自治机关，指挥官们咬牙切齿地痛恨军队委员会，苏维埃在群众和政府之间疲于奔命。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部长、总指挥官和委员们上台又下

台。政权越是手忙脚乱地进行压制，下层群众的激愤就越强烈。上层的整个生活是一片“无政府状态”。

显然，懦弱的双重性质的小市民“民主”制度是内在地缺乏力量的。摆在革命面前的问题越是尖锐，就越明显地呈现出这种无力状态。整个国家建筑是靠一个或两三个首脑来支撑的。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或策烈铁里的一个不谨慎的手势，往往有引起国家建筑完全倒塌的危险。越往后走，由苏维埃夺取政权，或者由资本家政府取消苏维埃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就越突出。只要从外部推一下，整个大厦就会彻底失去平衡。7月3—5日的事件，对于内部注定要灭亡的制度来说就是外部的推动。以两种互不相容的制度“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安闲生活”，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策烈铁里已有可能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上一笔，他的拯救俄国的计划被机枪团破坏了。

写于1917年8月。译自《无产者报》1917年8月26日第1号。

## 国际主义策略

在俄国革命中各阶级政治集团是无比清楚的，而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充满着无比混乱。俄国历史发展的迟缓性，使得小市民知识分子能用最好看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孔雀毛装饰自己。不过，他们使用这样的装饰，只是为了掩盖自己松弛无力的躯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无论在3月初、5月3日，还是在7月3日都没有夺得政权，这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革命，而是因为完全陷入帝国主义罗网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连一百二十五年前雅各宾民主派<sup>4</sup>所完成工作的十分之一都已无力完成。他们高谈阔论地谈论拯救革命和国家，可是他们会不经一战就把阵地接二连三地交给资产阶级反动派。因此，夺取政权的斗争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直接任务，同时革命也正在从自己身上彻底撕去“民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外衣。

或者是我们向着很可能以君主制为结局的顽固的帝国主义制度倒退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土地委员会、军队组织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都要被粉碎，而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们也将成为废物。或者是无产阶级把半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把昨天这些群众的领袖从自己的道路上扫除掉（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们也将成为废物），同时建立工人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的进一步成就，直接取决于欧洲革命，首先是德国革命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时机一到就可以背叛（象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一样）的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深刻

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成就。因此，我们不能用那些使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发生困难的步骤和策略为代价来换取局部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坚决与社会爱国主义者断绝关系是我们全部政治工作的必要前提。

“国际主义者同志们，”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位发言者叫嚷说，“把你们的社会革命再推迟五十年吧！”……不用说，这个善意的劝告博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满意的掌声。

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空想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就在这里，就在对社会革命的态度上。有不少的“国际主义者”，他们以战争所引起的一时沉醉于沙文主义的现象来解释国际的危机，或者指望一切迟早都要恢复原来状态，旧的社会党会重新找到现在已经迷失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幼稚可怜的希望！战争不是暂时使资本主义社会失去平衡的外来灾难，而是在该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反抗民族国家和私人占有形式的狭小框框的暴动。退回到上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对平衡状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盲目地破坏生产力，或者是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历史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样。

同样，国际的危机也不是外来的现象。

欧洲各社会党形成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而改良主义者企图使无产阶级迁就国民议会制度和民族市场的时期。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内有拥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人。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党员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承认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却宣称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这种要求，而这个日子实际上是遥遥无期的。”由于“和平”时期为时颇久，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旧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内占了统治地位。直到矛盾的“和平”积

累为帝国主义的猛烈震荡所代替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和荒谬性才以最惹人反感的形式暴露出来。不仅旧的民族国家，而且随之增长的官僚化的社会党，都同继续发展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种情况本是早就多少预见到的。

远在十二年以前，我们就曾写道：“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因循习气。欧洲的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党——德国的党养成了一种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吸引的群众越多，这些群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越高，这种保守主义就越顽强。因此，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在一定的时刻会成为工人同资产阶级反动派公开冲突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家的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在一定的时刻会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sup>①</sup>但是，如果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第二国际各党丝毫没有偶像崇拜，即使如此也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些庞大组织的崩溃竟会如此悲惨。

新的时代产生新的组织。在斗争的烈火中现在到处都在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丰富遗产当然不会毫无用处。不过，对这种遗产要进行内部的清理工作，整整一代的“现实主义”的庸人都将被抛到一边去，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将第一次发挥其充分的政治意义。

在各国内部，任务不是维持过时的组织的统一，而是真正团结富有主动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这些人现在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被推到了前沿岗哨。在国际范围内，任务不是要在外交会议上（斯德哥尔摩！）使参政的社会党人靠拢与“和解”，而

---

<sup>①</sup> 《我们的革命》1906年版第285页。——托洛茨基注

是要使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联合起来，并使他们具有共同的方针——在每个国家内进行社会革命。

不错，在工人阶级的上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在全欧还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俄国人恰恰不应被这一点所吓倒。我们知道，在革命时期少数会很快变为多数。工人群众所积累的愤慨一旦彻底挣脱国家纪律的束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和他们的朋友就会立刻取得领导德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只有执行社会革命的政策才能表明组织上的分裂是适当的；但这个政策也使组织上的分裂成为必要。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的同道们与我们相反，他们反对从社会革命着眼来安排政治任务。他们在自己的政纲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我们的任务只能限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种议论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任务。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俄国，那么马尔托夫的议论或许是对的。可是，问题却是结束世界大战，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马尔托夫同志不是向俄国的工人说明，俄国的命运现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们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说，欧洲工人的失败会使我们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还要变为英美的殖民地；不是使我们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反而从狭小的民族的框框来看俄国的革命，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提法充满着曾经导致第二国际崩溃的该死的民族局限性。

马尔托夫同志在实践上把自己局限于民族远景，从而使自己有可能跟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共处于一个组织之内。他指望跟唐恩和策烈铁里一起熬过那种应同战争一起消失的民族主义“流行

病”，然后打算同他们一起回到“正常”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使马尔托夫跟社会爱国主义者联结在一起的，并不是空泛的派别传统，而是对社会革命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态度，即把社会革命看作是不能决定当前任务的提法的遥远目标。这就使他跟我们分了家。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于我们不只是民族民主革命当前的一个阶段；不，它是要完成一项国际主义义务，是要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战线上占领一个最重要的阵地。正是这个基本的观点，决定着我们对所谓民族护国主义的态度。战线暂时移动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们停止，也不能使我们放弃锋芒指向靠帝国主义互相残杀各族人民来支持的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

**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写于1917年9月。译自《无产者报》1917年9月6日第10号。

#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声明

(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

## · 编者按语 ·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向各交战国政府建议进行和谈。但是英法等国拒绝这一建议，苏维埃政府乃于1917年12月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奥两国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当时俄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疲于战争，旧俄军队陷于瓦解，为了获得喘息时期，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坚决主张立即签订和约。

但是，托洛茨基和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却在媾和问题上疯狂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左派共产主义者”空喊革命口号，主张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则主张既不签订和约，也不继续作战，即所谓“不战不和”。他作为苏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违抗列宁和中央的指令，在布列斯特擅自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宣布退出战争，同时全面复员军队。德军利用托洛茨基的这一叛卖性声明，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线进攻，使苏维埃共和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只是在红军奋起阻止德军进攻以后，3月3日在布列斯特签订了和约，但这时和约的条件比原先的要苛刻得多。托洛茨基的叛卖行为使苏维埃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然而他在《第二次战争与和



约的签订》一文中却诬蔑当初赞成签订和约是“不战而降”。

在为彻底解决和约问题而召开的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继续为自己的“不战不和”的反党立场进行辩护。

托洛茨基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他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能在帝国主义包围中存在下去,而认为“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地拯救我们”;他认定德国不会发动进攻,而如果德国发动进攻,就会“在德国引起剧烈的爆发性事件”。

列宁多次揭露和谴责了托洛茨基的罪恶行径,指出“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托洛茨基一伙“实际上是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447页)。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解答如下问题:对方所提出的边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即使是在最低限度内保障俄国人民的自决权。我们听取了参加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我方代表的报告,我们认为,在对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讨论和全面研究以后,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各国人民在迫不及待地等待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结果。各国人民在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由世界各国统治阶级的自私和贪权所引起的空前的人类自相残杀?如果战争在一个时期曾经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那么现在它对两个阵营来说早就不再是这样的了。如果英国攫取非洲殖民地、巴格达和耶路撒冷,那么这就不再是自卫战争了;如果德国占领塞尔维亚、比利时、波兰、立陶宛和罗马尼亚并侵占莫昂宗德群岛,那么这也不是自卫战争。这是分割世界的斗争。现在这一点

是清楚的，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

我们再也不愿参加这场为了满足有产阶级的贪欲而公然以人类的鲜血为代价的纯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对两个阵营的帝国主义采取同样的不妥协态度，我们也不再同意用我国士兵的鲜血去保卫一个帝国主义者阵营的利益，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者阵营。

我们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以等待我们所期望的世界各国被压迫劳动阶级象俄国劳动人民那样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的庄稼汉士兵要回家务农，以便在今春和平地耕种革命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农民的土地。我们的工人士兵要回到工场，不是在那里生产用于破坏的工具，而是生产用于建设的工具，和庄稼汉一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退出战争。我们把这一点通告各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我们向目前正在抵抗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军队的我国军队发出了全面复员的命令。我们期待并且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久也会效法我们的榜样。同时我们声明，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向我们提出的条件是根本违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这些条件遭到世界各国劳动群众（其中也包括奥匈帝国和德国人民）的驳斥。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库尔兰和爱斯兰的人民认为这些条件是强奸民意的；而对俄国人民来说，这些条件意味着经常的威胁。按照政治觉悟或道德本能行事的全世界人民群众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们期待有一天由世界各国的劳动阶级来规定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和友好合作的准则。我们拒绝承认德奥帝国主义靠利剑加在活着的各国人民身上的那些条件。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活着的人带来压迫、痛苦和不幸的条件上签字。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想根据军事占领的权利来控制各国的土地和人民。让它们公开地去干自己的勾当吧。我们不能使暴力神圣化。我们退出战争，但是我们不得不拒绝签订和约。

根据上述声明，我向同盟国联合代表团递交如下业已签署的书面声明：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兹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和中立国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并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全线的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

列·托洛茨基、阿·越飞、米·波克  
罗夫斯基、阿·比岑科、弗·卡烈林

译自《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82—283页。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sup>83</sup>

(1918年2月18日)

托洛茨基(反对发出建议和谈的电报)证明说,现在群众刚刚开始领会所发生的事情;签订和约目前只会在我们的队伍中造成混乱;对于德国人也同样如此,他们以为我们只是在等待最后通牒。可能他们指望取得心理效果。必须等一等,看这一切对德国人民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在德国,停战受到兴高采烈的欢迎,德国的进攻会在德国引起剧烈的爆发性事件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要等一等看效果如何,如果没有产生这种效果,那时还可以建议和谈。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  
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98页。

## 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的发言

(1918年3月7日)

同志们，我们来总结一下在我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发展速度上出现不协调的时期。毫无疑问，我们大家或多或少曾经都是怀疑论者，但是我们全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欧洲革命的速度应当和我国革命的规模相近。没有疑问，我们全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我国十月革命本身，以及由这一事实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的社会措施、废除和公布旧的条约、公开建议举行和谈，所有这一切都会直接推动西欧的风潮。我们认为，这种震动将削弱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为我们向俄国资产阶级和欧洲资产阶级进攻建立新的、日益坚固的阵地。这里出现了某种不协调，不协调的非常深刻的根源在于我国的落后，在于无力经受这种长期的世界大屠杀的我国被卷进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

从这种尖锐的不协调中，我国革命先于其他国家，在欧洲革命前很久就成长起来了。它在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由此产生了我们面临的一切极其严重的策略上的困难。如今这种想法好象一个磨损了的硬币，然而目前还保持着自己的全部价值，现在不管我们怎样自作聪明，不管我们发明什么样的策略，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拯救我们。

我在中央委员会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弃了权，原因有二。第一、我不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或那种态度

能够决定我国革命的命运。我不认为它有决定意义。至于哪方面成功的希望大一些：是这方面还是那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较大的希望不在列宁同志那一边。关于这一点我下面再谈。第二、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所谓的反对派坚持的那种政策即革命战争的政策，要能够真正在实际中得到采纳，就需要各派意见一致，全党意见一致，这是首要的一点。当党内存在着以列宁为首的一半人或大部分人反对自己的时候，要克服落后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因循守旧心理，进行反对德国人和反对我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回到这个问题以前，我要三言两语地提一下上述国际政策的含义。

毫无疑问，如果单纯为了我们国内建设或为了得到有利的物质条件而需要喘息时机，那么我们本应在11月间就缔结和约。那时我们或许会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一个最好的和约，因为我们首先在德国敌人的队伍里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坚持这种观点。大家（包括列宁同志在内）都说：“去吧，要求德国人把话讲清楚，要揭穿他们，一有机会就中断谈判回来。”我们大家都把这一点而不是把革命的词句看作是和谈的实质。在最后一次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前，我们不断地讨论我们今后的策略问题。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人主张立即签订和约，这就是季诺维也夫。他从他的观点出发说得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说，我们如果拖延就会使和约的条件变得不利，应当现在就签订和约。但是大多数人说：“不，你们要继续采取原先那种宣传、拖延等等的政策。”季诺维也夫尽管提出了必须立即签订和约的问题，然而已经迟了。当我们最后一次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已经用不着我们来拖延谈判了，德国人自己就拖延了，他们不举行会议，因为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基辅乌克兰拉达<sup>84</sup>在准备贩卖。基辅拉达准备了第四宣言<sup>85</sup>。他们需要承认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

共和国，为此他们把乌克兰拉达代表团派到基辅去。他们要同乌克兰缔结一项最后的和约，以便对我们提出最后通牒。我们知道，同乌克兰缔结和约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当时知道，单独媾和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和平，尽管如此，我们大家都认为，现在同当时失去了基辅的乌克兰拉达打的交道并没有正式结束，而问题涉及的只不过是粮食和国内的其他自然资源而已。再说一遍，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到最有利的和约，我们早在11月就应当同意缔结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无论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我们全党——曾赞成这样做。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运动上。当时我们大家都主张搞宣传，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促使德国、奥匈帝国和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指望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最近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到了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罢工的消息。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不应当让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政治觉悟、它的斗争能力经受一番考验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首先承认不能签订和约。

我们本应作最后一次尝试，而列宁同志在这里反对这样做，但是他反对得不那么坚决。然而，那些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声明而指责我们的同志，当时却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如果硬要我去同德国人继续谈判，我在2月10日就会重做我已经做过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sup>①</sup>我认为在那时签订和约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虽然我很清楚，每拖延一天都会使和约的条件变得不利。为什么？因为所有我们过去同德国人的谈判和我们的宣传，只有当人们信以为真时，才具有推动革命的

---

<sup>①</sup> 这两句话在代表大会速记记录里记得不清楚。看来应当理解成这样：如果硬要托洛茨基去重开谈判，他会向德国司令部再次发表象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那样的声明，即“不战不和”。此外，在代表大会速记记录里，2月10日的日期被记成1月10日，这是错误的，本版已加以改正。——原编者注

意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曾在党团中说，正象前奥匈帝国大臣格拉茨说过的那样，德国人只是需要一个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他们以为我们示意要他们提出最后通牒。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的立场，被我们的敌人和愚昧无知的、不够觉悟的朋友们说成是拿早就预先作出的决定开玩笑，说我们把我们进行单独媾和和早先答允签订任何和约的做法当作儿戏，说我们在演革命的滑稽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签订这个和约，而不让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去经受考验，那么我们一方面有丧失烈韦里和其他地区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有失去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或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同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责任交给了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看来这个党是完全软弱无力的，它不仅没有试图反抗（喊声：“这是正式的党，可是另一个党呢？”），反而不断地为德国帝国主义对俄国的侵略性进攻进行辩护。德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了叛卖性的党。我是属于曾经认为德国人不会进攻的那些人之列的。当时我说，如果他们进攻，我们随时都有时间来签订和约，即使条件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相信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迫使或促使德国进攻的所有因素。拉狄克同志说，有些德国报纸现在说，在我们动身四天以后，德国报刊说过不会进攻。这里牵涉到哪些因素，是跟我们的同盟者玩幕后把戏呢，或者也许仅仅是德国本国最极端的军国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对我们来说现在几乎是无所谓。不言而喻，我们采取了冒险的步骤。这不是个人的冒险，不是小集团的冒险。这里曾经下了很大的赌注：看欧洲的无产阶级支持不支持我们？如果不支持，我们将被击溃。这种冒险是由于我们意识到形势的本质而引起的。我们对当前这种冒险的危险程度的估计是不同的。列宁同志认为，在德国人攻克了烈韦里和其他城市以后，现在必须签订和约；我所



属的那一派则认为,对我们来说现在唯一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就是以革命化的方式影响德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就可以不割断我们曾进行的宣传的继承性,不至于造成宣传上的历史的间断。当然,以后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现在必须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的无产阶级,面对那个不是由我们造成而是由国际形势的本质产生的政治悲剧,如果德国党不支持,我们就要它负全部责任。我们在退却、在自卫,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将实现列宁同志所预言的前途:我们要退到乌拉尔,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我应当说,列宁同志曾说过德国人想在彼得格勒签订和约,几天以前我和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记得,好象列宁在一次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私人谈话中,对德国人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曾表示怀疑,显然,他认为攻克彼得格勒一事会使德国工人大大革命化。这是可能的。攻克彼得格勒是危险的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对德国人来说,这显然也是一种冒险的策略。但是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冒险的,而我们的整个策略恰恰就建立在这种冒险的基础上,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把握。只能在许多不清楚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和那种政策来寻求解决,而一切都取决于欧洲革命的觉醒和发展的速度。就是我们批准这个和约,欧洲革命也要发展……那些说明和平的必要性的论据不仅瓦解建立军队的工作,而且瓦解直接动员工人群众的工作。同时在普斯科夫和其他地方有人对他们说,工人被赶去屠杀,但是这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结果。

既然我们被迫进行自卫,我们就应当保证自己有后方,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于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德国人,我们对日本开放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过来的道路,我就更不必提了。那里也有千百万卢布的各种各样的财富、原料,会在日本人的陆战队登陆后落到他们手中。现在就有谣言说,日本军队有成千上万的士

兵，日本政府不过是在等待体面的借口，以使用合适的形式建议我们离开远东。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我不想说，批准或者不批准和约，我们都会立即得到解救的办法。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在目前以党的名义号召进行革命战争或自卫的时候，我们应当在自己的队伍中取得完全的意见一致。如果我们发生分裂，如果在我们的组织中、在部分组织中有人认为，我们号召工人进行自卫，就是使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去让人歼灭，就是使社会主义革命遭受残酷的打击，那么，在当前时期进行革命的自卫是绝对不可能的。

情况是很严重的：党内一部分人不承认主张签订和约的人的决定，——我讲这一点不是指责谁，因为主张革命战争的人认为，战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和唯一的拯救办法，他们本应不顾党的正式意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党的很大一部分人退党了，从而大大削弱了苏维埃政权。在国家衰弱、农民消极、无产阶级情绪显然低沉的情况下，党还有分裂的危险。由于在中央委员会里形成的力量对比，我这一票关系重大；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取决于我这一票，因为有些同志是同意我的立场的。我弃了权，以此表明我不能对党在将来的分裂承担责任。我认为退却比为了取得虚构的喘息时机而签订和约更合适些，但是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为党的领导承担责任。我认为，在国家所处的目前形势下，分裂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不堪设想的。拉狄克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外交人民委员没有权利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弃权。因此，我当时就在那一次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辞去了我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

总之，同志们，和约已经签订了，它需要得到批准。我不会建议你们不去批准它。我非常尊重体现在签订和批准和约、体现在这样或那样的喘息时机、甚至即使是没有确定的历史时间的喘息

时机上的那种政策。在这里，特别是列宁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应当认真进行战争。为了进行战争，不仅要有普斯科夫农民的刀，而且还要有大炮、炮弹、步枪等等。如果美国现在由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而感到出售步枪和大炮是有利的，从而把这些武器供给我们，我们就把它们拿过来用于自己的目的，而不用害怕这是从帝国主义者那里来的。我们同列宁同志就是这样来看待问题的，我们都认为美国给军事装备当然是从自己的考虑出发的。显然，我们当时指的抵抗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所能进行的抵抗，而不是敷设庞大的铁路、建立强大的军队等等这样的抵抗。因此，我们所指的反击是利用我们现有的并且须要进行整顿的力量所进行的反击。列宁同志谈到撤出彼得格勒的可能性。但要知道单单这一件事就得用几天和几个星期，而敷设铁路则要用好几个月和好几年。

如果革命战争是持久性的，这两种前景都是可能的。它们会把党弄到分裂的地步。如果欧洲革命发展得过于迟缓，如果我们为了获得喘息时机而签订和约，从而交出乌克兰，那么这种危险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我们没有支持我们革命部队的直接斗争，然而根据最新消息，看来那里的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没有作战，而我们苏维埃联邦的部队却在进行斗争。明天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可能会面临支持乌克兰无产阶级的问题，但是它们能做些什么呢？后天德国人会要求我们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这一点在他们的和约条件中是有的，但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是否同被我们和乌克兰工农赶走了的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呢？其次，当斯文胡伍德击溃芬兰红军的时候，还会要求我们同他签订和约。这种要求是不能排除的，相反地，它是由和约的条件合乎逻辑地产生的。我们能不能还说我们力量薄弱，不能予以拒绝和进行抵抗，所以必须同意这样做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进行由于它所处的国家统治

阶级的地位而应进行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说，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苏维埃政权是一个过重的负担，我们出现得太早了，应当回到地下去，这就是上述说法的含义。对于一个革命的阶级来说，同帝国主义者勾结是不能容许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掌握着苏维埃政权。应当发展和加强这个政权。难道我们掌握着政权，还要由于考虑到没有一定期限的喘息时机而继续退却和不断地作出让步，根本不提出任何限度，不提供任何保障吗？我们力量薄弱，因此不仅在地理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在废除债务、我国工业国有化问题上作出让步。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前景不明的喘息时机而让这种退却发展下去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会陷入内部矛盾的地步。这样我们可以说，俄国无产阶级就无力保持住阶级政权。历史上种种情况的配合把这个政权交给了它，但是由于各种条件，它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正在交出这个政权并实行退却。我认为，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将会建成很好的铁路，至少会建成还能过得去的铁路。这个喘息时机最多不过几个月，而更确切些说，最多不过几个星期和几天。在此期间，问题将会弄清楚：或许我们会宣布说，我们出现得太早了，我们要下台，回到地下去，让切尔诺夫、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这些著名的政客去同斯文胡伍德或乌克兰去算账。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得已下台的话，我们应当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下台，即为每一个阵地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历史条件正使我们面临这种前景。

如果资产阶级战胜我们，这对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将是一个打击，但是不能把这同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法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而欧洲的其他地方则没有任何革命传统，在政治上陷于半封建的野蛮状态，现在完全不同了。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欧洲无产阶级比我们更加成熟。即使我们被击溃了，那也不会形成象巴黎公社以后那种历史性的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已经开始到处出击了，例如，当我们离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逮捕了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sup>86</sup>，而这次逮捕是对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公然挑衅。这事恰恰发生在我作出“我们停止战争”的声明的时候。由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逮捕了这些贵族，我们就向德国人显示了俄国革命的铁拳。我们的任何行动，对于德国帝国主义者来说始终都会是一种挑衅行为。我问过：“我们是否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我们让步的限度？”我在中央委员会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再一次提出来。乌克兰在战斗，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和士兵们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战斗；考虑到业已形成的局势，我们不支持他们。我们珍惜喘息时机。但是如果德国人要求我们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我们是否签订呢？中央委员会的有些同志说：“是的，我们要签订。”我说：不。这将是不折不扣的叛卖行为。要知道他们目前正在作战，他们正在同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军队作战。因此我说：“不，同志们，我们不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我们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和约签订的情况下将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样的决议案。我们不能进行革命战争，因为那样会引起党的分裂，会动摇苏维埃政权。批准是免不了的，但是我想在这个决议案中提出对退却规定一个限度，这种退却不仅是从某个边界的退却，而且也是从一定的国际政策原则的退却。我们应当指出，我们想获得一定的喘息时机，想赢得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在乌克兰拉达摧残乌克兰工人的时候，为了这种喘息时机而阉割我们的国际政策的精神。我们不能同基辅拉达缔结和约，因为它把乌克兰工人当作直接的阶级敌人。

我们投弃权票的人表示了巨大的自我克制精神，因为我们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为了挽救党的统一而牺牲了自“我”。你们应向对方说，你们走上的那条道路有着某些现实的希望。但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它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拯救了生命，但抛弃了生命的含

义。你们应当在这个决议案中向我们保证，你们的退却有一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不容许了。你们应当说明，中央委员会的道路是不对的，你们应当指出你们的人民委员们不应超出的限度。

译自《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5—72页。

## 第二次战争与和约的签订

德国政府在和谈破裂后的最初几天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选择什么道路。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认为，主要的东西已经到手，没有理由去追求我们的签字。军人们准备无论如何要冲破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上规定的框子。德国代表团顾问克里格教授对我们代表团的一位团员说，在目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德军向俄国进攻的问题。当时任德国驻彼得格勒使团团长的米尔巴赫伯爵动身去柏林时表示，保证达成关于交换战俘的协议。这一切丝毫不妨碍霍夫曼将军宣布停战已经结束，同时他们是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最后一次会议之后来计算七天期限的。在这里对这种无耻行为表示道义上的愤慨，那是不适宜的，因为这种无耻行为非常适合于统治阶级外交和军事道德的一般范围。

德国的新进攻是在对俄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展开的；我们得到通知不是原来约定的七天以前，而只是两天以前。这种情况在早已处于慢性解体状态的军队中加深了张惶失措的情绪。几乎谈不上抵抗的问题。在我们宣布战争状态结束以后，士兵们不肯相信德国人将会发动进攻。张惶失措的退却甚至使本来准备进入战斗阵地的个别部队丧失斗志。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区里，反对德国人背信弃义和真正强盗般地入侵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在这些使人忧虑不安的日日夜夜，工人们成千上万地准备报名参军。但是组织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在后面。个别士气高昂的游击队，在同德国常规部队最初几次认真的交火之后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因此士气进一步衰颓。旧军队早已惨败和分崩瓦解了，阻塞了所有的道路。新军队在全国消耗殆尽、工业和运输业遭到极大破坏的条件下组织得很缓慢。德国人入侵道路上的唯一真正的障碍就是空间。奥匈帝国政府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乌克兰。拉达<sup>84</sup>通过自己的代表团向中部帝国政府公开请求给予军事援助来反对当时在乌克兰全境取得完全胜利的苏维埃。这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同工人和贫农的斗争中自愿地为外国的入侵打开了大门。

同时斯文胡伍德政府谋求德国刺刀的帮助来反对芬兰的无产阶级。这样，德国军国主义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充当了扼杀俄国工农革命的刽子手的角色。

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在下列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们是否应该在这种条件下屈服于德国的最后通牒并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我们谁都不怀疑，这个条约所包括的条件将比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向我们提出的更苛刻得多。一派的代表认为，目前当德国人正在俄罗斯共和国领土上对内部斗争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不可能在俄国的一部分地区创造和平的条件和采取消极的态度，同时德国军队将在南部和北部恢复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以列宁为首的另一派认为，每一次延期，每一个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时机，对于俄国，对于巩固内部和提高防御能力来说，都会具有巨大的意义。当我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我们目前无力抵御敌人的入侵以后，缔结和约到处都将被理解为是受力量对比这一严峻的规律所迫而采取的行动。如果从抽象的道德考虑出发，那就是幼稚的行为。任务不在于光荣牺牲，而在于最终取得胜利。俄国革命要存在下去，必须存在下去，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赢得时间，以等待西方革命运动的援助。德帝国主义同英美军国主义仍打得难分难解。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俄国和德国之间缔结和约才是可能的。必须利用这种局面。革命的利益就是最高法律！必



须接受我们无力拒绝的和约，必须保证自己有喘息的时机，以便利用这个喘息时机在国内进行紧张的工作，包括建立军队。

在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一样，赞成缔结和约的人取得了胜利。在1月间认为不能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现在也赞成缔结和约了。他们说：“那时我们如果签订和约，会被英法两国工人理解为不作斗争就可耻地投降。甚至英法两国沙文主义者关于苏维埃政权同德国人阴谋勾结的这种无耻诽谤，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使西欧工人中的某些人信以为真。在我们拒绝签订条约以后，在德国人发动新的进攻以后，在我们进行反击以后，在我们的军事弱点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得一清二楚以后，谁也不敢责备我们不战而降。”第二次的比原来更苛刻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正式签订并批准了。

写于1918年5—6月。译自《托洛茨基全集》  
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7卷第1  
分册第125—128页。

# 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

——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布)

中央全会的提纲初稿

## · 编者按语 ·

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国家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时托洛茨基在党内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转移了全党、全国的注意力。在争论中,托洛茨基又抛出提纲,又写小册子,要求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提出“拧紧螺丝”和“整刷工会”的口号,同时组织反党派别,进行派别活动。在托洛茨基的煽动下,一时党内派别林立,什么“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缓冲集团”,纷纷登场,组成反党大合唱。

贯穿于托洛茨基这几篇文章的基本精神,是“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托洛茨基的“整刷”政策就是要把那些在工会领导岗位上的老布尔什维克停职或撤职,而代之以能贯彻执行他那一套强制手段和行政命令的人。其结果必然是在党和工会之间,在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在工农之间造成分裂。列宁在谈到“整刷”时尖锐地指出,“这种态度会造成分裂,并且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页)。

列宁还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工会国家化”的主张,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

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03、406页）。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斥责了他们的派别活动，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责令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派别集团，违者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这一决议为反对托洛茨基之流的派别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1. 我们的工会正经历着极严重的危机，几乎所有工会运动的工作人员，不论地方的或中央的，都感觉到、意识到并证实着这种危机。这种危机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在不同的工会中所表现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工会危机由于构成“上层”和“下层”问题的各种病态现象而复杂化了。但是，必须撇开那些表明苏维埃俄国一切组织和机构的实际生活的一般条件、困难和现象，才能弄清工会本身经历的危机的特殊的独特的性质。

2. 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工会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和无定规。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工会（仍以革命时的那种方式）试图直接掌管生产机关。它们未能适应这种状况。于是出现了与工会平行的管理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苏维埃机关。这种苏维埃机关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工会的，同时又完全独立于工会之外，并把领导经济的工作集中在自己手中。

这样，工会机关就和管理该工业部门的机关平行存在。行政经济机关的独立性和闭塞性越来越发展，因而它与工会相脱离的状况也越来越发展。换句话说，工会越来越受排挤，不能实际参加

经济生活。

工会在提出担任经济职位的人选和进行生产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很不明确，而且极其有限。

工会没有任何发展的前景。而为了发现合适的人选和进行生产宣传，可以建立远比工会更为经济的机关。许多积极的工会工作人员都为这种状况而感到苦恼，力图摆脱工会的工作。如果目前这种危机拖延下去，工会就有完全瓦解的危险。

3. 在工人国家，工会是吸收该经济部门的工人的组织，其目的是最正确而有效地为生产本身的利益服务，同时提高工作人员本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生产工会不是从属于生产的工会，而是为了生产的工会，即为了全面地参加生产，包括领导生产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经济机关和工会组织的平行存在只能容许作为暂时现象，而不能容许作为工人国家的原则。共产党、生产工会和工人国家机关的思想和精力应当用来使经济机关和工会在不远的将来融合起来，以便使工会毫无例外地吸收参加该工业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使行政经济机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机关，即成为工会的极重要机关，而后成为宣传、教育、供应和执行纪律之类性质的机关。

4. 可见，对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来说，工会方面的任务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必须使工会掌握生产，另一方面应当使工会有能力掌握生产，而不仅是“协助”生产。

正是这个目标要明确和清楚地向工会提出来。工会在工人国家中所起的生产作用和工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起的（基本上是）“工联主义”作用是根本不同的。然而在保持和加强国家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在工会内部，同国家的关系目前仍然是作为订约的一方。这种工联主义因素由于上述情况而渗透了许多工会工作者的心理，它无论对工会还是对经济机关，换句话

说,对整个工人阶级都是非常危险的。

5. 党在向自己和工会提出明确和清楚的任务,即保证工会在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以后,应当向自己和工会提出为此目的而改组、改造和重新教育工会的任务。

我们正在建立、改组、解散和重建苏维埃经济机关,正在选拔和考查不同岗位上的各种工作人员。工会几乎完全置于这项工作之外。然而,非常明显,如果向工会提出在一年、二年、三年之内掌握本部门生产的任务,那么,目前就必须着手改组工会,即首先就要从这个角度来选拔领导人员。

6. 十分明显,整个说来,只有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维埃国家才能既从思想上领导把工会从职业工会改组为生产工会的工作,又保证这种改组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质条件(人员,技术机构,等等)。在一种场合下(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旨在使工会接近于生产类型的组织变化,是通过特殊条件所造成的极其坚决果断的组织措施来实现的。如果明确规定苏维埃国家中工会组织的目的,并使这个目的为全体工会工作人员所了解,那么,改组工会的组织措施就能具有非常平和的性质,使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十分明显,在这个决定工会今后命运(或者瓦解,或者提到更高的历史阶段)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工会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听取党的明确指示,得到工人国家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充分帮助。在一种场合下,这种领导和行动的机关是政治部(交通总政治部<sup>87</sup>),在另一种场合下则由党中央、相应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和经济管理总局等派代表参加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临时委员会。

7. 由此可见,指责上述观点为工团主义是多么不严肃。所谓工团主义是指工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组织力图不要或越过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去掌握生产。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才能帮助工会

进行改组，以便使它完全有能力掌握生产。

8. 改组工会应当做到：

(1) 向工会提出广泛的生产目标(掌握生产)，作为宣传鼓动、组织和选拔人员的基础；

(2) 立即调派大批经过各方面考验，证明具有经济才干和一般组织才能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工会；

(3) 保证工会有必要的、真正在技术上有能力承担工会所面临的任务的机构。

9. 由于全国的整个形势，没有可能同时均衡地提高经济，因而也不可能同时均衡地加强一切工会，因为既缺乏人力，又缺乏物力。重点制原则是从目前条件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整个说来，实行这项原则的必要性是广大群众，其中也包括工会工作者都理解的。那些目前没有希望得到特殊照顾的经济部门和工会的工作者可以自己来实行重点制，这就是划出少量企业，集中精力来进行恢复。重点制原则尽管有其缺点，但是目前被公认为恢复经济所必不可免的方法，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得出来：目前的工会代表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报告所提出的决议，其中谴责工会领导机关采用重点制方法不够坚决。

只有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生产成果，才能为更广泛地实行平均制，主要是为真正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创造实际的条件。

10. 现在应当把大力加强五金工会的问题提上日程。必须立即成立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和五金部的代表参加的专门委员会，来全面弄清五金工人工会的现状并且采取最广泛而坚决的措施选派坚强的工作人员和组织者，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工会。

11. 生产工会应当吸收该经济部门所需要的一切工作人员，从干粗活的工人到最熟练的工程师。

工会应当从生产角度来考核工会会员，掌握对每个工作者的生产作用所做出的全面而明确的鉴定。

工会应当使在各种行政岗位或行政技术岗位上的全体工作人员承担一定的工会职务。应当使所担负的工会工作成为生产工作的必要的和必然的补充。

应当使工人群众充分认识到，现在最能捍卫他们利益的，是那些提高劳动生产率、恢复经济和增加物质财富的工作人员。应当把这类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同继续在机床旁劳动的工人和专职工会工作者一起选拔到工会领导机关中去。

12. 在该工业部门得到恢复的基础上内部已经完成向劳动热情高涨方向转变的工会中，可以而且必须日益广泛地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即经常在广泛的群众会议上讨论一切经济生产措施，对一系列经济行政岗位采取选举制，从而使这些岗位同在生产组织内部的一定地位结合起来，如此等等。

13. 在专家问题上，即在使他们在生产中和在工会中的地位相协调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只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14. 所有专家毫无例外地必须经过工会的审查。由于历史条件和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专家可以分成三类：（1）受考查的（昨天的高尔察克匪徒，弗兰格尔匪徒等等）；（2）候补工会会员；（3）享有充分权力的工会会员。

只有最后一类专家可以被委派到负责岗位而不需要政治委员。第二类专家只有在生产工会派出政治委员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负责的职位。第一类专家只能在作为工会会员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手下当助手或顾问。通过这种方法，工会会员的称号在生产上将

取得很高威信，这种威信无论对工人的思想还是对专家的思想都同样会产生良好影响。

在生产民主即劳动者的主动精神，尽可能广泛实行选举制等原则同劳动军事化和重点制原则（这是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在从被毁掉和被破坏的劳动市场向有计划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过渡的时候，即在国家极其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劳动军事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 necessary 办法。但是这种军事化，正如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阐明的那样，只有在全体有觉悟的工人和革命农民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在过渡时期这种不可避免的强制措施必须依靠越来越广泛地引导、组织和发挥主动精神的工作，依靠提高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生产水平与一般文化水平。

把“军事”方法（命令、惩罚）和工会方法（解释、宣传、主动精神）单纯地对立起来就是考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偏见。没有成千上万工人和农民的主动精神，工人国家的劳动军事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种主动精神现在正在变为千百万人的主动精神，并且逐渐吸收和溶合最严厉的强制方法和措施。在工人国家中把劳动组织和军事组织对立起来就是可耻地向考茨基主义投降。红军是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主动精神的成果。红军本身的“军事化”，即培养红军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勤奋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完全建立在这种主动精神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落后的农民阶层不断进行鼓动和宣传的基础上的。

15. 我们今后要继续发展这种制度，逐渐扩大运用从基层到上层的选举制原则，把工会的负责作用和生产的负责作用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在比较近的时期内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工会将从一切方面完全掌握该生产部门，同时通过选举和选拔



相结合的方法,分离出全部行政经济机构,由协调一切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国家进行全面监督和领导。

列·托洛茨基

译自《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15—819页。

# 工会的作用和任务

## 代 序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看来也是唯一引起争论的问题）将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及其工作方法的问题。本小册子试图对那些决定工会今后前途的基本问题作出扼要的、近乎提纲式的回答。

虽然小册子署的是我的名字，其实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许多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参与了商定原则性条文的措词和制定实际建议的工作，这些条文和建议构成了本小册子的内容。

我和所有这些同志希望，本纲领性小册子将使同志们更好地了解工会在苏维埃政权发展中的新的经济时期的新任务，从而有所裨益。

1920年12月25日

## 一 工会组织的危机

1. 我们的工会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它表现在同群众联系

的削弱，同经济机关和党组织经常的磨擦和频繁的冲突，工会的踏步不前，它所面临的~~任务不明确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混乱~~，这种思想混乱使某些工会运动的工作人员倒退到原则上早已为党所肃清的工联主义立场上去了。

2. 危机的最不容争辩的原因之一是，工会在整个内战时期因牺牲沉重而受到削弱，并一蹶不振。此外，工会的许多积极分子和有首创精神的人被调到粮食部门和各个苏维埃行政工作部门。领导干部的削弱不能不影响到工会的工作，影响到领导机关同群众的联系等等。

3. 而在这方面更加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把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努力都转移到前线方面去了。经济方面的任务以及工会运动问题退居到第二、第三位。

在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极端紧张地投入战争的情况下，工人组织，其中包括工会组织的内部生活和独立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推行工人民主的方法(广泛的讨论、批评、思想斗争、选举制等等)变得极为有限，极不完备。

4. 上述各种原因，对于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无论是党组织、苏维埃组织，还是工会组织，都是共同的，但是它们绝对掩盖不了工会危机本身特殊的、独有的特点。这一事实在目前显得尤为突出。

当前，过渡到采取独立活动和选举制等方法，已是大势所趋，对全党来说已根本无需争辩，在这个时候，在工会运动方面，我们在工会的作用、意义及其工作方法的问题上面临着不同的趋势。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只应一致确定在我们所有工作部门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工人民主的方法。本届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

5. 工会危机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工会在发展的现阶段客观

上所面临的任务同过去遗留下来的在工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方法不相适应。现有的工会和应有的工会之间的不相适应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工人国家内部的最大矛盾。不克服这个矛盾，我们就不能在经济方面迈出重大的步骤。

## 二 工会在党纲上和实际上的地位

6. 关于工会组织的作用和任务问题，我们的党纲写道：

“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既然是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就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工作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最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同时，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也是同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的官僚化作斗争的主要办法，并且提供对生产成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的可能性。”<sup>①</sup>

实际上，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接近了党纲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离它更远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这不仅对工会，而且对经济，都是极大的危险。

7.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会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为改善工人状况，然后为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进行斗争。

<sup>①</sup>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在克伦斯基时期，工会转而对工业实行监督，这种监督是劳动同资本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十月革命以后，工人阶级(主要是通过工会)自己设立极简单的机构来掌握国有化企业。这个运动曾被称为自发的工团主义，但是根据不足。事实上，工人群众在革命的这个最初时期就是用这样一些群众半自发创造的方法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军队等等。

随着经济机关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它们的分工更细和专业化等等，经济机关就从工会分离出来。经济机关独立性的增长引起了机构重叠、权限争执、组织上的磨擦和冲突等不可避免的现象。经济机关在这个专业化和划分权限的时期，力图限制工会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它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整个苏维埃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的本质的东西已失去意义，因为在工人国家中不能进行阶级的经济斗争。另一方面，从工会分离出来的经济机关发展得越来越独立，它们为自己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创立新的工作方法和习惯，建立和改造自己的机构——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条理，越来越有名无实。工会的深刻危机正是从这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8. 使工会不能积极而负责地参加建设工作，这就极大地助长了工会工作者领导层中的工会保守主义。

在苏维埃制度的三年期间，在机构、工作方法和领导机关人员等方面，工会的变化都比工人国家其他一切组织的变化小得多。在失去了旧的生存基础即阶级的经济斗争以后，工会由于种种条件，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能够有效地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向它提出的、在我们党纲中

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

9. 现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某些生产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完全置于基本的经济工作之外，这种状况是根本不能容忍的。几乎所有在组织、经济和行政方面有才华的工会工作者都被生产机关吸收而自动脱离工会，这种做法是很不正常的。各总局和委员部越来越与生产工会相分离，与之相隔绝，似乎要把经济领导权垄断在自己手里，这种事实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归咎于经济机关。为了建立更加合理的相互关系，必须使工会自己愿意并且能够直接参加制订经济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必须使工会给自己全面地提出这个任务。

在工人国家里不可能有组织上彼此分开的组织生产的专家和工会运动的专家。应该承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生产所需要的人，也是工会所需要的人，相反，任何一个有用的工会工作者也应该参与生产的组织工作，这是一般原则。

10. 正如我们党纲所要求的那样，把生产的全部管理工作集中在工会手里，意味着有计划地把工会变为工人国家的机关，并逐步地把工会机关同经济机关结合起来。问题不在于形式上宣布工会为国家机关，而在于使工会事实上变为生产组织，把每一个工业部门从各个方面包括进来并且既对生产的利益也对生产者的利益承担责任。

11.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得到反映的这个观点，在形式上，即在口头上，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所承认。例如，托姆斯基同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同意布哈林同志对我们党纲的观点的阐述而没有作副报告。

不久前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版社再版的小册子对工人国家中工会的作用和地位作了如下的阐述：

“由于业已形成的过程，工会不可避免地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的机关,对于在该生产部门从事工作的一切人员来说,参加这个机关将是一种国家义务。”

“工会正在由同资本进行斗争的机关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机关,而且,随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推进,工会工作的重心便转移到组织经济的方面。工会担负着组织劳动和生产的主要工作,并且工会越是精通这项任务,就越能够同国民经济结合起来,成为它的脊梁骨。”

“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会在过渡时期共同建立生产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委员会,主要的国有化企业管理委员会,等等),而它们本身,随着向社会主义的推进便失去自己的特点;苏维埃和工会的全部工作集中到组织劳动和生产上;它们的非生产职能便消失。工会和苏维埃经济机关是融合起来,产生统一的经济机关。”<sup>①</sup>

12. 可见,任务不在于重新审查党纲规定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前提,而在于采取新的切实步骤实现党所承认的和在党纲中规定的原则。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年中经济组织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某些部门取得了重大的生产成果。经济计划的统一问题具有越来越具体的、实际的轮廓。然而整个这项工作对于工会几乎毫无影响。如果在工会机关同生产机关结合方面,总的发展方向对我们是无可争辩的,那么,十分明显,在经济方面的每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该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相结合的道路上的新阶段。在这一点未达到之前,危机将会加深。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随着经济任务被提到首位,许多工会工作者日益激烈地和不要妥协地反对“结合”的前景和由此产生的实际结论。我们认为,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就是这种工会工作者。

<sup>①</sup> 阿·洛佐夫斯基《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会》1920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版社版第34、35页。——托洛茨基注

不仅如此。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新的任务和新的方法，在自己的一批人中间培养小团体主义和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因而实际上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

### 三 在工会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13. 如果正确地提出问题，那么在工人国家里组织劳动的任务能够具有生产的基础和目的。换句话说，组织劳动和组织生产应该一致。正是由此而产生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逐渐“结合”。据我们看来，党纲的观点就是如此。

14. 与此相对立的观点是苏维埃工联主义。这种观点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只有梁赞诺夫同志说得比较完整、比较公开。（见他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副报告。）

梁赞诺夫同志要工会保持它在国家中的原有地位，即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当然，梁赞诺夫同志拒绝采取战斗的方法，即拒绝罢工，而从这个方面把任务归结为对国家政权施加组织上的压力或影响。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中，大工联的领袖们也是把自己的任务归结为对国家施加思想的、议会的等等压力，而拒绝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采用战斗的方法。可见，梁赞诺夫同志实质上是力图使工会在工人国家中保持强大的机会主义工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占据的那种地位。梁赞诺夫希望托姆斯基同志成为工人国家的龚帕斯。

15. 以上我们看到，托姆斯基同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形式上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而洛佐夫斯基同志却相当鲜明地



表达了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结合”和“融合”的观点。但是，工会的旧方法、旧习惯、旧组织与崭新任务(组织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如此之大，以致使许多工会领袖几乎不由自主地背离了根据党纲的立场而得出的实际结论。既然托姆斯基同志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把自己的立场同逐步结合和国家化对立起来，他们也就越来越陷入梁赞诺夫同志的苏维埃工联主义。

16.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建议把领导经济的工作立即和全部交给工会，即实行国家“工会化”。这种明显受工团主义思想倾向的支配而提出来的措施似乎是很激进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点切实可行的内容。把领导生产的工作交给工会在目前的情况下就等于说把担任这项领导工作的现有机构交给工会，换句话说，就是以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代替五金部委员会，同时在地方上也作相应的更替。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自己的机构来直接领导五金工业。如果它把五金部正式工会化，就不得不利用过去三年中在五金工会参加下在五金部内实际上业已形成的那个机构。

当然，今后由工会建立的新的五金部委员会可以通过安置适当的工会工作者的办法来着手改造管理机关、进行人员的更新以及其他工作。但是这样一来，结果不是由工会一下把生产全部管起来，而是非常接近于结合<sup>①</sup>，只是这种结合未必十分正确和有系统，因为根本无法证明，按照工会目前的状况，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比现在的五金部委员会更适合于领导五金工业。而用简单的群众性袭击生产(在生产方面已有固定的、并非偶然建立起来的机构)来回避一切困难的做法丝毫不能提高工会在生产上的

---

① 原文为“询问”。在俄文中“结合”(сращивание)一词与“询问”(спрашивание)一词很接近。可能托洛茨基有笔误，把“结合”写成“询问”。列宁曾在页边上指出这个错误。现按列宁的更正译出。——编者注

作用,只能在组织上带来极大的混乱。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假激进的立场同保守的工会工作者的立场在下述方面是一致的:他看不到根据组织生产的任务必须对工会进行改组、改建和改造这样一个基本任务。

## 四 生产准则和生产教育

17. 把工会变成生产工会(不是仅仅从名义上,而是从工作内容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任务。工会工作者应该把自己不是看作满足工人的需要和要求的说客,而是看作劳动者在不断提高技术的基础上从事生产的组织者。

在工人国家里工会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它实际上掌管生产,把它的全部工作者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的机械化程度和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改善群众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

工会在进行生产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军事方面的其他一切工作的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作为劳动者的生产组织这一基本性质。

18. 生产工会应该把本经济部门所需要的全部工作人员,从干粗活的工人到最熟练的工程师都吸收进来。

工会应该对自己的成员从生产的角度进行考核,随时掌握对每个工作人员的生产作用所作的十分完整和精确的鉴定。

工会应该让在各个行政岗位和技术岗位上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担负一定的工会职责。担任工会的工作应该是对行政-生产工作的一种必需的和必要的补充。

必须使工人群众充分意识到,最善于保护他们利益的是那些提高劳动生产率、恢复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的人。必须把这类组织

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同继续在车床旁边工作的工人，同专职的工会工作人员一起选拔到工会领导机关中去。

“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践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怀。”

“党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和培养新型的工会工作者，即有毅力的、积极主动的经济工作者，他们在看待经济生活时，不是用分配和消费的观点，而是用发展生产的观点；不是用向苏维埃政权提要求、讲价钱的眼光，而是用组织者-主人翁的眼光。”（党中央12月7日的决议。）

19. 生产上的再教育，自然首先应该在工会工作者中间普及开展，因为这些人员要尽量加强和更新。中央和地方的工会领导人应该熟悉纯经济问题，从而给工会的日常工作提出生产准则。另一方面，经济机关的领导人员应该学会处理生产中的一切问题，其中包括纯技术问题，首先是学会处理诸如把觉悟日益提高的、团结精神不断加强的、富有朝气的工人有生力量组织起来的问题。只有这两种观点的相互结合才能为平行地存在的机构从组织上结合成统一的机构创造必要的心理基础，这个统一的机构将既保证生产的总利益，同时也直接保证生产者的利益。

20. 生产宣传是生产教育的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建立工人和生产之间新的相互关系。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批判思维是在摆脱雇佣劳动压抑的限度内发展的，那么在现在的条件下，必须把工人的思维、批评、首创精神和意志引向更好地安排生产本身，引向更合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和车床，引向劳动的机械化，引向科学地组织车间、工厂、地区和全国的劳动。

这种细致的、孜孜不倦的、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一次又一次反复进行的鼓动和宣传（主要的是用事实和范例，同时也用口头和书

面语言)从现在起应该成为工会生活和工作的最重要的内容。工会是否有生气、起作用,最可靠的一条标准是看它的生产宣传是否认真、具体和有效。

群众应该学会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虚有其表的、毫无经济意义的、装潢门面的建设,对待没有实际内容,即首先没有生产内容的纯属点缀的工人民主形式。

过去,工人群众受布尔什维克罢工者、街垒战士的鼓舞和教育,跟着他们向资产阶级国家冲锋陷阵。后来工人群众在战场上了解了作为指挥员和政委的布尔什维克,同他们一起学习和一起锻炼,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现在,最广泛和最落后的群众应该认识到昨天的罢工者、街垒战士、红色战士是生产者、组织者和经济工作者,应该恢复和坚定自己对他们这些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建设者的信赖。

## 五 工人民主和生产, 军事方法, 官僚主义, 专家和“工人化”

21. 某些工会工作者竭力把目前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思想斗争说成是“民主方法”同“委派制”、“委员制和命令”等方法的斗争,这是对问题的本质制造根本错误的概念。

经济方面的委派制和委员制仅仅是该工会在生产上无能为力、当时无力胜任刻不容缓的经济任务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补充措施。从原则上指摘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战线最受威胁的地方曾经采用委派制和委员制这种非常措施是不够的。必须用生产民主的方法在实际上消除这种非常措施的必要性。必须使工会牢固地立足于经济之上,学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那些迄今为止通常不经过

工会解决的极其重要的经济任务。

22. 生产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解释为同工人民主的思想是对立的。相反，工人民主只有作为生产民主才能发展。工人民主在民穷财竭的条件下是不能发展的。群众的主动性只有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挥，把一切力量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经济方面去，这应该是所有机关内部生活和工人民主形式的内容。

工会的工作越沿着新的方向开展，工会越深入群众，给群众以崭新的生产观点，那就越来越有可能在经济领域运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说，不仅在广泛的群众大会上对最重要的经济措施进行系统的讨论，而且对一系列经济-行政管理性质的岗位越来越广泛地采用选举制，其方法是将这些岗位与生产组织内部一定的职务结合起来。

23. 工人民主应该自觉地置于生产准则之下。非常明显，会议、建议、讨论、批评、宣传、选举，在它们不破坏生产进程的范围内是必要的，是允许的。运用民主方法的程度和方式必须由客观情况来决定。从抽象的，即空洞的工人民主的口号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任务，是根本不对的。

交通总政治部<sup>87</sup>过去在运输部门的活动遭到部分工会工作者的猛烈攻击，这是用形式上的民主对待经济问题的鲜明例证。尽管党是由于铁路状况非常严重而建立了交通总政治部作为临时机构，尽管交通总政治部完成了交给它的任务，就是说，它使运输部门摆脱了那种使全国受到致命威胁的状态，但是，某些工会工作者完全忽视了生产方面的问题，用形式上民主的准则去处理问题，他们不问用工会民主的方法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否取得必要的结果，就指摘交通总政治部。工人民主的观点在这里成了形式主义的，因而是庸俗的观点。工人民主不懂得拜物教。它只知道要适应革命。

24. 生产民主(劳动者的主动性,尽可能广泛地采用选举制等等)的原则同劳动军事化以及经济的重点制(根据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的原则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在从被毁掉和被破坏的劳动市场向有计划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过渡的时候,即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条件下,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办法。但是这种军事化,正如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阐明的那样,只有在工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且,在过渡时期实行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措施必须靠越来越广泛地进行工作来吸引和组织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提高他们的生产水平和总的文化水平。

军事方法和劳动军事化不久以前也得到工会组织中保守派的承认。

托姆斯基同志在1920年10月写道:“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劳动军事化就是劳动力的分配,就是根据整个国家计划和目前的要求进行这种分配,尽管它违背了这一措施在某个时期所涉及的某些工人的愿望。现在应当知道并懂得,在劳动战线上的斗争同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一样艰苦。每一起玩忽职守、经营不力、对经济活动漠不关心的事例都会给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带来贫困、寒冷和饥饿,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则是瘟疫和死亡。这里需要有象战时那样的毅力和决心。关于‘强制’的哭嚎阻止不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为了摆脱失败、贫困和疾病而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

“不管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们(他们现在是工人阶级中损人利己的旧阶层的思想家)怎样叫喊,工会从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正在实行并且必须实行劳动军事化,这是使俄国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的最必要的先决条件之一。”<sup>①</sup>

<sup>①</sup> 米·托姆斯基的文章载于《劳动通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月刊1920年10月号第24页。——托洛茨基注

洛佐夫斯基同志写道：“工业战线是俄国革命的最重要的战线，每个公民都有劳动的义务。对逃避劳动的人决不宽恕。”<sup>①</sup>这就是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劳动军事化。在消灭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私有制的时期谁能否认无产阶级国家拥有这个权利？谁能否认它有义务要求每个人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额的劳动？除了可怜的庸人、十足的笨蛋或者无耻的蛊惑者之外，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25. “按军事方法工作”对我们来说决不是只用或者说主要用恐吓的方法，而不用说服的方法工作。共产党人的军事工作要求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培养对待职责观念的英雄主义态度；即使牺牲，也要完成。因此需要勤奋、准确、负责。只有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具有我们的前线工作那样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巨大任务。在这方面，按军事方法工作同表面上的纪律和形式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它不是对工人民主的否定，相反，是工人民主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26. 生产民主意味着克服官僚主义。我们的党纲非常透彻地谈到，正是“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且由它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管理，这就是同经济机关的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手段。……”因此，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从我们党纲的观点来看，不是一项借助于某些组织手段所能解决的孤立的任务，而首先是工会在对群众进行生产教育和实际掌管生产方面的工作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方面，工人国家与其花力量来滥设监察机关，不如花力量采用使经济机关同群众性的生产工会相结合的办法来整顿和改善现有的经济机关。

由于工会不立足于创造性的生产工作，所以它开始踏步不前，

---

<sup>①</sup> 阿·洛佐夫斯基《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会》1920年版第63—64页。——托洛茨基注

僵化,并且表现出官僚主义的一切恶劣特点。

27. 所谓苏维埃机关“工人化”,意思不是要机械地排挤专家,用不内行的工作人员来代替他们,而是要使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系统地掌握国家各方面的活动,这只有在生产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完全达到。只有培养、挑选、提拔工人经济工作者、组织者,在工会和全国创造生产气氛,党和工会才能在最近的时期内使得富有创造精神的新生力量必然从下面大量涌现出来。经济上升不仅将使整个无产阶级精神振奋,而且将为无产阶级最有天赋的子弟充分发挥创造才能准备条件。

28. 可能有人反对说,不需要加紧(竭力加速)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结合,需要考虑群众的觉悟水平,工会国家化会使敌视工人国家的孟什维克工联主义得到发展的土壤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谈到点子上。发展速度可能受到最近时期我们整个发展所处的基本条件的制约而有所不同。但必须使工会全体工作人员都明确工会的发展方向,并沿此发展方向确定每一个前进步骤,哪怕这一步骤是微不足道的。

把工会国家化变成对当前实践没有任何影响的脱离现实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在当前实践的环境中工联主义的趋势正因此而得到复活。国家化是一个分阶段完成的创造性过程。必须考虑到群众的总的水平和某些工业部门的特点,认真细致地确定这些阶段,但是必须明确地遵循这个方向,以便在局势坚决要求前进时不致于后退。

29. 认为似乎工人群众不能理解工会向生产工会的转化,并且会背离工会,这种想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根本错误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即从外面向国家施加压力,现在不会给群众指出任何前途。相反,生产政策由于使经济得到好转,将会消除群众的贫困。劳动者首先希望经济上取得成就,他们将会支持在这方面所做的



任何认真而明智的努力。一旦取得初步的、群众可以看得出来的经济成就，他们就会表现出极大的生产热情。如果说有谁反对工会的新生产方针，那决不是群众，而是比较保守的那一部分工会官僚。

## 六 实际的结论

30. 根据以上所发挥的观点，必须立刻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以便消除工会的消极作用，切实地引导它去完成新的任务，使它的工作同经济机关协调起来。必须现在就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这样，两个最负责的生产机关单方面的专业化将是不可能的。其中每一个机关的成员都将有一部分工作人员直接感受到行政要求和生产上技术要求的压力，同时又生活在工会组织的环境中。

与此同时，在每一个机关中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纯”行政工作者和“纯”工会工作者，这样就能够在足够的程度上在过渡时期既保证工作上必要的专业化，又保证在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相互关系中有足够的伸缩性。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两个机关，在全体成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上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讨论并解决组织经济，包括组织劳动中的一切重大问题。

在各经济委员部、各总局和各相应的生产工会中央委员会方面也应建立起这样一种组织上的相互关系的体制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委员兼职的制度，兼职委员负责妥善处理两个机关的工作。

这个组织原则适用于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基层单位（州和边区、省、区和联营企业、街道、工厂等等）。

凡是行政-经济机关以一长制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地方，必须使一长制的行政负责人参加相应的工会基层工作，即使只有发言权也好。

既然谈的是要取得工会完全信任的工作人员，最好用选举的方法使这种行政负责人成为工会基层组织的有表决权的成员。

如果谈的是专家，工会因某种原因认为不可能使他参加自己的基层工作，哪怕只有发言权也不行，那么工会基层组织就要指派自己的全权代表（政委）来体现工会对行政负责人-专家的监督。

附注：任命全权代表（有政委的权力）是生产工会的特权，也是在经济机关中实行无产阶级制度的手段之一。

在各工厂、矿场和其他地方，工会越是坚决执行生产方针，群众在各种选举时越是深刻地理解生产准则，那么行政机关和工会机关组织上的结合和人员的结合也就越容易。任命工厂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为工厂厂长是完全适当的，当然，要以人选合适为条件。相反，工厂厂长如果是由外面委派来的，而他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够赢得工人的信任，工会基层组织就应该竭尽全力吸收他参加自己的组织。

31. 由于配备了相应的经济机关的优秀行政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而得到加强的工会经济部门，应该成为改善整个经济组织、科学地安排生产、实行机械化、泰罗化等等的强大工具。

各工厂的相应的基层组织应与工厂管理委员会建立一定的关系。工厂管理委员会有义务仔细审查通过基层的促进协会等这类组织所提出的一切改进技术和组织的建议，并且尽可能在工厂全体大会召开之前定期报告对所提各项建议的采用情况。

32. 劳动力的分配及其工资标准的调整交工会机关处理。

33. 工人和经济机构在生产过程中的冲突只能由工会来解决，因为工会对工农国家负有责任。

34. 从生产民主的观点来看，人所共知的困难在于专家问题，也就是确定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在工会组织中的地位的协调一致问题。但是，只要生产工会采取坚定和果断的政策，这个问题也可以圆满解决。

所有专家毫无例外地必须经过工会的审查。由于整个历史条件和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专家大致上可分三类：（1）受考查的（昨天的高尔察克匪徒、弗兰格尔匪徒等等）；（2）候补工会会员；（3）享有充分权利的工会会员。

只有最后一类专家可以被委派到负责岗位而不需要政治委员。第二类专家只有在生产工会派出政治委员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负责的职位。第一类专家只能在作为工会会员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手下当助手或顾问。通过这种方法，工会会员的称号在生产上将取得很高威信，这种威信无论对工人的思想还是对专家的思想都同样会产生良好影响。

35. 工业企业的一长制仍是整个过渡时期不可动摇的法规，尽管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平行地存在着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按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的管理委员会拥有管理权。但是，委任管理委员会和安排候选人的制度本身，管理委员会对工会的总的关系以及它进行工作的生产气氛应该使管理委员会越来越成为行政-经济机关，而这种机关就是工会为此目的而设置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工会干涉或不干涉生产管理的问题本身就会消失，因为非常自然，搞生产宣传的部门或者改善工人生活的部门将不可能干涉行政工作，行政工作由专门为此而建立的部门来担任。

36. 为了在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中做到步调完全一致，两者应该完全根据该生产部门的结构和要求按照同一型式建

立起来。

在改建和改组工会、工会区域等等的时候，不应该以工会机关自身的需要和方便为准，而应该以经济本身更深远的需要为准。

37. 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现成的组织方案能够概括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相互关系中的一切情况。在这方面要有创造性、主动精神，要有人员和组织符合客观具体条件的互相配合。但是，所有这些试验都必须根据下述共同任务来加以阐明：

在工会工作者当中培养和提拔经济工作者、生产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

密切工会与经济机关的工作，并使之在组织上结合起来；

划分出两者工作的共同部分，并共同予以解决；

不断地努力使这部分共同工作变得越来越大，最后扩大到全部工作，也就是说，使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彻底融合。

38. 全面发展这种制度，逐步扩大采用选举制原则，使工会的负责作用同生产上的负责作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就或迟或早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工会为了从各个方面完全控制本生产部门，将通过挑选和淘汰相结合的办法，在协调各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国家的普遍监督和领导下，从工会中产生出整个行政-经济机关。

39. 关于向上述方向发展的速度问题丝毫也无法准确预定，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局势和世界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全部力量和资金集中到经济工作上去的程度。但是，很明显，无论是在顺利的条件下，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展速度在不同的经济部门将是不同的，它取决于该工业部门的技术特点和在其中工作的工人的水平。

毫无疑问，在运输部门，特别是在铁路运输部门，以及在五金工业部门，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比在纺织工业和

木器工业部门能更早得多地得到解决,更不用说比农业部门了,因为在农业部门,这个问题目前甚至还没有在稍大的范围内提出来。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经济机关的政策在这方面应该是灵活的,应当具体地考虑到各该经济部门的特点,绝对不能追求按照一般的组织模子机械地把所有的工会和经济部门搞成一个样子,因为这种模子对一些工会和经济部门会显得太宽,而对另一些工会和经济部门则显得太窄。

如果比较先进的生产部门在其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在比较落后的生产部门的前面,给它们作出榜样,从而加快发展速度,那么,这不仅不会给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带来任何损失,而且对于它的整个工作会有极大的好处。

40.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改组工会应该是:(1)使工会具有广泛的生产目标(掌握生产),这个目标应该成为鼓动、宣传、组织和挑选人员的基础;(2)立即调大量的、具有经济才干以及一般组织才干经过各方面实践考验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工会;(3)保证工会拥有一个真正能担负起它所面临的任务的必要机关。

41. 国家总的状况没有可能使整个经济同时均衡地发展,因而所有工会也不可能同时均衡地加强,因为既缺乏人力,也缺乏资金。

在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只有通过重点制阶段,我们才能在一些基本的经济部门达到必要的比例关系。

这种思想在工会工作者本身的队伍中已很深入,这从最近一次(第五次)工会代表会议上以绝对的多数通过了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报告的决议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项决议对工会领导机

关采用重点制的方法不够坚决而提出了指责。

42. 目前,为适应经济的普遍需要,解决矿业工人工会和五金工人工会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尽力加强这些工会应该成为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特别注意的问题。

43. 生产教育不能只限于工厂和俱乐部范围之内。工人个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应该受到每个生产工会的特别关心。虽然我国经济处在各种困难之中,但只要有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协助,只要男女工人发挥自己应有的首创精神,只要把集体主义的因素带到日常生活领域(公社住房、公共食堂、托儿所、合作修补厂等等)中去,就有相当大的可能去改善工人住、衣、食的状况。每一个工会负责人必须寻求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办法,并且定期地使上级工会机关和工会刊物知道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

译自《列宁文集》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6卷第320—348页。

#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1921年3月14日)

同志们，我们现在要就工会问题通过一个决议。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问题都是以阶级与阶级以及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为依据的。与此相反，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估计我们的争论时却说，我们这些“生产派”忽视了关于农民的作用以及农民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他把这一点当作主要前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得不对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和农民心理作了巨大让步。然而季诺维也夫还说，生产派，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政纲的支持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的错误和虚伪暴露得最为明显。我必须指出，恰好在一两年前，即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我曾到乌拉尔工作将近一个半月，在那里更具体地接触到了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一切实际问题并从地方工作人员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之后，去年2月我曾向中央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这份建议我可以散发给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它与你们现在所要讨论并通过的那份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建议几乎是字字句句完全相符。我证明说，我们的粮食政策是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必须在这方面创造刺激力量，即改善农民经济的渴望，这一点在保持工人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经济上让步的办法是可能办到的。我们是一年以后才这样做的。当时我并没有灰心，我深信我们一定

会这么做。事实就是这样摆着的。在这里，预见的正确性完全在我们这一方面。

现在来谈一下关于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进行的斗争，仿佛是拥护工人民主或反对工人民主的斗争，“工人反对派”<sup>88</sup>崇拜民主原则，提出了一些危险的口号。把工人阶级的选举制仿佛置于党之上了。每个时期的专政都不是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形式主义原则上的。当然，工人民主是借以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的唯一方法。这是起码常识。我同意，有时会有意或无意忘记了这个起码的真理，因此需要修改和提醒，采用新的宣传方法，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有一个条件，即全党一致认识到：即使在工人阶级情绪暂时动摇的情况下，党仍然捍卫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如果这一点是所谓工人反对派所不了解的，那就会因此而造成极严重的后果。我断定说，在我们斗争的初期，特别是在同一直作为十人提纲的最明显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作斗争的初期，季诺维也夫同志把党的作用在工人民主作用的面前化为乌有了。当我证明工人民主必须以工人阶级经济利益为准则的时候，后来站到十人立场上的加米涅夫同志在争论中便宣称：工人民主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有条件的”原理。当然是这样。不过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有制约的。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即工人民主是某种处在所有其余东西之上的无条件的东西，那么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就是正确的了，他的第一个公式就说，每个工厂可选出自己的管理机关，每个区生产者代表大会可选出领导机关，直到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都这样做。如果从形式方面来说，那这是最明确的工人民主路线。在这个问题上，曾作了主要的斗争。但是，因为列宁同志参加了这场争论，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极为谨慎，他只是暗示：不要使季诺维也夫同志误入迷途太深。在这个问题上，不同阵营的同志们都有这种印象。这一点，今天又被证实了。



现在我在谈十人决议草案时，应当提醒同志们，要知道将要表决的不是演说，而正是这个草案。我认为决不能表决这个决议草案，因为这个草案十分——不妨说——不完善。在这里，列宁同志仿佛责备我（在这方面，他责备布哈林同志搞折衷主义）好象把经济和政治对立起来，而他认为政治是集体的经济。我过去和现在都说，党内的协调、革新、妥协和大力扩大工人民主范围等问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这一切都应当以经济准绳来衡量。在这里，并没有忘却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面临的危机，我们已经预料到了。从前，危机只是以征兆的形式在苏维埃、党及其他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在工会里，它表现为工人阶级消费心理的压力，表现为工人群众与生产心理的联系不够，而且最近越来越差了。

危机在于：在工会里，单纯消费观点的压力增加了，这种观点对下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要比对上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但是，如果说这一点在下面没有找到理论上的表现，那么在上面却找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的危机并不是工会的危机，而是一般的危机。这不过是一般地空谈危机罢了。但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分析危机在不同方面的表现。我们说，存在着工会危机，它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革命的危机，这种危机我们能够克服，但目前却存在着。由此有人作出了这样一个意料之外的结论，说我们证实存在危机是不对的；他们反对我们的意见，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发展。这就是整个实质所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毫不在乎地忘记了自己后半主张，即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发展。目前我们怎能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发展呢？如果是说“托洛茨基犯了错误，他不了解即将到来的是更加深刻的危机，而不只是单独的工会危机”，那就更合乎逻辑。这种说法虽然从实际方面来讲是不对的，但至少还合乎逻辑。可是说现在工会遭受的危机不是危机，而是发展的征兆，这象什么话！不说工会危机只是最深刻的危

机的反映，反而对我们说，“这是发展的征兆”。同志们，你们不能自圆其说，你们决议中“不是危机，而是发展”这一章是不正确的，无疑地应当完全删去。

其次，谈一谈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同志们，这里有许多老生常谈。决不能这样模棱两可地、马马虎虎地提出问题。这里说：“即使在苏维埃俄国，工会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一开头就说，“即使在苏维埃俄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季诺维也夫曾经对我们说：即使在欧洲，工会这个问题目前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欧洲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要知道，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以新的方式提出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溶化在全欧性的问题里面呢？现在应当以苏维埃共和国国内情况的特点、工人阶级专政（当然是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这种修正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以及这种专政的特殊条件为出发点。他们不仅要把我们从工人阶级专政这一点上向后拖，而且从一般的工人共和国这一点上向后拖，他们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和在资产阶级国家一样。”这一章就是从此开始的。是否谈到沙皇俄国，谈到德国和法国呢？这里，“共产主义学校”是什么意思呢？决议中说，共产主义学校的任务是“改造”半无产阶级分子，使他们“适应”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抱歉得很，这只是一般的空谈。“改造”、“适应”是什么意思？如何改造、如何适应呢？以什么为基础呢？接着又说到逐渐吸收“最广大劳动阶层参加经济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如何吸收呢？以什么为基础呢？要知道，到处都是这样说的。没有一个法令在提到任何一个机关时不是指示要“吸收”的。但是，如何吸收呢？我们有专门的“吸收”机关——工农检察院。吸收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在这方面，工会有什么特点？有何具体任务呢？没有说。在第七页上说：“对苏维埃俄国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

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请听一听，“同样地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可见，最初先作些改造和适应，除此而外，“共产主义学校”“还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恐怕这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他的手笔。“对苏维埃俄国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着……因素”。请注意因素，“经济教育因素”，“同样地”这一些词。这里，他们对生产观点作了让步，他们告诉我们说：“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它除了改造和适应之外，还包括一个不关重要的因素，即经济教育。”接着就说起与前面所说的完全矛盾的话来：“工会之所以能起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就因为它在按共产主义原则实际改组经济方面也是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者。”因此，既然只是“因为”，那何必要“同样地”和“因素”呢。我再说一下，这里到处都有矛盾和紊乱。这是写得很草率的、折衷主义的和前后矛盾的。这是不中用的。下一章是“关于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它也毫无起色。这一章里说，“工会迅速国家化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迅速”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小时走多少俄里？这完全是肤浅的，令人不可理解的，草率的。应当说明：我们是否要向工会国家化方面发展？如果是，那么应当说明这种发展的速度是取决于什么。显而易见，它取决于加入工会的工人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实际增加情况。换句话说，工会在经济方面的作用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工会逐渐国家化。如果我们向自己提出一项促使工会的生产作用增加的任务，那也就是我们促使工会国家化。但是，“迅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若是人为地加快国家化的速度，那就只会妨害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在这里没有说清楚“人为地加快速度”是什么意思。目前我国存在着工会脱离生产，消费心理流行的现象。为什么这里要讲人为地加快速度呢？为什么工会进一步国家化会损害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呢？如果非国立的共产主义学校更好些，那我们为什么又要按同样原则创办国立学校呢？请看一看

工农检察院向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吧。在第一页上就说：工农检察院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学校。这是一个国家机关，它建立了自己的类似基层工会的工厂基层组织。为什么在工人国家里实行国家化这个举动本身是共产主义学校的故障呢？如果我们不能把国家机关变为共产主义学校，同志们，那就应当更多地放弃一些东西。其次，“工会的说服方法和强制方法”这种说法虽不太确切，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并不反对。为了避免由此而发出怨言、产生误会和从事恶意宣传，我们已把这一点完全列到我们的提纲中去了。

当我谈到选拔工会领导人员，谈到我们应该从生产观点来为工会选拔工作人员的时候，托姆斯基同志便说，选拔就是委派。我们曾对托姆斯基说：他们在工会里担任什么职位，我们将采用工会组织的方法来确定，但他们的人选应当在党内确定。托姆斯基不愿作任何宽容，他说在这里选拔就是刷新和委派等等。而现在我们在有托姆斯基签字的决议中看到的却完全是这样的词句：“领导人员要由党来选拔”等等。接着下面讲到“工会和政治部”，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也遭到责难，因为极不公平云云。但是，同志们，我仍然请你们回忆一下，交通总政治部<sup>87</sup>是在什么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已经说明：“同时代表大会认为，采取一些特殊的和非常的措施（战时状态等等）是完全和绝对必要的，因为运输业处于惊人的解体状态，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以刻不容缓的措施防止运输业的完全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你们看：“面临运输业的完全瘫痪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在整整一年稍多一点时间以前，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交通总政治部是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首先为拯救运输业而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最初有人企图否认交通总政治部工作的成绩。我不知道你

们是否熟悉运输统计表。不妨了解一下经济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交通总政治部取得了极为巨大的胜利。由于成千上万共产党员投入这一极为艰巨的工作而英勇奋斗，所以获得了巨大的初步成就。我们制订了一年完成一万台机车中修的计划。我们在1920年下半年就完成了六千台机车的中修，从而，在1921年内（如果往后工作情况不是变坏的话）至少可以完成一万二千台机车的中修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用一些硬性办法进行的，当然，党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完全了解这方面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之中止。8月28日成立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受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推动，英勇地进行了工作，从而基本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拯救了已处于绝望状态的运输业。这种成就经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讨论并已承认之后而党代表大会还不承认，那是不对的，是不体面的；肯定十人草案中的意见，对你们所安置的、还未免职的工作人员说来，将是极不公平的。

现在谈一下关于一些实际建议的问题。这些建议已经争论得很详尽了，所以我不打算再来耽误你们的时间。将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对于各个实际建议我们将在这个委员会里更加详细地来谈，如果我们谈不妥，那再提到这里来。但是，有一项建议即关于增加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是此刻必须谈的。在十人草案中到处都提到，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太小，应当扩大和加强。但是，同志们，这里没有注意到一点，即工会现在的环境和工作是同1917年底或1918年初不一样，那时工会在组织经济方面面临的是一片荒野或敌占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或灵便的经济组织体系。他们向工会说：“你们应当在组织上扩大自己对生产的影响。你们应当比以前更多地掌握直接领导组织经济的工作。”这一点，在这个提纲里提过两三次，但这是什么意思呢？采取什么方式呢？你们知道，为反对合并进行了斗争。但是，在经济方面，工会在自己面

前是有现成的有组织的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会如何能够增加自己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是不经过这个机关、不借助于它或不通过组织上与它合并的办法吗？这就是我们处处都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工人反对派有这样解决问题的倾向，即由工会掌握经济，而撇开那些集中了我们三年建设经验的经济机关。这种解决办法是绝对不正确的。十人草案中说，过去工会和经济机关是同时并存的，由于当时经济机关的薄弱，证明这种并存局面是必要的。今后将怎样呢？显而易见，工会今后进行活动仍然是不撇开、不反对或不越过经济机关，不是把经济机关一脚踢开，不是同经济机关各自为政进行工作，而是达到在组织上的配合，也就是结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得到了你们方面的某些让步。我们曾经尽力使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和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同一时期举行会议，使它们有主要工作的共同日程，共同的小组活动，等等。如果条件容许实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在组织上的配合和结合方面会迈进一大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抛弃这种绝对不正确的提纲和这种既不能充实我们党、也不能充实共产国际的糊涂说法。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劝你们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季诺维也夫同志向你们作报告说，好象这个决议案包括了一切，好象我们已根据这个决议案而深信，党在对待工人阶级和农民方面有两种世界观、两种工作方法和两种态度等等。但情况并不如此。这是骇人听闻的夸大。我们现在处在最困难时期，需尽最大努力。如果你们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工会问题，那么，你们就会更心平气和地对待意见分歧，就会找到促使党达到最大团结的正确姿态。

译自《真理报》1921年3月17日。

## 致米·奥里明斯基

### ·编者按语·

十月革命胜利后过了整整四年，托洛茨基仍然顽固地坚持早已破产的“不断革命”论。

这封信本来是不供公开发表的，所以写得十分露骨。托洛茨基在信中大言不惭地宣称：“我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全是我不对”，“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说，当年列宁同托洛茨基的原则分歧意见，错误在列宁一边。托洛茨基还狂妄地声称，他关于分析革命内部力量和革命前途的文章至今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为这些文章从1917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

显然，托洛茨基这里要说的不是他走向了布尔什维主义，而是布尔什维克党向他“靠拢”了。关于这一点，不久以后他在新版《1905年》一书为《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所加的附注中说得更加清楚：布尔什维主义在十月革命前夕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思想上的重新武装”。

这封信对于认清托洛茨基的真面目，是个极好的反面教材。

1921年12月6日

亲爱的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

请原谅，答复迟了些。这个星期我忙得厉害。您问到可不可以刊登我给齐赫泽的信件。我不以为这样做是适当的。现在还不是谈往事的时候。那些信都是在一时的印象和需要下草成的，信中的语调就表现了这种情况。今天的读者不会理解这种语调，不会去查考必要的史实，因而只会感到莫名其妙。从国外应该可以得到党内档案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书刊。那里会有所有参加过“吵架”的人的大量信件。莫非您打算现在刊登它们么？这会完全多余的政治上的麻烦，因为党内大概找不到几个老侨民在当时思想斗争的影响下，出于一时的激动等等而未在通信中互相粗暴地辱骂过。

给我的信加一些说明么？但这等于把我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说出来。我在自己的小册子《总结与展望》的序言中简略地谈过这一点。我看不出由于偶然在警察厅的案卷中发现一些信件就有重提旧事的必要。对于这一点应当补充说，现在回顾派别斗争可能会导致一场论战，因为——我对这件事衷心感到后悔——我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全是我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方面是我不对，而且是根本不对，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但是，这个根本错误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而在那个时期无论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都是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的。当时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曾希望（我在信件和报告里屡次表示过这种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不断革命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立场上，这一点在1905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如列宁同志为考茨基论俄国革命动



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sup>33</sup>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而我根据这个估计对两派所做的结论则是绝对不正确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由于自己的不调和的路线，才把旧知识界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中的真正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才可能那么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的文章分做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分析革命的內部力量和关于革命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sup>48</sup>)的文章，另一类是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的斗争等等的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为这些文章从1917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第二类文章显然是错误的，不值得再版了。寄来的两封信就属于这第二类文章，发表它们是不合时宜的。十年以后让别人去做这件事吧，如果那时对此感到兴趣的话。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译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  
莫斯科俄文版第299—300页。

# 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工业报告的结束语(摘录)

(1923年4月21日)

## ·编者按语·

1923年4月17日至25日，俄共(布)召开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危言耸听地说什么整个经济机体“面临着一个严重危机”，胡说农业的发展“可能成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营养液”，手工业的发展“可能第二次在我国造成真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声称“现在有工人阶级专政被推翻的危险”，“有被私人资本碰得头破血流的危险”，甚至连农业丰收也成了破坏经济的一种力量，成了一种危险。他说什么丰收“既为国营工业打下基础，也为私人资本打下基础”。

斯大林在《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中谈到托洛茨基关于丰收是一种危险的观点时指出：“只要把托洛茨基的这个荒谬已极的声明和列宁同志在商品极端缺乏时期说丰收就是‘救国’的声明对照一下，就会明白托洛茨基的声明的全部错误了。”（《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7页）托洛茨基实际上是要党对农民采取危害政策，用剥夺农民经济的办法来建设工业。

既然我提出的只是第一个标准，我就来分析一下——手工业

在恢复起来吗？这样好吗？这有什么不好。这是需要的、正常的、必然的和进步的。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前进。这是市场的基础。这是正常的、必然的和进步的，但毕竟是初步的。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手工业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据说有人说过，要么是我被手工业吓倒了，要么是我用它来吓唬别人。不应该这样提问题。手工业本身现在是进步的事物。它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现象。但是，在国营工业没有同时充分增长和发展的情况下，在它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并处于亏损的情况下，这种手工业就不会处在我们合作社的影响之下，不会处在我们所组织的国家信贷的影响之下，而会处在私人商业资本的统治之下。因此，现在在我国已有相当广泛影响的商业资本同开始逐渐支配其他手工业者的富农手工业者的结合，可能第二次在我国造成真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客观的分析。这个危险大吗？怎么讲呢？这是一种不能用统计方法事先估计的危险，它取决于事物的进程，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斗争，而我们则是这个斗争中的主力。但是看不到这种前景，对它估计不足，就意味着要吃盲目无知的苦头，意味着必然会碰到灾难。我在报告中说过，手工业和手工艺一起提供了四亿一千五百万卢布的产品。

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还是那个压制手工业或者限制我国农民经济的结论吗？只有疯子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常清楚，我们不但不准备压制这种手工业，而且恰恰相反，我们越往后就越要从我们这方面尽一切努力寻求通过合作社和国家信贷同它结合的途径，把它逐步纳入国营经济系统。但是这个任务我们只是刚刚着手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库、税务机关日益适应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特点，即更多地压制富农和富农手工业者。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帮助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尽力把这种发展纳入一定的轨道，把它同我们的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但是，如果闭眼不看这一事实，即它可能成为同我们背道而驰的另一种发展的源泉，成为可能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营养液，那就是犯罪的和荒谬的行为，我现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怎么说好呢——用机械的办法把农村和手工业的生产力转入工业，强迫农村和手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国营经济呢？不，我们不能。这在经济上会造成一场灾祸。而在这场经济灾祸蔓延之前，我们会碰到政治灾祸。

2月间我们在喀琅施塔特察觉到了这种迹象。因此，我们经营管理的艺术应当在外国资本（这一点我们将单独来谈它）流入我国以前，把工业的发展同农业特别是农民经济最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依赖关系是通过复杂的途径来建立的。首先，我们通过合作社和私人贸易额来摸清市场，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国库和税务机关来摸清农民的购买力。这个税务机关对农民的压力很重；我们大家都想把这种压力减轻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关于这点将有一个专门的报告。我们的工业企图一方面直接依靠农民市场，这就是轻工业，另一方面依靠预算，而预算也是来源于农民那里的。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保持平衡，破坏平衡，如果我们不能满足农民，脱离农民，或者如果我们在这里或那里把赋税负担加得太重，因而破坏平衡，那么工业就会从某一块基石上滑跌下来。这是一个实事求是地正确估计农民的力量、弱点及其经济伸缩性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为自己提出跳过农民经济或乘汽车超过它的任务，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敢落在它的后面。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提纲在这方面明确地写道：“对国营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落后于农业，否则私人工业就会在农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它最后将吞噬或挤垮国营工业。”这个危险并不亚于第一个危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冒进了，脱离了农民群众。但是现在有工人阶级专政被推翻的危险；有落后于农民经济及其

剩余产品积累的危险，有被农民经济剩余产品积累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私人资本碰得头破血流的危险。关于这些危险，同志们，我在我昨天报告的主要部分中已经谈过了。

要是赶不上去，那么，随着今明两年的丰收，会有很大的危险。如果接连三年丰收，对我们来说自然是一种天赐的厚礼，但是这种丰收就要在国内外寻找销路。我们能够向国外输出多少，这取决于欧洲的购买力，但是主要取决于我们的运输条件和技术条件。国内将有农村本身不需要的大量剩余农产品。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呢？这是极大的优点。但是这个优点既为国营工业打下基础，也为私人资本打下基础。如果国营工业赶不上农村剩余产品的积累，那么在这种积累的基础上会产生私人资本，就是说，这种剩余产品会促进商业资本同手工业者和富农的结合，如此等等。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正在进入整个经济机体恢复的时期，但面临着一个严重危机，即我国工业原料的危机。而且我们正面临另一个更深刻得多的危机——固定资金的危机，即我们的设备日益损耗，这些设备需要更新，为此掌握工业的国家手中必须拥有这方面的资金。同志们，这就是一幅总的图景，但这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为了使自已对此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国家的经济正在恢复；有两三次丰收，恢复就会大踏步地前进。超过农村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落后。决不能落后！

译自《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报》1923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文版第297—299页。

## 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摘录)

### · 编者按语 ·

《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和《党的艺术政策》是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时写的几篇论艺术的文章中有代表性的两篇，反映了托洛茨基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

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认为无产阶级根本谈不上创造自己的文化。他否认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新社会中管理生产和文化的组织，而是为新社会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战斗的秩序”。托洛茨基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从而得出结论，“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在托洛茨基看来，艺术领域，党不能直接地进行“领导”，甚至不能进行“监督”，不能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而顶多只能给以“协助”和“指导”。托洛茨基的这些观点是同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学说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际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

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823页）

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创造自己的文化，因而也创造自己的艺术。历史上出现过东方的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文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文化以及现在统治着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由此似乎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也应当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艺术。

可是，问题远不象初看起来那样简单。奴隶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过许许多多世纪。封建制度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文化即使只从它崭露头角和蓬勃兴起之时即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也存在了五个世纪，而且达到极盛时期并不早于十九世纪，实在说不早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证明，以统治阶级为中心形成一种新的文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要在该阶级在政治上走向衰落以前的时代才能最后形成。

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呢？与奴隶主、封建主、资产者的制度不同，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专政是短暂的过渡时期。当我们揭穿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分乐观的见解时，我们要提醒说，一场社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将要延续的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和几十年——几十年，但不是几个世纪，更不是几千年。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里能不能创造新的文化呢？在这方面产生疑问当然是合理的，因为社会革命的年代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年代，那时破坏比建设占着更大的位置。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本身的主要精力将用于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以及为了生存和进一步斗争的迫切需要而运用这个政权。正是在这样一个革命时期，在这个使有计划的文化建设的可能性受到很大限制的时期，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才会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和得到

充分的发挥。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愈不发生动荡，如果文化创作的条件愈有利，无产阶级就会愈多地溶合到社会主义共同生活中去，从而失掉自己的阶级特征，即不再成为无产阶级了。换句话说，在专政时代是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即谈不上具有最伟大的历史规模的建设的；而当专政的铁钳已无必要的时候出现的、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化建设，将不会再有阶级性了。由此应当得出这样一个一般的结论，即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惋惜这一点确实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文化，为全人类文化开辟道路。我们似乎往往忘记这一点。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模糊不清的议论，是根据类比即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照而产生的，其根源在于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毫无批判地加以比拟。形式主义的历史类比这种肤浅的纯粹自由主义的方法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在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历史轨道上，根本就不存在物质上的类比。

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在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革命把国家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以前几百年就开始了。当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半无权的第三等级的时候，它就在文化建设的一切领域起着重大的、日益增长的作用。这一点在建筑学上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哥特式的教堂并不是在宗教灵感的冲击下一下子建筑起来的。科伦大教堂的结构、它的建筑样式和它的雕塑总结了人类从穴居的陈设开始所积累下来的建筑经验，把这种经验的要素用于表现当代文化，即归根到底表现当代社会结构和技术的新风格。旧行会和同业工会的资产阶级前身是哥特式建筑的实际建设者。有意识地积极地采用过哥特式建筑的资产阶级，在发展壮大即发财致富以后，就不是为教堂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宫殿式楼宇来创造自己的建筑风格了。资产阶级依靠哥特式建筑的成就，面向古希腊罗马的



风格，主要是古罗马的建筑样式，利用摩尔式的建筑样式，使所有这一切服从于新的城市社会生活的条件和需要，从而开创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十五世纪头二十五年末期)。专家们可以统计而且也正在统计：文艺复兴时代究竟有哪些要素渊源于古希腊罗马的风格，究竟有哪些要素渊源于哥特式建筑，以及究竟哪一方面占着优势。总之，在一个富有文化的新的社会阶级自觉有足够的力量来摆脱哥特式建筑的羁绊，把它和在它以前产生的东西仅仅看作是一种资料，并且能自由地使过去的技术要素服从于自己的建筑艺术的目的之前，文艺复兴是不会开始的。所有其余的艺术也是如此，而不同之处在于“自由的”艺术因为各自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即对实用目的和材料的依赖性较小，所以就不会以那么大的说服力显示出各种风格的克服和更替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在封建社会中负有为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存在而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的使命，在这两者和使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在法国)之间，资产阶级的物质威力和思想威力的壮大经过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法国大革命时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战争时期，使文化的物质水平暂时有所降低。但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天然的”、“永恒的”制度而确立起来了……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文化要素的积累及其固定为一种风格的基本过程，决定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产的和剥削的阶级的社会特性：它不仅在物质上是在封建社会的内部发展起来的，同封建社会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逐步把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还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在领导第三等级公开控制国家以前好久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基地(中学、大学、研究院、报纸、杂志)。只要回忆一下以下历史事实就够了：德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技术上、哲学上、科学上和艺术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素养，但是

直到 1918 年为止还让政权掌握在封建官僚等级手中，只是当德国文化的物质支柱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才决定，更正确地说，才不得不把政权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奴隶制艺术是经过几千年创造出来的，资产阶级艺术是经过几百年创造出来的，那么无产阶级艺术为什么就不能经过几十年创造出来呢？现实生活的技术基础现在完全不同了，因而速度也应当不同。这个表面看来仿佛很有说服力的见解，实际上却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当然，在新社会的发展中，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之后经济、文化建设、艺术都会得到向前推进的极大自由。至于它的速度我们现在只能加以想象。在一个摆脱了为糊口度日而惶惶不安的社会里，公共食堂把食物做得又好又有营养、美味可口，以供大家选择；公共洗衣店很好地为大家洗涤漂亮的衣衫；儿童们吃得饱饱的，健康而又快乐，所有儿童都能吸收科学和艺术的基本营养，就象吸收蛋白质、空气、太阳的温暖一样；电和无线电不是象现在这样以手工业方式工作，而是象一道集中了大量能量的无穷无尽的瀑布那样，听从计划的按钮工作；没有“吃闲饭的人”；人的获得了解放的利己主义——一股雄伟的力量——完全用于认识、改造和改良宇宙方面去，——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发展的活跃程度将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长期的和重大的转变之后才能出现，而这种转变总的来说几乎还没有到来。我们要谈的正是这个转变的时代。

难道目前的时代不是很活跃吗？是高度活跃的。但是这种活跃集中表现在政治上。无论战争或革命都是活跃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技术和文化来达到的。诚然，战争能引起一系列技术发明。但是它所造成的贫困却长期地推迟了这些技术发明的实际应用，而这些技术发明如果得到实际应用，就能够使日常生活

革命化。无线电、航空和许多化学上的发现都是如此。革命本身是为新社会创造前提的。但是它在这样做时用的是旧社会的方法：阶级斗争、暴力行动、毁灭和破坏。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人类就会在自身的矛盾中奄奄一息。革命拯救了社会和文化，但是所应用的却是最残酷的外科手术的方法。一切积极的力量都集中在政治上，集中在革命斗争上，——其余的都退居次要地位，一切障碍都被无情地扫除。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其个别的高潮和低潮：战时共产主义被新经济政策所代替，而新经济政策本身也要经历各个不同的阶段。但是总的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新社会中管理生产和文化的组织，而是为新社会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战斗的秩序。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可以设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1914年8月2日当作旧社会的顶点，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文化的狂暴势力把帝国主义战争的血和火喷向整个世界。应当说，人类新历史的开端是1917年11月7日。应当认为，人类发展的基本阶段大致划分为：原始人的史前“史”、古代史（它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发展的）、中世纪（它是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的）、通过雇佣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最后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可以期望由此无痛苦地过渡到无政权的公社。总之，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要用二十、三十至五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将作为由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极其困难的转变时期，而绝不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化的独立时代而载入史册。

现在，在暂息时期，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里对这一点可能会发生错觉。文化建设问题已经被我们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我们从今天要办的事推想到未来的许多年时，就可以想象到无产阶级文化。但是在实际上，无论我们的文化建设多么重要和迫切需要，它却完全处在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标志之下。我们依然是行军中的士兵。现在我们正在休息。应当把衬衣洗洗干净，理理发，梳梳

头，而且首先应当把枪擦干净和涂上油。我们现在的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不外是两次战斗和两次行军之间的某种休整。主要的战斗就在前面——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我们的时代还不是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走向新文化时代的初阶。对于我们来说，即使只是为了给新文化开辟道路，也必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掌握旧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

要是照例从国际范围来谈任务，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明确。无产阶级象过去一样，依然是一个没有财产的阶级。这就决定无产阶级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吸取那些已永远成为人类财富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要素。的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产阶级，至少欧洲的无产阶级曾有过自己的改革运动的时代，这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虽然当时它还没有企图直接夺取国家政权，但却为自身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的发展争得了更为有利的法律地位。但是，第一、历史给予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议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主要和第二国际时期相吻合）大约只有几十年，而同时给予资产阶级的则有几百年。第二、无产阶级在这个准备时期根本没有变成比较富有的阶级，没有把物质力量集中在自己手中，相反地，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它变得越来越贫困了。过去资产阶级是在掌握了当时的全部文化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而现在无产阶级只是在十分迫切需要掌握文化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首先是要把早先不为它服务的文化机关——工业、学校、出版社、报刊、剧院等——接收过来，并通过这一措施为自己开辟通向文化的道路。

在我们俄国，这个任务由于整个文化传统的贫乏和最近十年间在物质上遭受的破坏而加重了。夺取政权之后以及在为保卫和巩固这个政权而斗争的近六年间，我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创造生存和掌握文化常识（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常

识)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质前提。所以我们提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做到人人识字的任务不是没有原因的。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我使用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太广泛了。完备的、发达的无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是不会有的,但是工人阶级在溶化于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仍然能在文化上留下自己的印迹。这种反对意见,首先应当被认为是从无产阶级文化立场的严重退却。无产阶级在专政时期内会在文化上留下自己的印迹,这是不容争辩的。但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化理解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各个领域中的一种发达的、内部协调的知识技能体系,那么,这距离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很遥远的。千百万人第一次掌握读、写、算的技能,单是这一情况本身就是新文化的一个实例,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实例。要知道,新文化就其本质来说不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贵族文化,而是群众的、普遍的、人民的文化。在这里量变也可以转为质变:随着文化的普及,它的水平将会提高,它的整个面貌将会改变。但是这个过程也只有在一系列历史阶段中才能展开。随着这个过程所取得的成就,无产阶级的阶级联系将会减弱,因而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也就会消失。

可是阶级的上层呢?它的思想上的先锋队呢?能不能说,在这个即使是圈子不大的人们中间,无产阶级文化现在正得到发展呢?难道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科学院吗?没有红色教授吗?某些人就有这样非常抽象地提问题的缺点。事情被理解成这样,似乎可以用实验室的方法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在实际上文化的基本结构是在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这个阶级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资产阶级文化——技术、政治、哲学、艺术——是在资产阶级同它的发明家、领袖、思想家和诗人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读者创造了作家,而作家又创造了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无产阶级也是如此,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只能建立在群

众创造积极性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最近几年间的首要任务不是在暂时还缺乏基础的情况下对新文化进行抽象的概括，而是从事最具体的文化建设，即帮助其余的群众系统地、有计划地、当然也就是批判地掌握已有的那种文化的最必需的要素。阶级的文化不能背着这个阶级来创造。而为了同阶级一道，在同它的总的历史发展的紧密联系中来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必须——即使是初步地——建成社会主义。在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社会的阶级特征将不是加强，而相反是逐渐模糊并化为乌有——这同革命的成就是成正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作用就在于，它是为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和创造全社会一致的文化扫清道路和奠定基础的暂时的（短期的）工具。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在工人阶级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建设时期的思想，我们就不拿阶级的，而拿几代人的相互更替的历史过程为例来谈一谈。它们之间的继承性表现在：其中的每一代人——在社会的发展时期，而不是在衰落时期——都把自己的贡献归并到以前的文化积累上。但是新的一代人在这样做以前要经过一个学习期。他们要掌握现有的文化，同时又要按照自己的、多少不同于老一代人的方式实现它。这种掌握还不是创造，即不是新的文化珍品的创造，而只是进行创造的前提。以上所说的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来说明奋起进行历史性创造的劳动群众的命运。不过要补充一点，即无产阶级在结束文化学习阶段以前，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再提醒一次，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上层是在封建社会里度过自己的文化学习期的；在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在文化上就已经超过旧的统治阶层，并已成为文化的推动者了。就整个无产阶级，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它之所以不得不在掌握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要素以前来夺取政权，它之所以不得不以革命的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因为

资产阶级不允许它去掌握文化。工人阶级力图把自己的国家机器变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渴望的强大的抽水机。这是一项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但是如果不是玩弄字眼的话，那么这还不是创造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等等，在我们这里大概在十分之三的场合下是不加批判地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在十分之二的场合下是指无产阶级的个别集团掌握无产阶级以前的文化的个别要素的事实，最后，在十分之五的场合下，谈论的概念和文字是如此混乱，以致完全不知所云。

下面就是成百个例子中的一个显然不加批判地、危险地滥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的最新例子。西佐夫同志写道：“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系……构成时代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特征。”<sup>①</sup>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文化时代就被置于和资产阶级文化时代同样的地位了。但是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时代，只是从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向另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短暂的过渡。在资产阶级制度确立以前，同样也有它的过渡时代，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力图（而且是不无成效地）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它以消灭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为目的，并且尽可能在最短时期内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时期的长短直接取决于革命的成就。忘记这一点，而把无产阶级的文化时代同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时代相提并论，这岂非怪事？

但是如果这样，那么能不能说我们连无产阶级的科学也没有了呢？难道我们不可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非常宝贵的科学要素吗？

---

<sup>①</sup> 《无产阶级和科学》，载于《熔炉》杂志第8期第99页。——托洛茨基注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的意义，无论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武装，还是对于一般科学，都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在一部《共产党宣言》中要比在历史的、历史哲学的教授们编纂、投机、伪造的文库中有着更多的真正科学。但是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呢？能不能说，我们已经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用来解决政治斗争的任务，而且用来解决广泛的科学任务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然是用这个阶级的文化，而不是用无产阶级的文化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及其进行的罢工和斗争，没有他们所受的苦难和举行的起义，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有科学共产主义，因为没有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需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虽然宣称要作最后的殊死斗争，但它却是完全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概括思想，在其最大胆、最诚实、最有远见的代表人物身上——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冲击下——上升到了天才地进行自我否定的高度，而进行这种自我否定所需的批判武器的武库，是由资产阶级科学的发展所准备好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就是这样。

无产阶级并不是立刻就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自己的方法的，而且至今也还远没有完全找到。现在，这种方法几乎主要只用于政治的目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广泛应用及其方法论的发展完全是未来的事。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政治斗争的单方面的工具变为科学创造的方法，变为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和工具。

整个科学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倾向，这是不容争辩的。科学同有效控制自然界的任务接合得愈密切（物理学、化学、一般自然科学），它的超阶级的、全人类的贡献就愈大。



科学同社会经营管理机构联系得愈深刻(政治经济学),或者它把全人类的经验概括得愈抽象(不是在实验生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在所谓的“哲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它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自私观念的程度就愈大,而对人类知识的全部总和所作的贡献就愈小。在实验科学领域里,由于概括的范围不同,科学的诚实性和客观性的程度也不同。一般地说,资产阶级的倾向在方法论哲学即“世界观”的上层领域中最为自由。所以应当自下而上地清扫科学的大厦,或者更正确地说,应当自上而下地清扫,因为应当从上面的几层开始。但是,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运用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科学之前,就应当批判地改造整个科学,那就太天真了。这几乎同好说教的空想主义者一样,说什么在建设新社会之前,无产阶级就应当提高到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事实上,无产阶级只有在建成,即使是初步建成新社会之后,才能彻底改造道德和科学。可是我们是否会陷入循环圈呢?如何借助于旧科学和旧道德来建设新社会呢?这里必须运用一点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在我们这里现在竟被胡乱地塞进抒情诗中,塞进办公室的事务中,甚至塞进菜汤和稀饭中。某些基本论点,某些能把人的思想从资产阶级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科学方法,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着手进行工作来说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正在掌握并已部分地掌握了它们。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不同情况下进行的许多次战斗中检验了自己的基本方法。但这距离无产阶级科学还很遥远。一个革命的阶级不能因为它的党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电子和离子的假设、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生物学家的发展学、数学上相对性的新发现等等而停止自己的斗争进程。当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掌握科学和重新审查科学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但即使在这里,事情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产阶级是绝对不会把社会主义建设推迟到它的新的学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现在还

是小孩子)检验和清理好认识的所有工具和手段后再来进行的。无产阶级在抛弃显然不必要的、不正确的、反动的东西的同时,在自己建设的各个领域采用当代科学的方法和结论,采用时其中必然会混有一定比例的反动阶级的杂质。实践的结果大体上证明是良好的,因为受到社会主义目的检验的实践,将会逐渐检验和提炼出理论及其方法和结论。与此同时,在新的条件下培养的学者也将成长起来。总之,无产阶级在能够自上而下地对科学进行总的清理之前,必须将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相当高的高度,也就是使整个社会真正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文化。我绝不想以此来反对目前正在各个部门以小组或讲习班的方式进行或试图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工作。这种工作是必要的,并且是富有成效的。应当千方百计地把它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但是我们在估量这类实验和尝试今天在我们整个历史性工作中的比重时,需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眼力。

以上所述是否排除革命专政时期从无产阶级队伍中涌现出著名的学者、发明家、剧作家和诗人的可能性呢?一点也不排除。但是,如果把个别工人出身的人所取得的即使是很有价值的成就称为无产阶级文化,那是过于轻率的。不能把文化的概念兑换成个人日常使用的零钱,不能按个别发明家或诗人的无产阶级身份证来确定阶级文化的成就。文化是知识和技能的有机的总和,这种总和表明整个社会的特征,至少表明它的统治阶级的特征。文化本身包括和渗透人类创造活动的一切领域,使这些领域具有统一的体系。个别人的成就正在上升到这个水平之上,同时又在逐渐提高这个水平。

在我们目前的无产阶级诗歌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创造之间是否存在着这样有机的相互关系呢?显然没有。个别的工人或集团正在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艺术,而且现在还以相当折

衷主义的态度在利用这种艺术的技巧。难道这是为了表达无产阶级自己的内心世界吗？问题就在于远非如此。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还缺少一种固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只有当艺术同整个文化的现状和发展之间具有深刻的相互联系时才能产生。这是有天赋或有天才的无产者的文学作品，然而这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这或许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源泉之一吧？

不言而喻，在目前这一代人的工作中有许多这样的胚胎、萌芽和源流，多少年后细心的后代人将会划清它们开始导致未来文化的线索，就象现在的艺术史家划清宗教神秘剧导致易卜生的剧作，或僧侣绘画导致印象派和立体派的绘画的线索一样。在艺术上，也象在自然界一样，都是很经济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白白丢失掉，一切的一切都是联系着的。但在事实上，具体地、切合实际地说，现在无产阶级出身的诗人的创作，还远没有向着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准备条件即提高群众的过程发展。

杜鲍夫斯科伊同志由于自己的一篇文章伤了一批无产阶级诗人，看来树敌不少。在那篇文章中，虽然有一些我认为并不一定正确的思想，然而毕竟说出了一系列即使味道苦涩但却基本上无可争议的真理。<sup>①</sup> 杜鲍夫斯科伊同志的结论是：无产阶级诗歌不在《打铁场》杂志<sup>89</sup>上，而是在工厂墙报的无名作者那里。在这个结论中也有正确的思想，尽管表达得有些离奇。同样可以说，一些无产阶级的莎士比亚和歌德，现在正在某个地方光着脚跑着步上初级小学呢。毫无疑问，工厂的诗歌作者的创作就其同工人群众的生活、习俗和利益的联系来说，要更加有血有肉得多。但这毕竟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而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提高过程的表现。我们在上面已经阐明，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工人通讯员、土生土长的诗歌作

① 《真理报》1923年2月10日。——托洛茨基注

者、揭发者<sup>①</sup>在为将来的播种进行松土和整地的同时,也在做着伟大的文化工作。不过真正的文化艺术收获好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了。

写于1923年9月。译自《真理报》1923年9月24日。

---

<sup>①</sup> 原文如此。——编者注

## 党的艺术政策

某些马克思主义文学家惯用苛求的态度来对待未来派、谢拉皮翁兄弟派<sup>90</sup>、形象派作家和一切同路人，无论对他们全体或个人都如此。尤其是不知为什么竟把攻击皮利尼亚克当成一种时髦，甚至未来派作家也参与其事。无疑地，皮利尼亚克的某些特点能引起人们的愤懑，如：在重大问题上过于轻浮，过分装腔作势，卖弄才华，抒情味太浓……可是，皮利尼亚克卓越地揭示了落后农民的革命的一角，揭示了私贩粮食的车队，——多亏皮利尼亚克，我们对这些事情比以前看得清楚得多、明显得多了。而对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又该怎么说呢？他的《游击队员》、《装甲列车》、《蔚蓝色的沙漠》，尽管在结构上有种种缺陷，文体不加修饰，甚至粗糙得很，难道我们读后不是更好地了解 and 感觉到俄罗斯那辽阔的幅员、五光十色的风土以及她的落后和气魄吗？难道这种形象的描绘可以用未来派的言过其实的说法，或千篇一律的颂歌、报刊上天天以同样三百个单词不同排列的文章来代替吗？要想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把皮利尼亚克和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抛掉，我们就会贫困得多……对同路人进行攻击（有点不顾前景和分寸的攻击）的组织者又选定了—一个攻击目标，竟把《红色处女地》<sup>91</sup>的主编、环形出版社的领导人沃隆斯基同志当成一个纵容者，几乎当成一个同谋者。我们认为，沃隆斯基同志根据党的委托进行了大量文学和文化工作，并认为，用一篇文章浮皮了草地颁布共产主义艺术的命令自然要比从事共产主义艺术的细致的准备工作容易得多。

从表面上看，我们那些苛求者是在沿袭过去（1908年）《崩溃》文集所推行的路线。但是总应当理解并看清历史情况的差异和迄今发生的力量对比的某些变化吧！当时我们是挨打的、处于地下的党。革命退却了，斯托雷平、无政府神秘主义的反革命在各方面施加压力，知识分子在党内还起着不相称的巨大作用，而且具有各种派别色彩的知识分子团体都串通在一起。在这种条件下，思想上的自卫要求对文学上的醉后朦胧进行有力的回击。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基本上处于相反的状况。最终决定知识分子创作路线的社会倾向（倾向于统治阶级）现在对我们有利。应当善于使艺术领域中的政策适应这一点。

革命的艺术似乎只有工人才能创造出来，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工人革命（不再重复很早就说过的话）所解放的劳动力能用于艺术的毕竟太少了。在法国革命时期，直接或间接反映这一革命的最伟大的作品，不是由法国的艺术家，而是由德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直接完成变革的本国资产阶级不能分出足够的精力来描述和刻画这一变革，更何况无产阶级了，他虽有政治素养，但艺术素养却很差。知识分子除了表面上有其专业技术上的优势之外，还具有令人反感的、政治立场消极的特点，他们或多或少地仇视或者同情十月革命。持这种“旁观者”态度的知识分子在用艺术反映革命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能比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尽管有所歪曲）更多的东西，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十分了解同路人的政治局限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可是，如果我们抛弃皮利尼亚克和他的《赤贫年代》，抛弃有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吉洪诺夫和波隆斯卡娅在内的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抛弃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那么其结果，除了给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开出空头支票之外，还剩下什么呢？更有甚者，象杰米扬·别德内依这样的人，既不能把他算作同路人，我们相信在革命诗歌方

面也还不能抹掉他，连他都不能被吸收到按照《打铁场》杂志<sup>89</sup>的宣言的精神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学中来，那究竟还剩下什么呢？

那么是不是说，党在艺术领域中完全违背自己的宗旨，站在纯粹折衷主义的立场上呢？这个结论看上去多么无可指责，实际上却是极其幼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来估价新艺术的发展条件，注视它的一切源泉，用评述创作道路的办法来促进其中最进步的东西——如此而已。艺术应当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路子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是领导历史的过程。有些领域，党可以直接地、绝对地进行领导；有些领域，党可以进行监督和协助；有些领域，党只能进行协助；最后，有些领域，党只能给予指导。艺术领域并不是党发号施令的场所。党可以并且应当进行限制、协助和仅仅是间接的领导。党对各种艺术团体可以并且应该给予有条件的信任，只要它们真诚地努力靠近革命并用艺术的形式来描绘革命。在任何场合下，党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站在正与别的文学团体进行争论的或者干脆说进行竞争的某个文学团体的立场上。党所维护的是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党在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地为新文化从而为新艺术创造前提条件，党对待文学同路人的态度，不是把他们当作工人作家的竞争者，而是当作在宏伟建设中的真正的或可能的助手。党了解过渡时期文学团体的暂时性，因此对它们的评价着眼于它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所起的或可能起的作用，而不是着眼于文学家们的阶级身份。如果今天某一文学团体的地位还不能确定，那么，党作为党，就要善意而关切地……加以等待。个别批评家或读者可能对某个团体事先表示好感。捍卫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党则应当是客观的和明智的。党的慎重不可能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党不能只是因为写作的人是工人而给《打铁场》杂志打上纲领性的印记，另一方面，党也不能事先屏弃任何一个文学团体，即使是知

识分子的文学团体，因为它正在努力接近革命，并努力帮助巩固联结城乡之间、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某一个纽带，尽管这种纽带往往是薄弱环节。

但是，这样的政策是否就意味着，艺术领域是党的一个不设防的侧翼呢？这样说未免太言过其实了，不论现在或将来，党对明显有毒的、有腐蚀作用的艺术倾向都要根据政治标准给予打击。不过，艺术侧翼的防卫比政治阵线的防卫要松一些，这是对的。科学领域的情况不也是这样的吗？宣扬“纯粹无产阶级”科学的形而上学者关于相对论能说些什么呢？相对论同唯物主义是不是可以调和的呢？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何人、何时、何地解决的呢？我们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是完全根据唯物主义路线进行工作的，这连门外汉也明白。但是，关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又该怎么说呢？这种理论是同唯物主义协调的呢，如象拉狄克同志（我也如此）所认为的那样，还是敌对的呢？关于原子结构以及其他新理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学者能在方法论上概括这些新结论，并把它们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联系起来，进而对这些新理论作出相互验证，深化辩证法，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我很担心，这样的著作——不是报章杂志上的文章，而是象《物种起源》和《资本论》那样的哲学科学巨著——不是今天或明天就能产生出来的，退一步说，即使今天能产生出来，那么在无产阶级可能解除武装的日子到来之前，这种巨著也仍然有被封存的危险。

然而，难道文化建设，即掌握无产阶级文化以前的基本常识也要有批评、有选择、有阶级标准吗？这还用说！但是这种标准是政治的，而不是抽象文化的。政治标准同文化标准只是在广义上即革命为新文化准备条件这个意义上说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一致性在每一个场合都能得到保证。如果革命一旦需要去破坏桥梁和艺术珍品，那么对任何一个艺术派别，尽管它有一切明显



的成绩，只要它可能有分化革命队伍的危險，或可能有使革命内部力量（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相互敌对的危險，革命就不能对它袖手旁观了。我们的标准很清楚是政治的、带命令性的和毫不含糊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应当明确规定自己的作用范围。为了表达得更清楚些，我认为，在存在革命警惕性很高的书刊检查机关的情况下，艺术领域中的宽大而灵活的政策，同小团体的恶意苛求是格格不入的。

十分明显，党在艺术领域中一天也不能实行自由主义的原则：Laisser faire, Laisser passer（听其自然）。全部问题只是在于，干预从什么基点出发，它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下——在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之间——党必须作出选择。而这个问题决不象文艺左翼战线的理论家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言人以及……苛求者先生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目的、任务和方法比在艺术上要具体得多，明确得多，理论上研究得充分得多。然而，在以集中化方法建设经济的短暂尝试之后，党看到不得不允许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各种经济类型同时存在：这里有组织成托拉斯的全国性工业，有地方性企业，有出租、租让企业，有私人企业；有合作社和个体农民经济，有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集体等等。国家的根本方针是建立集中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在目前这个总的倾向中，也包含着对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的全力支持。没有这种支持，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的方针就会成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抽象概念。

我们的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联盟。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在提高技术和文化的条件下，需要经过一系列阶段才能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农民和知识分子不是按工人所走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他们的道路在艺术中是不会没有反映的。那种不把自己的命运同无产阶

级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由于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更确切地说，由于资产阶级的支持已十分脆弱，就会在农民中去寻找支持。眼下这个过程还纯系探索性的，在更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其表现是（颠倒历史地）把庄稼汉的革命自发势力理想化。这种独特的新民粹派可说是所有同路人的特征。今后，随着农村学校和读者的增加，这种艺术同农民的联系可能成为更有机的联系。同时，农民中也将涌现出自己的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比，农民的见解——在经济上、政治上、艺术上——较为简单、较有局限性、较为自私。但是这种农民的见解是存在着的，并且将会存在很久，很牢固。如果一位从农民的角度、多半是从农民知识分子的角度观察生活的艺术家，深刻认识到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他的创作，在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的前提下，就会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他的创作将会以艺术感染的方式巩固城乡之间必要的历史性合作。农民向社会主义迈进是一种深刻的、丰富的、多样的、鲜明的进步，有一切根据认为，在这种进步直接启示下所产生的艺术创作将会给艺术带来可贵的篇章。相反，把典型的、古老的、没有开发的、“有民族特色的”农村同繁华的城市对立起来的见解，在历史上是反动的。由此产生的艺术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是与历史发展不相容的，是注定要衰落的。可以认为，即使从表面上看，这种艺术除了旧调重弹和怀旧之外，不会有什么作为。

在克柳耶夫、形象派作家、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皮利尼亚克身上，甚至在未来派作家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卡缅斯基身上都有一种庄稼汉的气息，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得自觉一些，在另一些人身上表现得不那么自觉；在一些人身上是本能的庄稼汉气息，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实际上是转化为庄稼汉语言的资产阶级气息。未来派作家、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形象派作家以及皮利尼亚克对

待无产阶级的态度是很少口是心非的，他们处处都带着反无产阶级的倾向——至少在不久以前是这样。所有这些团体都以折射的形式反映了余粮收集制时期的农村思潮。在那些年代里，知识分子为了免于挨饿而跑到农村去，并在那里积累了自己的印象。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就用这些印象作出相当含糊的总结。但是应当看到，这种总结无非是以喀琅施塔特叛乱告终的那个时期的衬托。现在农民有了相当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知识分子中也有表现，并且可能甚至必然会在有庄稼汉气息的同路人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现在已经有所表现了。在这些团体中将会产生内讧、分裂，并在社会推动力的影响下重新组合。应当十分细心地和用批判的眼光注视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相信，不无某种根据希望取得思想领导权的党，没有权利以廉价的洁癖来回避这个问题。

可是，难道范围广阔的纯粹无产阶级艺术就不能够用艺术来阐明并促进农民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运动吗？当然“能够”，正象国营电站“能够”以自己的电力来照亮或供给农舍、畜棚、磨坊一样。只是需要有这样的电站和通往农村的电线。那时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就不会再有对抗性危险了。可是还没有这样的电线。也没有这样的电站。没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带有无产阶级倾向的艺术，包括工人诗人团体和党内未来派作家在内，要在艺术上满足城乡的需要，并不比苏维埃工业解决包罗万象的经济任务来得更快一些。

但是，即使把农民撇开不谈（而怎么能把他们撇开呢？），那么对于作为苏维埃社会的根本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情况也并不完全象文艺左翼战线的作品中所写的那样简单。未来派作家不仅仅是因为旧的个人主义文学在形式上过时了，而且也因为——归罪于我们的理由——它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者的本性有矛盾，所以才提议要抛弃旧的个人主义文学，这也就表明他们还是很理解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辩证性的。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

的。个人主义与个人主义也不一样。革命前的知识分子由于个人主义严重,有一部分陷入了神秘主义,另一部分走上了杂乱无章的未来派道路,还有被革命卷入的那一部分——值得称赞地——向无产阶级靠拢了。可是,当这些向无产阶级靠拢的人把极度厌烦的个人主义的情绪传到无产阶级身上时,说明他们多少犯了一点自我中心论,即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不幸的是,一般的无产者恰好不具备这种品质。无产阶级的个性总的说来,并没有完全形成和分化出来。我们正在掀起的文化高潮,其最有价值的内容恰恰就是要提高对个性的客观估价和主观自我意识。认为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能够打开阶级团结的缺口,这是幼稚的。工人从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陀思妥也夫斯基那里所得到的东西,首先是关于人的个性及其热情和感情等较为复杂的概念;工人会比较深刻而敏锐地领悟个性的心理力量以及无意识的东西在个性中的作用,等等。结果工人就变得更完美了。早期的高尔基浸透着带有浪漫色彩的流浪汉的个人主义。然而在1905年前夕,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蓬勃革命精神,因为他促进了这样一个阶级的个性的觉醒,在这个阶级中觉醒的个性正寻求与其他觉醒的个性的联系。无产阶级需要艺术的营养和哺育,但是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已故的或健在的艺术家们可以按自己的形象或模样随意捏塑的泥巴。

在精神上,从而也在艺术上非常敏感的无产阶级,是没有受过美学教育的。未必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无产阶级似乎可以简单地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毁灭前夕所停留的地方开始。一个个体在由胚胎开始发育的过程中往往重复着(生理上和心理上)本种类以至整个动物界的发育过程,同样地,一个新的、多数只是在不久前才摆脱几乎毫无历史地位状态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不重复艺术文化的全部历史。它在没有把旧文化的要素吸收过来并加以同化之前,是不能着手建立具有新风格的文化的。这绝不是说

必须缓慢地、系统地、一步一步地经历过去的全部艺术历史。既然这里说的不是生物个体，而是社会阶级，所以掌握和实现旧艺术文化的过程就具有非常自由和自觉的性质。但是对于新的阶级来说，不去研究过去最重要的里程碑，那就不能前进。

革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坚决性摧毁了旧艺术的社会基础，旧艺术的左翼在为保持艺术文化的连续性的斗争中不得不在无产阶级中寻求支持，或者至少在无产阶级周围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团体中寻求支持。而无产阶级则利用统治阶级的地位，努力着手搞一般的艺术，并为它准备空前雄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工厂墙报是未来新文学最必要的前提，这是正确的，尽管距离还很遥远。当然，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无产阶级在没有从墙报提高到独立的艺术技巧之前，就可以把其余的一切都统统勾销。创作传统的连续性对于无产阶级也是需要的。现在无产阶级主要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通过资产阶级的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来实现这种连续性，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倾向于无产阶级或者希望靠近它。因而无产阶级对其中的一部分要容忍，对另一部分要支持，对第三部分要半收养，对第四部分要完全同化。共产党的艺术政策正取决于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要把这种政策归结为一个极简短的公式是办不到的，而且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写于1923年9月8日。译自《真理报》1923年9月16日。

## 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

### · 编者按语 ·

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在挑起一场新的争论前发表的。托洛茨基打着探讨“革命规律”的幌子，篡改十月革命的历史，对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影射攻击。

他在十月武装起义的日期上大作文章，硬说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曾决定“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武装起义的时间不晚于10月15日”，只是后来“被有意识地推迟了十天”，才保证了起义获得胜利。

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文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拆穿了托洛茨基的谎言，指出中央委员会10月10日和16日两次会议的决议都没有规定过什么“10月15日”这个起义日期。而列宁之所以建议把起义的时间提前，“第一、因为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让出彼得格勒，这就会使高涨的起义受到挫折，因此每一天都是宝贵的。第二、因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公开规定并公布起义日期（10月25日）的错误，只能用在这个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来纠正”。（《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9页）在十月武装起义的关键时刻，犯了公开规定并公布起义日期错误的恰恰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设法阻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举行起义，实际上是破坏起义。列宁曾斥

贵托洛茨基的作法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

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列宁的伟大战略决策指引下，领导俄国人民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开始了武装起义，并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事实上夺得了政权。

“当然不能。只有火车才能按时发出，但也不总是如此”……

思维的准确性到处都需要，而在革命战略问题上更是这样。但由于革命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革命的概念和思想也就会蒙上一层油污，轮廓变得模模糊糊，问题勉勉强强地提出，又马马虎虎地解决。

墨索里尼按事先公开规定的期限完成了他的“革命”（即反革命）。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主义在革命时机到来的时候，没有实现革命。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完成了自己的“革命”，采取的办法是搞军事阴谋，规定了准确的日期并分配了角色。西班牙的军官们也是这样干的。反革命政变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反革命政变往往安排在这样的时刻，即当群众由于对革命或民主产生失望情绪而采取漠然态度，从而给组织-技术上业已作好准备并预先规定日期的军事打击造成了有利的政治形势。很明显，有利于反动政变的政治形势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更不用说规定一定的日期。但是，我们看到，一旦这种形势的各种基本因素都已具备，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就能事先选择有利的时机，并根据这个时机配置政治、组织和技术力量，实行确有把握的攻击（如果估计无误的话）。

资产阶级不总是进行反革命的，它过去也进行过革命。它是否为革命或反革命规定过日期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典型的或非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这是我们年青马克思主义者的课题！），那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颇有教益的。但

是，即使不作这样的细致研究，那也可以确定问题的下列基本因素：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即获得政权的那部分“人民”并没有进行革命，而是在等待革命的实现。当基层的运动冲破了界限，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或旧的政治制度时，自由资产阶级几乎总是自动地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自由派学者宣布这种革命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们就打着历史规律的旗号，制造出一大套毫无意义的废话：革命与反革命（即卡烈也夫过去说的动与反动）都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因而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或任意规定日期的，如此等等。这些规律从来没有妨碍过有充分准备的反革命政变。然而，这种模糊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维往往钻入革命者的头脑，使之造成极大的空虚，带来实际的危害……

但是，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也远不是在它的所有各个阶段都按照自由派教授的“天然的”规律发展的：小资产阶级平民民主派推翻自由派时，是通过密谋和发动预先安排好日期的起义实现的。法国革命的极左翼雅各宾派<sup>4</sup>就是这样干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自由资产阶级（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和1917年2月的我国资产阶级）来说，往往只要等到发生一个强大的自发运动，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知识和自己同国家机关的联系在最后时刻施展出来，从而掌握舵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行动，因为他们既没有财富，也没有社会影响和联系，他们往往只好以考虑周密和精心策划的革命行动计划来代替，而这种计划要求有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要有规定的期限。

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这样。共产党不能采取等待的态度，来对待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孟什维克的立场基本上就是这样：当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阻挠革命，当革命胜利了一半的时候，他们就享受革命的成果，并竭力阻止革命完成。共产党



掌握政权，不能是从旁利用革命运动的结果，而只能是直接地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技术上领导革命群众的结果，在长期准备时期是如此，在决定性的革命关头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对所谓革命是自发发生的，而不是进行的，因此不可能规定日期这种自由派的伟大规律完全无可奈何。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是正确的，而从领导者的观点看，这纯属废话和无稽之谈。

我们设想有一个国家，那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条件业已成熟，或者显然在日益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对起义和确定起义的日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如果这个国家正经历着最深刻的社会危机，矛盾尖锐到了极点，民情处于鼎沸的状态；如果明显的、无可争辩的多数劳动人民，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所有积极的、自觉的、奋不顾身的成员都拥护党，那么，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个尽可能近的日期，使得在这段时间内有利的革命形势不可能发生不利于我们的急剧转变，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来作好出击的准备，使自己的全部日常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服从于军事目的，以使用集中起来的力量进行打击，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任务。

我们且不去剖析一个抽象的国家，而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十月革命。当时俄国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国际上，都处在巨大的危机中。国家机关瘫痪了。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地涌到我们党的旗帜下。自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后来又在莫斯科苏维埃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多数时起，党所直接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地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是准备按照一定的计划、在一定的日期夺取政权了。大家知道，这个日期实际上也就是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子。一部分中央委员事先就认为，实际出击的时间应该安排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时刻。另一部分中央委员担心，资产阶级会在这以前作好准备并驱散代表大会，因而

要求把出击的时间提前。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规定武装起义的时间不迟于10月15日。这个决议在执行中被有意识地推迟了十天，因为宣传和组织准备过程证明，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举行起义就意味着在工人阶级相当多的阶层中散布疑虑，因为他们认为夺取政权应该是苏维埃，而不是党及其秘密组织。另一方面，已经完全弄清，资产阶级士气十分沮丧，他们不可能在两三个星期内组织有力的反击。

这样，党在起领导作用的苏维埃里取得了大多数，从而保证了夺取政权的基本政治前提之后，军事问题就完全按明确的日程摆在我们面前。在尚未具备这个多数以前，组织技术计划当然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假设性和灵活性。对我们说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初期建立的苏维埃，是衡量我们革命影响的标尺。苏维埃既是我们进行地下秘密活动的政治掩蔽所，而后来在实际掌握政权后又是政权机关。

如果当时没有苏维埃，我们的战略应该是怎样的呢？很明显，我们首先必须求助于衡量我们革命影响的其他标尺，如工会、罢工、街头示威游行、各种形式的民主选举等等。虽然苏维埃在革命时代是衡量群众实际积极性较为可靠的标尺，但是，即使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有可能看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多数什么时候拥护我们。很明显，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向群众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把整个问题摆到军事冲突的范围里去了，所以当我们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十分周密的、规定有日期的武装起义计划。

既然大多数劳动者拥护我们，至少在起决定作用的中心城市和州里是如此，那么根据我们的号召建立苏维埃就有了保证。较落后的城市和州或迟或早也会跟着起先导作用的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摆着一项政治任务即确定召开苏维埃

代表大会的日期，和一项军事任务即保证政权转到这个代表大会手里。显然，这只不过是同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在上述形势下，也就是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群众已经自发地向我们涌来，但还不能保证取得明显的绝对多数的时候召开决定性的会议，那我们怎样制订下一步行动计划呢？我们是否确定起义的日期呢？

答案可从上面所说的全部情况中得出。我们可以对自己说，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明显的绝对多数，但是群众中的变动如此巨大，取得我们所必需的、无可争辩的多数也就是最近几周内的事情了。假定说，为了在彼得格勒、莫斯科、顿涅茨矿区争取工人的多数，我们还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向自己提出这个任务，并在这些中心城市集中必要的力量来解决它。一旦争取到了多数——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实际检验这一点——，我们就号召劳动者建立苏维埃。在彼得格勒、莫斯科、顿涅茨矿区，要做到这一点绝不会超过一两个星期；可以确信，其他城市和州随后也会在两三星期内按照中心城市的榜样跟上来。这样，建立苏维埃网需要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在最重要的一些州里有了我们占多数的苏维埃以后，我们就号召它们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代表大会再外加两星期左右时间，这样，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就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应该准备好夺取政权，而且应该把它付诸实现。

据此，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军事组织作出计划，规定在两个月、最多两个半月时间内，准备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铁路沿线等地方举行武装起义。我之所以用假定语气说话（即假如这样做，假如这样规定），是因为虽然我们实际上干得并不坏，但并不是如此有计划地进行的，这倒不是因为“历史规律”妨碍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举行无产阶级起义还是第一次。

但是，运用这种方法会不会失算呢？夺取政权意味着战争，而在战场上就可能有胜有负。但是，我们概括地描绘的那条道路是最正确、最直接通往目标的道路，也就是说它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胜利的可能性。的确，如果在中央委员会开过上述决定性会议一个月以后，我们还没有得到大多数劳动者的支持，那我们当然就不能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等于悬在空中（我们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反对苏维埃的）。相反，如果过了两个星期以后无可争辩的多数已站在我们方面，这就会缩短我们的计划，使起义的决定性时刻提前到来。计划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即建立苏维埃和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如上所述，如果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正式建立苏维埃还得不到保证，我们就不能提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口号。由此可见，我们每个阶段计划实现的可能性是由前一阶段计划的完成情况提供和保证的。军事准备工作是与极严格地按日程规定的任务同时进行的。在这里，党要牢牢掌握住自己的军事机关。当然，在革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偶然的、预料不到的、自发的情况，无疑地，我们应该重视和适应所有这些“偶然现象”，但是，我们的策略计划订得越周密，我们处理这些突然事件就越有把握，越有成效。

革命拥有强大的即兴力量，但它永远不会为宿命论者、粗枝大叶和头脑简单的人作出任何好的即兴作品。正确的政治估量、正确的组织工作和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决心是必定要胜利的。

写于1923年9月。译自《真理报》1923年9月23日。

## 四十六人声明（摘录）

### · 编者按语 ·

1923年冬，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国家在经济方面出现某些困难，党内生活中也暴露出一些缺点。托洛茨基利用这种情况，纠集了“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中的残余分子，向俄共（布）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企图篡党夺权，改变党的路线。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向中央提交了一封信，信中大肆攻击党的机关的干部和党内民主制度，指责党的机关“官僚化”、“脱离群众”等，说什么“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基本上就已形成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完全形成和固定下来的那个制度比起战时共产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来，距离工人民主制要远得多。”

10月15日，托洛茨基召集一批反对派分子在家里开会，讨论并拟定了由四十六人签名的这份声明。但托洛茨基本人为了掩人耳目，没有在声明上签字。这是他玩弄两面派阴谋的一种手段。

托洛茨基一伙在声明中大肆攻击党的领导，预言严重的经济危机必不可免，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他们要求消灭“派别统治”，让各派别组织和集团能自由活动，认为这是彻底改变当前局势的唯一出路。

10月25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有

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联席全会。全会坚决谴责了托洛茨基及四十六人的声明，并作出决定，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指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50页）。

〔密件〕

俄共中央政治局：

目前形势极端严重，我们（为了我们党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得不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今年7月底开始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包括党内的）后果，无情地暴露了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很不称职。

中央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体系，在经济方面没有做到收支平衡，结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这些成就停止不前和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说，不能归功于不称职的领导，而是在不顾这种领导，或者毋宁说，在缺乏任何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

如果不迅速采取广泛、周密、有计划和果断有力的措施，如果目前这种缺乏领导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经济动荡，与此相联系，必然造成国内政治复杂化，并使我国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全部瘫痪。任何人都懂得，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这种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它决定着世界革命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

我们在党内关系方面同时看到，在最近的危机中暴露得特别

明显的领导错误正在使党陷于瘫痪和瓦解。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由于目前党的领导者在政治上无能所造成的。相反地，尽管我们在评价局势和选择改变这种局势的措施时，同他们会有分歧，我们还是认为党必须让现在的领导继续担任工人专政的各级领导职务。我们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在保持官方团结的表面形式之下，实际上我们在确定人选和行动指南时，都是片面地适应一个狭小的派别的观点和意愿。由于党的领导被这样一些狭隘的考虑所歪曲，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自己发挥作用的集体，不再是真正进行生动的活动并与它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集体。与此相反，我们看到党正在日益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由上层选定的党的职业官员和不参加他们的派别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对任何人都不再是秘密了。

这是每一个党员都知道的事实。党员如果对中央、甚至对省委的某个决定不满意，心存某种疑虑，“亲自”发现某些错误、混乱和违法乱纪现象，都不敢在党的会议上讲，更不敢彼此交谈，除非对方看来完全可靠，会保守秘密。党内的自由讨论事实上已经化为乌有；党的舆论已经窒息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党员群众都不能提名选举俄共的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相反地，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都是由党内的书记特权阶层来挑选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正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变为这个特权阶层的高级官员协商会。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个官僚机关平时可以运转自如，但危机一旦到来就必然发生故障，并且会有在日益迫近的严重事变面前根本不能应付的危险。

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

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我们当中许多同志曾经自觉地保证不反对这种制度。由于1921年事件的变化,后来又由于列宁同志患病,我们当中许多同志都认为需要采取党内专政性质的临时措施。另一些同志从一开始就对此抱怀疑或持否定态度。尽管如此,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制度实行得过头了。它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党内约束开始松弛。党开始走下坡路。当时就显然不健康的党内多种极端反对派倾向,开始具有反党性质,因为党内对棘手问题不能进行同志式的讨论。本来,这样一种讨论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向这些派别的大多数参加者并向党员群众揭露这些派别的不健康的性质的。结果就出现了引导党员超越最后界限的非法集团,并使党脱离工人群众。

如果不在最近的将来彻底改变当前的这种局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危机以及党内派别专政的危机就会给俄国的工人专政和俄国共产党以沉重的打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执行者——俄国共产党就不得不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在无产阶级斗争各条战线难免失败的前景下进入即将来临的新世界的非常时期。……

考验迫在眉睫。这要求我们全体党员万众一心,亲密无间,完全自觉,非常积极,无比坚定。派别统治必须消灭,而首先必须消灭它的祸首,用同志般的团结和党内民主的统治去取代它。……

写于1923年10月15日。译自罗伯特·维·丹  
尼尔斯《共产主义史料》1960年纽约英文版第  
239—242页。



# 新 方 针

## · 编者按语 ·

托洛茨基抛出给中央的一封信和四十六人声明以后，开始了一场新的激烈的党内斗争。

12月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决议发表两天之后，托洛茨基写了《给党的会议的信》，并越过中央委员会，把文件分发给各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支部，要求党员讨论。接着，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又发表了《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和《党的社会成分》等文章。

托洛茨基在文章中攻击党的领导“蜕化”，把党的老干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相提并论，提出要“革新”党的老干部，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扫除；托洛茨基百般阿谀青年，说“青年是最可靠的晴雨表”，要使他们“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要他们“培养自己独立的见解和面貌”，“参加对阶级的领导”，把青年干部和老干部对立起来；他攻击党的机关，要求改变党内纪律，取消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恢复“组织上自决的原则”，即派别和小集团的自由。这是托洛茨基和党中央相对立的政纲，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宣言。

在全党就托洛茨基的文章展开的大争论中，托洛茨基一伙遭到了迎头痛击。

1924年1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托洛茨基又把过去写的和新写的一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以《新方针》为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继续攻击党的领导“蜕化”，诬蔑列宁主义是什么“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的肌肉感觉一样”。托洛茨基在“低估”农民的问题上进行狡辩，并继续贩卖“不断革命”论，大言不惭地说他发挥的思想“从整体来看，比那时许多布尔什维克所写的东西更接近列宁主义的真正实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战略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代表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反党活动，并通过了《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决议指出：“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丝毫不容怀疑，这个反对派客观地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会议表示完全无条件地赞同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派别集团的决议，并建议中央公布该决议第七条：任何中央委员如果进行派别活动，得降为候补委员，直至开除出党。这是对托洛茨基一伙的严重警告。（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367、371页。）

## 序 言

这本小册子拖延了很久才问世，因为我患病未能早些出版。但

是，这些问题都是在迄今所展开的讨论中提出来的。

在讨论过程中，围绕着党内制度和国家经济问题，升起了阵阵疑云，常常形成一种几乎难于透视的浓雾，严重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但是，这种情况即将过去。疑云将会消散。这些问题将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党的集体思考通过争论会逐渐得出它所需要的结论，党将日趋成熟，它本身会变得更加稳固。因此，党的基础会扩大，它的领导会更加稳固。

对中央委员会关于“新方针”的决定，不论有多少“反义”的解释，它的客观意义却就在这里。清党，提高党的政治教育及其理论水平，最后，规定党的工作人员的条件，所有这些过去的工作只有通过扩展和加强全党的有主见的活动，才能圆满结束。这种活动是对付由新经济政策和欧洲革命的延缓而产生的全部危险的唯一可靠保证。

不过，党的新方针只能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它对于未来阶段的重要性和价值将取决于它帮助我们解决我国重要经济任务的程度。

我国国营经济的管理需要集中起来。其结果是首先使中央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分歧局限在几个人的狭小圈子里。党的思想总的说来还不能对国营经济的计划方向的基本问题和各种困难施加直接影响。甚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把经济的计划方向问题提出来讨论，实际上也只是走走形式。这就充分说明，为什么这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所规定的各种方法仍然几乎完全不适用于当前，为什么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在第二天重新提出实施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经济决议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议。

但是，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总的计划方向的决定，这一次也受到各方面的怀疑和责难。这种怀疑没有创见，缺乏理论深度，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如果党内容忍这种怀疑，那正是因

为党的思想还不明确，没有把集中计划的经济方向问题讨论清楚。而革命的命运现在完全取决于这种方向的胜利。

这本小册子仅在最后一章才根据不是由我们注意挑选，而是由党内讨论强加于我们的特殊例子，谈到了计划方向的问题。人们希望党在未来阶段会考虑用比现在更加具体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这是我现在的立场——来看当前的经济讨论，似乎党已退回到不久以前用更加批判的态度来重订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一年。因此，可以这么说，由小圈子几个人操纵的这些问题正在逐渐成为全党注意的中心。就我个人来说，我只能奉劝搞经济问题的同志们留心研究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工业的争论，并且把它们（本应如此）和当前的讨论联系起来。我希望能很快回答这些问题。

必须承认，在党内的口头和书面讨论过程中，大量传播的“事实”和报道完全不符合实际，说得文雅一点，它们是敏捷的灵感成果。我们在自己的小册子里提供了这一情况的证据。采取这种“骇人听闻的”手段，实质上是不尊重党的表现。而我认为，党应当用努力核查提出的引文、数字和事实的办法来答复这些问题。这是教育党和保证自我教育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我们党是成熟的党，完全不必回避“死气沉沉”的或狂热的讨论。一种更加稳定的党内民主制度将保证我们的讨论本应具有的特性，并教导我们向党提供只能是经过细心查对的材料。党的舆论在这方面应当通过无情的批评树立典范。工厂基层组织应当根据它们日常的经验核查讨论的材料及其结论。这对在校青年撰写他们的历史、经济和统计著作也是有益的，可以引用在党内当前讨论中经过严格查对的材料，在明天或后天作出自己著作的结论。

我再说一次：党所取得和必须保持的最重大成就在于，过去在

一些机关解决过的这些重大经济问题现在成了党内群众注意的中心。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讨论所搅起的疑云将会消散，假的材料将被党的思想否决，而经济组织的基本问题将永远不再离开党的视野。党将取得革命的胜利。

列·托洛茨基

附言：除了在《真理报》已发表的几章以外，这本小册子新加了下列数章：《官僚主义和革命》、《传统和革命政策》、《关于“低估”农民的问题》和《计划经济》。对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我只字未改，收在这里。这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作出判断，它们的意思在讨论期间常常遭受怎样的歪曲，并且仍在遭受怎样严重的歪曲。

列·托

写于1923年12月。译自《新方针》1943年纽约英文版第7—10页。

## 给党的会议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我曾坚信不疑地指望，最近能够参加关于党内状况和新任务的讨论。但是，这次患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凑巧，而且患病的时间也比医生最初预料的更长。我除了通过这封信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政治局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在作重大的转变。正如许多会议正确指出的，转变时需要慎重，但是除了慎重以外，还需要坚决果断。转

变时采取观望和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一种最坏的不慎重的作法。

某些思想保守的、喜欢过高估计机关的作用和过低估计党的首创精神的同志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政治局的决议。他们说：中央承担了无法完成的义务；决议只会散布虚假的幻想，只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显然，这样看问题是对党抱着十足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中央的决议所宣布的新方针就在于：在实行旧方针时曾错误地把重心放在机关上，目前在实行新方针时就应当把重心移到党这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性、批判的首创精神和自治上来。新方针决不意味着党机关的任务是在某一个时期内颁布法令和建立民主制度。不，党本身就可以实行这种制度。任务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党应当使自己的机关服从自己，始终成为权力集中的组织。

最近，在讨论中和文章上经常指出：“纯粹的”、“广泛的”、“理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的，民主对我们说来决不是目的本身。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但同样也可以有权利和有根据地说，纯粹的或绝对的集中制是不能实现的，是同群众性的党的本性不相容的，集中制和党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目的本身。民主和集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办法把这两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时期丧失了。重心被不正确地移到机关上面。党的首创精神被贬到最低限度。这就造成了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精神背道而驰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方法。用削弱党内首创精神的办法过分加强机关的集中制，在党内产生了身体不适之感，它已经表现为一种极其严重的病态，以致到了在露骨敌视共产主义的分子领导下在党内建立秘密小集团的地步。同时，对机关解决问题的方法采取批判态度的风气已在整个党内上升了。几乎大家都了解或至少感觉到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警告的呼声高涨起来了。

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就是党内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正式的十分重要的表现。这个决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就要看全党即四十万党员愿意和能够实现的程度。

许多文章都贯串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活跃党的主要办法是提高普通党员的文化水平，此外，其他一切问题即工人民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由于我党面临着巨大任务，所以必须提高我党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单纯从教学的角度、以教师的口吻提出问题是十分不够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坚持这种提法，那就只能使危机尖锐起来。党只有通过对工人阶级及其国家的集体的独立的领导而全部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时，才能提高全党的水平。需要的不是教学的办法，而是政治的办法。决不能这样提出问题：似乎党内民主是否实行（谁来实行？）应当取决于党员对党内民主的“准备”程度。党毕竟是党。对每个愿意加入我党和留在党内的人，都可以提出很严格的要求。但是，入了党的人从而也就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积极参加者。

官僚主义扼杀首创精神，从而阻碍党的整个水平的提高。这就是它的主要过错。参加党的机关工作的必然是一些经验较丰富的有功的同志，所以机关的官僚主义最严重地影响党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的提高。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其原因正在于此。

但如果认为，滥用机关的方法来解决党内问题丝毫不会影响到体现着党的政治经验和革命传统的老一辈身上，那就错了。不，这方面的危险也是很大的。没有必要来说我们党的老一辈有重大意义（不仅就俄国范围来说，而且也就国际范围来说），因为这是众所周知和一致公认的。但如果把这个意义看作是孤零零的事实，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军这一革命因素。否则，老一辈就会

僵化，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

“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国际的领袖和政党这个最新最显著的历史实例来说。我们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尔、维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斯坦、拉法格、盖得等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导出来的学生。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领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蜕化了，都在议会改革以及党和工会机关独立发展的情况下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战前夜看得更清楚，以老一辈的威望为幌子，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怎样成了革命发展的极严重障碍。我们，正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应当说，我们这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我们容许党内继续坚持和推行机关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执行政策，使青年一代变成教育的消极对象，因而必然使机关同群众、老年人同青年人疏远，那么我们就丝毫不能独立自主地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会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要防止这种不容置疑的危险，除了对方针作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改变，使它向党的民主方面转变，并把更多的直接从事生产的无产者吸收到党内来，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党内民主的这些或那些法律上的（章程上的）规定和法律上的限制。这些问题不论怎样重要，毕竟是次要问题。我们将根据现有的经验来讨论这些问题，如有必要，我们将加以改变。但是，首先必须改变笼罩在组织内部的那种气氛。必须使党——它的一切支部和联合组织——恢复自己的集体首创精神，同志般的、毫无顾虑和犹豫的自由批评的权利，组织上自决的权利。必须革新党的机关，使它感到自己是伟大集体的执行机关。

最近党的报刊上举了不少例子，说明党的风气和党的关系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蜕化现象。对批评的回答是：“拿出你的党证



来！”在中央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公布以前，官僚化的机关代表人物认为一提到改变党内政策的必要性就是异端邪说，就是派别活动，就是破坏纪律。目前，他们也从形式上准备“注意”新方针，也就是说用官僚主义的方法使新方针化为乌有。革新党的机关（当然是在党章明确规定的范围内）的目的应当是由那些与集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或能够保证这种联系的新人物来代替庸碌之辈和官僚主义分子。而首先应当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驳和抗议就要别人拿出党证来听其压制的人从党的岗位上撤下来。新方针的出发点应该是：使大家在机关内自下而上都感到没有人敢吓唬党。

要求青年重复我们的公式，是十分不够的。要使青年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把它化为血肉，培养自己独立的见解和面貌，并能够拿出由真诚的信念和独立的性格而产生的勇敢精神来为自己的见解奋斗。消极听从、机械地顺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逢迎、升官发财，——所有这些都应当清除出党！布尔什维克不只是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埋头钻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自己坚定不移的见解，他不仅在对敌作战时而且在自己的组织内勇敢和独立地捍卫自己的见解。他今天可能在自己的组织内处于少数地位，他就服从，因为这是他的党。但这当然不是说，他总是错的。他也许只是比别人更早地看到或了解新的任务或转变的必要。他坚持不懈地两次、三次、十次地提出问题。他以此为党效劳，帮助党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新的任务或完成必要的转变而不致于遭到组织上的震动和派别的痉挛。

不错，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为派别集团，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不应当有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有的。这种行为是遭到作为独立的集体的全党反对的。但是，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针，党才能胜利地清除派别活动的危险。派别活动产生的极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机关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

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提出批评或警告的人或集体戴上一顶派别活动的帽子。机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别活动来补充，而后者又是对党内民主的恶意讽刺和可怕的政治威胁。

党是在清楚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下，抱着因我们所面临的巨大任务而产生的十分坚定的决心去完成必要的转变的。因此，党必将把自己的革命统一提到更高的阶段，作为党完成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经济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保证。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我都没有把问题谈完。由于怕耽误你们过多的时间，我有意不去考察它的许多重要方面。但是，我希望我不久就能战胜在我看来是与党的新方针处于显然对立的疟疾病，那时，我想用更方便的口头演说来补充和更确切地说明我在这封信中没有说到的地方。致

同志般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3年12月8日

附言：趁这封信在《真理报》上晚两天发表的机会，我想补充几点意见。

有人告诉我，当我的信在各地会议上宣读时，有些同志表示忧虑，我对“老近卫军”和青年一代的相互关系的意见可能会使青年人和老年人对立起来（！）。可以完全担保，这种想法出自那些早在两三个月以前就惶恐不安地拒绝提出必须改变方针的问题的同志们。不管怎样，这种忧虑在目前的环境下和在目前的时刻被提到首要地位，只能是由于对真正的危险以及危险的迫切性估计错误所致。每一个有头脑的党员都了解：具有很大征兆性的目前的青年情绪是由于实行“风平浪静”这个已遭到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所驳斥的方法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正是“风平浪静”本身包含

着一种危险，使党的领导层同较年青的党员即多数党员越来越隔膜。党的机关代替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倾向，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导致只依靠传统来巩固领导集团威信的趋势。尊重党的传统，无可争辩地是党的教育和党的团结的十分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只有通过独立地积极地检验党的传统、通过集体制定目前的党的政策而不断丰富和巩固起来时，才是生气勃勃的和牢固的。如果没有这种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那就可能使尊重传统变质，而成为囿于官场的情趣或者十足的官僚习气，即没有内容的形式。不用说，这种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联系是十分不够的和不可靠的。从外表上看来，它在内部还没有暴露出致命的裂缝以前，可能维持五分钟的巩固。依靠党内“风平浪静”的党机关的方针，其危险也就在于此。由于保持革命传统的、没有染上官僚习气的老一辈的代表人物，即——正如我们所确信的——老一辈的绝大多数人都明确了解上述这种危险前途，并站在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立场上来全力帮助党实现这个决议，所以造成党内各代人物相互对立的主要根源也就可能消失。那时，青年在这一方面的某些“无节制”或偏激就比较容易克服。但是，首先必须创造条件，使党的传统不致于集中在机关内部，而是在党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生根和革新。这样也就可以避免另一种危险：把最老的一辈分成“机关领导分子”即维护“风平浪静”的分子以及非机关领导分子两类。不用说，党的机关即它的组织上的骨干，如果能摆脱闭关自守的处境，那它就不会削弱，而会更加巩固。至于我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权力集中的机关，这在我们党内是不会有两种意见的。

也许还可以反驳说，信中引述的社会民主党机关蜕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两个时代有着深刻的区别：那时是停滞不前的改良主义的时代，而现在是革命的时代。自然，例子毕竟是例子，决不会一模一样的。但是，把两个时代笼统地对立起来，本身还不

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所以指出同国际革命长期性有密切关系的新经济政策的危险，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日常的实际国务工作，这种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工作，正如中央决议中指出的，蕴藏着使眼界狭隘的危险，即机会主义蜕化的危险。十分明显，党的领导越是由闭关自守的“书记”的指挥来代替，这些危险就越是严重。如果我们指望“时代的革命性”来帮助我们克服一切困难，首先是克服内部困难，那么我们就是蹩脚的革命者。必须通过正确实现中央政治局一致宣布的党的新方针的办法来尽力推动这个“时代”。

最后还有一点意见。大约两三个月以前，当作为目前争论对象的问题刚刚提出，可以说，刚刚提到党的日程上的时候，某些省一级的负责同志总是喜欢以倨傲的态度耸耸肩膀说：这大概都是莫斯科想出来的，外省一切都很顺利。目前在外省的某些通讯报道上也可以听到这类论调。把易受传染的或扰乱人心的莫斯科同平静的和理智的外省对立起来，这无非是同一类性质的官僚主义的（虽然是外省版本的）明显表现。事实上，我们的莫斯科党组织是最大的、力量最强的和最富有生气的组织。甚至在所谓“风平浪静”（这个词很生动，它不免会载入我党史册！）的最沉闷的时刻，莫斯科组织的独立生活和积极性始终比其他任何地方要高。如果说，目前莫斯科与其他地方有某些不同，那么，它的不同只在于它发出了改变党的方针的倡议。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功劳。全党都将跟随莫斯科陆续经历对过去时期某些财富重新评价的必要阶段。外省党机关对这一方面反对越少，各省组织就越能有计划地经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必不可免的阶段。党一定能获得团结日益加强和党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成果。

列·托·

## 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sup>①</sup>

关于小集团和派别的问题在争论中占着中心地位。这个问题必须说得很清楚，因为问题很尖锐、很重要。可是，现在它总是提得很含糊。

我们是国内唯一的政党，在专政时代不这样是不行的。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要求都向我们的党压来，力图通过党找到政治表现。发展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各部分无产阶级之间或全体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在利益上的暂时不协调，——所有这些都通过工人和农民的党支部，通过国家机关，通过青年学生对党施加压力。甚至局部的暂时的意见分歧和差异也可能在某一个穷乡僻壤的机关中反映出一定社会利益的压力；局部的意见分歧和暂时的意见分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变为固定的小集团；同时，后者又可能迟早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派别；最后，业已形成的派别把自己同党的其他部分对立起来，然而会更多地受到党外压力的影响。在共产党由于必要而独揽政治生活领导权的时代，党内小集团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结论是什么呢？如果不愿有派别组织，就不应该有固定的小集团；如果不愿有固定的小集团，就要避免有临时的小集团；最后，为了防止党内出现临时的小集团，就必须使党内根本没有意见分歧，因为凡是有两种意见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总是结成集团的。但另一方面，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

---

① 我打算写几篇文章，对目前党内争论中的一些中心问题作一评价。鉴于普通党员的水平，我尽量作解释性的论述，因为没有他们而大谈党内民主是徒劳无益的。我希望读者对问题采取冷静的、深思熟虑的态度。先要努力彼此了解，以后再发怒还来得及。——托洛茨基注

件下领导全国生活的、拥有五十万党员的党究竟如何防止意见分歧呢？这就是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所处的地位中产生的主要矛盾，而这个矛盾决不是光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办**法**就能解决的。

由于确信一切照旧而投票赞成中央决议的人、拥护旧方针的人大体上是这样议论的：你瞧，好容易掀开了一点党的大厦上面的机关这个盖子，就马上发现有各种小集团的倾向；必须重新用螺丝钉把盖子拧紧一下。在“反对派别活动”的几十篇演说和文章中都贯串着这个简单的妙计。这些同志在内心的深处认为，中央的决议或者是一个必须加以制止的政治错误，或者是一种必须加以利用的党机关的手腕。我认为他们是大错特错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使党遭受极大的破坏，那么这就是在恭恭敬敬地接受新方针的幌子下坚持旧方针。

党的舆论必然是在各种矛盾和意见分歧中形成起来的。使这个过程只局限于机关内部，然后把现成的成果即口号、命令等教给全党，这就等于使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软弱无力。让全党来参加决议的制订——这就是迁就临时性的思想小集团，而这些小集团有转变成长期性的小集团甚至派别组织的危险。到底怎么办？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难道在党内“风平浪静”的制度和党的派别分裂制度之间就没有实行党的路线的余地了吗？不，这样的路线是有的，党的领导的全部任务在于：每一次，特别是在转折关头，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找出党的路线来。中央的决议坦率地写道，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是派别集团产生的原因之一。这个真理目前未必需要证明。旧方针同“广泛的”民主相距很远，并且它不仅丝毫不能使党防止秘密派别的形成，而且不能使党防止本身由于形成临时性或长期性小集团而可能爆发的这种争论（对这一点佯作不知是可笑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也

不要因此把那些忠诚的和守纪律的党员推上闭关自守和派别活动的道路。“可是，关于派别问题的这种提法不就是为了米雅斯尼柯夫精神辩护吗？”——我们听到官僚主义高明人士发出这种呼声。真的吗？但是，第一、我们加了着重号的整个这句话都是确切地从中央决议中摘录下来的。第二、从什么时候起解释忽然等于辩护了呢？说脓包是供氧不足、血液循环不良的结果，这决不是替脓包“辩护”和承认脓包是人的机体中正常的组成部分。结论只有一个：脓包必须切开和消毒，除此而外，——这是更重要的——必须打开窗子，使血液更好地吸收新鲜空气中的氧气。但是，糟糕的是，最富有战斗精神的、主张党机关实行旧方针的一派人却坚信中央的决议是错误的，特别是说明官僚主义是产生派别活动原因之一的那一部分决议是错误的。如果“旧方针拥护者”没有把这种意见说出口来，那只是出于形式主义的考虑，正如他们的一切想法都充满着作为官僚主义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精神一样。

不错，派别组织是我们条件下最大的祸害，而小集团，即使是临时性小集团又会转变成派别。但是经验证明，为了使小集团和派别无法产生，只宣布它们是祸害是完全不够的。为了切实取得这方面的成就，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有一个正确的方针，而且每一次都要适应具体环境。

只要深入钻研我们的党史，那怕只是党史上的革命时期，即派别活动特别危险的时期，就会清楚地看到，与这种危险作斗争决不能只限于形式上对小集团的谴责和禁止。

在世界历史的极其伟大的任务上，即1917年秋夺取政权的任务上，党内产生了最严重的意见分歧。在事态发展极其迅速的情况下，问题的尖锐几乎立即使意见分歧具有尖锐的派别斗争的性质：反对夺取政权的人甚至事与愿违地实际上同非党人士结成了联盟，在非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声明，等等。党的统一受到严重

的威胁。是怎样才避免了分裂的呢？只是由于事态的迅速发展和胜利的结局。假如事件拖延几个月，分裂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假如起义遭到了失败，分裂就更不可避免了。党在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坚强领导下，猛冲猛打地越过了反对派，夺得了政权，于是人数虽然不多但熟悉党务的反对派也踏上了十月革命的大地。派别活动和分裂的威胁，这一次不是靠规章条文的办法战胜的，而是用革命的行动战胜的。

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产生了第二次规模巨大的意见分歧。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结成了名副其实的派别，拥有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等等。我不知道，不久以前流传的关于布哈林同志几乎要逮捕列宁同志的政府的笑话有何根据。总之，这有点象蹩脚的梅恩·里德式的或共产主义的……平克顿式的惊险小说。应该认为，党史委员会会把这些事搞清楚的。但是毫无疑问，左派共产主义派别的存在对党的统一有极大的危险。当时要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是不必花很大力气的，也不需要领导方面……煞费苦心：只要简单地宣布禁止左派共产主义派别就行了。然而，党采取了更复杂的办法：暂时容忍党内派别组织的存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和危险的现象，采取争论、解释和靠政治经验来进行检验。

在军事建设问题上，我们党内有相当顽强的小集团。按实质说，这个反对派反对建立正规军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集中的军事机构，吸收专家，等等。有时斗争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但是，这里也和十月革命时一样，武器的检验帮了忙。政府军事政策中某些突出的和夸大的地方有所减轻（不无反对派的影响），这对正规军的统一建设不仅无害，反而有利。反对派则逐渐消失了。反对派中很多非常积极的代表人物不仅参加了军事工作，而且还在军事工作中担任非常负责的职务。

在令人难忘的工会问题争论时期中，小集团显得很突出。今



天，当我们有可能回顾这一整个时代，并用后来的全部经验来说明它时，看得很清楚，当时争论的决不是工会问题，甚至也不是工人民主问题；通过这些争论表明党患有重病，其原因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时过长。国内整个经济机体处在毫无出路的困境中。在工会的作用和工人民主的表面争论的掩盖下，转弯抹角地寻求新的经济出路。结果发现真正的出路在于废除余粮收集制和粮食垄断制，在于使国营工业逐步摆脱官僚主义管理总局的控制。这些历史性决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完全解决了工会问题的争论，而根据新经济政策，工会的作用也完全不同了，所以几个月以后不得不根本修改关于工会的决议。

“工人反对派”<sup>88</sup>这个小集团为时最久，某些方面也危害最大。它歪曲地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矛盾、党的个别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客观困难。但是，这里的问题也决不只限于形式上的禁止。在解决党内民主问题上采取了形式上的步骤，但在清党问题上却采取了实际的极为重要的步骤来处理“工人反对派”的批评和要求中正确的和健康的成分。而主要的是，由于党依靠自己极其重要的经济决定和措施在基本的重要方面战胜了已暴露出来的各种意见分歧和小集团，所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从形式上禁止派别组织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才有取得实际成效的希望。但是不言而喻，——过去的经验和健康的政治理解力都向我们证明这一点——单是依靠禁止的办法，不仅没有绝对的保障，而且没有比较重大的保障，足以使党防止产生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新派别。主要的保障是正确的领导、及时地注意那些通过党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发展中的种种要求，党机关的灵活性，党的机关不要阻碍而要发挥党的主动性，不要害怕批评，也不要派别活动的幽灵去吓唬人，因为恫吓多半是恐惧的产物！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的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只可能具有辅助的性质，这个决议本身还不能提供

解决一切内部困难的钥匙。如果认为，光靠一纸空头决议——不问党的发展进程、领导的错误、机关的保守主义、外部的影响，等等——就能使我们防止小集团的产生和派别的震荡，那就是过分肤浅的组织上的偶像崇拜。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十足的官僚主义。

彼得格勒组织的历史就是上述情况最明显的例子。在禁止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彼得格勒就爆发了尖锐的组织斗争，结果形成了两个互相尖锐对立的集团。乍一看来，似乎最干脆的是，宣布其中一个小集团（至少一个）为有害的、罪恶的派别组织。但是，中央断然拒绝了彼得格勒向它提出的这种办法。中央充当了彼得格勒两个小集团之间的直接中介人，最后不仅保证了——固然，不是一下子做到的——它们的相互合作，而且使它们溶合在一个组织内。这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例子是不应该忘记的；为了清洗某些官僚主义的头脑，这个例子简直是不可或缺的。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党内每一个比较重大的和长期的小集团，尤其是组织上的派别，都有反映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的倾向。作为小集团基础的每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发展起来可能成为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或半敌对的阶级利益的反映。所有这些都完全属于官僚主义，甚至首先是属于官僚主义的。必须从这里动手。说官僚主义是一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倾向，可以认为，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既然如此，那么，它的发展就有使党脱离正确道路即阶级道路的危险。它的危险就在这里。但是，那些比别人更激烈、更坚决、有时更露骨地主张每一个意见分歧、每一类不同意见（那怕是暂时性的）都是不同阶级利益表现的同志们，却不愿意把这一标准运用于官僚主义，这一点大可注意，同时也令人十分不安。其实，社会的标准在这里是最适用不过的了，因为我们认为官僚主义是十分明显的祸害，是有目共睹和绝对有害的倾向，它虽已遭到正式

谴责但并未根除。它怎能一下子就根除呢！但是，如果象中央决议中所说的，官僚主义有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有削弱党的阶级性质的危险，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决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预先同某些非无产阶级的影响等量齐观。相反地，党力图保持自己无产阶级性质的愿望必然会在党内产生对官僚主义的反击。当然，在这种反击的幌子下可能出现各种倾向，其中也有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和有害的倾向。只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揭露这些有害的倾向。但是，如果把反击官僚主义的行为纯粹形式主义地看作是派别活动，是异己影响侵袭的渠道，那么这种看法本身就成为明显的官僚主义影响侵袭的“渠道”。

可是，不能把认为党内意见分歧尤其小集团活动就是各阶级影响的斗争这种看法理解得太简单、太肤浅了。举例来说，对是否需要1920年用武力试探波兰的问题，我们是有局部意见分歧的。有些人主张实行比较大胆的政策，另一些人主张实行比较谨慎的政策。这里是不是有不同的阶级倾向呢？未必有人敢于这样武断地说。这是在对局势、力量和手段的估价上的意见分歧。但是，双方在对问题估计上的基本标准是一致的。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至于哪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决不是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毋庸置疑，这种现象今后在我们这里还会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地出现，因为我们面临的道路是艰巨的，不仅政治任务而且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组织问题都会造成意见分歧和临时性的各种不同意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各种分歧意见进行政治检验，向来都是我党最必要的保险措施。但必须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检验，而不是作为官僚主义自卫武器的因循守旧的老

一套。如果我们越是严肃地实行新方针,那么,就越能顺利地检验和区别目前反官僚主义的性质不同的政治思想内容并抛弃其中一切敌对的和有害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党的机关在思想情绪上没有重大转变,那么这项工作也就无法实现。相反地,我们现在遇到的却是党的机关实行新的进攻,它对形式上已遭到谴责但还没有取消的旧方针的任何批评都一概置之不理,借口说这是派别活动。如果说派别活动是一种危险(它确实如此),那么,对保守的官僚主义的派别活动的危险熟视无睹就是犯罪行为了。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首先正是反对这种危险的。

党的统一是绝大多数同志最主要的、最殷切关心的问题。但这里必须坦率地说,如果目前对党的统一有严重威胁的话,或者说至少对党的思想一致有严重威胁的话,那么这就是狂暴的官僚主义。正是从这个阵营中发出了只能被称之为挑衅性的呼声。有人正有恃无恐地说:我们不怕分裂!正是这个阵营的代表人物在搜索过去的历史,想从中发掘一切能够使党内争论加剧的手段,人为地使人回想起过去的斗争和分裂,以便不知不觉地逐渐使党在思想上接受新的分裂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自杀罪行是可能的。党要求少一点制度中的官僚主义习气,有人则打算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抵销这个要求。如果党走上了这条道路并牺牲了党内民主最必要的有生因素,那么,除了加剧内部斗争和推翻自己的主要保证以外,是一无所获的。如果对党本身都不表示信任,那就决不能片面地和以最后通牒式的口吻要求党信任机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抱着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就是机关制度中一切坏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党不希望有派别而且不允许有派别。认为党会粉碎自己的机关或允许某人去粉碎自己的机关,那是令人奇怪的想法。党知道,参加党机关工作的是一些体现着过去大部分经验的最宝贵的干部。但是,党希望革新机

关，并向它提醒：它是党的机关，是由党选举产生的，它不应当脱离党。

如果深入地考虑一下目前党内的局面，尤其考虑一下这种局面在争论中是怎样展示出来的，那么，今后的两个发展前途就非常明显了。或者是：目前党内按照中央决议的路线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这种整顿将真正成为党的机体发展的道路上的一个步骤，成为新的重大一章的开端（当然，只能是开端），那时，也将是我们大家所最希望的、对党最有利的结局。那时，党对过多的争论和过多的反对派活动，尤其是对庸俗的民主主义倾向，就容易处理了。或者是：转入反攻的党机关或多或少地受到自己最保守分子的影响，在反对派别活动的口号下重新使党回到昨天的“风平浪静”的立场上去。这第二条道路将是痛苦无比的：当然，它不能阻碍党的发展，但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遭到更大的震荡才能得到发展，因为它给那些有害的、起腐蚀作用的反党倾向以过多的营养。这就是两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我写这封《新方针》的信的用意就在于帮助党走上第一条道路，即更经济和更健康的道路。我完全坚持这封信的立场，屏弃对这封信所作的故意歪曲和错误解释。

## 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

在莫斯科争论期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我发现有一种埋怨的意见，认为党内民主问题由于新老两辈相互关系的争论和实行人身攻击等而更加复杂了。这种埋怨说明思想是模糊的。人身攻击是一回事，而新老两辈相互关系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目前不分析党的成分——不论是社会成分，还是年龄和政治经历——而提

出党内民主问题，就是使这个问题陷于空谈。

把党内民主问题首先作为新老两辈相互关系问题提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种提法是由我党全部过去的历史所准备好了的。这段历史可以概括地分成四个时期：（1）十月革命以前二十五年的准备时期，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准备时期；（2）十月革命时期；（3）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4）“新方针”时期，即目前开辟的时期。

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虽然很丰富，它所经历的阶段很复杂很多样，但它只是一个准备时期，这一点在目前是完全不容争辩的。十月革命对党和党的干部作了一次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检验。我们所说的十月革命是指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最尖锐斗争的时期，譬如说，从列宁同志的四月提纲开始到实际夺得国家机器为止的时期。以月计算的十月革命这一章，就其内容说来，它的意义并不比以年或十年计算的整个准备时期逊色。十月革命不仅对党的伟大的过去历史作了一次正确无误的、独一无二的检验，而且它本身对于今后工作是极其伟大的经验的源泉。十月革命以前的党通过十月革命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真正意义。

在夺取政权以后，党的队伍开始迅速增长，甚至出现不健康的臃肿现象。党象一块强大的磁石一样，不仅吸引了觉悟不高的劳动者，而且吸引了公开的异己分子：守旧的公务员、投机钻营之徒、政治上的寄生虫。在这个十分混乱的时期中，党只是依靠那批经过十月革命考验的老近卫军切实实行内部专政才继续保持其为布尔什维克政党。在稍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新党员——不仅是劳动人民出身的，而且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几乎都无条件地接受老一辈的领导。投机钻营之徒认为，他们依仗这种俯首听命的态度就能牢固地保持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但是，这些人失算了。党通过严格的自我清洗把他们清除出去了。党的队伍缩小了。但是，党的觉悟提高了。可以说，党的自我检查和清洗是一个起点，那时，

新的、十月革命以后的党才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拥有五十万党员的集体，它不仅受老近卫军的领导，而且本身有责任弄清基本的政策问题，并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整个危急时期仿佛是目前正在党内生活中显露出来的这个深刻转变的开始，这个转变大概将要以新方针的名称载入党的史册。

有一点是一开始就必须清楚了解的：我们所经受的摩擦和困难，其实质不在于某些地方书记作得太过火了，从而必须稍为加以阻止，实质在于，全党都要转入更高的历史性阶段。党员群众仿佛向党的领导机关说：“同志们，你们有十月革命以前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的；可是，在你们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十月革命以后的经验，这种经验将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我们不仅想受你们的领导，而且想同你们一起参加对阶级的领导。我们所以想这样作不仅是因为这是我们党员的权利，而且是因为这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我们下层的经验（这种经验不是简单地从上级那里吸取来的，而是我们自己积极地带到党的生活中来的），党的领导机关就会官僚化，而我们下层机关就会在非党群众面前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思想武装。”

如上所述，目前的转变是从过去的全部发展中产生的。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党内生活和思想的分子变化过程，早就为转变作好了准备。销售危机大大推动了思想批判工作。德国事件的迫近使党震动了一下。正是在这个时刻非常突出地暴露了党的两层生活已达到何等程度：上层决定问题，下层只是听取决议。但是，批判地审查党内状况的工作由于局促不安地等待德国事件的即将爆发而推迟了。一旦发现这件事由于事物的发展进程而推迟时，党就把新方针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正象过去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旧方针”正是最近几个月

内才暴露了最坏的简直不能容忍的缺点：党机关的闭关自守、官僚主义的自满、忽视党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只要一打算把批判地审查党内制度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整个党机关由于官僚主义的惯性就会敌意相待。当然，这不是说，党的机关完全是由官僚主义分子、尤其是由某些积习甚深和不可救药的官僚组成的。丝毫没有这种意思！绝大多数党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历了目前的危机时期并懂得了它的意义以后，将会学到许多东西和抛弃许多东西。从目前的转折关头中产生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最终将对普通党员群众和党的机关发生良好的影响。但是，在临近目前这次危机的党机关中，官僚主义的缺点发展到了确实很危险的地步。正是这些缺点使目前党内的思想整顿具有如此尖锐的性质，以致使人产生很自然的忧虑。

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即早在两三个月以前，只要一提到党机关的官僚主义现象，一提到委员会和书记过分压制的现象，就会在中央和地方遭到主张党的旧方针的、身居要职的权威代表人物的冷眼相待或愤怒抗议。是上面定的吗？无稽之谈！是官僚主义吗？捏造，为反对而反对，等等。这些同志确实没有看到官僚主义的危险，他们自己正是这种危险的代表者。只是在下层坚决的推动下，他们才逐渐承认：官僚主义也许有，不过只是在某些地方，在外省的组织中，在某些省和县里存在；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的偏向，等等。他们把这种官僚主义解释成为战争时期的一般残余现象，也就是说是一种会逐渐（虽然不很快）消失的东西。不用说，这种态度和这种解释是根本虚假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省组织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县里经过省向中央发展的，倒是恰恰相反，是从中央经过省向县里发展的。它决不是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党内来的结果。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



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形的形式，但它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较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党的机关不顾党的思想水平的提高，继续顽固地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中央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这种意义是党在思想上必须充分加以估计的。只把事情设想成这样：似乎决议的全部实质在于书记和委员会更“温和”、更“细心”地对待党员群众以及某些组织-技术上的改变，那是不够的。要知道，中央的决议不是平白无故地谈到新方针的。党准备走上新的发展阶段。当然，问题并不象某些人企图描绘的那样在于摧毁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问题在于使这些原则适应党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条件。问题首先在于党的老干部和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多数党员之间建立更正常的相互关系。

理论修养、革命锻炼和政治经验是党的重要资本，这笔资本的拥有者首先是党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党按其实质来说，是民主的组织，也就是由全体成员的思想和意志来决定本身道路的一个集体。十分清楚，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党越能充分地利用老一辈所积累的经验，委托他们的代表人物担任党组织内最负责的职务，党就越能信心百倍地和正确地为自己开拓道路。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和现在往往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党内处于干部地位和专心致志于各种管理问题的老一辈，习惯于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对待党员群众，则把纯粹学院式的吸收党员参加政治生活的方法（如成立政治常识班，测验党的知识，举办党校，等等）提到第一位。由此就产生了党机关的官僚化、闭关自守、孤独自在的党内生活，总之，产生了构成旧方针中消极一面的一切特征。关于今后党内生活有分成明显两层生活的危险，我在论党内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信里已经谈到过，而我所说的青年

当然不只是指学生青年，而且是指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这一代党员；首先指工厂支部的党员。

党越来越感到不舒服的毛病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党员群众以下这种自言自语或感觉中：“不管党机关的考虑和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在他们考虑和决定问题时总是没有我们参与和替我们包办。一旦我们发出困惑、怀疑、反对和批评的呼声时，回敬我们的是呵斥、遵守纪律的号召，更多的是被斥责为反对派立场甚至派别活动。我们对党无限忠诚，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党。但是，我们希望积极地和自觉地参加制定党的意见和确定党的行动路线！”毫无疑问，当基层群众的这种情绪刚刚表现出来时，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及时地察觉和加以考虑，这种情况就是党内一些反党集团产生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它们的意义固然不应有所夸大，但它们所起的警告作用也不能加以缩小。

由于重大的历史原因和我们的错误而形成的旧方针，其主要危险在于它暴露出几千个领导干部同志同作为影响对象的全体党员群众的对立有日益加深的趋向。如果这种制度今后继续顽固地保持下去，无疑，它最终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险，而且，这种蜕化会在党的两极上发生，即既在青年党员身上也在领导干部身上发生。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支部以及学生等，危险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许多党员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是全党工作的积极参加者，由于自己向党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及时答复，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党员独立活动的代替物，即各种小集团和派别。象“工人集团”<sup>92</sup>这种小集团之所以具有征兆性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在另一端，即执政的一端，这种拖延过久、被党认为是官僚主义的方针，它的危险性也是不小的。如果不懂得或看不到中央决议对官僚主义的谴责正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谴责，那是可笑的、

不体面的鸵鸟政策。问题不在于党的实践有某些脱离正确的理想路线的偏向，而正是在于党机关所采取的方针，在于它的官僚主义倾向。官僚主义是否包含有蜕化的危险呢？否认这种危险就是盲目无知。官僚化的长期发展会造成这样一些危险：脱离群众，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挑选和调动的问题上，缩小眼界，削弱革命嗅觉，也就是说，或多或少地使老一辈至少是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机会主义的蜕化。这个过程是缓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的，但是一旦暴露出来却很快。只有有了官僚主义的病态的多疑心理和党机关的傲慢态度，才会把这种以客观的马克思主义预见为依据的警告看作是某种“侮辱”、“谋害”之类的东西。

不过，这种蜕化的危险实际上是否很大呢？党懂得或感到这种危险并对此采取积极的行动——比如政治局的决议就是因此而问世的——，这个事实证明党是有雄厚的生命力的，从而也发现了抵抗官僚主义毒素的有生力量。这就是党实行革命自卫的主要保证。但是，既然旧方针力图千方百计地通过压制，通过更多的人为挑选和恫吓的办法，一句话，通过对党采取官僚主义的不信任的办法保持下来，那么，大部分干部蜕化的实际危险还会不可避免地增加起来。党不能只靠过去的资本而生活。过去只是为现在作了准备。但必须使现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能跟上过去，以便为将来作准备。而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发挥党的积极性的重心移到党的基本群众方面来。

有人可能会说，重心的这种转移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党不能把老一辈“送进档案馆”，就立即开始新的生活。对这种愚蠢的恶意煽动的理由未必值得一驳。只有疯子才会说出把老一辈送进档案馆的话。问题正在于使老一辈自觉地改变方针，从而继续保证自己在独立政党的全部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必须使老一辈把新方针看作是党的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一种手腕、一种外交

手段、一种暂时的让步。那时，担任领导工作的一辈人和全党都会取得伟大的胜利。

## 党的社会成分

当然，问题不仅限于新老两辈的相互关系。从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问题是由党的社会成分决定的，而首先是由工厂支部和直接从事生产的无产者在党内所占的比重决定的。

执政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国家机构，其中包括军队、经济管理机关等。但是，国家机构、合作社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人化，按其实质说来，就是削弱党的基本工厂支部并在党内大量增加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出身的行政干部。这就是事物的矛盾。只有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健康地活跃工厂生活和经常地吸收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入党的基础上，才能摆脱这种矛盾。至于这个主要过程发展的速度如何，它将会有哪些起落，目前还很难预见。不言而喻，即使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上也必须尽力吸收更多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入党。但是，要大大改变党的成分，使工厂支部大约占全党三分之二，还不是很快能做到的，这只有在取得很大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估计到最有经验和最积极的党员——当然，其中也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还有很长一段时期要在国家机关、工会、合作社和党机关的各种不同岗位上工作。这个事实本身也就包含着危险，就会成为官僚主义的来源之一。

由于党内的需要，教育青年现在和将来都会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党校、高等专科学校来教育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的新型苏维埃知识分子，从而使年青的无产阶级分子

不仅在学习期间而且按一般规律也在今后的一生中脱离生产，那时高等学校毕业的青年工人显然都将被工业机构、国家机关或这两个部门的党机关所留用。这就是破坏党内平衡、不利于基本工厂支部的第二个因素。

关于一个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其他阶级出身的问题，显然有它应有的意义。在革命后的初期，关于十月革命以前从事什么职业的问题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从生产岗位调去担任某种苏维埃的职务是一种暂时现象。目前，在这一方面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或师政委是苏维埃社会中一定的类型，某个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或师政委的出身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无所谓的。最近六年来，形成了相当固定的苏维埃社会集团。

因此，我们现在——而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的情况是：很大数量非常成熟的党员都在不同的领导和管理机关以及经营和指挥机关内工作；另一部分很大数量的党员在学习；第三部分分散在农村里种田；只有第四部分（就人数说来，目前还不到六分之一）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无产者。十分清楚，党机关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化的缺点不是由于通过机关而联结起来的工厂支部产生的，而正是由于党通过管理、经营、指挥和培训等国家机关而行使的其他一切职能产生的。换句话说，在工业发展并不十分迅速的情况下越来越把注意力和精力移到政府机构和机关上去，是党内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鉴于这些基本的事实和倾向，我们应当更清楚地了解党的老干部在机关中蜕化的危险。如果认为只是由于老干部经历了世界上最好的革命的锻炼，他们就有防止一切思想堕落和机会主义蜕化的天然保障，那便是浅陋的偶像崇拜。不！历史是通过人创造出来的，而人们常常决不是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其中包括创造自身的历史。归根结蒂 问题自然是由具有国际

意义的各种重大因素来解决的，如欧洲革命发展的进程和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但是，以宿命论的态度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这些客观因素上去，这和只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主观激进主义中寻找保证一样是不正确的。在具有同样的革命精力和同样的国际条件下，党反对腐化倾向的斗争却有好有坏，这决定于党对危险的认识程度和同危险作斗争的积极性。

十分清楚，由整个环境所产生的党的不同社会成分不是削弱，而是大大加剧党机关的方针的一切消极方面。要克服各部分党员的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除了他们在党内民主制度中积极接近起来以外，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的。党内官僚主义一方面拥护“风平浪静”，把一切都加以隔离，另一方面又以同等沉重的分量，虽然以不同的方式，既打击工厂支部又打击经济工作人员，既打击军人又打击青年学生。

我们看到，青年学生对官僚主义的反应特别敏锐。无怪乎列宁同志建议要广泛地吸引学生来反对官僚主义。青年学生就其社会成分和社会联系来说，反映了参加我党的所有社会阶层，并且受他们的情绪的影响。由于年轻热情，青年学生总是立即使这种情绪赋有积极的形式。他们作为青年学生总是力图说明和概括问题。但这决不是说，青年在自己的一切表现和思想情绪中都是反映健康的倾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党内万事如意，或者是青年不再反映自己党的情绪了。但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有人说，我们的基础不是学校支部而是工厂支部，这种说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说青年是晴雨表时，我们正是认为他们的政治表现不是具有主要的意义，而是具有征兆性的意义。晴雨表不能造成气候，只能显示气候。政治气候是在阶级的深处和阶级相互冲突的地方造成的。工厂支部使党和我们的主要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建立直接的联系。农村支部与农民建立联系的程

度就差得多了。使我们和农民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军队支部，但军队支部处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最后，从苏维埃社会各阶层中招收来的成分复杂的青年学生反映着我们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如果我们不是非常细心地了解他们的情绪，那我们就会是感觉迟钝的人。这里还必须补充的是，我国大部分新的学生是具有一段对青年一代说来十分重大的革命经历的党员。目前最热心的党机关迷对青年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是完全徒劳的。青年是我们的检验者，是我们的接班人，明天是属于他们的。

不过，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如何克服因自己的苏维埃职能而分离的党内各部分人的不同地位问题。我们已经讲过，并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党内的官僚主义决不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古董，相反地，这是一种实质上由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和新错误所产生的新现象。

无产阶级是通过苏维埃国家来实现自己专政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政党，因而也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政党。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实行这种领导，而不过分密切地同国家的官僚主义机关纠缠在一起，并在这种纠缠中遭到官僚主义蜕化。

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共产党员是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的。他们在国家机关内彼此处于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中并与非党群众保持复杂的个人关系。他们在党内都是平等的，因为这是涉及到确定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方法问题。共产党员有的直接参加生产，有的参加工厂委员会，有的管理企业、企业托拉斯、辛迪加，有的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既然问题涉及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那么党就要考虑——必须考虑——分布在行政和经济部门的不同职位上的全体党员的经验、阅历和意见。我们党的主要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就在于此，它能够每时每刻地通过党员施工、党员工会干部、党员经理和红色商人的眼睛来观察工业，

把所有这些工作人员的经验取长补短地综合起来，确定党对整个经济工作，尤其是对某个具体经济部门的领导路线。

十分明显，这种切实有效的党的领导只有在活跃的积极的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相反，机关化工作方法越是占优势，党的领导就越会被它的执行机关（党委会、执行部、书记等）的行政手段所代替。我们看到，在强调这种方针的时候，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有时集中在书记一人手里，书记可以任免人，发布命令，查办某人，等等。在领导上发生这种蜕化现象时，党的主要的无可估量的优越性，即党的多方面的集体经验就失去了意义。领导具有纯粹组织上的性质，常常变成简单的强迫命令。党的机关日益陷于解决苏维埃机关的琐碎任务和问题中去，一天到晚只关心它的日常事务，受着它的影响，结果，党的机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说党组织作为一个集体总是比国家机关的任何组织都更富有经验，那么，对于党机关的个别负责人就决不能这样说了。认为书记有了书记这个头衔就能在他的身上体现党的领导所必需的全部知识和本领，这确实是幼稚的想法。实际上，他为自己建立起拥有官僚主义部门、官僚主义情报和书面资料的附属机构，并以这个同苏维埃机构相接近的附属机构，把自己同生气勃勃的党隔离开来。于是，产生了象德国一句名言所说的情况：“你以为你在推动别人，其实是别人在推动你。”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官僚主义作风都浸入到党的机关中来，造成了党机关内官僚主义的发展。作为集体组织的党感觉不到自己的领导，因为它没有实行领导。因此，即使在领导实际上是正确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不满或疑惑。但是，这种领导不能长久保持正确的路线，因为它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分散精力，因为它不具有经常的、有计划的和集体领导的性质。这样，官僚主义不仅破坏党内团结，而且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正常作用。这一点常常是那些在党对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问题



上叫喊得最响亮的人所不注意和不理解的。

写于1923年12月。译自《真理报》1923年12月11日、28日、29日。

## 官僚主义和革命

(作者未能发表的一个报告提纲)

1. 有些基本情况大家都了解，它们不但妨碍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而且有时还是使革命遭受痛苦考验和严重危险的根源。这些情况是：(1)革命内部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自动缩小，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不断显露出来，并力求获得政治上的表现。(2)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长期的反革命威胁。

2. 革命的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我们国家的基本阶级是什么？(1)无产阶级，(2)农民，(3)新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

从经济作用和政治意义的角度来看，首要地位属于已经组织成为国家的无产阶级，属于在我国经济中提供主要农产品的农民。新资产阶级在苏维埃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在苏维埃工业各部门和农村经济各领域之间，主要是起中间人的作用。但是，它本身并不局限于仅仅作为商业中间人，而且多少还起着生产组织者的作用。

3. 如果暂时撇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速度问题，我们的革命事业将取决于我们经济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国营工业、农业、私营工商业资本——的相应增长。

4. 自由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拿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sup>4</sup>的覆

灭！)作历史上的比拟来滋养和安慰自己，这种比拟是肤浅的，毫无根据的。由于缺乏成熟的社会关系，雅各宾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被剥夺了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左翼(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坚定支柱；右翼(资产阶级)则在顺利成长；最后，经济上和政治上更加落后的欧洲阻止革命的发展，不让它越出法国的国境。

而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的处境都无比地更加有利。无产阶级和我们站在一起，是革命的核心和左翼，它的任务和目标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完全一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如此强大，能在一定限度内容许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它身边形成，并且让农民参与国家政权，不必通过资产阶级政党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中间途径，而是直接参政，这就排除了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生活的任何机会。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不仅不排斥，而且必然促使革命向国外扩展。

因此，在法国甚至雅各宾派最有远见的政策也无力根本改变事态的进程，而对我们，由于形势非常有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制订的正确政治路线，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捍卫革命的决定因素。

5. 让我们作一个对我们很不利的历史设想。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如果它可能实现的话)，将意味着苏维埃的工业和商业，包括合作社在内，都不能保证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另外，这还表明私人资本本身正在日益干预工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正在要求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影响农民。不用说，苏维埃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破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严重危险，这是反革命可能胜利的征兆。

6. 如果刚才提出的经济设想成为事实，那么，将会通过什么政治途径达到反革命的胜利呢？途径很多：不是直接推翻工人政党，就是工人政党逐渐蜕化变质，或者最后是局部的蜕化变质、分

裂与反革命暴乱交错在一起。

这些突然事变究竟会出现哪一种情况，首先取决于上面所说的经济发展速度。假如私人资本日积月累，能够逐渐支配国家资金，政治进程就会显出主要是国家机关朝着资产阶级方向蜕化变质的性质，其结果还会连累到党。如果私人资本迅速增长，并能与农民结合起来，那时，反对共产党的活跃的反革命倾向也许会占上风。

我们坦率地提出这些设想，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历史的可能性（正好相反，它们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有可能更正确地和更全面地确定历史方向，从而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点就是能在各种新的动向和新的危险甚至还处在萌芽阶段就识别并抓住它们。

7. 我们在经济领域中得出的结论向我们提出了“剪刀差”问题，即合理组织工业，并使它与农民市场相协调的问题。在这方面丧失时间，就是放慢我们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我们的主要任务，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关键就在于此。

8. 如果我们所说的那种反革命危险从某种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这绝不意味着不能用一种合理的政策来避开这种危险（即使在经济状况对革命不利的情况之下），减轻这种危险，排除这种危险以及推迟这种危险。这种推迟能保证革命或者在国内进行顺利的经济变革，或者与欧洲的胜利革命保持联系，从而易于挽救革命。

因此，我们必须在上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订出明确的国家和党的政策（包括明确的党内政策），目的是要制止反对工人阶级专政的、由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失败滋生出来的各种倾向的积累和加强。

9. 我党的社会成分不纯反映出革命发展的各种客观矛盾和

由此而来的各种倾向和危险。

保证党和革命基本阶级的联系的工厂核心，现在代表着全党六分之一的党员。

苏维埃机关的基层组织尽管有许多消极面，但仍然保证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这就使这些基层组织具有重大的特殊影响。大批老战士都是通过这些苏维埃基层组织参加党的生活的。

农村基层组织使党和农村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还很薄弱)。

军队的基层组织使党和军队保持联系，而且通过军队也(首先)和农村发生联系。

最后，在教育机关的基层组织中所有这些倾向和影响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10. 就阶级成分来说，不言而喻，工厂的基层组织是基础。但由于他只占党员的六分之一，其中最积极的成员又被派到党和国家机关中去了，遗憾的是，党至今不能完全或主要依靠他们。

他们的成长将是衡量党在工业中，以及一般来说在经济中获得成就的最准确的标尺，同时也是党能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最可靠保证。但是，不能期望他们在最近时期内就能很快成长起来。结果，党在下一阶段不得不依靠社会成分混杂的基层单位来确保党的内部平衡及其革命路线。

11. 各种反革命倾向能够在富农、经纪人、零售商和小摊贩中间，总之，在一些比党本身更能包围国家机关的分子中间得到支持。只有农民和军队的基层组织可能受到更直接的影响，甚至有被富农渗透的危险。

尽管如此，农民的分化是一种有利于我们的因素。清除富农出军队(包括地方师)，不但应该成为不容侵犯的规定，而更重要的是，应该成为对农村青年、军事单位，尤其是对军队基层组织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措施

工人将通过使军队中的农村劳动群众在政治上与复兴的富农阶层对立的办法，来保持他们在部队基层组织中的领导地位。这种对立的办法也适用于农村基层组织。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项工作的成功自然要取决于国营工业满足农村需要的程度。

但是，不论我国经济成就的速度如何，我们在部队基层组织中的基本政治路线不仅要反对耐普曼，而且首先要反对复兴的富农阶层，这个一切反革命企图唯一可以历史地信赖的和重要的支柱。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从社会成分的观点出发，更精确地分析部队的各种成分。

12. 毫无疑问，多少能够反映农村以及城乡差别特点的各种倾向，正在通过农村的和部队的基层组织渗入，并将继续渗入党内。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农村基层组织对党来说就没有价值了。

在基层组织中流露出来的情绪变化，是对党的提醒或警告。能否按照党的路线来指导这些基层组织，要取决于党的总方向和党内制度是否正确，总之，取决于我们是否更接近于解决或缩小“剪刀差”问题。

13. 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最重要的根源。一方面，它吸收大量最积极的党员并且教给其中最能干的人管理人和事的方法，但不教给他们对群众进行政治领导的方法。另一方面，它大量地吸引党的机关的注意力，并借此竭力用它的管理方法来影响党的机关。

因此，机关官僚主义化大量出现，它使党受到脱离群众的威胁。这正是当前最明显最直接的危险。在目前情况下，反对其它危险的斗争必须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始。

14. 如果认为官僚主义只是机关负责人旧习惯的总和，那他就是一个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官僚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即一定的管理人和事的制度。产生官僚主义的深刻原因在于社会的不

纯,在于居民不同集团的日常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差别。广大群众缺少文化是官僚主义复杂化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是由于需要建立和维持把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非常融洽地结合起来(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机器。需要保持常备军也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根源。

很明显,我们刚才所列举的那些现在由官僚主义培植起来的消极的社会现象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能置革命于死地。我们上面曾提出这种设想:国营经济与农民经济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协调现象,农村富农的日益增多,并与私营工商业资本联合起来(如果农村和部分城镇的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又低的话),这一切都是发生反革命危险的原因。

换句话说,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内的官僚主义是我国局势中原有的最令人不安的倾向的表现,是我们工作中各种缺点和偏差的表现,它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会逐渐破坏革命的基础。因此,这种情况也同其它情况一样,量变达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变。

15. 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长期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与经济建设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等其他基本任务相并行的任务。

党是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最重要的历史工具。当然,甚至党也不能超越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但是,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最优秀、最积极和最自觉的成员的自愿组织,比国家机关能更有效地防止官僚主义的各种倾向。尽管如此,党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不断反对这种危险。

因此,教育党内青年在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基础上以新的态度为国家机关服务并且彻底改造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传统和革命政策

传统与革命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很不简单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这样。最近我们有机会不止一次地谈到我们党的理论传统和实践传统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声明：我们决不允许破坏我们的思想系统。现在最需要的是对什么是党的传统取得一致的理解。为此，我们必须从利用相当多的反证方法开始，并且举出一些历史例证作为我们的论据。

让我们以第二国际的“典型”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它半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政策都是以适应议会制度、不断扩大组织、出版和财库为出发点。这种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传统带有半机械化的性质：每天“自然”流逝，承续昨日，同样又“自然”准备着明天。组织扩大了，出版发展了，财库充实了。

在这种机械化中成长着追随倍倍尔的整整一代官僚主义者、市侩和蠢人，他们的政治面目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最初几小时内彻底暴露的。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总是宣扬由传统所定下的党的老策略。而这个传统确实顽强。这是一种机械的、无批判力的和保守的传统；结果是窒息党的革命意志。

战争永远结束了德国政治生活的“传统”均势。年轻的共产党从正式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进入了危机和动乱的暴风雨时期。不过，通过它的较短的历史，不但可以看出传统的创造作用，而且可以看出它的保守作用，它在每个阶段，每个转折点，都与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党的重要决策发生冲突。

早在德国共产主义存在的初期，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便成了它的英勇传统。1921年3月骇人听闻的事件<sup>93</sup>完全证明：党还没

有足够的力量来达到它的目的。在重新开始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之前，必须朝着争取群众的斗争来一个剧烈的转变。

这种剧烈的转变很难完成，因为它与新形成的传统格格不入。目前在俄国党内，我们正在回忆最近几年党内或党中央出现的各种分歧，甚至最荒谬的意见。回忆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的主要分歧也许是有益的。现在看来很明显，那时在列宁领导下所实现的改变，尽管遭到大会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是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但确实拯救了第三国际；如果共产国际继续坚持那条机械的、无批判力的、在很短时间里已变成顽固传统的“左倾”道路，它就有灭亡和瓦解的危险。

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共产党十分痛苦地实现了必要的改变。然后他们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开始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同时进行冗长的谈判和采取其它的教育措施。这个策略坚持了两年多，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新的宣传方法由于旷日持久，变成了……一种新的半机械化的传统，在1923年下半年的事件中起了非常严重的作用。

现在不容争辩的是，从5月（开始于鲁尔区的抵抗）或7月（这次抵抗的失败）到11月，即泽克特将军夺取政权的这段时期，显然是德国生活中史无前例的危机时期。半被扼杀的艾伯特—库诺的共和制德国试图抵抗法国军国主义遭到了失败，这个国家可怜的社会和政治平衡也被打破了。鲁尔区的灾难对“民主”德国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同五年前德国军队的失败对霍亨索伦王朝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

马克骇人听闻地贬值，经济混乱，普遍的动荡和不安，社会民主破产，大批工人涌入共产党人队伍，一致期待着政府的垮台。如果共产党迅速改变它的工作步调，并且利用历史给予它的五个月或六个月时间，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技术上作好夺取政权的准备，



事变的结局就会与我们在11月所经历的完全不同。问题在于：德国党进入这个新的短暂的危机时期（也许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仍沿用了两年前为扩大群众影响而采取的宣传斗争的现成方法。这里需要确定新的方向，新的格调，新的接近群众的方法，关于统一战线的新的解释和应用，新的组织方法和技术准备——总而言之，需要实行急剧的策略转变。无产阶级应该看到一个正在从事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

但是，德国党实际上继续执行昨日的宣传政策，规模甚至更大。直到十月才确定新的方向。但是这样一来，剩下的时间太少，不能发挥它的威力。党的准备工作拼命加快速度，群众无法跟上，党本身在这两方面都缺乏信心，于是在决定性时刻不战而退。

如果说党没有抵抗就放弃了它的特殊阵地，那么主要原因是党已经证明它在新阶段的开始（1923年5月至7月）无法摆脱自己以前政策的机械性，似乎以前的政策本来就是为未来年代准备的，并且已经从党的宣传、行动、组织和技术等方面正确地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

时间是政治的重要因素，在革命年代尤其如此。有时丧失几个月需要几年和几十年才能弥补。假如我们党在1917年4月没有实现飞跃，然后在10月夺取政权，也必然会是这样。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德国无产阶级不会为它疏忽而付出太大的代价，因为目前德国政权的稳定无疑首先是国际形势造成的。

显然，传统作为一种保守因素，作为昨天对今天的机械性压力，是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它为保守党服务，而对革命党非常有害。革命党的全部力量首先在于摆脱保守的传统主义影响。这是否意味着不要任何传统呢？决不是。但革命党的传统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

如果现在我们以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过去和后来的十月革命

时期为例，就会认识到党的最宝贵的根本策略品质是党具有无与伦比的才能，善于迅速适应形势，很快改变策略，更新党的武器，采用新的方法，总之，善于实现迅猛的转变。暴风雨般的历史环境需要这种策略。列宁的天才创造了策略的高级形式。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党完全摆脱了保守的传统主义影响，因为一个大党不能有这样一种理想的自由，但是党的力量和潜力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来，因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大胆而又现实的革命策略的主动精神，已经把怠惰习气、传统主义和事务主义减少到最低限度。

党的真正传统正是在这里，也应当是在这里。

党的机关大量官僚主义化，必然伴随着保守的传统主义及其全部影响的发展。对于这种危险宁愿高估，也不要低估。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机关中最保守的分子总是想把他们的意见、方法和错误与“老布尔什维主义”混为一谈，并且力求把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说成是对传统的破坏，我认为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某种思想僵化的确凿表现。

马克思主义是进行历史分析和确定政治方向的方法，而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一大堆决议。列宁主义是这种方法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应用。列宁主义正是这种历史特点和这种方法的结合，它制定出大胆和自信的政策，列宁为我们树立了急剧转变政策的光辉榜样，并且不止一次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概括。

马克思说过，先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落后国家未来的榜样。有人想从这个有条件的命题来说明一种实质上是以俄国孟什维主义“哲学”为依据的绝对规律，用它来限制无产阶级，使它不根据革命斗争的进程，而按照一种机械的款式行事，所以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适应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的表现，也是适应于迟来的“民主”的表现。事实表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充满着极端对立现象的俄国，是第一个被推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

国家。

无论是十月革命，或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或是创立正规农民军，或是实施余粮收集制和新经济政策，或是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都没有或未能被十月革命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预见到或预见方向。所有这些事件和转变，每次都是在情况不同的形势下独立地、批判地以及富于创造性地运用布尔什维主义方法的结果。

这些决议每一项在通过以前，都引起了斗争。一味求助于传统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事实上，在每项新的任务和每一次新的转变面前，问题都不在于向传统寻找和发现那里并不存在的答案，而是要从党的全部经验中取得教益，独自找出适合形势的新的解决办法，这样做，就是使传统丰富起来。这个问题甚至可以提得更尖锐些：列宁主义就是要大胆摆脱保守的回顾，不受过去纯粹的正统出处和引证的束缚。

列宁本人不久前曾用拿破仑的话说明这种思想：“打起来再看。”换句话说，一旦投入战斗，就不要过分拘泥于陈规和先例，而应面对既定的现实，找到争取胜利的必要力量和通往胜利的途径。由于遵循这条路线，列宁在自己党内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受到了破坏传统、放弃“老布尔什维主义”的指责。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召回派经常打着保卫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幌子反对列宁主义倾向的情况。（《红色年鉴》<sup>94</sup>第九期登过一些这方面的极有趣的材料。）党内所有墨守成规的人都是在捍卫“老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在捍卫死板的、虚构的、假传统的掩饰下，跳出来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我们党内有一位历史学家（我们党内的历史学家到现在为止，不幸都不太走运）在十月事件的高潮中对我说：“我不拥护列宁，因为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仍然站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立场上。”“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

斯特和约,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斗争,也是用维护党的革命传统和反对国家机会主义危险以捍卫“老布尔什维主义”纯洁性的名义来发动的。“工人反对派”实际是指责党破坏旧传统的全部批评就不用回忆了。我们仅在最近才看到:就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传统作出最官方的解释的人们所采取的立场,同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的需要以及同列宁的立场是截然对立的。

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其它在历史上无足轻重,有同样定论的事还可举出很多。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情况已足以证明:每当客观形势需要新的转变、勇敢的后退以及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时候,保守的阻力就表现为用“旧传统”和所谓老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不过是剩下来的时代空壳——与新任务、新形势和新方向相对立的一种自然倾向。

党的机关愈向内发展,党本身原有的傲气就愈严重,对各阶层的需求反应愈慢,并且愈好用正规传统来反对各种新的需要和任务。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可能对党的精神生活和青年的教育给以致命打击的话,那肯定是把列宁主义从一种需要创造精神、批判思想和思想上的勇气来应用它的方法,变成一种只需要一劳永逸地指定专人进行解释的教规。

不能把列宁主义设想为是没有理论广度,不对政治进程的物质基础进行分析批判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武器必须不断磨利,经常使用。传统正是在这里,而不是用合法的出处和偶然的引证来取代它。列宁主义与肤浅的思想和粗糙的理论是水火不相容的。

不能把列宁著作割裂成适用于各种可能情况的语录。因为对列宁来说,超越现实的公式是从来没有的,它永远是我们能够理解现实和支配现实的工具。从形式上讲,在列宁著作中并不难找出几十处或几百处似乎自相矛盾的段落。但是决不能只看段落之间

的形式联系，而应看到每段话与具体现实的真正联系，因为这种公式是应用于现实的杠杆。列宁主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但是不能把革命嗅觉与蛊惑者的鉴别力混为一谈。后者可能取得一时的成功，有时甚至是耸人听闻的成功。但这是一种低级的政治本能。它总是倾向于阻力最小的路线。另一方面，列宁主义力图提出和解决革命的基本问题，克服主要障碍；它的蛊惑者对方则总是回避问题，制造虚幻的满足，麻痹批判性的思想。

列宁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是从革命行动的观点出发，在量和质上对现实所做的最高评价。正因如此，列宁主义同以空洞鼓动做掩饰以逃避现实的行为，同以维护党的传统作借口为消极丧失时间和昨日的错误狡辩的行为是不相容的。

列宁主义真正摆脱了形式主义的偏见，摆脱了教条主义的说教以及企图束缚革命行动的意志的知识分子保守主义的一切形式。但是如果认为列宁主义“万能”，那就是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列宁主义包括群众活动和群众政党的道德，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革命的道德。列宁主义是同官吏的骄横跋扈和官僚的犬儒主义誓不两立的。一个群众政党有它自己的道德，它是正在为事业而战斗的战士的义务。蛊惑群众的宣传是不符合革命政党的精神的，因为那是骗人的，它所提出的某种简单化解决当前困难的办法，必然会损害最近的将来，削弱党的自信心。

蛊惑宣传一遇风浪袭击和严重危险，就容易变成惊慌失措，而惊慌失措和列宁主义甚至在纸面上也是很难相提并论的。

列宁主义充满战斗精神。而不用计谋，不要花招，不愿弄敌人，是不能打仗的。胜利的军事谋略是列宁主义策略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列宁主义对党和工人阶级却表现了最高的革命忠诚。

它不允许捏造、空想和虚张声势！

列宁主义是正统的，顽强的，不可战胜的，但它没有丝毫的形式主义或教规，也没有一点官僚主义。它在斗争中不畏险阻。如果把列宁主义传统看成一种超理论的保证，能使解释这些传统的人们的全部言论和思想一贯正确，那就是嘲弄真正的革命传统，并把它变为官气十足的官僚主义。企图使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热衷于反复应用千篇一律的公式，靠它来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不根据每个问题的实质，不采用提出和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而是依据传记性的资料……真是可笑而又可悲。

既然我不得不用点时间谈谈我自己，那我要说我不认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道路象其他同志那样平安顺利。我是经过战斗走向列宁主义的。但是我走过了全部路程。我为党服务的行动是说明这一点的唯一保证，除此以外我提不出其它的补充保证。如果问题的提出是为了进行生平的调查，那么，它至少应当得到正当的解决。

这就需要回答几个棘手的问题：在小节上忠于导师的人，在大节上也会忠心耿耿吗？在导师面前貌似恭顺的人，一旦导师不在，会保证继承他的事业吗？难道全部列宁主义就在于顺从吗？我没有列举个别同志为例来分析这些问题的任何打算，因为我所关心的是还要继续与他们携手共事。

无论未来的困难和意见分歧可能有多大，只要通过全党的智慧同心协力，每次都由党来检查，从而保证发展的连续性，它们都能胜利地得到克服。

革命传统的这种性质是与革命纪律的特殊性密切相联的。哪里有保守的传统，那里一遇危机就会纪律松弛，违法乱纪。至于在我们党内凡是有革命活动的高潮体现传统的地点，纪律就无比严明，因为纪律的决定意义和重要意义是在战斗中不断受到检验的。因

此，革命主动精神，即批判地大胆地探讨问题的精神是与战斗中的铁的纪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只有通过这种卓越的活动，青年人才能从老一辈那里接过这种纪律的传统，并且继承下去。

我们同任何人一样，爱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但是谁胆敢把官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把顽固守旧与传统混为一谈，就决不答应。

## 关于“低估”农民的问题

某些同志采取了非常简单的政治批评方法：他们断言我今天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因为我在十二年前就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犯过错误。这种方法使任务变得无比简单。

今天的问题本身需要就它的全部内容进行研究。但是一个在几年前提出的问题，早已经过详细讨论，有了历史定论，现在重新提出来，就不用煞费苦心了；只需要回忆和诚意就行。

但是我不能说我的批评家们在后面一点上都做得很好。我要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作例证。

最近某些集团津津乐道的论据之一是指责——主要用间接方式——我“低估”农民的作用。但是人们在我的反对者那里却无法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事实和引证，总之，无法找到任何证据。

通常他们的论证可归结为对“不断革命”论进行影射，引用街谈巷议的三言两语。而在“不断革命”论与街谈巷议之间什么也没有，空洞无物。

至于谈到“不断革命”论，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在1904、1905、1906年以及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坚持认为我当时所发挥的那些思想，从整体来看，比那时许多布尔

什维克所写的东西更接近列宁主义的真正实质。

“不断革命”的提法是马克思针对 1848 年革命用过的提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当然不是在修正主义文献中，而是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个专用语永远享有公民权。弗兰茨·梅林曾引用它来说明 1905 年到 1907 年的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确解释是继续革命，即不间断的革命。这种提法所包含的政治概念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在取得这次或那次的政治胜利之后，在实现这次或那次的社会改革之后，革命没有结束，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它的唯一的边界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革命一旦开始（在我们所参加的革命范围内，尤其是当我们领导革命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正式阶段上决不半途而废。恰恰相反，当革命还没有发挥完运动的全部潜力和全部动力的时候，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推进革命，当然要与形势相适应。这一点既适用于在一个国家内争取革命的胜利，也适用于国际范围。

这个理论对于俄国就意味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作政治王冠，甚至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得到农民支持和开辟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工人政府。

因此，不断革命的概念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战略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十八年或十五年以前看不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在总的原则已经有染满鲜血的历史篇章作证，就不可能不理解它和不承认它了。

谁也不可能在我当时的著作中发现任何忽视农民的意图。不断革命的理论直接导向列宁主义，特别是导向列宁 1917 年的四月提纲。

然而，事先决定了我党贯穿在整个十月革命中的政策的这个提纲，大家知道，却在现在极端厌恶“不断革命”论的大多数人当中



引起了惊慌。

可是，要同那些早已停止读书、一味沉浸在对青年时代的混乱回忆中的同志们讨论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并且无济于事。但是，那些原来孜孜不倦地学习的同志们和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深奥的词句或“不断”二字所吓倒，他们将手拿铅笔，认真研读当时赞成或反对“不断革命”的文章，并且尽量从中找到与十月革命有联系的线索，而这是不太困难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在此以后的实践。那里的每个细节都是经得起检查的。关于我们党采纳“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的政治选择问题就不用说了，在我和列宁之间连一点分歧的影子都没有过，在土地法令问题上也是这样。

不论我们的农民政策在一些具体要点上是对还是错，它从未在我们之间引起过任何意见分歧。正是由于我的积极参加，我们的政策才面向中农。军事工作的经验和各项决定对这一政策的实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此外，在一支从农民中征兵并在先进工人的帮助下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的兵团中，怎么可能低估农民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呢？

只要查阅一下我们的军事政治文献就足以看出，下述思想过去多么深入人心，就是认为内战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与反革命为支配农民而斗争，因此，不在工农之间，不在每个团队中，不在每个军事行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建立合理的关系，胜利就不能得到保证。

我在1919年3月从伏尔加区呈送中央的报告中，曾拥护更有效地贯彻我们党对中农政策的必要措施，反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流行的疏忽和轻率态度。

我在一份根据森赫里耶夫党组织的讨论所提出的报告中写道：“当前的政治形势——它可能甚至延续很长时间——不过是一

种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现实，因为即使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取得胜利，我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从中农出发，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

然而，面向中农的第一种形式（如“对农民表示关心”、“不对他们下命令”，等等），证明是不够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改变经济政策，我对部队情绪的观察以及在乌拉尔进行经济巡视期间发表的宣言，促使我于1920年2月给中央委员会写道：

“按照消费标准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以及缴纳这些粮食和平均分配工业品的联合责任制等现行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状态，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

我提出了一项作为基本实际措施的建议：“用按产量比例征税的办法（一种累进所得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并且使这样一种办法还能更有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更好地进行耕作。”

我这段话基本上提出了一项相当完整的向农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建议。与此相联系，还有如何对待新的工业组织的意见，即一项虽非决定性的，却颇为审慎的建议，但总的说来，这是针对破坏工农业之间一切联系的“管理总局”制度的建议。

这些建议当时被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请看，这就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唯一的意见分歧。现在对1920年2月是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有利时机可能会有不同的估计。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可能不一致，但我个人毫不怀疑，我们定能从它得到益处。无论怎么说，不可能从我刚刚提到的文件中得出我经常忽视农民，或对他们的作用估计不足的结论。

由于实行余粮收集制和“管理总局”拥有无限权力的制度，我们陷入了经济死胡同，工会的争论就是因此而发生的。工会“并入”经济机关能挽救局势吗？显然不行。但是，只要“战时共产主

义”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任何其他措施都不能挽救这种局势。

这些插话式的争论在求助于关于市场的决议——一项没有引起任何意见分歧的极其重要的决议——以前已经停止了。一项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有关工会任务的新决定，是由列宁在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制订出来的，而且再一次获得一致通过。

我还可以列举几十件其他事实，尽管在政治上不太重要，但都正好能一针见血地反驳所谓我对农民作用“估计不足”的无稽之谈。不过，这种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谬论，专靠欺诈，或者顶多靠糟糕的记忆为依据的谬论，果真需要和可能反驳吗？

\* \* \*

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本特点真是“低估”农民的作用吗？不，不是。机会主义的基本特点，包括我们俄国的孟什维主义在内，是低估无产阶级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缺乏信心。

孟什维克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全部论据是：俄国的农民人数异常庞大，起着巨大的社会作用。社会革命党人则认为：农民天生是为了接受他们的领导，并且通过他们来统治全国。

孟什维克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跟社会革命党人合作，断言农民按其天性注定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支柱；他们在各种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效劳，不是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就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此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通过这些合谋把农民捆着手脚送给资产阶级。

可以肯定地说——而这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在把农民的作用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比的时候，低估了农民可能起的作用，但是当把他们把无产阶级与农民对比的时候，就更低估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前一个低估是从后一个低估产生出来的，是派生出来的。

孟什维克坚决否定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和由此得出的全部推论，即认为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夺取政权是乌托邦、幻想和胡说。这就是孟什维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sup>95</sup>。顺便说一下，孟什维克也只有脚后跟这一点上和阿基里斯相似。

最后，在十月革命前，我们党内反对夺取政权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真是在于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吗？恰恰相反，是在于把农民的作用估计得高过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反对夺取政权的同志们主要是断言无产阶级将会被以亿万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所淹没。

“低估”一词的本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这不是农民在历史上的绝对分量的问题，而是农民对于其他阶级——一方是资产阶级，另一方是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作用和重要意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该提得很具体，就是说，要从各个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角度提出问题。对革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远非到处都如此）就是要弄清：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能否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且能吸引到什么程度。

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在许多国家象在我们本国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决非到处都如此）在经济上就是要弄清：执政的无产阶级采取什么措施能成功地使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民经济协调起来。但是在所有国家和在一切情况下，机会主义的基本特点都是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力量，过低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

想从农民问题得出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布尔什维主义公式，既适用于1917年和1923年的俄国，又适用于美国及其农民，还适用于波兰及其大地主，这种企图虽不能说是荒谬的，但却是可

笑的。

布尔什维克是从把小块土地归还给农民这一纲领开始的，然后用国有化纲领代替了它，在1917年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建立了余粮收集制，后来又用粮食税代替它……但是我们仍远未解决农民问题，并且还必须实行很多改革和转变。

今天的实际任务不能用昨天的经验得出的一般公式来解决，经济组织问题的解决不能只凭求助传统的办法，只靠回忆过去和诸如此类的办法，是不可能确定历史道路的，这不是很清楚吗？

当前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当然也在工业之中建立一种允许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使危机、冲突和混乱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保证工业和国营商业比私人资本拥有日益增长的优势。

这是一个总题目，它分成许多小题：今后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在城乡之间，在运输业、金融业和工业之间，以及在工业和商业之间建立合理的相互关系？指定哪些机关执行这些措施？最后需要什么统计数据才能在任何时候制订最适合客观情况的计划和经济核算？显然，每一个问题都不可能事先用任何一般的政治公式来解决，而必须在建设过程中找具体答案。

农民所要求于我们的不是重复阶级关系（结合，等等）的正确历史公式，而是要我们供给他们便宜的钉子、布匹和火柴。

我们只要日益准确地实行登记、组织、生产、出售、检查和改进工作、实行根本改革等措施，就一定能不断满足这些需求。

这些问题带有纲领性和原则性吗？不，因为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经验的概括，无论是党的纲领，还是党的理论传统都没有束缚我们，也不能束缚我们。

这些问题有巨大的实际重要意义吗？其大无比。这些问题的解决决定着革命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要按照已经变成抽象概

念的党的“传统”来解决每一个实际问题和由此产生的意见分歧，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抛弃这种传统本身最重要的东西：按照每个问题的全部现实提出和解决它们。

应当结束关于低估农民作用的无稽之谈了。真正需要的是为农民降低商品价格。

## 附 录

### 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

(1920年2月提交党中央的建议)

王室贵族的土地已经分给农民，我们的整个政策反对农民占有大量土地和大量马匹(富农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粮食政策是建立在征收剩余农产品(超过消费标准部分)的基础上的。这就促使农民除满足自己的家庭需要以外，不愿再多耕种土地。特别是三牛抽一(作为剩余牲口)的法令，实际上导致秘密宰牛，私卖高价肉以及奶品业的破产。同时，城市的半无产者，甚至无产阶级分子正在移居农村，在那里着手经营自己的农场。工业正在丧失劳动力。农业中的自给农场则在不断增加。由于这种情况，我们的余粮收集制政策的基础已遭破坏。如果今年能够征收更多的农产品，那是由于苏维埃领土的扩大和粮食机构有了某种改进。但是总的说来，国家的粮食来源有枯竭的危险，征收机构的改进无法扭转这一事实。要战胜经济衰退趋势，只有采用下列办法：

1. 用按产量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余粮收集制(一种累进所得税)，使用这种办法还能更有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进行耕作；

2. 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缴纳的粮食量，两者必须确定

更严格的相互关系，不但城镇如此，乡村农场也应如此。

地方工业企业应承担这项任务。特别是要用工业企业的产品来换取农民所提供的原料、燃料和粮食。

总而言之，按照消费标准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以及缴纳这些粮食和平均分配工业品的联合责任制等现行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状态，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这是很清楚的。

## 计划经济（一〇四二）

在目前的口头和书面讨论中，第一〇四二号命令突然莫名其妙地引人注目起来。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大多数党员已经忘记了这个神秘编号的意义。我将加以解释。这是1920年5月22日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机车修理的命令。此后，又有多少流水从铁道和桥梁底下流过。现在存在的许多问题看来要比我们在1920年组织机车修理是否正确更加紧迫得多。有关冶金、机器制造、特别是农业机械方面新近有许多计划指示。关于计划管理的意义和任务，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我们有1923年计划生产的新经验。那么，为什么一个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制定的计划，正好现在象罗马戏院里用于表演的救急神一样重新出现了呢？

救急神的出现是由于它后面有导演，他需要它出来造成高潮。谁是第一〇四二号命令的导演？为什么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需要这项命令呢？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你可能会认为这是死钻历史真相牛角尖的人所需要的一项命令。显然，他们也知道有许多别的问题要比约四年前提出的修理铁路车辆的计划更为重要，更合时

宜。但是，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把第一〇四二号命令说成是一项忽视农民因素、轻视党的传统和企图成立派别的错误命令，使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想前进，想制订新的计划并对其正确和成功负责，这可能吗？你们自己去判断吧！乍看起来，一〇四二只不过是简单的命令编号。但是，你们如果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会看出一〇四二这个号码简直就象启示录中的猛兽的象征“六六六”<sup>96</sup>这个号码。首先必须从砸烂启示录中的兽头开始，然后我们才能从容谈论还没有被四年时光盖没的其他经济计划……

老实说，最初我本不想花费读者的时间来谈第一〇四二号命令。由于对它的攻击归结起来都是借口和影射，目的是要显示这些耍花招的人所知道的事比所说的要多得多，其实，这个可怜的家伙却是一无所知。从这种意义上说，对第一〇四二号的“指责”与对第一〇四一号的其他指责并没有多大区别……在这里，可能是数量代替质量。任意抹杀事实，歪曲原文，轻视比例，全是一大堆语无伦次的废话。为了弄清意见分歧和过去的错误，需要恢复当时局势的本来面目。我们能为它抽出时间吗？即使能做，但在许多根本错误的暗示和指责被忽视以后，是否值得对“第一〇四二号命令”的重新出现作出反应？

经过考虑以后，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在这里遇到一种……轻率地和欺诈地进行指责的典型例子。第一〇四二号命令事件不是发生在思想领域，而是生产领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而要用数字和重量来衡量。收集可靠的生产情报和报告真实情况，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采用简单的细心办法就能指导那些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因为向他们表明他们正在谈论一些自己不知道和不理解的事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从这个具体的和确切的例子知道救急神只不过是一个不老实的滑稽小丑，也许能帮助一部分读者识破其他“指责”后面的把戏。不幸的是，这种指责空洞无物，很难



象第一〇四二号命令那样加以证实。

我在解释这一事件时，将竭力使自己不局限于历史资料，并且不把第一〇四二号命令与计划生产和管理的问题联系起来。我将提出的几个具体例子也许能使事件稍为清楚一点。

关于机车修理和为此目的有组织地利用铁路管理局和国家在这方面的力量和资源的第一〇四二号命令，是由今天仍在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的优秀专家花了很长时间制订出来的。第一〇四二号命令在1920年7月1日正式执行，实际上在5—6月间就开始贯彻了。这个计划不仅涉及各条铁路线的蒸汽机车库，而且涉及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关工厂。我们在下面列出了一张说明计划执行情况的比较表，一方是铁路蒸汽机车库，另一方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我们的数字是转述基本运输委员会按期呈报劳动国防委员会并由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签署的可靠的官方资料。

### 第一〇四二号命令的执行情况

(计划执行情况的百分比)

1920年	铁路蒸汽机车库	经济委员会的工厂
7月	135	40.5
8月	131.6	74
9月	139.3	80
10月 <sup>①</sup>	130	51
11月	124.6	70
12月	120.8	66
总额	129.7	70 <sup>②</sup>

① 鉴于计划执行所取得的成绩，从10月起定额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托洛茨基注

②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厂在供应铁路蒸汽机车库的原材料和各种备件时，只完成它们原定计划的百分之三十。——托洛茨基注

1921年		
1月	95	36
2月	90	38
3月	98	26
4月	101	

(叶姆沙诺夫在1921年是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

可见,由于加强了交通人民委员部蒸汽机车库的工作,从10月开始,生产定额每月可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尽管有了这样的增长,1920年下半年的计划完成情况超过了已达到的百分之一百三十的定额。1921年前四个月的计划完成情况略低于百分之百。但是,此后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超出交通人民委员部权限的问题干扰了计划的执行:一方面是由于修理工作本身缺乏所需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另一方面是由于燃料奇缺,甚至现有的机车也不能利用。结果,劳动国防委员会为了1921年的平衡,在1921年4月22日的一项命令中决定大量减少第一〇四二号计划原定的机车修理定额。交通人民委员部在1921年后八个月的工作中完成了百分之八十,而国民经济委员会只完成原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四。

第一〇四二号命令在上半年即运输最紧张时期执行的结果,曾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予以宣布,受到党中央政治局的表扬。其内容如下:

“这样,修理计划不仅对铁路蒸汽机车库,而且对国民经济委员会为运输业开工的各工厂都带有明确的暂时性质。原定耗费大量劳动并经基本运输委员会批准的修理计划仍然按照一种很不相同的比例在铁路蒸汽机车库(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各工厂(国民经济委员会)中执行:当时蒸汽机车库的大修和小修——用平均机修单元表示——在这一年从修车二百五十八辆增至一千辆以上,即增加了三倍,这等于月修计划完成百分之一百三十,而国民经济委员会却只按交通人民委员部与基本运输委员会商定的原计划三分之一的比例供应原料和各种备件。”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以后，第一〇四二号命令所提高的定额却因缺乏原料和燃料而不能完成。顺便说一下，刚从这几句话知道这个事实的批评家会说：这正好证明命令是错误的！必须对他们这样回答：第一〇四二号命令管机车修理，但不能干预其他命令和机构所控制的冶金和采煤等生产。第一〇四二号命令不是万能的经济计划，而只是一项交通计划。

但是人们要问，难道它不需要与燃料和金属等资源协调一致吗？当然需要。正因如此，基本运输委员会成立时，才在同等基础上吸收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计划是按照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们宣布所能供应的某种原料的指示而制订出来的。因此，如果有计算错误，责任完全在经济委员会。

可能，毕竟那是批评家们所要说的话？这值得怀疑，很值得怀疑！这些“批评家”只是在历史真相不抛弃他们的时候，才对它表示最大的关心。在这些放马后炮的批评家当中，有些人原是当时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在自己的批评中简直把人称搞错了。这倒是可能发生的。另外，应当指出，当时预报采煤和冶金生产等等要比现在困难得多，这是情有可原的。如果说，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机车修理的预报相当准确，国民经济委员会无法与它相比，那是因为至少在这一点上，铁路管理更加集中，更有经验。我们很容易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此，这丝毫不能改变计算错误全应归咎于经济委员会这一事实。

这个促使计划定额降低，但未使计划本身作废的错误表明，它既未直接也未间接涉及第一〇四二号命令，而这项命令在本质上是带方向性的，并且规定可以根据经验定期加以改变。生产计划的检查是实现计划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从上面我们看到，由于交通人民委员部蒸汽机车库的生产能力在采取若干措施以后，证明比人们所设想的要高得多，第一〇四二号命令的生产定额从1920

年10月起已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我们还看到,因为发生了上述人民委员部不能控制的种种情况,这些定额从1921年5月起急剧降低了。但是,这些标准的提高和降低都是紧随着一个以第一〇四二号命令为基础的明确计划而实现的。

这是对一个方向性计划的最高要求。当然,最初几个月即上半年的数字最有意义,以后的数字只有理论意义。参加制订这项命令的人,当时谁也未曾料到它能坚持执行四年半之久。当证明它能提高定额时,所设想的期限减为三年半。由于原料缺乏,期限再次延长。但是,在运输功能起最关键作用的时期(1920年底至1921年初),证明它能适应现实,机车修理工作能按明确的计划完成,增长四倍,使铁路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这是尽人皆知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尊敬的批评家是用哪些理想计划来与第一〇四二号命令作对比的。在我们看来,它应当与命令颁布以前的形势作对比。在那些日子里,机车分给要求为自己运粮的各个工厂。这是一项造成运输瘫痪和大量浪费修车劳动的致命措施。第一〇四二号命令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一套机车定量定厂制度,使车辆修理基本上不再依靠工人阶级的分散努力,而是依靠比较精确的登记人力和资源的交通管理办法,从而使修理工作采纳了各种合理组织劳动的因素。第一〇四二号命令的原则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至于计划数字与完成数字是否相符,与此毫无关系。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这方面的情况也同样是很好的。

自然,事实已被忘记,人们可以随意谈论一〇四二计划,满以为无人会想去查对它,无论如何总会挑出一些毛病。但是在那些日子里,这件事非常清楚,是无可否认的。证据不胜枚举。我们将选择其中的三处,作者虽然不同,但各有典型特点。

6月3日《真理报》对运输情况的评价如下:

“……现在,运输功能在某些方面已有改进,任何一个观察家,甚至一个

肤浅的观察家都能证实，现在有了某项命令，尽管是初步的命令，但以前未曾有过。因为这是第一次制订了一个准确的生产计划，给各车间、各工厂和各蒸汽机车库分配了明确的任务。这是革命以来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完善和准确的登记全部生产潜力的办法。从这一方面来说，托洛茨基签署的第一〇四二号命令是我们在运输领域工作中的转折点……”

也许有人反对说，这个证明不过是由尼·布·署名所写的一种表示期望的评述，只是布哈林的意见。我们不争论这一点。然而，《真理报》在这段话中承认车辆修理工作已经开始贯彻这项指令。

但是，我们将提出一个以半年经验为根据的更有权威的证明。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

“……你们已经从叶姆沙诺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提纲中看到，我们在恢复运输方面制订了一个为期多年的切实计划。第一〇四二号命令预计为五年，在五年当中我们就能恢复我们的运输业，减少破烂机车的数目；我要强调一下，在提纲的第九条里指出我们已经把这个期限缩短了，这一点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

当预计多年实现的大计划出现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怀疑分子，他们说：‘我们哪里还能去预计许多年的事情，能完成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不坏了。’同志们，必须善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

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运输工作的明显改进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提醒你们注意第九条的一个地方，那里说恢复运输业的期限原定为五年，但是这一期限已经缩短，因为我们正在超额完成工作；期限现已确定为三年半。其他经济部门也应当这样工作……”<sup>①</sup>

最后，在第一〇四二号命令颁布一年以后，我们读到了捷尔任斯基在1921年5月27日签署的一项命令《交通人民委员部未来

<sup>①</sup>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4页。——编者注

工作的基础》：

“鉴于降低第一〇四二号命令和第一一五七号命令<sup>97</sup>的定额——计划经济的第一项卓越经验——是暂时的，是由我们正在经历的燃料危机引起的……采用保养和维修工具材料和车间的必要措施是恰当的。”

这样，铁道部门的新领导人（接替叶姆沙诺夫）在有了一年经验和被迫降低修理工作定额之后，承认第一〇四二号命令是“计划经济的第一项卓越经验”。我非常怀疑，事过境迁很久的历史，尽管只涉及铁路车辆的修理，现在还会被人歪曲。不管怎么说，目前有几个人正热中于这类“修理”，力图歪曲昨天的历史，使它适应眼前的“需要”。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修理工作（也是按“计划”进行的！）有任何社会效用，或者，从长远来看会产生任何确实的成效。

诚然，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铁路的火车头可以修补，历史的火车头却不能这样做，尤其是不能颠倒日期。拆穿来说，这些修理历史的企图都叫伪造<sup>①</sup>。

\* \* \*

我们已经看到，各有关经济部门的协调，现在提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更大规模上和更系统地提出的任务，基本运输委员会都是局部地和摸索地完成的。我们所举的例子同时说明了计划经济的任务和困难在什么地方。

无论大小工业部门或任何企业，如果没有规划，就决不能合理地分配它们的资源和力量。同时，所有这些局部计划都是有关联

---

① 为了搅乱问题，你们当然可以不顾事实和数字而谈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或外国机车订货。因此，我认为需要指出：这些问题彼此没有联系。第一〇四二号命令是在叶姆沙诺夫领导之下，然后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之下继续管理修理工作的，因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已经完全改变。谈到订购外国机车，我不愿背着交通人民委员部并且不顾第一〇四二号命令及其执行情况来解决和实现这类业务。顺便问一下，难道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吗？——托洛茨基注

的，它们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必须把这种互相依存关系作为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基本准绳，也就是说要在已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计划定期核实。

一个制订了多年的计划最后证明它是不能实现的，嘲笑这些计划是容易的。这样的计划多得很，经济幻想在经济中没有地位就更不用说了。但为了要制订合理的计划，不幸的是还必须从最简单和粗略的计划开始，正如要得钢刀必须先从石斧开始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计划经济问题抱有幼稚的想法。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计划。我们有了一个电气化计划，让我们实现这个计划就够了！”这种理解表明对这个问题缺乏最起码的知识。电气化远景计划完全从属于工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最后还有农业等主要部门的远景计划。所有这些局部性计划必须首先根据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国经济资源和经济潜力的资料互相协调一致。

正是这样一个协调的总计划，例如一个年度计划(包括三年或五年计划等等的特殊计划的年度部分，并且只代表能实现的设想)，才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保证计划的执行和在执行过程中作出必要调整的主管机关在实践中的根据。这样一种领导具有一切必要的灵活性和行动自由，不致蜕化(也就是不应蜕化)为一系列临时应急行动，因为这种领导方法有一个合理的有关整个经济过程的总概念作为依据，而在作出必要的调整时，它会努力使经济计划完善化，并根据物质情况和资源使其具体化。

这就是国家经济计划最一般的方式。但是市场的存在使这种计划的执行变得异常复杂化。在边远地区，国家经济会与小农经济结成联盟或者至少试图与它结成联盟。结合的直接工具是轻工业产品和部分中型工业产品的贸易，直接为国家(为军队、运输业和国营工业)服务的重工业只是间接地、局部地或附带地参与贸

易。农民经济是不受计划控制的，但是它受自发地发展的市场的影响。国家能够而且也应该对农民经济施加影响，推动它前进，但国家还绝对没有能力根据单一的计划把农民经济纳入轨道。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好多年（恐怕首先要依靠电气化）。在下一个时期（这是我们实际上最感到兴趣的），我们将有一个计划国营经济，使国营经济与农民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其结果则是国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适应农民市场的需要。虽然这个市场自发地发展着，但国营工业并不是自发地适应这个市场。相反地，我们在经济组织上的成就，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对市场情况的确切了解和正确的经济预测成功地根据明确的计划协调国营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各国营工厂或各托拉斯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竞争，丝毫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国家是所有国有化工业的所有者，国家作为一个所有者、管理者和经理，在对待农民市场的关系上是把它的全部财产看作一个整体的。

显然，对农民市场不可能作精确的预计，正如我们不可能精确预计世界市场的情况一样，因为我们同世界市场加强联系主要是通过输出谷物和原料，单单因为收成等等情况的变化无常，估计的错误就在所难免。这种差错将通过市场以局部的或者甚至普遍的产品不足、混乱和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如此，但是只要更加认真地把计划经济推行到国家经济所有部门中去，使这些部门不断地统一步伐，那么这些危机就不会尖锐和持久，这是很明显的。如果说布伦坦诺派（德国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的信徒）和伯恩施坦的学说——根据这个学说，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统治可以“调节”市场从而使工商业危机成为不可能——是根本错误的话，那么把它应用到工人国家方面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个国家是托拉斯的托拉斯和银行的银行。换言之，在我国经济中，国营经济与私人活动相比，危机范围的扩大和缩小是它们是否取得成就的最清



楚和最正确无误的晴雨表。在国营工业争取控制市场的斗争中，计划经济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没有它，国有化本身就会成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私人资本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

所谓国营经济，我们所指的除工业之外，当然还有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金融事业。这一整个“综合体”——就其整体及其各个部分而言——是在适应农民市场和适应作为纳税人的个体农民。但是这种适应有其基本目的，那就是提高、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和社会主义基础的国营工业。如果认为有可能孤立地发展这个“综合体”的某一部分——不论是运输和金融或任何其他部分——并使其臻于完善，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的进步和它们的退步都是紧密地互相依赖的。因此，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具有原则的巨大意义的，它的作用在我们当中还很难为人所理解。

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调整国家经济中的一切基本因素，也就是说有系统地统一并指导国家经济中所有的基本因素，使它们与国家经济，也就是主要与农民经济保持正常的关系。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关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工业，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说在国营经济综合体当中，“专政”权必须掌握在工业手里，而不是在财政金融手里。当然，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专政”这个字眼的意义在这里是极其有限和有条件的：这是用来与财政金融所要求的“专政”的相对提法。换句话说，不仅对外贸易，而且还有恢复稳定的通货，都必须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当然不用说，这决不会是针对结合关系的。相反地，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我们才能逐渐顺利地把这种“结合”从纯修辞的范围转入经济现实的范围。如果说，这样提出问题就是“忽视”了农民，或者说让国营经济独揽一切就不符合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那真是荒谬

透顶，无论怎么说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下面是我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它最有力地说明：下一阶段所期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业高潮，谁需要这样一种高潮：

“我说我们曾有过亏损。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有权威的经济部门负责人有同样的看法。我建议你们看一下为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出版的哈拉托夫的《论工资》这本小册子。李可夫为它写了一篇序言说：‘在进入新经济政策第三年的时候，必须承认前两年所取得的成就还是不够的，我们甚至未能完全制止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减少，更谈不上向积累资金和提高共和国的生产力过渡了。在这个第三年应该使我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部门成为盈利的部门。’这就是说，李可夫断定我们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在这一年中仍在继续减少。他说：‘在第三年应该使我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部门成为盈利的部门。’我本人非常赞同李可夫的这种愿望，但是，根据我们在这第三年的工作成就来看，我不抱他那样的乐观希望。我不相信我国工业的基本部门在第三年能够盈利，我还认为，如果我们能在新经济政策第三年首先估计出我们的亏损比我们在第二年的情况好一些，并且能够证明我们的工业、运输业、燃料业和冶金业等重要部门在第三年的亏损将低于第二年，那就不错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造成一种发展趋势，并且帮助它扩展下去。如果我们的亏损减少，工业增长，我们就会成功，我们就会取得胜利，也就是说，能够盈利。但是这种曲线必须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所以，硬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发展速度，并且几乎靠“脾性”来决定……是很荒谬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发展方向问题。

但是，要同那些把每一个明确具体的新问题说成是早已解决的一般问题的人进行争论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使一般公式具体化，而这是我们许多争论的要点：我们必须从提出结合的一般公式谈到更具体的“剪刀差”问题（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从“剪刀差”问题谈到有效地和有计划地调整各种左右价格的经济成分的问题（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用老布尔什维克的术语来说，这是反对

经济“尾巴主义”。不取得这种思想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取得任何经济上的成就。①

铁路车辆的修理在1920年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因为当时尽管有官僚主义管理总局建立的摩天大楼，但还不可能有象目前这样的计划。制订计划这种杠杆被应用于运输业中，就是说应用于当时陷入最严重险境和濒于彻底崩溃边缘的经济部门。这就是我们那时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在提交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提纲中说过：“在整个苏维埃经济现在所处的情况下，当一个简单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在大多数与这个未来计划有密切关系的部门还是凭经验取得一致的时候，铁路管理局要根据一种必须事先订出来的简单经济计划的资料来编造自己的修理和管理计划是绝对不可能的。”运输业由于有修理计划而得到改进，不再是负值，但又碰到了其它“负值”：冶金、粮食和煤炭。根据同样的原因，第一〇四二号计划在其发展过程中提出了总经济计划的问题。新经济政策改变了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因而也改变了解决它的方法。但是问题本身仍然非常尖锐。许多决定反复重申需要成立作为苏维埃经济总参谋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是明证。

不过，我们还要回头细谈这个问题。因为各项经济任务需要进行单独的和具体的检查。

我希望，我刚才举出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我们的批评家重新翻出第一〇四二号命令是枉费心机。这项命令的命运所证明的与他们所希望证明的恰好背道而驰。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手法，我们预料他们会大声疾呼：“翻出这些老问题，检查四年前颁布的命令有什么用！”要满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修补昨天的历史的人是

---

① 我们再一次奉劝所有热中于这个问题的同志们重读一下，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仔细研究一下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业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注

极难的。但是我们不打算满足他们。我们相信读者不会对编造历史感兴趣，而是努力发现真理，把它消化成自己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建设。

写于1923年12月。译自《新方针》1943年纽约英文版第39—88页。

## 论军队和其他方面的因循守旧

近一年来，我不止一次就军队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口头地或书面地同部队干部交换过意见，这些不良现象总起来可以叫做因循守旧的顽症。在上次陆海军政治工作人员代表大会上，我相当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致我认为在我们一般的报刊上谈一谈也未尝不可，何况患这种病症的决不只限于军队。

因循守旧与官僚主义是很近似的，甚至可以说，因循守旧只不过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当人们习惯于一种形式而不考虑其内容，洋洋得意地使用现成的词句而不思考其含义，习以为常地下达命令而不问其是否适当，或反之，害怕每一个新鲜词语，害怕批评，害怕主动精神，害怕独立自主精神，那么这就是说，最危险的因循守旧顽症已侵蚀到各个方面了。

在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我列举了我们部队的一些历史论著作为初看起来无可指责的因循守旧的例子。出版这些论述军、师、团的战史的书籍，这一事实本身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它证明，红军部队通过战斗和学习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精神上已形成为富

有生命力的机体，并对自己的过去产生了兴趣。但是，应当承认，这些历史论著很大一部分是按照“胜利之雷震天响”这种调子写出来的。

更直截了当地说吧，有些论述我们红军部队的小册子，简直象是在写已经寿终正寝的近卫军团和近卫军重骑兵团的历史。毫无疑问，这种比喻会引起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所有白卫军报刊兴高采烈的狂叫。但是，如果我们因害怕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拒绝自我批评，那我们就是完全无用的废物。从使人清醒的自我批评中得到的好处，比起由唐恩或切尔诺夫叼去我们作坊的一些垃圾而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就让所有笃信宗教的（和不笃信宗教的）、一听到自我批评就丧魂落魄（或到处散布惊慌失措情绪）的老太婆也都知道这一点吧！

当然，我们的团、我们的师以及我们全国都有权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但是，我们获得的不光是胜利，而获得这些胜利的途径也不是笔直的，而是十分曲折的。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有许多伟大的英雄主义业绩，在多数场合，这些业绩是无名的、集体的，所以尤为伟大；但是也有一些软弱、惊慌、怯懦、无能、甚至变节的现象。如果真实而生动地叙述我们每一个“老的”团队（四、五年已经可算是老革命了）的历史，也就是尽量按照它在战场上和营房里的实际情况加以叙述，那是非常动人和有教育意义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而往往是英勇的传奇故事，这种故事正是因循守旧的典型。你看：在我们队伍里，人人都是英雄，个个勇往直前，敌人总是数量上占优势，我们所有的命令都是高明的，执行得都很圆满，如此等等。谁要是认为，用这种办法就能在自己心目中抬高武装部队，就能对青年的教育产生良好的影响，那他显然已经沾染上因循守旧的恶习了。实际上，这种军事文牍主义的浪漫作品搞得再好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也就是说，红军战士在阅读或倾听这种“故事”

时，会象他父辈听圣徒传一样，听起来很有教益，很壮丽，但对实际生活却不适用。亲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年龄大一点的人，或者比较机灵一点的人会对自己说：嘿，打仗的事要不掩人耳目，要不撒谎，显然是不行的。比较幼稚、比较单纯、对一切都信以为真的人会对自己说：“我这个人不行，哪能同这样的英雄比呢……”因此，他的精神不是振作起来，而是低落下去了<sup>①</sup>。

历史的真实性对我们来说，绝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要知道，我们需要这些历史论著，首先是把它作为教育的手段。如果说一个年青的指挥员对过去的事情习惯于以假充真，那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甚至在战斗活动中如法炮制。譬如说，在他的战线上出现了失利、疏忽或混乱，能不能据实报告呢？应该报告！但是，他所受的教育是因循守旧，同他在本团历史中所读到的英雄相比，他不愿意往自己脸上抹黑，或者说，他的责任感已经衰退，于是他就抹煞事实，也就是歪曲事实，使上级、甚至更高的上级机关陷于迷误。下面谎报情况最后不可能不导致上面发布错误的命令和指示。最后，最坏和最可恶的是指挥员干脆不敢向上级报告真情。因循守旧在这里得到了最恶劣的表现：为讨好而撒谎。

在军事上，如象在革命事业上一样，最伟大的英勇精神是老实和负责的英勇精神。在这里，我们谈论老实并不是从某种抽象的道德观点出发的：什么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谎和欺骗自己亲近的人。在存在着利害冲突、斗争和战争的阶级社会里，这种理想主义的原则纯粹是伪善。尤其是在军事上，如不用诡计、伪

---

<sup>①</sup> 当然，喜欢编造“提高我们声望”的谎言的人，不仅在军事方面有，而且到处都有，甚至艺术领域里也有。请看，他们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摧残他们意志的“酸溜溜的东西”。大腹便便的庸人，需要伪古典主义的慰藉而厌恶批评，这我们是早就知道的。但是，这同我们革命军队、革命政党是完全不相称的。青年一代应该毫不留情地去掉这种情绪。——托洛茨基注

装，不出其不意，即不进行欺骗，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为了人们献身的事业而有意识地、预谋地欺骗敌人是一回事；而由于虚伪的自尊心，或者为了讨好和献媚，或者纯粹受了扼杀责任感的官僚主义的因循守旧的影响，危害事业地作“一切顺利”的谎报，则是另一回事。

## 二

为什么我们现在谈起因循守旧来了呢？在革命的头几年，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在这里依然以军队为例，但是，读者自己会对我们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必要的类比，因为在阶级及其政党、国家、军队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有某种类似的现象。

我们新的指挥人员是由革命家、战斗队员、游击队员配备起来的，他们进行了十月革命，已有一定的经历，更主要的是已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这些指挥员的特点，不是独立性不足，而是独立性有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协同动作和严格纪律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游击习气”）。在军事建设初期充满着反对各种军事“独立性”、争取建立正确的关系和严格纪律的斗争。在这方面，国内战争年代是一次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严酷的锻炼。结果，在这第一批优秀的革命指挥员中，能使个人的独立性和纪律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在喘息年代，我们年青的指挥人员完全是通过另一种途径成长起来的。一个未来的指挥员在青年时期进入军事学校，他自己既没有革命的经历，也没有战斗的经历，他是一个新手。他不是象老一辈那样建设红军，而是参加红军这个已经有了内部制度和传统的现成组织。这同青年党员和近卫军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正因为这样，把军队的战斗传统或党的革命传统传给青年的方法，具有很大的意义。没有继承，也就没有传统，

因而也就不能稳步前进。但是，传统不是死的教条或因循守旧的浪漫精神。把传统背得烂熟是不行的，象领悟福音书那样去领会它也不行，单纯相信老一辈的“真话”，也是不行的，传统需要通过深刻的内心修养来获得，需要独立地、批判地去研究，需要积极地去掌握。否则，整个房子就等于建立在沙滩上。我曾经描绘过那些“老近卫军战士”（通常是二、三流的），他们仿照法穆索夫<sup>98</sup>的榜样给青年人灌输传统，说什么“你们最好跟老年人学习，比方我，或者已故的大叔……。”而无论是向这位大叔，或者向他的侄子都是什么好东西也学不到的！

毫无疑问，我们老一代指挥人员对革命事业确实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部队青年的心目中，他们的威望很高。这很好，因为这保证了高级和下级指挥人员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既保证了指挥员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指挥员与红军士兵群众之间的联系。但这里有一个不可缺少和极端重要的条件：老一代的威望无论如何也不应使年青一代失去个性，更不应使他们感到恐惧。

在部队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更喜欢规定这样的原则：不许说话，不许议论！但是，即使在部队里，这种“原则”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是极为有害的。主要的任务在于：不要阻碍，而相反，要帮助年青指挥员形成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志向，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是真实的独立性与自觉的纪律性的结合。光知道说“是”的那种指挥员以及一般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老讽刺作家萨尔蒂柯夫形容这种人说，他们“说来说去只会说是、是、是……”。由这种人（唯唯诺诺的人）执掌军事行政机关（即全部军事办公机构），也许不无成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但是，军队是战斗的群众性组织，它需要的不是阿谀奉承的官吏，而是充满责任感的、有道德修养的人。这种责任感使他对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都能无畏地用一切办法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又不违背正确理解的，



即非官僚主义地理解的纪律和行动的一致。

红军的历史，正如它的各个部队的历史一样，是老一代指挥人员与年青一代指挥人员之间建立相互了解和继承性联系的最重要的办法之一。正因为如此，在这里特别不能容忍官僚主义的圆滑、涂脂抹粉的装饰和其他各种一文不值的、臆想的、虚伪的、无谓的主意。需要的是批评、检验事实、独立思考、用自己的头脑来分析过去和现在、独立的性格、责任感、对待自己及自己的事业抱老实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因循守旧的死对头。让我们把因循守旧从一切角落扫除、驱逐并烧毁吧！

写于1923年12月2日

## 论 结 合

(或论结合与谣言)

近几个月来，党内一些同志已经几次问我，在农民问题上我的观点有什么特点，我的观点同列宁同志的观点究竟有什么区别。另外一些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确，更具体，他们问：我“低估”农民及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结合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真的吗？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既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我极其困惑不解地问道：“你们怎么会有这种看法呢？你们根据什么事实这样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回答说：“问题正在这里，我们不了解实情，但有传闻。”

起初我并不重视这些话。但是我最近又接到一封信谈到这个问题，这就使我不得不加以考虑。这些传闻从何而来呢？我突然想起，四、五年前在苏维埃大地上曾极为广泛地流行过这类传说。那

时说得比较简单：列宁支持农民，而托洛茨基则反对。经过回忆，我找出了刊载在报纸上的两份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一份是我的，载于1919年2月7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一份是列宁同志的，载于2月15日的《真理报》。列宁同志直接回答了农民格·古洛夫的来信，这位农民谈到有一种（下面我援引列宁同志的话）“流传的谣言，如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恰恰在中农问题上他们之间有巨大分歧。”<sup>①</sup>

我在信中讲述了我们农民政策的一般性质，讲述了对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态度，并在信的结尾写道：“关于这一点，在苏维埃政权里，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分歧。但是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愈来愈糟，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欺骗劳动群众，说什么存在着从内部分裂人民委员会这样一种虚假的斗争。”

列宁同志的文章是在我的信发表后过了一星期才发表的，其中讲到：“托洛茨基同志说，关于我同他（在农民问题上）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和无意帮助他们的人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符合事实的。”<sup>②</sup>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谣言是不会轻易消逝的。关于这一点，甚至有一句法国谚语说：“造谣中伤，造谣中伤，结果总会造出点名堂。”现在，这类谣言当然不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效劳的，因为自1919年以来，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这伙人在我们这里已经减少了。然而却出现了耐普曼，在农村则出现了商人和富农。毫无疑问，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共产党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制造混乱和纷争。要知道，正是富农、收购商、新商人、城市经纪人在市场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2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上寻求同农民的结合(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和工业品的购买者),妄图把苏维埃国家机关排斥在这一结合之外。要知道,现在的主要战斗正是沿着这一条线展开的。政治在这里也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应该想到,个体经纪人为了寻求同农民的联系和取得农民的信任,会很乐意去沿用旧时地主的谎言并使之流传起来,只不过干得小心谨慎一点而已,因为这时苏维埃政权已经比较巩固了。

无产阶级和农民,或者说国家工业和农业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早已在列宁同志的著名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作了清楚、明了而又详尽无遗的阐述。没有必要提起注意或者引用这篇文章。不这样作大家也都记得。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在最近几年中,我们既要把苏维埃国家保持为工人国家,又要千方百计地使它适应农民的需要、需求和能力;既要把苏维埃工业保持为国营的即社会主义的工业,又要千方百计地使它一方面适应农民的市场,另一方面适应农民的纳税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致打破苏维埃国家本身的平衡,直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平衡被革命打破为止。不要到处重复“结合”这个词(尽管这个词本身是好的),而要在实际上使工业适应农业的基础,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问题。

这里我们接触到剪刀差的问题。使工业与农民市场相适应,这首先就向我们提出一个任务:竭力降低工业品的成本。然而,成本不仅取决于生产工业品的工厂的工作,而且取决于国家工业、国家运输业、国家财政、国家贸易机关的整个组织工作。如果工业的各个部门不相适应,比例失调,那就意味着国家有很多呆滞资本,这给整个工业带来压力,使每一俄尺印花布、每一盒火柴的价格上涨。好比一个用不同长度的木板制成的木桶,若向这个木桶里灌水,至多能灌到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再往里灌,不管如何灌,水都会溢出来。国家的经济情况也是这样。如果它的各个部门(煤

炭、冶金、机械、棉花、布匹等)彼此之间以及与运输和信贷之间不能配合,那么,生产费用将包括那些最庞大的工业部门的开支,而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最不发达的部门。目前的销售危机,正是从农民市场这方面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警告:不要空谈结合,而要实现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是自发的,归根结蒂也是唯一的调节经济的手段,也就是使不同的工业部门彼此之间、使工业的全部产品量与市场的容量之间相协调的手段。但是,在我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苏维埃经济中,工商业危机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正常的,或者甚至认为是使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相互适应的必要的手段。危机要消耗、毁坏或损失一部分国家财产,而其中一部分则会落到经纪人、收购商手中,总之落到私人资本手中。由于我们所继承的工业是极其紊乱的,加上战前工业各个部门之间所保持的比例同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比例完全不一样,因此,要调整经济,使工业的各个部分适应起来,以便尽可能通过市场使全部工业同农业相适应,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决定只靠危机这种可怕的推动力的作用来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这就预示着私人资本将大获全胜,何况私人资本本来就已经在我们和农村之间,也就是在我们和农民、手工业者之间百般钻营。<sup>①</sup>

现在,私人商业资本取得的利润很大。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作单纯的中间人交易。他们试图把手工业生产者组织起来,或者向国家租赁工业企业。换句话说,他们想再一次重复原始积累的历史,先是在商业周转方面,然后再发展到工业方面。显然,我们的任何一次失利,任何一次亏损,都是私人资本的胜利,因为首先,

---

<sup>①</sup> 当然,在彻底建立起协调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前,我们还将面临不少危机。创造性的任务就在于使危机的次数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每一次危机的危害性变得最小。——托洛茨基注

我们被削弱本身就是他们的胜利，其次，我们亏损中的一大部分必然会落到新资本家手中。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用什么手段去同私人资本进行有效的斗争呢？一般说来，究竟有没有这种手段呢？有，这就是对市场以及对一切经济任务自觉实行周密的计划管理。工人国家手中掌握着工业的主要生产力、运输和信贷工具。我们没有必要等待局部危机或者总危机来暴露我国经济各个环节之间的不协调。我们能够毫不盲目地去进行竞争，因为我们手中掌握着市场竞争的王牌。我们能够学会，而且应该学会更精确地估计经济的一切主要环节，预见它们今后在生产过程和市场上的相互关系，并利用我们的估计和预见使一切经济部门协调一致，使它们在数量和质量上彼此配合，确立整个工业和农业之间必要的比例。这就是我们在结合上真正要做的工作。

对农村进行文化助导是极好的事。然而结合的基础仍然是价格便宜的犁和铁钉，价格便宜的印花布，价格便宜的火柴。降低工业品价格的必由之路，就是要根据农业的发展来正确地（即精确地、系统地、有计划地）组织工业。

谁要说：“问题完全在于结合，而不在于工业的计划”，谁就是不了解问题的实质，因为结合的途径是通过对工业进行正确的调整，对它进行有计划的领导。其他途径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要想正确地安排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的工作，就要直接去正确有效地解决结合的各种问题——不是取代市场，而是以市场为基础<sup>①</sup>。农民今天还不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却应该理

---

① 为了避免曲解，我要着重指出，问题正在于正确的安排，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并不是说有了国家计委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言而喻的。决定工业及整个经济进程的因素和条件有数十种之多。但是，要正确地考虑这些因素和条件并相应地指导我们的全部活动，非得有坚强的、有权威的、不断工作的国家计委不可。——托洛茨基注

解，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理解，每个先进工人应该理解。农民迟早会感觉到国家计委在农业方面所做的工作。自然，这个任务很艰巨，而且十分复杂，一下子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采取一系列日益准确而果断的措施。我们需要从目前危机的教训中学得聪明一些。

当然，发展农业并非不重要。然而这一过程比起工业的恢复工作来，自发性要大得多，因而对国家的依赖性也就要大得多。工人国家应该给农民提供农业贷款（有多少资金就给多少！），同时还要在农业技术上给予帮助，以便使农产品（小麦、肉、油等）能投入国际市场。然而，促进农业发展的途径，毕竟还是主要通过工业，如果不是直接地，那也是间接地。需要向农村提供价格适宜的农具和机器。需要向农村供应人工肥料。需要向农民提供廉价的家庭日用品。为了提供和发展农业信贷，国家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为此就需要国家工业有盈利，如果工业各个组成部分不能正确地协调起来，那就不可能做到这点。不是口头地而是实在地、不是表面地而是认真地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相结合的途径就是这样。

为了在政治上促进这一结合，特别是为了杜绝那些正在通过经纪人、生意人得以传播的谣言和诽谤，需要有一份真正的农民报纸。怎样才是真正的农民报纸呢？它要能为农民所看到，为他们所理解，能使他们与工人阶级更加接近。一种印数在五万或十万份的报纸，尽管在诚心诚意地谈论农民问题，但它无论如何也不是农民的报纸，因为它到不了农民手中，中途就会落在我们各种机关的无数工作人员手中。我们需要一种农民周报（日报办不起而且递送也不方便），第一年的印数大约为二百万份。这种报纸一定不要“教训”农民，不要“号召”他们，而要通俗地告诉他们在苏联、在国外、特别在那些与农民和农民经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生活领域内发生的事情。新型的有革命要求的农民很快就会对读报发生兴趣，只要我们善于为他们创办一份合适的报纸。报纸的印数可逐月

增加，以便使苏维埃国家和千百万农民之间保持即使是一星期一次的联系。但是办报的事也会把我们引导到工业上来。需要切实地提供技术。农民报不仅在编辑上而且在印刷上都要成为模范，否则，每星期把我们城里的粗糙的东西拿给农民看就是一种耻辱。

对于向我提出的关于农民的问题，我暂时只能回答这些。倘若这些解释未能使提出问题的同志们感到满意，我准备根据我们六年来在苏维埃工作的全部经历中所积累的确切材料，作进一步的更具体的阐明。因为这个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写于1923年12月。译自《真理报》1923年12月4、6日。

## 论 列 宁 (摘录)

### · 编者按语 ·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列宁与世长辞了。

托洛茨基把列宁逝世看作是他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列宁在世的时候，托洛茨基一贯地攻击他、诋毁他，列宁逝世后，他就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以“称颂”列宁的姿态，来破坏列宁的威信。在列宁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写了大量关于列宁生平的回忆录和文章，并把它们汇集成《论列宁》一书。

在这本书里，托洛茨基肆意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突出自己，破坏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威信。

例如，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列宁对苏维埃的合法性估计不足，不了解在苏维埃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日子夺取政权的重大意义，似乎列宁是一个“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的布朗基主义者。在托洛茨基笔下，列宁成了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极重要问题的官吏，“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给人的印象是：列宁似乎是所有残暴的布尔什维克中最残暴的一个，等等。

《论列宁》一书是臭名昭著的《十月的教训》一书的准备。



斯大林在揭露托洛茨基的手法时指出，“旧托洛茨基主义竭力用某种公开的方式破坏列宁的威信，不怕后果如何。新托洛茨基主义做得比较谨慎。它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姿态来干旧托洛茨基主义的勾当”，其“用心”就是企图“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6—307、301页）。

## 十月前后

### 2. 变 革

在“民主会议”结束前，由于我们坚持的结果，确定了10月25日为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当时，不仅工人住宅区，而且部队营房里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觉得最合适的是把卫戍部队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日期上来，正是这一天苏维埃代表大会应当来解决政权问题，而工人和部队应当预先做好准备来支持代表大会。我们的战略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我们向政权发起攻击，但在宣传上则强调敌人要驱散苏维埃代表大会，因此必须给他们以无情的反击。全部计划所依据的是强大的革命浪潮，这个浪潮当时在各地都发展到几乎同样的水平，不给敌人以片刻喘息。最落后的团队至少也会对我们保持中立。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任何步骤都必定会保证我们立即取得决定性优势。但是，列宁担心敌人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调集小股具有坚决反革命情绪的军队先发制人。敌人如果乘我不备而取缔党和苏维埃，逮捕彼得堡的领导成员，那就会使运动失去领导，然后逐步予以削弱。列宁坚决主张：“不能等待，不能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于9月底或10月初深夜在苏汉诺

夫家里举行了一次著名的会议。列宁出席了会议，这一次他决心力争通过一项不容怀疑、动摇、拖延、消极和等待的决议。但是，在抨击反对武装起义的人们之前，他还对那些把起义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人施加压力。有人向他转述了我的话：“我们已经确定于10月25日起义。”我确实多次重复过这句话，来反对那些企图通过预备议会和通过立宪会议中“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办法来确定革命道路的人。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去夺取政权，布尔什维主义简直就该报废。那时就连立宪会议也很可能开不成。等到一切事情过去之后再在10月25日召开事先保证我们能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我们也就公开承担了不迟于10月25日夺取政权的义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日期挑剔得很厉害。他说，他对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这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代表大会还开得了吗？即使开得了，它又能做些什么呢？必须夺取政权，不应该把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把起义日期事先告诉敌人是可笑的和荒唐的。在最好的情况下，10月25日也只能作为一种烟幕，但起义必须提前，不必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应当用武力夺取政权，然后才谈得上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立即着手行动！

在7月的日子里，列宁曾明确预料到“他们”会枪杀我们，而现在和那时一样，他又替敌人仔细考虑了全部情况。得出结论说：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乘我们不备用武力袭击我们，使革命瓦解，然后各个击破。象在7月时一样，列宁过高估计了敌人的洞察力和决心，也许还过高估计了敌人的物质潜力。这种过高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在策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目的是使党加倍地努力实行攻击。但党毕竟不能撇开苏维埃和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去夺取政权。这样做是错误的。它的后果甚至会影

响到工人的行动，并且可能在卫戍部队方面造成非常严重的困难。士兵们了解代表苏维埃，了解自己的士兵支部，他们是通过苏维埃了解党的。如果起义背着苏维埃，不与它联系起来，不借助于它的威望，使士兵看来起义不是直接和明显地从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结局出发的，那就会在卫戍部队中造成危险混乱。还不应忘记，在彼得堡除了地方苏维埃以外，还存在着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才能与这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抗衡。

结果，在中央委员会里形成了三派：一部分人反对夺取政权，按形势的逻辑他们必然放弃“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要求立即组织起义，不指望苏维埃；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需要把起义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密切联系起来，从而使它在时间上同后者衔接起来。列宁坚持说：“无论如何，夺取政权必须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否则他们就会粉碎你们，你们将会任何代表大会也开不成。”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意思是说起义不应迟于10月15日举行。记得关于日期本身似乎没有什么争论。大家都明白，日期仅仅是大致的，可以说是方向性的，根据事态发展，可以稍为提前或推后。但这里谈的仅仅是个日程而已。最必要的是期限，而且是最近的期限，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主要争论是沿着同一部分根本反对起义的人作斗争这条线进行的。我不想重复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就下列题目所作的那三四次发言：要不要夺取政权？是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夺取了政权，我们能不能保持政权？列宁在当时和稍后，用这些题目写了几本小册子和几篇文章。会上几次发言的思想自然都是一致的。但是，这几次激烈而热情的即席发言的整个精神是很难转述和表达的，满篇都竭力用自己的意志、信心和勇气去感染反对者、动摇者和怀疑者。要知道，这是解决革命命

运的问题！……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大家都感觉自己就象做完了一次外科手术一样。部分与会者，包括我在内，后半夜都住在苏汉诺夫家里。

大家知道，后来的事变进程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解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尝试导致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有可能利用苏维埃的威望使起义的准备工作合法化，并把它与整个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存亡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从上述这次中央会议到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我记得只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次，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10月15日至20日。记得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兴趣，就是列宁对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发言的“防御”性质采取的态度。我曾声明说，关于我们似乎准备在10月2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日”）举行武装起义的传说完全是谣言，并提出警告，对任何进攻我们将给予坚决回击，直到最后胜利。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会见时的情绪比较平静和沉着，甚至我要说，不那么多疑。他不仅不反对我发言中貌似防御的语气，而且认为这种语气完全适合于麻痹敌人的警惕性。但他不时地摇头，并问：“他们会不会抢到我们前头？会不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我证明说，以后的一切几乎都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在这次会见中，或在会见的某个时刻，好象斯大林同志也在场。不过，也可能我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了。总之应当说，对革命前几天的一些事情，在我记忆中象被压缩成团似的，很难把它们分开、拆散，并分别清理出来。

我和列宁的以后一次会见已经是在10月25日，在斯莫尔尼宫了。是在几点钟？完全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傍晚。我记得很清楚，列宁是从我们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就卫戍部队未来命运进行谈判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谈起的。报上报道说，谈判接近圆满结束。“你们妥协吗？”列宁带着逼人的目光质问说。我回答说，我

们故意在报上发表安抚人心的消息，这只是展开总攻时刻的一种军事计谋。“这样很一很好，”列宁兴高采烈，拖长着音节说，并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步，激动地搓着双手，“这一非一常一好！”伊里奇一般是喜欢军事计谋的。欺骗敌人，愚弄敌人——难道不是最开心的事吗？但在当时情况下，计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直接进入了决定性行动的阶段。我开始报告说，军事行动进展神速，我们很快就拿下城内一系列重要据点。列宁看见了（也许是我给的）头天晚上印出的一张警告暴徒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如果他们趁着革命时机作恶，当予就地处决。我感觉，列宁起初好象在沉思，甚至在犹豫。但后来说：“对一对。”他如饥似渴地记下了这些起义的细节。对他说来，这些细节雄辩地证明：这一次事情确实在全速进展，决定性的关头已经度过，不会有反复和后退了。记得有一个消息给列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个消息说我曾书面命令抽调巴甫洛夫团的一个连来保障我们党和苏维埃报纸的出版。

“怎么样，连队出发了吗？”

“出发了。”

“报纸在排版吗？”

“在排版。”

列宁喜形于色，欢呼着，笑着，搓着双手。后来，他又开始沉默，想了一会儿说：“好，可以这样做。只是要夺取政权。”我明白，他只是在这个时刻才最后容许我们放弃用密谋夺取政权。他直到最后一小时还在担心敌人会乘我们不备而进行拦截和袭击。只是在10月25日晚上，他才算放了心，最后批准了事变走过的那条道路。我说“放了心”，——但这只是为了说明这里还有一系列与起义未来进程有关的各种具体细微的大小问题引起的不安：“听着，可不可这样做？要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会不会引起这样的后

果？”这些无休止的问题和建议表面上互不联系，但都是从同一件紧张的立即就会影响到整个起义的工作中产生出来的。

在革命事变中要善于不使自己受挫。当高潮不断掀起，起义力量自动增长，而反动势力注定要土崩瓦解的时候，最容易受事变自发进程的驱使。迅速取胜正如失败一样，会解除人们的武装。不要忽略事变的主要线索；在取得每次新的成功以后，都要对自己说：还什么都没有取得，还什么都没有保证；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的五分钟，正如展开武装行动之前的五分钟一样，应当具有同样的警惕性、毅力和决心；而在胜利以后的五分钟，在第一阵欢呼尚未停止以前，要对自己说：胜利尚无保障，必须分秒必争，——这就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行动方式和方法，这就是他的政治性格和革命精神的本质。

\*       \*       \*

我曾说过，有一次，唐恩大概是在去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派会议时，认出了化了装的列宁，当时他和我坐在一间过道房间里的小桌旁。这个情节甚至也被画成了画，不过，据我看，画得很不真实。但这是历史画的命运，而且也不仅是这一张。我记不清是由于什么原因，但是在过了相当时日以后，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应当记下这一点，否则，以后会被人搞错。”他诙谐地和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挥说：“反正一样，他们会没完没了撒谎的……”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列宁没有出席。他留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房子里。我记得，不知什么原因，房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后来有人在地板上铺了被子，上面放了两个枕头。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躺着休息。但是，几分钟后有人叫我：“唐恩正在发言，需要给予回答。”我在略作答复以后，回来仍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排躺在一起，他当然没

有睡意。哪里顾得上呢！每隔五至十分钟就有人从会议厅跑来报告那里发生的情况。此外，城里不断有人来报告消息：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率领下，已经包围冬宫，最后冲进去了。

这大概是在第二天早晨，离开过去的一天隔着一个不眠之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样子有点疲惫。他微笑着说：“从地下、动荡不安到掌握政权过渡得太突然了。Es schwindelt（头晕脑胀）。”——不知为什么，他用德语补充了这么一句，并用手在脑袋旁边做了一个旋转动作。这是我听到他就夺取政权所说的唯一的、多少属于个人的意见。这以后接着就是向日常工作平静过渡了。

### 3.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我们举行和平谈判是抱着推动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协约国工人群众的希望的。为此就要尽可能拖延谈判，以便给欧洲工人足够的时间来理解苏维埃革命这一事实本身，特别是理解它的和平政策。在谈判第一次中断以后，列宁建议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屈尔曼男爵和霍夫曼将军谈判的前景本身是很暗淡的，但正如列宁所说，“为了拖延谈判，就要有拖延的人”。我们在斯莫尔尼宫就谈判的总方针扼要地交换了意见。关于是否签字的问题，暂时推后，因为谈判如何进行，欧洲反映如何，会造成什么形势，都无法知道。而我们自然没有放弃对革命迅速发展所抱的希望。

我们不能再打仗，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当我第一次穿过战壕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尽管事先接到通知并一再催促，但我们的同志对组织一次略微象样的抗议德国过分要求的示威，显然也已经无能为力，战壕里几乎空荡无人。谁也不敢说一句甚至有条件地继续战争的话。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此后不久，当我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返回的时候，我反复劝说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小组的代表发表一个“爱国主义的”演说来支持我们代表团。他回答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们不能回战壕去，我们不会得到谅解，我们会失去任何影响”……可见，在不可能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上，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丝毫没有意见分歧。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德国人能不能打下去，他们能不能向宣布停战的革命进攻？怎样来了解和摸清德国士兵群众的情绪？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德国的一月罢工表明变动已经开始。但是变动的深度如何？是否需要试探一下，使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军队面临一次考验：一方面是宣布停战的工人革命，另一方面是三令五申要向这个革命发动进攻的霍亨索伦政府。

“当然，这很吸引人，”列宁反驳说，“毫无疑问，这样的考验不会没有结果。但是这很冒险，非常冒险。如果德国军国主义有足够力量（很有可能）对我们发起进攻，那怎么办？不能冒险：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

最初，立宪会议的解散大大恶化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德国人开始一直担心我们会同“爱国主义的”立宪会议达成协议，这就可能导致继续进行战争的尝试。这样一种轻率的尝试会彻底断送革命和国家，但这一点只有后来才看得清楚，而这使德国人重新紧张起来。在德国人看来，立宪会议的解散意味着我们明显地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停止战争。屈尔曼的腔调立即变得蛮横起来。立宪会议的解散会给协约国的无产阶级造成什么印象呢？对此不难自己作出回答：协约国报刊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霍亨索伦王朝的代理人。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正是在德军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时候解散“民主”立宪会议，以便与霍亨索伦签订奴役性和约。显然，协约国资产阶级会在工人群众中散布极大的混乱。而这又会促进



对我们的军事干涉。大家知道，甚至在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派中间流传着谣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已经被德国政府收买，目前正在布列斯特-里斯托夫斯克上演一出角色早已配好了的喜剧。这种谣传在法国和英国更是离奇。我认为，在签订和约以前，无论如何必须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与德国当局势不两立的鲜明态度。正是在这些考虑的影响下，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想出了一种“教学式的”表述，正式的说法就是：我们停止战争，但不签订和约。我同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就写信告诉伊里奇。他答复说：回来再谈。顺便说一下，也许他在这次答复中已经表示不同意我的建议；我现在记不清这一点，我手头没有这封信，我也不能肯定，信是否还保留了下来。我回到斯莫尔尼宫以后，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这一切都很吸引人，要是霍夫曼将军无力调动他的军队来反对我们，那最好不过了。但这种希望很小。他能够从巴伐利亚突击兵团中精选出几个团的兵力，而反对我们难道需要很多兵力吗？你自己不是说，战壕里空荡无人。如果他终于恢复战争，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被迫签订和约，而那时大家都看得清楚，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决打击关于我们与霍亨索伦王朝秘密勾结的无稽之谈。”

“当然，这里有正确的一面，但这毕竟太冒险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要不惜一切保障革命的安全。”

除了这些主要困难以外，还有党内性质的严重困难。在党内，至少在领导成员中间，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条件持不调和态度的人占支配地位。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谈判的消息加强了和激化了这种情绪。它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这种情况自然使列宁深感不安。

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只是在口头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决定签署德国的条件，我们就要冒在党内引起分裂的危险。我们党也同欧洲工人一样，需要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同左派决裂，党就会严重右倾：要知道，所有那些采取战斗立场反对十月革命和赞成各社会党结盟的同志，都无条件地拥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我们的任务绝不仅限于签订和约。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十月革命时期起过很大战斗作用的，如此等等。”

“这一切都是不容争辩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但目前，问题关系到革命的命运。我们将恢复党内的平衡。但首先要拯救革命，而只有签订和约才能拯救革命。宁愿分裂，也不能使革命遭受军事毁灭的危险。左派会大闹一通，然后，——甚至闹成分裂，这是不可避免的——再回到党内来。要是德国人粉碎我们，我们谁也不能回来了……好吧，就假定接受了你的计划。我们拒绝签订和约。而德国人在此以后转入进攻，那时你怎么办？”

“在刺刀下签订和约。那时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将看得清楚。”

“而你那时不坚持革命战争的口号了？”

“决不。”

“照这样说来，这可能不是那么危险的试验。我们冒着丧失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危险。爱沙尼亚的同志在我这里曾说过他们如何出色地在农业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牺牲社会主义的爱沙尼亚确实是很遗憾的事”，列宁开玩笑说，“但是，为了良好的和平，大概不得不达成这种妥协。”

“如果立即签订和约，难道就能排除德国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吗？”

“就假定这样，不过那里只是一种可能，而这里几乎是必定的了。无论如何，我主张立即签字：这是上策。”

列宁对我的计划的主要担心是，一旦德国重新发动进攻，我们就来不及签订和约了，就是说，德国军国主义不会为此给我们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说过：这只野兽奔跑得很快。在决定和约问题的历次会议上，列宁总是非常坚决地反对左派分子，而非常郑重和平静地反对我的建议。他勉强地容忍这个建议，是因为党显然反对签字，而对党来说，折中的决定应是通向签订和约的桥梁。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会议显然表明，刚从熊熊烈火的十月熔炉中出来的我们的党，需要用行动来经受国际形势的检验。如果没有折中的提法，多数人就会赞成革命战争。

这里指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立即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一点，也许是很有趣的。至少，斯皮里多诺娃最初是坚决拥护签订和约的，她说：“庄稼汉不要战争，他们会接受任何一种和约。”当我第一次从布列斯特回来时她对我说，“立即签订和约，并取消粮食垄断制。”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停止战争而不签订和约的折中提法，但把它作为通向革命战争的一个阶段——“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大家知道，德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声明的反应是，似乎德国不打算用恢复军事行动来作为回答。我们带着这个结论回到了莫斯科。

“他们不会欺骗我们吗？”列宁问道。

我们两手一摊。

“似乎不象。”

“好吧，”列宁说，“如果这样，那就好了：外表保持不变，退出战争。”<sup>①</sup>

然而，在期满前两天，我们接到留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

---

① 本章内所引用的对话自然都是大致的，但关于“外表”一词记得很清楚。——托洛茨基注

的电报通知：根据霍夫曼将军的声明，德国人认为从2月18日12时起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建议他离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第一个接到这封电报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当时在他办公室里。他正在同卡烈林和某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收到电报后，默不作声地把它递给我。我记得他的眼神使我立即感到：电报带来了重要的不祥的消息。列宁赶紧结束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讨论当时的形势。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欺骗了我们。赢得了五天时间……这只野兽什么也不放过。这么说，现在除了签订和约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德国人同意保留原来的条件。”

我提出异议，意思是要让霍夫曼转入实际的进攻。

“但是要知道，这就意味着放弃德文斯克，丢失许多大炮，等等。”

“当然，这意味着新的牺牲。但是，要使德国士兵实际上通过战斗进入苏维埃国土。一方面要让德国工人，另一方面也要让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知道这一点。”

“不，”列宁反驳说，“问题当然不在德文斯克，但是目前不能丧失一个小时。考验已经完毕。霍夫曼要想打仗，也能够打仗。不能拖延：这样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赢得了五天时间，这一点我是预料到的。而这只野兽是奔跑得很快的。”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发电报表示立即同意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相应的电报发出去了。

“我觉得，”我在个别谈话中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提出辞职，在政治上是适宜的。”

“为什么？我们可不采用这些议会方法。”

“但是我的辞职对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政策上的急剧转变，从而使他们深信我们这次真要签订和遵守和约的决心。”

“也许，”列宁考虑了一下说，“这倒是个严肃的政治理由。”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接到德军在芬兰登陆和开始击溃芬兰工人的消息。记得我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走廊里碰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情绪异常激动。在此以前和以后，我都从未见过他这样。

“是呀，”他说，“看来，非打不可了，虽然是赤手空拳。这一次看来没有别的出路了……”

这是列宁对芬兰革命被粉碎的电报的最初反应。但是过了十至十五分钟，当我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他说：

“不，不能改变政策。我们出兵并不能拯救革命的芬兰，而肯定会毁灭我们。要用一切办法帮助芬兰工人，但不能离开和约的基础。我不知道，这在目前是否能拯救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还可能得救的唯一道路。”

而这条道路果然使我们得救了。

\* \* \*

不签订和约的决定，绝不象现在人们有时写的那样，是从我们似乎与帝国主义根本不能达成协议的抽象考虑出发的。只要在奥弗相尼科夫同志的小册子中看一看列宁就这个问题提议的极有教益的表决，就会相信：拥护“不战不和”试探性提法的人对于我们革命政党在某种条件下是否可以签订“可耻的”和约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说过：即使霍亨索伦不敢或不能同我们作战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尽管要承担某种风险，也必须进行这种试验。

三年以后，我们进行了冒险，用刺刀试探资产阶级贵族的波兰——这一次是列宁倡议的。我们被击退了。这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情况有什么差别？没有原则的差别，但是在冒险程度上却有差别。

记得拉狄克同志有一次写道：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与进军波兰期间的魄力是列宁策略思想的威力的最光辉表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进军华沙是个错误，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它不但使我们签订了割断我们与德国联系的里加和约<sup>99</sup>，而且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事件一起，给资产阶级欧洲的结合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里加和约对欧洲命运的反革命意义，如果设想一下1923年一年的形势，就能理解得更清楚。当时我们与德国存在着共同的边界，无数事实说明，德国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可以完全另一种途径发展起来的。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军事干涉及其失败，波兰本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会以无比顺利的速度发展起来。据我所知，列宁本人非常重视“华沙”错误。然而，拉狄克对于列宁的策略气魄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自然，在“试探”波兰的劳动群众而未获得预期结果以后，在我们被击退以后（不可能不被击退，因为在波兰保持平静的情况下，我们向华沙进军只能是一种游击式的袭击），在我们被迫签订里加和约以后，不难得出结论：反对进军的人是正确的，最好是及时停止，保证我们和德国的共同边界。但是，要知道这一切只是事后才清楚。而对于列宁来说，在进军华沙的思想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计谋的勇敢精神。冒险是很大的，但目的胜过冒险。计划可能遭受的挫折不会给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存在带来危险，而只会使它削弱……

为了向欧洲工人表明态度，是否值得去冒恶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条件的风险，只有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去作评价。但非常清楚的是，在表明态度以后，应当而且必须签订这个强加的和约。在这里，列宁的鲜明立场和果断精神挽救了局势。

“如果德国人仍要进攻呢？如果他们向莫斯科推进呢？”

“我们就向东方撤退，撤到乌拉尔，同时发表愿意签订和约的声明。库兹涅茨矿区的煤矿很丰富。我们依靠乌拉尔的工业和库兹涅茨的煤，依靠乌拉尔的无产阶级和莫斯科与彼得格勒那部分

随我们撤走的工人，建立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我们将坚持下去。必要时，我们再向东撤退，撤到乌拉尔以东，撤到堪察加，但一定坚持下去。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将从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境内重整旗鼓，发展壮大，重返莫斯科和彼得堡。要是我们现在毫无意义地卷入革命战争，丧失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精华，那时我们自然就永远不能再回来了。”

在那个时期，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在列宁的论据中占了重要地位。有时，他用问题把反对者问得目瞪口呆：“你们知道我国的库兹涅茨矿区有丰富的煤矿吗？我们把乌拉尔的矿藏和西伯利亚的粮食结合起来，就有新的基地了。”对方往往稀里糊涂，不知库兹涅茨在哪儿，那里的煤同彻底的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战争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们瞪着两眼，或者因出其不意而大笑起来，以为列宁不知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耍滑头。而实际上，列宁丝毫不是开玩笑，而是——坚定不移地——在考虑形势的严峻后果和最坏的实际结局。他所以需要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的构想，是为了加强自己和别人的信心：仍然一无所失，而从战略上来说，决不能容许悲观失望。

大家知道，事情没有发展到建立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的地步，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毕竟可以说，未实现的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拯救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无论如何，只有把列宁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策略与他的十月革命的策略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它和评价它。反对十月革命和赞成布列斯特和约，这两种情况实质上都是同一种投降情绪的流露。全部实质在于，列宁在主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投降时，发挥了象保证我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那样无穷无尽的革命毅力。只有把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和约、伟大的魄力与胆大心细的作风、果断精神与洞察力自然地和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衡量列

宁的方法和列宁的力量。

## 5. 政府工作

彼得堡的政权已被夺下来。需要成立政府。

“给它起个什么名称呢？”列宁大声地议论着。“只是不要叫什么部长大臣，这是一个可憎的和用滥了的名称。”

“可以称为委员吧，”我提议说，“不过现在委员太多了，要不就称为最高委员……不，‘最高’叫起来不好听，叫‘人民’委员不行吗？”

“人民委员？看来这倒很合适。那整个政府呢？”

“叫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附和着说，“这好极了，满有革命的味道。”

最后这句话，我是一字不漏地记得非常清楚的。<sup>①</sup>

在私下同全俄铁总执委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是，关于这一段我能谈的不是很多。我只记得列宁对于全俄铁总执委会提出的蛮横无理的要求极为愤怒，对于我们队伍中赞同这些要求的人也非常不满。但是，我们还是把谈判继续了下去，因为对全俄铁总执委会暂时还得予以重视。

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提议，废除了克伦斯基制定的士兵死刑法。我现在记不大清楚加米涅夫是向哪个部门提出这项建议的，很可能是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概是在10月25日的早晨。记得当时我在场，并且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列宁当时还不在。这件事显然是发生在他到斯莫尔尼宫之前，当他得知这第一个法令时，

---

① 米柳亭同志对这段情况的叙述稍有不同。但是我觉得上述说法更准确。无论如何列宁说的“满有革命的味道”这句话是针对我提议把整个政府命名为人民委员会而言的。——托洛茨基注



他怒不可遏。

“胡扯，”他重复着，“不枪毙人怎么能实行革命呢？难道你们认为解除自己的武装，就能够对付一切敌人吗？还有什么镇压手段可言呢？监禁吗？在国内战争中，当每一方都指望胜利的情况下，谁会认为监禁有什么意义呢？”

加米涅夫试图证明，问题仅仅限于废除克伦斯基专门用来处置逃兵的死刑。但是列宁没有妥协。他清楚地看到，在这项法令背后，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极大困难隐藏着一种轻率的态度。

“错误，”他重复着，“不能容忍的缺点，和平主义的幻想……”他建议立即取消这项法令。人们提出反对，指出这样会造成极不好的印象。当时有谁说了一句：“当事情很明显，已经别无办法的时候，那最好还是采用枪毙。”最后终于这样结束了。

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从革命的最初之日起就变成一种相当和谐的豺狼和疯狗的大合唱。只有《新时报》<sup>24</sup>夹紧尾巴，企图唱出“忠顺的”调子。

“难道我们就制服不了这帮混蛋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机会就这样问。“天哪，这还叫什么专政啊！”

许多报纸特别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并通过一切方式，发社论、写诗歌和小品文反复唠叨。

“他们总算是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了。”列宁有一次带着开玩笑的失望神情说。

“这是谁说的？”我问，“还是捏造的？”

“不，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列宁回答说，“我说过就忘了，可是他们却把这句话变成了整个纲领。”于是他幽默地挥了挥手。

凡是对列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最大的长处之一就在于他总是善于把实质与形式分开。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强调指出，他对形式也是非常重视的，他知道形式的东西对意识的支配作用，

从而使形式的东西变为物质的东西。从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时起，列宁就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作为政府而有系统地进行活动。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机关；同省里没有联系；官吏们在怠工；全俄铁总执委会在干扰同莫斯科的电话谈判；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军队。然而列宁以政府的名义到处发布决议、法令和命令。当然在这里，他比任何人走得更远，而绝不迷信那些形式上的咒语。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力量就在于从基层由彼得格勒各区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机关。为了使上面的闲散的或者正在怠工的各机关的工作与下面基层的创造性工作联结起来，就需要这种形式上坚定的作风，即需要这样一个政府的作风，尽管这个政府今天还是个空架子，但在明天或者后天它将成为一支力量，正因为这样，它今天就应当作为一支力量而出现。为了加强我们本身的纪律性，同样也需要这种形式的东西。在汹涌的自发势力和先进无产阶级集团的革命即兴行动上逐渐拉上了政府机关的网线。

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位于相对的两端。联结着我们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们分隔开来的那条走廊是如此之长，以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开玩笑地提议要用自行车进行来往。我们通过电话联络，水兵们经常跑步把列宁的重要便条送来，这些小小的纸片上只写着两三句很有力量的话，每一句说得都直截了当，在最重要的字句下面划有两三道着重线，并附有结论性的问题——同样是直截了当的。一天当中我总要几次沿着那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如同通往蚁穴般的长廊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去参加会议。当时的中心是军事问题。我把对外交部的关照完全交给了马尔金和扎尔金德同志，我本人只管写一些宣传材料和接见为数不多的客人。

德国的进攻使我们面临极其困难的任務，可是又没有解决这些任务的手段，就连寻求这种手段或创造这种手段的最起码的本

领都没有。我们开始发出呼吁。由我起草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文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讨论。这些国际主义的新兵对呼吁书的标题大为恼火。相反，列宁却非常赞成地说：“这就表明我们对保卫祖国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就需要这样。”呼吁书草案中结论性的一条讲到，凡是帮助敌人者应就地处死。被一阵什么怪风卷入革命甚至吹进人民委员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尔格出来反对这种残酷的威胁，认为这样会破坏“呼吁书的感召力”。

“恰恰相反！”列宁大声地说，“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感召力（他讽刺地把重音挪到最后）。难道你们认为我们不要最残酷的革命恐怖就可以成为胜利者吗？”

这个时期，列宁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温情主义，马尼洛夫精神<sup>100</sup>，懒散作风，这样的表现多得很，引起列宁愤怒的不光是这些东西本身，而且是工人阶级的上层对那些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解决的极其严重的困难缺乏足够认识的种种迹象。列宁在谈到敌人时说：“他们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是他们有数十万受过战争锻炼的吃得饱饱的、凶悍无比和不顾一切的军官、士官生、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警察和富农。不客气地说，正是这些‘革命者’设想我们会以仁慈和友善的方式实行革命。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他们所理解的专政是什么呢？一个心慈手软的人能搞出什么专政呢？”这种愤激的话一天之内总能听到几十次，而且矛头总是对着在场的一些有“和平主义”嫌疑的人。每当人们谈论革命和专政的时候，特别是在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或动摇不定的共产党人参加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总是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的专政在哪里呢？请指出来给我们看看！我们这里是一锅粥，而不是专政。”他非常喜欢用“一锅粥”这个词。“如果我们连枪毙一个怠工的白匪的本领都没有，

那还算什么伟大的革命呢？你们看，我们那些资产阶级废物在报纸上写些什么！哪里还有专政呢？纯是废话和一锅粥”……这些话反映了列宁的真实情绪，同时也说明是有其独特意图的：列宁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认为必须用非常严酷的手段来拯救革命。

从德国人转入进攻开始，新的国家机关的软弱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列宁个别对我说过，“昨天还牢牢地坐在马鞍上，而今天只揪着马鬃了。这可是个教训啊！这个教训必将对我们那种可恶的奥勃洛摩夫精神<sup>101</sup>起点作用。如果不愿意做奴隶，那就要来一番整顿，真正把工作抓起来！即使……即使德国人和白匪消灭不了我们，那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出人意料地问我：“你看，如果白匪把咱们俩打死的话，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开玩笑地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谈话就到此结束。

司令部经常在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是所有机关当中最乱的一个机关。从来也搞不清楚哪些事情究竟由谁主管，由谁发号施令。在这里第一次一般地提出了军事专家的问题。我们通过同克拉斯诺夫的斗争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当时我们任命穆拉维约夫团长为指挥员，他又委派瓦尔登团长来领导普尔科沃城郊的战役。在穆拉维约夫跟前有四个水兵和一个士兵，他们接受的指示是：左右监视，手不离开手枪。这就是委员制的萌芽。这个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基础。

每一次到参谋部去以后，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没有真正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我们就不能脱出这种混乱状态。”

“这想必是对的。他们千万可别叛变……”

“给他们每个人派一个政治委员。”

列宁喊道：“派两个更好一些，并且要精明强干的。我们决不会没有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政府迁往莫斯科的问题上引起了不少争论。据说这有点象从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彼得格勒逃跑的样子。说工人们想不通，说斯莫尔尼宫已成为苏维埃政权的象征，而现在却又建议取消它等等，等等。列宁简直怒不可遏，他对这些说法回答说：“怎么能用这些无谓的感伤情绪来掩盖革命命运的问题呢？如果德国人一下子占领了彼得城并在那里把我们抓住，那革命就将付诸东流。假如政府迁到莫斯科，那彼得堡的陷落只是一个局部的重大损失。你们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不明白这一点呢？此外，在现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留在彼得堡，这只能增加对它的战争危险，那就会促使德国人来夺取彼得堡。如果政府迁到莫斯科，那么德国人夺取彼得堡的欲望也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如果占领一座处在饥饿中的革命城市，而这种占领又决定不了革命与和平的命运，那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呢？你们胡扯什么斯莫尔尼宫的象征意义！斯莫尔尼宫之所以是斯莫尔尼宫，是因为我们在斯莫尔尼宫。我们迁到克里姆林宫，你们所说的全部象征意义也就会随之转到克里姆林宫。”反对意见终于被驳倒了。政府迁到了莫斯科。我在彼得堡又呆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因为我担任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原因。到了莫斯科之后，我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到处是“一锅粥”，就是说毫无秩序，一片混乱，丝毫不亚于斯莫尔尼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意地批评了充满大地方主义情绪的莫斯科人，并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拉紧了缰绳。

政府相当频繁地进行着各部门的改革，同时展开了热气腾腾的立法工作。人民委员会初期的每一次会议都表现了立法方面的

一种极其伟大的即兴式创作情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都得在空地上建立起来。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由于时间有限，就连进行简单的查询都很困难。各种问题的提出都根据革命的紧急需要，即根据那种最难以置信的混乱情况而定。大小事情都稀奇古怪地搅在一起。一些不重要的实际任务也变成极其复杂的原则问题。不是所有的，远远不是所有的法令都互相协调。列宁曾对我们法令制定上的不协调不止一次地，甚至公开地进行过讥讽。这些矛盾尽管从当时的实际任务看来是非常尖锐的，但最后都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作中湮没了。这种革命思想的工作通过立法虚线为人类关系的新世界规划出了新的途径。

不用说，领导这全部工作的是列宁。他连续五六个小时不知疲倦地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初期每天都举行），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领导辩论，用怀表严格地控制报告人发言的时间（后来用计时器代替了怀表）。问题的提出通常是没有准备的，如上所说，往往是根据紧急程度提出来的。常常在辩论开始之前，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对问题的实质都还搞不清楚。但是，辩论总是很紧凑，提案报告以五——十分钟为限。然而主席总是能摸索出其中的轨道。如果与会者很多，并且其中有专家和一般不熟悉的人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用他常喜欢用的一种手势：把右手象遮阳板一样紧贴在前额上。透过指缝观看报告人和所有与会者，与俗话说的“指缝里看人”这句话的意思相反，他看得非常敏锐，非常仔细，寻视出他所需要的东西。在一张狭小的纸片上用很小很小的字（多节约！）写着报告人的名字，一只眼看着小桌上的时钟，以便提醒报告人该结束发言了。同时主席根据他在辩论过程中发现的那些最重要的意见迅速地在纸上草拟出决议性的结论。通常列宁为了节省时间把这些便条分送给与会者，征求这些或那些人的修改意见。这些便条是苏维埃立法技术上的一种

非常广泛的和有趣的书信式的文件。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找不到了，因为答案往往是写在问题的背面，主席随时把它细心地销毁了。到一定时候列宁便宣读自己的决议要点，而这些要点总是故意地写得那么率直，有点教学式的生硬（这是为了强调，突出，不使人含糊不清），接着，辩论或者完全停止，或者进入实际建议和补充建议的具体议程。列宁的“要点”奠定了法令的基础。

领导这样的工作，除了要有其他必要的品质以外，还要有巨大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初看起来，这个词似乎不太合适，然而它表达了事物的本质。人的想象力有各种各样：一个工程师-设计师同一个奔放的小说家一样，需要有想象力。有一种可贵的想象力能够在即使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把人物、事物和现象想象得象实际表现的那样逼真。运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和理论观点，把迅速捕捉到的个别的、细小的现象收集起来，进行加工整理，把它们联系起来，根据某种非公式化的相应规律加以补充，从而把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具体地再现出来——这就是想象力，这就是立法家、行政领导人、特别是革命时代的领袖所不可缺少的想象力。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具有现实的想象力。

列宁的目的性总是具体的，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目的性。列宁好象最初是在《火星报》<sup>1</sup>上谈过这样一个思想，即在复杂的政治活动的链条中必须善于突出当时的中心环节，以便抓住它，为整个链条指出方向。以后列宁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个思想，而且经常谈到链条和环节的本身形式。这种方法在他那里仿佛是从有意识的领域变成了下意识的东西，最后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在最紧急的关头，一旦事情涉及到重大的或是冒险的策略上的转折，列宁就把全部其他的、次要的或者可以延缓的事情抛到一边。这绝不能理解为他抓中心任务只是抓它的主要之点而忽视了细节。相反，他总是把他认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提得十分具体，从各个方面去研

究它，仔细考虑它的细节，有时甚至是非常次要的细节，寻求论据加以进一步推动，并不断地提示、号召、警告、检查、督促。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那个决定性“环节”。在这里，他不仅把所有直接或间接与中心任务相冲突的事情，而且把那些分散视线、削弱精力的事情，一概抛在一边。在最紧张的时候，他对于超出他所急切关心的问题以外的那些事情，几乎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态度。只要一提到其他的所谓中间性的问题，他就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危险，于是他就本能地加以回避。

当一个危急的阶段顺利地度过之后，列宁经常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感叹地说：“瞧，我们竟忘记了做某件事”……“瞧，我们忙于主要问题，这里忽略了一点”……有时当人们反驳他说：“可是要知道，这个问题曾经提出过，而且提过具体建议，只是您那时连听也不愿意听。”他回答说：“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得。”这时他就俏皮地略有“谦意”地大笑起来，并用手从上到下做出一个他固有的特殊动作，意思是说：看来要百废俱兴是办不到的。他的这一“缺点”只不过是能对所有力量进行最伟大的内部动员的才能的另一面，而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

列宁在1918年1月初写的关于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sup>①</sup>。现在觉得这些话完全不能令人理解：是不是笔误，这里是不是指几年或者几十年？但是，不，这不是笔误。列宁其他一些类似的话也许还可以找到不少。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初期，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一再重复地说过，过半年之后我们这里就会是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不光是他们，吃惊地抬起困惑莫解的脑袋，互相交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10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换着眼色，然而却哑口无言。这是列宁的一种诱导方式。列宁要使所有的人养成一种习惯，把一切问题都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范围内去考虑，不是停留在“最终目的”的前景上，而是着眼于今天或明天。在这里，列宁在这种急剧转变的时刻，采取了他所特有的极端作法：昨天说社会主义是“最终目的”，而今天的思虑、言论和行动都应当从保证社会主义数月之后取得统治出发。这只是一种教育方法吗？不，不只是这一点。在教育的坚定性上还必须加上一点，这就是列宁的炽烈的理想主义，他的坚强的意志，这种意志在两个时代的剧烈变动中压缩了阶段，缩短了期限。他对自己说过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为社会主义的成功所规定的这段离奇的半年期限，同列宁对待今天的每一个任务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一样，也是他的一种精神职能。对于人类发展的极大可能性的深刻而不可遏止的信念，永远是列宁精神的主要动力，为了这种信念可以而且应该付出任何牺牲和痛苦代价。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十分繁重的日常工作中，在粮荒和其他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的艰苦环境里，列宁总是极其细致地从事着苏维埃宪法的工作，把国家机关的各项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实际需要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个农民国家中的原则任务作极其精心的平衡。

宪法委员会因某种原因决定修改列宁的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使它与宪法的内容相“协调”。当我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收到了一些从宪法委员会送来的材料，其中有经过修改的《宣言》草案，或者说至少是它的某些部分。我在列宁的办公室里见过这份材料，列宁本人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在场。当时正准备召开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究竟为什么要修改《宣言》呢？”我问领导宪法委员会工作的斯维尔德洛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地微微抬起了头。

“因为宪法委员会认为《宣言》中有与宪法不一致的地方和不确切的说法。”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

“依我看这是徒劳的。”我答道，“《宣言》已经通过了，已经成为历史文献，修改它有什么意义呢？”

“完全正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支持地说。“我也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就让这个披头散发的婴儿这样活下去吧，因为不管怎样，他毕竟是革命的产物……如果把他送到理发师那里去，他未必会变得更好些。”

斯维尔德洛夫“出于职务的原因”曾试图为自己的那个委员会的决定作一些辩护，但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明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不止一次地不得不起来反对宪法委员会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建议，只是不愿意为了他本人起草的那份《权利宣言》而挑起纷争。但是他非常乐意得到在最后时刻意外出现的“第三者”的支持。我们三个人共同商定不再修改《宣言》，于是这个头发蓬乱的可爱的婴儿就从理发馆里得到了解救……

研究苏维埃立法的发展要特别注意其中一些原则性的因素和转折性的关键，要联系到革命本身及其阶级关系的进程，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对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它的结论可能而且一定会具有头等重要的实际意义。

苏维埃法令汇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全集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不重要的一部分。

写于1924年4月。译自《论列宁》1924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第52—65、72—81页。

# 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4年5月26日)

## · 编者按语 ·

1924年5月23—31日召开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广泛讨论了党内生活和党的组织建设问题。

托洛茨基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企图在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上重新挑起争论。托洛茨基在发言中继续向党的机关宣战，蛊惑人心地解释党内民主的原则，继续诬蔑中央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胡说什么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的“某些部分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的机会主义观点又一次遭到可耻的失败。代表大会一致斥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政纲，认为这个政纲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争论总结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斯大林在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中指出了托洛茨基反党谬论的实质，他说：“向党的机关宣战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坏党。唆使青年反对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瓦解党。为集团自由而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粉碎党，粉碎党的统一。用蜕化的胡说

来诬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1页）

同志们，我现在只是谈一谈中央报告所阐述或者涉及的问题中的很有限的几个问题。我要提请（或者说我试一试提请）大家注意代表大会（或者说代表大会相当一部分人，更确切地说是整个代表大会）正在等待我说明的一个问题，同时，我预先就完全避免在某种程度上使问题尖锐化，避免带来个人因素，避免更不利于克服党所面临的、我们大家为了党的今后工作都愿意使党摆脱的那些困难，我想我这样做的动机，代表大会是会理解的。因此，如果我不提及最近时期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尖锐情况，那并不是因为我要回避向代表大会回答任何问题，而是因为我打算去掉个人方面的因素，以突出问题的根本实质。

同志们，这里已经说过，我们党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这就是在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之间爆发了一场尖锐的争论，争论的目的，正如所说的那样，是或者改组中央，或者改变中央的政策。没有疑问，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爆发的争论是很尖锐的，但是我认为，同志们，如果我们要回顾一下报告所涉及的一年并指出党内争论的最突出特点，我们就应该说，这个特点在于，中央委员会本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某一时期认为（而且公开宣布）改变党内政策是必要的。

## 官僚化的危险

同志们，让我们回顾一下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就在我的面前。这个决议列举了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发展中的

客观矛盾、困难和消极现象，同时决议的第一节说，这些不良倾向包括“党的机关出现的官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能避开这个事实。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认为有必要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党的机关出现官僚化，由此产生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同一个决议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增长了。这里是不是有矛盾呢？不，没有矛盾。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群众思考问题要比党来得缓慢，因此党是阶级的先锋队。群众综合和总结党的活动是缓慢的，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共同在决议中指出，近年来（在这期间群众消除了自己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主义的联系）党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的政策使党博得了工人群众更多的信任。当时我们真是谁都没有想到我们在扩大党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方面会来一个快速跃进，即我们会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吸收二十万人，乃至可能是二十多万人入党。

但是工人群众通过其最忠诚积极的分子靠拢党这一事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决议中也谈到了这点。在决议中同时也谈到，党内出现党的机关官僚化，由此产生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这第二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意味着，如果中央委员会所指出和分析的那些不良过程得以继续发展，就会使党今后难于取得劳动群众的信任。是哪些情况、哪些原因推动了内部有各种分歧和差别的整个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道通过如此极为重要的、有分量的决议呢？同志们，这里我打算提出最不易受到怀疑的论据。我来引用一下争论初期布哈林同志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几段十分渊博的话。我使用的是讲话的速记记录稿，我只摘录说明官僚化特点的部分，看看布哈林同志在那个时期对此是怎样理解和解释的。我本可以摘录许多其他的引文，但是我却选中了这一段，原因是什么大家都明白。下面就是布哈林同志的

原话：

“同志们，我认为应当稍微具体地给大家描绘一下使我们党员群众感到焦虑的情况。这里不是谈论臆想的前提、分析等等，而是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党员群众为什么感到苦恼，从中央到支部都必须重视的非党群众由于什么原因而产生不满情绪。缺点使我们党陷入一种半危机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由于我国现时的经济危机而严重起来的，这类缺点虽然多得不计其数，但毕竟是可以分门别类的。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拿一个党支部的生活作例子，首先拿工人的机关作例子，因为支部也是一种机关。在我们这里（我讲的首先是莫斯科的组织），支部书记通常是由区委会任命，而且区委会也不力求通过这些支部来提名候选人；区委会可以任意地提出人选，选举通常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来上几个人问问‘谁反对’，由于人们多少有些害怕说反对，于是相应的人物就被任命为支部书记。如果我们进行一下调查，看看有多少表决是采用主席问‘谁同意’和‘谁反对’的方式，那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我们党组织的选举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变成了带引号的选举，因为表决前不仅没有讨论，而且是按问‘谁反对’的公式进行的，由于说反对‘首长’是不好的，所以这个问题便就此了结。这就是我们选举基层支部书记的情况。

再看看我们的党员大会，它是怎样进行的呢？我本人在莫斯科的许多党员大会上讲过话，我知道我们党组织中所谓的讨论通常是怎样进行的。以选举主席团为例。区委会的某个同志出来发言，提出名单，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事情就告结束。主席团选出了，这位同志宣称主席团一致通过。此后开始了议程问题。议程的情况也是同样。最近两三年来，据我回忆，很少很少在党员大会上提出新的议程项目，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的，是极少的……后来

就是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决议照老一套的办法通过。主席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决议一致通过。这就是我们党组织的通常格式。应该明白，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对此明确表示不满，是完全自然的，他们肯定是不满意这种情况的。

我们有许多基层组织都抓住了‘没有争论’、‘谁反对？’等等挡箭牌，这一整套做法使党的生活化为乌有。不言而喻，由此就产生了巨大的不满浪潮。我举的是我们最基层的支部生活中的几个例子。在我们党的其他各级组织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只是形式稍有不同。”

这就是著名的中央委员对我们党组织生活的特点所作的描述，显然，正是这些特点迫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说党的机关出现了官僚化和由此产生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当然，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危险。

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这一诊断中得出怎样的实际结论呢？我们从12月5日的同一个决议中可以看到这个实际结论：

“不论从党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种种影响作顺利斗争来说，或是从提高党在各项工作方面的战斗力来说，党的利益都要求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切实、经常地实行工人民主原则。”

可见，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鉴于明显暴露了党内生活的病态和缺点（这是中央分析和肯定了的），承认必须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同志们，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避开这个事实，这正是本届代表大会所要总结的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这样，中央委员会确定，第一、必须认真地改变党的方针；第二、必须扩大党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这两者是一致的。我们在决议中可以看到：“扩大党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的工作在最近几个月内，应当成为所有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中央委员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确定必须认真改变党的方

针，这是否意味着根本破坏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或其他原则呢？我认为不能这么说。这仅仅意味着中央委员会确认，在目前条件下，在这些原则的贯彻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偏差，其表现就是党的机关官僚化，就是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威胁日益增加的党脱离群众的现象。所以，正是为了保证在现时条件下贯彻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和其他一切原则，中央委员会才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承认有必要认真改变党的方针。

## 关于两代人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为什么又因为党和工人阶级内部两代人的问题而复杂化了呢？同志们，有许多同志从一开始就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内部两代人相互关系的角度（而且我认为是完全正确地）提出了党内制度的问题，为了不使我的说明复杂化起见，我不准备引用这些同志的论据。我要说得更尖锐些：党内制度问题的实质，在目前具体条件下，在我们看来，首先应归结为党以及工人阶级中两代人相互关系的问题。显然，问题是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整个年轻一代，问题是要使得，或者确切些说，是要保证工人阶级这年轻的一代（不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中工作，还是按照党和工会的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中学习）能够在新的条件下走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年轻一代不能重复历史，幸好也不必重复老一代的历史。老一代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在沙皇制度铁蹄下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通过别的途径走上今天自己的道路的。老一代保证了新一代能够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前进。任务就在于使得，或者确切些说，保证新一代能够通过符合于工人阶级国家的本质、符合于新形势的新途径，走上同一条布尔什维



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康庄大道。

如果我们自问，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党内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党内民主制度，同志们，我一开头就要说（虽然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这几乎是多余的），在我们党内未必能找出十个多少领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会从纯形式的角度，——从多少时间改选一次，百分之几的票数，多少次辩论等角度，从民主的统计角度，从在党内生活中运用形式主义的议会制原则的角度来对待党内民主问题。我们有了十分长久的经历，其间同伪政治，同假民主（它一方面是孟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遮羞布）作了非常巨大的斗争，所以我们不会从形式上来看民主问题。

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党内制度中的民主呢？是从这样的角度，即保证党免除党的机关官僚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等这种现象。这便是一个准绳！如果我试图针对我党的现状、当前时代、当前这段时间为党内民主下个定义，我就要说：党内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一方面能保证富有经验的、进行过地下斗争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因为不保证这种领导（只有小孩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党在目前形势下就不能引导国家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大船通过困难重重的峡谷前进，另一方面，在保证老一代的领导的同时，也能保证年轻的一代不是通过学校而是通过积极、独立、切实地参加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列宁主义的大道（通过学校是办不到的）。党内民主制度应当保证把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破坏这种必要的结合和平衡，就会有党的机关官僚化和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当我们反躬自问，我们有没有这种必要的平衡，我依然认为自己有权举出如下事实，即中央委员会本身肯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破坏了这个平衡。我要再次提一下我援引过的布哈林同志不是在中央委

员会内部,而是在一个区的群众大会上说的那段渊博的话,他很具体而明确地说明了在党内方针上的平衡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对于不大成熟的党员,即对于广大青年党员是极其不利的,而对于老党员干部则是危险的。

## 派别和小集团

在党内争论中,上面这个问题牵涉到党内派别和小集团的问题。同志们,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到12月5日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这个决议指明,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小集团的自由,派别小集团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随时都可能造成政府以及整个国家机关的分裂或瓦解。我认为这是没有疑问和无可争议的。我们一致认为要引证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关于派别和小集团的定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危险的问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手制定的。说我似乎是主张允许小集团活动,这是不对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诚然,我犯了个大错误,就是在党内争论的紧急关头我生了病,未能象其他许多人那样及时起来发言,驳斥这种说法。我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认为,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未说过,我认为一方面必须禁止派别,一方面可以容许有小集团。相反地,我在一切场合,只要我有机会谈这个问题,我都指出,派别和小集团是区分不开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正式的文字说明,那我可以提供。<sup>7</sup>现在我不在这一点上占用代表大会的时间。我认为,从政治上说这已经足够了(就上面所作的声明而言),我从来没有承认,现在也不承认党内小集团的自由,因为小集团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只不过是派别的另一种名称而已。但是,同志们,我同时还应当向你们提一下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另一

处谈到派别和小集团问题的地方。那里说：“只有经常的生动的思想生活才能保持住党在革命前和革命期间那种状况，即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集体讨论重要的问题。只有这种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保证短时间的（即暂时的、偶然的）意见分歧不致变为招致上述一切后果的派别小集团。”接着又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不要因此把忠诚的党员推上闭目塞听和派别活动的道路。”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同一个决议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把它从我们的记忆中，从党的历史中抹去。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说明，单靠一道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禁令，单靠公开禁止派别和小集团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得要有一种党的方针来使我们免除党机关的官僚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提出这样一种极端重要、极有分量的解释，那我们可以从我以前的讲话里找到答复。换句话说，党的机关的官僚化（这一点已可看出）正是（如决议所说的）使短时间的暂时意见分歧变为小集团，再由小集团走上派别活动道路的原因之一。

同志们，这就是我对党内基本问题的说明，这就是这些问题由于一年来党的发展而被提出来的情况，这就是中央委员会12月5日的决议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在一定的时刻，在12月5日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告诉全党：注意，已出现官僚化的现象，这些现象蕴藏着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容许派别活动，但要记住，避免派别和小集团的真正可靠的保证在于铲除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不良现象，在这个时候，如果我现在事后来自问的话，我要说如果设想一下这种因素，设想一下布哈林同志向我们描绘的党组织生活的情景，那么，同志们，党内在这方面（布哈林本人在演说中也是

这样说的)必然爆发不满情绪的浪潮,爆发批评的浪潮,这不是不言自明的吗?在这里,如果我自问,能不能把这种批评、这种不满情绪用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样笼统的词汇不分皂白地加以说明和指责,同志们,那我就要产生很大的怀疑和极度的忧虑。

## 计划问题

事情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党内问题,一个是有计划地领导经济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的决议中对第一方面的问题的态度,我已经讲过了。我现在扼要谈谈中央委员会12月5日在经济方面所作的结论。

12月5日的决议在分析了现有经济状况之后说道:“党从上到下应当由此为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是否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只有看我们是否能真正学会使国营经济成分在其本身之间以及它们同市场之间的日常相互作用上协调起来。”接着又说:“国家计委——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地方经济计划组织的经济司令部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里。必须保证它真正取得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那种地位。”

因此,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认为必须反对的不是对计划领导的可能性所持的幻想的、空想的以及其他夸大的看法。我被认为是夸大这种可能性的人们中的一个。我觉得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分散大家的注意力。重要而值得注意的不是有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夸大,重要的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告诉全党说,不能缩小计划领导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向前发展。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所讲的话。可见,中央委员会所觉察到的危险不在于有谁夸大了计划经济的

可能性,而在于党对计划原则的意义估计不足,国家计委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没有取得按照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应取得的地位。

我离开莫斯科,在苏呼姆从我们的报纸上看到了加米涅夫同志在新改组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上的讲话(这是在2月8日):“如果我们不把有计划地协调国民经济作为自己的目的,我们就会犯大量的错误。这种协调工作过去一向都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任务,但那时它主要表现为协调劳动国防委员会成立前出现的各主管部门的分歧。我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今后各经济部门的协调不应是各主管部门冲突的结果,而应是预先考虑周到的经济计划(哪怕是草案)的产物。”

同志们,这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指示,即在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有计划的结合我们全部工作的问题上必须改变政策,这番话不是在争论之前,而是在争论之后讲的。可见,所谈的不是抽象的包罗万象的计划,也不是个别的电气化计划,尽管这是庞大的远景计划,而是这样一种计划: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的,它要把我们经济中的所有组成部分经常机动灵活地“结合”起来,使之互相配合,以便使它们无论是单独地或是整体地都能更切实、更正确、更少困难地适应我们的市场,主要是指农民市场。这就是2月8日,即在争论之后,确认必须改变主要经济机关的政策。同志们,这样我就要再问自己,能不能够说,2月8日以前要求作这种变革的呼声就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呢?同志们,我不这样想。在这方面以及在党内方面提出的指责或评价能有什么根据呢?假定可以说:在争论时有许多人过分夸大了党内民主的意义,把这个口号绝对化了。也就是假定说,问题在于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计划经济方面,假定可以说,对计划经济的作用估计过高。这是假定。虽然夸大计划性绝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因为小资产

阶级具有散漫性，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方法，它绝不会倾向于计划经济。但我不谈在这些说法上的矛盾。假定说，谴责是针对夸大党内民主和夸大经济的计划领导的。如果说这类夸大是存在的，那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岂不是使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说，这些夸大正是由于某些其他不良的病态现象造成的。如果我们说对党内民主是有夸大，那这岂不是对党内官僚主义增长的一种反应，因为中央的决议十分决断地确认了这种增长，认为由此产生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当然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渗透的渠道。没有疑问，任何方面的任何夸大和错误都能成为其他阶级的影响渗透的渠道，因为我们党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处在国内外其他势力的影响之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常识，我再说一遍，对潜力、可能和远景的任何夸大都是异己阶级影响的渠道。但是另一方面我要问，难道党中央自己肯定的党的机关的官僚化是某种行政事务上的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吗？我认为，机关的官僚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官僚化的主要根源就是国家机关，因为摩擦、阶级调和、广大劳动群众以至整个工人阶级本身的愚昧都交织在国家之中。既然我们党领导国家，那么对它来说，国家机关就是产生官僚主义影响的最径直的直接根源。如果是这样，那么官僚化就不是一个行政事务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形式民主方面的夸大也是一样，这是同一类的现象。如果我们说，夸大的要求，夸大的说法，对民主问题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可能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泉源，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从前途上、理论上看来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党的机关的官僚化倾向也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不小渠道，而且是更为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党对于这个主要的直接危险的反应是十分尖锐的，从这种反应中绝看不出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同志们，至于计划问题就更是这样了。我们中间的什么人是否犯了过高估计计划原则的错误，我们可以写书来平心静气地进行争论，大概我们还不得不写很多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书籍，写许多冷静探讨性质的书籍。但是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党通过其领导机关没有必要的力量来对付有计划地领导经济的任务，这一点我认为现在是绝对肯定无疑了。现在我想先不谈诸如出超或商品输入等局部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评价也是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角度出发的。同志们，这些问题我稍等一等再谈。我们可以在讨论商业问题时再谈，那时这些问题将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里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分歧，它们十之八九具有实践的、经验的性质。现在已经有了严格的检验。当然任何人都没有说过，我们不需要出超，我根本没有听到这样的主张，由于我国贫困，出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奢侈，这样的奢侈应当减少到最必要的限度。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把它减少到这种限度，我们积累了过多的外汇，我们已经开始在纠正这一错误。这是第一。

·第二、在商品输入方面，我们认为，既然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商品调配来调整国内价格，那么我们就不能自我封锁，我们不得不仰仗外国商品，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当然还要严格地协调相应的工业部门的利益。我们在探讨经济问题的时候还要谈到这一点，但这里我无论如何看不出，小资产阶级倾向这种指责是有根据的。

## · 关于错误

同志们，这里邀请了所有犯错误的人来声明他们犯了错误。在

自己的党面前声明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比什么都简单，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最容易。我认为这方面无需多大勇气。但是，同志们，我认为有责任和有义务提醒一点（因为这一点没有人讲到），整个中央委员会在一定的时刻向全党声明了某些只是有待于纠正的错误。12月5日的决议声明了同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本身就是声明党内方针有了错误。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认为存在这些错误，那也就没有必要改变正确的东西了。要改变的应是不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

我们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在新的形势下召开的，这一新的形势是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号召下形成的，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使党本身的社会成分沿着无产阶级方向发生变化。党内民主问题是否因此而改变或者消除了呢？不，没有改变，不，没有消除。无疑地，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正如在这里讲到的那样，使我们党更接近于选举的党。我在梯弗利斯讲过这一点，我在巴库和在莫斯科的一些会议上也讲过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国家民主（要知道，在议会制国家里，国家民主首先要解决的是由哪一个政党来管理国家的问题）方面看问题，如果我们是从这方面看问题，把我们这里出现的情况（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事实）拿来同许多议会制国家最近几个月来举行的选举比较一下，那我们就完全有权利说（而且我亲自讲过几十次），我们这里表现出来的民主的方法（工人阶级在自己前进道路的一定阶段上用某种非常有分量的群众性手段来总结党的多年来的工作，把二、三十万工人推举出来，输送给党），比另一种民主制度（国内的居民在资产阶级报刊专政下、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形式上每隔五年必须把自己的选票投入选票箱一次）要高得无可比拟和不可限量。这是非常明显的，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的这种优越性——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把关于党内方针及其优点和缺点问题从



议事日程上取消掉。如果我们愿意现实地估计形势，那我们就得说，党的队伍的这一巨大的发展、这一特大的跃进，是党多年的长期工作的结果。而中央在正确地肯定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增长的同时，在12月份警告自己和全党防止党内机关出现可能有损于党在群众中扩大影响、甚至将使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的发展过程。因此，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事实并不能取消党内方针问题。我认为，它反而使问题变得对我们更加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在这里又碰上了党内有理论经验和受过锻炼的老一代同现在入党的人数众多的年轻一代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现在应当特别着重地和坚定地指出，如果让12月5日的决议中指出的那种过程继续发展下去，就将会对党的主要的两部分人即它的领导一代和年轻一代造成威胁。中央12月5日提出的警告只有从这种前景来看才是有意义的。

同志们，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当一个反党有理的人。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使无产阶级解决其基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工具。我已经说过，要在党的面前说这一切批评、一切声明、警告和抗议都是大错而特错的，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然而，同志们，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不这样认为。我知道，反对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实现正义的其他道路。英国人有句古老的谚语：不管对不对，但这是我的国家。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历史权利说：在个别时间，在个别的、局部的具体问题上不管对不对，但这是我的党。如果说，在一些同志看来，我在这里作这样或那样的提醒是多余的，如果说，在一些同志看来，我在这里描述这样或那样的危险是多余的，那么我自己认为，我仅仅是尽了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要党警惕我认为有危险的那种情况。

如果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人走上讲坛提出这样的决议

案，说必须认真改变党内的方针，否则党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那么，同志们，我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得不到响应的，他是得不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提案的支持的。但是，在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央是应当一致通过这种指出必须改变党内方针的决议的。同志们，我们面前还有十分巨大的困难，我相信，我们大家将作为好同志，作为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去克服这些困难。这里要发表什么个人声明，那是可笑的，也许几乎是不恰当的，但是我相信，一旦需要，我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街垒的最后一名战士！我坚信，历史不会让我们经受这样的考验，我们将胜利地战斗，攻克我们敌人的街垒。无论如何，困难，甚至巨大的困难还会有的，同志们，我懂得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在目前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党员，知道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而党的意见要考虑到在个别时期与党的领导集团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有分歧的那些呼声。我要说，现在我们吸收了二十万或二十多万工人入党，在这个时候，12月5日的决议的意义，它的作用并没有减少。相反地，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志们，如果我们由于对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夸大其词的进攻，而忽视了这个决议，那么我们会犯错误，从而使党内产生新的困难，新的复杂情况。我们大家都乐于把这些困难和复杂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个人也同任何人一样愿意认识错误），那么，同志们，谁也没有权利把这些错误说成是旨在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团结和纪律。不仅个别党员，甚至党都可能犯有个别错误。例如，最近那次代表会议个别的一些决定就是如此，我认为这些决定的某些部分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但是党的决定即使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也绝不会使我们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使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接受党的纪律的决心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如果党作出一个决定，而我们当中有某个

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决定，那么他就要说，不管公正不公正，但这是我的党，我要对决定的后果负责到底。

译自《真理报》1924年5月27日。

##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摘录)

——1924年6月21日在全苏医务和兽医工作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 编者按语 ·

托洛茨基的这篇讲话曾收入1924年出版的《西方和东方》一书,共七节,这里选译了第六节。

这一节讲的是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托洛茨基在这里夸大其辞,说当时德国“具有最有利的、几乎是最理想的形势”,而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只“在于党的领导”,没有能“及时地保证转向夺取政权的坚决的策略转变”。托洛茨基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架式,把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共产国际的领导身上,并指责德国党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利用得“极不充分”,鼓吹要“仔细研究十月革命的全部历史事实”,为他即将出笼的《十月的教训》大做舆论准备。

然而,托洛茨基弄巧成拙。事实上,当时他对共产国际采取的策略并没有提出过异议,不仅如此,在德国十月革命期间,他始终站在德共右翼领导布兰德勒等人一边,并且到1924年1月他还同拉狄克等人草拟过赞许德国退却、反对起义的提纲。这就充分表明,所谓主张“坚决的策略转变”云云,纯属欺人之谈。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特殊环境，斥责了托洛茨基“笼统地把十月革命跟德国革命类比”的荒谬作法（《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2页）。

## 六 德国革命的教训

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共产党是否能够、是否善于利用这些动荡来取得政权，然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如果问：我们这个国际在这一时期里是否更强大了，那么应当回答说，整个说来，我们无疑是更强大了。几乎所有的支部都更加巩固、更有影响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的力量正在发展并将不断地沿着一条上升的路线发展？不，不意味这一点。这种力量是曲折地、波浪式地、痉挛似地发展的——这里同样是发展的辩证法，共产国际也不能逃脱这个辩证法。例如，去年下半年德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比今天强大得多，那时它直接去夺取政权，而德国整个社会生活动荡得如此之大，以致不仅最落后的工人群众，而且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指望共产党人很快取得政权并改造社会。这些情绪本身就是革命形势成熟的最可靠的征兆之一。但结果是共产党人还不善于夺取政权。这不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原因而不能，——不，不能设想有更成熟、更现成的夺取政权的条件了。如果确切地阐述这些条件，那么可以把这些条件当作典范直接写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教科书中。但是，党不善于利用这些条件。这一点是需要谈一谈的。

国际历史上的第一个时期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起到1921年3月德国的革命动荡为止。一切取决于战争及其直接的后果。我

们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欧洲无产阶级的起义和夺取政权。我们的错误在哪里呢？我们对党的作用估计不足。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新的时期开始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实际上意味着“建设党”。这一政策在德国贯彻得最彻底和最成功。但它在这里正好同1923年由于鲁尔被占领而使欧洲虚假的均势遭到破坏所造成的形势发生了矛盾。

1923年底，我们在德国遭到了极严重的失败，这丝毫不亚于我们在1905年的失败。但是，区别在哪里呢？1905年，我们的力量不够，这在战斗中暴露出来了。换句话说，失败的原因在于客观的力量对比。1923年，我们在德国遭到失败，是因为没有使事态发展到力量冲突的地步，没有动员和利用力量。因此，这里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固然可以说，即使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它也仍然不能动员足够的力量并且还会被击溃。但是，这种说法至少是一种猜测。就客观形势、阶级力量对比、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自我感觉来说，也就是从一切革命前提来说，我们具有最有利的、几乎是最理想的形势：由于占领而发展到顶点的民族国家生存的危机；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议会制度危机；统治阶级完全丧失自信心；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瓦解；共产党影响的自发增长；小资产阶级分子向共产主义方面的转变；法西斯分子的情绪急剧低落。政治前提就是这样。我们在军事方面的情况怎样呢？常备军人数很少，有十一——二十万人，实际上只是一支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警察。法西斯的力量被大大夸大，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空架子。无论如何，法西斯分子在7—8月以后士气大为低落。

共产党人是否拥有大多数劳动群众呢？不能仅仅用统计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问题要靠革命的进程来解决。群众不断地涌向共产党人。敌人也不断地在削弱。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的群众丝毫没有象1921年3月那样，要积极对抗共产党人。相反，大多数

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变革。这也是理应如此的。

群众有没有斗志呢？1923年的全部历史说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诚然，斗志在年底以前还表现得比较拘谨，比较凝聚，缺乏内因性，即缺乏随时爆发的准备。不过，不如此又能怎样呢？到下半年群众开始有经验得多，他们感觉到或者了解到，事态快要使问题得到充分解决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坚强的、自信的领导和群众对这个领导的信任，群众就能够发动起来。关于群众似乎没有斗志的议论是很主观的，实质上反映了该党上层没有信心。

关于群众没有进攻的斗志的说法，在我国十月革命前夕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列宁对此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即使甚至这些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只不过证明，我们已错过了最有利的时机。但这决不意味着，目前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任何人都不敢断言，似乎多数或者即便是相当多的少数工人群众会起来反对变革。最温和的人想要说的，无非是多数将不积极参加变革。但是，即使参加起义的是积极的少数，而多数人抱着善意的、观望的或者甚至消极的情绪，那也足够了。”这就是列宁的论据。以后的事态表明，充满斗志的少数率领了绝大多数劳动者。毫无疑问，德国的事态发展也会是这样的。

最后，从国际的观点来看，无论如何不能把德国革命的形势说成是没有希望的。诚然，与革命的德国毗邻的是帝国主义的法国。然而，世界上还存在着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在一切国家都更强大了，法国也是这样。

德国共产党失败的基本原因在哪里呢？

在于它没有及时地认清从鲁尔被占领时起，特别是从消极抵抗停止时（1923年1—6月）起日益逼近的革命危机。它错过了日期……对于革命政党来说，最困难的是从延续多年的宣传鼓动

时期过渡到通过组织武装起义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一转变必然产生党内危机。每一个负责的共产党人都应对此作好准备。准备的方法之一就是仔细研究十月革命的全部历史事实。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少，而德国党对十月的经验利用得也极不充分……它在鲁尔危机到来以后，仍根据统一战线的公式——以同危机前一样的速度和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其实，这一策略早已根本不够了。党的政治影响在自然而然地增长。应当有急剧的策略转变。应当向群众，首先向自己的党内指出，目前问题在于直接准备夺取政权。应当从组织上巩固日益增长的影响并为直接冲击国家创造稳固的基础。应当把整个组织工作转到工厂支部去。应当在铁路上建立支部。应当直截了当地提出军队工作的问题。尤其应当使统一战线的策略完全适应这些任务，使它具有更加坚定的速度和更加革命的性质。应当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军事技术工作。

确定起义日期的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和这个前景下才具有意义。起义是艺术。艺术首先要求有清楚的目标，明确的计划和日期。

然而最主要的是，及时地保证转向夺取政权的坚决的策略转变。这一点没有做到。主要的和致命的过失就在这里。由此产生了基本矛盾：一方面，党等待着革命，而另一方面，它在三月事件中受到挫折后，到1923年最后几个月就放弃了组织革命，即准备起义的念头。党的政策是以和缓的速度推行的，但是发动的日子临近了。当敌人实际上已经利用党错过的时间而得到巩固的时候，起义的日期才确定下来。以急剧的速度开始的党的军事技术准备工作，脱离了从前以和缓速度推行的政策。群众不了解党，也来不及跟着它走。党立刻感到脱离了群众并陷于瘫痪状态。由此就从头等阵地上不经战斗突然退却下来，这是一切可能的失败中最惨



重的失败。

不能把事情设想成这样：历史会机械地创造出革命的条件，然后根据党的要求，在任何时候把它放在碟子里端上来：请收下并在收据上签字。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

阶级应当在长期斗争中锻造出这样一个先锋队，它善于认清形势，当革命来敲大门的时候，它能够认出它来，它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把起义的任务理解为艺术的任务，能够制定计划，分配角色并给资产阶级以无情的打击。然而，德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却缺乏这种能力，这种本领，这种锻炼和毅力。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里的问题所在，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我们在1917年10月动摇起来，观望起来，并退到一旁说：让我们暂时等一等，局势尚未十分明朗化。初看起来似乎是：革命不是熊，不会跑进森林里去，如果在10月没有实现它，迟两三个月还能实现。但是，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它没有考虑到构成革命的一切因素的变动着的相互关系。革命最直接的、最迫切的条件是群众实现革命的准备。但是，这种准备是不能储存起来的，而要在它一旦出现的时候，就加以利用。在十月革命以前，工人、士兵、农民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但这自然不意味着，他们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一切和任何条件下都跟着党走。他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大失所望，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跟着布尔什维克党走。对妥协政党的失望，使得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布尔什维克将更加巩固，他们是用另外的材料制成的，他们言行一致。如果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条件下表现出动摇和采取观望的立场，那么，他们在短期内就会使自己在群众心目中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同起来：群众会迅速地甩开我们，就象他们迅速地向我们涌来一样。这样力量对比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试问，力量对比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概念很复杂，是由很多因

素构成的。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些很稳定的因素，决定阶级结构的技术和经济就是这样的因素；既然力量对比取决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阶级的人数，那么这也是相当稳定的因素。但是，在阶级人数相同的条件下，它的力量就取决于它的政党的组织性和积极性，取决于政党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群众的情绪等等。这些因素就不那么稳定了，特别是在革命时代。我们要谈的正是这一点。如果一个极端革命的政党因事变的逻辑而置于劳动群众注意的中心，但错过了时机，那么，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被党所唤起的群众的希望会被失望或消极情绪和深深的绝望所代替，而党也就只能把那些被它牢牢地和彻底地争取过来的分子，也就是少数人保存在自己的周围。去年在德国发生的情形就是这样。所有的人，直到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都希望共产党把国家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党却不善于把这种普遍的希望变成决定性的革命行动并引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这就是在10—11月以后革命情绪开始低落的缘故。这也就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暂时巩固创造了基础，因为其他任何比较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阶级分化方面，在经济方面）在这一时期自然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得到了三百七十万票。这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非常非常优秀的核心。但应当用发展的观点来估价这个数字。毫无疑问，在去年8—10月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共产党可能得到多得多的票数。另一方面，许多情况说明，假如选举晚两三个月进行，共产党所得的票数会更少。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它的影响当时正在缩小。闭眼不看这一点是可笑的：鸵鸟政策不是革命的政策。但是，应当清楚地了解这一事实的意义。我已经说过，共产党也不能不受辩证规律的支配，它的发展是通过高涨和危机而在矛盾中实现的。在政治涨潮时期，党对群众的影响迅速增长，在退潮时期，影响便会削弱，党的内部淘汰过程便会加

强。一切偶然的、不可靠的都离开了，党的核心团结起来并得到了锻炼。这样它便可以来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和正确的展望可以避免错误和失望。在战后时代，我们在工业高涨和危机的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往后在关于欧洲新的改良主义时期到来的问题上，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了解德国正在经历的那个阶段，否则我们就不会理解明天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在1905年失败以后，我们用了七年时间才使运动在连纳事件<sup>102</sup>的推动下重新迅速进入高潮，用了十二年时间才使无产阶级取得第二次革命的胜利。德国无产阶级去年遭到了极大的失败。它需要一定的而且是相当长的时间，来研究这次失败，吸取教训并恢复元气，重新积聚自己的力量，同时，共产党只有充分吸取去年的教训，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五年？十二年？对这个问题无法给予确切的回答。只能谈一谈一般的看法，就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来说，发展的速度战后要比战前更迅速更剧烈得多。在经济方面，我们看到，生产力发展很慢，但形势的恶化和好转互相更替得比战前更频繁。在政治方面也有类似的现象：法西斯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互相更替得很迅速，昨天的局势是很革命的，而今天资产阶级显然取得了全线胜利。我们整个时代的深刻的革命性质就表现在这里，这一性质使我们得出结论，德国反革命的胜利不会是长久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退潮，而不是涨潮，我们的策略自然应该适应这种情况。

译自《西方和东方》192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27—135页。

# 十月的教训

## · 编者按语 ·

这是托洛茨基在1924年9月为他的全集第三卷,即《1917年》一书写的序言。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俄共(布)党内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这是托洛茨基利用列宁逝世加紧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

托洛茨基以“总结”十月革命的教训为名,修正列宁主义,歪曲十月革命的历史,攻击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他把列宁主义分割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战前或十月革命以前的“旧的”、“不中用的”列宁主义,一部分是十月革命后经过托洛茨基主义改造过的“新的”列宁主义。为了抬高自己,他肆意篡改历史,把自己描绘成十月革命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胡诌什么从他领导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10月9日决定拒绝把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命令时起,实际上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决定了“十分之九”或“四分之三”的结局,而列宁领导的10月25日(11月7日)的武装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他总结的十月革命的基本教训是“不畏缩后退”,以此影射共产国际领导在1923年10月德国革命中“畏缩后退”,从而招致革命失败。这类造谣诬蔑、歪曲篡改之词充斥全文,不胜枚举。

斯大林的《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十月革

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文就是专门驳斥托洛茨基的谬论，捍卫列宁主义而作的。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的新著作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他的“这部十月革命的‘历史’从头至尾都在破坏十月起义的主要活动家的威信，破坏组织和举行这次起义的党的威信”。斯大林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301、309页）。

## 必须研究十月

我们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却没有沾到我们出版物的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著作，来阐述十月变革总的情况，提出它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素。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说明变革准备时期各个方面或变革本身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现在也都没有公布。我们出版了许多属于十月以前时期的有关革命史和党史的文件和资料。我们所出版的十月以后时期的资料，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十月则注意得十分不够。我们在完成了变革以后，似乎认定，反正我们不会再去重复它了。我们似乎认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准备时期、它的实现时期、它的巩固时期的头几个星期的各种条件，对于完成今后建设的迫切任务没有什么直接的益处。

然而，这样的看法，尽管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也是十分错误的，甚至还是有民族狭隘性的。如果说我们不会再重复十月革命的经验，那也决不意味着我们从这个经验中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而所有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还都刚刚在着

手解决自己的“十月”任务。最近一年来，我们也已经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就连西方最老练的共产党都不仅没有切实地接受我们的十月经验，而且他们简直就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

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关十月的资料，就不能不同时重提旧日的意见分歧。可是，这样看待问题是十分无聊的。自然，1917年的意见分歧是很深刻的，也决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经过了几年，到现在还企图拿它们来作为武器去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那就过于小气了。然而，如果为了更无价值的个人考虑，而回避十月变革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更是不能容许的。

去年，我们在保加利亚遭到了两次惨重的失败。首先，党由于抱有学究式的、宿命论的看法，放过了采取革命行动的非常有利的时机（赞科夫六月政变后的农民起义）。随后，党力图纠正错误，举行了九月起义，却没有为这次起义准备好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先决条件。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应该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下半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保加利亚去年的经验也好，德国去年的经验也好，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得到相当充分而具体的估价。本书作者对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作了一般的概述（参看《西方和东方》小册子中的《在转折点上》和《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两章）。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证实了这个概述的正确。另外也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打算提出任何其他的说明。但是作些概述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丰富的实际材料具体地说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以便能十分具体地解释最惨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的原因。

但是，既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政治上和策略上说明过十月变革，那就很难谈到对保加利亚和德国事件作出分析。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完成的。十月以后，人们狂热地以为欧洲的事件将会自然而然地展开，而且时间紧迫，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从理论上吸取十月的教训。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1918年11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其他有产阶级手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各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期只是从1921年年中才刚刚真正开始（“争取群众”，“统一战线”等等）。“十月”的任务推延下来了。与此同时，对十月的研究也推延下来了。去年才又使我们重新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资料并着手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每个阶级、甚至每个政党主要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来学习的。但这决不是说，其他国家、阶级和政党的经验是无关重要的。不研究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1905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以后，在整个反革命的时期内，也一直是研究1905年的教训和结论的。可是，对于1917年胜利了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做这一项工作，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过。自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反动年代，也不是流亡时期。况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人力和物力，也决不是那些艰苦年代所能比拟。需

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确切地提出在党的范围内和在整個国际范围内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务。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去年德国的教训，不止是有重要意义的预兆，而且也是严厉可怕的警告。

固然，可能有人说，即使最认真地了解了十月变革的进程，也还不会保证我们的德国党取得胜利。可是，这种笼统的而实质上是庸俗的说法，是连一步也不能使我们前进的。诚然，仅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可能产生下面一种情况：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却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去年在德国，恰好就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还会在其他国家出现。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时为止，再没有比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凡是没有极郑重地、而且十分具体地研究十月变革历史的，就好象一位要在现在的条件下准备新战争的军事长官，却没有研究过这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经验。这样的军事长官，在将来必不可免地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1917年2月至1918年2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它要么成为转变的序曲，要么成为转变的后果。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



最近的根源。列宁在1917年7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sup>①</sup>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转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因素，那么党就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领导，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经准备迎接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而运动越过了党，在走向失败。

革命的政党受着其他政治势力的压迫。它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转变及由此而引起内部派别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转变的必要而发生的党内派别变化，往往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阶级倾向的支柱。简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调一致，就要成为或者几乎成为其他阶级的间接工具。

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对于每一次严重的策略转变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大的战略转变来说，就更为正确了。我们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军事上的一样，看成是进行个别战役的艺术；而把战略看成是赢得胜利的艺术，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艺术。在大战以前，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区别，当时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个概念。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曾经运用的是议会策略、工会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至于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组合各兵种——来战胜敌人的问题，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时代就根本没有提出过。这是因为当时实际上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页。——编者注

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革命党人会立即从农村中消失。不是的。农民革命在开始阶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但是照我们所设想的事件发展情况，民粹派本身会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来，与城市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寻求联合。很明显，在这种场合下，起义的直接结局也将首先决定于与农民有联系的军队的士气和行动。如果没有大战爆发，因而没有在发展的链条上加进一个新的重大环节的话，1914—1915年的运动能够获得胜利吗？这一点是无法猜测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有许多情况说明，如果胜利的革命是沿着那条以1914年7月事变为开端的道路展开的话，那么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着革命的工人苏维埃直接取得政权，而这些苏维埃将通过（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农民群众引上自己的轨道。

战争中断了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推迟了这个运动，可是随后又异乎寻常地加速了它。战争通过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为小资产阶级的党造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创立了一个不仅是社会的、而且也是有组织的基础。要知道，农民的特点，也正在于他们固然人数众多，但即使当他们具有革命精神的时候，也是难于把他们变成有组织的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党依靠了现成的组织，即军队，就来威胁无产阶级，而且引诱他们走上护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列宁立即气愤地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旧口号的原因，因为它在新的条件下，意味着变布尔什维克党为护国派集团的左翼。列宁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护国主义的泥潭中拖出来。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在下一阶段成为农村劳动群众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确切些说，又该如何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呢？列宁毫不留情地驳斥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们“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只是无谓地背诵

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努力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sup>①</sup>

不错，列宁有时也说过，在二月革命初期，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现到一定程度。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些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是，正如列宁不止一次地阐述过的，二月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仅仅实现了一半政权。它们支持了资产阶级政权，对资产阶级施加了半反对派的“压力”。正是它们的这种中间地位，使得它们不能越出工农兵民主联合的范围。从政权的形式来看，这种联合，由于所依靠的不是调整好了的国家关系，而是武装力量和直接的革命监督，因而是趋向专政的，但是没有达到这种专政，而且相距还很远。妥协派苏维埃的不稳定性，也正在于这种工农兵半政权联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确性。这些苏维埃要么应当趋于消灭，要么应当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然而，它们要夺到政权，不能以各党派的工农民主联合的形式去进行，而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去进行。这个无产阶级处于统一的党的领导之下，并领导着从农民中的半无产阶级起的农民群众。换句话说，工农民主联合只能看成是一种不成熟的、没有取得真正政权的形式，也就是一种倾向，但不是事实。要想进一步向夺取政权的方面发展，就必不可免地应该冲破民主的外壳，使得大多数农民必须跟着工人走，使无产阶级有实现阶级专政的机会，这样，在社会关系完全而十分急进地民主化的同时，就把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所有制所实行的纯粹社会主义的剥夺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了。谁在这种条件下还继续坚持“民主专政”

<sup>①</sup>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31页。——编者注

的公式，谁就是在事实上放弃了政权，而把革命引向一条死路。

其余一切问题所围绕着一个基本的争论问题是：要不要为政权而斗争？要不要夺取政权？这一点就已经表明，我们那时所面临的不是无关紧要的观点上的分歧，而是两种具有极大原则意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之一，即基本的倾向，是无产阶级的，并已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另一种倾向是“民主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最后使无产阶级政策服从于正在进行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在整个1917年中，每当遇到多少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两种倾向总要发生敌对的冲突。恰好在革命的时代，也就是在把党所积蓄的资本用来直接流通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揭开并实际暴露出这种分歧来。这两种倾向还将在所有其他各国的革命时期中不止一次地显露出来，只是程度或深或浅，形式有所差别而已。如果注意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根本之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用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教育、一种锻炼、一种组织；如果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改良主义的反对派活动，理解为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合法性的迁就，也就是理解为从实际上教育群众承认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动摇性，那么就会十分明白，甚至在共产党内部，在直接革命时期，当政权问题需要迫切解决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会极为明显、极为公开、极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要知道，共产党也并不是从历史熔炉中一下子铸炼出来的。

只是到了4月4日，也就是列宁来到彼得格勒以后，夺取政权的任务才提到党的面前来。但是，即使从那时候起，党的路线也还未具有完整的、一贯的、人人都无疑义的性质。虽然有了1917年四月会议的决议，可是反对革命路线的行动——有时暗地进行，有时公开进行——却一直贯穿着整个准备时期。

对于从二月到十月革命巩固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从其过

程上加以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实际意义。对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意见分歧,列宁在1910年曾称之为一种“先期行为”,即预兆。研究这些意见分歧,追本溯源,也就是说一直追溯到1903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例如追溯到“经济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想使这项研究具有意义,必须把这项研究进行彻底,并且要研究这种意见分歧受到决定性考验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时期。

限于现有的篇幅,我们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斗争的所有阶段都加以详尽研究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的出版物中有关我们党的发展的最重要时期的这个值得惋惜的空白弥补上,哪怕只能弥补一部分也好。

上面已经说过,意见分歧的中心是政权问题。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试金石,通过它可以确定一个革命政党(也不只是革命政党)的性质。与政权问题有密切关联的战争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被提出来并且获得了解决。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将根据最主要的纪年标志来进行: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初期、列宁回国以前党和党报的立场;以列宁提纲为中心的斗争;四月代表会议;七月事变后果;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问题(9月—10月);“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分歧意见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作出对共产国际其他政党同样也具有意义的结论。

## 反对战争和反对护国主义的斗争

1917年2月沙皇制度的推翻,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如果只在二月革命范围内来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

走向十月革命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只不过表明俄国已接近于譬如象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法国那种类型。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来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而看成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至宝。他们也就根据这一点,建立了革命护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所保卫的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革命”和“民主”。可是,在我们党内,革命的二月变革在初期也造成了政治前景的异常混乱。实际上,《真理报》在3月间对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立场比对于列宁的立场更接近。

我们在编辑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两军对峙的时候,如果建议其中一方放下武器各自回家,那就是最荒谬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什么和平政策,而是奴役政策。自由的人民对这种政策一定是气愤而鄙弃的。不,自由的人民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以枪还枪,以炮还炮。这是无庸争辩的。我们不应容许任何瓦解革命军事力量的行为。”<sup>①</sup>这里谈的不是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而是“自由的人民”,不是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自由的人民坚守“自己的岗位”。想法和说法都是彻头彻尾护国主义的!这篇文章接着又说:“我们的口号不是瓦解革命的和正在革命化的军队,不是空喊‘打倒战争’,我们的口号是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公开地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决然地尽力(!)说服(!)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以商讨停止世界大战的方法。而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压迫帝国主义政府,以便“劝说”它做好事,这是德国的考茨基和累德堡、法国的让·龙格、英国的麦克唐纳的纲领,但决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这篇文章最后不只“热烈欢迎”彼得格勒苏维埃那篇臭名远扬的宣言《告全世界人民书》(这篇宣言完全

<sup>①</sup> 《不要秘密外交》,载于《真理报》1917年3月15日第9号。——托洛茨基注

充满革命护国主义的精神),而且“高兴地”指出报社赞同彼得格勒两次群众大会作出的显然是护国主义的决议。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其中一项决议是这样讲的:“如果德奥两国的民主派不肯听取我们的呼声(也就是临时政府和妥协派苏维埃的“呼声”。——托洛茨基注),我们就要保卫我们的祖国到最后一滴血。”①

引用的这篇文章不是绝无仅有的。恰恰相反,它完全确凿地表明了列宁回国以前《真理报》的立场。例如,在第二天的一篇《论战争》的文章中,虽然对于《告全世界人民书》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同时却又说:“不能不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昨天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因为它号召他们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屠杀。”②可是究竟从哪条道路去寻求摆脱战争的出路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出路是压迫临时政府,要求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③

诸如此类的引文——隐蔽的护国主义的和伪装的妥协主义的——还可以举出不少。而就在这个时候,甚至早在一个星期以前,还没有离开自己苏黎世小屋的列宁就在自己的《远方来信》(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送到《真理报》)里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对护国主义和妥协主义表示让步的任何暗示。他通过资产阶级报纸电讯的歪曲报道,了解到革命运动的情况。他在3月8日(21日)的信中写道:“绝对不允许向自己和向人民隐瞒下面的事实:这个政府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它是英国资本的走狗,它要恢复君主制度和巩固地主资本家的统治。”④随后,在3月12日,他又写道:“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那无异于向妓院鸨母宣传行善积德。”⑤

① 《真理报》1917年3月15日第9号。——托洛茨基注

② 《真理报》1917年3月16日第10号。——托洛茨基注

③ 同上。——托洛茨基注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24页。信的日期应是1917年3月9日(22日)。——编者注

⑤ 同上,第342页。——编者注

正当《真理报》号召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它“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为和平而努力的时候，列宁写道：“建议古契柯夫一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缔结真诚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约，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甫’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慈爱待人，当左边吃了一记耳光时，就让人家再打他右边。”<sup>①</sup>

4月4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就开始坚决地反对《真理报》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他写道：“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要不可容忍地‘要求’这个资本家政府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因为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sup>②</sup> 妥协派3月14日发出的受到《真理报》极端恭维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列宁只称之为“臭名远扬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更是自然的事了。一方面号召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本国的银行家决裂，另一方面自己却同本国的银行家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极端的虚伪。列宁在一篇纲领草案中写道：“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从各方面‘逼迫’政府，赞成坚决‘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sup>③</sup>

说不定，乍一看到这种意见，会有人起来反驳：难道一个革命的政党可以不对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施加“压力”吗？当然，不可以。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是改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不拒绝改良。但是改良的道路对于次要的问题才有用，对于主要问题是不合用的。用改良的道路得不到政权。不能以施加“压力”的方法去迫使资产阶级在与它整个命运有关的问题上改变自己的政策。战争之所以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正由于它没有为改良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4页。——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4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53页。——编者注



主义的施加“压力”留下余地。要么，就一直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么，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以便从它手里夺取政权。在第一种场合下，可以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某一些内政上的好处，条件却是绝对支持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正因为这样，社会改良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公开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也正因为这样，真正革命分子才不得不着手创立新的国际。

《真理报》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而是民主护国主义的观点，尽管它的护国主义并不彻底。我们推翻了沙皇制度，我们正在对民主政权施加压力。这个政权必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如果德国民主派不能相应地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就要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和平的前途并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独立任务提出来的，这项任务工人阶级应当通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加以实现，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没有作为实际革命任务提出来。然而，这两件事却是彼此分不开的。

## 四月代表会议<sup>104</sup>

列宁在芬兰车站上所作的关于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说，对党的许多领导者来说，不啻是一颗炸弹。列宁同那些“完成民主革命”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第一天起就开始了。

发生尖锐冲突的起因是四月武装示威，在这次示威中曾喊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这种情况使得右翼的个别代表找到了借口，硬说列宁犯了布朗基主义<sup>21</sup>的错误。他们认为，要想推翻当时为苏维埃中大多数所支持的临时政府，好象只有避着大多数劳动者才能办到。从外表来看，这种责难象是不乏说服力的，但在实质上，在列宁的四月政策里，连一点布朗基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在

列宁看来，整个问题恰好在于：苏维埃还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反映着群众的真实情绪，党以苏维埃中大多数为依据是不是会落空。比原来预计“更左”的四月示威，是一种侦察性的出击。其目的是试探群众的情绪，以及群众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相互关系。试探所得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我们曾看到，列宁在5月初曾很严厉地约束喀琅施塔特的人，因为他们冒进了，他们曾声明不承认临时政府……而那些反对为政权而斗争的人，对问题却抱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申诉说：“在《真理报》第19号上，有的同志（显然是指列宁。——托洛茨基注）起先提出来一项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在这次危机以前就印好了。可是，随后这项口号被取消了，认为它有瓦解作用，认为它是冒险主义的。这表明，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次危机期间是学到了东西的。现在提出的决议案（就是列宁向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案。——托洛茨基注）又犯了这种错误……”这样提出问题，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列宁在作了试探以后，取消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但是只把它取消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取消的期限长短，要看群众憎恨妥协派的程度增长快慢而定。可是，反对派则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的暂时退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路线的意味。他的出发点并非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他的出发点只是群众在今天还不能够推翻临时政府。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工人阶级能在明天推翻临时政府。

党的整个四月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我们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去夺取政权，还是去协助（别人）完成民主革命。可惜的是：四月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可是，要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根本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能象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那样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非常而直接的作用。

列宁的立场是：对护国主义及护国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争取

苏维埃中的大多数；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革命的和平政策；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外世界革命的纲领。我们已经看到，反对派正与此相对立。反对派主张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办法来完成民主革命，同时苏维埃仍旧作为“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的机构。由此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对待护国主义的无比妥协的态度。

一个对列宁持反对立场的人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谈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把它当作我们力量的和政权的组织中心……它的名称就足以表明它是小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盟，它还面临着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那么，这个联盟就不可能存在了……而无产阶级就会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这个联盟……可是，既然现在我们承认这个苏维埃是力量的组织中心……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等到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政权就会真正转到无产阶级的手里。”（加米涅夫同志的发言）

这种说法的无可救药的公式主义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掌握政权的人不改换，“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日子永远也不会来到。上面所引用的发言漠视了革命的阶级核心：决定党的任务的依据不是阶级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而是革命的形式上的定义，即看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我们应该同小资产阶级联盟，对资产阶级政权实行监督，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为止。这个公式显然是孟什维主义的。学究式地用革命的名称（“资产阶级”革命）来限制革命的任务，那就不能不对临时政府采取监督的政策，不能不要求临时政府提出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等等。所谓完成民主革命，就是意味着通过立宪会议实行一系列的改良。同时，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中处于左翼

的地位。在这样的主张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完全失掉了实际内容。已故的诺根（也属于反对派）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清楚、最彻底、也最周到：“苏维埃的最重要的职能将在发展过程中消失。一系列行政方面的职能将移交给市政机关、地方自治局等等机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今后国家建设的发展，那么，我们不能否认今后要召开立宪会议，随着还要召开议会……这样一来，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就将逐渐消失。但这不是说，苏维埃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它仅仅是移交了职能。有苏维埃存在，我们就建立不起共和国-公社。”

最后，第三个反对派人物从俄国没有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吗？俄国在欧洲，是一个最小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指望群众同情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党既然抱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那它就只能变成一个宣传小组。社会革命的推动力一定要来自西方。”接着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会从什么地方升起呢？我认为，根据一切条件，根据居民的水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动权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客观条件。而在西方这个问题就能够提出来，大致就象我们能提出推翻沙皇制度的问题一样。”

并非所有反对列宁观点的人都在四月代表会议上作出了诺根那样的结论。但是，他们由于事物的逻辑发展，在几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前夕，都不得不接受这种结论。要么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就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当反对派——当时在我们党内的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十分明显，第二种立场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立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孟什维克不得不在二月革命以后取消的那个立场。在事实上，好多年来，孟什维主义啄木鸟就老在唠叨什么未来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

政府只能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不能担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任务，而应该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来“推动资产阶级向左转”。马尔丁诺夫对这个问题发挥得深刻到令人厌烦的地步。随着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来临，孟什维克很快就加入了政府。在他们全部“原则的”立场中所剩下来的，只有无产阶级不能染指政权这一个政治结论。但是，很显然，布尔什维克里面那些揭发孟什维克入阁的主张而同时自己又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人，事实上也走上了孟什维克在革命以前所采取的立场。

革命使得政治势力向两个方向发展：右派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成了共和派，这是形式上的向左转，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向右转。资产阶级社会企图以这样的办法来为自己建立一套维护政权、稳定性和秩序的新骨架。但是同时，正如孟什维克从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到庸俗的民主主义立场一样，布尔什维克右翼也转到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也就是孟什维克昨天的立场。

在战争问题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力量变化离合的情况。资产阶级除了少数的学究之外，都在有气无力地嘶叫不兼并不赔款。可是，不兼并的希望已经很小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齐美尔瓦尔德派虽然责难过法国社会主义者不该保卫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祖国，可是一当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有了地位，就立即成了护国派。他们是从消极的国际主义立场转上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右翼却采取了消极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就是为了民主和平，为了“不兼并，不赔款”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破灭了，进而分化为两种相反的观点：以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的保留条件为掩饰的民主观点和社会革命观点，即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列宁的观点。

## 七月事变, 科尔尼洛夫叛乱, 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

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给了党一个在原则上正确的立场。但是, 这些决议并没有消灭党内上层的意见分歧。恰恰相反, 随着局势的进展, 这些分歧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形式, 并且在革命的决定性时刻, 也就是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 达到了极为尖锐的地步。

依照列宁的动议打算在6月10日举行示威的意图受到那些原来对四月示威不满的同志的非难, 被说成是冒险主义。由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禁止, 6月10日的示威未能举行。但是到了6月18日, 党却得到了报复的机会: 由于妥协派相当粗心而发起的彼得格勒总示威, 几乎完全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下举行的。但是, 政府也企图捞一把: 在前线发起了一个轻率而愚蠢的进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列宁警告党不要轻举妄动。6月21日, 他在《真理报》上写道: “同志们, 现在发动是不适宜的。现在, 我们不得不度过我们革命中整整一个新的阶段。”<sup>①</sup> 但是七月事变到来了, 这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党内争论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七月运动中, 彼得格勒群众自动的出击起了决定的作用。然而, 毫无疑义, 列宁在7月里曾经反问过自己: 是不是时机已经到来了? 群众的情绪是不是超过了自已的苏维埃上层建筑? 沉醉于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我们, 会不会有落后于群众情绪的危险, 会不会

---

<sup>①</sup> 《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 《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1册第283页。《列宁全集》以后各版均未收此文。——编者注

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很可能在七月事变期间，个别的纯军事行动是根据一些同志的动议去搞的，这些同志诚心诚意地认为他们并没有违背列宁对时局的估计。列宁后来说过：“在七月里，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蠢事。”不过，在实质上，这一次也只是在运动的新的而且更高的阶段上进行一种新的而且是更为广泛的试探罢了。我们不得不退却，而且退却得很厉害。党既然准备举行起义和夺取政权，所以它和列宁一起，认为七月发动仅仅是一个插曲。在这个插曲中，我们为了深入地试探自己和敌人的力量，固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这个插曲却不能改变我们行动的总路线。恰恰相反，那些对夺取政权的政策抱反对态度的同志，必然认为七月插曲是一个有害的冒险。党内右派分子越发活跃起来。他们的批评更强硬了。反驳的口气也与此相适应地改变了。列宁写道：“所有这些叫苦、这些议论（说‘不应当’使群众完全正当的不满和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不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出的背弃革命的言论，就是小资产者惊慌失措的一般表现。”<sup>①</sup>当时用了“背弃”这个字眼，表现出意见分歧具有悲剧性质。后来，这个不吉利的字眼就愈来愈常见了。

对于政权问题和战争问题的机会主义态度，显然也决定了对于国际的相应的态度。右派曾经企图吸引党去参加社会爱国派的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sup>77</sup>。列宁在8月16日写道：“8月6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不能不引起忠实于自己的党、自己的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击。”<sup>②</sup>随后，当谈到什么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起革命的大旗这句话时，列宁又写道：“这是充满了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精神

---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19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31页。——编者注

的最空洞的豪言壮语。这是弥天大谎。不是革命的旗帜，而是勾结、妥协的旗帜，是赦免社会帝国主义者、让银行家谈判瓜分割地的旗帜，——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旗帜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sup>①</sup>

到斯德哥尔摩去的道路，实质上是到第二国际去的道路，正如参加预备议会是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去的道路一样。列宁主张抵制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正如后来主张抵制预备议会一样。在斗争的烈火中，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建立新的共产国际的任务。

早在4月10日，列宁就已经提出了改换党的名称的主张。他对于所有反对改换新名称的意见一一加以驳斥：“这种理由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苟且的理由。”他坚持地说：“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sup>②</sup>尽管如此，党内上层的反对依然很强烈。结果，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党才决定了改换新的名称，回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上去，而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整个俄国都脱掉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件肮脏的衬衫。列宁在整个1917年中的作用，在这一段改换党的名称的经过中得到极鲜明的表现。在最急剧的历史转折点上，他始终在党内进行紧张的斗争，为了明天而反对昨天。在“传统”的旗帜的掩护下进行反抗的昨天，其反抗有时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使局势产生对我们有利的急剧转变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暂时缓和了党内的意见分歧。但只是缓和，却没有消灭。在那些日子里，在右翼中出现一种倾向，就是要在保卫革命、特别是保卫祖国的基础上，同苏维埃中大多数接近。列宁于9月初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谈到这件事，他写道：“我深信，滚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上去的

---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33页。——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6页。——编者注



人<sup>①</sup>或堕落到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支持临时政府的人(象另外几个布尔什维克),都陷入了无原则的泥坑。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毫无原则的。只有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护国派。”随后又说:“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是无原则的。有人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并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主义’的泥坑,被事变的急流冲走了。”<sup>②</sup>

意见分歧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民主会议(9月14—22日)和由这个会议产生的预备议会(10月7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任务是: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去束缚布尔什维克,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合法地位转变为资产阶级议会的合法地位。右派是欢迎这种做法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听到过,他们是怎样描绘革命的未来发展的:苏维埃逐渐把自己的职务移交给相应的机构——移交给杜马、地方自治局、工会,最后是立宪会议,从而退出舞台。通过预备议会这条道路,就会把群众的政治思想从正在结束自己生命的“临时”机构苏维埃引开,而导至作为民主革命的具体完成的立宪会议。可是,那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是多数。我们在军队中的影响,不是天天地,而是时时地在增长。当时,已经不是预想的问题,已经不是前途的问题,而干脆是选择明天道路的问题。

完全筋疲力尽的妥协派,在民主会议上的行径是毫不足惜的卑鄙行为的表现。然而,我们提出的以示威形式退出民主会议这

① 从下面一句句子结构来看,这里显然提起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是脱落了。——托洛茨基注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77—278页。托洛茨基的这段引文引自《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第95页,《列宁全集》俄文第2、3、4、5版在“滚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上去的人”之后都加了“(象沃洛达尔斯基)”一句。——编者注

个显然是极其齷齪的地方的建议，遭到当时在上层依然有势力的党团中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成了抵制预备议会斗争的前奏。9月24日，也就是在民主会议以后，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为了不落入圈套，不让人们用这次会议来转移人民对重大问题的注意，本来应当采取抗议的形式退出会议的。”<sup>①</sup>

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辩论，尽管主题本身比较狭小，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实质上，这是右派的一种最广泛的、而且从外表来看很得手的把戏，企图把党转到“完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看来，这次辩论没有作速记记录，至少是没有把记录保存下来。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连秘书的记事也没有发现过。本书的编辑在我个人的文件中找到一些极不完全的资料。加米涅夫同志发挥了一种论证，后来这种论证构成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党组织的那封著名的信（10月11日发出的）的内容，其措词则更为尖锐和明确。诺根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最原则的：抵制预备议会是号召起义，也就是重演七月事变。有些同志则以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策略的一般理由作为出发点。他们大致是说：“没有人敢于提议抵制议会，但是有人向我们提议抵制这样的机关，仅仅是因为它的名称是预备议会罢了。”

右派的基本观点在于：革命必不可免地要从苏维埃引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而“议会”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自然环节。我们既然要在议会中占据左方的议席，我们就没有道理拒绝参加预备议会。要完成民主革命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可是怎样准备呢？就是经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所学校。要知道，先进的国家要显示给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据他们设想，推翻沙皇制度要用革命手段，事实发生经过也正是如此；但是无产阶级夺取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页。——编者注

政权却要在完成了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延续许多年的民主制度。为了参加预备议会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使工人运动“西欧化”、尽快把工人运动纳入民主的“争取政权斗争”的轨道即社会民主党的轨道的斗争。民主会议中的党团，其人数在百名以上，与党的代表大会毫无不同之处，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党团中的大半都表示赞成参加预备议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心了，而从那个时候起，列宁也就当真不断地敲起警钟来。

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写道：“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就成了不可救药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称自己为议会，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sup>①</sup>从列宁的许多讲话中，尤其是从他9月29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来估价参加或不参加预备议会的意义的。他在信里指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是布尔什维克不可容忍的错误”<sup>②</sup>。在他看来，这种决定依然是那些民主幻想和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而他正是在反对这两种表现的斗争中，发挥了并磨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说什么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许多年的时间，这是不对的。说什么议会制度是准备夺取政权的唯一的或基本的或必经的学校，这是不对的。说什么取得政权的道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这些说法都是纯粹的抽象词句，都是学究式的死套子，它们的政治作用只有一个：束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脚，并利用“民主的”国家机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80页。——编者注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67页。——编者注

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的政治影子，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不能按照学究式的死套子指导无产阶级政策，而应该根据阶级斗争的现实道路。不应参加预备议会，而应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其余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列宁甚至曾提议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提出抵制预备议会作为政纲。自此以后，他的所有书信和论文都集中于一点：决不通过预备议会去做妥协派的“革命”尾巴，而要走上街头，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 十月革命前后

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必要没有了。列宁的压力保证中央委员会和预备议会党团中的势力产生了必要的左倾。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由于把一部分带有布尔什维克情绪的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问题而发生了冲突。10月16日，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个合法的苏维埃起义机关。党内的右翼企图牵制事态的发展。党内不同倾向的斗争，正如国内阶级斗争一样，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右派的立场最充分地并且最根本地表现在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署名的那封《论时局》<sup>①</sup>的信里。这封信是在10月11日即在革命前两个星期写好的，并且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信中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这封信警告人们不要低估敌人的力量，其实这封信却离奇地低估了革命的力量，甚至否认群众有战斗情绪（是在10月25日以前两个星期啊！）。信里说：“我们深信，

---

① 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7—92页。——编者注。

目前宣布武装起义，这不只是拿我们党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而且也是拿俄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可是，如果不起义，也不夺取政权，那该怎么办呢？这封信也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军队、通过工人拿起手枪对准着资产阶级的脑袋。”可是，资产阶级不会由于这支手枪而去取消立宪会议呀。信里又说：“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我们党的机会是很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在增长……只要政策正确，我们能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这样看来，这封信就公开采取了在资产阶级立宪会议中起“有影响的”反对派作用的路线。这种纯粹社会民主党的路线，似乎是用下面的道理来加以掩饰的：“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消灭……立宪会议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为了说明右派的整个路线，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立宪会议加苏维埃的“联合的”国家机关的理论，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后，又被德国的鲁道夫·希法亭重加运用了，因为他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位奥地利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不晓得自己原来是个剽窃者。

《论时局》这封信不认为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它用纯粹议会的观点来估价这种大多数。信里说：“俄国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绝大部分士兵也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比如，我们大家都深信，如果现在情况发展到选举立宪会议，那么，农民中大多数将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偶然的吗？”这种问题提法中有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错误，其原因这是由于不了解农民可以有重大的革命利益，并且极为迫切地要求加以满足，但农民却不能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他们要么通过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革命党去投资产阶级的票，要么就真正靠拢无产阶级。这两种可能之中，哪一种能实现，正是决定于我们所采

取的政策。假使我们加入预备议会，以便在立宪会议中产生反对派的影响（“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那么，我们就会几乎是机械地把农民放在那种地位上，也就是使他们必然要通过立宪会议的道路去寻求满足自己的利益，因而也就不是通过反对派，而是通过立宪会议中的多数去寻求满足自己的利益。与此相反，假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就会立刻为农民反对地主和官吏的斗争造成一种革命局势。如果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流行的字眼来说，那么，这封信既低估了同时又高估了农民：低估了的是他们的革命可能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而高估了的则是他们的政治独立性。这种同时低估又高估农民的双重错误，也是由于低估了本阶级和它的党，也就是用社会民主党的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这里丝毫没有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所有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是错误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可能性。

这封信反对夺取政权，并以革命战争的前景来吓唬党。信里说：“士兵群众支持我们，不是为了战争的口号，而是为了和平的口号……假定我们现在独自夺得政权以后，由于整个世界局势而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诚然，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士兵会和我们留在一道。但是，士兵群众是要离开我们的。”这一论断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张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基本理由。然而，这些理由在这里却是拿来反对夺取政权的。显而易见，《论时局》这封信所表现的立场，使那些拥护这封信里的观点的人非常轻易地接受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我们在这里还要重复一下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关于这个问题所讲过的话：表现列宁政治天才的，不是孤立地来看待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暂时屈服，而是要把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结合起来看。这一点不要忘记。

工人阶级是在始终认为敌人比自己占优势这种意识中进行斗

争并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表现出来。敌人手里有财富、政权、一切思想压迫手段和一切镇压工具。经常认为敌人比我们占优势，这是准备时期革命政党的整个生活和工作的组成部分。每次，由于行动的不慎或时机未到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最无情地使我们联想到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认为敌人比我们强的习惯，现在正在变成胜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今天的软弱，似乎为他昨天的强大所掩盖了。“你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所有反对武装起义的派别分子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胜利前两个星期，我们的一些反对起义的人写道：“凡是不愿意空口侈谈起义的人，必须冷静地权衡一下起义的得失。在这里，我们认为有责任指出，在当前时机中，最有害的是低估敌人的力量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要比他们所显露出来的大。彼得格勒起着决定作用。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敌人正是在彼得格勒积聚有庞大的力量：五千名士官生，他们武装精良、组织严密，他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甘心而且善于作战；又有司令部，又有突击队，又有哥萨克，又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又有以扇形配置在彼得格勒四周的很大一部分炮兵。另外，敌人一定要借助利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法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sup>①</sup>

既然在国内战争中问题不在于简单地计算军队的营数，而在于预先估计他们的觉悟程度，那么，不言而喻，上面那种计算永远也不会十分可靠和确实的。甚至连列宁也认为敌人在彼得格勒力量强大，因而提议从莫斯科开始起义。据他预计，起义可以在莫斯科不流血地进行。这种个别的预计错误，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比较正确的是：应该根据比较不顺利的情况来决定方针。可是，我们在当前场合下要注意的是下面这

<sup>①</sup> 《论时局》。——托洛茨基注

个事实：在敌人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有人却离奇地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完全歪曲了各种比例。

正如德国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当起义的口号对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来说，主要（即使不说非常）具有宣传鼓动意义的时候，他们干脆就忽视了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个问题（国防军、法西斯队伍、警察）。他们以为，不断增长的革命潮流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军事问题。可是，一当起义的任务被提到他们面前并急待解决的时候，那些本来认为敌人武装力量似乎不存在的同志们，又立即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们相信了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一切数字，仔细地把它们同国防军和警察的兵力加在一起，然后把总数四舍五入地算成整数（达五十万以上），结果就变成一支全副武装、实力雄厚的军队，完全足以打败他们本身的努力。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比我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无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组织上和训练上也要强一些。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们的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阶级占压倒的多数。在我们这里，问题决定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在德国，则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中心点同时发动起义。从这一点来看，敌人的武装力量完全不象四舍五入的计数结果那样可怕。无论如何，应该坚决地驳斥那种别有用心心的计算，为了证明导致失败的政策之正确，这种计算在德国的十月失败之后是一直在进行的。在这方面，我们俄国的实例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在彼得格勒没有经过流血而赢得胜利前两个星期——我们本可以提前两个星期赢得这个胜利的——，党内有经验的政治家就认为，与我们敌对的有甘心而且善于作战的士官生、有突击队员、有哥萨克、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有配置成扇形的炮兵、有从前线调回来的军队。而在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现在不妨作这样的设想：反对起义的人在党内和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取



得了胜利。指挥机关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不是列宁向全党控诉了中央委员会，指出它打算做些什么，而且指出它无疑会做得很如意，那么革命早就注定失败了。可是，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党在相应的条件下都能有一位列宁啊……不难设想，如果反对战斗的路线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了上风，历史又会怎样写呢。官方的历史家自然要这样来描写史实：1917年10月的起义完完全全是一桩蠢事，而且会给读者写出一堆关于士官生、哥萨克、突击队员、配置成扇形的炮兵、从前线调回来的军团等等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这些兵力，不经起义的烈火检验，看上去要比实际可怕得多。这就是每个革命者必须铭记在心的一条教训！

在9至10月间，列宁之所以坚决地、不倦地、不放松地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是由于他经常担心我们会放过时机。右派回答说：这是多虑，我们的影响将一再增长。谁对呢？而且，放过时机又是意味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要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积极的、富有战略性的、完全实际的估计，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完全浸透了宿命论精神的估计是极其分明地相冲突的。放过时机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在力量对比变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候，才是起义最有利的局势。这里所指的自然是意识方面的、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力量对比，而并非指经济基础，因为，在整个革命时期，基础可以看成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在社会的同样的阶级分化情况下，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以下列各种因素为转移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他们的幻想的破灭；他们的政治经验的积累；中间阶级和集团对国家政权信任心的动摇；以及国家政权自信心的减弱。在革命中这都是一些瞬息万变的过程。全部策略艺术正在于抓住那个各种条件配合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科尔尼洛夫叛乱完全准备了这些条件。对苏维埃中占多数地位的各党失掉

信任的群众，亲眼看出了反革命的危險。他们认为，现在得通过布尔什维克去寻找出路了。国家政权的自然垮台也好，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急迫而有所要求的自发信任也好，都是不能经久的。危机必须解决，不是向这方面解决，就是向那方面解决。列宁一再说：现在或者永远不！

右派对这一点提出反驳说：“……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问题，用‘现在或者永远不’这种提法，是严重的历史错误。不！无产阶级的党将要增长，它的纲领将为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所了解……它只要用一种方法就会断送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在当前情况下起义……我们要对这种危險的政策提出警告。”<sup>①</sup>

这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需要极其细致地加以研究。它既不是一个民族所专有的，也不是某个个人所独具的。刚好在去年，我们在德国也看到了同样的倾向。实质上，在这个等待主义的宿命论下面隐藏着犹豫不决甚至是行动无能，只不过用下面这种安慰人的预言作掩饰而已：我们的影响会愈来愈大，愈往后我们的力量就愈增强。这是最要不得的蒙混！革命政党的力量只增长到一定的时刻，在此以后，过程就会转到自己的反面：由于党的消极被动，群众的希望就会被失望所代替，而敌人在这时就会从惊慌失措之中稳定下来，并且会利用群众的失望情绪。1923年10月，我们在德国看到了这种起决定作用的转折。1917年秋天，在我们俄国，差不多也有类似这样的转折。只差几个星期的时间。列宁说得对：“现在或者永远不！”

起义的反对者，搬出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一条理由：“但是决定性的问题在于：首都的工人和士兵是否真正有那样的情绪，即认为只有巷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主动地冲向街头。不是

---

<sup>①</sup> 《论时局》。——托洛茨基注

的，没有这样的情绪……首都广大贫苦群众如果有冲向街头的战斗情绪，他们所发动的起义就保证能把那些最大的、最重要的、然而我党在其中的影响很薄弱的组织（铁路工会和邮电工会等等）带动起来。可是，即使在工厂和兵营里也没有这样的情绪，因此要在这上面打什么算盘，那就是自欺。”<sup>①</sup>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党的领导同志，他们正是以群众不愿战斗为借口来解释去年的不战而退的，那么，上面这几句写于10月11日的话就具有非常而十分迫切的意义了。不错，问题的关键正在于：一般说来，起义的胜利只有在这样的時候最有保证，即群众可能取得足够的经验，不至于轻率地投入战斗，并且能够等待和要求坚决的有本领的战斗领导。临到1917年10月，工人群众，至少是他们的领导阶层，根据四月示威、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事件的经验，已经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今后不再是个别的、自发的抗议的问题，不再是试探的问题，而是进行决定性的起义以夺取政权的问题。与此相适应，群众的情绪更为集中，更为尖锐，更为深刻。从兴奋的、充满幻想的自发状态转到更为尖锐的自觉状态，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革命的意外阻碍。群众情绪中这种前进中的危机，只能以党的相应的政策来克服，这首先就是指党真正去准备无产阶级的起义并且善于加以领导。与此相反，党虽然长期进行了革命宣传鼓动，使群众摆脱了妥协派的影响，但是，后来当由于这些群众的信任而被拥到应有的地位的时候，却开始动摇起来，自作聪明，要花招和消极等待。这样的党会麻痹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失望和瓦解，从而把革命断送掉，可是它却为自己找好借口，在失败之后把责任都推到群众不够积极上面去。《论时局》这封信正是要使人走上这一条道路。幸而我们的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决消除

<sup>①</sup> 《论时局》。——托洛茨基注

了党内上层的这种情绪。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党才胜利地完成了革命。

\* \* \*

现在，我们说明了与准备十月革命有关的一些政治问题的实质，并且尽量阐述了在这种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意见分歧的基本意义，然后我们还要哪怕是简略地讲一下最后几个星期中，也就是决定性的几个星期中，党内斗争最重要的因素。

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10月11日，把上面分析过的那封信《论时局》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10月18日，也就是革命的前一个星期，在《新生活报》<sup>105</sup>上刊出了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信里说：“不只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而且还有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都认为，在当前时机中，在当前力量对比中，不顾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在它开会的前几天来发起武装起义，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置无产阶级和革命于死地的步骤。”<sup>①</sup> 10月25日，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11月4日，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会议，并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由苏维埃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他们写道：“……不这样，那就只有一条路了：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纯粹布尔什维主义政府。”当时，在另一份文件里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对中央委员会这项毁灭自己的政策负责。这项政策违反绝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意志，因为工人和士兵都渴望尽快停止民主派各个部分之间的流血。因此，我们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以便有权公开对工人和士兵说明自己的意见，并号召他们拥护我们的口号：‘苏维埃各党派组成的政府万岁！立即在这种条件下妥协！’”<sup>②</sup> 可见，那些本来把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看成冒险而

<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年10月18日第156号。——托洛茨基注

<sup>②</sup> 《十月革命》，《革命文库》1917年第407—410页。——托洛茨基注

加以反对的人，在起义胜利完成后又主张把政权交还给那些无产阶级与之进行了斗争才夺取到政权的党派。到底为什么胜利了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定要把政权交还给——他们所谈的正是交还政权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呢？反对派对这一点的回答是：“我们认为，组成这样的政府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防止今后流血，防止即将来临的饥饿，防止卡列金之流扑灭革命，保证在规定期间召开立宪会议，并切实执行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纲领。”<sup>①</sup> 换句话说，他们的用意是要通过苏维埃的大门，寻求通往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如果革命拒绝通过预备议会，而为自己打通了一条经过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么，反对派所制定的任务就是要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协助下把革命从专政下解救出来，把它引上资产阶级制度的道路。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取消十月革命。自然，在这种条件下是谈不上什么妥协的。

在第二天，11月5日，又公布了一封同样方针的信：“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违反理智、不顾自然趋势、不肯承认客观条件的时候，我为了维护党的纪律，不甘缄默，因为这些客观条件正迫使我们在崩溃的威胁下，去同所有社会主义党派妥协……为了维护党的纪律，我不能醉心于个人迷信，也不能以某人是否参加内阁来决定是否在政治上同那些支持我们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党派妥协，并且不能为此再延长哪怕是一分钟的流血。”<sup>②</sup> 最后，写信的人（洛佐夫斯基）提出，必须争取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下面这一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它将完全走上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

<sup>①</sup> 《十月革命》，《革命文库》1917年第407—410页。——托洛茨基注

<sup>②</sup> 《工人报》1917年11月5日第204号。——托洛茨基注

点的道路。”<sup>①</sup>

局势真的象是无望了。不仅资产阶级和地主，不仅那些还掌握有许多上层组织（全俄铁总执委会、军队委员会、国家职员等）的所谓“革命民主派”，甚至还有我们党内一些极有影响的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也都大声疾呼地谴责党要想继续掌握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纲领的企图。可是，我们却要说：如果只从表面上而不深入去观察，那么，局势可能被看成是绝望的。应该如何办呢？接受反对派的要求，等于取消十月革命。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呢。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依靠群众的革命意志前进。11月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党中央委员会有决定意义的声明。这项声明是列宁写的。它充满真实的革命热诚。它的内容明白、简炼而确切。它是写给党员群众看的。这项声明打消了任何一种对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今后政策所抱的怀疑情绪：“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被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吓倒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象一个人，屹立不动地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sup>②</sup>

最尖锐的党内危机被克服了，但是内部斗争还依然没有停止。斗争的路线仍旧未变。但是斗争的政治意义却愈来愈小了。关于这一点，12月12日乌里茨基在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召开立宪会议的报告，就是一个非常有兴味的证明。他说：“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并不新鲜。这还是早先在起义问题上所表现出

---

① 《工人报》1917年11月5日第204号。——托洛茨基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71页。——编者注

来的那条路线。现在，有些同志把立宪会议看成是一种应该用以完成革命的手段。他们抱着循规蹈矩的态度，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该背礼等等。他们反对那些担任立宪会议议员的布尔什维克去监督会议的召集工作、力量对比等等。他们纯粹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可以利用从这种监督得来的资料去判明立宪会议周围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才可以确定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现在我们所持的观点，是为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可是，那些为数无几的同志却以为我们是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又应该以立宪会议来完成。”

立宪会议的解散，不仅可以看作是俄国历史中一个大的段落的告成，而且可以看作是我们党史上一个相当大的段落的告成。无产阶级的党在克服了党内的反抗以后，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把政权保持在自己的手里。

##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

在9月里，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要求直接转入起义。他说：“既然要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么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保罗要塞，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向市中心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战，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当然，这不过是大概地谈谈，以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期不象对待

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忠于革命。”<sup>①</sup>

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本来打算通过党的途径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随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项胜利。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起义被引上苏维埃的道路，而且在宣传上把它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这次发生的意见分歧需要详细阐明，这样，这次意见分歧就自然不会属于原则问题的范围，而属于纯粹技术问题的范围，尽管这个技术问题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前面已经谈过，列宁对于拖延起义是十分担心的。由于党的上层曾经表现过动摇，所以那种在形式上把革命同即将举行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宣传，在列宁看来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延期，一种对犹豫不决态度的让步，一种对犹豫不决分子的让步，一种对时机的放过，一种直接的罪行。从9月底起，列宁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9月29日，列宁写道：“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领导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sup>②</sup>10月初，列宁写道：“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要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要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sup>③</sup>10月8日列宁在为彼得格勒代表会议所写的提纲中说，“必须打破立宪幻想，打破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所抱的希望，抛弃那种认为一定要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偏见”<sup>④</sup>等等。最后，10月24日，列宁写道：“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接着他又写道：

---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82—283页。——编者注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65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2—123页。——编者注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6页。——编者注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sup>①</sup>

所有这些信件，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在革命的钢砧上锤炼出来的，对于说明列宁和估计时机具有特殊的意义。贯穿这些信件的基本思想就是不满、反对、愤恨那种对待革命的宿命论的、等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态度，那种把革命看成为没完没了的事情的态度。如果一般地说时间是政治的重要因素，那么，时间在战争中和革命中的作用将增长百倍。可以在今天做的事就完全不一定也都可以在明天做。今天可以起义、打倒敌人、夺取政权，而明天就会不可以。要知道，夺取政权就是扭转历史的舵把。有人会问，这种行动可以用二十四小时这样一段时间就能决定吗？是的，可以的。当局势已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时候，行动就已经再不能用政治的长尺来衡量，而是要用战争的短尺来衡量了。放过几个星期、几天、有时甚至一天，在一定的条件下，就等于出卖革命，等于投降。如果列宁不这样担心，不施加这种压力，不提出这种批评，不这样激烈地、满怀革命热诚地对一些人表示不信任，那么，党或许就不能在决定性的时机中整顿好自己的阵线，因为当时党内上层的反抗非常剧烈，而司令部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国内战争中是起很大作用的。

但同时十分明显的是：在准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掩护下，并且在保卫这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来准备和举行起义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好处。自从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执行克伦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命令时起，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未能估计到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据我的记忆，在他当时所有的信件中，对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4、215页。——编者注

于这种情况就没有提到一个字。可是，当我们反对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16日），向所有部队和机关派出自己的委员，从而不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时候，10月25日起义的结局已经预先决定了至少四分之三。实质上，我们当时进行的就是武装起义，这是彼得格勒团队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尽管是不流血的），它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并且在准备保卫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进行的，而这次代表大会正应该决定关于政权的命运问题。列宁本来建议在莫斯科开始起义，据他估计在那里可以保证不流血而赢得胜利，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他当时处于地下，没有可能估计到自从10月中旬最初几天首都卫戍部队“平静地”起义以后，所有士官和军官已经不只在情绪上，而且也在组织关系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从营队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拒绝离开首都而且当真没有离开的时候起，我们在首都的起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只不过表面上还稍微留着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式的残余罢了。10月25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进行得才很顺利。与此相反，在莫斯科进行的斗争则具有较为持久和流血的性质，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已经建立起了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十分明显，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开始起义，那么，这个起义必不可免地将具有更为持久的性质，而且它的结局也是极其没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败势将严重地影响彼得格勒。当然，即使走这条路也决不是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起义实际上所走的那条路，却是更经济得多，更有利得多，更成功得多。

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只不过因为“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武装起义——至少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即使不是十分之九

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实了。我们把这次起义称为“合法的”，是指它是从两个政权并存的“正常”条件中产生的。当妥协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苏维埃检查或纠正政府决议的事。这种做法，似乎成了以克伦斯基执政之名写入史册的那个制度的宪法中的一项规定。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握政权以后，只是继续了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

我们没有用苏维埃宪法的幻想去麻痹群众。因为我们是在争取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把革命军队争取过来，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敌人——妥协派引入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圈套，而且其效果比预期的更大。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革命中使用诡计，总是危险的。说不定骗不了敌人反而使跟着你走的群众堕入迷途。如果说我们那次“诡计”百分之百地成功了，那并不是因为这种诡计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们故意想出来的，而是因为它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及其出现的严重矛盾自然造成的。临时政府想摆脱卫戍部队。兵士却不愿意到前线去。我们使这种自然的不愿情绪带上政治色彩、具有革命目的，并使之披上“合法”外衣。这样，我们就保证了卫戍部队内部非常一致，并且把卫戍部队同彼得格勒的工人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我们的敌人由于处境濒于绝望、思想陷于混乱反而情愿把苏维埃的外衣看作是真情实况。既然他们想受骗，我们也就足足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同妥协派之间进行了争取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斗争。在群众的意识中，政权的源泉是苏维埃。克伦斯基、策烈铁里、斯柯别列夫都是从苏维埃出来的。我们也是以我们那个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基本口号而同苏维埃紧密地联系着的。资产阶级从国家杜马接受政权。妥协派从苏维埃接受政权，为的是使苏维埃趋于消灭。我们也是从苏维埃接受政权，却为的是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妥协派还没有中断苏维埃的继承性，就赶忙架起一座由苏维埃到议会制度的桥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召开了民主会议并组成了预备议会。苏维埃参加预备议会似乎等于是批准了这种路线。妥协派企图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做钓钩，去捕捉革命，以便在捉到以后把它拖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

不过，我们也同样注意利用苏维埃合法地位。在民主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迫使妥协派同意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他们既然不放弃苏维埃合法地位，他们就不能反对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看到，这次代表大会，从它的组成来看，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更为坚决地推崇这次代表大会，把它看作是国家的主宰，并且把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拥护和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使之不受反革命的必不可免的攻击这一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说，妥协派是通过从苏维埃产生出来的预备议会以苏维埃合法地位来对付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也是以同样的苏维埃合法地位去对付他们，但却通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这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个口号下先作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由此看来，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不是天真地希望代表大会本身当真能解决政权问题。我们根本不存在这种对苏维埃形式的偶像崇拜心理。

夺取政权的一切必要的工作，不仅是政治工作，而且也包括组织工作和军事技术工作，都是全面地展开的。但是仍旧是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个借口作为进行这些工作的合法外衣，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政权问题。尽管我们在全线进行进攻，可是却保持着防守的假象。恰恰相反，临时政府——如果它当真决心认真防守的话——则势必攻击苏维埃代表大会，禁止它的召开，从而使对方抓到一个对临时政府最为不利的理由去进行武装起义。此外，我们不只使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处境不利，而且干脆麻痹了它那本来已经迟钝的思想。这些人当真相信，我们所致力的是苏维埃议会制，是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通过一项关于政权的新决议，——发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决议的精神，——然后，政府就可以拿预备议会和即将举行的立宪会议作为借口来拒绝这项决议，从而使我们陷于尴尬的地位。最聪明的小市民才子们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设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克伦斯基笔下找到确切无疑的证明。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10月24日半夜他如何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唐恩和另外几个人很激烈地争论当时已经全面展开了的起义。克伦斯基写道：“首先，唐恩对我说，他们对情况的了解比我清楚得多。他说，我是受了我的‘反动司令部’报告的影响而把事态夸大了。随后，他又说，共和国苏维埃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尽管有伤‘政府的自尊心’，却非常有用处，而且对于‘转变群众情绪’十分重要。他说，这项决议的效果‘已经产生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将‘很快地缩小’。据他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领袖们谈判的时候，曾表示情愿‘服从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他们准备‘明天就立即’采取一切方法去扑灭那个‘违反他们愿望并且未经他们批准而爆发起来的’起义。最后，唐恩先提到布尔什维克‘明天就立即’（都是明天！）解散自己的军事司令部，跟着就告诉我说，我所采取

的压制起义的一切办法，只会‘刺激群众’，而且，一般说来，我这种‘干涉’只会‘妨碍苏维埃中大多数的代表顺利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消灭起义的谈判’。……为了能充分说明当时的情况，必须补充的是：正好在唐恩向我做这种得意的报告的时候，‘赤卫队’的武装队伍已经把政府机关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了。而且几乎恰好在唐恩和他的几位同志离开冬宫的时候，宗教部长卡尔塔舍夫从临时政府开完会回家，在百万大街被逮捕了，并立即被押送到斯莫尔尼宫。而唐恩也正要回到斯莫尔尼宫去同布尔什维克继续和平谈判。必须承认，当时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有很魄力，而且手腕也不低。在起义已经热火朝天，而‘红军’已经在全城行动起来的时候，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很成功地设法使得‘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陷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境地。这些手腕高超的人，整夜在无休无止地争论着各式各样的方案，好象必须用这些方案作为调解和消灭起义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利用这种‘谈判’的方法，使自己赢得了大量的时间。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战斗力量却没有及时地动员起来。这正是需要证明的！”<sup>①</sup>

的确，这正是需要证明的！从上面这种情况来看，妥协派完全和彻底地上了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当。克伦斯基猜想，好象有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故意以即将消灭起义为辞，去迷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积极参与谈判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确实打算消灭起义，并且很相信各党派协商成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政府的形式。可是，在客观上，这些谈判使者却毫无疑义地对起义有一定的功绩，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幻想培养了敌人的幻想。然而，他们之所以对革命有这样的功绩，则完全由于党不顾他们的劝阻和警告而勇往直前地把起义引导到彻底的胜利。

<sup>①</sup> 克伦斯基《久远的回忆》第197—198页。——托洛茨基注

要使这样一次广泛的迷惑战术获得胜利，必须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完全异常的情况的配合。首先，必须有不愿继续作战的军队。假使到革命时期我们没有一支破碎的、怀着怨望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军队，那么，革命的整个进程，特别是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即从2月到10月，将会呈现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行的试探才能成功，而这次试探也就预先决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一种使“不成熟的”和几乎不被察觉的起义同保卫苏维埃合法地位不受科尔尼洛夫分子破坏的特殊的结合，但要把这种结合升华为一种规律，那是谈不到的。恰恰相反，可以肯定地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会再原封不动地重复这一经验。但是，仔细地研究它还是必要的。通过研究，可以开阔每个革命者的眼界，使他懂得：在明确提出任务、正确估计局势、具有斗争到底决心的条件下，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可资运用的。

莫斯科的起义具有比较持久的性质，而牺牲也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莫斯科的卫戍部队没有能够象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那样由于调往前线的问题而受到革命的锻炼。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说一下，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是分为两步进行的。第一步在10月上半月。那时，彼得格勒团队服从苏维埃所制定的完全符合他们自己心情的决议，顺利地拒绝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第二步在10月25日。这时所需要的只是一种不大的补充性质的起义，以剪断二月政权的脐带。至于莫斯科的起义，则是一步进行的。这也许就是它具有持久性质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不够坚决。我们看到，在莫斯科曾经由军事行动转为谈判，然后，再由谈判转到武装斗争。如果说，那种能使被领导者的情绪受到影响的领导者的动摇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话，那么，在武装起义的条件下这种动摇就有致命的危险。

统治阶级已经对自己的力量失掉信心(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指望胜利),但是,国家机器依然在他们手里。革命阶级的任务是掌握国家机器。为了这个目的,革命阶级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党既然把劳动者引上起义的道路,就应该由此作出必要的结论。“打仗就要有打仗的样子”:在战争中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不容许动摇和错过时机。战争是用短尺来衡量的。踏步不前,哪怕是几小时的时间,也会使统治者恢复一部分自信心,而使起义者失掉一部分自信心。可是,要知道,正是这一点直接决定对起义结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对比。必须用这种观点一步一步地联系政治领导去研究莫斯科军事行动的进程。

国内战争在有些地方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比方说,在那里,由于民族因素,战争往往出现一些复杂情况,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仔细分析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研究,一定能大大地丰富我们对国内战争一套办法的概念,从而使我们易于归纳出一些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方法、规则和方式,把它们列为一种国内战争的“条令”<sup>①</sup>。但是在通过这一研究作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时,我们首先可以说,外省国内战争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彼得格勒国内战争的结局所预先决定了的,尽管在莫斯科发生了意外的阻延。二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临时政府把它承继下来,却没有能力把它更新或加强。结果,2月和10月之间的国家机器仅仅起了官僚主义惰性的残余的作用。外省的官僚习惯于向彼得格勒看齐,他们在2月这样做了,在10月又是这样做了。使我们占了很大便宜的是:我们为推翻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完满建成的政治制度是作了准备的。“二月”国家机器的极端不稳定和缺乏自信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工作,使革命群众和党本身增加了自信心。

<sup>①</sup> 参见托洛茨基《国内战争问题》,载于《真理报》1924年9月6日第202号。——托洛茨基注



德国和奥地利在1918年10月19日以后，也产生了与此相同的情况。但是，在那里，社会民主党弥补了国家机器的缺陷，从而帮着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这个制度到现在绝不能称为稳定的范例，然而，它自产生以来，毕竟已经存在六年了。至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不会有这种优越性，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会离得这样近。他们的二月革命已经远远落在后面了。诚然，在英国还保留有不少封建残余，但是在英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国内的君主制、贵族等等要到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一扫而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将是完全建成的资产阶级国家。但这还不是说，将是稳定了的国家机器，因为无产阶级起义的可能性本身是以资本主义国家解体的极为深刻的过程为前提的。如果说，我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同一个在二月革命以后还没有来得及完满建成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展开的话，那么，在其他国家里，起义的对象将是一个正处于逐渐解体状态中的国家机器。

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设想，——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已经讲过这一点，——在各个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抵抗力量通常要比在我国大得多，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比较困难，但是，只要它取得政权，就能保证它立即有一个比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第二天所有的稳定得多并巩固得多的地位。我们的国内战争只是当无产阶级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夺得政权以后才算真正展开，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的头三年还延续着。许多情况都说明，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可是，一旦取得政权，则无产阶级的行动将无比地更为自由。当然，这种对未来的设想是有条件的。它将大都决定于欧洲各国革命发生的顺序，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当时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等。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基本的和在我们看来是无可争辩的意见是：在

欧洲和美洲，夺取政权这一行动本身将遭遇到比起我国来要大得多、严重得多、顽强得多、并有计划得多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抵抗。因而，就更要求我们在事实上把武装起义（一般地说是把国内战争）当作一种艺术来看待了。

##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

无论在1905年还是在1917年，我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是从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它是这个运动在一定斗争水平上的自然的组织形式。但是，对于欧洲年轻的党来说，由于它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苏维埃当作一种“学说”、一种“主义”来接受，所以经常有把苏维埃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危险，有把苏维埃当作一种革命的独立自主在因素的危险。然而，尽管苏维埃作为一种夺取政权的组织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却完全可以产生另外一种情况，即起义可以在其他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展开（工厂委员会、工会等），而仅仅在起义过程中，或者甚至在起义胜利后才产生苏维埃，而这时它已经是政权机关了。

从这种观点出发，列宁在七月事变以后所开始进行的那种反对对苏维埃组织作偶像崇拜的斗争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在7月中成了公开驱使士兵进攻并压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所以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可以而且必须为自己寻找另外的道路。列宁曾提出以工厂委员会作为夺取政权的组织（例如，可参看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回忆录）。如果不是科尔尼洛夫叛乱迫使妥协派的苏维埃趋于自卫，并使布尔什维克有可能通过苏维埃左翼即布尔什维克一翼把苏维埃同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因而重新鼓舞起苏维埃中的革命生活的话，运动很可

能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

正如德国不久以前的经验所表明，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在德国建立了好几次苏维埃：作为起义机关，却没有起义；作为政权机关，却没有政权。结果在1923年广大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就开始围绕着工厂委员会集结起来。而工厂委员会基本上执行了我国苏维埃在直接夺取政权以前那个时期中所担负的一切职能。当时，在8月到9月间，有些同志提议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维埃。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这项提议被否决了。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事实上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团结革命群众的枢纽。苏维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苏维埃只能使人忽视起义的物质任务（军队、警察、武装的百人团、铁路等等），而去注意一种独立自主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在起义以前不是为了执行起义的直接任务而硬是成立苏维埃，就等于赤裸裸地宣布：“我来攻击你们了！”政府不得不对工厂委员会“容忍”，因为它们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心，但是，却要打击那第一个成立起来的苏维埃，因为它是“图谋”夺取政权的正式机构。共产党人势必被迫出来保卫苏维埃这个纯粹的组织形式。这样一来，决战的展开就不是为了夺取或防卫物质阵地，而且也不是在我们所选择的那个时刻，即由于群众运动的条件而产生起义的时刻。不是的，展开决战是为了组织形式、是为了苏维埃的“旗帜”，而决战的时刻是敌人所选择的，而且是硬加在我们头上的。同时，显而易见，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顺利地<sup>在</sup>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下进行，因为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群众的组织，正在继续成长和巩固，并且使党能够在起义的时间上有机动的自由。不言而喻，到了一定阶段苏维埃是要产生的。值得怀疑的是，在上述条件下，作为起义的直接机关的苏维埃可否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产生，因为这样会有在最紧急时刻出现两个革命中心的危险。英国有一句谚语说

得好：“急流之中莫换马”。到了全国各重要地点胜利后苏维埃就有可能到处成立起来。无论如何，起义的胜利必然引起苏维埃的建立，这时它就是政权机关了。

不要忘记，我国的苏维埃还是在革命的“民主”阶段上就产生了的，在这个阶段上就已合法化了，然后我们再把它继承下来加以利用。这种情况不会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重新出现。在大多数场合下，那里的苏维埃将根据共产党人的号召而建立起来，因而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机关。显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以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动摇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情况就为成立作为准备起义的公开机关的苏维埃造成条件。但这决不是一般的通例。很有可能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经发生转折以后，甚至在起义完成时，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来。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可能，免得把组织当作偶像来崇拜，免得把这种本来应该是富有弹性的、富有生命力的斗争形式的苏维埃变成一种组织“原则”，从外面硬加在运动的头上，从而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

最近，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大致是说，我们无从知道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通过什么途径进行：通过共产党还是通过工会。这样提出问题，表面上好象是从历史发展上去看问题，其实是根本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抹煞近些年来主要教训。如果说在战争结束时没有能够发生赢得胜利的革命，这恰恰是因为缺少一个党。这个结论适用于整个欧洲。它可以用个别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命运来更为具体地说明。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就十分明显。德国革命如果保证有必要的党的领导，无论在1918年或是在1919年，都是可以胜利的。在1917年，我们根据芬兰的例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革命运动是在非常有利的

条件下，在革命俄国的掩护和直接的军事支援下发展的。但是，芬兰党内大多数领导者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就把革命断送了。从匈牙利的经验中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教训。他们那里的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左派不是通过战斗夺取政权的，而是从吓坏了的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来的。成功了——既没有战斗，也没有胜利——匈牙利革命，在最初阶段就缺少战斗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就暴露出它本身不是一个共产党，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把那样轻易得来的政权保持在手里，尽管匈牙利无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战斗精神。如果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教训。不错，英国工会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结论——关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结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弃它或者轻视它。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觉性、预谋性和计划性所起的作用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该起的并且已经起了的作用要小得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也是群众，但是比起现在来，其组织性和自觉性要小得多。那时的领导权操在资产阶级各党派的手里。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财富和文化，还有与此种优越性有关的组织（城市、大学、报刊等）。官僚的君主制是凭着经验来自卫的，是以试探的方法去行动的。资产阶级则是窥伺时机，以便利用下层的运动投入自己的社会力量，使局势有利于自己，从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仅是一个突击力量，而且是——体现在自己的先锋队身上——一个领导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

力、文化、市政机关和大学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党来起。由于敌人那一方面的自觉程度不可估计地提高了，所以无产阶级的党的作用就更大了。资产阶级在自己几个世纪的统治中创立了一所比旧的官僚君主制的学校更高明得多的政治学校。如果说，议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实行革命的准备学校，那么，议会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反革命的战略学校。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训练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现在已成为私有制的主要支柱。欧洲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如这种革命最初一些步骤所表明的，将是一个不仅要进行激烈和无情的战斗、而且要进行考虑周密和计算精确的战斗的时代。其考虑周密的程度，将比我国在 1917 年时期的大得多。

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国内战争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我们常常追随列宁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起义是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根据积累下来的最近几年的丰富经验去研究国内战争艺术的基本要素，从而把马克思的公式充实起来，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应该干脆说：凡是肤浅地看待武装起义问题，那就是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力量在作祟。一个党如果肤浅地看待国内战争问题，妄想到必要时一切都会自行安排妥当，那它就一定要垮台。必须用集体力量来研究自 1917 年以来各次无产阶级战斗的经验。

上面所讲到的 1917 年党内各派的历史，也是国内战争经验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来说也具有直接的意义。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在这里我们再重说一遍，研究这些分歧意见，绝不能也不该看做是在攻击那些曾经实行过错误政策的同志，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不是所有的党员都同无产阶级革命同一步伐，而把党史中最重要的一章删掉，这也是

不能容许的。党可以而且应当知道自己的全部过去，以便正确地作出评价并把一切都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革命政党的传统不是建立在含含糊糊上，而是建立在通过批评而澄清问题上。

历史保证了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制度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在地下条件下养成的革命的自我牺牲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经验的广泛理论研究，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1905年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经验的理论研究，从1905年革命教训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然而尽管如此，甚至在这样的党里面，临到决战的时刻，在它的上层中依然出现了一些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经验的革命者、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在革命最紧要的时期中，大致从1917年2月到1918年2月，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为了捍卫党，为了捍卫革命，为了消弭其中由于此种情况而产生的极度混乱，必须有列宁当时在党内所起的那种唯一的、空前的影响。要想使其他各国共产党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这一点。遴选领导人物的问题，对西欧的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夭折了的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正在为此而发出悲鸣。可是，必须以革命行动的观点来进行这种遴选。几年来，在德国曾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在直接斗争的时期中去检验党的领导人物。没有这项标准，其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这几年来，法国没有多少革命震动，即使是局部的也不多见。可是，法国的政治生活却也爆发过几次国内战争的火花，这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领导者也不得不认真地应付一些急需解决的和尖锐的问题（例如，1924年1月11日流血的群众大会）。仔细地研究这些尖锐的事件，会使我们掌握到极宝贵的资料，以评价党的领

导、党的个别机构的行动、党的个别领导者的行动。漠视这些教训，不从这些教训中作出关于遴选领导人物的必要的结论，其前途就是必不可免的失败。因为，没有英明的、坚决的和勇敢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个党，甚至是最革命的党，也难免产生自己组织上的保守主义，否则，它就会失掉必要的稳定性。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保守的程度。一个革命的党的极其必要的保守主义成分必须同不墨守成规的充分自由精神、决定方针的主动精神、行动上的勇敢精神相结合。这些精神将在历史道路的转折点上受到最严酷的考验。上面我们已经听到列宁讲过的那句话：甚至最革命的党，在局势急剧转变、从而任务也急剧转变的时候，也往往还继续走着昨天的路线，因而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或有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的危险。党的保守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动性，都最集中地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而欧洲的共产党还只是将要面临急剧的“转变”——由准备工作向夺取政权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最严、时间最紧、责任最重、危险性最大。放过这种转变的时机就是整个党的最惨重的失败。

把近年来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战斗经验拿来同我们自己的经验加以对照，我们就会知道，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往往会在党必须向前大跃进的时候把党向后拖。一种类型的领导者专门会在革命道路上看到困难、障碍、麻烦，而在判断每一种情况的时候总抱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尽管不是经常有意识的逃避行动的打算。马克思主义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拖延革命行动的依据。这一种类型的纯粹的代表者是俄国的孟什维克。但是，这一种类型自然也不完全限于孟什维克，在最危急的时刻，这一种类型也会突然出现在最革命的政党的负责的岗位上。另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的特点是认识肤浅和大吹大擂。这些人根本看不见什么障碍和困难，直



到碰得头破血流为止。他们善于利用辞令来冲淡实际障碍，对任何问题都表现出十足的乐观主义（“大海不过没膝深”），一临到决战的时刻，他们就一定会转到另一个极端。在第一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谨小慎微的革命者看来，夺取政权的困难只是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专门惯于看到的那一切困难的积累和加深。在第二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肤浅的乐观主义者看来，革命行动的困难永远是突然发生的。在准备时期，这两种类型人物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一种表现为怀疑者，从革命的意义上来讲不能过于依靠他；第二种却正相反，好象是个狂热的革命者。但是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两类人就共同携起手来反对起义。然而，全部准备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能够使党、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善于决定起义的时机并领导起义。因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以便改造社会。

近来，常常有人谈到并且写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性。这是一项无可争辩的、确定无疑的任务。这项任务经过去年保加利亚和德国的教训以后变得更加突出了。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学说（就是说不仅仅是学说），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教育体系。什么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呢？这就是对这些共产党进行教育，这就是在它们中间正确地遴选领导人物，免得他们在自己的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又溜之乎也。“这就是黑格尔，这就是书本上的智慧，这也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

##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

“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包括二月革命到四月危机，以及5月6日通过建立有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方法对此危

机的解决。整个第一阶段的工作，本书作者都没有参加，因为在5月5日，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夕，本书作者才回到彼得格勒。关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及其前途，我在美国所写的论文中有所阐述。我认为，这些论文在所有主要的论点上都同列宁在其《远方来信》中对革命所作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自从回到彼得格勒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就完全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一致。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路线，我当然是完全和彻底支持的。关于农民问题，我同列宁之间连一点分歧的影子也没有，当时列宁正处在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右派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反对他们那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正式入党以前，我就参加拟订了一些以党的名义提出和发出的决议和文件。我推迟三个月入党的唯一理由是，我想使区联派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和一般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赶快合并起来。我实行这项政策，也是列宁完全同意的。

本书的编者要我注意，在我当时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我曾为了团结，指出过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有“小组习气”。别有用心的祭司，象索林同志一类人，当然要急忙把这句话直接拉扯到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上面去。当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组织上的错误以后，我认为没有必要再为这件事去争论了。但是，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我在最具体的时间条件下的表示，有些受坏影响较少的读者会找到十分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在区联派的工人之中，还存在有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对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组织政策的很严重的不信任心理。在区联派里面很盛行“小组习气”的议论，他们在这样做时总是借口一切“不公平现象”，这在类似场合下是常有的事。我在论文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小组习气是存在的，它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但是，为了使它减少，区联派必须停止独立存在。

我向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由十二个彼舍霍诺夫组成政府的那个纯粹论战性的“建议”，被有的人——大概是苏汉诺夫——说成是好象我个人对彼舍霍诺夫献殷勤，要么就好象是一种不同于列宁的特殊路线。这当然是最露骨的奇谈。当我们党要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也就等于“要求”由若干彼舍霍诺夫组成政府了。因为，归根到底，在彼舍霍诺夫、切尔诺夫和唐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别，而为了使政权易于由资产阶级转入无产阶级，他们几个人是同样可用的。彼舍霍诺夫不过对统计知道得多一些，比起策烈铁里或切尔诺夫来，能使人产生一种稍微精干一些的印象而已。一打彼舍霍诺夫等于是由一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组成的政府来代替联合政府。当我们党所领导的彼得格勒群众提出了“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要求由孟什维克和民粹派来占有这些部长的位置。“资产阶级民主派先生们，把那些立宪民主党人赶出去吧，把政权拿在你们手里吧。把十二名（多少随便吧）彼舍霍诺夫安置在政府里面吧。我们答应你们，将来到时候，我们一定尽可能‘和平地’罢免你们。这样的时候很快就要到了。”这里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是列宁不止一次提过的路线。

我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本书的编者连茨涅尔同志所提出的警告：本书引用的大部分讲话，不是根据速记记录（哪怕是不完整的速记记录），而是根据妥协派报纸一半是无知、一半是出于居心叵测的记者的报道。当我匆匆地翻阅了几个这一类文件之后，我就打消了原来想要对这些文件多少加以删改和补充的计划。让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存在下去吧。它们也是一种时代的文件，哪怕是“从另一方面来的”。

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对本书作了许多注释，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和他的助手赫列尔同志、克雷让诺夫斯基同志、罗文斯卡娅同志和

伊·鲁麦尔同志为本书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本书才得以出版。

在这里，我向他们致以同志的谢意。

我要特别谈谈我的亲密的同事姆·斯·格拉兹曼，他为本书所作的巨大的准备工作，就象为我的其他几本书所作的准备工作一样。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对这位卓越的同志、工作人员和卓越的人的不幸逝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

写于1924年9月15日。译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48—293页。

## 多余的热心

### ·编者按语·

托洛茨基的《论列宁》一书出版后，广大读者对于托洛茨基伪造历史、歪曲列宁形象的丑恶行径极为愤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十期上刊登了瓦尔丁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首先指出，托洛茨基《论列宁》一书给读者的基本印象是，似乎在决定性时刻只有托洛茨基是同列宁意见一致的，而除托洛茨基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动摇的、错误的、误导的；如果一个不了解我党历史的人读了托洛茨基的书，一定会相信，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从来不存在任何意见分歧。接着，瓦尔丁列举了托洛茨基在该书中的几个错误，如在夺取政权时机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错误解释列宁对“掠夺掠夺物”这一口号的态度，抹杀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向华沙进军的原则差别等。

看来，瓦尔丁的评论击中了托洛茨基的要害，使他恼羞成怒。托洛茨基立即写了这篇反驳文章，一方面对瓦尔丁竭尽攻击谩骂之能事，另一方面为自己的错误百般狡辩。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解释他为什么写与列宁“亲密交往和携手协作”的时期，而不写与列宁有原则分歧的时期，似乎是为了突出列宁活动的主要方面，而过去存在的原则性分歧“已经纯粹是插曲性的”，已经“抛进了历史”，完全可以“象对待历史资料一样没有任何偏见地来对待

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托洛茨基写《论列宁》一书的真正用心正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页）。

瓦尔丁同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期上费了大约五页篇幅来评论我的《论列宁》一书。文章通篇充满着理论上的胡说，政治上的虚伪，逻辑上的语无伦次，简直可以说瓦尔丁同志创造了极端混乱的苏维埃新记录。如果问题并不重要又没有意义，也许可以不加理睬。鉴于这个问题的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必要举出瓦尔丁同志那些最主要的意见，看看这些意见到底有什么价值。

## 一

作者引用了我的话：“如果我们在十月不夺取政权，那我们就完全不能夺取它了”，并声称这种绝对的论点是错误的。瓦尔丁解释说：“……如果上升阶级的政党由于某种原因而错过了这个极好时机，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完蛋了(!)，也不意味着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大好形势永远也不会再有了(!!)。”于是瓦尔丁决定把问题说成是，似乎我认为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中只可能有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就象一切有生命的机体只可能有一次生与死一样。真不明白，怎么会说得这种胡言乱语！或许这只是一种不恰当的说法？不！瓦尔丁反复强调了这种胡言乱语。他写道：“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一生中夺取政权的‘时刻’只有一次，如果它错过了这个‘时刻’，夺取政权的幻想也就破灭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形而上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上的

形而上学呢？这里连一点形而上学的东西都没有，这里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胡说八道——仅此而已。但是瓦尔丁并不就此满足。这位批评家接着说：“托洛茨基同志把关于实现变革必定有个时期的形而上学的‘法则’运用到德国。他断言：如果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没有夺取政权，他们也就完全不能夺取政权了。从他的全部(?)论断可以得出结论，德国共产党人再也不能夺取政权了，因为他们在最理想的有利时期——1923年10月没有夺取政权。”读者可以看到，这简直荒谬到了极点。似乎德国无产阶级由于党的领导人的过错，放过了1923年的典型的革命形势，也就永远被剥夺了夺取政权的权利。大家知道（所有了解这一点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他的《内战》<sup>①</sup>一书中责备巴黎无产阶级没有从巴黎公社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和没有在法国夺取政权。从对我来说非常可爱但对瓦尔丁来说捏造得太拙劣的观点，可以得出结论，法国无产阶级再也不能指望夺取政权了。用这种方法来考察一下宪章运动的历史也可以得出结论，英国无产阶级将永远看不到政权，就象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这种荒谬已极的胡说八道究竟从哪儿来的呢？瓦尔丁企图从上面引用的唯一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在十月不夺取政权，那我们就完全不能夺取它了”得出这种胡说八道。但是，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是在同一些同志进行争论，这些同志现在，即过了几年以后的今天认为，我们不仅在十月能夺取政权，而且在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也能夺取政权。我断言十月大概已经是最后的时期了，往后低潮就开始了，如果我们在十月不夺取政权，再晚三个月或六个月就不能夺取它了，“我们就完全不能夺取它了”。很显然，最后这句话不是针对人类历史或俄国历史的整个进程而言，而是针对由战

---

<sup>①</sup> 指《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争造成的、起先引起了二月革命、接着引起了十月革命的具体革命形势。我反对那种等待的宿命论，这种论调认为，如果我们在1917年8月、9月、10月力量壮大了，那么我们到了1918年1月、2月、3月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不！我说事情不是这样。革命的形势有最尖锐化的时刻，这个时刻只会延续几个星期，而绝不会延续几年，如果革命阶级不善于和来不及掌握政权，那么在这个时刻过去以后，力量对比就要发生急剧的变化而有利于反革命的阶级。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前夕，党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星期这样提出了问题：现在或者永远不！这里有几个活生生的事例。9月29日列宁写道：“现在不夺取政权，而要‘等待’，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喋喋不休，仅限于‘争取机关（苏维埃）的斗争’、‘争取代表大会的斗争’，这就等于断送革命。”<sup>①</sup>断送革命！10月24日晚列宁写道：“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sup>②</sup>多么骇人听闻的形而上学！难道不是这样：无产阶级在适当的“时刻”不去夺取政权，它也就必定遭到灭亡（“等于死亡”），因为谁都知道，死亡之后谁也不能夺取政权了。接着在同一封信中列宁又写道：“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sup>③</sup>怎么会丧失“一切”呢？我们从瓦尔丁那里不是听到：错过了时机的无产阶级尽管经常挨打，但是它能认真地学会本领，从而变得有能力去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要从失败中学习，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正要向那些告诉它放过革命的形势是最大的和最危险的失败的人学习。失败会使革命推迟到不知多远的将来。欧洲有两三次这样的失败，去年德国就有过这种失败，美国的资本家就能够来得及长期地扼杀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6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14页。——编者注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4页。——编者注



欧洲。欧洲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天(比如美国革命之后)会振奋起来。但只是“总有一天”。而我们希望欧洲现在就振奋起来。

《论时局》那封著名的信坚决反对列宁那种最后通牒式的问题提法(现在或者永远不!)。信中说:“这样提出关于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的问题:或者现在,或者永远不,将是极大的历史谎言。不!无产阶级政党将会发展,它的纲领将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了解,它将有可能以更广泛的形式继续无情地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这些人开始走上了把政权真正过渡到大多数人民手里的道路。它只有一种办法才能制止自己的成功,那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采取主动行动,从而把无产阶级置于联合起来的受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持的整个反革命势力的打击之下。我们提出警告反对这种招致灭亡的政策。”这封信写于10月14日即十月革命前两周<sup>106</sup>。

列宁对盲目乐观的宿命论,对这种在政治上意味着等待观望的消极态度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列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现在,刻不容缓,立即!当然,他没有创造象瓦尔丁所说的历史在其整个进程中似乎赋予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只有一次夺取政权的时刻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法则。对于这种幼稚的胡说八道,成年人是完全不会相信的。当列宁宣布“现在或者永远不”的时候,他指的不是整个历史过程,而是指当时的、现实的、具体的革命形势;他说的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在当时那个革命发展阶段夺取政权,或者是完全不能夺取它。如果我们错过了时机,形势就会急剧变化,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那就要等待不知多长时间再出现革命的形势。我在瓦尔丁引用的那句话中所表述的也就是这个思想。

即使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恶意,也是不可能有另外的理解的。而且我对这句话还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不会产生善意的怀疑,而且排除了任何可能的诡辩。我进一步解

解说(第66页),如果我们拖延和等待,群众就会脱离我们的党,就会丧失对它的信任,资产阶级就会获得喘息的机会,结果“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就会推迟到不知多远的未来”。不知多远的未来,瓦尔丁同志!可见,这里字字句句都说明,错过了时机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永远不可能,而只是意味着将推迟到不知什么时候。我想,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瓦尔丁同志发明的整个这条出色的“法则”,即所谓在历史上只赋予(由上帝赋予吗?)无产阶级一次夺取政权的机会的“法则”,不仅违背了正常的思维,而且违背了我们的揭发者形而上学地谈论的那本书中完全明确的、清楚的、不容任何曲解的原文。

现在专门来谈谈德国问题。即使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表过关于德国革命前途的意见,那么瓦尔丁同志也丝毫没有权利把他在自己文章中所胡诌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结论强加于我。但是情况之所以严重是由于我完全准确地和具体地对这些问题在报刊上发表过意见,并且不止一次。我认为有必要引述两段,相信这两段引文对德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和瓦尔丁的论战手法问题可以作出必要的阐释。

1924年5月22日我在《共产国际的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相信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教育会相当迅速地使德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这次更加明确和更加坚定地掌握革命的方向。需要竭力促进这个过程。需要加速这个过程。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跳越必然的阶段。如果把事情看成似乎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只是发生了某种意外的波折等等,这是根本不正确的,这就会造成战略方面的极大错误。所发生的情况不是表面上的波折,而是巨大的失败。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当领会它的含义……革命的高潮,然后低潮,接着又是新的高潮——这些发展过程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速度。我们说,革命不仅仅是自行发展,革命是要去组织的。但是组

织革命只能根据它内在的发展……最优秀的革命政党也不可能在失败后的第二天就随心所欲地发动新的革命，就象最优秀的助产士不可能使怀孕三个月或五个月就分娩一样……德国无产阶级必须经过一个恢复和积聚力量的阶段，以达到新的革命高潮，然后共产党才能对形势作出估计，发出新的进攻信号……

德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两次最大的教训：1921年3月和1923年11月。第一次，党以主观急躁代替革命形势的成熟；第二次，党不知道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并错过了它。这就是‘左倾’和‘右倾’两个极端的危险。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往往就在这两者之间通过。我们坚定地相信，富有斗争、失败的教训和经验的德国共产党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成功地引导本国的革命航船穿过‘三月的’和‘十一月的’险滩，保证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它理应得到的胜利！”

大约在写完这篇文章（此文已收入我的文集《西方和东方》）之后一个月，我在1924年6月21日医务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在1905年失败以后，我们用了七年时间才使运动在连纳事件<sup>102</sup>的推动下重新迅速进入高潮，用了十二年时间才使无产阶级取得第二次革命的胜利。德国无产阶级去年遭到了极大的失败。它需要一定的而且是相当长的时间，来研究这次失败，吸取教训并恢复元气，重新积聚自己的力量，同时，共产党只有充分吸取去年的教训，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五年？十二年？对这个问题无法给予确切的回答。只能谈一谈一般的看法，就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来说，发展的速度战后要比战前更迅速更剧烈得多……我们整个时代的深刻的革命性质就表现在这里，这一性质使我们得出结论，德国反革命的胜利不会是长久的。”

我想读者会看到，所有这一切很象“形而上学的法则”，就同瓦

尔丁同志的写作手法很象有良心一样。

这就是十分热心的批评家在我的书中所发现的那个基本的最带原则性的“错误”。

## 二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一章中，我把1918年初拒绝签订和约同1920年向华沙进军进行了比较。两者的指导原则都是想从东方推动欧洲革命。一种情况是指望：德国军国主义想要对拒绝继续战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动进攻的企图，会大大加深德国的革命矛盾，加速它的爆发。另一种情况是指望：给波兰反动派的军事打击会加速波兰的革命并由此向西方延伸。我在小册子中顺便谈到，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待问题的态度不存在原则差别：无论在那里和在这里，政治路线的制定都是从国际革命的角度考虑的。我写道：“没有原则的差别，但是在冒险程度上却有差别。”为此瓦尔丁同志象奥林帕斯山的雷霆<sup>107</sup>一样突然大发，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纯粹抽象地形式主义地对待问题的典范——没有作具体的分析，没有考虑具体的情况。”瓦尔丁作了“具体的分析”，即勉强列举了早已分析过的和众所周知的条件，并得出结论说，在布列斯特的条件下冒险意味着“拿革命的脑袋去冒险”；他说，向华沙进军则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并不意味着拿革命的脑袋去冒险”。妙极了！但是要知道，这恰恰意味着在冒险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一种是拿脑袋去冒险，而另一种只是拿手或者脚（比如局部领土）去冒险。用具体分析全副武装起来的瓦尔丁，只不过用自己的话复述了我在书中第八十八页上所说的话，那里说：“对于列宁来说，在进军华沙的思想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计谋的勇敢精神。冒险是

很大的，但目的胜过冒险。计划可能遭受的挫折不会给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存在带来危险，而只会使它削弱……”可见，早在神赐降给瓦尔丁“具体分析”之前，我已经十分清楚地和准确地说过，为什么进军华沙的冒险是合理的革命的冒险，尽管这次进军的理由显得不充足，而相反，为什么在所有其他的政治手段都用尽之后，不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冒险是不合理的和不能容许的冒险。瓦尔丁同志对我的意见丝毫没有加以补充。显然他觉得，当我说在布列斯特时期和华沙时期根本的准则都是同一个的时候，我是在“开脱”或“减轻”自己的错误。但是他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对具体的形势错误地运用革命的准则就有断送革命的危险，那么革命也不是只要准则正确就会比较容易的。差别只是：一个掌握正确的共同准则的人能够更容易地明白某种具体运用的不正确性，从而在自己的错误中受到教育。比如，当一个批评家以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对待一本书，尽管他未必能保证不犯一个错误，但是同他讨论起来就比较容易些。当批评家以无论如何要找出错误的“准则”来对待一本书，那么这样的批评家就毫无可取之处。

现在谈谈最主要的。我提出“原则上没有差别，而在冒险程度上有差别”这个公式，是因为我觉得它正是发展了列宁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特别明显的那个特点，问题不在于列宁对待问题的某种独特的原则态度，而在于他的辨别力，在于他的观察力，在于他的敏锐性，在于他的伟大的政治洞察力。在这种情况下，“论据”在他那里一般是次要的。虽然“智力”的检验进行得非常深入和极其细致，但是洞察力首先使他作出多半是正确无误的决策。天才的秘密（它的秘密之一）就在于下意识 and 智力之间的和谐平衡，即这两种东西的相应的作用。

但这是我们的批评家所不感兴趣的，他所寻求的不是别的，正是伪造的足迹。

### 三

我在《论列宁》一书第一〇二页上讲到：

“许多报纸特别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并通过一切方式，发社论、写诗歌和小品文反复唠叨。

‘他们总算是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了。’列宁有一次带着开玩笑的失望神情说。

‘这是谁说的？’我问，‘还是捏造的？’

‘不，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列宁回答说，‘我说过就忘了，可是他们却把这句话变成了整个纲领。’于是他幽默地挥了挥手。”

对于这件事瓦尔丁同志无比愤怒。他提醒说，这个故事在我们的报刊上已经引起“最理所当然的抗议”。这怎么能不是这样呢？看来我实际上几乎是事后犯了剥夺剥削者、消灭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没收富农财产的未遂罪。瓦尔丁坦率地说，这是“重新评价我们的过去”。白纸黑字就是这样写的！简直使人迷惑，不知怎么落到这种荒唐地胡说八道的地步。

首先我们从政治上来看问题。看来，对待剥夺的过程，对它的进程，对它的方式（而这正是“我们的过去”），可以拿比我回忆列宁对某个时期的这个或那个宣传说法的态度更好的事迹作根据来加以判断。我的记忆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其所讲述的整个事件，这点我们还要再谈，但是说由此就“重新评价我们的过去”，却真是下流无耻。用什么方法重新评价呢？是让我迫使列宁忏悔剥夺有产者方面的罪过吗？还是不必认真对待你们关于重新评价的那些话呢？也许你们不是想表达这一点吧？你们想要“表达”什么呢？是难以表达的热心吗？

我们再从心理上来看问题。我写这本书只是根据记忆。我想，我上面讲的那件事，对于我以及读者来说，都可以说具有完全中立的意义：没有任何关于这点的党内争论，没有任何分歧，没有任何差别和派别集团。那个时期以及列宁的宣传说法早已成为过去。因此，在顺便讲述的那段并不重要的事件中寻找某种政治倾向，是毫无意义的事，只能证明有些人的热心多余到何等程度。

最后我们从语言学上来看问题。在瓦尔丁以前，我曾试图通俗地说明什么是“掠夺掠夺物”，这并不是拉丁语，而是我们真正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有个时候，列宁曾用一位老宣传员的话，这位老宣传员在回答指责布尔什维克的掠夺行为时曾说：是的，我们要掠夺掠夺物。不用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并完全可以说，这成了列宁的作风。但是，把它当作“纲领”是不行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在一定时期我们执行过红色恐怖政策。在回答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指责我们蹂躏知识分子时，我们说：是的，我们主张对黑色的或者白色的蹂躏采取红色蹂躏。是不是允许这样做呢？我认为完全允许。但是，我们没有采用这种论战性的宣传说法，而采用了拉丁语中的恐怖。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们的恐怖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恐怖……

这可不是拉丁语！——我们的激进派七年后嚎叫起来。但是在列宁那里，在列宁私下听到的说法（它本身不具有蹂躏的特点，而具有形象的宣传的特点）中自然丝毫没有这种蛮横地对待拉丁语的态度。他只是带着对敌人的讥讽，说过从拉丁语翻译过来的这个“译语”。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如此蔑视拉丁语呢，这种蔑视只适用于最执拗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或查波罗什的哥萨克。塔拉斯·布尔巴<sup>108</sup>就这样说过：“讲拉丁语的人是傻瓜，连乌克兰语的伏特加都不知道。”剥夺剥削者——这就是我们的拉丁语，并且完全

是纲领性的说法。纲领一词本身也是拉丁语<sup>①</sup>。在我们党的名称中拉丁语起着不小的作用，因为共产主义和政党都是来源于拉丁语，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拉丁语。这些用语大概可以比较成功地译成俄语。比如，在答复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指责我们不是专政，而是独裁，跟着我们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无知平民等等时，我觉得，正是列宁在某次演说中大声地说：是的，我们主张平民的革命的独裁，反对贵族的自古以来的独裁。我们的宣传家可以把这句话带到群众中去，大概也可以起到自己的作用。但是，无论列宁，无论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不会的！），我们已经习惯并正在习惯使用拉丁语的术语（拉丁语！）——专政（拉丁语！）无产阶级（拉丁语！）。少一点热心吧！少一点形式主义吧！

那么我所讲述的那件事究竟怎样呢？它确实可靠吗？它的意义在哪里？瓦尔丁证明同列宁的这次谈话是不可能的，根据是我似乎认为此事发生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即正是列宁使用掠夺掠夺物这个公式的时候。这是瓦尔丁唯一有分量的理由，假如我确实认为此次谈话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星期。但是，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讲过这一点，我不明白，瓦尔丁是怎么确定自己的时间年表的。相反，列宁说：“我确实说过这句话，我说过就忘了，”——这恰恰说明此次谈话只可能在更晚一些时候。我没有确定也不想确定这次谈话发生的准确时间。正象上面所说的，我引用它不是因为要赋予它政治分量，而只是作为回忆的片断，虽然本身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毕竟同列宁有关。谁也不能认为或者要求多少年后回忆转述的每句话都一字不差。我在我的书中已经仔细地预先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指出，在写回忆时，我有意识地不利用任

<sup>①</sup> 为使自己避免可能的语言学的雷击（这种雷击有时常使读者震耳欲聋），我要指出，这里我把来源于希腊语的词也列入“拉丁语”；我想，从我们感兴趣的角度来看，这种细微差别没有意义。——托洛茨基注



何材料、资料、参考手册之类，否则就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就要求另一种规模和承担另一种责任。我把自己的回忆称为“供写传记的资料”，正是在于这些回忆仅仅凭借记忆，没有通过文件对它们进行客观的检验，没有同其他的回忆进行对照等等。所有这一切也完全适用于我们上面分析的那件事。但是我根据记忆讲述的这一小段对话受到的评论竟关系到如此重要的原则，那就需要认真地对待，首先就需要规定必要的政治范围和时间年代的范围。

第一个风暴和冲击的时期，大约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2月。这是斯莫尔尼时期。那次谈话，从它的意思上看显然要晚得多。我记得谈话发生在莫斯科，不是在斯莫尔尼宫，而是在克里姆林宫，这证明完全与这一点相吻合。二月是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的转折时刻，这时剥削者的反抗已被摧毁，剥夺已初步完成。但是统计和组织工作大大落在剥夺的后面。开始提出新的任务，新的口号：监督、自觉纪律、统计、劳动生产率。关于铁路上实行个人专制的法令开始成为注意的中心。在这条新的战线上曾进行过斗争。孟什维克指责我们在恢复刚刚被消除的残暴的纪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我们心胸狭窄和狭隘的实用主义，左派共产主义者则抗议我们背叛了十月的遗训。4月29日列宁写道：“试将‘革命家’通常流行的概念，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口号：随机应变、退却、等候、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漫……比较一下吧。有些‘革命家’听到这些口号以后，不觉义愤填膺，开始‘痛斥’我们，说我们忘掉十月革命的传统。”<sup>①</sup>当然，列宁没有放弃二月以前时期的口号，其中包括“掠夺掠夺物”，但是，在列宁看来，这些口号已成过去，已经失去作用了。现在重复这些口号不但意味着做无聊的琐事，而是在为其他阶级效劳。在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在捍卫严格纪律和经济监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7页。——编者注

督的口号时(在批评家看来,这些口号似乎是群众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说:“从掠夺掠夺物方面得不到任何好处的贫农,同我们站在一起。在他们那里我们的口号是行得通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且看到,在农村中人们是怎样理解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的……无产阶级和经营个体经济方面已经破产和绝望的农民群众,一定会站在我们这方面,因为他们完全懂得,单靠掠夺来维持俄国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而每个人在当地也都看见和体会到这一点。”<sup>①</sup>我们看到,这里也谈到掠夺掠夺物,但已经是从另外的方面,可以说是从相反的方面来谈了。谁将跟我们走并赞成我们的口号呢?原来是那些没有从掠夺掠夺物中得到一点好处的人。继续站在“掠夺掠夺物”纲领方面的只能是富农和他们的思想代表人物。“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且看到,在农村人们是怎样理解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的”,根据富农的理解,即新的掠夺悄悄地不慌不忙地代替了旧的掠夺。但是我们先进的无产者知道:“单靠掠夺来维持俄国是不可能的。”在向财主和他们的财产冲击时,小资产者曾同工人们站在一起,甚至常常更过分更狂热。但是一旦提出统计、监督和<sup>レ</sup>组织生产的问题时,小资产者就通过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顽强的反对。在这里就分道扬镳了。气急败坏的小资产者今后只准备承认一个纲领:掠夺掠夺物。而先进工人为此就一点一点地把它取消。孟什维克和半孟什维克的报刊天天都幸灾乐祸地对布尔什维克讲:“掠夺掠夺物”,这是你们叫喊的口号,这是你们的福音书,你们的纲领;现在你们应付不了你们煽起的情绪了。而另一方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说:你们掌握政权以后,就放弃了“激昂的”革命口号,而又重新转到拉丁语:监督、纪律、组织。同时很可能,当党的政治任务已经根本转到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7页。——编者注

其他方面时，我们自己报刊的一些思想健全但过分热心的记者们仍然在“掠夺掠夺物”这个题目上喋喋不休。面对所有这一切各式各样的但却互为补充的现象，列宁不得不盛怒地，或者至少是带着讥讽的失望情绪来谈论“掠夺掠夺物”：是的，在某个时候我说过，并且说得正确，但这不是福音书，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象应声虫那样人云亦云……应当重新学习；现在任务已经不同了……

试想一下，假如我所引用的谈话发生在我们的革命政策刚刚实行意义极其重大的转折之后，那么无论在政治上、在心理学上以至在语言学上，一切就依然如故，一切就都清楚了。列宁不止一次地带着那种恼怒的、半讥讽的失望情绪以及那种独特的富于表情的哼哼声挥动双手甩开那些朋友和敌人，因为这些人挑衅性地把他在某种条件下和针对一定的目的所说的、但已经完全失去作用的那些口号、公式或说法奉赠给他。总之，我越仔细周详地把我讲述的事件同当时的形势和当前反对拉丁语病症的情形相比较，我越坚信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

骤然看来，在这件事中唯一不明白的，顺便说一下，批评家完全没有注意到的是：我那时不知道（否则就不会问了）列宁关于“掠夺掠夺物”的讲话。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这可能吗？我认为完全可能。那时完全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报纸。那时有几次我不得不惊异地感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抱怨说：“来得及看看标题，也就不错了！”

瓦尔丁主要的基本的纲领性的反对意见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些意见到底有多大价值。除了这三个方面：“形而上学的法则”，“冒险程度上的差别”和“重新评价我们的过去”（通过拉丁语）——其余都是支离破碎的攻击，其意图比论据要清楚得多。例如，瓦尔丁在我的书中发现“相当明显的暗示，其基本倾向是给人一种印象，在决定性的时刻只有他，列·达·托洛茨基与列宁是一致的，

除了他，所有人都是动摇的、错误的、迷误的”。这句短短的话包含着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我的书既不是写十月革命的历史，也不是写十月革命所有领导人的传记或传记资料。这本书是论述列宁的。我只是在我认为必要的限度内谈到一些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以便突出和描绘列宁活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以及他的个性特征。任何一个细心的没有偏见的读者都不难确信这一点。在《十月前夕》和《变革》两章中谈到的是我与列宁没有任何分歧的那个时期。为了使瓦尔丁同志满意而事后臆造一些分歧，我觉得是不适宜的。由于列宁不在彼得格勒而产生的关于起义时间的臆想的分歧已经在事变的进程中完全解释清楚了。似乎根据我的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在这个时期只有我一个人(!)同意列宁，这是不对的，当时绝大多数党员和多数中央委员都同意列宁。我谈到列宁同少数中央委员的斗争，只是限于评述列宁那个时期的工作所绝对必要的范围。顺便提一下，我认为，汇集和出版所有说明这个时期的重要文件，特别是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sup>104</sup>的记录是再适时不过了。我还认为，目前应当从理论上来研究这个时期(自然，不是为了证明谁在十月革命中怎样糊涂、怎样犯了错误和怎样出了偏差，这种企图正象为了不提及过去的错误而“不涉及”十月革命的企图一样都是渺小可怜的)，在充分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来研究十月革命，这首先是为了使外国的党便于实现他们的十月革命。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一章中我谈到我同列宁的分歧，谈到这些分歧是怎样产生和有哪些变化，同样也只限于为描写列宁思想的道路和它的坚韧性所需要的范围。在《解散立宪会议》一章中我提到我同所有其他中央委员一起投票反对列宁的情景，当时在延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列宁处于孤立的地位。尽管列宁自己后来说过：这样更好更干脆，然而，我现在仍认为，当列宁要

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列宁反对所有的中央委员是对的。在那种困难的形势下，用不着通过解散立宪会议来增加冒险和创造第二次补充革命的必要性。关于政府迁往莫斯科的问题，我在书中丝毫没有谈到私人派别，因此，也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可以作出使瓦尔丁感兴趣的结论的材料。但我确实支持列宁关于政府迁往莫斯科的建议。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它按顺序是最后一个，但是按意义并不是最后一个。瓦尔丁这样写道：“如果一个不了解我党历史的人读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书，一定会相信，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从来不存在任何分歧……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在‘供写传记的资料’中竟没有从充满这些‘战斗’的历史中引用一行字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不了解我党历史的读者，在我的书里仍然会有许许多多与政治有关的事情不明白，至少有四分之三的篇幅不明白。的确，读我的书要求读者对党史和革命史的基本内容有所了解。为什么我首先写我与列宁亲密交往和携手协作的时期，而不写与他有分歧的时期呢？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包含了答案，或者说至少包含了大部分的答案。由于我希望不根据书本和引文，而根据个人生活交往来论述列宁活动的某些方面、某些时期和某些特点——作为传记的补充材料，自然，我应当举出我与列宁比较亲密共事的时期。我首先举出旧《火星报》<sup>1</sup> 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几乎已经没有人讲了。我在我的书中谈了这个基本理由。为什么我接着又举出十月革命时期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也包含了回答：就是因为十月革命时期不仅是我们党，而且是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经历的所有时期中最重要时期。我已经预先说明，以后打算修改这本书。毫无疑问，我会谈到我与列宁在局部或者次要问题上，或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有分歧的时期。我准备从列宁的活动和个人交往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时期，我没有任何动机来事后修改历史，尽管在长期

分歧的基本问题（党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列宁是完完全全正确的。革命年代的工作中同样存在着分歧，但已经纯粹是插曲性的，这个时期的工作使党内原先那些分歧已成历史，以至我觉得可以毫无偏见地象对待历史资料一样来对待它。但是，我没有根据预先说明（尤其是无法预先考虑瓦尔丁同志的文章）我还没有写出的书的章节。以上所说的已经足够了。

从以上所说的一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清楚的：多余的热心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但是，几乎不用怀疑，就我对瓦尔丁同志的粗制滥造的文章的说明，我们这位批评家大概还会举出与他所提出的而我不得不加以分析的那些问题完全无关的一百零一条意见。有这样一些舞文弄墨的战略家，他们认为，摆脱那种令人不愉快的论战局面的最好出路是扩大混乱的半径。我有充分根据认为瓦尔丁同志就是这样的战略家。

写于1924年10月。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4年第12—13期第92—104页。

## 致俄共(布)中央全会

### · 编者按语 ·

1924年11—12月，在全党围绕着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展开的大争论中，各地党组织纷纷通过决议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的反党派别活动。1925年1月17—20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托洛茨基的反党言行。托洛茨基借口“生病”，没有参加会议，给中央全会写了这封信。

托洛茨基在信中只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却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诬蔑对他提出的批评是“不正确的、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指责”。

全会严厉谴责了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论是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并对他提出“最严厉的警告”，要求他“完全无条件地放弃任何反对列宁主义思想的斗争”。

根据广大党员的要求，全会确认托洛茨基不宜继续担任军队领导工作。1925年1月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托洛茨基挑起的争论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敬爱的同志们：

本届中央全会第一项议程是关于各地方组织就托洛茨基的“发动”所作的决议问题。我因患病在身，不能参加全会，我以为，在这里作以下简短的解释，将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所助益。

一、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我能够在争论中提出有分量的带原则性的和有事实根据的意见，来反驳说我企图“修正列宁主义”和“贬低”（！）列宁作用的指责。然而，我拒绝作这一方面的解释，这不仅因为患病，而且因为，在目前争论的条件下，我就这些题目发表的任何言论，不问内容、性质和语气如何，都只会加深争论，使争论从单方面的争论变成双方面的争论，使争论具有更为尖锐的性质。

现在，在估价争论的整个进程时，尽管在争论中对我提出了许许多多不正确的、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指责，我仍然认为，从党的总的利益着眼，我的沉默是正确的。

二、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说我执行一条特殊的路线（“托洛茨基主义”）和企图修正列宁主义的指责。仿佛不是我走向了布尔什维主义，而是布尔什维主义走向了我，这种凭空加在我头上的说法简直是奇怪之至。我在《十月的教训》序言中（第62页）坦率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同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而且同“调和主义”这种曾包括我在内的思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从而为完成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好了准备。近八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去看待某个问题，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在政治上早已消除了。在我党面前出现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上，不论我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我都是根据我党的全部理论和实际经验来解决的。这些年来，从没有人向我说过，我的某些思想或建议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只是在就我的《1917年》一书进行争论时这个名词才出现，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三、对农民的估价问题在这方面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我坚决否认，已完全成为过去的“不断革命”的公式在任何程度上曾促使我在苏维埃革命的条件下对农民采取漠视的态度。如果在十月革命之后我因某种原因一般地重新提过“不断革命”的公式，那仅仅是谈党史，即回顾过去，而不是要说明现在的政治任务。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我看来，无论从我们共同取得的八年革命经验中，或是从将来的任务中，都是找不出根据的。

我也不同意以下一些说法和推论，似乎我在西方革命进程延缓的情况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抱“悲观主义”的态度。尽管由于资本主义包围而产生种种困难，苏维埃专政的经济资源与政治潜力是非常雄厚的。我曾不止一次地按照党的委托发挥和论证过这个思想，特别是在几次国际大会上，而现在也还认为，这个思想完全适用于目前这个历史发展时期。

四、关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无论在中央委员会，或是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更不要说在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之外，我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足以直接或间接地重新提起业已解决的那些问题的任何建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经济、苏维埃和国际性质的新任务提出来了，或者说提得更加明确了。要解决这些任务有很大的困难。我绝没有打算用某种“政纲”来和党中央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对立。对于出席过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或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的所有同志们，这个意见是不需要任何证明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的争论问题，在最近争论中之所以重新提出，不仅与我的工作无关，而且据我现在所能判断的，也与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无关。

五、鉴于这次争论的正式借口是我的《1917年》一书的序言，我认为首先必须驳斥这样一种指责，说我似乎背着中央出版了自

己的书。事实上这本书出版（当时我在高加索就医）所依据的原则，和所有别的书，不管是我的书或是其他中央委员的书，甚至一般党员的书所依据的原则是完全相同的。不用说，对党的出版物建立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监督，是中央的事情；但我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丝毫没有违背迄今为止确定的那些形式的监督，自然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违背它。

六、《十月的教训》序言是我以前、尤其是近一年来一再说过的那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这里我只举出下列报告和文章：《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上》（梯弗利斯，1924年4月11日），《东方的前途与任务》（4月21日），《西方与东方的五一节》（4月29日），《新的转折》（《共产国际的五年》一书序言），《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6月21日），《国内战争的基本问题》。

上面列举的由于1923年秋德国革命失败而作的报告都登在《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出版物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更不要说整个政治局，从来都没有向我指出过这些作品的错误。同样，《真理报》编辑部不仅没有给我的报告加过按语，而且从来不曾向我指出过编辑部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不同意这些报告。

不言而喻，我不仅没有把联系德国事件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分析看作是“政纲”，而且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被人理解为“政纲”，因为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政纲”。

七、由于其他几本我写的书，包括发行过好多版的书都在被指责之列，我认为必须说明，不仅整个政治局，而且任何一位中央委员从来都没有对我指出过，我的某本书或某篇文章可以被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1905年》这本书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本书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出版的，发行了好多版，曾由党的刊物热情推荐过，共产国际还把它译成多种外文，而现在竟被指责为修正列宁主义的主要材料。

八、如开头已经说明的，我发表上述意见的唯一目的是：对于全会解决第一项议程的问题有所助益。

至于说在争论中一再说我似乎企图享有党内的“特殊地位”，不遵守纪律，拒绝中央委托我的这种或那种工作等等，我不想纠缠于评论这些意见，但我断然声明：我准备在任何职位上和在任何职位之外，自然也在任何党的监督的条件下完成中央所委托的任何工作。

这里无须证明，在这次争论之后，事业的利益要求尽快解除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句，在全会闭幕以前我将不离开莫斯科，以便必要时回答某些问题，或者作必要的解释。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月15日于克里姆林宫

译自《真理报》1925年1月20日。

## 关于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

### · 编者按语 ·

1924年，正当托洛茨基利用列宁逝世进行猖狂的反党活动的时候，在国外，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也密切配合，出版了大量书籍，诽谤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权。伊斯特曼的《列宁死后》一书就是其中之一。

麦克斯·伊斯特曼是美国记者，曾加入美国共产党，后被驱逐出党。他在莫斯科居住期间，与托洛茨基分子鬼混在一起，同托洛茨基本人也有来往。他收集了关于所谓的列宁“遗嘱”的传闻和谣言，出版了《列宁死后》一书。伊斯特曼在书中不惜笔墨，大肆诽谤俄共（布），诬蔑苏维埃政权，并引用了同托洛茨基的谈话，说明党中央“隐瞒了”列宁的“遗嘱”，等等。事实上，列宁逝世时并没有任何遗嘱，所谓的“遗嘱”是列宁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曾在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不把它公布，因为列宁本人不愿意而且没有要求公布它。

对于伊斯特曼的诬蔑，托洛茨基是负有直接责任的。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声明，说“关于隐瞒或违背‘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意的捏造”。

但是托洛茨基出尔反尔，声明墨迹未干，托洛茨基一伙又在所谓“党中央向党隐瞒了遗嘱”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大喊大叫，来诬蔑斯大林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

我从苏呼姆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就从伦敦《工人星期日》的编辑杰克逊同志拍来的电报质询中了解到，伊斯特曼的《列宁死后》一书出版了，这本书正被资产阶级报刊用来攻击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虽然我给杰克逊同志的答复当时已在报纸上发表，但是我认为在这里重复一下其中的第一部分，仍然是适当的：“您所谈到的伊斯特曼的书，我不知道。不断引用这本书的资产阶级报纸，我还没有拿到手。不言而喻，我事先就断然拒绝任何反对俄国共产党的评论。”在电文的后面一部分我否认了说我似乎转向资产阶级民主和贸易自由的那些荒谬诽谤。在这以后，我接到了英国共产党书记英克平同志寄来的上面提到的那本书（《列宁死后》），他还寄了一封与杰克逊同志的电报内容相似的信给我。我不打算阅读，更不打算评论伊斯特曼的书，我认为我给杰克逊同志的回电当时已经在英国以及其他外国报刊上发表，这也就足够了。但是，在党务工作上与我十分接近的、已读过这本书的同志们认为，鉴于该书引用了我的谈话，我的沉默可能会间接地支持这本矛头完全对着我们党的书。这就促使我比较认真地对待伊斯特曼的书，而首先是认真地读一读它。伊斯特曼根据我们党内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件，根据关于党的民主方法和关于国家调节经济等的争论，作出一些完全反对我们党的结论，人们如果相信这些结论，就可能使党和苏维埃政权威信扫地。

首先我们谈一谈一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极其尖锐的现实意义的事：这就是对红军的看法。伊斯特曼把事情描绘成这

样：似乎军队的领导人一更换，军队就瓦解了，就丧失了战斗力。伊斯特曼究竟从哪里弄到自己的荒谬情报，我完全不知道。但是他的论断的荒谬绝伦，是一目了然的。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建议帝国主义政府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伊斯特曼的新发现上。顺便提一下，这位伊斯特曼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对红军的描绘从另一方面表明他所说的正是腐朽透顶的、孟什维主义的关于波拿巴主义<sup>109</sup>、御用军队等等的奇谈，因为很显然，由于更换领导人就会“瓦解”的军队就不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军队，而是波拿巴主义的、御用的军队。

作者在写书过程中引用了大量文件，举出了许多事件，但引用的往往是第二手、第三手和第四手的材料。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有不少是明显错误的、虚伪的报道。我们只谈谈一些最重要的。

伊斯特曼的书里有几个地方谈到中央向党“隐瞒了”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文件（指的是民族问题的书信、所谓“遗嘱”等等），这无非是对我们党中央的诬蔑。从伊斯特曼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指定在报刊上发表这些带有组织内部建议性质的书信。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对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患病时起就再三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代表大会提建议，写信等等。所有这些书信和建议，当然总是按照指定送达，通知了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然对党的决定也总是发生了应有的影响；这些书信所以没有全部发表，那是因为写信的人没有指定在报刊上发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无论就他对党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党本身的性质来说，都不可能有什么“遗嘱”。在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通常提到的所谓“遗嘱”，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内容是组织内部建议的信

(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象对待所有其他书信一样,也非常重视这封信,并根据这封信作出了适合当时条件和情况的结论。关于隐瞒或违背“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意的捏造,完全违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本意和他所建立的党的利益。

伊斯特曼断言中央委员会似乎想闭口不提(即不发表)列宁论工农检查院的文章,这更是荒谬已极。中央委员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如果在这里一般可以说是一种“分歧”的话),完全是次要的,它只涉及到在发表列宁的文章的同时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发表一个表示没有任何根据担心分裂的声明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那次会议上已经一致同意地解决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全体与会委员签署了一封致各党组织的信,信中写道:

“在这封纯属通知性质的信中没有讨论列宁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十分及时地提出的可能发生的历史性危险的问题,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起见,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完全一致声明,在中央委员会的内部工作中完全没有任何可以作为担心‘分裂’的根据的情况。”在这个文件中,不仅有我的签名(我同其他十个人的签名排在一起),而且文件的正文还是我起草的(1923年1月27日)。

在这封表明中央委员会对列宁关于工农检查院的建议的一致态度的信中,也有古比雪夫同志的签名,这也就同时驳斥了伊斯特曼的另一个荒谬的说法,似乎在工农检查院内古比雪夫同志带头“反对”列宁的组织计划。

伊斯特曼说中央委员会似乎如此这般地没收或扣压我在1923或1924年或另外某个时期写的书和文章,这也是荒谬的和捕风捉影的。

伊斯特曼的另一个说法,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提议我

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同样也显然是不正确的。我还是第一次从伊斯特曼的书中知道这样的事。

细心阅读这本书，就毫无疑问可以指出许多其他不正确、错误和歪曲的地方。但未必有这种必要。资产阶级，特别是孟什维克的报刊正在利用伊斯特曼的情报和引用他的说法，它们竭力突出他作为我的传记的作者同我的“接近”、同我的“友谊”，目的显然是用这种间接方法使他的结论具有它所没有和不可能有的分量。因此不得不就这一点谈一谈。我同伊斯特曼的真实关系，从我在他的《列宁死后》一书还没有影子时写的一封事务信件中，大概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来。

我在苏呼姆时接到替我办理出版书籍的一位同志从莫斯科寄来伊斯特曼题为《列甫·托洛茨基的青年时代》的手稿。我的同事在书稿所附的信中通知说，作者寄交给国家出版局以备出俄文版的手稿，以它的感伤的语调令人产生一种奇怪的而对我们来说很不习惯的印象。我在1925年4月3日的信中对此回答说：

“即使甚至不看伊斯特曼的手稿，我也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刊印这个手稿是完全不适当的。尽管承蒙您好意寄来，但是我却不能阅读这份手稿，没有兴致。我十分相信，手稿实质上也是没有味道的，特别是对我们俄国共产主义的口味来说。伊斯特曼很长时期来坚持要我相信，共产主义很难使美国人感兴趣，但是共产党人可能使他们感兴趣。他的论据并非没有说服力。这一点也就促使我给予他帮助，不过这种帮助是有限的：在我给他的信中说明了这种帮助的界限<sup>①</sup>。关于他打算在俄国出版这本书的事情，我不曾

<sup>①</sup> 1923年5月22日，我回答伊斯特曼一再提出的请求时是这样说的：“在获得确实可靠的材料方面，我将尽力协助您，但我不能同意阅读您的手稿，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不仅要事实，而且要对评论和估价负责。十分明显，这是不可能



知道，否则我必定会及时地建议国家出版局不要刊印它。要阻止伊斯特曼在国外出版这本书，我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他是一个‘自由的’作家，曾经住在俄国，收集了材料，目前在法国，或许在美国。请求他作为对我个人的好意不要刊印这本书？不过要做到这点，我却和他不够接近。而且一般说来，这样做未必是适当的。”

再重复一遍，这里说的是关于我的青年时代（到1902年为止）的一本根本没有过错的小册子，但是我的信的语气不会留下怀疑的余地，我和伊斯特曼的关系同我和其他许多外国的共产党员或者“同情者”的关系丝毫没有不同，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了解十月革命，了解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仅此而已。

伊斯特曼以鄙俗的自以为是的口吻，讥笑我对中央委员会里亲近的同志采取“唐·吉珂德<sup>110</sup>式”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在“激烈的论战”时刻对他们采取友好的态度。看来，伊斯特曼自认为负有纠正我的“错误”的使命，他用来评论我们党的领导成员的方法，除了诬蔑诽谤之外，不可能是别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伊斯特曼是在何等腐朽的基础上建造自己的楼阁的。他利用党内论战的个别片断，肆无忌惮地歪曲事情的真实意义和破坏一切规程，来诬蔑我们党和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但是我觉得，稍为认真和有点头脑的读者，甚至无需检验伊斯特曼的引证和“论据”（虽然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只须问问自己：假如伊斯特曼对我们党的领导成员的恶毒评论哪怕有一点点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党怎么能经受多年地下斗争的考验，完成极其伟大的革命，引导着千百万群众并帮助其他国家建立革命的政党呢？没有一个正直的工人会相信伊斯特曼描绘的图景。它本身

---

的。我愿意负责，但只是对根据您的要求我所提供的那些事实负责。其他一切，就只能由您个人负责了。”我只协助他了解1902年以前的事实。——托洛茨基注

就驳斥了自己。伊斯特曼居心何在，这且不管。反正他的书只能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效劳，因而在客观作用是反革命的工具。

写于1925年7月1日。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16期第67—70页。

# 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摘录)

——苏联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

## · 编者按语 ·

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写于1925年,全书除序言外分三章,这里选了序言和《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一章。

当时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接近结束,农业已接近战前规模,大工业的产值已约占战前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但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单单恢复经济和达到战前水平还是不够的,必须继续前进。这里就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苏联的经济建设应该循着什么方向和以什么样的速度进行的问题。一句话,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笼的,它专门为一种“投降主义的递减曲线论辩护”。这种理论在建设速度方面实际上主张最低速度。托洛茨基在书中说,既然“战前扩大工业基本上是靠建立新工厂”,而“目前扩大工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利用旧工厂和充分利用原有设备”,那么“随着恢复过程的终结,增长系数也必将大大降低”。

几年后的事实表明,苏联国家计委拟定的1930—1931年的产值增长数字却规定百分之四十七。由此可以看出托洛茨基一伙的“‘递减曲线论’的全部反动性”(《斯

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6页)。

小册子用种种遁词怀疑和否定苏联能够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对此斯大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托洛茨基说：我们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走到社会主义。明知道走不到社会主义而仍然走下去，——难道这不是愚蠢吗？”（《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4页）

## 序 言<sup>①</sup>

本书试图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些主要方面作出评价。这种评价的困难，就在于我国发展的急剧转折的特点。当运动沿着直线进行时，只要两点就足以确定其方向了，可是当发展在转弯处沿着复杂的曲线进行时，要根据个别线段来判断这条曲线就困难了。而新制度的八年是一个不长的线段。

然而，我们的对手和敌人，在十月革命八周年之前很久，就曾不止一次地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作出武断的评论。这些评论有两个方面：第一、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使国家破产；第二、说我们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是走向资本主义。第一种批评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第二种批评具有社会民主党的特色，即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两个方面的批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且两个要好的邻居也常常会互相拿错武器，甚至由于他们神圣地陶醉于同共产主义野蛮行为的斗争而觉察不到这一点。

我希望本书能向没有成见的读者表明，无论公开的大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自封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在说谎。当

<sup>①</sup> 本序言是为这本小册子的德文版和英文版而写的。——托洛茨基注

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使俄国破产了，这是说谎。因为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遭受帝国主义战争破坏、继而又遭受国内战争破坏的俄国，工农业生产力正在接近战前水平，并在近年内即将达到战前水平。当他们说生产力在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是说谎。在工业、运输业、商业和财政信用系统方面，国营经济在全国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缩小，相反却在增大。数字和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问题要复杂得多。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点也不感到突然。从分散的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耕作制，只有通过技术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步骤才有可能。这种过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政权保持在竭力想领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阶级手中，这个阶级越来越善于通过国营工业影响农民，提高农业技术，从而为农业集体化创造前提。

不必说，这项任务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刚刚开始创造循序渐进地逐步解决这一任务的前提。况且，这些前提本身正在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危险。这些矛盾和危险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目前，国家供应市场五分之四的工业品，约五分之一的工业品由私营企业主，即主要由小手工业者供应。铁路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百分之百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现在控制了将近四分之三的贸易额。对外贸易约百分之九十五由国家掌握。信用机关正在形成一个集中的国家垄断组织。但是，有二千二百万农户同这个强大的国营联合企业相对峙。在生产力普遍提高的条件下，国营经济同农民经济相结合，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社会问题了。

没有生产力的提高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上，只有把生产者本人的切身利益包括到公有制的经济中，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对工人来说，由于工资是根

据劳动生产率来确定的，因而这一点就有了保证。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农民来说，个人利益是由私有经济及其为市场工作这一事实本身获得的。但是，困难也由于这一事实而增加了。工资差别本身不论有多大，都不会造成无产阶级的社会分化，因为工人始终是国营工厂的工人。农民的情况就不同了。二千二百万农户——在它们中间国营经济(国营农场)、集体农民经济和农业公社暂时只占极少数——为市场工作势必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不仅富裕户，而且还有剥削户从农民群众的一极分化出来；而在另一极则有部分中农变成贫农，贫农又变成雇农。苏维埃政府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实行新经济政策并在农村扩大其范围时，曾清楚地估计到市场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危险。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危险不是必须对之俯首帖耳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是在每个阶段都应加以认真分析和实际解决的问题。

如果随着农村分化的加剧，国营经济放弃自己在工业、商业和财政方面的阵地，那么危险就可能会变成无法克服的。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本就会扩大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当然首先是在农民市场上的影响，加速农村的分化过程，从而使整个经济发展转向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为什么首先确定工业、运输业、财政、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的阶级力量对比朝哪一个方向改变，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在所有这些部门中的不断增长的优势——国家计划委员会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种优势——，正在建立完全另一种城乡关系。我们对经济命脉控制得太牢固了，以致我们连在较近的将来农业中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都觉察不到。在这个问题上，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既然在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而这两种倾向的合作和竞赛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所以可以说，斗争的结

局将取决于两种倾向的发展速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去试着证明这个前途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他们比可怜虫考茨基（或者麦克唐纳）办事娴熟，也会碰得焦头烂额的。然而，上述前途是否能够排除呢？从理论上说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执政党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连犯错误，从而阻碍了目前大有发展希望的工业的增长，如果党放弃对农村政治经济过程的监督，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败。然而，我们决不打算根据这些前提来作出我们的预测。在1918年11月9日以后，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出色地教训了国际无产阶级，怎样丧失政权，怎样断送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怎样为资本主义效劳。这里就无需多说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们想要表明，怎样保持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怎样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内容来充实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我们有一切根据来指望，在正确的领导下，工业的发展将超过并制止农村的分化过程，为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创造技术前提和经济条件。

在我的小册子中没有农村分化情况的统计说明。问题在于，能对这个过程作出总评价的资料还根本没有。其原因与其说是我国社会统计工作的缺陷，不如说是包含着二千二百万农户的分子变化的社会发展过程本身的特点。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已经认真地着手研究我国农民经济分化过程的问题了，这本小册子是以国家计委的计算为基础的。国家计委在这方面作出的结论，将及时发表，这些结论对国家在赋税、农贷、合作社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无疑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资料无论如何不会改变这本小册子中所拟定的基本前景。

不必说，这种前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同东西方的命运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无产阶级前进的每一步，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从物质上和道义上使我们更加巩固，更接近共同胜利的时刻。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八周年纪念日  
于基斯洛沃茨克

## 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不但在数量上而且也在质量上达到战前水平，都将是巨大的成就。我们在第一章里专门论述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一成就只是把我们引向这样一个“起点”，即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的经济竞赛。

国家计委说明书的结束语把总任务概括如下：“在经济情况允许的一切地方，坚决守住已经取得的阵地，并循序渐进地每年向社会主义推进哪怕是一步也好。”这几句话，如果从字面上去解释，可能成为作出错误结论的根源。每年向社会主义推进“哪怕是一步”就足够了，这样的话可以被理解成这样：好象速度问题几乎是无所谓。因为既然总合起来的力量都是指向社会主义的，那就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到达目的地。这样的结论是根本错误的，当然，国家计划委员会是无论如何不愿意说这种话的。事实上问题的解决恰恰就靠速度。只是因为国营工商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私营工商业，才在过去这个时期里使“社会主义的”总合力量得到了保证。这样一种速度对比在今后仍应保持下去。然而更重要的却是我们的总的发展速度和世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对比。国家计委的说明



书暂时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认为有必要对此详尽地谈一谈，因为这一新的准则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对于衡量我们的成功和失败所起的作用，是和“战前水平”这一准则对于衡量恢复时期的成就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十分明显，随着我们的进入世界市场，希望在增长，而且危险也在增长。其根源仍然是：农民经济的分散性，我国技术的落后和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暂时的巨大的生产优势。直截了当地承认现实，当然，同这样一点没有丝毫矛盾，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就其方法、趋势和条件来说，都要比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强大得多。狮子比狗强大，但是一条老狗可能会强过一头幼狮。对于一头幼狮来说，最好的保障是发育成长，磨利爪牙。为此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老的资本主义对年青的社会主义所保持的最主要的暂时优势究竟是什么？这不是手头的珍宝，不是窖藏的黄金，也不是积累和掠夺来的大量财富。过去积累起来的有价值的东西是有巨大作用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不能靠过去的储备来生活，它得用活的劳动产品来维持生存。古罗马尽管拥有一切财富，终究抵挡不住“野蛮人”的进攻，因为后者代表比腐朽的奴隶制要高的劳动生产率。为大革命唤醒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把意大利贵族城市公社从中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干脆掠夺得一干二净。要是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到欧洲的水平，在银行地下室里储藏着的九十亿美元黄金也帮不了它什么忙。资本主义各国所占的主要经济优势就在于，资本主义目前还在生产比社会主义要来得便宜，而且质量也更好的商品。换言之，在靠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惯性生存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目前还是要比在承受了不文明遗产的条件下刚刚开始采用社会主义方式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得多。

我们知道历史的基本规律是：取得胜利的归根到底是那种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经济水平的制度。历史的争讼不是立刻，不是一下子，而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来解决的。

全部问题现在就在于，我国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对比在今后几年内将朝什么方向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发生变化。

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通过不同的途径来把我国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作一比较。要知道，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种类是极为繁多的。比较可以是静态性质的，也就是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出发，也可以是动态的，即以发展速度的对比为根据。可以把资本主义各国的国民收入同我国的国民收入加以比较。还可以作生产扩大的系数的比较。所有这一类比较和对比都各有其作用，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只要明白它们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就行。我们将进一步举出若干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想法，仅此而已。

资本主义的进程在北美合众国达到了顶峰。为了估量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现有的物质优势，正是要以表现得最显著的资本主义所占的优势为例，才能从中吸取教益。

前不久，美国工业代表大会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统计表，我们从中采用若干统计数字。美国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生产的粮食占百分之二十一，其它谷类作物占百分之三十二，棉花占百分之五十二，木材制品占百分之五十三，生铁占百分之六十二，钢占百分之六十，纸占百分之五十七，铜占百分之六十，铅占百分之四十六和石油占百分之七十二。美国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物质财富。全世界百分之三十八的水力资源，百分之五十九的电报电话线路，百分之四十的铁路和百分之九十的汽车都属于美国。

在我们苏联，电站的总发电能力明年将达到七十七万五千千瓦；在美国电站的总发电能力去年就已达到一千五百万千瓦。至

于厂用电站，则 1920 年的调查确定我国厂用电站的总发电能力约为一百万千瓦；而美国在那时约有一千零五十万千瓦。

用国民收入来表现总劳动生产率，如所周知，其计算是相当困难的。据我国中央统计局的资料，1923—1924 年度苏联的国民收入按人口计算平均约为一百卢布，美国则约为五百五十卢布。然而，外国统计数字提供的美国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却不是五百五十卢布，而是一千卢布。这就是说，取决于设备、组织、技能等等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在美国竟高达我国的十倍，或者至少高达六倍。

然而，这些统计数字不管有多么重要，它们丝毫不能注定我们在历史性的斗争中会遭到失败：这不仅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并不限于一个美国；不仅因为，参加这一历史性斗争的还有在过去整个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还因为，首先，美国本身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就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美国的生产力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生产的下降也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美国也没有市场的保障。它所面临的销售问题正越来越突出和尖锐。决不能排除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劳动生产率比较系数将从两个方面拉平：我们提高，美国降低。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大概也适用于欧洲，那里的生产水平现在就比美国低得多。

有一点是清楚的：资本主义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目前仍占巨大的优势；当前面临的高涨是急剧的；任务和困难也确实是巨大的。只有以世界经济为准绳才能找到和检验前进的道路。

## 世界经济的比较系数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不能把苏联经济的动态平衡看成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整体的平衡。相反，越向前发展，

国内经济的平衡将越多地要由进出口工作给以支持。要始终考虑到这一情况，并从中作出一切结论。我们越多地参加到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去，我们国内经济的一些因素，例如商品的价格和质量，就越直接地为世界市场上相应的因素所左右。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发展工业时是以其战前水平为参考的。为了比较和确定产品的价格，我们利用的是 1913 年的价目表。这种其实是极不完善的比较，在初步恢复时期是适当的，但是，这个时期正趋向于结束，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的整个问题正转入一个新的方面。今后在每一个特定的时刻，我们都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数量、质量和价格来说，我们的产品究竟比欧洲市场或世界市场落后多少。恢复时期的结束使我们有可能最终抛弃我们自己的 1913 年的价目表，转而在用德国、英国、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公司的价目表来武装自己。我们还得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表现我国产品和世界市场产品在质量和价格两方面对比的新的指数上。这些新的衡量标准，这些不属于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的，而是国际范围的比较系数，将在今后唯一有权评价用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所表达的那个过程的各个阶段。

\*       \*       \*

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对抗的条件下，我们的发展速度，即我们的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生长速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从今天来说，我们的贫穷落后是一个由不得我们争辩，相反，却要竭力加以强调的无庸置疑的事实。因而，系统地同世界经济进行比较，只是给这一事实提供一种统计的表现形式而已。有没有这样的危险性，即恰恰是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当我们还远远没有来得及使我们的经济好好地发展起来，世界市场就以其拥有的各种手段的巨大的物质优势将我们扼杀？对如此提出来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不引起争辩的，尤其是统计形式的答案，正象例如对这

样一个问题一样，即农场资本主义的（“富农的”）吸引中农的倾向，会不会造成麻痹无产阶级对农村施加影响和在政治上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危险？同样不能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资本主义暂时的、非常相对的稳定会持续下去的话，它能不能动员起一支象样的武装力量来反对我们，并用新的战争来阻挠我们的经济高涨？消极的预测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这里谈的是斗争，在斗争中诸如创造性、随机应变、毅力等等因素在某些时机起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是本书的任务，在本书中我们试图确定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并尽可能从其它因素中把这些趋势概括出来。

无论如何，对于世界市场能否仅仅用它的经济优势就把我们压倒的问题，可以回答说：在世界市场面前我们决不是赤手空拳的；我们的经济是得到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关税保护制度的一定的国家机关保护的。然而，这一保护制度究竟有多大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多少学到一点东西。在很长的时期里，德国或美国在工业方面落后于英国的那一段距离看来简直是不可逾越的。后来这些落后的国家在保护关税的庇护下，利用其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而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国家。国界、国家政权和关税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这在更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越是广泛和复杂，经过深思熟虑的、坚定而又灵活的社会主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我们就越是重要。

然而，不用说，以对外贸易垄断制为其最高表现形式的保护关税制度决不是万能的。它可以遏止资本主义大量商品的冲击，按照国内生产和消费的需要来对它进行调整。正因为如此，保护关税制度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工业获得必需的时间来提高其生产水平。如果没有对外贸易垄断制，我们的恢复过程就是不可能的。但

从另一方面来说，只有我们现实的生产成就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保护关税制度得以维持下去。即使在今后，对外贸易垄断制尽管能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其暂时还无力对付的外来冲击，但是不言而喻，它不能代替工业本身的发展，因为工业的发展今后要由世界的各种系数来衡量。

我们现在所作的同战前水平的对比，只是从数量和价格的角度去进行的。产品不是就其内容而是就其名称作比较的。这当然是不对的。生产比较系数还应该包括质量问题。做不到这样一点，这些系数就会成为自欺的根源和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在降低价格方面曾有过一些经验，在一些个别场合，降低价格是靠降低质量来弥补的。在我国和外国同种商品的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比较系数取决于成本的差别。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质量的差别。最后，在成本和质量都有差别的情况下，则需要对二者作出综合的评价。确定成本是生产成本核算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品质量只有通过若干指标才能确定。电灯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质量取决于使用寿命、发光所消耗的能量和光的均匀分布程度等等。

某些技术规格和包括“质量”标准在内的生产标准的确定，非常有助于比较系数的计算。我国的标准和世界市场的标准之间的比例，在每一特定时期都应该是一个常数。只要知道我们的产品是否符合既定标准就行了。至于价格的比较，则在既定的质量对比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十分简单的。综合系数只要用简单的乘法就可以算出。如果我们某种商品的质量比外国商品差两倍，而价格比它贵一倍半，则比较系数就是三分之一。

有人说我们不知道外国的成本，这是对的，然而却是意义次要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价格就够了，因为价格就印在价目表上。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额叫做利润。降低我们的成本就可以使我们在

价格方面同世界市场并驾齐驱而不用考虑外国的成本。这在实质上也就是我们要在最近时期里解决的基本问题，在这之后——当然还不是那么快——就将开始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任务是要在世界市场上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产品去战胜资本主义的产品。

有时会有人反对说，商品项目极为繁多，计算比较系数是一项“力不胜任的”任务。对此可以有两种回答。第一、无论什么商品都要通过成本核算，都要上账和列入价目表。因此，尽管商品名目繁多，在这项工作中就谈不上什么力不胜任了。第二、在开始时可以只限于最重要的大众日用品和那些可以说是对每一种生产都是关键性的商品，其前提是使其余商品在比较评价系统中处于过渡的地位。

另一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要衡量质量，甚至简单地确定一下质量都是困难的。实际上，什么是花布的质量？不就是结实、每一平方俄尺的棉花重量、脱色程度和花色是否悦目吗？不能否认，衡量大多数商品的质量是困难的。然而，这个任务决不是不能解决的。只要不是用某种臆想出来的或是绝对的标准来处理它就就行了。对于其销售对象是农民和工人的花布来说，占第一位的是布料的结实程度，其次是脱色程度。如果衡量了这两个因素——而这在采用严格客观的方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就会掌握用数字表示的质量的基本特点。要取得准确的，即用数字表示的我国制造的铎犁、脱粒机、拖拉机和美国制造的同类机具的比较系数，做起来还要更容易和更简单一些。这个问题将在最近几年内对农业所起的作用，就象固定资本的更新问题之于工业一样。在购买一匹马或一头牛时，农民自己确定——而且极其准确——一切必要的“系数”。而在购买机器时，他几乎是束手无策的。在劣质齿轮上吃了亏以后，于是在购买机器之前，他的怕担风

险的心理也传染给了邻人。要使农民确实知道，他买的是什么样的机器。苏联的脱粒机都应该有商品说明书，比较系数就以说明书为依据。这样，农民就会知道，他买的是什么东西；而国家也就会知道，国产的和美国造的机器之间的对比。<sup>①</sup>

关于比较系数的思想，乍看起来会以为是抽象的，几乎光讲理论的，但在实际上却极其富有生气，简直可以说是从全部经济条件中、乃至整个日常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我们现在这种同战前水平比较而计算出来的比较系数，同样不仅具有理论根据，而且还具有生活根据。接触不到统计表和价格曲线的广大消费者，运用的是他们自己的和家属的那种消费者的记忆力。统计表中提到的某些战前水平的百分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属于数量方面的，然而消费者的记忆力却加以补充说：“和平时期”（即帝国主义战争以前）一双靴子值若干若干卢布，可以穿若干若干个月。每当购买靴子时，消费者就要在头脑中把比较系数盘算一番。这样的计算是任何一个购买者都要做的：皮革托拉斯在向沃罗涅什机器制造厂或基辅机器制造厂买机器时这样做，一个在市场上买三俄尺花布的农妇也要这样做，——所不同的只是托拉斯在做比较时依据的是价目表和会计账册，而农妇依据的则是记忆力。还应该说，基于直接生活经验的农妇的比较系数，在很多场合要比托拉斯的系数来得更实际一些，因为托拉斯的系数是匆促编制出来的，几乎总是不考虑质量，有时还带有倾向性。不管怎样，统计结果、经济分析和消费者凭记忆力所作的日常计算归结到一点，这就是在战前的经

---

① 我们在上面举了一些作为例子的反对意见，决不是想以此说明，比较系数的思想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抵制。恰恰相反，我们的生产者、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科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是抱着非常同情的态度来对待这种由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想法的。与此相应的工作已经通过产品质量特别会议和科技研究所这两条线来进行了。——托洛茨基注



济条件中寻找出发点。

这种向后看的独特的民族局限性今天已接近尾声了。我们同世界市场的联系，现在就已经足以从各方面把我们推上用我国商品同外国商品进行比较的道路。由于对战前产品的回忆逐渐从人们，特别是从年青一代人的记忆中消失，因此老一套的比较就逐渐模糊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比较越来越鲜明了，因为这种比较所依据的不是回忆，而是每天的活生生的事实。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正在从国外带来某些公司关于提供某些商品的建议，带来各种公司的价目表，最后，还带来他们自己作为消费者的个人经验。现在到处都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国外某种商品值多少钱，它的质量同我们的有多大差别。这是过去几年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国外旅行将日渐频繁。我们应当通过各种途径，让我们的托拉斯工作人员、工厂经理、优秀的大学生和技术人员、工长、装配工和熟练工人去看看外国的工业，自然，不是一下子都去，而是按照必要的顺序安排。要知道，这种旅行的目的在于让经济工作人员和生产工作人员中的骨干有机会从各方面去估价每一个不利的“比较系数”，以便使其更好地转而有利于我们。

如果以为面向西方的进程只涉及经济的领导层，那就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局限性。恰恰相反，它由于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涉及到主要的消费者基层，因而具有深刻的群众性。在这方面走私所起的作用是不小的。不要低估这一作用。走私虽然是不值得称许的，但毕竟是经济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完全以世界经济比较系数为依据的一部分，因为走私者运进来的只是那些比我们国产的质地要好、价钱要便宜得多的产品。为产品的质量而斗争，——顺便指出，——因而也就是同走私现象斗争的一种最好的手段，因为现在走私从国家身上榨取了上千万卢布的钱。走私主要靠小商品，但正是这种小东西在极深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

一个毛孔中去。<sup>①</sup>

还有一个部门，实际上在同国外进行比较时从来不是不起作用的，这就是农机具部门。农民知道奥地利镰刀，而且总是拿它来同我们的镰刀作比较。农民知道美国人麦考密克、加拿大人哈里斯、奥地利人海德等等。当前，随着农业的高涨和对农机具需求的增长，这一切比较都正在活跃起来，而一项美国福特牌拖拉机同我国产的拖拉机之间的新的比较又正在自上而下地添加上去。一个农民买了一台马拉脱粒机，质量低劣的铁齿轮用了两、三个小时就在他眼皮底下坏了，这时，他看待这一事实用的就是这样一大堆比较系数，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了。

至于工人，则他最先碰上的比较系数倒不是在他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方面，而是在为他的生产服务的那些产品和部分地供他消费的产品方面。他知道美国和俄国的机床、工具、铸铁、量具等等的质量。不必说，高度熟练的工人对于这些差别都是极为敏感的，而提高这种敏感程度是生产教育的任务之一。

我们认为，上述一切都足以证明，世界生产的比较系数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种臆想，而是一个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新任务的头等重要的实际问题。

这种比较系数制使我们能从世界经济成就的角度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的横断面。平均系数对于所有的产品来说，将表明用准确数字衡量过的我国生产技术落后的程度。定期测定商品系数和平均系数将为我们提供一幅我们的成就的画面，并将计算出个别生产部门和整个工业获得这些成就的速度。

人们坐马车旅行是用眼睛或凭听觉来测量里程的，汽车行驶则用自动计程表。我国工业今后发展要用国际计程表，不仅最重

---

<sup>①</sup> 对走私商品的研究，无论从专业生产还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托洛茨基注

要的经济措施，而且还有我们的许多政治决定都要以它的读数为根据。如果一种社会制度的胜利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说法是正确的话——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对苏联经济的产品进行正确的测定，无论就解决当前的市场任务来说，还是就评价我国历史道路的每一个阶段来说，同样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 发展速度及其物质限度和条件

1922—1924年总的工业增长主要是由轻工业决定的。今年，优势已开始转向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然而，即使这些部门暂时也还只能在利用旧有的固定资金的基础上恢复起来。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年度，我们从资产阶级那里承受下来的固定资金将百分之百地得到利用，我们将着手进行更新固定资金的广泛的工作。国家计委拟定的基本投资为工业（包括电气化）——八亿八千万卢布，运输业——二亿三千六百万卢布，住宅及其它各种建筑——三亿六千五百万卢布，农业——三亿卢布，合计将近十八亿卢布，其中包括九亿多卢布的新投资，即来自整个经济的新积累。这个目前刚刚拟定的，而且尚未最终核实的计划，对于分配国家物质资源来说是一个极为巨大的推动力。迄今我们是在靠原有的固定资金进行生产，只是部分地予以补充。今后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固定资金。正在到来的和快要过去的经济时期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从个别经济工作人员，比如说，托拉斯工作人员的观点来看，发展速度取决于银行提供的贷款。“给我若干百万卢布，我就会提供新的房屋和机床，使生产增长到十倍，使成本降低一半，在质量上同欧洲媲美”，——这样的话我们不知听了多少次。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拨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首要的因素。经济发展速度是

由生产过程本身的物质条件决定的。关于这一点，国家计委的说明书刚好极为概括地提到过。“国民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的通用极限，——说明书说道，——能决定一切起制约作用（限制作用）的局部因素的极限，应被认为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国家积累的规模，即那些新生产出来的财富的总和，这些财富是被用来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要的，因而也就构成了扩大再生产和改造的物质基础。”

对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这样的问题来说，信用券、股票、债券、期票等“有价证券”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只不过是计算和分配物质财富的辅助工具而已。当然，从私人资本的观点和总之从私人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些有价证券自有其独立的意义；它们保证持有人得到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但是从国民经济的观点（它在我们的情况下和国家的观点非常接近于一致）来看，有价证券本身不会为那些作为扩大生产基础的物质产品在量上增添什么东西。所以应当从这个现实的基础出发。通过预算、银行、经济恢复公债和工业基金等途径把货币资金分配出去，只是各种经济部门之间分配相应的物质产品的一种方法而已。

在战前年代，我国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至七。应当承认，这个系数是够高的了。但是同当前工业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这样的系数来比较，它就显得完全微不足道。然而，如果不加考虑地拿这些增长系数进行对比，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战前扩大工业基本上是靠建立新工厂。我们目前扩大工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利用旧工厂和充分利用原有设备来进行的。因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所以很自然，随着恢复过程的终结，增长系数也必将大大降低。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因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争取我们“在太阳下”的社会主义地盘的斗争，必然会成为争取尽可能更高的生产增长系

数的斗争。然而，这种增长的基础和“限度”仍然是现有的大量物质财富。

可是，如果事情竟是这样；如果恢复过程竟基本上恢复了农业和工业之间、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原有的相互关系（出口粮食和原料，进口机器和制成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恢复过程把战前的增长系数也恢复了，我们就要从现在这样一个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高度，经过一、两年以后下降到战前的百分之六？对这个问题，当然，现在不会有十分确切的答案。然而，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有化工业的存在，由于包括进出口的基本经济过程不断得到调整巩固，我们能够在达到战前水平之后，还保持一个不仅远远超过我国战前的，而且还超过资本主义平均系数的增长系数。

我们的优越性究竟何在？我们已经举出过了。

第一、我们这里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寄生阶级。战前事实上的积累不是百分之六，而是至少有它的两倍多。但是，积累起来的资金却只有一半用于生产。另一半则被挥霍无度和游手好闲地浪费掉了。因此，仅仅废除君主制、官僚制度、贵族和资产阶级一事就可以保证，在具备其它必要的条件下，增长系数可以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二，或者说至少提高到百分之九至十。

第二、扫除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各种障碍之后，就可以使从事管理工作的国家，在每一特定时机，在必需的经济部门中，根据需要放手地把必需的资金动员起来。由于事务管理重迭、竞争等而引起的非生产性的附加开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还将日益减少。就是由于这样一些条件，我们才可以无需外援而在最近几年达到如此迅速的高涨。今后仅仅有计划地分配人力和资金这一项，就使我们有可能在比现在还要大得多的程度上，在消费同样资源的情况下，获得比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大的生产成果。

第三、我们刚刚开始在生产的技术装备方面实行计划原则(标准化,工厂专业化,把工厂联合成统一的生产整体),这在最近就会使生产系数得到真正的不断的提高。

第四、资本主义社会是在高涨和危机的周期性交替中生存和发展下来的,这种交替在战后时期具有一种病态的痉挛性质。诚然,我们的经济也不会超脱于危机之外。更何况同世界市场的日益增多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就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可能产生危机的根源。然而,提高计划的预见性和加强计划的调整工作,是能够而且应当大大地缓和我们发展的危机阶段,并从而保证大量的额外积累。

这就是我们的四个优越性,它们已经在过去几年中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它们的作用不会减弱,恰恰相反,随着恢复时期的结束,它们的作用还将大大地增强起来。在正确地发挥这些优越性的情况下,它们综合在一起就会使我们有可能在最近几年内把工业的增长系数提高到不仅超过战前百分之六的一倍,而且超过两倍,也许还要多。

然而,问题不尽限于这一点。我们列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不但会在国内经济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将依靠世界市场提供的条件而大大增强起来。我们在前面主要是从世界市场所孕育着的经济上的危险性的角度来观察它的。但要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资本主义市场所包含的不只是威胁,它还会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机会去接触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及其最复杂的产品。因此,如果说世界市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卷入进去而产生新的危险,那么它也为一个正在正确地调节其周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抵销这种危险的强大手段。正确地利用世界市场,我们就能够大大地加速比较系数的变化过程而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

当然,我们将要在严格测量水深的情况下向前推进,因为社会主义的航船在这条河上还是首次出航。但是一切资料说明,越是向前行驶,航道将越宽、越深。

写于1925年11月。译自《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第2版第3—7、31—47页。

## 六 人 声 明

### · 编者按语 ·

1925年以后，苏联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斗争。向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过渡的困难使有些人发生动摇。1925年，党内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他们散布悲观情绪，否认苏联能够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他们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遭到迎头痛击之后，就在1926年夏同托洛茨基勾结一起，结成托季反党联盟，他们召开黑会，举行反党示威，建立地下中央，进行疯狂的反党派别活动。

9月底10月初，托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动的反党派别活动，遭到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坚决反击，使他们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于是他们改变策略，暂时退却，以便伺机反扑。10月16日他们抛出了这份六人声明，声明一方面谴责自己所进行的派别活动，表示要遵守党章党规，另一方面却顽固地声称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在揭露他们的这种手法时指出：“现在他们正在收缩自己的派别活动，因为如今时机对他们‘不利’。但是，既然他们不放弃自己的原则观点，既然他们决心保留自己原先的立场，那么，由此可见，他们是意存观望，等待‘良



机’，以便积蓄力量之后一有可能就重新反对党。”（《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5—216页）

以后的事实证明，托洛茨基反对派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我们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与大会的多数和中央产生了分歧。我们的观点已在我们在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发表的正式文件和发言中阐明。我们现在仍坚持这些观点。我们坚决屏弃“派别和小集团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承认这种理论和实践是同列宁主义的原则及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我们认为切实贯彻党关于不允许派别活动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

同时我们认为有责任向党公开承认，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和我们的志同道合者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多次采取了违犯党纪，超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范围而走上派别活动道路的步骤。我们认为这些步骤是绝对错误的，声明坚决放弃用派别方法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因为这种方法危及党的统一，并号召同意我们观点的所有同志采取同样的行动。我们号召立即解散一切围绕着“反对派”观点形成的派别集团。

同时我们承认，我们不顾中央的决议而开始了全国争论，十月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表的言论违背了中央关于不允许全国争论的决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到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sup>42</sup>是不正确的，因为，尽管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决无此意，旧事重提却可能被人理解为分裂的前景和以分裂进行威胁。我们一致屏弃这种前景，认为这极端危险并且与我们的立场毫无共同之点。

我们坚决谴责那种变成攻击的对共产国际或我党政策的批

评，因为这种批评削弱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共产国际的地位，削弱共产国际的先进部队苏联共产党，削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不仅柯尔什以及象他一样与共产主义决裂的人，而且超出这些范围的任何人的宣传，都必将遭到我们的坚决反击。我们断然否认那些进行任何反对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或苏联的宣传的人自命有与我们团结一致的权利。

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每个成员有权在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大会决议的范围内捍卫自己的观点，同时认为绝不允许直接或间接支持共产国际个别支部中任何集团进行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派别活动，不论这是法国的苏瓦林集团，德国的马斯洛夫—费舍、乌尔邦斯—维贝尔集团，意大利的博尔迪加集团或任何别的集团，不论这个集团对我们观点的态度如何。我们认为特别不允许对已被开除出党和共产国际的人如路特·费舍、马斯洛夫的活动加以任何支持。

奥索夫斯基在文章中表述的观点，以及在《真理报》上剖析过的梅德维捷夫的观点（“两党”论，宣传取消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企图与社会民主党统一，使租让政策超出列宁规定的范围等等），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列宁主义并与我们的观点根本矛盾的。列宁对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同志所捍卫的“工人反对派”<sup>88</sup>政纲所作的估价，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完全同意。

我们认为应绝对遵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将无条件地服从并执行这些决议。我们号召同意我们观点的所有同志采取同样的行动。

我们每人只应通过由党章、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所规定的形式来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深信这些观点中正确的东西将会被党在今后工作进程中采纳。

\*                    \*                    \*

近几个月来，许多同志由于违犯党纪和采用派别方法为反对派观点辩护而被开除出党。从上所述，下列签名者显然应对这些行动负有政治责任。我们坚决希望，反对派用实际行动停止派别斗争，这将使被开除的同志们在承认违背党纪和党内统一利益的错误之后，能够重新加入党的队伍，在这里我们有责任尽力协助党消除派别斗争和反对违犯纪律的旧病复发。

格·季诺维也夫

列·加米涅夫

格·皮达可夫

格·索科里尼科夫

列·托洛茨基

格·叶夫多基莫夫

1926年10月16日

译自《真理报》1926年10月17日。

#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 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1日)

## · 编者按语 ·

联共(布)于1926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召开了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接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于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了第七次扩大全会。托洛茨基等六人“声明”墨迹未干,立即利用这两次会议的讲坛发起新的进攻。

托洛茨基在这两次会上的发言,系统地发挥了他的“不断革命”论,否定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把“关于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说成是斯大林“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托洛茨基否认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把个别国家从前在经济上的不均等跟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混为一谈,宣称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规律”。他大肆宣传生产力同民族国家的矛盾,说什么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对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经济的依赖”。尽管托洛茨基一再声明,他“非常不想重提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早已归入了档案的问题”,实际上他用来为自己辩护的武器仍然是早已破产的“不断革命”论。

在这两次会上，斯大林先后作了《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两个极其重要的报告，驳斥了托洛茨基一伙的种种谬论，斥责了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学说。

同志们！决议案指责反对派（包括我在内）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打算把最近时期即与“反对派联盟”这个名称有关的时期内我们（中央的少数）和中央的多数发生分歧的争论问题再一次逐个地进行分析。我应该肯定说，这些争论问题和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提供可以指责我们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任何根据。

同志们，我们争论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在目前时期，目前阶段遇到什么危险，是我们国营工业落后的危险，还是冒进的危险。反对派（包括我在内）证明，我们面临的现实危险是国营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危险。我们多次指出，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所执行的政策而造成的比例失调，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人们不知为什么把这叫做“悲观情绪”。同志们，算术是既不知道悲观，也不知道乐观的。经济统计既不知道乐观、悲观，也不知道缺乏信心和投降精神。数字就是数字。如果你们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来看，这些数字说明，上年度的比例失调，或者确切些说，工业品脱销达三亿八千万卢布，本年度达五亿卢布，这就是说，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初步的控制数字，比例失调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提纲中说，可以指望（暂且还只是指望）本年度不会再增加比例失调了。但是这个“指望”从何而来呢？原来是来自收成比我们所指望的更坏。如果沿着我们批评家的错误道路走下去，我可以这样说，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提纲中实际上是欢迎恶劣的收割条件来摧残我们不坏的收成，因为收成越多，比例失调就会

更大。(李可夫即席说：“我是另一个意思。”)但是数字本身说明问题。(喊声：“为什么你们对李可夫报告不发言?”)加米涅夫同志在这里解释了我们不发言的原因。因为对这个专门的经济报告，除了我们在四月全会上发表的意见以外，我不能补充任何修正案和论据。我和其他同志们在四月全会上所提出的修正案和提议，现在仍然完全有效。但是从四月以来的经济经验，显然还太少，使我们不能指望在当前阶段说服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而重新进行还没有受过经济生活进程检验的那些新争论，也只是徒然使气氛紧张而已。如果新的经验使那些问题在数字上受到检验，它们就更易于为党接受，因为客观的经济经验检查意见分歧，不是看数字乐观或者悲观，而是看它们是否正确。我认为，我们对比例失调的估计是正确的。

我们还争论了工业化的速度。有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指出：现在速度不快，而正是由于工业化速度不快，才使农村分化过程显得特别重要。富农正在抬头，或者说，贫农在农村所占的比重正在减少(这是同一件事的另一个方面)，这里自然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过渡时期的严重现象，病态现象。“害怕”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但是应当正确估量它们。我也认为，在工业落后即在比例失调加剧的情况下，农村分化可以成为危险的现象。反对派曾说过，我们必须逐年减少比例失调。同志们，这里我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坚决主张农村的分化要求对农村各阶层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减轻下中农的税负，增加富裕中农的税负，并对富农尤其是对富农和商业资本的结合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主张免除贫农百分之四十的税。我们对不对呢？我认为对，你们认为不对。但是，这里会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我从未想到。(笑声)

我们说过，在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分化的增长就必须在政

治方面有加倍的保证,就是说,我们决不能容忍扩大富农、雇主、剥削者(哪怕是很小)的选举权。我们曾就扩大小资产者选举权的著名指令发出过警报,这对不对呢?你们会说,我们这个警报是“夸大其词”。就算是这样。但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要求、坚持和主张坚决谴责对“生产实力强大的中农”实行农业合作社的方针,因为这种称呼通常就是指富农。我们主张谴责信用合作社面向农村上层的“变动”(这是政治局报告中用的字眼)。同志们,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在工资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在其已经达到的水平上,不应当这样来提出工资问题:工人必须先提高劳动生产率,然后才会导致工资的提高。而应当相反:工资的提高(尽管较少)应当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喊声:“用什么经费?”)不论是对,还是不对;但这里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把你们所知道的党内生活现象和官僚主义的滋长联系起来。我想,这里也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其次,我们曾反对过高估计稳定局面的经济因素和过低估计它的政治因素。例如,如果问,英国现在的经济稳定情况究竟怎样呢?显然,英国正在破产,它有入超,对外贸易正在减少,生产正在下降。这就是英国的经济“稳定”。而资产阶级的英国靠什么来维持呢?不是靠鲍尔温,甚至不是靠托马斯,而是靠柏塞尔。柏塞尔主义是英国目前“稳定”的另一种说法。因此我们认为,在举行总罢工的工人群众面前,直接或间接支持柏塞尔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我们要求取消英俄委员会<sup>111</sup>。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坚持重新修订我们工会的章程，关于这点我在中央已经报告过了，“工会国际”<sup>112</sup> 去年在章程中被删去了，而代之以“国际工会联合会”，即使按照最善良的愿望，它也只能被理解为“阿姆斯特丹”<sup>113</sup>，而不能有别的理解。我满意地指出，现在对去年的修订作了修订，“工会国际”又重新写入了我们工会的章程，它不能不受到欢迎。但为什么说我们在这方面产生过的不安是社会民主主义呢？同志们，我怎么也无法理解。（笑声）

我想——当然只是扼要地——列举一下最近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的要点。这些分歧是由于我们对党和工人国家的阶级路线在长期的新经济政策和国际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受到的威胁理解不同而引起的。同志们，从这些意见分歧中，从我们在这些意见分歧中所坚持的立场中，无论用怎样复杂的逻辑方法，甚至用烦琐哲学的方法都找不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这就需要从现实的意见分歧——在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目前阶段上所产生的实际而又严重的分歧——回溯很远，从一般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中去探索意见分歧。即不是从对当前的革命阶段，对当前的具体任务的理解中，而是从对革命性质，或者如提纲所说，从对“革命本身”、对“其本质”的理解中去探索意见分歧。德国人在这种场合的说法是：an sich und für sich（自在与自为）。这是一个有名的形而上学术语，就是说，革命与它的周围世界没有实际联系，与革命的今天和明天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产生万物的“本质”。瞧，在这个关于“本质”的问题上，我在革命的第九年竟成了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罪人。罪名不大不小！同志们，关于这一点，我是第一次从这个决议中知道的。我觉得，如果同志们由于某种原因认为必须引用我文章中的话来写决议，那么，至少应当引用我就我国革命性质问题所写的主要著作，可是构成原罪的理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的主要部分，却引用了我在



1917—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的话。同志们，请原谅，不从实质上谈问题，却引证某时某地写的某些话，这是令人非常扫兴的。但是，既然在决议中为了论证“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摘引了我著作中的很多话，我就不得不作出必要的答复。我受党的委托在1920年写了《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来反对考茨基，反对考茨基认为我国革命是非无产阶级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这本书曾经通过共产国际在国内外大量出版。本书所受到的最亲近的同志（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评论，绝对不是敌意的。而决议没有引用这本书。我在1922年受政治局委托写了《帝国主义与革命之间》一书。在这本书里，我根据格鲁吉亚的局部经验重新研究了——通过同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攻击我们的国际社会民主党进行论战——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有权不仅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而且有权破坏它的机构）的基本问题。这也没有引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的委托作了报告，报告的中心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时期。我和布哈林同志发生了争论。他当时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前，将不断地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和危机，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稳定”。当时布哈林同志曾指责我右倾（可能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同意下，为我所论述的提纲进行辩护。提纲的精神是，尽管革命延期，我们如果壮大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就能度过这个阶段。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的委托，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后作的。我论证了什么呢？我证明说，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不引用我受党的委托从1920年到1922年论述我国革命性质的这些著作（不管好坏，但这是主要著作），却从这个时期的一篇序言和另一篇跋中摘引两三行，抓住个别词句不放。我再说一次，没有一

句话是从主要著作中引来的。根据这四段引文(1917—1922年)就定下了我否定我国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罪名。定罪之后,就把其他一切,甚至1925年的反对派都罗列在这一罪名、这一原罪之下。加速工业化的要求和增加对富农征税的建议以后都是出自这四段引文。(喊声:“不要成立帮派。”)

同志们,我珍惜你们的时间,但是,为了反驳决议强加于我的罪名,我还是应该举出几段引文,——我本来可以举出几百条来。首先我请大家注意,构成原罪的理论所根据的四段引文都是引自我在1917年至1922年写的著作。在此以后,我是否认为我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却一概不提,无人知道。现在,在1926年底,为了说明所谓反对派在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目前观点,竟摘引我个人在1917至1922年为止的著作,而且,再说一遍,这不是主要著作,而是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所写成的著作。同志们,现在回头来谈这些引文,我要对每一条引文都作出回答。但请允许我先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举出几段更重要的话。

例如,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我在1921年10月28日莫斯科市工会代表会议上就说过:“我们现在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寄希望于我国经济更长远的发展。我们考虑到,欧洲革命尽管正在成长壮大,但比我们所预料的发展要缓慢得多。资产阶级更加巩固了。在仍然受到资本包围的我国,我们不得不承认要更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装备最好的大企业上。此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农村中的粮食税,出租企业的增多,所有这一切都正在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和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创造条件。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将在大工业更狭窄、但更巩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同年11月10日我在索科里尼奇区党员大会上说过:“我们现在情况怎样呢?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之中,第一、在一

个国家的基地上，第二、在一个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国家的基地上，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之中。”

我作了什么结论呢？主张投降吗？请看我的主张：“我们的任务是要使社会主义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农民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无优越性的裁判员。我们要在农民市场上与资本主义竞争……”

现在我们有什么根据来树立胜利的信心呢？根据很多。国际形势，共产党的发展，我们完全保持了政权，我们只在我们认为需要的范围内才开放自由贸易，这都是根据。”

同志们，这都是在 1921 年说的话，而不是在 1926 年。

我在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说（这是专门反对奥托·鲍威尔的报告，如今却突然要把我和他等同看待）：“我们在市场基础上进行经济斗争的最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权。只有改良主义的笨蛋才不了解这种工具的意义。资产阶级却很懂得。它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掌握的另一种工具是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力：全部经济运输业、全部采矿工业、绝大多数加工企业都由工人阶级直接经营管理。

土地也属于工人阶级，即属于工人国家，农民每年为此缴纳几亿普特的实物税。

工人政权控制着国界：外国商品，一般外国资本只能在工人国家认为适当和许可的范围内流入国内。

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和手段。”

我在 1923 年出版的《生活问题》一书中，曾就这个问题说过：“工人阶级通过以前的斗争取得了什么和保证了什么？”

一、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国家）。

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物质支柱的红军。

三、一切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

四、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这四个牢固地争取到手的因素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钢铁结构。正是由于这个钢铁结构，我们每一个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如果这是真实的成就，而不是虚假的成就）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组成因素。”接着，该书还有更明确和更尖锐的提法。书中说道：“革命的变革对于俄国无产阶级越是容易（当然是相对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越困难。但是，以四个基本因素（见上文）为特征，并受过革命锻炼的我国新社会制度的结构，却使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切善意的和理智的努力在客观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工人使资产阶级发财，而且劳动得愈好，资产阶级就愈是大发其财，尽管工人不愿意和不想这样做。在苏维埃国家中，一个善良的好工人即使没有想到，或不关心（如果他是非党群众或者不问政治），他却正在完成社会主义的工作，增加工人阶级的资金。十月革命的意义正在这里，新经济政策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意义。”

我还可以尽量增加引文，因为我对我国革命没有做过别的解释，也不可能做别的解释。但我还是仅限于摘引斯大林同志引用过的那本书（《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它最初是在1925年发表的，作为小品文刊登在《真理报》上，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从来没有向我指出过书里有什么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异端思想。这本书在今年出了第二版，并由共产国际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我以前没有听说这本书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作了不正确的描述。斯大林同志随意看了两三行，就说“不明确”。因此我不得不再往下念，以说明这是完全明确的。

首先请看序言，它专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和社会民主

党的批评家，首先是批判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这里说：“（敌人关于我国经济的）评论有两个方面：第一、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使国家破产；第二、说我们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是走向资本主义。第一种批评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第二种批评具有社会民主党的特色，即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希望本书能向没有成见的读者表明，无论公开的大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自封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在说谎。当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使俄国破了产，这是说谎……当他们说生产力在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是说谎。在工业、运输业、商业和财政信用系统方面，国营经济在全国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缩小，相反却在增大。数字和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问题要复杂得多。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点也不感到突然。从分散的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耕作制，只有通过技术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步骤才有可能。这种过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政权保持在竭力想领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阶级手中，这个阶级越来越善于通过国营工业来影响农民，提高农业技术，从而为农业集体化创造前提。”

批评反对派的决议说，托洛茨基的观点很接近鲍威尔的观点，因为鲍威尔说过，“在无产阶级仅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时，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首先，同志们，怎么能够设想我们中间竟有人会想出这样庸俗的问题提法？“当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这个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什么呢？所谓“文化方面”，怎样理解呢？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独立的农民文化是没有的，农民只能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或者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达到文化方面的成熟。农民的文化发展只有这两种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认为，“文

化上成熟的”农民会抛开无产阶级，独立掌握政权，这就是最粗陋、最庸俗的偏见。我们从列宁所阐明的两次革命的经验中深知，如果农民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推开它的政权，那么农民只能成为（经过波拿巴主义<sup>109</sup>）资产阶级的桥梁。不可能有一种建立在既非无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基础上的独立的农民国家。可见，鲍威尔的全部说法都是极其鄙俗的市侩见解。

说什么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指责我们进行正是“掠夺”农民（不是富农，而是农民！）的鼓动。

同志们，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我们词典中的用词，因为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建议工人国家“掠夺”农民，而这里说的正是农民。如果说，建议免除贫农百分之四十的税并把它转加到富农身上，这有可能正确或不正确，但这绝对不是掠夺农民。

我要问你们，如果说我们不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尤其是说我）主张消极等待欧洲的革命，我希望对我说明：那我们为什么主张“掠夺”农民呢？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是无法理解的。我们认为，工业化——社会主义的基础——发展太慢，这是打击农民。比方说，如果农民收成的商品部分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我假设的），但如果谷物的售价下降百分之八，而各种工业品的价格象过去一样，提高百分之十六，那么农民的收入就会恶化，还不如歉收和工业品廉价零售的时候。加速工业化，尤其是通过对富农征收更高的税额，将提供大量降低零售价格的商品，这既有利于工人，也有利于大多数农民。

你们可以对此不同意。但谁也不能否认，这里说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套看法。你们怎么能说我们：“你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而要求掠夺农民？”什么原因？为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我肯定，这是无法解释的。有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曾问过不止一次，为什么解散英俄委员会就是号召退出工会？而

为什么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就不是号召工人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工会呢？（喊声：“会对你们说清的。”）我至今没有得到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将来也得不到。（喊声：“会得到的。”）对于怎么可能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力图“掠夺”农民的问题我也将永远得不到回答。

在同一本书（《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还详细谈到，正确分配国民收入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之中。“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两种倾向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去试着证明这个前途是不可避免的吧。即使他们比可怜虫考茨基办事娴熟，也会碰得焦头烂额的。然而，上述前途是否能够排除呢？从理论上说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执政党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连犯错误，从而阻碍了目前大有发展希望的工业的增长，如果党放弃对农村政治经济过程的监督，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败。然而，我们决不打算根据这些前提来作出我们的预测。在1918年11月9日以后，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出色地教训了国际无产阶级，怎样丧失政权，怎样断送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怎样为资本主义效劳。这里就无需多说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们想要表明，怎样保持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怎样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内容充实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

本书的全部内容，（喊声：“关于合作社只字未提。”）——也谈了合作社，——书的全部内容是专门论述怎样以社会主义内容充实苏维埃国家形式这个题目。有人可能会说（已有这种苗头）：“是的，当处在恢复过程中，工业发展速度占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四

十五的时候，你认为我们是在走向社会主义，但当我们遇到固定资金危机的时候，你在恢复和扩大固定资金的困难面前就表现得所谓‘惊慌失措’。”

我不能全部引证《发展速度及其物质限度和条件》这一节（第43页及以后各页）。这里指出了我们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四个因素，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优越性如果得到正确的利用，就能在最近几年内使工业增长率比战前的百分之六提高两倍、三倍、甚至更多。”

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我国工业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八。固然，这里还包括恢复的因素。但是不管怎样，我在一年半以前用作例证而提出的粗略统计数字和我们今年的实际速度非常接近。

你们问：那么决议中引用的这些惊人言论又作何解释呢，——我应该作出答复。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我在1917—1922年关于革命性质所写的主要著作，一本也没有引用。而我在1922年以后，在去年和今年写的东西，却被蒙上了一块奇怪的幕布，引了四段话。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这几段话，决议也说到了，所以请你们允许我也来谈谈。

“工人运动在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变成反革命势力。在农民中，整个富农阶层和很大一部分中农也‘聪明起来’，安静起来，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以便从无产阶级和……贫农手中夺走政权……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sup>①</sup>

同志们，我很担心，如果有人这样说，这段话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恶毒成果，很多人都会相信。但这段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

---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68—71页。——编者注



在《列宁文集》第五卷中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5年底构思的小册子笔记。那里描绘了一个前景：工人在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富裕农民和相当大一部分中农转到反革命方面。顺便说一句，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最近一期第六十八页上引了这一段话，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用了引号，却有粗暴的歪曲：干脆删去了提到大多数中农的话。我建议把《列宁文集》第五卷第四五一页和最近《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九、二十期第六十八页对照一下。

我可以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举出几十段这样的话：第六卷第三九八页，第九卷（我没有时间来念，谁想核对，可查记录）第四一〇页，第七卷第一册第一九二页。

我还要再从第九卷第四一五页上引一段话：“俄国革命（指民主革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市有制也好，国有化也好，或分配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制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sup>①</sup>（即席喊声：“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对，我会谈到它的。现在来引一段我在1922年所写的话，说明我对1904—1905年时期革命的看法是怎样形成的。

同志们，我非常不想重提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这个理论和目前的争论毫无关系，不论是其中正确的部分，或不完备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都与目前的争论毫无关系。这一点我已经声明过几十次。无论如何，对我们近来大谈特谈的这个不断革命论，不仅1925年的反对派，而且1923年的反对派，你们知道，都不能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早已归入了档案的问题。现在回头来谈谈决议中所引用的话（诚然，是我在1922年写的，但是是从1905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49页。——编者注

—1906年的角度写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虽然这是在1922年写的，但这句话用的是将来时，是说无产阶级会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这是叙述革命前的观点。请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5—1906年说大部分中农会“聪明起来”并转到反革命方面去的预言证实了没有？是证实了，还是没有证实？我肯定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证实了。(喊声：“一定程度上？”“什么时候？”喧哗声)在党的领导下，首先是在伊里奇的领导下，用新经济政策克服了和农民的分裂，这是无容争辩的。(喧哗声)同志们，如果你们有谁认为我在1926年没有领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那他就错了。我在1926年领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可能比别人差些，但毕竟是有领会的。但是请你们注意，在还没有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还没有1917年革命的时候，在我们想象革命发展的前景的时候，根据过去革命——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举出了引文)在内，有过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并把土地交给农民以后，将会象同反对者，甚至同反革命势力发生冲突那样，不仅遇到大农，而且还会遇到大多数中农的反抗。我们这里出现过这种反抗的“迹象”没有？出现过某些迹象，而且还不少。例如，当马赫诺匪帮在乌克兰帮助白匪扫除苏维埃政权时，这就说明伊里奇的预言是正确的；当我们这里发生安东诺夫叛乱、西伯利亚叛乱、伏尔加叛乱和乌拉尔叛乱时，当“中农”在喀琅施塔特叛乱中用十二英寸口径的海防大炮和苏维埃政权交锋时，这难道不就是说，伊里奇的预言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正确的吗？(莫依先科：“你主张什么？”)我在1922年的著作中关于和农民分手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确认这个事实而已，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我们用新

经济政策克服了和农民的分裂。但是，难道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有过意见分歧吗？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没有意见分歧。（喧哗声）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前夜，当党在寻找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时，在工会问题上发生过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具有严重的意义；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政纲时，我们完全投票赞成，当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几个月之后从新经济政策中产生了关于工会的新决议时，我们在中央也是一致赞成的。而在转变关头——这种转变是非同小可的——，农民（包括中农）却说：“我拥护布尔什维克，但反对共产党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中农在这个阶段上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特殊的俄国形式。

我因为说过“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而受到指责。这是我在1917年8月写的。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难道我们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了脚吗？我们来回顾一下事实。当德国和协约国缔结条约时，局势是岌岌可危的。如果这时没有及时发生德国革命，一次遭到社会民主党破坏而没有完成的革命，但毕竟是一次推翻了旧制度和瓦解了旧的霍亨索伦军队的革命，如果德国仍然象以前一样，那我们可能就已经被推翻了。这里不说一般“资本主义的欧洲”，而说“保守的欧洲”，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机器，而主要的是军队。请问你们：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不能生存下来？（喊声：“得了吧，你难道是在和小孩讲话吗！”）同志们，如果说我们生存下来了，正是因为欧洲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写的：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sup>①</sup>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什么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页。——编者注

时候说这种话的？1919年3月18日，即十月革命后两年。难道这在实质上不是同一个意思么？我在1917年8月说话的意思是，如果我国革命不能推动欧洲，不能震撼欧洲，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喊声：“在德国进行的革命犯了错误。”）在1917年以前和在1917年从政治设想上有过考虑的那些老同志，请问，他们是怎样想象革命及其后果的？当我想让自己和别人回忆这一点时，我发现大致的说法都一样：“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对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我们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革命命运。这是谁说的？（莫依先科：“列宁。”喊声：“而不久以后他是怎样说的？”）列宁的话是在1921年说的，而我的话是在1917年说的。因此我有权为我在1917年说的话向列宁在1921年说的话申诉。（喊声：“列宁后来说了什么？”）后来我也讲了一点别的。（笑声）“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即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7页。——编者注

引文接着说，道路是更为曲折、更为复杂的，但我们的预见基本上是正确的。重说一遍，我们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是同心协力，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莫依先科：“为了不致灭亡。”）

对，正是为了不致灭亡；正是为了不致灭亡——我已经说过了，我领会到这一点——，我们共同努力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

同志们，我请求给我延长时间。我想谈谈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我请求再给我（我只剩下五分钟了）半小时。（会场上喧哗声）同志们，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

（执行主席：“等一等，我们来决定。还有什么提议？”）

有二种提议：第一种提议是照原来规定不变，第二种提议是再延长半小时，第三种提议是只延长一刻钟。

表决：谁赞成再延长半小时？请举手。谁赞成延长一刻钟？少数。你还有半小时。”）

下面一段引文用来对我进行如下的指责：虽然伊里奇说过，“在十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sup>①</sup>，托洛茨基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我要问，这段引文首先是什么意思？伊里奇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保持十至二十年的正确关系。这就等于伊里奇说：在十至二十年内我们不能建成任何社会主义。为什么？因为所谓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理解为一种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没有阶级的制度。社会主义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这就是说，这里描绘了二十年的前景。在此期间，我们必须执行一条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政治路线。首先是这一点。但接着又说了，托洛茨基主义认为，“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是说，我规定了一条法律，在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3页。——编者注

世界革命胜利以前应当尽可能和农民建立不正确的关系。(笑声)同志们,显然,在这里想说的不是这种思想,因为这句话根本没有意义。

新经济政策是什么?新经济政策是走上新轨道的过渡,正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更正确的关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吗?不,没有意见分歧。我们现在争论的是对富农征税,无产阶级和贫农联系的方式方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关于如何建立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争论。你们可以认为我们哪些建议不正确,但是整个思想斗争正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上究竟保持怎样的关系才更为正确而引起的。

在1917年期间我们在农民问题上出现过意见分歧没有?没有!我们一致接受了农民委托书即“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作为我们政纲的基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是在膝盖上用铅笔起草的土地法令在我们中间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是一致通过的。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引起任何意见分歧。(莫依先科:“而布列斯特和约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展的争取中农的斗争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确定了对待农民的态度党纲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我不是说,不曾有过任何意见分歧,但我肯定说,即使在个别重大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那么在党对待农民政策的基本路线上是没有意见分歧的。

是的,1919年在人们中间有过在这方面有意见分歧的流言。关于这件事伊里奇是怎样写的呢?我来提醒一下。那时有个农民古洛夫问我:你和伊里奇有哪些意见分歧?我回答了他。我的回答刊登在《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sup>114</sup>上。下面是伊里奇的话,刊登在1919年2月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是从列宁文章中一字不差地引来的:

“1919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了农民

格·古洛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并且谈到各种流传的谣言，如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恰恰在中农问题上他们之间有巨大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2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的《给中农的一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中说，关于我同他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和无意帮助他们的人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谎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符合事实的。我同他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在中农问题上不仅我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而且我们两人所参加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由苏维埃选出的，受这个党领导的现在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万分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话。”<sup>①</sup>

这是在新经济政策以前，然后就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再重说一遍：难道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有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就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问题作过与鲍威尔论战的报告。后来我在这个问题上说过：“新经济政策受到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欢迎，认为这是解放生产力的一个必要的（但自然是‘不够的’）步骤。考茨基以及奥托·鲍威尔一类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们都赞成新经济政策，正是把它看作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曙光。他们还补充说：或者是新经济政策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可喜的结局），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破坏新经济政策（悲惨的结局）。”

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报告证明说，新经济政策不会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但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

---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23页。——编者注

我的这段话曾使我受到指责(因为在这里我们直接谈到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我的话),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是在1922年说的。而后来在决议中指责我们说:“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道者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这种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sup>①</sup>可能这里有点细微的差别(我现在还未发现),这里的提法不够确切(这一点我也看不出来),但是说这些观点“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就太过分了。首先我举出和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sup>②</sup>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位比我重要的人物说的,这是伊里奇在1918年11月8日说的!不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而是在1918年11月8日,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年。同志们,如果他仅仅说了这些,我们当然可能任意滥用个别引文来做论据。(喊声:“这是关于最后的胜利”。)不,对不起,他说:“需要最积极的合作。”同志们,企图转到武装干涉上是说不通的,企图回避基本问题转到武装干涉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合作,不是仅仅免除武装干涉,而是“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的”合作。(喊声:“怎么回事?”喊声:“结论,结论。”)同志们,这不是唯一的谈到问题不仅在于武装干涉的引文。目前的结论就是我所说的观点:由于落后所产生的内部矛盾应当在国际革命中求得解决,这并不是我的特殊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39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34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见解，而是列宁多次极其坚决果断地阐明过的同一个观点。

有人对我们说，这对于似乎还未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时代，即对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是正确的，我不能详谈这个问题。但是遗憾的是，我应当说，斯大林同志在理论方面和历史方面陷入了最严重的错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帝国主义以前很早就有了。此其一。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现在在各国的的发展极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在十九世纪要比二十世纪更加悬殊。当时，英国是世界的霸主，而日本，根据我们上一代的记忆，则是一个异常闭塞的封建等级国家。在我国农奴制废除的同时，日本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国在酣睡，如此等等。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尖锐，更加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不平衡性的认识并不比我们差。正因为金融资本是最活跃和灵活的资本形态，所以帝国主义的发展比金融资本主义的前期更具有“平衡”的趋势。毫无疑问，现在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发展不平衡性，但是说在过去，在十九世纪，在帝国主义的前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平衡，因而说什么当时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正确的，而现在，帝国主义发展的类型增加了，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正确的了，不，这不能自圆其说，这是和全部历史经验相矛盾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现象。必须寻找其他更有力的论据。

斯大林同志写道：“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sup>①</sup>

而我们在1918年听见伊里奇说过，为了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个先进国家的直接合作，“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然而，列宁并没有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请看他在1918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编者注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这是针对考茨基主义和苏汉诺夫主义），他们硬说在世界各国的革命爆发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并不怀疑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等待劳动阶级完成世界规模的革命，——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①

对不起，下面是这样说的：

“这是荒谬的。革命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后地取得胜利。”②

然而，伊里奇没有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后来，在 1921 年，不是在 1917 年，而是在 1921 年，又说：

“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发展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③

这里不是说武装干涉，而是说国家经济和阶级发展的水平。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④

“另一个条件，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互相协议。”……⑤

①②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45—346 页。括号里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

编者注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203 页。——编者注

④ 同上。——编者注

⑤ 同上。——编者注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协议，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sup>①</sup>

这就是说，伊里奇并不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达成协议，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不管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如何，他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这只是一个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其他国家革命的及时支援。他把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对于我们特别必要的条件，因为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最后，我说过：“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这也成了我的罪名。同志们，显然，我们已经有点忘记了正确运用术语了。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有共同引为自豪的巨大成就，我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向外国人也极力说明这些成就。但对这些成就有多大，应当有冷静的估计。李可夫同志的提纲说，我们接近了战前水平。这也不确切。我国的居民人数也一样吗？不，更多了！而按人口平均的工业品消费量呢？比1913年低得多。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草案，我们只有到1930年才能达到1913年按人口平均的工业品消费量。1913年的水平是怎样的呢？这是贫困、落后、野蛮的水平。当我们说到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真正的高涨时，这就是说，城乡之间不应该有矛盾；这就是说，皆大欢喜，生活富裕，都有文化。这才是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我们离这一天还远得很。我国现在还有大批流浪和失业的人口，我国农村每年有两百万剩余劳动力，每年流入城市约五十万，而工业每年所能吸收的人数不超过十万。我们可以为既得成就而自豪，但不能破坏历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4页。——编者注

史的远景。这还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这仅是在联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桥上初步的几个重大步骤。这难道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我受到指责的那段话是绝对正确的。

伊里奇在 1922 年曾说：

“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向来确认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sup>①</sup>

可见这里说的不是武装干涉，而是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也许，你们会说，这是伊里奇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写的，当时好象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不，这是他在 1922 年写的，这个规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的确，在《论合作制》这篇文章中有唯一的一段话，人们企图用来和伊里奇说过的全部言论对立起来……（喊声：“偶然的。”），不是偶然，一点也不偶然，我完全同意这段话，只是应该正确理解它。这段话是：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96—597 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sup>①</sup>（念得很快。笑声。）同志们，请再给我几分钟。（笑声。喊声：“对。”）对，我对这段话完全同意。（喊声：“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里说明什么，这里列举了哪些因素？这里列举了：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四、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五、合作社。这就是伊里奇在这里列举的因素。请问你们，你们中间谁也不认为可以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不是吗？如果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掌握了政权并组成了合作社，（喧哗声）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不，不能。这是说，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要有一系列别的因素，如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技术、文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列举了国家的条件，所有制的条件和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仅此而已！他是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使农民无产阶级化，不需要各种新的革命，只要有了政权，有了和农民的联盟与合作社，我们就能利用这些国家的和社会的形式与方法把任务执行到底。但是，同志们，我们知道伊里奇还有另一个社会主义定义，即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样，我念的那段引文是否取消了电气化呢？不，没有取消。这段引文对伊里奇所有其他论述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我在上面作了明确的说明——是补充还是取消？我说，这句引文是补充，而不是取消我上面引用的那些话，因为我们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国际市场、非常现实的国际经济的环境中为电气化而奋斗的。世界经济不是理论上的概括，这是一种有力的现实，它的规律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编者注

也对我们施加压力，而且我们每一年的发展都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在比较详细谈到这点以前，我要提醒一下，某些同志在根据伊里奇《论合作制》一文的引文进行片面解释而造出一种全新的理论以前，他们自己曾坚持过别的观点，而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极不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和现在（喊声：“这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的完全不一样，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这段话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直到1926年还全盘保留下来。请听：

“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sup>①</sup>

这是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写的，而决议中引用我的话，却截至1922年为止。（笑声）是的，这是在1924年说的；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了免除武装干涉，不是为了防止复辟，不，不，决不是，而是“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斯大林同志改变了这种观点。这当然是他的权利。

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

“这种说法的缺点在哪里呢？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页。——编者注

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sup>①</sup>

对不起，在前一段话（1924年）中这两个问题根本没有混淆，那里不是说武装干涉，而是非常清楚地说单靠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不可能完全组织社会主义生产。

同志们，难道问题真是归结为武装干涉吗？决不能把问题设想成这样，我们在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而外来的敌人可能打破我们的玻璃。问题不如此简单。武装干涉是战争，而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政治则是集中表现的经济。可见，问题在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决不限于所谓武装干涉这种特殊形式。这些关系更加具有连续的和深刻的性质。布哈林同志曾直截了当地说，整个危险仅仅在于武装干涉，如果没有武装干涉，“我们甚至在这个缺乏技术的基础上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的，这是对的。——托洛茨基注），这种社会主义的增长会异常缓慢，我们会象乌龟爬行，但我们毕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一定会建成社会主义”（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

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的；说我们将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并肩建成社会主义，这是无可辩驳的。（笑声）我觉得，在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上当人们说到将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并肩建成社会主义时发笑，是不对的。（笑声。喊声：“不要恶意煽动。”“不要来笼络我们。”）我说，象乌龟爬行我们是永远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我们受到世界市场日益严密的控制。（喊声：“你胆怯了。”）请看，布哈林同志是如何想象这种建设的。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

<sup>①</sup>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1页。——编者注

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应该说这是出自布哈林手笔的经院气味最浓的文章）（笑声）中说：“争论的是，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并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说，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布哈林《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9—20期第54页）请听，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能不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如果“撇开”，就能够。但撇开是办不到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此。（笑声）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笑声）但是我担心，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无论天气或是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的。（笑声）

“再重复一遍：争论的是关于各种内部力量的问题，而不是和国外有联系的危险。也就是说，争论的是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布哈林，《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9—20期）我国革命从什么时候起和国际条件无关而具有独立的性质呢？我肯定说，如果没有两个国际条件，即第一、如果没有大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本；第二、如果没有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我国革命。在1917年以前，革命就是通过各种伟大的世界力量的汇合而准备起来的，十月革命就是由于这些力量的汇合并经过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现在有人却对我们说：“撇开”国际环境，在我们家里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态度。这是不能撇开世界经济的。什么是出口？内部事务还是国际事务？要在国内收集出口产品，似乎就是内部事务，而要输出到国外去，似乎就是国际事务。（笑声）

什么是进口？进口好象是国际事务，因为要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但输入国内似乎又是内部事务。（笑声）请看，布哈林同志主张“撇开”国际环境的全部理论在进口与出口问题上立刻破绽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取决于速度，而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则最直



接最尖锐地取决于原料和装备的进口。当然，可以“撇开”外汇不足而订购大量棉花和机器，但这样只能干一次，第二次再要这样“撇开”就行不通了。（笑声）我国的全部建设受着国际的制约。

当有人问我，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我应当说，这个问题本身是提得不够妥当的。如果你们不是根据从未经校订的记录中随意摘取三言两语，而是根据我关于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几十篇和几百篇的文章和演说，我们只有这样互相对待，不是抓住未经校订的辞句，而是从实质上看待彼此的观点，——那么，你们在作出判断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同你们一样认为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是否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已经引用许多言论作了回答。如果你们问，国内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资金在三十或五十年内彻底建成社会主义，而不管全世界将发生什么事件，那我要说，问题的提法根本就不正确。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帮助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而世界无产阶级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内夺取政权的希望决不比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少；希望决不会更少，而是更多！

同志们，请问，当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是重要之点，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你们说：不管在此期间全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好的，我们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多少时间？伊里奇认为，二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性就是三十年也建不成。最低期限也要三十年至五十年。请问，在这个时期内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如果不对欧洲作出预测，也就不能为我国作出预测。这里可能有几种前景。如果你们说，三十至五十年内欧洲无产阶级自然会夺得政权，那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内取得政权，那么无论在我国或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的阵地都是确保无虑的。但是，

显然你们认为，应当从这样的前景出发：欧洲无产阶级在近三十年内不会夺取政权。否则你们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全部预测呢？请问，在这一时期内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单纯从理论上说，这里有三种设想：或者欧洲将象目前一样，围绕着战前水平动荡不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此起彼伏，互相平衡。这种“平衡”我们所以称之为不稳定的“平衡”，是因为它……是不稳定的。这种局面不可能延续二十、三十、四十年。这种局面必将朝着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得到解决。你们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将找到新的动的平衡，你们是否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将保证自己有新的高涨时代，帝国主义大战前的扩大再生产呢？如果认为这是可能的（而我认为资本主义决没有这样的希望），如果在理论上姑且假定如此，那么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还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是推动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的上升的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我们来得太早了。

（执行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已经超过允许给他的时间，已经半个多钟头了。他请求再延长五分钟。表决一下。谁赞成再延长五分钟？谁反对？还要再表决吗？”）

我请求再付表决。

（执行主席：“谁赞成再给托洛茨基同志五分钟？谁反对？多数。”）

我想用五分钟作一些简短扼要的结论。

（执行主席：“再表决一次。”喊声：“用代表证表决。”执行主席：“用代表证表决。谁赞成给托洛茨基同志五分钟？请举起代表证。谁反对？少数。与其花五分钟数票，不如给他五分钟。托洛茨基同志讲话。”）

总之，如果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在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三十至五十年内将走上坡路，那么就应该作出结论，我们将被窒息

或被击溃，因为上升的资本主义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还会拥有相当的军事技术和完全相当的手段。此外，我们知道，当资本主义实力大增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工人贵族鼓动群众进行战争。在我看来，这种阴暗的前景正在被世界经济的整个局势所排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前景建立在上述前景上面。

还有第二种前景：资本主义没落和腐朽下去。但要知道，这正是欧洲无产阶级学习——很慢，但毕竟在学习——进行革命的艺术的基础。

能不能设想欧洲资本主义会腐朽三十至五十年，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问，为什么我应当接受这个只能称之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毫无根据的极端悲观心理的前提呢？同时又对靠我国孤立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着无批判的乐观情绪呢？我作为共产党员的理论职责或政治职责在什么意义上使我必须接受欧洲无产阶级在四十、五十年内不会夺取政权（如果会夺取，那么争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前提。我断言，我没有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加容易些。

不。这里较多的希望完全在欧洲无产阶级方面。如果这样，请问：为什么列宁把这两个因素看成彼此对立的，而不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条件”呢？为什么需要在理论上承认在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呢？这种前景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1925年以前谁也不曾提出这个问题呢？（喊声：“提出过。”）不对，谁也不曾提出过，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也说过，单靠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今天还是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候，才能得到保证。这决不是说，我们的建设是非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和不应当全力以赴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象德国工人在准备夺取政权那样，准备未

来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项成就都有利于德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他们的斗争也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唯一正确的国际主义前景。

我在结束发言时要重复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说过的话。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虽然有官僚主义病态），即还需要不顾某些错误的官僚主义的主张而大大接近工人阶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如果我们不认为我国有足够的资源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我们不确信我们能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那我们显然就不能留在共产党的队伍中。

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这两条标准来评价反对派：或者反对派只可能有一条路线，或者可能有另一条路线。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我们的建设不是社会主义建设，那就应当使无产阶级反对这个国家，并且应当建立另一个党。

第二条路线。（喊声：“你们已经开始了这条路线。”）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有着官僚主义病态，受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如果认为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但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足以保证按需要分配国民资金，那就应当用党的手段和办法反对你认为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危险的东西，并对党和工人国家的总政策负完全责任。（执行主席的铃声。）现在就结束发言，还有一分半钟。

毫无疑问，最近时期的党内斗争的特点是表现为派别活动这种极端尖锐的形式。毫无疑问，反对派方面这种尖锐的派别活动（不管它是由于哪些条件引起的，我现在且不去谈它）可能并且已经被大多数党员群众理解为意见分歧已经很大，可能使共同工作无法进行，即可能引起分裂。这就是说手段和目的显然不相适应，

即反对派所要维护的目的和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所采用的手段互不适应。正因如此，我们承认了这种手段（派别活动）是错误的，这不是由于今天的考虑（喊声：“没有力量啦。失败了。”），而是由于估计到党内所形成的整个局势。10月16日声明的目的和意思是在共同工作和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对党的总政策一致负责的范围内维护我们所坚持的这个或那个观点。

同志们，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决议的客观危险何在呢？危险在于它把不仅必然产生派别性政策，而且必然产生两个政党的政策的这样一些观点强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决议有把10月16日声明和中央通知变为一纸空文的客观倾向，这个通知曾满意地……（喊声：“这是威胁？”）……不，同志们，这不是威胁。我最不愿说威胁话。（喊声：“那这是为了什么？”）你们马上就会听到了，请听到底，还有几句话。

在我们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会造成损失，而我就所谓反对派的同志们，首先是领导同志们的情绪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这项决议的通过决不能迫使我们离开10月16日的路线。我们不接受强加于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打算人为地扩大意见分歧或者使它激化，从而准备恢复派别活动。相反地，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不缩小意见分歧（分歧是存在的），同时竭尽全力在不中断工作和对党的政策共同负责的范围内来处理这些分歧。

译自《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  
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505—535  
页。

#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12月9日)

同志们！首先我想请求你们不要限制我的时间。议程上的问题就象围绕着轴心一样在围绕着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打圈子。一位青年同志很随便地数了一下在这个大厅里反对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发言人的名单(而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其中有布哈林、库西宁、特伦、佩珀、伯尔契、施特恩、布兰特、雷梅勒,更不用说斯大林同志的长达三小时的报告了。

这里行将结束的争论别致得很。今年1月,我们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告各兄弟党书说:

“联共(布)中央完全一致地认为,把有关俄国问题的争论带到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去是不适宜的。”

可见,这样的国际性争论从没有正式进行过,至少我们没有参加过。这里有人想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起诉书来了结这一场没有正式公开过的争论。

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是违反我的意图、我的信念和我的真正观点的。为了向你们证明,我并不是那个强加在我身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责任编辑,请你们让我的时间不受限制(至少两个小时)。

(给托洛茨基同志一个小时。)

同志们,我要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言,尽管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

《真理报》上今天可以看到这样一篇社论，其中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作了发言的事实解释为派别活动的企图。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共产国际扩大执委会根据里泽同志关于让联共(布)反对派代表发言的建议作出的决议，完全是按照另一种精神起草和通过的。台尔曼和埃尔科利同志的发言也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今天宣读的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信也没有说我们发言就是破坏我们10月16日的声明。不，不是如此。如果中央委员会作了这样的声明，我就不会向主席团请求发言了。中央固然说过，我们的发言可能促使派别斗争恢复起来，但中央让我们自己对此作出抉择。中央的声明提到，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甚至不顾直率的建议而拒绝发言，理由是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就当时争论的问题表示了意见。同志们，可是我应该就此提到一个事实，即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正是责备我不愿意发言。在这个决议中说，我以似是而非的理由为借口而不向共产国际的最高机关说明自己的观点。

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声明说，我们的发言不是申诉，那么我们只是想以此表示一个完全明确的思想，第一，我们不提出任何决议案，其次，由于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意图和行动，因此我们尽力使我们表达的思想不致推动共产国际内同情我们的同志走上派别斗争的道路，而是相反地，促使他们放弃派别活动。说我们的发言本身似乎就是违背10月16日我们所承担的义务，这是不正确的，因为10月16日承担的义务和中央对此的回答，使我们完全能够用正常的党章规定的办法来坚持自己的思想。

同志们，我已经说了，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争论的轴心。我们尊敬的主席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我在争论中有个人突出的野心，这是对我的曲解。情况完全不是如此。这里谈的是政治问题，而决非个人问题。而且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政治问题同我个人、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是完全错误的、人为的，

但这不是被我，而是被那些批评我们观点的同志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同志的报告，至少是前半部分（因为可惜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今天《真理报》上刊登的前半部分），我认为是一个通篇指责反对派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报告。这个指责所依据的是从几十年的政治活动和新闻活动中抓到的引证，这是企图用种种诡辩的逻辑从早已为事件进程解决了的旧争论中吸取现成的答案，来应付今天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崭新阶段上我们和整个共产国际所面临的问题。这一套人工设计三番五次依据的事实是，我在我的政治生活中，在我多年的政治活动中站在布尔什维克党之外，而在某些时期甚至激烈地反对过党和反对过列宁的极为重要的观点。在我这方面曾有过错误！单是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然是没有“条件”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在纲领、策略、组织和党籍方面是不许有什么条件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证明，过去那些使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已经留在党外了。

（雷梅勒的喊声：“怎能把那样的东西留在党外呢！”）

当然，同志们，这不能按照雷梅勒同志那样从表面意思上来理解。我的意思是说，意见出入和意见分歧已经由我在政治生活的进程中，根据政治生活的经验加以消除了，在我入党以前，我的活动中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因素就被事实以及来自事实的思想经验克服了。当然，我完全愿意承认雷梅勒同志（和其他一切人）有权自命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性更强的共产主义者，要知道问题不在这里。对我的政治生活道路负责的是我一个人。党只是把我当作自己的党员看待，我也只是用这样的称号从这个讲台上辩护一定的思想。

当我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意见分歧是相当严重的。且只说一些主要方面，这些分歧牵涉到对俄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从而对最近革命的前途和它从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可



能性所作的具体估计。关于所谓不断革命的问题是与此有联系的。另一方面，意见分歧牵涉到建党的方法和道路以及对孟什维主义的态度。在这两个问题上（当向我提出这类问题时，我已经作了书面说明），在座的同志们反对我远不都是正确的。但列宁，他的学说和他的党反对我则无疑是正确的。为了答复对此有怀疑的同志们，我曾写道：

“我们认为，正如经验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的，在一切多少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谁要是和列宁的意见发生了分歧，真理无疑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方面。”

接着又说：

“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完全站在列宁根据 1905—1917 年的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所制定的理论与策略学说（“结合”）的立场上。”

现在完全违反事业的利益而被人为地卷入争论的这个理论，即不断革命论，在我还没有看到作为对所有的革命都适用的万能学说、作为一种超历史理论的这个理论的缺陷时，我是不理解的，尽管我引用了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的话。当时我把不断革命的观点运用于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一定阶段。我只知道唯一的一部作品（而且直到最近几星期我才知道），试图从这个理论中造出一种万能的学说，使它具有修改列宁的理论立场的性质。下面我就要向你们念一段引文。用不着说，我和这种解释丝毫没有共同之点：

“……在 1905—1906 年革命的民族局限性的条件下产生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必须通过清洗典型的民族特征，取得国际思想体系的资格。列·达·托洛茨基在 1905 年从理论上进行了这种使布尔什维主义清洗掉民族色彩的工作，他企图用欧洲不断革命的思想把俄国革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联系起来。”

这不是我写的，不，这是一位名叫曼努伊尔斯基的同志在 1918

年写的。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喊声：“我写了蠢话，而您现在却来重复它。”）

蠢话？完全同意您的说法。（笑声）尽管不得已地把自己的意见称为蠢话是不愉快的，但是，同志们，你们根本不用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情况表示不安，毫无根据地硬说我树立了伟大的英雄业绩的曼努伊尔斯基同志马上又会说我犯了两三个莫须有的错误，并通过这种办法来维持平衡。（笑声）

同志们，近年来我再一次碰到了不断革命论，而且是一种有时在事后塞给我的丑化了的不断革命论。这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请回想一下由于我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而展开的争论吧。当时指责我为几乎是取消主义的趋势辩护，虽然我是在列宁的完全同意下来为这些趋势辩护，而反对许多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危机将不断地（不停顿地）发展和尖锐化的同志的。我说我们应当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稳定的趋势，临时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暂时好转，又说我们应当由此作出策略的结论，我的这些论点当时被某位极左派斥责为几乎是半孟什维主义的观点。首先这样做的是佩珀同志，我记得他当时还是初次登上共产国际的舞台。

（佩珀的喊声：“您当时不得不接受我对决议案的建议！”）

原来如此？既然佩珀同志不顾我的有限时间而从主席团上来打断我的话，我就要提醒一下，我们都知道佩珀同志有三条福音。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第一条福音说：俄国革命需要西方不断的即不停顿的革命攻势，因此佩珀维护了三月行动（1921年在德国）的错误策略。

后来佩珀同志去了美国，又从那里给我们带来了第二条好消息：共产国际应当支持拉福勒特的资产阶级政党，因为据说美国的

革命将不是由工人，而是由破产的农场主来实现的。这就是他的第二条福音。

第三条福音是我们现在从他那里听到的，这就是：俄国革命从今以后既不需要美国的农场主革命，也不需要德国的三月行动，因为俄国革命本身靠自己的内部就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总而言之，这是一种适应于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sup>115</sup>。这就是佩珀同志的第三条福音。我虽然白发斑斑，却也愿意向佩珀请教，但我决不能这样每隔两年就大转弯地从头学起。

同志们，我决不认为审查履历的方法能够使我们解决原则问题。我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犯过错误，这是完全不容置辩的。然而未必应当由此作出结论说，政治问题可以不按其内容而根据履历来加以审查，因为不然的话，就该要求全体代表交出履历了……我个人则可以援引一大先例。在德国曾有一个叫做弗兰茨·梅林的人生活和斗争过，他在长期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直到最近几年我们还被叫做社会民主主义者）之后，才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梅林先前作为一个敌人（不是作为资本的奴仆，而是作为思想上的敌人），写了一本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后来作为一个忠实的朋友，把这部历史修改成一部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湛的著作。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则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马克思，而他们两人长期以来受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鞭挞。此外，伯恩斯坦还以恩格斯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闻名。然而，弗兰茨·梅林是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而逝世和安葬的，而另外两个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却是作为改良主义的走狗而活到如今。履历因素固然重要，但它本身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之中谁也没有一个无可指责、毫无过失的履历。列宁在世时比谁的错误都要少些，但就是他也有过错误。至于我们，当事

情关系到重要的原则问题时，当我们反对列宁时，我们总是错的。

斯大林同志在这里列举了别人的错误，却漏谈了他本人的错误。如果“不断革命”由于和列宁的真正观点不同而是不正确的，那么在它里面仍然有某种正确的东西，这也就使我能够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譬如说，“不断革命”并没有妨碍我在同布尔什维主义作了斗争的尝试之后（上面已经说了，我这是不对的），于1917年在美国从根本上确定了与列宁向党发挥并实际贯彻的那条路线在原则上相同的路线。斯大林同志在二月革命后执行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主义倾向的错误策略（反映在《真理报》上的文章和关于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中）。在民族问题上，在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上，在党专政及其他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后来又犯了很大错误。但是我认为，他现在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的关于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季诺维也夫同志把这个问题的历史讲得很清楚，我完全确信，每一个同志只要仔细研究问题（当然不是形式主义地只根据引文，而是根据这些引文出处的文章的精神），他就必然会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传统完全在我们这方面。然而单是传统还不解决问题。可能会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自己必须修改（修正）以前关于可能或不可能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决定。让他们这样去说吧！但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在我看来，旧决定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全部意义。我认为这个问题越发挥下去（这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才认为有义务在这里发言），新理论的宣告者们就越来越不仅和我们学说的基本原理，而且也和我们工作的政治利益发生矛盾。

同志们，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斯大林指责我不承认或不完全承认这个规律。其实不然！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规律，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规律。资本主

义在其初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不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悬殊；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没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而是相反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们的均衡。这种均衡从来不会那么彻底。发展速度的差异将一再破坏均衡，这就使帝国主义根本不可能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列宁把不平衡归结为两点：第一、速度；第二、不同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由于问题牵涉到速度，帝国主义在这里使不平衡发展到极高的程度；而由于问题牵涉到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所以这里正好是速度的差异引起某种均衡的趋势。谁不懂得这点，谁就是不懂得整个这一问题的根本点。拿英国和印度来说吧。印度某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英国最初的资本主义发展要快得多。但是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别、经济上的距离现在比五十年前要大些还是小些呢？是小些。再以加拿大、南美、南非为一方，英国为另一方为例。加拿大、南美、南非最近一个时期以疯狂的速度向前发展。英国的“发展”则是停滞甚至下降。因此，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不平衡。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现在比三十或五十年前彼此更加接近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很重要的结论。某些落后国家近一个时期来的发展速度飞快，而某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却缓慢甚至倒退，这就使考茨基关于按计划组织起来的超帝国主义的假设完全不可能实现，同时还由于不同的国家在水平上彼此接近（当然决不会达到平衡），它们就发生了同样的要求（对销售市场、原料等等）、同一类型的竞争。正因为如此，战争的危險又变得越来越大了，并且战争本身的规模也会很大。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保证和加深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

同志们，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近二十至三十年来由于落后国家和整个整个大陆加速发展而日益确定的现实。这是一个根本事实，正因为如此，企 图 在 研 究 个 别 国 家 经 济 和 政 治

的命运时，硬要抽掉这个国家同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这是根本错误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帝国主义大战是什么？是不仅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而且也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框子的生产力暴动。帝国主义大战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框子对于生产力已狭小到难以容忍的程度。我们总是断定说，资本主义不能掌握它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超出资本主义国家框子的生产力纳入更发达的经济整体。退回到孤立的国家去的道路是再也没有了。

革命前、大战前的俄国是怎样的呢？它是不是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它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问题就在这里。谁忽视这一点，谁就是忽视一切社会和政治考虑的基础。为什么经济落后的俄国也被卷入了世界大战呢？因为俄国通过金融资本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命运牢不可破地结合在一起了。它没有别的路可走。请问，同志们，是什么使俄国工人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呢？首先当然是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农民战争”（这正是列宁天才地预见到并从理论上规定的），无产阶级要在我国掌握政权是不可能的。但难道在其他革命中农民战争使无产阶级执政了吗？至多是使资产阶级执政。为什么我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呢？因为它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在能够取得政权以前就和整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同走了下坡路，也就是说，因为资本主义俄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旧俄国家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如果俄国站在世界发展的旁边，站在帝国主义的旁边，站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旁边，如果俄国既没有金融资本在本国经济中的统治，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本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精神统治，它就决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如此迅速

地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以为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它能够象一按电钮就关上电灯一样使一个国家脱离世界经济，那是根本错误的。

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杠杆。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我们自问，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如何？根据这一问题的专家瓦尔扎尔的统计，战前我国工业装备的百分之六十三是进口的机器。只有三分之一的装备是国产的，而且这三分之一还是极简单的机器，因为比较复杂的和重要的机器都从国外进口。因此，当你们察看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时，你们就会亲眼看见俄国以及苏联在物质上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谁不注意问题的这个方面，谁在议论这个问题时把它的经济技术基础和世界经济政治关系撇开不谈，谁就必然会成为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和断章取义的引文的俘虏。

近十年来，我们几乎没有更换我国工业的固定资金。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根本没有从国外输入机器。显然，这种情况使某些人认为，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似乎属于我国的自然资源，似乎今后可以在这种“自然的”基础上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完全建成。但这是幻想。我们现在处在所谓恢复时期的终点。我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但是恢复时期的终点同时也是恢复我们和世界经济的物质联系的起点。我们应该更新现在正经历着危机的固定资金。谁以为在今后几年里我们就能够自己制造全部或大部分装备，谁就是一个幻想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而提出的国家工业化，意味着在最近时期和相当长的时期里不是减少，而是相反，增加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因而也意味着增加我们对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经济的依赖（当然是相互的依赖！），意味着加强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说，不能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

经济变化的问题割裂开来。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制造机器。”那么我就要回答：“当然，如果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今天就垮台，那么我们在一、二十年后就能制造出比今天多得多的机器。”如果我们想撇开资本主义世界（然而它是存在的）而抽象地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间里凭自己的双手制造出全部机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机器，就是说，如果我们企图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工业的现状的先前的经济历史，总之，如果我们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的道路而一切靠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话，那么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极其自然，拒绝利用世界市场来弥补我国装备的缺陷，就会使我们自身的发展慢得惊人。然而发展速度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因为地球上毕竟不止是我们一家，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暂时还只存在于新闻记者和决议起草人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处于世界市场的相对控制之下。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发展速度不能任意规定。它是由整个世界发展给我们规定的，因为世界经济处于最高一级的地位控制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即使这个部分处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为了使我国工业化，我们需要输入机器。而农民需要输出粮食及其他产品。如果我们不输出，我们就不能输入。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不能吞纳全部农产品。因此，无论农民的需要或工业的需要都把我们重新纳入世界经济，而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也就意味着我们同它的斗争将与时俱增。我们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状况，而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谁如果谈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忽视我国经济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合作”和斗争的事实，谁就是搞赤裸裸的形而上学。



同志们，在这以前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相当片面的争论毕竟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斯大林同志稍稍比较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从而暴露了自己的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拿斯大林同志报告前半部分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来说吧，它的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明摆着的。斯大林同志说：

“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否可能呢？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使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请注意这个思想！——托洛茨基注）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①

这样说来，这里的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仿佛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解决也就在于此。其实不然！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阶级，是以全部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组织取代阶级社会。问题在于克服城乡之间的矛盾，这又要求农业本身的高度工业化。而这一切都要在资本主义依然包围的环境下进行。不能把这个问题和仅仅对国内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混为一谈。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解各有不同。例如，当列宁谈到西欧时在1915年写道，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然后起来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战斗。他这里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最近几年来已经做过的事：工厂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采取必要的步骤由国家负担费用来保证生产，从而使人民能够生活、建

---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页。——编者注

设、保卫自己抵抗资产阶级国家等等。这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只不过是初步而已。然而从这里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远得很。因为，我们再重复一遍，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然后就是国家消亡。而斯大林同志却说，我们只要战胜国内的资产阶级，就能保证在我国建成这种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可是，同志们，我们需要国家和军队来反对外部的敌人。就是说，只要还有世界资产阶级，这个因素就总是要保留的。此外，能不能设想，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我们就能仅仅依靠国内的经济与文化资源，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溶合在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中？上面说过，为此我们就必须大力提高技术，这首先要增加粮食的出口和机器的进口。机器在世界资产阶级手中，而它是我国粮食和原料的买主。世界资产阶级暂时还操纵着世界价格，因此我们对它还有一定的依赖并要同它作斗争。为了消除这种依赖，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在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政治上我们在1917年在俄国就已把它推翻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即在同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并且暂时还很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力变得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更加强大才行。因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不是一年，不是十年，甚至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好几十年，所以只有使我国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才能达到这一点。所以问题不是民族无产阶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殊死的斗争。问题只应该这样提。

现在再请听：

斯大林说：“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说，虽然我国在技术上比较落后，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党就没有理由（理由？——托洛茨基注）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

野党的地位。”①

接着他又重复说：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能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建设社会主义，并终于把它建成，那么党就应该继续掌握政权，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以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或者是我们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么，鉴于不能立即（为什么说立即？——托洛茨基注）得到外援，即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支援，我们就应当老实地和公开地放弃政权，而采取在苏联组织未来的新革命的方针。党能不能欺骗（为什么说欺骗？——托洛茨基注）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是要被肢解的。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不是失败，而是缺乏信心？——托洛茨基注），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②

这是一片虚伪之词。同志们，列宁关于这点说了些什么？

（主席柯拉罗夫同志请发言人注意，他的时间快到了。）

可是有人对我说，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一样有一个小时。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一个小时延长为一小时三十五分。（笑声）我希望也会给我同样多的时间。

我想说的话恐怕还没有讲到一半。当然，你们完全可以不让我讲完。但是我刚刚打算来谈最迫切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总是肯定说，我们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时间上拖得长些，但它的胜利是有保证的，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从来就痛斥那些以社会主义的命运同他们的个别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来辩解的爱国的机会主义者，不论这班爱国者是否还卖弄革命，或者是否象他们大多数人那样完全拒绝革命而以改良主义的纲领为立足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点。另一方面，我们总是断定说，如果情况使一国的无产阶级能够站到前列，掌握政权，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或军事进攻，或者确切些说，两者同时并举的话，它就没有权利去等待别的国家，因为世界革命恰恰就是这样展开的。我们的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掌握了政权，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此向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伟大的范例，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巩固我们的国家，——这一切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不言而喻的，——难道这是有争论的吗？但正因为我们是世界无产阶级，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用自己的建设来参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有什么特别的保证，我们将不依赖世界革命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这里却还在说，如果我们要求（向谁要求？）这种保证而不可得，我们就该辞职，把问题归结为内阁危机，并退居为苏维埃国家的在野党。难道问题的这种提法不是虚伪透顶的吗？

斯大林本人的想法未必和他在报告中所说的一样。否则的话，他早就应该辞职了。昨天以前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已经引了斯大林在1924年说的话。然而我还要重复引一次。因为，如果没有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事先保证，我们就应该自动交出政权的话，那么请问：斯大林同志本人在1924年（不是在耶稣诞生之前，也不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那时仿佛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而仅仅是在两年以前）的情况如何呢？我再提醒一下斯大林同志当时写的下面这一段话：

“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的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①

---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编者注

是的，然而在 1924 年我们并没有打算交出政权，也没有退居为工人国家的在野党。请好好地想一想这点吧！如果我们党的传统，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真正从来就要求并且现在也要求相信不经过国际革命而能在单独一个国家，而且是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如果谁不承认这点，谁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即根据本身经验本应知道我们党的思想传统的斯大林，怎么能在 1924 年写出这种话来？请你们给我解释解释！

这里还有一个谜。我在这里给你们看一本书，书中有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如果有人要看的话，我可以把这本书放在主席团的桌子上。我们党在 1921 年 9 月表示赞同这个纲领，以领导和教育我国的整个青年运动。在共青团纲领第四条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一段（请你们注意地听一听这些话，特别是从青年共产国际来的同志，因为我们苏联共青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在苏联，国家政权已经由工人阶级掌握。工人阶级在三年反世界资本的英勇斗争中捍卫和巩固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俄国虽然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毕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居民占多数的工业落后的国家。它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革命发展的时代。”

这是什么？悲观主义？缺乏信心？可能甚至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我极难对此作出回答。要知道这些话是写在现在拥有二百多万工农青年的我们青年组织的纲领上的。当有人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辩护时说：“要知道我们应该使我们的青年看到前途”（这是斯大林同志惯用的一个论据），“否则看不到这个前途，青年就会陷入悲观主义或缺乏信心，甚至（上帝救命吧！）陷入托洛茨基主义”，那么我要问：既然共青团五年来有着这样一个“托洛茨基主义

的”纲领，这一切灾难为什么却没有发生呢？

（主席柯拉罗夫同志按铃表示发言人的时间到了。）

人们总是在最有意思的地方打断我。不过还是请主席团和全体会议给我上面提到的哪怕三十五分钟也好。

（主席说：“您的时间到了。”）

遗憾得很，毫无办法，只好让你们还没有听完就去表决向你们提出来的决议案了。但是我正要引的主要论据虽然还没有说出来，仍然保持客观的效力。要知道这并不是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会议。虽然你们将一致通过决议（这一点我们没有怀疑，尤其是在今天什麦拉里同志发言以后，因为他很内行地指责我们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事实依然故我。事实将发挥它的力量，而我们的论据将从事实的力量中获得新的力量。这个问题还会在我们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占有自己的地位，我毫不怀疑，即使不是我，也总有别人会向共产国际发挥今天你们不让我讲完、然而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保有全部力量的那些论据。

译自《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卷第94—106页。

# 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 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

(1927年6月)

## ·编者按语·

1927年,托季联盟向联共(布)中央发动了全线进攻,猖狂地进行反党派别活动。

托洛茨基于1927年5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发表反党演说,5月25日提出《八十四人宣言》,6月9日又以给托派分子斯米尔加送行为借口,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举行政治示威,并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党的政策,妄图以此向党施加压力。

有鉴于此,联共(布)中央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党破坏活动问题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

托洛茨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两次发言,一方面大谈自己在历史上同列宁的“一致”,声称他“从来不是孟什维克”,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反党活动辩解,另一方面大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诬蔑布尔什维克党“热月化”,扬言“要继续批判斯大林政权”,说“它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政权,一个倒退的政权”。

## 第一次发言

在我发言以前——我怀疑我在这里是作为被告，还是作为原告来讲话——我坚决要求撤销扬松同志的审判员资格，因为他不合格，这是由他过去的全部活动所决定的。你们大家当然知道得很清楚，从1924年以后，除我以外，全部政治局委员曾组成一个派别性的“七人集团”。我的职位被你们的前主席古比雪夫接替。本来，按其职责来说，他应当带头捍卫党的章程和道德，但实际上，他却带头践踏和破坏它们。这个七人集团曾经成立非法的反党机构，由它背着党来决定党的命运。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曾点名指出扬松参加过七人集团的反党活动。无人反驳这次发言，扬松本人哑口无言。还有一些人犯有同样的罪行，可是，扬松案的罪证是记录在案的。现在扬松竟要来审判我有反党行为。我要求撤销扬松的审判员资格。

（主席奥尔忠尼启泽：“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托洛茨基同志。”）

我没有在严重问题上开玩笑的习惯。我承认我的建议可能使主席团的处境有点尴尬，因为在主席团委员中恐怕还有其他人参加过七人集团的活动。但是我的本意决不是要把我的建议变成玩笑。事实上，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对当时甚至借口“草拟通告”而召集的各种会议也一无所知。在这些会议上精心策划了反对我的各种办法，特别是规定政治局委员不准彼此论战，而要一致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论战。这件事未通知党，更不会让我知道。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我并不是说奥尔忠尼启泽同志是七人集团的成员，而是说他参加了这个七人宗派集团的活动。



（奥尔忠尼启泽：“可能是说扬松，而不是奥尔忠尼启泽。你说错了吧？”）

请原谅，然而我确信这是一个纯属形式性质的错误。我的确是说扬松。我不是说扬松同志是七人集团的成员。不是。但是他参加过这个七人宗派集团的活动。这种活动不符合党章的规定，违反党的章程和意志，否则，它就用不着隐瞒。万一证实这里在座的同志中还有人象扬松一样参加过七人宗派集团的活动，那么，我就不揣冒昧，请将他们也包括在我的撤销要求之内。

（撤销扬松审判员资格的建议立即遭到主席团的拒绝。）

同志们想把事情描绘成这样：由于雅罗斯拉夫车站事件<sup>116</sup>、由于季诺维也夫的广播讲话以及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行为”，似乎非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不可。这一切看来颇有道理，但是按照我们反对派早在去年7月初提交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来看，却正好相反。我们在这项声明中十分明确和详尽无遗地预言过你们反对我们的一切步骤。我们预料到你们将利用一切借口来实现改组党的领导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你们的派别首领在很久以前，甚至在七月全会之前，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已设想好了。

你们指控我的罪名有二：第一、是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决不能审查我在作为上级机构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如果这对扬松同志仍然难以理解的话，他就应当反复深思，重读共产国际的章程和我们党的章程。然后，他就会懂得我是正确的，正如我否认区监察委员会有权审查我作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所做的任何发言一样，是绝对正确的。

第二个罪名是在雅罗斯拉夫车站为斯米尔加送行的示威。你们把斯米尔加放逐到哈巴罗夫斯克。我再一次坚决要求你们对这

项放逐作出一个至少在你们之间都同意的统一解释。什基里亚托夫在监察委员会叫嚷说：“在哈巴罗夫斯克也有工作做！”如果斯米尔加是按正常程序调到哈巴罗夫斯克工作，那么，你们就不能非难我们的集体送行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不过，如果这是对一个现在需要留在负责岗位，即苏维埃战斗岗位的同志判处行政流放，那么，你们就是在欺骗党。你们犯了欺骗罪。你们还要再说把斯米尔加送去哈巴罗夫斯克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吗？与此同时，你们还要指控我们搞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吗？这种手段是口蜜腹剑。

但是，我要撇开这些作为指责的诬蔑，专门谈谈基本政治问题。

关于战争危险。我们在去年7月发表的声明中说过：“保卫苏联，因而维护和平的首要条件是，在日益壮大的红军与我国和全世界的劳苦群众之间建立最紧密的联系。凡有助于发挥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作用、加强工人阶级与农业工人和贫农的联系并且巩固工人阶级同中农的联盟的一切经济、政治和文化措施，都能加强红军，保证苏维埃国土不受侵犯，并增强和平事业。”

一年以前，我们呼吁你们密切注视战争危险问题和战争期间苏联国内的种种危险，这就是有力的证据。这些不是特殊问题。它们是我们的阶级政策、我们的整个方针问题。前国家元首，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曾在特维尔发表过演说，大意是说我们需要健壮的士兵，而只有中农才能成为健壮的士兵，贫农不能提供这样的士兵，因为他们体弱的人太多，因此，我们除了采取公开面向强壮的“中农”的决策，没有别的办法。而这正是掩护富农或准富农的借口。加里宁忘记了我们所完成的十月革命，当时正是短小瘦弱的人战胜身高体壮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胜利？因为他们的人数当时而且现在仍然比其他人多得多。你们会说：“尊

敬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生来就是话多。”但是你们制止过他吗？没有，你们不制止他，你们制止我们，以免我们批判他那条鄙视贫农、鼓励富农的路线，而雅柯夫列夫正在玩弄统计花招来掩饰这种富农。正是雅柯夫列夫应该受审判，但是，雅柯夫列夫却要来审判我们。

战争危险现在被你们用来迫害反对派，并且准备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你们从我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战争危险问题、英国工运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问题的全部文献中，只发表了我手中现在拿着的这本作为党内资料的红小册子，而且是为了对付反对派才发表的。即使这样，我怎么说呢？你们还借口我未“修订发言稿”而把它从记录中弄掉。这恰好说明：你们现在利用战争危险主要是来反对我们。

我们声明，只要你们没有从肉体上封住我们的嘴，我们就要继续批判斯大林派制度。在你们强制堵住我们的嘴巴以前，我们要继续批判斯大林派制度，否则，它将会破坏十月革命的一切成果。在沙皇统治时期，爱国者把祖国同统治政府常常混为一谈。我们与它们完全不同。我们要继续批判斯大林派制度，它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制度，一个倒退的制度，一个思想蜕化、心胸狭窄和目光短浅的制度。

整整一年，我们曾力图把英俄委员会<sup>111</sup>的目的硬灌入你们的头脑。我们告诉你们：它正在摧残英国无产阶级的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在此期间，你们的全部威望，布尔什维主义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列宁主义的威望——所有这一切，你们都用来支持柏塞尔。你们会说：“但是我们批评他！”这不过是布尔什维克支持机会主义的倒退的新形式。你们“批评”柏塞尔，可是无比温和，少得出奇，而且你们同他仍然勾结在一起。而当他本国的革命者指责他为张伯伦代理人的时候，他能找到什么口实来回答他们呢？他可

以说：“喂，请看！捐款支援英国罢工工人的托姆斯基本人是政治局委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批评了我，尽管如此，我们现在正在携手进行工作。你们怎么敢叫我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他说得对不对呢？他说得对。你们用狡猾的手段让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机构由柏塞尔支配。我们谴责你们的正是这一点。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谴责，远比雅罗斯拉夫车站为斯米尔加送行严重得多。你们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贡献？你们在这几年当中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威望，它的全部经验以及马克思和列宁的整个理论有什么贡献？你们已经告诉全世界的工人，首先是我们莫斯科的全体工人，一旦战争爆发，英俄委员会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中心。但是我们说过，并且现在还要说，一旦战争爆发，英俄委员会对于从苏联的假朋友和同路人当中所产生的各种叛徒和投向苏联敌人阵营去的各种逃兵，将是一条现成的堑壕。托马斯公开支持张伯伦。柏塞尔则支持托马斯，这就是主要问题。托马斯靠资本家的支持来维持自己。柏塞尔则靠欺骗群众来维持自己，并且支持托马斯。而你们正在支持柏塞尔。你们谴责我们支持张伯伦。不对！正是你们自己通过你们的右翼同张伯伦勾搭在一起。你们既同支持托马斯的柏塞尔，又同支持张伯伦的托马斯一起站在一条战线上。这是经过政治分析的判决，而不是莫须有的罪名。

鬼才知道在各种会议上，特别是在工农核心会议上谈论了关于反对派的什么问题。居然提出了反对派进行“工作”的“财源”问题。这类值得“黑帮”来提的问题，可能是没有文化和没有觉悟的工人，也许是你们自己的工厂提出来的。……还有充当报告人的恶棍竟厚着脸皮对这类书面问题做含糊其词的解答。你们如果是真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就有责任制止这种肮脏、可恶和卑鄙的纯斯大林式的对反对派的攻击。另一方面，我们并不介意正在散布的流言蜚语。我们发表公开政治声明：张伯伦和托马斯站在一

条战线上；他们得到柏塞尔的支持，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你们却在支持柏塞尔，因而正在削弱苏联和加强帝国主义。这是一个严正的政治声明！而你们自己目前才感觉到这项声明的分量。

你们若是真象自己所说的那样严重关切战争危险，怎么能进行疯狂的和日益加剧的党内镇压呢？怎么能在目前排斥第一流军事干部呢？他们现在被解除军事工作，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的现行政策是错误的和招致毁灭的政策，尽管他们准备并且能够为社会主义祖国而战。你们有很多象斯米尔加、姆拉契科夫斯基、拉舍维奇和巴卡也夫这样的军事干部吗？我听说你们打算开除穆拉洛夫出军事检察院，因为他是八十三人宣言<sup>①</sup>的签字人之一。你们与柏塞尔及其同类的其他“反战战士”是一丘之貉，难分难舍，却要开除穆拉洛夫出军事检察院。（场内议论纷纷。喊声：“谁向你报告的？”）谁也没有向我“报告”，而是普遍在谈论这件事。

（奥尔忠尼启泽：“你猜想得太多了。”）

这句话插得好，的确如此！我正要指出你们在四十八小时以后即将做的事情<sup>②</sup>，正如去年7月我们事先端出了你们反对我们的全部预谋一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军事学院和空军学院的学员情况怎样呢？你们正在开除参加了反对派的优秀学员。我已经成功地得到了四名学员的简历，他们是在毕业前夕于几天前被开除出军事学院的。第一份是奥霍特尼科夫的简历，第二份是库兹米切夫的，第三份是勃罗伊多的，第四份是卡佩尔的。第一份简历如下：奥霍特尼科夫，生于1897年，父母是农民（比萨拉比亚人），自己没有土地，为地主种地。他只受过

① 应是《八十四人宣言》。——编者注

② 穆拉洛夫是红军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此后不久不仅被排挤出军事检察院，而且被开除出党，流放到西伯利亚，直到如今。——托洛茨基注

小学教育，1915年以前，为父亲劳动，曾受雇当卡车司机。从1915年起在沙皇军队当兵，二月革命期间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由后备炮兵队选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但在5月因有布尔什维克倾向而被调往前线第四军，在那里由第十四炮兵旅选为师委员会和军委员会的代表。十月革命期间作战负伤，曾入疗养院疗养。1917年12月出院以后，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同罗马尼亚占领军作战。1918年，他在比萨拉比亚加入地下组织，任捷列茨克区地下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游击队队长。他曾因进行这种活动，受过罗马尼亚军事法庭两次审判，被判死刑，但都逃脱了。1919年，他率领游击队到乌克兰，加入红军第四十五师。担任过不同的指挥职务。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战争结束后多次参加反对白匪的斗争。1924年他进入军事学院，因未受过正式普通教育，编在先修班，以优异成绩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1927年2月，他因支持反对派观点第一次在党内受到指责。后因参加“斯米尔加送行”而被开除出军事学院。

我迄今所掌握的四份简历，基本内容彼此大致相同。他们都是革命军人、党的军事指挥员，在战争中负过伤，荣获过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奖状，是红旗勋章的获得者，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会永远忠于十月革命，为十月革命战斗到底。而他们正在被你们驱逐出军事学院。这是为革命的军事防御进行准备的办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被指责为悲观和缺乏信心的人。“悲观”这种指责从何而来呢？我相信，这种四处流传的蠢言恶语是来自斯大林。但是，正是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需要大大增强对国际革命的信心，才能逆流而进。而缺乏信心这种指责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臭名远扬的理论。我们拒绝相信斯大林的这种理论。

（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泽在 1925 年对我说过，我必须写文章反对斯大林。”）

我们拒绝相信这种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新发明。我们不相信这种新发明，因此，我们就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

但是，你们知道斯大林的前辈，那位“乐观主义者”是谁吗？

我随身带了一份重要文件，如果你们想要，我愿发给你们。这是福尔马尔在 1879 年写的一篇文章。他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文章题目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篇文章应该译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当然，也应发给全体党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早在 1879 年就提出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他的门徒斯大林只在 1924 年才着手创立他的“新颖的”理论。为什么是在 1879 年呢？因为当时是一个反动时代，是欧洲工人运动普遍退潮的时期。法兰西公社在 1871 年遭到镇压。直到 1879 年止，法国没有革命运动。在英国，自由派工联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到处取得胜利。这是英国和大陆革命运动最严重的低潮时期。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正在德国迅速发展。由于这种矛盾，福尔马尔便得出了他那个一国社会主义的新颖理论。你们知道福尔马尔的结局吗？他最后成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极右派，一个沙文主义者。你们一定会说今天的形势不同了。当然，今天总的形势是不同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遭受了重大的失败。今天，国际革命及其直接胜利的希望，不象 1918—1919 年那样有把握，已经被推迟了，而一些“乐观主义者”大多已经不抱希望，因而正在得出没有国际革命我们也能生存下去的结论。机会主义者从福尔马尔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到堕落为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福尔马尔主义，其前提正在这里。

你们指责我们悲观和缺乏信心，而不论与这种理论有联系或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反对派是“一小撮”悲观主义者和没有信心的人。党是团结一致的，党内全是乐观主义者和充满信心的人。这种描述未免太过于简单吧？请允许我用下列方式来提问题：一个野心家，追求飞黄腾达的人，现在会参加反对派吗？当然不会，除非他是这样一种很阴险的人，参加进来只是为了立即退出去，马上被封为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优秀代表”。但是，这可以说是极端卑鄙的个别人物。如果你们懂得野心家，那么，我请问，这种人会投靠目前处境下的反对派来谋求自己的发迹吗？你们本人都知道，他决不会的。当工人布尔什维克因参加反对派活动正在被赶出各种工厂而掉入失业队伍的时候（而所有这些人在需要时都会进行战斗，不会亚于现在在这里开会的任何人），一个追求私利的人会参加目前处境下的反对派吗？利己主义者决不会参加。工人反对派的榜样表明，尽管受到各种镇压，党的队伍里仍有左派敢于为自己的观点而战斗。每个革命者的优秀品质是敢于反潮流，能在甚至最不利的条件下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我再问一次：投机分子、官僚和追求私利的人会参加反对派吗？不，他们决不会。家庭负担沉重的工人，他们在革命中萎靡不振，理想幻灭，在党内庸碌无为，会参加反对派吗？不，他们决不会。他们会说：“当然，政府很坏，但是让它去为所欲为吧，我管不着。”一个人需要怎样的品质才会参加目前处境下的反对派呢？他必须对自己的事业，即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真正革命的信心。但是你们所要求的只是一种涂了保护色的信心，是按官方表决进行表决的信心，使社会主义祖国同区委员会一致和竭力仿效书记的信心。如果你是一位经理或行政负责人，你就必须投靠区委员会或省委的书记来保住自己。

你们的伟大信心是怎样经受考验的呢？通过百分之百的表决



票。凡是不愿参加这种强迫表决的人，有时就悄悄地溜走。但是书记决不允许这种情况。他必须投票，必须按照指示投票，谁弃权，就记下谁的名字。你们以为你们能把这一切都瞒过无产阶级吗？你们在玩弄谁？我再问一次：你们在玩弄谁？你们是在危险地玩弄自己，玩弄革命，玩弄党！跟着你们投百分之百票的那种人，昨天“诽谤”托洛茨基、今天“诽谤”季诺维也夫的那种人，明天一定会“诽谤”布哈林和李可夫，他们在革命的艰难时刻决不会成为坚定的战士。但是，反对派表明了自己的忠诚和勇敢，正是因为它在倒退和镇压的最困难时期没有投降，并且把既不受利诱，也不怕威胁的最可贵的战士集合在自己的周围。

（扬松：“在反对派中也有野心家和追求私利的人。”）

说出名字来！只要你说出名字来，我们就同你们一起坚决把他们驱逐出去。他们在哪儿？反对派的核心是由那些既不受利诱，也不怕威胁的人所组成的。

党的制度压制、窒息和束缚着党；它掩盖着国内正在发生的深刻的阶级变化过程。在战争危险的谣传刚一出笼的时候，我们已面临这个过程，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它还会更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目前的制度正在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失去本色，因为它不容许有机会开诚布公说出威胁的危险根源，而现在无产阶级已经受到来自非无产阶级方面的危险的威胁。过去整个时期就是这样，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其他阶级却在扩展势力。

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工人国家问题。有许多恶毒谎言正在通过《真理报》系统地广泛传播，其一就是所谓我说过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这是采用曲解我的一次未经修订的发言而捏造出来的。我在那次发言中只是发挥了列宁对苏维埃国家的看法，以驳斥莫洛托夫的立场。列宁说过，我们从沙皇机构中接收了许

多最坏的东西。但是你们现在说什么呢？你们正在制造工人国家的偶像，企图把这个国家当作一种“秉承天意”的特殊国家加以神化。谁是这种神化最出色的理论家？是莫洛托夫。那是他的贡献。我要把他说的话给你们重读一遍。你们压制我对莫洛托夫的批评，而《真理报》则歪曲它。但是，这里是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反对加米涅夫时所说的话：“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国家……但是有人向我们提出，说什么必须用使工人阶级更加靠近我们国家的提法才更正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给自己提出使工人更加靠近我们国家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谁的国家？难道不是工人自己的国家吗？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那么，更加靠近国家，也就是说，使工人自己更加靠近执政的和正在控制国家的工人阶级，那怎么可能呢？”<sup>①</sup>这是莫洛托夫说的话。同志们，这是对列宁主义关于一个工人国家的概念进行最拙劣的批判。列宁主义认为，工人国家只有在完成了批判、完善和改革等大量工作以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完全的工人国家。但是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这种国家成了某种绝对化的东西，不可能再进一步靠近群众了。我的反驳，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对苏维埃国家所作的列宁主义的分析，正是针对这种官僚政治拜物教的。（喊声）

你们在这里说：“应该做什么？”如果你们真是认为对我所指出的各种现象束手无策，那就是说，你们承认革命必然灭亡。因为，革命在目前这条道路上必定灭亡。这就是说，你们是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尽管你们沾沾自喜。然而，这种局势是完全能够由于改变政策而得到挽救的。但是，在我们能决定做什么之前，我们必须说明现状；我们必须指明各种过程正在发展的方向。你们如果思考一下象住宅问题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会发现这里正在发生的两

<sup>①</sup> 《真理报》1925年12月13日。——托洛茨基注

种过程。它们反映在统计数字上，容易核查：无产阶级的住宅区正在缩小，而其他阶级的却正在扩大。至于正在迅速进行建设的乡村，我就不用了。当然，不是贫农在建房子，而是上层分子，即富农和殷实的中农。但是，我们城市的情况怎样呢？所谓“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即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商人和专家，他们今年每人都占有更多的立方英尺。但是每个工人的面积今年却比去年少。在谈论做什么之前，我们必须老实说明情况。正如在住宅问题上一样，在日常生活、文化、剧院和政治等方面也是这样，各非无产阶级正在扩占活动地盘，而无产阶级则正在受挤压。我再说一次：正如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在物质领域进行着扩张那样（你们从各种街道、店铺、电车和公寓都能观察到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也正是这样；整个无产阶级正在受挤压，而我们党的制度则在加强对无产阶级的这种阶级压制。这是基本事实。这种打击的威胁来自右派，来自各非无产阶级。我们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无产阶级认识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要无产阶级别以为政权到手，就永世不变，万事大吉。别以为苏维埃国家会绝对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是工人国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一定要懂得，苏维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特别是由于领导的错误政策，可能变成使政权离开无产阶级基础而转向资产阶级的机构，它最后会完全撕掉苏维埃这件外衣，使苏维埃政权变成波拿巴主义<sup>109</sup>的统治。在错误的政治路线之下，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危险。

没有国际革命，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要是没有执行依靠国际革命，而不是依靠支持柏塞尔的正确政策，你们不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一定会断送苏维埃政权本身。无产阶级迫切需要懂得这一点。反对派的错误，我们的罪过就在于我们拒绝进行自我欺骗，不肯“乐观地”闭眼不看我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危险。

现实的危险来自右派，不是来自我们党内的右派。我们党内

的右派不过是一种传播途径。现实的主要危险是来自正在抬头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方面，他们的思想家是那个聪明和有远见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列宁过去常常注意听他发言，并且警告大家要提防他。你们都知道，乌斯特里亚洛夫不支持我们；他支持斯大林。在1926年秋天，乌斯特里亚洛夫写道：“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新的策略、新的推动，比方说，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政策。从这个观点来看，必须承认，最近党向反对派所作的一些实际让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他又进一步写道：“要是反对派领导人的悔过声明是他们单方面无条件投降的结果，人们会欢呼政治局万岁。不过，如果这是与他们妥协的产物，政治局就该死。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斗争一定会再爆发出来。……取得胜利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要有抵抗反对派瓦解性毒药的内在免疫力。它必须从反对派的失败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否则，这将是我国的灾难。……因此，（乌斯特里亚洛夫继续写道）这项工作必须由俄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商业人员和专家集团以及主张演变的（而不是革命的）思想家来进行。”乌斯特里亚洛夫得出结论说：“正因如此，我们现在……坚决支持斯大林。”而你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你们企图把反对派清除出中央委员会，——暂时还仅仅是中央委员会。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一个熟悉法国大资产阶级历史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然，他非常精通这种历史。这位反映新资产阶级心情的发言人懂得，只有布尔什维克本身的倒退，才能最顺利地为新资产阶级的政权作好准备。这个支持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写道，必须防御（防什么？）反对派的瓦解性毒药。因此，他同你们也是一致的，认为反对派是瓦解性毒药，必须进行消毒，否则“它将是我国的灾难”。这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正因如此，他不但反对我，而且支持斯大林。好好想想这一点。你们在这里不是同一个无知的人打交道，他不是没有头脑和容易受骗的人，他不会相信反对派是

靠英国金钱来进行活动的。不，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一个颇有阶级意识的人，他深知自己说话的涵义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他为什么支持你们？他同你们一起要维护什么？

最近有人告诉我说，索尔茨同志与一位曾在反对派声明上签字的同志交谈时，曾拿法国革命做比喻。我现在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法。我相信，关于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它的最后阶段的真实的评注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应当重新刊印出来。索尔茨同志现在在这里，他说过什么，他知道得比我更清楚，要是我把他的话引述错了，他会纠正我。索尔茨说过：“八十三人声明要干什么？”“它要造成什么结果？你们知道法国革命的历史，它的结果就是逮捕和断头台。”沃罗比约夫同志（索尔茨同志是在同他谈话）问他：“因此，你们想送我们上断头台？”索尔茨在回答时作了冗长的解释。他说：“在你看来，罗伯斯比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不感到难受吗？而后来罗伯斯比尔自己也不得上去……你认为他不难受吗？他当然难受，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

这就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一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重新认识法国大革命。这是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从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开始。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比饶勒斯更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基础和阶级基础。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人被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曾将许多人交行刑队处决。但是，法国大革命史有两大篇章，其中一章是这样的（向上指），另一章是这样的（向下指）。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当象这样的——向上的——篇章为首时，法国的雅各宾派<sup>4</sup>，即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曾把大批君主派和吉伦特派<sup>17</sup>送上断头台。当我们反对派同你们一起枪毙白卫军和放逐吉伦特派时，我们也有过类似的伟大篇章。然后，当法国的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和准乌

斯特里亚洛夫之流——雅各宾派右翼中的热月派<sup>117</sup>和波拿巴派<sup>118</sup>——开始放逐和枪杀雅各宾派左翼即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在法国就开始了另一个篇章。我倒希望索尔茨同志彻底思考一下他的比喻，首先由他本人回答这个问题：索尔茨准备按照哪一个篇章来枪毙我们？（场内议论纷纷。）这不是开玩笑，革命是严肃的事业。我们谁也不会被行刑队吓倒。我们全是老革命家。问题是要知道枪毙谁，按照哪一个篇章行事。当我们枪毙人的时候，我们对这一个篇章有坚定的认识。但是，索尔茨同志，你们现在准备按照哪一个篇章来枪毙人，有明确的理解吗？索尔茨同志，我担心你们正要象乌斯特里亚洛夫那样，即象热月派篇章<sup>119</sup>那样来枪毙我们。

当“热月派”这个专门名词在我们中间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贬义词。人们都认为热月派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派，是君主制统治的自觉支持者，如此等等。决不是这样！热月派是雅各宾派，不同的是他们变成了右派。雅各宾组织——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在各种阶级矛盾的压力下，很快就决定必须消灭罗伯斯比尔集团。你们以为他们在热月九日第二天会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把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吗？决不是这样！请查看当时的各种报纸。他们说：我们消灭了一小撮破坏党内和平的人，而现在，在他们消灭以后，革命将取得完全的胜利。索尔茨同志对它有无任何怀疑。……

（索尔茨：“你确实是在重复我自己讲过的话。”）

这就更好了。要是我们在这一点上一致的话，索尔茨同志，那将大大有助于决定关于你们准备按哪一个篇章来展开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理解：除非我们照应当做的那样来着手纠正党的阶级路线，否则，党内必然奉行乌斯特里亚洛夫所指定的路线，即残酷斗争反对派的路线。

我将把布里瓦尔在国民公会里所说的话念给你们听。他是雅

各宾派的右翼，是一个热月派分子。他在报告关于国民公会开会期间将罗伯斯比尔和其他雅各宾派分子交付革命法庭的情况时说道：“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阴谋家和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自由，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他们。这些议员是：罗伯斯比尔、库通、圣茹斯特、勒巴和小罗伯斯比尔。主席询问我的意见。我回答说：凡是经常按照山岳派<sup>16</sup>的原则精神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投票的人，都投票赞成逮捕。我更是极力赞成，因为我是这项措施的提议人之一。此外，我作为秘书，立即签发了国民公会的这项法令。”这就是当时的索尔茨或扬松做报告的情况。罗伯斯比尔及其同伙都成了反革命。“凡是经常按照山岳派的原则精神投票的人”，按照当时的话等于是说，“经常都是布尔什维克”。布里瓦尔自以为是老布尔什维克。“我作为秘书，立即签发了国民公会的这项法令”。今天也有立即“签发”的秘书。今天，同样有这类秘书。……

再听一听法国国民公会在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被处决以后告全国人民的宣言书：“公民们，正当取得战胜外敌的辉煌胜利的时候，共和国受到了一种新危险的威胁。……如果法兰西公民在祖国和一些独夫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刻犹豫不决，国民公会的成果就会化为泡影，我们军队的勇敢将失去一切意义。……响应祖国的号召，不参加万恶的贵族和人民的敌人的队伍，你们将再一次拯救祖国。”

他们以为在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实现的是“一些独夫”的利益。他们不懂得，这些“独夫”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最低层的基本革命力量。这些“独夫”表现了反对“新的新经济政策”和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基本力量。热月派以为这个结局所涉及的是几个人的更换，而不是阶级的改变。“响应祖国的号召，不参加万恶的贵族的队伍。”罗伯斯比尔的同事，这些人成了“贵族”。而我们今天不是从扬松口中听到同样的喊声称我为“贵族”吗？

我能向你们引证任何一篇把革命的雅各宾派列为当时的张伯伦即皮特的代理人的文章。这个比喻实在令人吃惊！在张伯伦身上，你们看到了皮特的缩影。奥拉尔的《法国革命史》说：“敌人不满足于杀死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事，还对他们进行诬蔑，把他们描绘为法国人心目中的君主派和卖国贼。”这是一段原话。而今天，《真理报》上以《反对派的道路》为题的文章不正是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吗？凡是读过《真理报》最近这篇社论的人都不会嗅不到这种气味。这种“第二个篇章”的气味正在钻进人们的鼻孔。这种第二个篇章的气味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它正是在我们党的统治压制每一个反对热月化的人的时候，渗入了我们党的各种官方机构，解除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武装。在党内，工人群众已经受到压制。普通工人默不作声。

你们想利用沉默进行一次新的“清洗”。这就是党的制度。请回忆一下雅各宾俱乐部的历史。他们那里有过两种清洗的篇章。当高潮象这样（向上指）时，温和派受到排斥。当路线开始曲折向下时，革命的雅各宾派就开始受到排斥。这对雅各宾俱乐部有过什么影响呢？反常的恐怖制度建立起来了，强迫沉默者百分之百地投赞成票，并且要求放弃一切批评，按照上面的强制命令进行思考，人们被迫忘记过去，不敢思考：党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和独立的组织，而不是一种满足私欲的权力机构。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时的类似机构，执行同你们一样的各种职能——同整个革命一起经历了两个篇章。在第二个篇章时期，它使党的成员丧失了思考习惯，迫使他们盲目接受上面的一切东西。雅各宾俱乐部，革命的严酷考验场，变成了培育拿破仑未来官吏的温床。我们应该向法国革命学习。但是，难道真需要历史重演吗？（喊声）

这不是说派性俏皮话。没有人愿为开玩笑担风险，把这类与我们生死攸关的大事视为儿戏。在这个机构面前，我不知道这是



不是我对这些问题表态的最后机会。我不知道你们将怎样迅速地实行我在发言开头时提到的那条路线。但是，我不想用规定给我的八十分钟来驳斥你们为反对我所进行的各种卑鄙无耻的指责，而要提出各种基本问题来进行辩论。

为了避免分裂应当做些什么呢？避免分裂可能吗？如果我们正生活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和革命以前的条件下，生活在各种矛盾相当缓慢地积累的条件下，我相信分裂将比保持团结的可能性大得多。要是对我们的深刻分歧抱任何幻想，那就是犯罪。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不同了。我们的分歧已经尖锐到了可怕的程度，各种矛盾变得异常剧烈。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分歧又一次增加到极为严重的地步。但是与此同时，第一、在我们党内拥有巨大的革命潜力，我们享有由列宁著作、党的纲领和党的传统积累经验的巨大思想财富。你们大量浪费了这笔资产，你们用许多现在党的报刊上风行的“现代学派”的廉价代用品来取代它。但仍然留下了大量纯金。第二、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充满着急剧转变、重大事变和人人都能够并且必须学习的严重教训。有许多惊人事件正在使两条路线受到考验。但是你们决不敢隐瞒这些事实，它迟早总会被人知道。你们不可能隐瞒无产阶级的胜利和失败。但是，对党来说，使无产阶级更易于或更难于熟悉和吸取这些教训，是可以做到的。你们正在增加无产阶级的困难。因此，我们，只有我们才是乐观主义者。我们说我们正在纠正党的政策，而不要分裂。我们正在为十月革命的路线而战斗，而且要继续为它战斗。我们现在深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毫不怀疑这条路线将会深入我们党的大多数无产者的心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应该是为这个尖锐的紧急时期建立一种比较健全而又灵活的党内制度，让两条对抗的

路线去经受各种巨大事变的考验，而不致发生任何动乱。要为党保证能在各种伟大事变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批评。如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党的路线在一、二年内一定会纠正过来。不要仓促从事，不要执行事后无法补救的那种决定。当心你们别又得说：我们抛开了应该保护的人，而保护了应该抛开的人。

## 第二次发言

我高兴地注意到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声明，他说同我一样，认为官僚主义在去年已经增长起来。这不只是一个官僚人数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方针问题，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态度问题。州委书记雅柯夫列夫在一次秘密的、部分人参加的州委会上作了一个攻击反对派的派性报告，一位女工起来作了如下有力的发言，“我同意这里所说的一切。要赶快解决反对派，但是，最令人烦恼的是，当穿着稍为整洁的人去州委员会时，他立即就被带到他需要去的地方，而当一个女工去时，衣着有点单调或不雅洁，就得在过道上等很久。”这是州委员会的一位女工委员说的。这种意见现在可以越来越经常地听到。它们不仅意味着官僚人数的增加，而且表明统治集团同苏维埃新经济政策社会的上层正在日益融合起来，正在形成两个阶层、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习惯，或者，用更明确的话来说，这些要素正在形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双重性权力，它在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可能转变为双重性政权。现在，双重性政权一定会构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威胁。城市中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是一个庞大的阶层，他们在下午三点以前过职员生活，三点以后则过花花公子的生活，对中央委员会抱自由主义态度，而每星期三下午六点以后，他们就谴责反对派是缺乏信心的人。这

种党员活象沙皇的官吏，他们私下承认达尔文的学说，但需要时就把圣餐证书拿出来。

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建议我们帮助他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那么，他为什么撤销反对派的职务呢？我坚决认为，绝大多数反对派被撤职不是由于不称职，或不遵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是由于他们的信念而受惩罚。他们是作为反对派而被撤职的。他们被撤职是由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遭致的惩罚。

我想至少趁这次难得的机会简略地说明我对托洛茨基主义这个题目的看法。这是利用我的政治传记文章，特别是通过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口和笔在传播着的谎言。而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与之类似的人，现在却以审判员资格在这里出席。所有老党员都知道，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在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度反对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我过去不是孟什维克。如果孟什维主义被理解为一种政治阶级路线——实际上也只能这样理解——，那么，我从来不是孟什维克。在1904年年中，即当孟什维主义开始成为一种政治倾向的时候，我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已经同要成为孟什维主义的某种观点决裂了。在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我同维拉·查苏利奇发表的文章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了支持地方自治自由派的计划，等等。）已经决裂。在关于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孟什维主义。而这是基本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一伙人是在欺骗党和国际，不但歪曲最近十年的情况，而且歪曲更早以前我还站在当时社会民主党两个主要派别之外时的情况。

1905年5月，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武装起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决议。克拉辛同志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修正案，它实际上成了一项单独的决议，曾在大会上受到列宁的高度赞扬。克拉辛所提出的这个决议案完全是由我在彼得格勒草拟

的。我有这件事的证据，即克拉辛在一次会议上曾写给我一张便条。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最重要决议，包括它的中心部分——请查档案！——是我执笔的，我是以此自豪的。在批判我的人们中间，有什么人能从他们宝库中列举出一点堪与比拟的东西来？

1905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地下印刷所印发的全部公告都是由我写的。有一份是1月9日告农民书；另一份是评沙皇的土地法；如此等等。1905年11月，列宁主编的《新生活报》<sup>120</sup>与我在《开端报》<sup>33</sup>上论我国革命的性质的几篇文章是一致的。我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所谓不断革命的理论。

（奥尔忠尼启泽：“可是，你支持的是《开端报》，而不是《新生活报》，是这样吗？”）

你显然忘了当时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决议。《开端报》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同《新生活报》合并了，后者曾不止一次热烈赞扬我的文章。这是倾向于统一的时期。你们隐瞒了我在1905年苏维埃中同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的事实。你们隐瞒了1906年列宁在《新浪潮》上发表我阐述我们在革命中对待农民的态度的小册子《我们的策略》这个事实。你们隐瞒了1907年列宁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赞扬我对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态度的事实。我坚决认为，我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从来没有大过于罗·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在这些问题上同布尔什维主义所发生的分歧。谁敢说他们是孟什维克！

我那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从来没有犯过象维护英俄委员会或让中国共产党附属于国民党这类极端荒谬的大错误。

（克里沃夫：“维也纳纲领是干什么的？”）

你是指1912年八月联盟吧<sup>121</sup>？

（克里沃夫：“是的。”）

那是调和主义的产物。我那时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起来的可能性还没有绝望。但是，请奥尔忠尼启泽、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人不要忘记，他们自己在1917年——请注意，不是1912年，而是1917年——曾同孟什维克一道加入联合组织。维也纳代表会议<sup>122</sup>是搞调和主义的一次尝试。我决不是企图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我仍对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和解抱着希望，力图使他们统一起来。列宁在这一次正如在其他几次的情况一样，拒绝接受这种虚假的统一。作为调和主义政策的结果，我发现自己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结成了联盟。但是在我们之间立刻——几乎就在第二天——爆发了战斗，而战斗的爆发表明，我们是互不相容的对手。附带说一句，斯大林在这整个时期就是一个相当庸俗的调和主义者，尤其是在最尖锐的时刻。斯大林在1911年曾把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的斗争说成是“杯水风浪”。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说的话。斯大林在1917年3月赞成与策烈铁里联合，在1926年赞成与柏塞尔、蒋介石和汪精卫结成联盟。我的错误同这些错误相比，真是微不足道。我在1914年到1917年即战争期间的活动被那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党人库西宁轻而易举地严重歪曲了，特别是被当时的爱国主义者或考茨基的追随者那帮先生们严重歪曲了。我要提醒你们，我在战争开始时写了一本题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季诺维也夫（他过去对我没有，也不可能有好感。）曾说它对全部原则争论的问题提得很正确。

（什克洛夫斯基：“那是在1914年！”）

一点不错，那是在1914年。这本小册子成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极左派手中的武器。我当时虽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在法国曾同一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同志们合作，他们后来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参与创立共产国际的

成员。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法国的。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西班牙的。在纽约，我曾同沃洛达斯基和布哈林一起在《新世界报》<sup>123</sup>编辑部工作。1917年2月和3月，我为《新世界报》写了几篇文章，精神与列宁在日内瓦发表的文章相同，而当时正是斯大林作为半孟什维克和半护国主义者退出《真理报》的时候。在加拿大阿默斯特的集中营里，我曾把德国海员组织起来，他们成了李卜克内西的拥护者，后来站在斯巴达克派<sup>124</sup>方面进行斗争。

（奥尔忠尼启泽：“你只剩下四分钟了，托洛茨基同志。”）

我还没有谈到对你们提出的有关我国革命“衰落”的基本问题的答复。

（奥尔忠尼启泽：“你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详谈你的经历？”）

我认为被告人有权谈他的经历，而在这种情况下限制他，是超出主席职权范围的。不管怎么说，首先提出我的经历问题的，并不是我。我根本没有考虑它，事实上问题已够多了。但是，正是斯大林派用我的经历问题来取代一切政治问题。我只是用各种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回答各种谎言。我请求主席团再给我十五分钟来答复关于我们革命的命运问题。

（奥尔忠尼启泽：“你先讲完剩下的四分钟，然后我们再考虑延长的问题。”）

奥尔忠尼启泽责备我拿法国大革命作比喻。你们看，监狱、断头台和衰落的前景等等都不能谈。迷信话说，祸从口出。祸也能从事出，或出自各种活动，出自错误的政策。不过，我要说明，这个问题本身决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我引用了索尔茨的话。它们促使我提出关于革命的不同阶段的问题，革命的高潮和低潮问题，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

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奥尔忠尼启泽同志。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指出，现在所有的基层组织都在为做更进一步的结论进行准备，这种准备正是为了实行那条驱逐和镇压的路线，而你们，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却轻率地官僚主义地不加考虑。是的，我重说一次，你们很轻率，官僚主义严重，闭眼不看党内外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一切基层组织里，报告人事先都经过特殊的排练，用安排一些工人起立发言（大多是奉命）的办法提出反对派的问题，说什么“你们干吗同他们罗嗦？不正该是枪毙他们的时候了？”然后，报告人就伪装温和的样子反对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已经是党内的老一套了。常常背着反对派提出这种问题，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卑鄙无耻地用纯斯大林方式歪曲反对派的纲领和反对派成员的革命经历，把他们描绘成革命的敌人和党的敌人。这一切都是为了激起受蒙蔽的听众和不成熟的年轻党员——你们正在故意把这种人塞进党的队伍——的强烈反应。这样，你们以后就有机会说：“请看！我们是准备有耐心的，但是群众坚决要求。”这是斯大林的特殊战略，你们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围攻的组织者，而当逆浪倒卷你们的时候，你们又说：“党要求这样做，我没有办法。……”

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对我提出的第二个谴责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政治谴责。他说，我拿法国大革命作比喻正好表明了你的“悲观主义”。你们看，托洛茨基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要是我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我为什么还要对你们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是永远站不住脚的。要是我象你所说的那样，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我为什么又要象你所说的那样提出“掠夺农民”的建议呢？也许是由于我对农民有个人的仇恨？要是我不相信革命，我为什么要进行斗争？随大流岂不最好。请你们弄明白这一点！凡是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的人，决不会进行斗争。同志们，你们再一次连二加二都不会算了。

十月革命没有灭亡。我从未说过这种话。我不相信它已经灭亡了。但是，我的确说过，要是有人真要这样做，十月革命是可能灭亡的，而你们已经做了一些促使它灭亡的事情。奥尔忠尼启泽同志，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思想不是辩证的，而是形式主义的。你忽视了各种现实力量的冲突问题，忽视了党的问题。你的思想浸透了宿命论，你区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时，把它们看成与形势和政策无关的两种不可改变的范畴，按照你的思想方法，一个人只能或者是“乐观主义者”，或者是“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或者认为革命已经彻底灭亡，或者认为不论我们怎么做，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灭亡。这前后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革命不是已经经历过一系列的高潮和低潮吗？我们在十月起义时期不是有过汹涌澎湃的高潮吗？而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不是系于千钧一发吗？请回忆一下列宁在与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期间说过的话：驾驶革命时代的机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常常要对付各种急转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是一次退却。喀琅施塔特暴动以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退却。而每一次的退却浪潮不是都引起了机会主义情绪吗？这种退却和低潮在革命中延续一年或者两、三年，群众和党的情绪就会更加低落，这是非常清楚的。奥尔忠尼启泽同志，你是高加索人，你知道登山的道路不是笔直向上的，而是迂回曲折的，攀上悬岩峭壁之后，常常要走两、三俄里下坡路，再继续攀登。但是，这毕竟是一条通向山顶之路。我在走一段下坡路的时候，一定心中有数：山路曲折，攀登，再攀登。要是我由于“乐观主义”，完全无视山峦起伏的情况，我的车子就会在某一个转弯的地方坠入万丈深谷。我认为你们目前正在向右转，走下坡路。危险是在于你们闭眼不肯正视事实。而闭眼登山是危险的。

1923年秋天，在德国革命高涨的同时，我们党内出现过高潮，



而在它失败以后，我们又经历了一次低潮。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次低潮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一种倒退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背道而驰。1926年中国革命期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出现过汹涌澎湃的高潮。而在中国革命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则是一落千丈的低潮。人们对曲折的历史运动必须根据一切具体条件进行分析。我们从1923年起遭受了一系列严重失败。只有可怜的懦夫会因失败而沮丧。这种人是瞎子、蠢人、官僚主义者、连左脚和右脚、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也分不清。1924年1月失败以后，我同布兰德勒有过一次争论。他对我说：“我在1923年秋天不同意你，因为你过于乐观。现在你过于悲观了，所以我又不同意你。”我答道：“布兰德勒同志，恐怕你永远成不了革命家，因为你不能区别革命的表面与它的另一个极端。”

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在探讨革命胜败问题时，忽视了事物与辩证进程的任何联系，也就是说，忽视了我们的政策与各种客观形势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以下列方式提出问题：不是革命必胜就是革命必败。而我说：如果我们老犯真正根本性的错误，那就可能断送革命。但是，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去纠正错误路线，我们就会胜利。但是，断言我们无论是对富农，或者对英俄委员会，或者对中国革命可以任意为所欲为而丝毫不损于革命，断言革命“反正”必定胜利，目前只有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才能作出这种推论。由此可见，正是他们可能毁灭革命。

我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有什么区别？

首先是两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不同。在法国起领导作用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在我国则是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在我国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在至今仍然存在着各种巨大的障碍和危险的情况下得到这样的发展。这是第一个不同点。

第二个不同点是：法国是受封建主义国家的包围，它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比法国本身落后。而我们是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它们在技术上和工业上都比我们先进，而且有更加强大和更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们可以期望这些国家在较近的将来爆发革命。因此，尽管帝国主义与我们势不两立，我国革命的国际处境从长远历史意义来看，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远远胜过了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处境。

最后是第三个不同点。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内外大动荡的时代，它构成了革命曲线的急剧上升，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是，不能认为这条“曲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携带我们前进，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谁认为我们即使在资本主义于往后数十年内有可能击败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谁就是一窍不通。这不是乐观主义，而是愚蠢的民族改良主义。我们只有作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才能取得胜利。世界革命即使延期多年，我们也必须坚持到它的来临。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倾向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采取正确的革命方针，我们就能巩固自己许多年，我们就能巩固共产国际，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的事业将乘着国际革命的伟大历史巨轮前进。

我们党目前的方针是主要危险。它压制革命的反抗力量。你们的方针是什么呢？你们把赌注押在富裕农民身上，而不是押在农业工人和贫农身上。你们依靠官僚和职员，而不依靠群众。你们过分相信各种机构。你们在这些机构中，彼此得到有力的内部支持，互相进行包庇，正因如此，奥尔忠尼启泽甚至对缩减编制也无能为力。由于脱离群众，产生了互相隐瞒和互相包庇的制度。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在党内，现在是依靠书记，而不依靠普通党员。你们现在依靠柏塞尔，而不依靠普通的无产者。你们不依靠革命矿工，而依靠背叛矿工的柏塞尔。在中国，你们

采取的方针是指靠蒋介石和汪精卫，而不是上海的无产阶级，不是肩扛大炮的苦力和起义的农民。

你们把驱逐我们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提上日程。毫无疑问，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将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计较自己的职位。但是，这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将不得不作出进一步的结论。生活本身将迫使你们作出这些结论。你们最好是停止和改变你们的方针。

译自《斯大林伪造学派》1937年纽约英文版第125—159页。

# 战争的危險——保卫政策 和反对派(摘录)

——1927年8月1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 · 编者按语 ·

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讨论关于国际形势、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等问题。

早在全会以前，托洛茨基提出了臭名远扬的“克列孟梭式的实验”，他在7月11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信中声称，在敌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要“把那些无知和无耻的抄袭家的政治路线象垃圾一样地扫除掉”。这是托派妄想利用外敌进攻的时机实行反革命政变的叫嚣。

8月1日，托洛茨基在全会上就战争危险和国防政策问题发言，虽然不敢重复要搞“克列孟梭式的实验”的反革命叫嚣，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要“扫除”和“改变”党的领导这一反革命目标。斯大林揭露了托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虚伪性，指出托派的五项措施就是：一、作一次克列孟梭式的实验；二、宣布联共党是中派的党；三、宣布联共党是不存在的，把它说成是“斯大林的派别组织”；四、分裂共产国际；五、给联共党加上特米多尔(即

热月)倾向的罪名,分裂党并另建新党(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51—53页)。这五项措施就是托洛茨基在全会发言的主要内容。

你们给了我四十五分钟。由于这个题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我愿尽可能扼要地谈谈。你们的提纲断言:据说反对派在战争和失败主义的问题上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某些提法。这是新的捏造!你们的提纲第十三节尽讲废话。就整个反对派来说,它决不能对我以前同列宁的分歧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是纯属次要性质的分歧。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在这里对这种愚蠢的影射作一个明确的答复。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有的告国际无产阶级书——全是有关战争与反战斗争的——都是由我代表第一人民委员部和党中央委员会执笔的。我们党纲中关于战争的部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和多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主要内容是论战争)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宣言(主要是关于战争的估计及其后果和前景),都是由我执笔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以及战争和革命的前途问题的提纲也是我写的。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委员会指派我作关于国际革命和战争的前途问题的报告。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十周年的宣言也是由我撰写的。中央委员会对这些文件没有任何异议。这些文件不但未引起任何争论,而且实际上未作任何修订就通过了。请问:我的“倾向”怎么没有通过我在共产国际长期颇为紧张的活动表现出来呢?

现在,骤看起来,我在1926年抵制“经济失败主义”(莫洛托夫为英国工人提出的一个荒谬无知的口号)以后,似乎脱离了列宁主义。莫洛托夫又为什么在我批评这个口号以后把他的愚蠢口号藏

在裤兜里呢？

（莫洛托夫：“根本没有口号。”）

那是我要说的。那是胡说，而不是口号。那正是我要说的。（笑声）为什么想要极力夸大旧的分歧呢？何况这是早已消除的旧分歧？目的何在？目的就在于掩盖和抹煞当前明显的现实分歧。在指靠英俄委员会<sup>111</sup>的同时，难道会严肃提出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和真正保卫苏联的问题吗？在指靠柏塞尔、希克斯和其他叛徒集团的同时，难道会指靠工人阶级的群众在战争进程中去进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吗？请问：我们究竟是布尔什维克的保卫论还是工联主义的保卫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让我首先提醒你们，现在的领导在去年整整一年是怎样教导莫斯科无产阶级的。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点。我把莫斯科委员会的指示逐字念给你们听：“英俄委员会能够、必须而且定会在反对对苏联进行各种形式的干涉的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它（指英俄委员会）将在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发动新战争的一切企图的斗争中，成为无产阶级国际力量的组织中心。”

莫洛托夫在这里说：“我们通过英俄委员会瓦解了阿姆斯特丹<sup>113</sup>。”十分明显，他甚至现在还毫不理解，我们瓦解的是莫斯科工人和全世界工人，因为我们欺骗他们，使他们敌友不分。

（斯克雷普尼克：“这是什么腔调！”）

我的腔调和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是协调的。你们巩固了阿姆斯特丹，削弱了你们自己。总委员会<sup>125</sup>现在更加空前一致地反对我们。

不过，必须指出，我刚才念的那个令人反感的指示更加充分、明确和忠实地表达了赞成维护英俄委员会的人的真正观点，远比布哈林卖弄玄虚的咒语要高明得多。莫斯科委员会教导莫斯科工人，而政治局教导全苏联的工人：一旦发生战争危险，我们工人阶

级一定能抓住英俄委员会这根绳子。从政治上看，问题就是这样摆着。但这是一根烂绳。《真理报》星期六版的一篇社论谈到了总委员会中的“叛徒统一战线”。甚至托姆斯基所心爱的宠儿阿瑟·库克也保持沉默。《真理报》叫嚷说：“真是令人难解的沉默！”你们的口头禅就是：“这真是令人难解！”你们先是把一切赌注押在蒋介石集团身上，我的意思是指柏塞尔和希克斯身上，接着你们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忠诚的”汪精卫身上，即在阿瑟·库克身上。但是，正象汪精卫在被布哈林封为忠诚分子两天以后就叛变了一样，库克也叛变了。你们把少数派运动的手脚捆起来交给总委员会的先生们。在少数派运动内部，你们还拒绝真正的革命者与圆滑的改良主义者相对抗，你们也不可能与他们发生对抗。你们不用细韧的绳子，却用较粗但已完全腐烂的绳子。当一个人通过一座狭窄而又不安全的桥面时，一根坚实的小木棍可能成为他的救命杖，但如果他用一根一触即断的烂木棍，就要遭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堕入深渊。你们的现行政策是在国际范围内实行烂木棍政策。你们不断拚命依靠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汪精卫、柏塞尔、希克斯和库克。这些绳子都是在最需要的时刻就断了。因此，正如《真理报》社论在评述库克时所说的一样，你们先说“这真是令人难解！”，以便第二天接着说“我们始终预见到这一点”。

## 关于“中派主义”和烂绳政策

反对派曾警告说，中国共产党在你们领导之下必然会采取孟什维主义的政策，反对派对此曾及时进行过无情的谴责。我们现在警告你们，英国共产党在你们现在强加于它的政策的影响之下，

必然会蒙受中派主义和妥协主义的毒害，这是肯定无疑的。你们如不迅速改弦易辙，英国共产党的结局决不会比中国党更好。这对整个共产国际同样适用。

现在该是懂得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中派主义不能经事变考验的时候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事件是革命和战争。我们已经让中派的政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受检验。革命要求从各种摇摆不定的指示中得出决定性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已经发觉自己处在不得不作出这些结论的境地。正因如此，它得出了——也不能不得出——孟什维主义的结论。你们在中国的领导遭到了空前的失败，这要求你们最后抛弃迫使你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抓烂绳的政策。

仅次于革命的最大历史考验是战争。我们事先说过：在战争事变期间，斯大林和布哈林派所采取的摇摆、逃避和欺诈的政策（中派主义政策）是没有出路的。这也适用于共产国际的整个领导。今天，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所面临的唯一考验是这个问题：你们准备日夜投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吗？但是，战争将向他们提出各种更为重大的要求。同时，对待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的政策显然已使他们的目光转向阿姆斯特丹和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分子。不管你们怎么局促不安，英俄委员会的路线就是依靠阿姆斯特丹官僚机构这根烂绳的路线，而在目前，它的最坏的组成部分是总委员会。一旦战争爆发，你们将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吃惊”和摔跟头。你们手中的烂绳会断掉。战争会在目前共产国际的上层中间引起剧烈的分化。一部分人会在“我们要认真保卫苏联，我们不想成为一小撮狂热分子”的口号下，转向阿姆斯特丹的立场。另一部分欧洲共产党人——我们坚信他们会占多数——将站在我们正在捍卫的列宁的立场上，李卜克内西的立场上。斯大林的中间立场是没有立足余地的。因此，请允许我坦率地说，所有这一切关于一小撮反对派的谈论，关于没有军队的将军以及诸如此类的谈论，在我们



看来都是极端荒谬可笑的。布尔什维克曾多次听到过这类谈论，在1914年和1917年都听到过。我们预见明天，一切了如指掌。我们正在准备迎接明天。反对派从来没有这样心心相印，坚定不移，深信自己正确。从来没有出现现在这样的团结一致。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绝对正确！”<sup>①</sup>)

在战争条件下，中派实行逐渐倒退的国内政策也是没有出路的。一切争论将会停止，阶级矛盾将会尖锐化，各种问题都会开门见山地提出来。必须拿出明确的答案来。

我们在战争时期需要什么？是“革命的团结”，还是“神圣同盟”？资产阶级为战争和战争危险的时期设想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条件，名曰“国内和平”或“神圣同盟”。这种纯粹资产阶级概念的含义是：在战争时期，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歧和争吵，还有各政党之间的内部分歧，都必须沉默下来，以便尽量迷惑和欺骗群众。“神圣同盟”是统治者对付被统治者的最高明的阴谋形式。不用说，要是我们党在和平时期在政治方面对工人阶级没有任何隐瞒，那么，在战争期间，当政治路线的纯洁性和明确性以及深入联系群众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的时候，就更要这样做了。正因如此，在我们党实行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强大无比的集中制的情况下，我们在最激烈的内战中允许我们自己用最尖锐的可能方式讨论政治领导的一切基本问题，并用党的民主方式加以解决。这是党赖以制订和巩固正确路线，增强革命团结所必须付出的一般代价。现在有同志——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直到昨天还有——认为列宁逝世以后，我们之间的领导的绝对正确性已经保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不再需要党的检查了。我们的想法刚好相反：我们认为，在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上，今天的领导比任

---

<sup>①</sup> 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长期坚持下去。——托洛茨基注

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检查，需要加以改变。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伪善的“神圣同盟”，而是真诚的革命团结。

游移不定的中派政策在战争时期是坚持不下去的。它不是向右转，就是向左转，也就是说，不是走热月派<sup>117</sup>的道路，就是走反对派的道路。（场内议论纷纷。）

在热月派的道路上战争可能胜利吗？一般说来，这样一种胜利是不排除的。作为第一步，是取消对外贸易垄断。提供富农加速进口和出口的机会。让富农能够压榨中农。迫使贫农懂得没有富农就没有出路。提高和巩固官僚机构、行政管理的重要地位。象“基尔特主义”<sup>126</sup>一样抛开工人的各种要求。从政治上限制苏维埃工人。重订去年的选举法，逐渐使它有利于有产者。这就是热月派的道路，它的名称是：分期付款的资本主义。然后，在军队居首位的就是由富农组成的低级指挥员以及由知识分子和资产者组成的高级指挥员。这条道路上的胜利就等于为转入资产阶级轨道的转辙器增加速度。

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道路上胜利可能吗？是的，可能。但不完全如此。整个世界形势说明，如果战争爆发，正是在这条道路上胜利最有保证。但是，我们为此必须首先驱散政治上的阴霾，而在它笼罩之下，一切看起来都是灰色的。右面的富农是敌人，左面的农业工人和贫农是朋友。通过贫农争取中农。我们必须造成一种政治环境，使资产阶级和官僚不能任意为所欲为，把工人推在一边，说什么“现在不是1918年，老兄！”要能使工人阶级自己这样说：“在1927年，我们不但吃得更好，而且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比1919年更强。”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胜利不仅可能，而且有最可靠的保证，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才能获得波兰、罗马尼亚和整个欧洲的人民当中下层社会的支持。……

斯大林派的中派主义路线能带来胜利吗？这条路线在两个阵

营之间摇来摆去。它先是答应安慰富农，收养他的儿子，抚育他的孙子，然后才迟疑不决地去建立贫农团；它年复一年地修改选举法——苏维埃宪法，先是站在富农一边，后来反对富农，然后又象在北高加索所干的那样支持富农；它指靠蒋介石和汪精卫、柏塞尔和库克等背信弃义的上层分子，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这条路线能带来胜利吗？这条路线指挥我们政治局在1926年10月29日发出了关于中国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指示，禁止把内战扩展到中国农村去，不准驱逐同路人或资产阶级、地主和将军；此外就是发出呼吁资产阶级自由派让工人最低限度（!!!）武装自己的指示。这条路线使一些人丧失热情，或灰心丧气，同时不能争取其他一些人；它失去了汪精卫这样的“朋友”而使共产党员发生混乱。这条路线就是抓住烂绳不放的路线。在和平时期，这条路线也许能维持一些时候。在战争和革命的条件下，中派主义就一定会急转直下，不是向右转，就是向左转。它现在已经正在分裂为右翼和左翼，而且两翼正在不断扩大，中派日益缩小。这个过程必然会加速。如果战争强加到我们身上，它会使这个过程具有狂热性质。斯大林中派必然会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党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需要反对派来帮助党纠正路线，同时防止分裂以维护革命团结，保护党的干部即党的基本财产，以免解体。因为，有了正确的政纲，有了明确的路线，在客观条件的迫使下，绝大多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干部将能重新制订各项政策，执行坚定的革命路线，这不是由于畏惧，而是出于信念。这就是我们正在争取达到的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关于有条件的保卫论的谎言，两个党的谎言，以及关于暴动的最卑鄙的谎言，我们全都奉还给诽谤者。

（反对派席上有人说：“听！听！”）

反对派的批评是不是会影响苏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威望呢？

我们甚至永远不会想到提出这样一种问题。天主教教会或封建将军们才会提出这种威望问题。天主教会要求信徒们虔诚笃信它的威望。当一个革命者提出批评的时候，他就是在提供他的支持，而他的批评权利愈有保障，他为创业及其巩固而斗争的热情就愈高涨，因为他是创业的直接参加者。批评斯大林派的错误当然会降低“无可争辩的”和自吹自擂的斯大林派的威望。但那不是革命和共和国的基柱。公开批评和切实纠正错误，将向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证明制度的内在力量，这种制度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能够找到确保正确道路的国内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的批评及其已经产生的影响和在明天将要产生的更大的影响，归根到底，是在提高和加强十月革命的威望，获得国际无产阶级非盲目的而是革命的信心，从而在国际范围内提高保卫能力。

政治局的决议草案说：“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不是意味着别的，而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同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扩大的基础上重新进行阶级斗争。”

这是否正确呢？绝对正确。但是决议接着说：“凡是象我们党内的反对派那样对战争的这种性质产生怀疑的人，……等等。”反对派对战争的这种一般阶级意义产生过怀疑吗？胡说八道！没有怀疑过。甚至一点怀疑的暗示也没有过。只有那些自己完全陷入迷途和企图纠缠别人的人才能信口雌黄。然而，难道说这种我们全都清楚的一般阶级意义就能用来掩饰一切错误和倒退行为吗？不，不能。这样的掩饰无济于事。如果我们首先和永远理所当然地认定现在的领导是唯一可能的和天生的领导，那么，对错误领导的每一次批评就似乎是否认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号召暴动。但是，这样一种态度完全是对党的否定。在你们看来，一旦战争爆发，党只能为保卫的目的服务，但是如何实现保卫却要由另外一些人来告诉党。或者再把它说得更为简单明确：我们反对派对保卫社会

主义祖国产生过任何怀疑吗？丝毫没有。我们不但希望参加保卫，而且能够教给别人一些东西。我们是否对斯大林制订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正确路线的能力产生过怀疑呢？的确，我们产生过，而且是最大程度的怀疑。

斯大林最近在《真理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下面一个问题：“反对派当真反对苏联在同帝国主义即将发生的各种搏斗中取得胜利吗？”请允许我重说一次：“反对派当真反对苏联在同帝国主义即将发生的各种搏斗中取得胜利吗？”这个问题多么厚颜无耻，我们暂且不谈。我们现在也不打算详谈列宁关于斯大林方式——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顺——的谨慎斟酌过的评语。我们愿意就所提出的问题来谈一谈，并对它提出答复：只有白卫军才“反对苏联在同帝国主义即将发生的各种搏斗中取得胜利”。反对派是赞成苏联胜利的；这一点在战斗中已经证实，并将继续证实，决不比任何人逊色。但是斯大林并不关心这一点。他担心的是一个本质不同的问题，不敢明说而已，这就是“反对派当真认为斯大林的领导不会保证苏联取得胜利吗？”是的，我们是这样认为。

（季诺维也夫：“对！”）

反对派认为斯大林的领导使胜利变得更加困难。

（莫洛托夫：“对党怎么看？”）

党已经被你们扼杀了。反对派认为斯大林的领导使胜利变得更加困难。反对派坚持过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它的各种警告已为事变所证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现在必须改变政策，不要坐待从内部来的类似大灾难的考验。战争一旦爆发，每一个反对派成员，只要他是真正的反对派而不是冒充的，一定承担党将托付给他的任何一项前方的或后方的职务，而且负责到底。但是，决没有一个反对派会在战争前夕或战争期间放弃自己为纠正党的路线——正如我们党内经常有过的情况那样——而斗争的权利和义务，因

为这正是争取胜利的最重要条件。总结一下。拥护社会主义祖国吗？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吗？不！

译自《斯大林伪造学派》1937年纽约英文版第  
161—165、169—177页。

# 反对派声明

## · 编者按语 ·

鉴于托洛茨基反对派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联共(布)中央在联席全会上提出了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问题。但是，为了给他们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向他们提出三项建议：一、放弃关于“热月化”的无稽之谈和关于克列孟梭式的实验的荒谬口号；二、公开斥责分裂共产国际的政策；三、放弃一切派别活动，放弃一切用以在联共(布)党内建立新党的手段。不接受这三个基本条件，就不能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反对派才不得不发表这个《声明》。

声明在上述三个问题上作了一定程度的退却，但退却是附有条件的，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发动新的进攻。斯大林当时指出，“不要把反对派向我们提出的建议看做党内和平。不要为错觉所迷惑。反对派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只是暂时的休战”(《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9页)。“决不能凭几句话就相信反对派”，“而应根据反对派的行动来考查反对派”(同上，第222页)。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久以后就背弃了自己声明中的诺言。

我们撇开问题的争论形式，从实质上予以回答：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无条件地和无保留地赞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免受帝国主义侵犯。

当然，我们无条件地和无保留地赞成在现在的中央领导之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现在的领导之下保卫苏联。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信中关于克列孟梭的那一段名言能够给人以借口来把这个比拟显然不正确地解释为利用军事困难来夺取政权，那么，我们坚决反对对这段话作这样的理解。同时我们保持我们如下的主张：如果中央的路线不正确，即使在战时，党也不能拒绝对这条路线提出批评和纠正。

附带说一下，在我们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我们提出了下列口号：使一切同苏联作战的资产阶级国家失败，——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个诚实的无产者都应当为使“本国”政府失败而积极活动；使每一个不愿帮助“本国”奴隶主的外国士兵转到红军方面来，——苏联是一切劳动者的祖国；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的“卫国”（列宁）战争将是“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保卫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队伍”的战争，我们的“卫国”战争“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道路，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列宁）<sup>①</sup>；谁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不是护国派，他肯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

关于热月化的问题，我们说：国内热月化的因素正在增长，这些因素有着相当强大的社会基础。我们并不怀疑，党和无产阶级必将在贯彻列宁主义路线和党内民主的条件下克服这些势力。我们所要求的是，党的领导给这些现象及其对党的某些环节的影响以更系统、坚决和有计划的反击。我们否定这种想法：似乎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已开始热月化了。

<sup>①</sup>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91—492页。——编者注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承认，德国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公开分裂和成立两个政党的危险。我们服从共产国际关于不容许同被开除的乌尔邦斯—马斯洛夫集团有组织上的联系的决议，同时坚决主张并将力争在共产国际内部重新审查关于开除的决议，因为在被开除的人当中有数以百计的同工人群众有密切联系、忠于列宁的事业和准备诚心诚意彻底保卫苏联的老革命工人。

在德国成立第二个党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联共(布)中央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取下列措施以防止这种危险：在封闭乌尔邦斯集团的机关报和乌尔邦斯集团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的条件下，让那些接受这些条件的人重新加入共产国际，并保证他们有可能在全党刊物上以及在党和共产国际的所有队伍内坚持自己的观点。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坚决谴责任何成立第二个政党的企图。我们认为，在苏联成立第二个政党的道路无疑是毁灭革命的道路。我们将用一切力量、一切办法反对任何成立两个政党的倾向。我们同样坚决地断然谴责分裂的政策。我们将执行联共(布)及其中央的一切决议。我们准备竭尽全力消除一切派别因素，这些派别因素是由于在党内制度被曲解的条件下我们曾不得不争取让党知道我们真正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全国的报纸上作了完全不正确的解释）而形成的。

阿夫杰也夫、巴卡也夫、叶夫多基莫夫、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利兹金、穆拉洛  
夫、彼得松、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斯  
米尔加、索洛维约夫、托洛茨基

1927年8月8日

译自《真理报》1927年8月11日。

# 苏联和美国

——1927年8月19日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

## ·编者按语·

这是托洛茨基同美国代表团的一次谈话。参加谈话的代表团成员共二十六人，其中有工人、教师、新闻记者，他们所持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

托洛茨基在谈话中，不从阶级的观点来看待民主和专政的问题，片面强调专政一面，而不谈民主一面，把民主问题归结为资产阶级专政似乎需要用它来作掩饰，而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任何假面具”来作掩饰的问题。托洛茨基没有直截了当地强调苏维埃制度下存在无产阶级民主的事实，更没有说明无产阶级民主是更高类型的民主，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更加民主百万倍的列宁主义观点。

托洛茨基在谈话中默认苏维埃制度下工人没有“言论自由”的说法，并荒谬地宣扬“不满情绪”是“前进的动力”。在谈到战争危险问题上党内的意见分歧时，托洛茨基用“把我们分开的东西要比把我们团结起来的东西少得多”这种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说明托洛茨基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

在你们刚才交给我的问题单子中，我看到有许多是涉及我们

党内生活的，说实在的，是涉及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我们布尔什维克习惯于在我们党的内部来谈论这些问题。请不要以为我说这些话是表示不准备向来客回答他们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但是，我认为最好还是先向非党人士讲一讲能唤醒他们加入我们党的那些见解和意见，然后再来说明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我还要联系战争危险，回过头来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从第七个问题开始回答。

这个问题是：“说苏维埃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否对呢？还是应该说，是一个阶级专政或这个阶级的一部分——共产党专政统治的国家？”是否把苏联叫做民主国家，这取决于民主概念的内容是什么。从美国现行的民主制度的角度来看，我同意我们可以不把苏联称为民主国家；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有权否认美国是民主国家。我可以按照第七个问题同样来提出一个问题：“能否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还是说美国是一个由最大的银行、托拉斯等等专政统治的国家？”对这个问题，按照我的看法，我可以这样来回答：统治美国的是披着政治民主外衣的最集中的资本专政。当少数享有特权的人统治着多数被剥削者的时候，对少数人来说，把自己的统治用宗教的、过去君主制的或政治民主制的各种骗局掩盖起来是有好处的。苏维埃制度是工人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必要就其专政的性质去欺骗别人，因此，它不必用任何假面具来掩饰它。

其次，在其先锋队即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与封建主和资本家的专政大不相同，封建主和资本家企图使自己的专政永世长存；然而，共产党却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过渡的临时制度。革命专政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根本不要国家政权的社会，因为它将建立在生产者摆脱剥削和任何阶级隔阂的团结一致的基础之上。

现在，请允许我回答第八个问题：“在苏联为什么不是所有的

人,其中包括苏维埃制度的敌人,都有出版和言论自由?”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还得要明确一点:什么叫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有飞行的自由,但是没有飞机就很难实现这一自由。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工人都有自己的出版权,自己的集会权,等等,但是要出版就要有印刷所和纸张,而要集会就要有会场和空闲的时间。可是,印刷所和房屋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或者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即使是工人出身,那他也是受到资产阶级的熏陶而为它的利益服务的。美国工人的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有花两分钱买一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出的报纸的自由。现在的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出版自由。这种自由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我们没收了资产阶级的印刷所、储存的纸张和造纸厂。我们用这些“言论自由”的物质武器来为教育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工作服务。这样,我们就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即虽然给全体劳动人民以飞行的权利、但却剥夺了他们飞机的民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你们问: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苏维埃制度下人民会不满,但没有表示自己不满的办法?

当然不能否认可能发生或存在不满情绪。目前还有贫困,还存在着阶级差别,这一切我们这里都有,因此不满情绪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不满情绪是前进的动力。在我们这里能不能表现出来呢?我们可以断言,尽管苏维埃制度在实际上存在着种种缺点,但是这一制度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党——比完全矫揉造作和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加充分和更加直接地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感情。这里可以给你们举一个最新的例子,一切民主分子对此都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不是根据职位而是根据信念。

众所周知,奥地利是一个民主国家,并且是一个在美国观察员和教导员直接参加下不久前按照最好的国际样板炮制出来的民主

国家。但是怎么样呢？不久前，我们亲眼看到，奥地利的工人尽管有出版和集会等等的“自由”，可是除了在维也纳举行起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你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工人不会采取这种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因为苏维埃的国家制度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相反，能够给工人群众以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生活进程的大得无可比拟的可能性。

第十个问题：“是否可以说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着眼于东方而不是着眼于西方的呢？”

我不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有时我们对东方比对西方更多地注意和作出更多的努力；但也常有相反的情况。我们必须既保卫我们的西方边界，又保卫我们的东方边界，而同时也要保卫北方边界和南方边界。在占领鲁尔区的时期或在英国总罢工的时期，我们更多地注意西方。中国的革命事件把我们的注意力首先吸引到东方。总而言之，我们是把我国的命运同世界工人阶级的运动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不但同西方的革命而且也同东方的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第十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妨碍美国政府承认苏联，为了消除这些障碍须要做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愿意听听尊敬的客人们的回答。（笑声）我认为，主要障碍在于我们双方的社会制度不同，美国现在代表了最完善、最彻底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我们目前还是初次“粗浅地”试行社会主义制度。那些掌握着美国命运的人不愿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继承人。主要障碍很难消除，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自愿改变自己的制度。但是，即使在这一主要障碍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为改善相互关系做许多事情。首先应该在美国说一说，我们并不象那里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坏，这样就会前进

一小步。特别应该说一说，虽然我们是私有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我们还是重视现实的，一旦我们跟资本家签订了合同，我们就会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为什么有人在不能令人容忍的宣传中指责我们？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不愿意容忍一个表现出非资本主义思想方式的政府存在这一事实。请允许我拿我们现在的谈话作为例子。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政府机关里，你们向我提交了一张有二十个问题的单子，如果怀着恶意的话，这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颠覆苏维埃制度的企图。然而，我们没有一家报纸会来谴责我们尊敬的客人，说他们在我们这里进行不能令人容忍的宣传。但是，请你们设想一下，一个苏联代表团在华盛顿的某一个国家机关的大楼里，向美国的一个国家官员也提出这样二十个怀疑美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整个基础的问题，那会怎么样呢？你们自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的话可能被人理解为我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指责，那么请原谅，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相反，我感谢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作出同样直截了当的回答。我只是想说，要是从我们这方面来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类似的问题，必然会被说成是企图进行不能令人容忍的“宣传”。

第十二、十三、十四个问题是专门讲我们这里外国投资问题的，我们用书面的形式给你们作出较详细的答复。在这里我们只谈一些主要的看法。

迄今为止，外国的租让企业，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起的作用不大。这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存在还只有十年，而且在头几年还有国内战争。第二个原因是上面已经提到的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而产生的互相不信任。第三个原因是世界市场的极度混乱以及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

行情的极不稳定。在德国有些大商行，例如施廷内斯商行倒闭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日本最近几个月成百个大商行倒闭，这也是正常现象。而如果在我们这里有哪一个外国承租者不能马上拿到三倍利润，那就说明苏维埃经济制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十五个问题：“苏维埃政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保持和延长和平。我们认为这一任务是我们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任务。如果有人**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要和平，而另一部分人则要战争**，那么我们就劝大家不要相信这种胡说八道。保持和平的意愿是从我们工农国家这一制度的基础本身产生的，也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自我保全的一条规律。

第十六个问题问：“苏联能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赶上？”

事实证明，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毫不怀疑一定能够继续前进。从前被皇室、贵族、资产阶级挥霍掉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现在大部分可以用来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经济的集中管理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我们是否能在技术上和文化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多长时间才能超过？对这个问题不能作出简单的回答，特别是对时间问题。我们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的任务在于逐年不断地缩短这一差距，首先要正确地运用我们的国内资金，其次也要利用世界资本和商品市场可能向我们提供的——当然不是白给的——补充资金。但是，要回答我们什么时候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就必须了解它们在这段时间里将要干什么。要知道它们是不会站在原地等待我们的。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概已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与此同时，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也就是十三年前引起帝国主义战争的那个斗争又恢复了，而且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国

家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将自然而然地引起新的战争，而新的战争将会引起革命——首先是在欧洲(美国会推迟)。总之，最近这一整个时代将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大动荡时代。很难预见到资本主义国家将保持什么样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有一点是可以说的，譬如说，德国或英国，特别是整个欧洲的胜利的革命，一旦同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和我们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将会异乎寻常地加速我们的、德国的、英国的和整个欧洲的生产力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发展。事态的这种发展，自然会大大加速美国的革命，缩短历史给它推迟的时间。

但是，我们自己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向前推进得越顺利，就能越加可靠和圆满地达到这个结果，而绝不能消极地等待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尤其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承认我们之前袖手坐待。我们要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完成这一任务——沿着用自己的资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你们问——第十七个问题，——能否说，现存的教会和政府正在齐心协力地工作？

我很怀疑能这样说。苏联政府不需要教会的支持，相反，力图使劳动人民摆脱任何宗教的影响。至于所谓的“现存的教会”，就我自己的职业范围和精神兴趣来说，我没有机会去注意它。

第十八个问题：“我们在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在加强社会主义基础和提高群众福利的同时，使我们的技术美国化。但我们并不反对美国的技术苏维埃化。如果把美国的技术和苏维埃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就能使全人类的文化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第十九个问题：“从1921年以来，苏联共产主义的最大成就是什么？”1921年以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恢复了我国的工业，在生产总量方面大概已达到战前水平。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以此证明自己有能力的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我写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就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这本书在美国也出版了。

联系到战争危险,我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问题。这些意见分歧自然使不同国家的不同阶级的舆论产生不同的兴趣。报界把它写成轰动一时的消息,美国报界在这方面如果说不占第一位,也是领先的一个。你们对此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们只能奉劝不要对你们报纸上的消息信以为真。首先我们要请你们在我们这里弄清楚,问题涉及的是在同一个党内的意见分歧,这个党是由从前地下斗争的全部历史、十月革命的战斗、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党内铁的纪律联结在一起的。不会因为这些意见分歧而如此轻易地发生我们的敌人正在指望或曾经指望的那种事态。把我们分开的东西要比把我们团结起来的东西少得多。某些最敌视我们、最会撒谎或最能混淆视听的外国报纸,甚至企图把未来的战争同我们党内的斗争不管怎样都要联系在一起。这些打算和希望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这是欺骗和愚蠢的大杂烩。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党是一心一意要保卫和平的。可是,如果我们遭到旨在妨碍我们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文化的进攻,那么我们党就会象1917年街垒战中或以后几年的国内战争中那样,同心同德地为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斗争。我们现在仍然是象当年高举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战争的起义旗帜那样的革命者,如果我们的敌人以为我们从担任国家职务的时候起就变得不爱动和懒惰了,那他们就势必大失所望。

一个补充问题:“我们完全不管任何党内政治问题,我们对同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所以愿意知道,苏俄在社会生活方面终于允许工人和一切不同意政府政策的人享有舆论自由的日子是否临近了?”

我们今天马上就可以签字承担这样一项义务，如果在座的各位能签字承担一项相应的义务，即我们那些拥有强大的物质手段的和平的敌人不干涉我们的内政以帮助剥削阶级颠覆苏维埃制度和使我国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当上个世纪中叶美国激进派为消灭奴隶制而同南部诸州的奴隶主进行斗争的时候，那时不仅在南部，而且在北部诸州也很少有所谓民主的“自由”。我在美国的旧书中读到过这样的故事：北部诸州某个地方有一个奴隶制的拥护者，为自己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在公共场所那怕是酒吧间里的舆论自由，使他常常碰得鼻青脸肿。但是我必须承认，他抱怨破坏了言论自由，这直到今天也不能引起我的任何同情。至于说到南部的“民主派”，那么他们常常把反对奴隶制的人涂上一层煤焦油，再让他滚一身鸡毛。废除黑奴制，即用“自由雇佣的”奴隶制来代替黑奴制，不是通过“自由”交换意见，而是通过国内战争来实现的。现在我们正在为废除自由雇佣奴隶制、为消灭资本主义而斗争。这是一个比废除几百万黑奴的奴隶制更加巨大而困难得多的问题。全人类分为两个主要阵营：革命无产阶级阵营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阵营。所有站在中间的人在关键时刻不是参加这个阵营，就是参加那个阵营。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问题不在于抽象舆论的抽象自由，而在于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我完全坦率地告诉你们，如果有人企图使我们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们要用真正无产阶级的铁拳头来回答他们。如果在美国有人说我们破坏自由，那么我们就回答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多少有点象美国自由的真正奠基人。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推动人类前进的其它道路。被阶级矛盾分裂的人类社会不是争论的俱乐部。各阶级在斗争中使用一切说服的和暴力的手段。我们是新社会制度的先锋。我们的敌人比我们人数多得多，而且富裕得多，强大得多。他们每一步都在窥伺着我们。

他们制造了一些欺骗群众的花招，他们把这些花招叫做民主规则。当事情涉及到根本问题——保护私有制时，他们自己从来也不遵守这些规则。在马戏院的舞台上，可以按照法国式的最文雅的摔跤规则去摔跤。但是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或者当他要保护自己最重要的和最宝贵的东西时，那他就会拳打脚踢，嘴啃牙咬，还管你什么法国式的摔跤规则或日本式的柔术摔跤规则，——而他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的敌人为了反对我们，需要有这种所谓的“民主自由”。我们是不会给他们的。我们仍将一如既往，用我们可能用的一切说服的和强迫的手段，去保卫作为走向真正自由的人类新社会的唯一道路的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如果在座的或不在座的朋友们答应要取消银行和托拉斯的统治，取消军队、舰艇和飞机在陆海空的统治，那么，我们答应就在同一天给一切党派以完全无限制的自由。

还有一个在原来的单子中没有列入的问题，就是代表团团长对英国和美国共产党的批评意见。关于这一点，刚才在这里有人说：在美国“一般”不仇视共产主义而仇视共产党员，据说这些共产党员和苏联的共产党员不同，他们不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而是从事破坏性的工作。我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在我们取得政权以前，我们俄国共产党员也被指责有破坏性的倾向，甚至现在也还没有停止这种指责。我按照以礼待客的惯例，顺从地听取了对英美共产党员“态度恶劣”的抱怨。但是应该说，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把自己看作国际共产党的一名党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英国或美国共产党员的一切指责，也就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指责，当然其中也包括我。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俄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共产党员的“恶劣”的性格和态度刺激了某些人，那怎么办呢？我们准备逐渐纠正，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比我们的阶级敌人纠正得慢……

\* \* \*

请允许我对你们向我提出来的问题所作的回答到此结束。如果回答得不符合要求,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难了。

译自《真理报》1927年8月24日。

## 反对派政纲(摘录)

### · 编者按语 ·

托洛茨基反对派曾先后起草了几个反党政纲。1927年5月25日提出臭名昭著的《八十四人宣言》；6月27日提出《十五人政纲》，进一步发挥《八十四人宣言》中的反党观点；9月3日又提出这个《反对派政纲》，并同时由反对派的地下印刷所秘密印发。

这个政纲全面阐述了托派对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工农业方针、经济工作、军事建设、苏维埃和党的看法，恶毒攻击当时的各项政策，把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

这个政纲概括了反对派过去提出的纲领和要求。

联共(布)中央当时没有公布反对派的这个政纲。斯大林在1927年10月23日的演说中列举了中央没有发表反对派政纲的理由，其中说到：首先，因为中央不愿意也没有权利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使一般派别集团合法化；其次，如果发表了反对派的政纲，就意味着不但不去解散，反而去帮助组织集团和派别；最后，反对派的政纲中包含着对党的诬蔑，这种诬蔑如果发表出来，给党和国家的损害是无限的(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6页)。

美国托派分子麦克斯·伊斯特曼以《俄国局势真相

和共产党的任务》为题将这个政纲收入《俄国局势真相》一书发表。这里选用了其中的第一、五、七、九、十一、十二章。

## 第一章 前 言

在最后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列宁说道：“过去一年来，国家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不知这个别人是谁，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天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人，还是投机者和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sup>①</sup>

在这些话里提供了我们应该用来审查我们政策中根本问题的准则。汽车正往什么方向行驶？还有国家呢？政权呢？它是按照我们，代表工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共产党人所要求的方向行驶着吗？还是没有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还是“不完全是”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

自从列宁逝世以来的这许多年月里，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促使党的中央机关，以后并试图促使全党注意这个事实：由于错误的领导，列宁所指出的危险已经大大地增长了。汽车不是按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方向行驶。尽管我们遭到了种种迫害，在党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8页。——编者注

代表大会前夕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有义务，以加倍的努力唤起党对这个事实的注意。因为我们确信这个情况是可以纠正的。党本身可以纠正这个情况。

列宁说汽车常常驶往我们敌对力量所指示的地方，他这么说使我们注意两个极其重要的事实。第一、在我们社会里存在敌视我们事业的力量，这就是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他们利用我们的落后和我们政治上的错误，他们依靠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持。第二、这些力量是强大到能把我们政府的、经济的汽车推往错误的方向，并且最后甚至企图（开头用隐蔽的形式）把汽车方向盘抓过去。

列宁的话给我们规定了如下的责任：

（一）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要提高警惕；

（二）要记住，随着国家的全面恢复，这些力量将竭力联合，把他们的“修正案”加进我们的计划里去，对我们的政策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通过我们的机器来满足他们的利益；

（三）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去削弱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联合和压力，防止他们在实际上（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造成两个政权制度，这是他们一心想达到的目的；

（四）把这些问题的全部真相坦白地告诉全体劳动群众。其中包括“热月政变”<sup>127</sup>的危险和反对这一危险的斗争这个根本问题的真相。

自从列宁发出他的警告以来，我们有许多事情改善了，但是也有许多事情更坏了。国家机器的影响在增长，但同时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也在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势力在农村中的绝对和相对增长及在城市中的绝对增长，因此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开始产生政治上的自觉意识。这些分子对于他们在工作中和在社交中接触到的那部分共产党人，竭力进行腐蚀，而其结果并不总是不成功的。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

不促使党内右派分子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sup>128</sup>更进一步联合起来。

“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负——这是一场最后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呢，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呢，还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单一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还是和新兴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斗争。在一个小农、小小农和一般的小有产者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最重大的事变常常是断断续续地和在暗中进行的，只是在最后才“意外地”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成分的主要表现是农村阶级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家的增多。农村的上等阶层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越来越紧密地同我们国家——经济机构的各种环节联结起来。而这个机构常常在统计数字的掩盖下帮助新资产阶级，使它的增大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活动取得成功。

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私营的贸易机构占去我们国民收入的一个很大份额，超过总生产量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年来，私人资本以商业中间人的资格所经营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全部贸易额的五分之一，每年的绝对数字则超过了五十亿。一直到现在，一般消费者所需产品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来自私人资本家之手。这对于私人资本家则成为他们利润和积累的根本来源。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差额，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额，农村经济不同部门在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价格的差额，国内和国际价格（走私货品）的差额，这些都是私人收益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在贷款上获取高利，在政府公债上赚钱。

私人资本在工业上的活动也是很可观的。虽然在最近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相对数字减少了，但它的绝对数字仍在增长。登记



的私人资本经营的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四亿。小型工业、家庭工业和手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十八亿以上。总计，各种非国营工业加起来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五分之一，占全部市场商品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属于非国营工业的广大群众和私人资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商业资本和家庭工业资本对于手工业工人群众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剥削是新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一个极其重要并且日益增大的来源。

税收、工资、价格和信贷是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工具，某些阶级从而得到加强，另一些阶级则被削弱。

目前农业税总的来说是以一种颠倒的累进办法征收的：对力量弱的课以重税，对力量强的和富农则只课以轻税。根据大致的估计，占全苏（即使把阶级分化高度发展的省份，如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土地所有者中百分之三十四的贫农，得到的纯收入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而占百分之七点五的最高层土地所有者获得的纯收入也正好是百分之十八。而且，这两者缴纳大体相同数额的税——总税收的百分之二十。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税收加在每一个贫农身上的负担比加在富农身上，或者一般“力量强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的负担都要沉重得多。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领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税收政策绝没有“剥夺”富农。它一点也没有阻碍富农把不断增多的金钱和货物集中在他们手里。

间接税在我们预算中的作用正在可惊地增大，结果就减低了直接税的作用。仅此一端，税收的负担就自动从较富有的阶层身上转移到较穷苦的阶层身上。1925—1926年，征自工人的税收为上一年两倍，而征自其他城市居民的税收则减少了百分之六<sup>①</sup>。

---

<sup>①</sup> 《财政公报》1927年第2号第52页。——托洛茨基注

越来越沉重得难以忍受的酒税正好落在各工业部门身上。根据某些大致的估计，1926年和1925年比较，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的增长，农民为百分之十九，工人为百分之二十六，商人和工业家为百分之四十六。如果把农民划分为三个基本阶层，你就会看到富农收入的增加比工人收入的增加要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根据税收材料估计出来的商人和工业家的收入，无疑是少于他们的实际收入的。但是，即使这些加工过的数字，也清楚地证明了阶级分化有了发展。

在过去一年半之间，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已经更加扩大了。农民出售产品所得的价格，至多为战前价格的一点二五倍，而他购买工业品所付出的价格至少为战前价格的二点二倍。去年一年，农民，并且主要又是下层农民的这种超额支出的总数为十亿卢布，这不仅加剧了工农业之间的矛盾，而且使得农村阶级分化大大尖锐化。

批发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使国营工业受了损失，也使消费者受了损失，这就是说有一个第三方面得到了利益。得到利益的是私人资本家，因此也就是资本主义。

1927年的实际工资最多也不过维持了1925年秋季的水平。可是在这两年期间，无疑地国家变得更富了，国民总收入增加了，农村的富农阶层极为迅速地扩大了他们的贮存，私人资本家、商人、投机者迅速地增加了他们的积累。很清楚，国民总收入中工人所占的份额是减少了，而其他阶级所占的份额却增大了。在评价我们的全面情况时，这个事实非常重要。

只有从心里认为我国工人阶级和我们党不能克服它的困难和危险的人，才会硬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发展中的这些矛盾，指出这些敌对势力的增长，是惊慌失措和悲观主义。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必须看清危险。我们把它们确实地指出来，正是为了用

正确的方法同它们斗争并且克服它们。

敌对势力——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新经济政策下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用单纯行政命令或简单经济压力去消灭这些力量。由于我们提出和执行新经济政策，我们自己就为我国资本主义关系开辟了一定的地盘，并且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还必须承认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当列宁说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他不过提醒我们注意工人必须知道的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当我们继续是一个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sup>①</sup>

列宁在这里指出的无比重要的这个社会情况，我们已经说过，是不能简单地消灭的，但是我们能通过正确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工人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和依靠同中农的联盟来克服它，跟它斗争。这个政策是有机地包括在所有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强里面，包括在社会主义指挥中心最迅速的提高里面，这个指挥中心是为准备和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工作的。

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也包括策略的运用。在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列宁常常采取部分让步的办法，以便麻痹敌人；采取暂时后退的办法，以便以后更成功地前进。现在也需要运用策略。但是在对于不能用直接进攻击败的敌人进行迂回运动作战的时候，列宁总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这条战线上的。在他领导下，党总是明了采取每一个策略的理由，它的意义，它的限度，不可超越的界限，以及无产阶级再次开始前进的位置。在列宁领导下的那些年月里，后退就叫做后退，让步就叫做让步。由于这样，在迂

---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页。——编者注

回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队伍总是保持着它的团结一致、战斗精神和明确的目标意识。

在最近时期，领袖们已经肯定地脱离了这些列宁主义的方法。党盲目地被斯大林集团领着前进。这个集团掩盖敌人的势力，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上制造一种成功的外表，它没有给无产阶级指出前途——或者，更坏的是，它给无产阶级指出一个错误的前途。它左右摇摆着前进，迁就和迎合敌对分子。它使得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削弱并且发生混乱。它促成了消极态度的增长、对领导不信任和对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它借口列宁主义策略而把非原则的左右跳跃伪装起来，这种左右跳跃总是出乎党的意料的，为党所不理解的，削弱党的力量的。唯一的结果是使敌人赢得了时间，他们前进了。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的这一类策略的“典型”例子在国际上是他们的中国政策和对英俄委员会<sup>111</sup>的政策，在国内是他们对富农的政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项彻底错误的政策的严重后果落在他们头上以后，他们才能发现真相，或者一部分真相。

在我党中央机构的政策实际上决定于斯大林集团的这两年<sup>①</sup>的结束之际，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集团无力防止：（一）那些企图把我国的发展推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的无节制的增长；（二）在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力量增长的相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农地位的削弱；（三）工人国家在和国际资本主义斗争中一般地位的削弱，苏联国际威信的下落。

斯大林集团明显的错误是：不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党、工人阶级和农民，反而掩盖事实，讳言敌对势力的增长，不许那些追究和揭发真实情况的人开口。

---

① 实际上是四年。——英译者注

在整个情况表明危险来自右面的时候，却集中向左开火；粗暴地、机械地压制表示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命运正当震惊的一切批评，公然默许右倾趋势，削弱党的无产阶级和老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情，正是在最需要无产阶级的积极活动、党的警惕和团结、对列宁真正遗产的忠诚这样一个时刻，来削弱工人阶级并使它解除武装。

党的领袖们曲解列宁，修改列宁，解释列宁，补充列宁，视其掩盖他们连续犯下的每一错误的需要而定。自从列宁逝世以来，一系列的新理论被创造出来了，唯一的意义是：为斯大林集团脱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供理论根据。孟什维克、路标转换派<sup>129</sup>〔事后的同情者〕和资本主义报刊欢迎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和新理论，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从列宁前进”（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运动，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说理”，是“现实主义”，是对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乌托邦”的否定。他们欢迎从党的领导中清除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列宁的战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改变党的根本路线的实际步骤。

同时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险。

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一个大地雷。这个过程的前途最终取决于国营企业增长和私营企业增长的对比。我们工业增长的缓慢步伐大大增加了农民中的阶级分化的速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方面的危险。

列宁写道：“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富农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以前所有欧洲的革命由于工人软弱，富农使共和制退到了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退到了剥削者、富

人、寄生虫的专政。……你可以相当容易地使富农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们互相争吵，但是要使它同工人阶级讲和，永远办不到。”①

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谁要是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谁就只能使革命撞在暗礁上毁灭。

我国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容的基本立场。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个是一心要把我们的发展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这个阵营，把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主的私人首创精神和个人利益上。这个阵营把它的赌注下在“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要使合作社、工业和我们的对外贸易都为这种农民利益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该依靠国家预算，它不应该发展得太快以致损害农业资本家的利益。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日益加强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神经。争取降低价格对它来说，就是为商业资本的利益而减少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反对官僚主义对它来说意味着解散工业，削弱计划中心；意味着把重工业置于不重要的地位——这又是进行一次有利于力量强的农民的调整，并且很快就放弃对外贸易垄断制。这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的路线。这条路线的名字就是根据分期计划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在我国是一个强大的趋势，它影响着我们党内的某些集团。

关于无产阶级路线，列宁是这么说的：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确使他们完全屈服，并保证本身完全巩固，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基础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83、584页。——编者注

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和无变化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这种帮助将为大大提高农业和耕作劳动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实例的力量和小农自身的利益迫使他们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sup>①</sup>

我们党的整个政策——预算，税收，工业，农业，对内和对外贸易，一切的一切，应该建立在这个原则上。这就是反对派的根本立场。这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斯大林派一天天趋近于前者，他们正沿着一条时而稍稍向左然后大大向右的摇摆路线前进。列宁主义路线是在同资本主义成分不断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乌斯特里亚洛夫路线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以逐步侵蚀十月革命果实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斯大林路线在客观上导致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减慢，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降低，从而为乌斯特里亚洛夫路线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斯大林路线背离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是掩盖在人们熟知的社会主义辞句的假面具下面的，因此它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就更大。我们建设过程的完成会把经济发展的全部根本问题暴露出来，并且会使斯大林的政策破产，这种政策用来解决重大问题——无论中国革命问题，或者苏联基本建设问题，是完全无能的。

尽管情势紧急，并且由于现领导的生硬错误而使紧急情势达于极点，情势仍然是能够扭转的。但是必须改变党的领导集团的路线，并且必须按照列宁所指示的方向，雷厉风行地改变。

---

<sup>①</sup>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85页。——编者注

## 第五章 苏维埃

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总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互相忠诚，在群众中间有计划地散布恐惧和对统治者的服从心理，用这样的方法来使自己骑在人民头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十月革命用工农兵苏维埃代替了旧的国家机器，给了资产阶级国家这个老偶像以历史上最沉重的打击。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党纲说：

“俄国共产党在与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时，坚决采取下列措施来彻底消灭这一祸害：（1）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个代表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2）不断变换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逐渐掌握所有管理部门；（3）逐渐把所有的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彻底而全面地实行这些措施，就是沿着巴黎公社所曾经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一步，同时在劳动人民文化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简化管理机关的职能，这将促使国家政权归于消灭。”<sup>①</sup>

苏维埃的官僚主义问题还不仅是一个文牍纷繁和机构人员庞大的问题。根本上这是官僚机构所扮演的阶级角色的问题，它的社会联系和同情的问题，它的权力和特权地位的问题，它同耐普曼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关系，同知识分子和文盲之间的关系，同苏维埃“阁下”夫人和无知农妇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的问题。干部站在哪一边呢？这是千百万工人每天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提出的

---

<sup>①</sup>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5页。——编者注



问题。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提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时，有力地强调指出了这个思想：“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去代替议会制机构。”<sup>①</sup>

最近几年苏维埃国家机构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呢？向着精简机构和节省开支的方向吗？无产阶级化吗？接近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吗？缩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吗？在生活条件、权利和义务方面更加平等的问题上，情况怎么样？我们在这方面前进了吗？非常明显，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你都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当然，不言而喻，真正的和完全的平等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达到。）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平等化的任务是受到阻碍和迟延了，但是并没有取消。对我们来说，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逐渐吸引全体劳动人民直到最后一个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有步骤地争取较大的平等，这仍然是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个斗争只有在国家日益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在物质及文化建设的一切部门居于优势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胜利。在过渡时期，这个斗争并不排斥给合格的工人以较高的工资、提高专家工作的物质水平。它也并不排斥给教员以高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工资，等等。

必须注意，近几年来官员队伍的人数一直在增长。它在巩固自己，把自己置于一般人民之上，在同城市和农村的较富有的分子结合在一起。1925年的“指示”把选举权给了为数众多的剥削分

---

<sup>①</sup>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1—272页。——编者注

子，这不过是一次很清楚的表现，表明这个官僚机构（直到它的顶峰）对于社会上富有的、发财的、兴旺的分子，已经变得有求必应了。取消这些指示——它们实际上是对苏维埃宪法的破坏——，是反对派批评的结果。但是在新指示下的第一次选举在一些地方已经暴露出有一种得到上面鼓励的意图，要尽可能地减少富裕阶层中被剥夺公权的人数。但是，问题的中心不在这里。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不断相对增长、并且日益同官僚机构靠拢的情况下，在我们总的领导机关的错误路线下，即使他们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仍然能够影响——虽然是在幕后——行政人员和政策，至少对较低的苏维埃机关是如此。

下层富农和“半富农”分子及城市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的渗透开始于1925年，由于反对派的攻击曾使之部分地停止，这种渗透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忽视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悲惨的后果。

城市苏维埃，这是使工人和劳动群众直到最后一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它已经失掉了一切真正的作用。这是阶级力量对比无可怀疑地向着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改变的表现。仅仅在行政上“复活”苏维埃来抵抗这种现象是不可想象的。只能用坚决的阶级政策来抵抗它——坚决反对新的剥削者，毫无例外地在苏维埃国家的一切组织和机关中增加无产阶级的活动和比重。

莫洛托夫的“理论”说，我们不可以要求工人靠拢国家和国家靠拢工人，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在内容和性质上已经是一个工人国家<sup>①</sup>，这是官僚主义最最恶性的公式。它事先就批准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官僚主义蜕化。在现领导集团下，对于莫洛托夫这个

---

① 《真理报》1925年12月13日。——托洛茨基注

反列宁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得到苏维埃官僚机构的广大人士公开的或者默认的同情——的任何批评，都被叫作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严厉地谴责这个“理论”以及一切类似的“理论”，是进行任何真正斗争以反对官僚主义蜕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斗争并不仅仅意味着把一定数量的工人变成干部。它意味着整个国家机构在一切日常工作中靠拢工人和贫农。

目前官方所进行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不是以工人的阶级活动为基础，而是企图以机关本身的活动代替它，这个斗争不会也不能有重大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反而促进和加强了现有的官僚主义。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近几年来在苏维埃内部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完全反动的过程。苏维埃同基本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上的决定越来越没有关系。它们正在变成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的附属品。政府工作完全集中在后者的手里。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讨论问题只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同时，苏维埃机关两届选举之间的时期正在延长，它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情形正在增长。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加强了官僚分子在决定一切问题时的影响。

庞大的城市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常常操在一两个共产党人手里，他们选用自己的专家和自己的工作人员，并且常常完全依赖这些人。没有适当训练苏维埃的人员。从下到上都没有让他们参加实际工作。因此在苏维埃机构里不断有缺乏熟练工作人员的抱怨。因此权力越来越多地转到官僚方面去。

苏维埃重要工作部门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行政人员，只要同苏维埃主席发生冲突，就马上被撤换。如果同党的省委员会发生冲突，他们被撤换就更快。结果，选举原则已荡然无存，对选举人负责云云也失去了任何意义。

因此：

(一)必须采取坚决的政策同官僚主义斗争——象列宁那样进行这个斗争，使它成为阻止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剥削意图的真正战斗，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在党、工会和苏维埃内部坚持一贯地扩大工人民主。

(二)必须采取使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同国家紧密联系的口号，国家机关无条件地为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服务的口号。

(三)作为使苏维埃恢复活力的基础，必须加强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活动。

(四)必须把城市苏维埃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变成引导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的工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实现城市苏维埃对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的控制。

(五)必须完全停止撤换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干部，除非在真正和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理由向选举人讲清楚。

(六)我们必须做到，使最落后的不熟练工人和最无知的农妇凭他们的经验相信，在无论什么国家组织里，他们都将得到关怀、忠告和一切可能的支持。

## 第七章 党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党曾经赢得过象我们党所赢得的这样巨大的胜利，迄今十年来我们党一直领导着一个无产阶级并且实现这个阶级的专政。俄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党。没有其他任何党担负过象我们

党所担负的这样一个国际历史责任。但正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所掌握的权力，我们党应该毫无畏惧地批评自己的错误。它应该暴露自己的阴暗面并且清楚地看到实际蜕化的危险，以便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列宁在世时常常是这样的，他经常警告我们防止自己蜕化成“骄傲自大的党”<sup>①</sup>的危险。在展示下面这幅我党目前状况和它的一切阴暗面的图画时，我们反对派表示坚定地希望：如果采取真正的列宁主义政策，党是能够克服它的弱点并且足以担当它的历史任务的。

(一)近年来，我们党的社会成分一直在恶化。1927年1月1日，我们党内大约有：

实际从事产业和运输业的工人	430 000
农村雇工和农业工人	15 700
农民(半数以上现在是政府干部)	303 000
干部(半数以前是工人)	462 000

由上表看来，在1月1日的时候，我们党只有三分之一的车间工人(事实上只有百分之三十一)，而三分之二是农民、干部、前工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

在过去一年半之内，我们党大约失去了十万车间工人。1926年“自动”退党的普通党员达到二万五千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六点五是车间工人<sup>②</sup>。根据官方材料(它当然把实际情况加以缩小)，由于最近同党员重新登记一起进行的所谓“甄别”，大约有八万党员被开除出党，其中的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以相对数字计算，今年初登记的党员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五”<sup>③</sup>。因此，仅仅通过重新登记的办法，就“甄别掉了”全体党员的百分之六点五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6页。——编者注

② 《消息报》第24、25号。——托洛茨基注

③ 同上。——托洛茨基注

(约为八万党员)。在“被甄别掉”的党员中，大约百分之五十为熟练工人，三分之一以上为半熟练工人。中央委员会要缩小这些业经大大缩小的统计数字的企图显然没有得逞。我们用斯大林的“甄别”抵消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

另一方面，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有十万农民被吸收入党，其中大多数是中农。雇农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

(二)党的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的恶化情况更加严重。在县(小区)委员会里，农民(出身)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五，职员及其他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这些委员会成员的百分之八十一一点八是各国家机构的雇员。车间工人在这些党的领导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几乎等于零。州和省委员会里，车间工人所占比例为百分之十三点二；在县委员会里为百分之九点八到百分之十六点一<sup>①</sup>。

党本身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是产业工人，而在那些党的决策机关里，产业工人只占十分之一。这构成对党的严重危险。工会也是走着同样的道路。这表明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行政人员”和“工会官僚”，把我们手里的权力拿去了很大一部分。这是使党“非无产阶级化”的最可靠的道路。

(三)“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前孟什维克”在党机器内和在一般领导岗位上的作用增大了。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在居于我们报纸负责和指导地位的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八是以前参加过其他党派的<sup>②</sup>。目前情况更坏一些。掌握党的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实际指导工作的，或者是“青年”修正主义派(斯列普柯夫、斯捷茨基、马列茨基及其他人)，或者是其他党派的前党员。在居于我们

① 《统计汇刊》1927年6月10日。——托洛茨基注

②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第83页。——托洛茨基注

党的行政机构领导地位的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前孟什维克。

(四)官僚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在增长，但是它的增长在党内特别具有破坏性。现在的党官僚们是这样看问题的：

“我们有许多党员，他们还没有适当地了解党，了解党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认为党是从支部建立起来的——支部是党的基础，然后区委员会，这样一层层地向上建筑，直到中央委员会。这是不正确的(!!!)。必须自上而下地看我们的党。在一切实际关系上和在我们党的全部工作中，都必须遵守这个观点。”<sup>①</sup>

比较负责的同志，比如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给我们规定的党内民主的定义<sup>②</sup>，本质上和这是同一回事。

这个“新”概念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我们当真承认“必须自上而下地看”我们的党，那就意味着，列宁主义的党——工人群众的党不再存在了。

(五)党内民主在过去的几年内被一步一步地取消了——这破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传统，破坏了一系列党代表大会的直接决定。干部的真正选举在实践中已经不存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没有一点不受到歪曲。党章被系统地篡改，目的在于增加上层的权利，而减少下层核心的权利。县、区、省委员会的选举期限被中央委员会延长为一年，两年，以及更长的时间。

省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省工会理事会等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不变动的(任期从三年到五年以及更长的时间)。任何一个党员和任何一部分党员“向全党申诉根本不同意见”<sup>③</sup>的权利实际上

① 《俄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讲话》，载于《铁锤》杂志 1927年5月27日。——托洛茨基注

② 《真理报》1926年6月4日。——托洛茨基注

③ 列宁语。——托洛茨基注

被取消了。在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前，不把一切问题让全党进行事先的自由讨论（象我们在列宁领导下时所经常做的那样）。要求进行这种讨论被看作破坏党的纪律。完全忘了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参谋部’必须真正为其部队的忠实而直觉的意志所支持，这支部队服从参谋部，同时又指导参谋部。”

党内正出现一种意义极为重大的情况——这是总路线的必然副产物——，这就是驱逐党内的老人，这些人经历了地下时期，或者至少经历了国内战争，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能够维护自己的观点。他们被一些新分子所代替，这些新分子的突出优点是盲目服从。

这种以革命纪律的名义自上而下地培养的服从，其实和革命纪律毫无关系。现在被提升到工人阶级基层组织和行政机构的领导地位的新共产党员，常常是从那些一贯以对革命前原来的当局驯顺著称的工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得宠是由于他们以明显尖锐的敌视态度对待老的工人党员——在革命最艰苦时刻的工人阶级领袖人物。

同样的现象以更加丑恶的形式出现在国家机关里，人们在那里常常会遇到苏维埃“党”老爷的完善典型。在庄严的场合，他以十月革命的名义发誓；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漠不关心；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资产阶级环境中，背后大骂他的上级，而在党的会议上“痛斥”反对派。

一个领导党员（首先是书记）的实际权利要比一百个普通党员的实际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形是由斯大林的“理论”所促成的，这种“理论”背弃了对于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可破坏的列宁主义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并且只能通过党的专政来实现。

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他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



工人民主的死亡。

党内分歧被曲解了。对于那些被斥为“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观点，进行一连几个月和几年的恶意论战。但是却不许这些布尔什维克们在党的报纸上阐述他们自己的观点。昨天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崩得分子<sup>130</sup>，犹太民族主义者，都在《真理报》上攻击和谴责一些中央委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他们对这些文件断章取义。但是文件本身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党的基层组织被迫投票“谴责”他们对之毫无所知的文件。

党被迫根据官方的“说明”和注解来判断我们的不同意见，而这些“说明”和注解往往既不真实又极无知，令人作呕。列宁的“谁仅仅根据无稽之谈而相信什么，谁就是毫无希望的傻瓜”这句话，已由另外一句话来代替：“谁不相信官方的话，谁就是反对派。”倾向反对派的产业工人为了他们的态度不得不付出失业的代价。普通党员不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党的老干部被剥夺了在报纸上或在会议上的发言权。

捍卫列宁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们被诬蔑为想要制造“两个党”。这个精心编造的指责，是为了使工人一致反对反对派，因为工人自然是热情维护他们党的统一的。对于斯大林的孟什维主义严重错误的任何批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英俄委员会等），都被说成是“反党斗争”。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斯大林事先从来没有向党提出过任何问题，无论是中国革命政策，或者任何其他重要问题。关于反对派要制造“两个党”的指责，每天有一些人重复不休，这些人自己的目的正是要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员排挤出党，以便他们可以放手实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

（六）几乎党的全部教育工作和全部基本政治文化事业现在都已成为整反对派的课程。强制的方法不仅几乎完全代替了说服的方法，而且补充以欺骗党的方法。党的教育成为仅仅是官方宣传，

因此逃避这种教育成为一般的倾向。会议、党校和小组活动现在都供作整反对派之用，因此参加的人数大大下降。对于党机关目前的错误路线，全党正在采取消极抵抗。

(七)近年来，不仅个人野心、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在党内日益发展，而且发源于异己和敌对阶级的浊流也流入党内——比如，排犹主义。党要保全自己就必须对这类污秽进行无情的斗争。

(八)虽然有这样一些事实，但是压制的措施却完全针对左派。由于反对派在其所属的支部会上发言，由于他们大声疾呼，由于他们企图宣读列宁遗嘱，因而把他们开除出党已经完全变成惯例。在政治认识水平上，更加重要的是在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上，被开除者常常是高出于开除者的。这些同志虽然处于党外——因为对蒋介石、柏塞尔或他们自己的官僚“不信任”和“抱悲观主义”，因此有罪——，但他们继续过党的生活。比起那些仍然是党员的野心家和市侩来，他们远为真诚地为党服务。

(九)由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目前压制和威胁的冰雹大大地加紧了，为的是进一步威吓党。这就证明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和李可夫联盟为了掩盖其政治错误，必然求助于极端手段。它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把党置于既成事实之前。

(十)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这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同斯大林一致的原则制定的）是错误的。目前中央委员会的核心继续在摇摆之中向右移动。取消党内民主是政治路线根本错误这个事实的必然结果。既然这条路线反映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压力，反映着包围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那么就必須自上而下地来强迫执行。

在理论方面，所谓“青年学派”占有垄断地位。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学派，他们任何时候都准备执行党机关的学术命令。受过布尔什维克党真正传统的熏陶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优秀分子，不仅遭

到排挤，而且实际上受着迫害。

在组织方面，政治局实际上隶属于书记处，书记处隶属于总书记，这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表示的最大担心——担心斯大林不够忠顺，担心他不按党的方式使用他所“掌握的”“极大权力”——已经得到了证实<sup>①</sup>。

目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一般领导机关里存在着三种基本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公然无忌的右倾。这种倾向又包括两个集团。其中之一，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软弱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经济上有势力的”中农的。它的路线是中农决定的，它受到中农思想的指导。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这样一些同志：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诺夫、加里宁、格·彼得罗夫斯基、邱巴尔、卡明斯基及其他人。紧紧围绕着他们活动的是一些“非党”政客：康德拉提也夫之流、萨季林之流、查扬诺夫之流、以及富农的其他代表们，他们或多或少地公开宣扬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理论。在每一个省，尤其在每一个县都可以看到不少小康德拉提也夫和小萨季林，他们在那里拥有一份真正的权力和影响。第一种总倾向的另一个集团是由工会领袖构成的，他们代表着工人和职员中的高薪阶层。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希望同阿姆斯特丹国际<sup>113</sup>加强联系。这个集团的领袖是托姆斯基，美尔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同志。这两个集团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摩擦，但是它们要使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路线无论在国际政策或国内政策上右倾的意图，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蔑视列宁主义理论和鄙弃世界革命策略著称的。

第二种倾向是官方机器的“中派主义”。这种倾向的领袖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基洛夫诸同志。

---

<sup>①</sup> 列宁 1922 年 12 月 25 日和 1923 年 1 月 4 日的信件。——托洛茨基注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政治局。不断摇摆的布哈林“代表了”这一集团的政策。这个官方中间集团本身绝不代表任何广大群众的态度，但是它却企图——不是没有成功——使自己代替党。党的、工会的、产业机构的、合作社的、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员”这个阶层现在已达几万人。其中有不少“工人”官僚——这就是说，以前是工人，而现在同劳动群众已经失去了一切联系。

不消说，在对革命前途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行政和领导机关里，当然也有成千上万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是没有同群众断绝联系、无限忠诚于工人事业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些机构里进行着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由于政治路线和党的制度的蜕化变质而产生了人数众多的真正官僚阶层这个事实。

这个阶层的实际权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个“行政人员”集团坚持主张“安安静静”，“关心业务”——而最主要的是“不准讨论”。正是这个集团自满地宣布（并且有时是真正地认为），我们已经“快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十分之九”已经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视”全党，更加高高在上地俯视非熟练工人、失业者、雇农。这个集团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左边——这就是说，在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之中。这个集团提出“向左开火”的口号。

目前，右和“中间”这两种倾向，由于它们共同敌视反对派而团结起来。但是如果清除了反对派，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加剧。

第三种倾向就是所谓“反对派”。这就是党的列宁主义派。由于统治集团要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它就可鄙地企图把反对派说成是一个右倾派别（“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等）。反对派是拥护党的统一的。斯大林硬说反对派要建立“第二个党”，他在这面谎言的旗帜之下宣传自己的纲领——“清除”反对派。反对派用自己的

口号回答道：“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列宁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统一。”目前这个文件阐明了反对派的纲领。党内的工人阶级成分和一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将会拥护它。

反对派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列宁的事业而斗争，因此个别人背离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三种倾向的领袖中间将会发生个别人的重新组合，但是这种重新组合并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根本事实。

(十一)把所有上述事实合在一起就构成党的危机。自从列宁逝世以来，党内分歧日益深刻化，牵涉的根本问题越来越多，范围日益扩大。

党内群众的基本情绪是希望党统一。现在的制度使全党无从理解，威胁着党的统一的危险来自什么地方。在每一个尖锐和重要的问题上，斯大林的全部策略是使全体党员面临单一的抉择：要么放弃你自己的意见，要么承受企图分裂的指责。

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以保持党的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割除、驱逐、开除等等政策——但同时在这个界限内，保证全党有权对一切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和作出决定。

反对派在揭发目前党内错误和不正常状况的同时，深信党内工人阶级成分的基本群众终于能够不顾一切把党带回列宁主义道路。反对派的根本任务就是去帮助这个过程。

## 实际建议

1. 必须象我们在列宁在世时所做的那样，在真正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准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写道：“每一个党员应当冷静地和极其公正地研究：（1）意见分歧的实质，（2）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研究，同时还一定要有能够从各方面进

行检查的最精确的印刷文件。”<sup>①</sup>中央委员会必须让每一个党员有可能研究目前党内分歧的实质和目前斗争的发展。为了这样做，它必须通过报纸以及特刊和小册子，发表对党至今隐瞒的全部文件。

任何一个或一部分同志，都应该有机会在报纸、会议等等场合对党阐述自己的观点。

中央委员会的、地方组织的、个别党员的和部分党员的中心提纲(政纲)，应该至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在《真理报》(或者《真理报》增刊)和地方党报上发表。

争论的进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和真正同志式的，不允许攻击个人和夸大事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全部准备工作的主要口号应该是统一——不是虚假的统一，而是俄国共产党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整个共产国际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

2. 必须立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进党及其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重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最近的将来，直接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应构成党员的大多数。”在今后二、三年间，我们应该仅仅和专门吸收来自车间的男女工人和在田里干活的男女雇工，把这作为一般原则。从其他社会阶层吸收党员，只能在严格的个别挑选的基础上进行：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只有工人阶级或农村无产阶级或贫农出身的才能吸收；贫农只有经过至少两年的社会政治工作考验以后才能吸收。必须停止吸收来自其他党的人们。

我们必须执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区委员会、省委员会等机关的全体人员中，车间工人不应少于百分之五十。这项决议实际上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取消，这是违背反对派意志的。在工业中心，我们必须保持车间工人的稳定多数(不少于四分之三)。

---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27页。——编者注

在县委员会里，应有同样的由工人、雇农和贫农组成的多数。

3. 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和执行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这项决议是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并于1923年12月5日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重申过，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也重申过这项决议。

我们必须以全党的名义重申：“‘工人’民主意味着一切党员有对党内生活重大问题公开表示意见和进行自由讨论的权利。有选举负责领导人员和从上到下各级委员会的权利。”<sup>①</sup>这是同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沃夫等人所发明的和传播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反列宁主义新定义完全不同的。我们必须对在现实生活中损害每个党员的这种基本权利的人采取惩罚措施。

一般地说，党内少数在任何原则问题上的观点，都应通过党报等方式使全体党员得知。只有在有关问题是秘密的条件下，才允许有例外。不言而喻，在决议通过以后，就要按照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予以执行。党的争论俱乐部网必须扩大，必须使党的机关报刊能够被用来对党领导的错误进行真正的批评（采取讨论专页、文选汇编等形式）。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加进党章里面的那些不好的改动（第25、33、37、42、50页等），必须取消。

4. 我们必须采取使全部机构无产阶级化的坚定路线。构成整个党机构决定性多数的应该是那些受党和非党群众拥护的车间工人和先进的共产党人。党机构绝不应该完全由领取薪金的人员构成，而应该经常从工人中吸收人员来加以更换。地方组织（包括州和省）的预算基本上应依靠党费。地方组织应该定期地确实地把它们的帐目向党员群众公布。目前党的庞大预算和付给党机构

<sup>①</sup>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托洛茨基注

的薪金应该坚决削减。很大一部分的党的工作应该由党员在企业或其他工作以外抽时间尽义务来做。恢复党机构生气的措施之一就是系统地把一些同志从机关下放到工厂和其他下层工作中去。我们必须反对书记使其本身不能更换这种倾向。我们必须确定书记和其他负责职位的明确任期。我们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反对最高集团的腐化和堕落,反对培植亲信,“官官相护”等等。(例如塞兹兰、赫尔松、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地。)

5. 早在列宁领导下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着重指出在党内和劳动群众内部更加平等的必要性。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已经注意到,在新经济政策下那些因其活动而同资产阶级发生联系的党的工作人员有蜕化的危险。必须“制定完全实际可行的措施来消除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在生活条件、工资条件等方面),因为这种不平等破坏民主制度,并且是使党腐化和使共产党人威信下降的一个根源”。鉴于不平等的情况近年来异常迅速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要象革命者那样来解决它。

6. 必须沿着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路线,重新组织党的教育工作,禁止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贗品的传布,这种贗品目前正在大规模地制造。

7. 必须立刻恢复被开除的反对派党员的党籍。

8. 必须真正按照列宁指出的精神重建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

(1)和群众紧密联系。

(2)独立于党机构之外。

(3)在党内有威信。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恢复人们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任,才能把它的威信提到必要的高度。



9. 在选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两者所属机关的全体人员时，必须遵循列宁在1922年12月25日和26日，及1923年1月4日信（遗嘱）中所提出的忠告。这些信件应该印发给全体党员参考。列宁在1922年12月26日的信中写道：“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sup>①</sup>

列宁在写这些信的时期，他在革命根本问题上向党提出了最后的和最为深思熟虑的忠告<sup>②</sup>。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应该严格按照上述列宁忠告的观点，选择它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 第九章 我们的国际环境和战争危险

### 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处境

一场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推迟这个危险，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加强苏联并团结国际上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应该是我们主要的实际的任务之一。只有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9—620页。——编者注

②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论合作制》。——托洛茨基注

主要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能最后消除这个危险。

由于下述的原因，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

1. 近年来资本主义方面为加强自己而进行的斗争，及其在这个斗争中所取得的部分胜利，使得市场问题对于各主要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紧急问题。

2.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相信苏联经济力量的明显增长，他们也看到在对外贸易垄断制保护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在俄国为资本家提供“自由”市场。

3.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正在猜测苏联的国内困难。

4. 英国总罢工和中国革命的相继失败，使帝国主义充满了希望，他们以为可以成功地打垮苏联。

英苏断绝外交关系很久以前就在蕴酿之中，而由中国革命的失败加速了它。在这个意义上，这件事是中央委员会拒绝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真正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个报应。如果认为这件事只不过是英苏间贸易形式有所改变，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仍将进行贸易，象我们和美国之间进行贸易那样。”）现在非常清楚，英帝国是有一个更大的活动计划的。它正在准备反苏战争，正从其他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那里承受“道义上的委托”，并且正企图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把波兰、罗马尼亚及波罗的海国家或者还有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匈牙利，都拉进反对我们的战争里来。

看来波兰希望在反苏战争上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准备。但是英国强迫它提前作战，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法国，英国要求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压力正得到资产阶级中有影响人物的支持。这些人在他们的要求上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当适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对于断绝外交关系是不会犹豫的。

最近德国的外交活动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总的“方向”是向着西方的。德国资产阶级已经公开声言，如果发生反苏战争，开始

时德国或许会保持“中立”（象美国在 1914 年那样）。这是为了尽可能从战争中捞一把，而且以后可以以高价向西方帝国主义公开出售它的中立。最有损苏联根本利益的，莫过于对它本身隐瞒德国资产阶级转向西方“方向”的情况。来自德国资产阶级的意外打击对我们将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完全公开的“按照实际情况说明事态”，只有唤起苏联工人和德国工人的警惕，才能使我们免于这个打击，或者至少使德国资产阶级难于发动打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日本资产阶级运用策略的狡猾是不下于德国人的。它很聪明地掩盖起它的企图，而假装“友好”。有一个时期，它甚至阻止张作霖攫取中东铁路。但是它暗中控制着中国，并且可能很快丢掉对我们的假面具。

在近东（土耳其和波斯），最起码说，我们也没有达到这样一种情势：在帝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情况下，那里能保证坚决的中立。在上述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将会在压力下按照帝国主义的命令反对苏联，这或许是较为聪明的假设。

在帝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情况下，美国将起帝国主义“后方”的作用，它迄今对苏联始终保持着不可调和的态度。因为美国正是唯一能在财政上保证反苏战争的国家，这种作用的意义就更大了。

总起来说，假使 1923—1925 年是一系列资产阶级国家承认苏联的年代，那么从现在开始时期将是断绝关系的时期。以前的承认时期并不一定意味着和平有了保证，喘息时机可以持久。现在的断绝关系时期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在最近的将来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的新时期，包含着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这是很明显的。

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是极大的。世界资产阶级要组成反对我国的长期统一战线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几个资产阶级国家在一定时期组成部分的反苏联盟，是完全可能的。

把所有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就迫使我们党：

(1)必须承认国际形势是危险的。(2)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把国际政治问题重新提到重要地位上来。(3)必须极其紧张地全面地进行苏联的国防准备，以防一旦发生战争。

包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将用各种方法竭力在帝国主义所准备的反苏战争的真正性质上欺骗它们的人民。我们的任务是立刻向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说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劳动剥削者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一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为保持整个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度而战。苏联则是为国际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被奴役国家的利益、为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而战。

我们的整个工作应该早已在这些口号下进行：(1)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工人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2)在所有进攻苏联的国家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3)使一切对苏联进行战争的资产阶级国家陷于失败。资本主义国家内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应该为“本国”政府的失败而积极努力。(4)一切不愿帮助“本国”劳动剥削者的外国士兵，投向红军这边来。苏联是所有工人的祖国。(5)除了正在进行反帝民族革命战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外，“保卫祖国”的口号只不过是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伪装。在苏联，“保卫祖国”是真实的口号，因为我们所保卫的是社会主义祖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基地。(6)自从1917年10月25日以来，我们就是“祖国的保卫者”。我们的“爱国”战争是“为了作为社会主义世界大军的一个团队的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战争。“我们的‘爱国’战争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一步，而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步”（列宁）。我们保卫祖国即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战争是由工人和雇农，在贫农的支持之下，并和

中农联盟反对“他们的”富农、新资产阶级、官僚、乌斯特里亚洛夫学派的专家以及白俄之下进行的。我们的战争是真正的正义战争。谁不是苏联的保卫者，谁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彻头彻尾的叛徒。

## 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和共产国际的策略

由世界大战和我国革命所开始的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共产国际是作为一个“世界革命的党”而建立起来的。“二十一条”<sup>131</sup>中包含着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并且，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共产党人同各种各样社会民主主义的“独立的”孟什维克分裂了。

承认战争和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每时每刻我们身边都有立即爆发革命的形势。在一定时期中，在个别的国家里，在个别的生产部门里，“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是能够局部重建其经济甚至进一步发展其生产力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将有它的高潮和低潮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准备，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程度，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也就更加重要了。但是，革命的这种涨潮和退潮并没有改变列宁关于当前历史时代的全面根本估计。只有这个估计才能成为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基础。

但是，由于世界革命运动一系列的失败和从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斯大林集团甚至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它对于目前的时代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和本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估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主要地是产生于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的“稳定”将要持续几十年。这整个“理论”本质上是“稳定论”信徒的蜕化思想的产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受到社会革命党无论其右翼或左翼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切尔诺夫本人已经著

文论述关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问题。左翼社会革命党机关报写道：“斯大林和布哈林正象民粹主义者那样，肯定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sup>①</sup> 社会革命党支持这个理论，因为他们从这里看到世界革命的策略已被放弃。

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斯大林报告的决议中，提出了明显错误的下述声明：“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取得了‘喘息时机’的加强和延长，它已经变成一整个时期。”<sup>②</sup>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2月7日）上，斯大林在他的报告里把共产国际的全部政策放在同一个根本错误的对世界形势的估计的基础上<sup>③</sup>。这种估计已经证明显然是不正确的。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7月、8月）的决议毫无保留地说到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和政治的稳定。这就使得这种斯大林派对世界形势的估计非常接近第二国际领袖们（奥托·鲍威尔、希法亭、考茨基等人）所作的估计。

自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已有一年半多了。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仅仅提到最重要的事件，就有这样一些：英国总罢工，中国革命的巨大事件，维也纳工人起义。这些事件及其爆炸力就是隐藏在现在的“稳定”情况里的，它们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积累了多少爆裂性物质，它的“稳定”是多么的不稳定。这些事件正好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

资本主义“稳定”的另一方面是，两千万的失业人口，生产机构严重的开工不足，军备的疯狂增长，世界经济关系的极度动摇。目前正笼罩着欧洲的新战争危险比任何东西都要肯定得多地表明，长期和平的希望是不可靠的。只有小资产阶级才梦想“几十年”的

① 《斗争的旗帜》杂志 1926 年第 17、18 期。——托洛茨基注

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957 页。——托洛茨基注

③ 《速记记录》第 12 页。——托洛茨基注

稳定，因为它被资本主义对工人的胜利弄得眼花缭乱，它被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和政治的成就弄得眼花缭乱。但是真实的情况正向着战争发展，战争将要炸掉任何的“稳定”。此外，工人阶级和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群众将不断地企图用暴力推翻这种“稳定”。有时在英国，有时在中国，有时在维也纳。在英国是一次总罢工——而英国共产党只有五千名党员。在维也纳是一场工人起义，牺牲的人等于一次全面革命——而奥地利共产党只有六千名党员！在中国是一场工农群众武装起义——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过是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的一个附属品！这就是目前世界形势的显著矛盾。这些就是支持和延长资本主义“稳定”的真实情况。我们的最大问题是帮助各国共产党，提高它们自己，以便能满足目前时代向他们提出的巨大要求。但这首先是假定说，在共产国际本身方面，对世界形势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们的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应该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为防止战争、为保卫苏联、为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战争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人共产党员首先应该把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争取过来，这些工人中间有非共产主义者、非党的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工作者，也要争取那些正直的工人，即使他们还是纯粹资产阶级组织的一员。“工人统一战线必须被理解为一切愿意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的联合，其中包括仍跟着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等等走的工人。在拉丁语系国家里，这样的工人的数目仍然是很大的。”这是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在今天它仍然充分有效和完全适用。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领袖们目前的活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在未来战争中的行为，就其不忠实和无耻叛卖来说，将远远超过他们在1914—1918年所扮演的角色。保罗-邦库尔（法国）已

经提出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通过资产阶级在战时实行专政的方法事先就出卖了工人。工联总委员会(英国)<sup>125</sup>正在为杀害沃伊柯夫的凶手进行辩护，并且为运到中国去的军队祝福。考茨基(德国)正在鼓吹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正在组织“手榴弹运动”。芬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和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们随时准备支持一场反苏战争。美国官方工会组织的领袖们使用最恶意的反动派的语言，公开反对承认苏联。巴尔干的“社会主义者”正在支持“他们的”工人的刽子手，并且随时准备支持任何反对“外国”苏维埃联盟的运动。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口头上“拥护苏联”，但是他们曾经帮助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分子，使维也纳起义的工人血流成河，显然，这些人在决定的时刻是要站到资本家那边去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现在没有鼓吹干涉苏联，只不过因为还没有任何强国准备这样做。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继续隐藏他们观点中的反革命本质，这些人是主要的危险，因为正是他们，使那些追随社会民主党旗帜的工人不能同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断然决裂。共产国际以前的成员(如卡茨、什瓦尔茨、柯尔什、罗森贝格)，在背离共产主义而采取极左主义的道路以后，扮演着同样的叛徒角色。

战争越临近，和这些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不论他们是哪种颜色，从公开的右派到伪装的“左派”)勾搭就越来越危险。统一战线的策略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和工联总委员会的叛徒们结盟，或者解释为和阿姆斯特丹亲善。这样一种政策使工人阶级削弱和混乱，而提高准叛徒们的威信，妨害我们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力量。这条错误路线用斯大林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向左开火”，这条错误路线在过去一、二年间已经把共产国际各最重要支部的领导地位送入右派手里，这是违背工人共产党员



的意志的。（这种情况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已经发生。）

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右派集团的政策是要砍掉共产国际中的全部左派，是在削弱共产国际的力量并且酝酿着不祥的危险。

特别是德国的开除乌尔邦斯集团，就是由这种排斥共产国际中全部左派的政策所决定的。斯大林集团不适当地强调乌尔邦斯和马斯洛夫左派党人所使用的某些尖锐的辩论词句（这些词句是回答那些诬陷他们是“叛徒”、“反革命分子”、“张伯伦的代理人”等等的人的），这样就顽固地把德国左派推上了成立第二党的道路。斯大林集团尽力促使德国共产党队伍的分裂成为完全的事实。

实际上，在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根本问题上，乌尔邦斯集团是捍卫列宁观点的。它捍卫苏联，并且在决定的时刻，它无疑将为保卫苏联而战斗到底。这个集团里包括着几十万老布尔什维克普通工人，同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有着联系。这个集团得到仍然留在德国共产党内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员的同情。

纠正斯大林分裂共产国际的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把所有这些被开除的同志——首先是乌尔邦斯集团——重新吸收到国际中来，这些同志是承认共产国际历届代表大会的权威的。列宁在他的《左派幼稚病》中，揭发了真正“极左派”的错误，同时写道，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过去和现在都是机会主义。“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sup>①</sup>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上述的问题，列宁又补充道：“同这个问题相比较，纠正共产主义左倾‘错误’是一个容易的问题。”<sup>②</sup>当列宁说“左派”这个词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极左派；可是斯大林，当他说和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8页。——编者注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29—330页。——编者注

极左主义斗争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革命的列宁主义者。

和作为主要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坚决斗争，同时改正“左”倾错误——这是列宁的口号。我们——反对派，提出这同一个口号。

归根结蒂，“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势力就是资本主义势力。在战后危机的最初几年里（1918—1921年），资本主义迅速地掉进深渊，这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随之在削弱并掉下去。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带来了社会民主主义暂时的加强。意大利工人1920—1921年的失败，德国无产阶级1921—1923年的失败，英国1926年大罢工的失败和中国无产阶级1927年的失败，不管原因是什么，它们本身已经引起了无产阶级上层分子中间的革命浪潮的低落。它们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社会民主主义而削弱了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它们使右派暂时居于统治地位而排斥了左派。工人贵族的作用、工运官僚及其小资产阶级同事的作用，在这样一个时期变得特别大了，也特别反动了。

这些过程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苏联共产党。行政“中央”已经集中向左开“火”，并且已经用完全机械的方法造成了一种新的内部力量对比，这对于左派列宁主义者是更加不利的。事实上已经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党的选举，只有机器的选举。

这些就是在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上，列宁派影响削弱的总原因。结果那些在十月革命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呆在敌人队伍里，但是最后好象经过一段预备期似的被吸收到共产国际中来的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马尔丁诺夫、什麦拉里、拉费斯、德·彼得罗夫斯基、佩珀等人），越来越经常和越来越高声地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言。在这些人里还必须加进象海因茨·诺伊曼及其同类这样一些纯粹冒险家的名字。但是在群众里面，新的左

倾运动的分子，新的革命起义的分子已经在聚集之中。反对派正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为那个新日子从事准备。

## 主要的结论

1. 在我们和英国断绝关系以及其他内外困难的影响下，在多数派的统治圈子里正准备着下述的“计划”：(1)承认债务。(2)或多或少地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3)从中国撤退——这就是，“暂时”撤销我们对中国革命，一般地说即是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持。(4)在国内实行向右的“策略”——这就是把新经济政策扩大一些。希望用这个代价来防止战争危险，改善苏联的国际形势，消除(至少减少)国内困难。这全部“计划”是以资本主义有几十年的稳定这一假设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不是“策略”，而是苏维埃国家这方面在目前形势下的全面投降：通过“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通过“新经济政策”，回到资本主义去。帝国主义者会接受我们的一切让步，然后更加迅速地进行新的攻击甚至战争。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分子意识到我们的让步之后，他们会更加顽固地组织起所有反苏维埃力量来反对我们党。我们方面的这样一种“策略”将造成我们的新“资产阶级”同外国资产阶级之间最紧密的同盟。苏联的经济发展将落在国际资本的完全控制之下——一辨士的贷款等于一卢布的奴役。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将对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对苏维埃国家知道领导人民走向哪里的能力开始失去信仰。

如果可能“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免于战争，我们当然要尽力这样做。但是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强大和团结，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世界革命的策略，必须加强共产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有可能使战争确实长期推迟，而不必付出会损毁我们力量

基础的代价；同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真有可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并且赢得战争。

列宁曾经向帝国主义作出某些经济上的让步，目的在于用赎买办法使自己免于战争，或者用可接受的条件吸引国际资本。但是不论是在这些情况下，或者是在革命的最严重时刻，列宁从来没有想到过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制，给富农以政治权利，削弱我们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削弱世界革命的一般策略。

首先我们必须完全地和毫无保留地肯定和加强我们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对一切“稳定”思想，对一切假政治家风度（它表现在这样一些说法里：我们不必去管“中国的闲事”，我们最好“尽可能迅速地从中国脱身”，如果我们举措“合宜”，他们会“放开我们的”，等等），我们必须表示坚决的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现在实际发挥着瓦解作用，并且明显地妨害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团结到苏联周围来。这种理论正在欺骗其他国家的工人，模糊他们对实际危险的认识。

2.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团结我们自己党的队伍，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不能再在分裂、割除、“砍掉”等上面公然进行投机。所有这一切都最直接地和战争问题联系着，目前帝国主义正沿着这条道义-政治路线进行“试探”。国际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机关报，现在都对我们的党内分歧表示极不寻常的兴趣。它们公开鼓励和怂恿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派，把反对派开除出党的领导机关，如果可能的话，则开除出党，最后如果可能的话，则根本消灭他们。从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sup>132</sup>，到挣扎得最成功的第二国际报纸维也纳《工人报》<sup>133</sup>（奥托·鲍威尔），所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都在向“斯大林政府”致敬，为了它和反对派斗争。它们要求这个政府砍掉反对派——这些“世界革命宣传家”，以此来进一步证明它

的“政治家式的明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要敌人在“砍掉”反对派等方面的希望仍然没有实现，战争也就不会来临。此外，如果可能，我们可以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免于战争，如果必须战斗，我们可以在战争中取胜——不过，唯一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保持团结，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对分裂或割除的指望落空。因为这种事情只对资本家有好处。

3. 必须纠正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阶级路线，停止对共产国际中的左派的斗争，让那些接受历届代表大会决议而被开除了的成员回到共产国际中来，永远结束同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叛徒领袖之间的“诚恳合作”的政策。在目前情况下，和总委员会决裂，其意义等于1914年和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sup>37</sup>决裂。列宁在一份最后通牒里要求每一个革命者进行这种决裂。在今天和这样一个总委员会保持联盟，就等于在那时帮助第二国际的反革命领袖。

4. 我们必须坚决纠正我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首先在中国，同时也在其他一系列的国家里——的路线。我们必须清算马尔丁诺夫-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回到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制定的路线上来。否则，我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上，不仅不能起加速的作用，反而会起障碍的作用，从而失掉东方工人和农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共产国际必须把国民党开除出去。

5. 我们必须始终如一，有步骤和顽强地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我们必须推迟战争，“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免于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可能和可允许的事都必须去做（参看第一点）。同时我们必须立刻作好战争准备，不能有片刻懈怠。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制止一切关于是否存在战争迫近的危险这种涣散精神的知识分子式的政治空谈和猜测。

6. 我们必须坚决地纠正我们在国内的阶级路线。假使战争不可避免,只有严格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工人和雇农,取得贫农支持,同中农联盟,反对富农、耐普曼、官僚。

7. 在我们整个经济、预算等方面,进行应付战争事变的全面准备。

资本主义正进入一个新的混乱时期。一场对苏联的战争就象一场对中国的战争一样,它对世界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系列的灾难。1914—1918年的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加速器”(列宁)。新的战争,特别是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只要我们这方面在战争中有一项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会赢得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同情,这场战争就将成为更加巨大的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崩溃的“加速器”。没有新的战争社会主义也将发展。但新的战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 第十一章 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

没有什么比下述的事情更能确切地表明斯大林集团的错误政治路线了:他们喋喋不休地与之争吵的,并不是我们那些真正的意见,而是一些虚构出来的意见,我们现在和过去都从未有过的意见。

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派别争论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他们的对手所提出的一套实际意见。但是当孟什维克或者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争论的时候,他们不是反驳布尔什维克的真正意见,而是把后者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推到他们身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能用任何正直的方式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工人就会支持布尔什维克。整个阶级斗争的

全部规律使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下流到必须骂对方是“阴谋家”，“反革命的同盟者”，以后又是什么“德皇代理人”。现在如出一辙，我们自己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只能把我们从来既没有想过也没有说过的事加到我们身上，否则就无法对我们的列宁主义观点进行斗争。斯大林集团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能够用任何自由的方式辩护我们的真正观点，那么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就会支持我们。

进行党内正直辩论的最基本条件是不存在的。在中国革命这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迄今没有发表反对派所说的任何一个字。在严密地把党封锁起来，把反对派同党报隔绝之后，斯大林集团对我们展开了不停的论战，每天往我们身上加添许许多多的蠢事和罪行，其数量与日俱增。而党员则日益趋向于不相信这些指责。

（一）当我们说，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并不是几十年的稳定，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列宁），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的一切稳定因素。

（二）当我们按照列宁的话说，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胜利是必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尤其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取得最终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完全论证过的，斯大林集团完全捏造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当我们遵循列宁，指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现象在发展，斯大林集团说我们认为苏维埃国家一般说来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无论谁企图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们，而同时又否认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否认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反对和唾弃。”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对我们进行诬蔑。

(四)当我们指出,热月派<sup>117</sup>正在我国成长,他们有着相当重要的社会基础;我们要求党的领导方面对于这些现象和它们对我们党的某些环节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坚决的和有计划的抵抗,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宣称党已热月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蜕化变质。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说我们指责我们党的多数右倾,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仅仅认为,在俄国共产党内有右的倾向和右倾集团,它们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党能够克服它们。”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诬蔑我们。

(五)我们指出富农的巨大增长;我们遵循列宁,继续断言“富农不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集团攻击我们想要“剥夺农民”。

(六)我们提醒党注意私人资本的地位正在加强的事实,注意私人资本积累及其影响在农村的过分增长,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攻击新经济政策,要求恢复军事共产主义。

(七)我们指出党在工人物质条件方面的政策不正确,在解决失业问题和住房需要方面的措施不适当;特别是我们指出,非无产阶级分子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正在猛烈地增大;他们指责我们犯了“基尔特社会主义”<sup>134</sup>倾向和“蛊惑人心”罪。

(八)我们指出工业一贯落后于社会经济要求,以及这种落后带来的全部必然结果——不平衡,商品不足,城乡联盟的破裂,他们把我们叫做“超工业化主义者”。

(九)我们指出价格政策的不正确,它不是把高昂的生活费用降低,而是为私人资本家积聚惊人的利润,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提倡一项提高物价的政策。一年前,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反对派在言论中从来没有要求过或建议过提高物价,而是认为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正是在于它没有进行足够的努力来解决必然造成零售价格过高的商品不足现象。”但是他们隐瞒了我们的声



明，却继续诬蔑我们。

(十)我们反对同总罢工的叛卖者、公开扮演着张伯伦代理人角色的英国总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诚恳合作”，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共产党人在工会里的工作，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

(十一)我们反对苏联工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或者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作任何种类的勾搭，于是我们被指责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我们反对以中国将军为基础的那个政策，我们反对把中国工人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我们反对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克策略，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蒋介石同谋”。

(十三)在我们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估计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战争正在临近的结论，我们及时向党提出了这个警告，因此斯大林分子对我们发出了卑鄙的攻击，说我们“希望战争”。

(十四)我们忠于列宁的教导，我们指出，战争的临近只是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有一项坚决的、纯粹的和明确的阶级政策，斯大林分子无耻地断言，说我们不愿意保卫苏联，我们是“有条件的保卫者”，半失败主义者等等。

(十五)我们指出这个明显的事实：全世界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都在支持斯大林在俄国共产党内同反对派斗争，赞扬斯大林压制左派，鼓励他砍掉反对派，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反对派，《真理报》以及所有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每天欺骗说，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赞成反对派”。

(十六)我们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权转入右派手中，反对开除几十万工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企图分裂共产国际。

(十七)在党的目前畸形制度之下，反对派——这些忠诚的党员，企图把他们真正的观点告诉全体党员，因此被逐出俄国共产

党。他们被加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关于捏造的分裂党的阴谋，处分的程序已经安排好了。党的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进行讨论，而是用破布遮掩起来。

（十八）但是，近年来他们最喜欢用的罪名是说我们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我们曾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说我们维护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不真实的。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争论过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斯大林集团拒绝发表这个向整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声明。它继续用“托洛茨基主义”指责我们。上述声明所提到的当然只是和列宁之间的过去的分歧，绝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恬不知耻地虚构出来的那些“分歧”。他们硬把我们老早以前的分歧同十月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那些实际分歧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虚构的。

〔斯大林集团提到 1923 年和 1925 年两派之间的早期分歧，企图用这个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反对派表述在目前政纲里的观点上吸引开，我们认为这种斗争方法是不光明正大的。这些分歧现在已经丧失了它们的意义。由于当时党内和国内一些情况不明，布尔什维克的两派在 1923—1924 年的争论中所犯的错误和小题大作，现在已经纠正了，并且它们没有妨碍在反对机会主义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的诚恳合作。〕<sup>①</sup>

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离开列宁的原则越来越远了，他们断章取义，粗暴和不忠地滥用任意摘选的列宁很久以前的那些论战语句，向党隐瞒列宁较近时期的另外一些话，直接伪造党的历史和昨天的事实，更加严重的是，曲解和直接篡改我们关于目前争论的问题所写的文章，力图用这些方法欺骗党，使党相信目前这个斗争是

---

<sup>①</sup> 方括弧中的这一段是托洛茨基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及其追随者的请求而插入政纲中的。——编者注

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实际上，目前这个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修正主义者用过完全相同的方法，他们曾经借口反“布朗基主义”<sup>21</sup>而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我们所以能够在反对斯大林路线的斗争中全心全意地合作，正因为我们完全是在保卫真正的列宁无产阶级路线的意愿和决心下联合起来的。

现在的这个政纲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这种指责的最好回答。一切读完它的人都将知道，这个政纲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都是以列宁的教导为基础的。它浸透着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

让党了解我们的真正意见。让党看到有关我们分歧的真正文件——尤其是我们在中国革命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的分歧。列宁教导我们，如果发生分歧，不要相信任何人的片面之词，而要要求拿出文件来，倾听争论的双方，屏弃谎言，正直地探求争论的关键所在。我们反对派重申列宁的这个忠告。

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分歧问题是在会前两三天突然降临到党的面前的，我们必须永远消除产生这种情形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为公正的争论和在分歧的真正问题上作出公正的决定而创造条件，列宁在世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做的。

## 第十二章 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国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已经坦白地说明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指明中央委员会这些错误怎样削弱了我们党这个革命的根本工具。我们已经指明，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党能够从内部改正它的政策。但是为了改正这个政策，必须清楚地和坦白地说明党领导上所犯错误

的性质。

所犯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据列宁的经典式定义，机会主义在其发展了的形式中，是由工人阶级领袖和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它反对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苏联现在的条件下，机会主义在其已臻于完全的形式中，是工人阶级首领们要同正在发展的新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妥协，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而牺牲工人和贫农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一种愿望。

因为我们指出这种倾向存在于我们党的某些集团里——在有些场合是刚刚出现，在有些场合已充分发展——，就以此为根据指责我们诬蔑党，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正是向党呼吁，要党警惕这种危害党的倾向。硬说我们指责党或者中央委员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对革命不忠诚，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是同样荒谬的。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可以产生于对工人阶级利益最真诚的关怀。甚至极端的右倾的代表，也相信他们准备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妥协是对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必要的，他们相信这种妥协不过是列宁认为完全可以允许的那些策略行动之一。甚至代表公开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右倾集团，也并非有意识地希望发生热月事件。这种情况对“中间派”来说更是如此，这部分人执行着一种典型的充满幻想、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

斯大林及其最亲密的信徒认为，借助于他们的强大机器，他们可以用斗智的办法战胜全部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不必在斗争中去打败它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玩弄”中国将军们，而在为了革命利益利用过他们以后，就会把他们象榨干的柠檬一样抛弃。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玩弄”柏塞尔之流，而不是柏塞尔之流反过来玩弄他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自由地”向“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让步，而以后可以同样

自由地收回这些让步。

斯大林分子为了“顺利实行”他们的策略，以一种官僚式的自欺欺人态度，完全不让党——实质上就是如此——参预政治决定，这样来避免它的抵抗。斯大林官僚机构作出决定并且行动起来，而后让党来“批准”它的决定。这种方式如果没有使得一些重要的力量瘫痪，也使得它们削弱了。这些力量本来是可以在一个既必要又及时的良好的政治策略行动中使用的，这些力量本来是可以减弱和消除那些领袖的显然恶劣的策略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这样，中央委员会右派的妥协倾向和它的中派的策略造成了一个累积的结果，这个结果总括起来就意味着：苏联国际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在同苏联内部其他阶级的相对关系中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恶化，它同贫农的联系的削弱，从而威胁到它同中农的联盟，它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的削弱，工业化速度的减慢。当反对派提出热月化危险的问题时，他们心中所想的正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政策的一些结果，而不是多数派的意图。这种危险就是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而转入小资产阶级的轨道。我们党的历史和性质同第二国际各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俄国共产党经过了三次革命烈火的锻炼。它在同各式各样的敌人的斗争中夺取并且掌握了政权。它组织了第三国际。它的命运就是第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革命决定着它的内部生活的节奏。由于强大的阶级压力而出现在党内的一切思想过程，都有迅速成熟和发展的趋势。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必须要在党内对每一种背离列宁路线的倾向，在一出现的时候就进行及时和坚决的斗争。

在目前条件下，俄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1）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和资本主义的暂时的局部稳定，造成一种相信这是全面“稳定”的倾向。（2）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

对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部分地复兴了资本主义，也复活了许多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3）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成分不能不渗入苏维埃和党。（4）党在政治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对革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个事实也进一步造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危险。在列宁领导下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经直接地和坦率地指出，我们党内已经存在着整批整批的人们（来自富裕农民的人，高级职员，知识分子），他们本来会加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如果这些党不是非法的话。（5）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关反过来使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分流入党内，用机会主义影响党。（6）虽然专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建设工作是必要的，但是从他们那里发出一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地侵入我们的各种机构——国家的、经济的和党的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对于斯大林集团的明显的日益危险的背离倾向坚持敲起警钟。要是认为党的伟大的过去和它的老布尔什维克队伍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间都是反对机会主义蜕化的保证，这是一种有罪的大意想法。这种想法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这不是列宁所教导的思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sup>①</sup>

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工人构成了西方各社会党内的绝大多数，他们曾经是无条件地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克服他们的领袖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在开始时并不是很大的。他们低估了这些错误的作用。他们不了解，在和平发展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35页。——编者注

的长时期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阶层；在这个和平时期后面，到来了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动，它不仅会迫使机会主义者，而且也会迫使中间分子向资产阶级投降，使群众在严重的时刻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如果说那些战前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有什么地方可受责备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夸大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把它叫做民族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过多地依赖那时的社会党中的工人阶级党员。他们依赖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依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低估了这个真正的危险，并且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动员下层革命阶级来反对它。我们不要再重复那个错误。我们要及时地纠正党的领导机构的路线。用这个事实，我们来回答指责我们要分裂党并且要建立一个新党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迫切地需要一个作为劳动群众和穷人的领导者的、单一的和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种不为派系斗争所削弱的团结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任务所绝对需要的。这种团结只能在不掺杂个人解释和修正主义歪曲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的基础上实现。

主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提的工业化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速度，主张反对富农的增长及其统治农村的野心，主张及时改善工人条件，主张党内、工会内、苏维埃内实行民主——反对派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同它的党分裂，而是为了加强全联盟共产党真正团结的基础。不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只能有一种表面的团结，这将使党在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之下被削弱，这将使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被迫在进军中和敌人的炮火下重新组织队伍。当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一旦发现我们的真正观点和建议，他们必将接受并且为之而战（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不是把它们作为“派别的”口号，而是作为全党团结的旗帜。

我们党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的领导上的错误，因此还没有纠

正这些错误。恢复时期我国工业异常迅速地增长是产生机会主义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里面系统地鼓励这种错觉。和内战时期比较，工人的条件迅速开始有所改善，这种情形使工人广大群众产生了迅速地和没有痛苦地克服新经济政策的矛盾的希望。上述的情形阻碍了党及时看清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

列宁主义反对派在党内的成长，迫使最坏的官僚分子使用了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方法。由于再不能用命令阻止在基层党组织内讨论政治问题，于是一部分官僚现在正转向——恰好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建立暴徒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用叫喊、吹口哨和熄灭灯光等办法来破坏关于党的问题的一切讨论。

在我们党内采取直接具体的暴力的方法的企图，势必引起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分子的愤怒，从而必将使它的组织者自食其果。党机器最坏部分的任何手段都不能使党的群众同反对派分离。在反对派后面支持着它的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传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国际无产阶级所看到的国际政治的现状和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现状。在恢复时期以后，阶级矛盾必然日益尖锐，它将日益肯定我们关于目前危机的出路的观点。它将在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日益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

战争危险的增长已经迫使工人党员更加深刻地思索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必将使他们积极地加入纠正机会主义错误的工作中来。

近年来，我们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它一直受到长期诽谤运动的不利影响，这种运动的目的是证明左即是右，右即是左。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将清醒起来。它将发现真实情况。它将把党的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帮



助工人先锋队是反对派的任务，是这个政纲的任务。

最重要、最尖锐同时使我们党一切党员苦恼的问题，是党的团结问题。而且老实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千千万万的阶级敌人正在集中注意我们党内的争论，并且带着无法隐忍的喜悦和急切心情期待我们队伍的分裂。我们党的分裂，建立两个党，这对于革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我们反对派毫无保留地谴责要建立第二党的任何企图。两个党的口号是斯大林集团的口号，为了要从全联盟共产党中排除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我们的任务不是创建一个新党，而是纠正全联盟共产党的路线。只有存在一个团结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正为了我们的观点在党内斗争，我们谴责“两个党”的口号，把它看作冒险家的口号。“两个党”这个口号一方面表现了党机器内的某些分子希望分裂，另一方面表现了一种失望的情绪，表现了他们不理解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内赢得列宁思想的胜利——不管有什么困难。没有任何一个真诚保卫列宁路线的人会抱有“两个党”的观点，或者有分裂的想法。只有那些想用其他路线代替列宁路线的人才会主张分裂，也就是沿着两个党的道路行动。

我们将用全力斗争，反对建立两个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它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单一的党。它要求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这就是说，它的政策是由无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并且是由无产阶级核心加以实行的。纠正我们党的路线，改善它的社会成分——这不是两个党的道路，而是加强和保证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团结。

在此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我们表示我们深刻的信心，工人阶级作出了无数的牺牲，推翻了资本主义，证明他们现在对于纠正其领导机构的错误、有力地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保卫世界革命中

心——苏联的任务，是同样能够胜任的。

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为了列宁主义党的团结！

写于1927年9月3日。译自《俄国局势真相》  
1928年伦敦英文版第23—39、94—101、111—  
133、140—146、155—171、174—195页。

#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1927年10月23日)

## · 编者按语 ·

联共(布)中央八月全会以后,托洛茨基一伙不但丝毫不履行自己《声明》中提出的诺言,反而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不择手段地建立地下印刷所,印发党的秘密文件和派别材料,并加紧分裂活动,准备建立有自己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地下党。

1927年10月21日至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了联席全会。全会又一次讨论了托季反对派联盟的反党派别活动,并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将他们进行分裂活动的材料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审理。

托洛茨基10月23日在全会上的发言,毫无悔改之意,继续恶毒攻击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扬言“要掌稳舵轮,继续前进”。这是托洛茨基对联共(布)中央的疯狂反扑。

我的关于单独讨论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的提议已经被否决了。我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党为什么会受到欺骗,怎样受到欺骗和受到谁的欺骗,因为有人告诉党说,同反对派有联系的共产

党员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要知道这已经在全国各地传开了。明天全世界都必然会谈论它。你们决定把我的关于假冒弗兰格尔军官问题的简短发言从速记记录里抽掉，也就是说对党隐瞒，这就再一次表明你们所说的讨论是什么东西。布哈林以明仁斯基的文件为根据，在这里给我们讲了一通热月派<sup>117</sup>大杂烩的哲学，而这些文件无论同印刷所或反对派都毫不相干。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布哈林的廉价哲学，而是事实。事实却没有。因此把整个问题插到关于反对派的讨论里来是一个诡计。〔粗暴和不忠顺已经发展到无异于罪恶的背信弃义的程度了。〕明仁斯基宣读的全部文件完全是反对现行的政策的，——只要对这些文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可以说明。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了这一点。〔不过我没有时间这么做。〕我只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目前的领导集团怎么会和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欺骗党，让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冒充为弗兰格尔军官，并抓住一场没有结束的侦讯的片断材料，用反对派参加反革命组织的假情况来恐吓全党。<sup>①</sup> 这件事的根源是什么？这会引出什么结果？只有这个问题才有政治意义。其余的都是次要而又次要的问题。

〔但是，先谈一两句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每一个机会主义者都竭力想用这个字眼为自己遮羞。伪造工厂正在日夜两班开工赶制“托洛茨基主义”。不久以前，我就这个问题给党史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其中包含五十条引文和文件，证明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和历史学派犯有伪造、歪曲、隐瞒事实和文件、曲解列宁的罪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所谓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我曾经要求把我的信抄送联席全会的成员。但是信没有抄送，虽然其中几乎全部是文件和引文。我要把它送到《真理报》“争论专页”。我想他

<sup>①</sup>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8--162页。——编者注

们同样会把它隐藏起来不让全党见到，因为我引用的事实和文件对于斯大林学派是致命的。〕

在我们去年的七月宣言里，我们十分精确地预言了破坏党的列宁式的领导和以斯大林的领导暂时取而代之的所有必经的阶段。我说暂时取而代之，是因为领导集团取得的“胜利”越多，它也就越脆弱。现在我们可以用下面的结论来补充我们去年7月的预言：斯大林目前在组织上的胜利是他在政治上覆灭的前奏。这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而且从斯大林的政治制度方面来说马上就会开始。反对派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使现领导的毁灭性政策的后果给党以及党与群众的联系所带来的损害尽可能地小些。

你们要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们认为这一步是完全符合现领导在其目前发展阶段，确切些说，覆灭阶段的方针的。这个统治集团正在把最优秀的党员、坚定的工人布尔什维克成千上百地开除出党；这个官僚集团竟敢于开除象姆拉契科夫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罗夫、萨尔基斯、魏奥维奇这样一些布尔什维克，仅仅这些人就能够建立一个其威信、其能力、其列宁化（喧哗声）比起我们目前的书记处来不知要高多少的党的书记处（喧哗声）；这个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把象涅恰也夫、施蒂克戈尔德、瓦西里也夫、施米特、费谢列夫以及其他许多卓越的党员囚禁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监狱里；这个官僚集团是靠对党使用暴力、窒息党的思想、瓦解不仅苏联的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办法维持的；在这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集团的尾巴后面，这一年来跟随着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柏塞尔、希克斯、本·提列特、库西宁、什麦拉里（喧哗声）、佩珀、海因茨·诺伊曼、拉费斯、马尔丁诺夫、康德拉提也夫和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这个集团是不能容忍我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即使距代表大会还有一个月。我们很清楚这一点。

〔粗暴和不忠顺是和怯懦紧密相连的。〕我们的政纲被隐瞒起来了。确切些说，曾企图把它隐瞒起来。（喧哗声）……（由于喧哗声、抗议声而听不见。）……惧怕一个政纲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惧怕一个政纲就是惧怕群众。

我们在9月8日对你们声明过，我们将不顾一切禁令，一定要使党看到政纲。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姆拉契科夫斯基同志、费谢列夫同志以及其他印刷和散发我们政纲的所有同志们，他们过去和现在的行动都是和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反对派成员完全一致的，我们负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全部责任。（喧哗声）

列宁提到的粗暴和不忠顺，已经不仅是个人的品质了；它们已经成为统治集团及其政策和制度的素质了。这不是一个外表的作风问题。现行方针的根本特点就在于相信暴力万能，甚至对待自己的党也是如此。（喧哗声）我们党通过十月革命掌握了强有力的强制机构，没有这个机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想象的。专政的核心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喧哗声）列宁在世的时候，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党的组织机构是从属于世界范围的革命的阶级政策的。其实，斯大林当总书记，从一开始就使列宁担心。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曾经对一些亲密的人说过：“这位厨师将只会做辣菜。”今天在这里就以宣布军事阴谋的形式上了一盘这样的辣菜。（喧哗声）在列宁领导的时候，在政治局里有列宁式的人员的情况下，总书记所起的完全是一种从属的作用。（喧哗声）从列宁卧病之时起，情况就开始变化了。由于通过书记处选拔人员，斯大林分子的官僚集团有了一种独立的、不顾政治路线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列宁在考虑到自己不能视事的前景时对党提出了最后的忠告：“把斯大林撤下来，他会把党带到分裂和毁灭的地步。”（喧哗声）党没有及时得知这个忠告。选出的

机构把它隐瞒了。后果已经全部摆在我们的面前。(喧哗声)

领导集团认为依靠暴力可以达到一切目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暴力能发挥巨大的革命作用。但是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从属于正确的阶级政策。(喧哗声)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对孟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人使用暴力，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果。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对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只是加速了这个妥协政体的失败。领导集团采取流放、剥夺工作、逮捕的办法，对自己的党进行威胁利诱。(喧哗声。喊声：“滚开！真卑鄙！孟什维克！叛徒！不要听他的！简直是对中央委员会的侮辱！”)工人党员不敢在自己的支部里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敢凭良心投票。官僚机构的独裁(喧哗声)使党感到恐惧，而党本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表现。统治集团对党进行恐吓，因而削弱了党使阶级敌人惧怕的能力。但是党的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党的领导的整个政策表现在党的制度上。近几年来，这个政策已经把自己的阶级核心从左向右移动了，即从无产阶级转向小资产阶级，从工人转向专家，从普通党员转向官僚，从贫雇农转向富农，从上海工人转向蒋介石，从中国农民转向资产阶级军官，从英国无产阶级转向柏塞尔、希克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sup>125</sup>的领导人，等等。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就在这里。

乍看起来，斯大林的方针似乎是完全胜利了。斯大林集团既打击左面(莫斯科、列宁格勒)，又打击右面(北高加索)。实际上，中派集团的整个政策是在两条鞭子的抽打下实行的：一条来自右面，一条来自左面。(喧哗声) 这个缺乏阶级基础的官僚主义中派集团摇摆于两条阶级路线之间，而且经常从无产阶级路线堕落到小资产阶级路线。这种堕落不是直线的而是急剧摇摆的。我们在过去看到过这样的摇摆情形。特别明显而又令人难忘的是在富农的压力下(右面来的鞭子)扩大选举的指令。(喧哗声) 然后又

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左面来的鞭子）取消扩大选举的指令。（喧哗声）在工人立法、工资、税收政策、同私商的关系等等方面的摇摆情况是不少的。然而总的方向是向右移动。最近的宣言毫无疑问是一次向左的摇摆。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要闭眼不看这一事实：这不过是一种本身并不改变政策的总方向的摇摆而已，它甚至会（在不久的将来）加速中派领导的进一步向右堕落。

今天的加紧进攻富农的喊叫（昨天还对他们喊叫过“发财吧”）不能改变这条路线，就象七小时工作日这样周年纪念日的意外礼物不会改变这条路线一样。（喧哗声、口哨声。）现领导的政治路线不是由个别冒险性的摇摆决定的，而是由这条路线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集合在自己周围的那股社会力量决定的。通过目前的机构、通过目前的制度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喧哗声越来越大，托洛茨基的话几乎听不见。）……的是地位稳固的官僚，其中也包括官僚工人（喧哗声、口哨声越来越大。）、行政管理人、小业主、新私有者、享有特权的城乡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分子都开始指着富农对无产阶级说：“这回可不是1918年。”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左的摇摆，而是根本的政治路线。起决定作用的是选拔志同道合的人。起决定作用的是干部。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支柱。不能既压制工人支部又进攻富农。这两者是不能相容的（喧哗声、口哨声。）。周年纪念日的向左摇摆如果贯彻下去的话，马上就会遭到多数派自己队伍中的极其激烈的反抗。今天叫“发财吧”，而明天（喧哗声）……从富农那里却什么也捞不到……在极端的官僚背后站着的是国内甦生起来的资产阶级……（喧哗声。喊声：“滚开！”）……（口哨声，越来越大的喧哗声。惊心动魄的喧哗声，什么也听不见，主席按铃。口哨声。喊声：“滚下主席台！”主席宣布休会。托洛茨基同志一直在念，但是一个字也听不清。主席团成员站起身来，开始散开。）〔今天叫“发财吧！”而明天叫“消灭



富农!”这对布哈林来说易如反掌。他会要笔杆，并且准备好了。他一无所失。但是富农、经理、有权势的官僚和专家，他们的看法却不一样。这帮人对突然大搞周年纪念活动没有兴趣。他们会有话要说的。

托姆斯基同志起来反对这次周年纪念的摇摆，因为他的处境比任何人都更糟。托姆斯基预感到工人会在工会提出质问，而负责回答问题的将是他。当工人看到宣言宣布左倾路线以后，明天就会要求托姆斯基至少要真正防止右倾。这就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不可避免的原因。在我国的右翼中有一种工业经理倾向和一种工联主义者倾向。正如工人运动史上常见的那样，他们有一个时期是联合活动的。但是这次周年纪念的向左摇摆，将造成经理们和工联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周旋于他们之间的职业官僚将失去他们的支持。

这次周年纪念的摇摆，一方面对反对派关于我国城乡生活一切根本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是最明显的庄严承认；另一方面，对统治集团来说是政治上的自我否定，供认自己破产。它是那些在行动上软弱无能的人的口供。这次周年纪念的摇摆不是推迟、而是加速现行路线的政治破产。

现领导的全部政策必然产生党内的压制制度。在大官僚后面站着正在甦生的国内资产阶级，而在它后面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势力压迫着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许它抬头，不让它开口。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愈远，它就愈要从上面用强迫方法把政策强加在无产阶级先锋队身上。这就是产生党内不可容忍的现行制度的根本原因。

当马尔丁诺夫之流、什麦拉里之流、拉费斯之流和佩珀之流对中国革命起着主导作用的时候，姆拉契科夫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罗夫和萨尔基斯都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

大会印发布尔什维克政纲而被开除出党。这绝对不是仅属于党内性质的事件。决不是。这些事件是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国政治中的表现。国内资产阶级当然不敢象世界资产阶级那样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肆无忌惮地施加压力。但是这两种压力是紧密联合和双管齐下的。首先感到并且说出这种日益迫近的危险的工人和党员，即更革命、更冷静、更有远见和决不妥协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代表，现在组成了反对派的队伍。这支队伍正在我们党内和整个共产国际内部成长壮大。重要关头的各种事件和事变正在进一步坚定我们所采取的立场。你们的压制正在加强我们的队伍，使党内的优秀“老人”靠拢我们，使年轻人受到锻炼，使他们中间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在反对派周围。被你们开除出党的反对派成员都是优秀党员。而开除和逮捕他们的那些人——尽管还没有意识到和理解到——正是其他阶级用来迫使无产阶级后退的工具。统治集团想践踏我们的政纲，就是执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社会命令——正在复活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社会命令。乌斯特里亚洛夫与那些侨居国外的垂死的老资产阶级政客显然不同，他是一个聪明而有远见的新资产阶级政客。他并不盼望反革命活动和闹事。他不想“跳越阶段”。适合乌斯特里亚洛夫目前阶段的正是斯大林路线。他把赌注公开押在斯大林身上。他要斯大林清除反对派。斯大林开除和逮捕反对派成员，提出与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有关的这种纯粹热月政变<sup>127</sup>性质的罪名来反对我们，正是执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社会命令。

斯大林为他们自己所提出的当前任务就是分裂党，清除反对派，使党习惯于肉体消灭的方法。法西斯哨子帮，殴打，扔书，丢石头，监狱——搞到这里，斯大林政权在它的道路上稍微停了一下。但是道路已定。既然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什维尔尼克之流、戈洛晓金之流和其他人可以把一厚册统计表投掷到一个反对派的头

上，他们干吗还要和反对派辩论政府的统计数字呢？斯大林主义在这次表演中暴露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公开耍流氓的顶峰。我们再说一遍：这些法西斯方法不过是盲目地和不自觉地执行其他阶级的社会命令。目的在于清除反对派并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已经听到有这样的喊叫：“我们要开除一千，枪毙一百，保持党内太平。”这些喊叫都是来自那些可怜可鄙、惊慌失措、但又穷凶极恶的盲人。这是热月派的喊叫。这伙恶棍滥用权力，闭目塞听，充满官僚主义仇恨，正在竭尽全力策划热月政变。为此，他们需要两个党。但是，他们的暴力将被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所粉碎，反对派忠于这条路线的革命勇气是坚定不移的。斯大林一定造不成两个党。我们公开对党说：无产阶级专政在危险中。我们深信，党——无产阶级的核心，一定会听到、理解和对付这种危险。党已经深受震动。明天，党会受到更彻底的震动。

在反对派少数几千人的队伍本身的后面，还有第二层和第三层忠于反对派的人们，而在他们后面则有更广泛的工人党员，他们已经开始倾听我们的声音，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这个过程是无法扭转的。非党工人不相信你们反对我们的谎言和诽谤。列宁格勒的工人阶级已经在10月17日明确表态的游行中对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和镇压表示了正当的不满。无产阶级是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但是他们要求另外一种政策。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势不可挡的。国家机器对它们无能为力。你们的镇压越残酷，反对派在普通党员和全体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就越高。每开除一百个反对派就意味着党内增加一千个新反对派。被开除的反对派成员认为自己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名党员。你们能用暴力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手中把党证抢去撕掉。你们能暂时剥夺他的党员权利，但是他永远不会放弃他对党的义务。当扬松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问姆拉契科夫斯基同志被开除出党以后怎么办时，他

回答说：“我要掌稳舵轮，继续前进。”每一个反对派都将作出同样的回答。不管反对派从什么地方，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或者从党内被开除出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象姆拉契科夫斯基那样说：“我要掌稳舵轮，继续前进。”我们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舵轮旁边。你们不能把我们拉开。我们要忠实地掌舵。你们不可能使我们离开党。你们不可能使我们离开工人阶级。我们受惯了压制，我们受惯了打击。我们决不会把十月革命断送给斯大林的政策。它的全部实质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压制无产阶级核心，同各国妥协分子友好，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你们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你们就把它变成了斯大林集团的一个狭隘的执行机构。看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将是你们官僚主义机构胜利的顶峰。实际上，它将是你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标志。斯大林集团的胜利是各种敌对阶级势力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胜利。党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失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党已经觉察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帮助党理解它。反对派政纲现在已经放在党的面前。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将会在党内变得无比强大。工人阶级的日程和党的日程与斯大林书记处的日程是不一致的。无产阶级思考缓慢，但坚强有力。我们的政纲将加速这个过程。结局取决于对这条政治路线的最后清算，而不是取决于官僚主义者的拳头。反对派是不可战胜的。你们今天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正如昨天开除谢烈布里亚科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正如逮捕费谢列夫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的政纲将会找出自己的道路。全世界工人会深为震惊地问他们自己：“什么道理，他们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开除和逮捕十月革命最优秀的战士？谁在这里捣鬼？哪个阶级在捣鬼？是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阶级？还是正在出现和破坏十月革命胜利的那个阶级？”

甚至各国最落后的工人也被你们的压制手段所激怒。他们为了弄清你们有关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所散布的恶毒诽谤，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政纲。你们的迫害、开除和逮捕将使我们的政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受群众欢迎、最亲切、最珍贵的文件。开除我们吧。你们无法阻挡反对派的胜利——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团结的胜利。〕

译自《真理报》1927年11月2日。方括号内文字是根据《俄国局势真相》1928年伦敦英文版第3—19页补译的。

#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 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的提纲(一)<sup>①</sup>

## · 编者按语 ·

1927年下半年，托洛茨基反对派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纲，并要求联共(布)中央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展开全党争论。

为了彻底揭露托派的反党活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决定进行代表大会前的公开争论。《真理报》开辟了争论专栏，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以下两篇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农村工作的提纲。

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这两个政纲中，自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以“左”的面貌出现，采取颠倒黑白、歪曲事实、蛊惑人心的手法，全面地攻击和否定联共(布)中央关于发展工农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全党争论的过程中，各地党组织坚决屏弃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反列宁主义提纲，并团结在党的总路线周围。反对派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遭到了破产，随后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

<sup>①</sup> 《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发表这个提纲时所加的标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编者注

## 一 引 言

1. “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改变了农业发展的条件，从而也改变了农业发展的进程，创立了根本不同的另一种土地关系发展的类型，另一种农村阶级力量重新配置的类型，另一种经济形式发展的方向。”（中央的提纲，第一条）

这种绝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单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实还不能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这个时期作了最好的说明。在中央的提纲中用混淆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的庸俗机会主义宣言代替了列宁对这个过渡时期及其内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竞赛、“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说明。

“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sup>①</sup>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sup>②</sup>

“我们纲领中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劳动者应当知道、领会和了解的东西。如果他们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不了解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必不可免地经常产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尽管他们一百次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且以最激进的共产主义炫耀于人，但这种共产主义是一文不值的。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5页。——编者注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页。——编者注

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sup>①</sup>

或者无产阶级国家依靠高度发展的和电气化的工业，克服千百万小农户和极小农户在技术上的落后，根据大生产和集体化的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或者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巩固之后，动摇城市中社会主义的基础。

这两个方针（列宁的方针与中央的提纲）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央看来，列宁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已不再存在。中央的提纲粉饰现实，削弱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警惕性，从而在实际上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反对派认为，这个问题是整个过渡时代的关键。

2. 反对派看到并考虑到由于十月革命而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工业、运输业、信贷业的国有化，商业的公有化，对外贸易的垄断，合作社，这一切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可能。这个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反对派反对粉饰现实，反对掩盖在我国特别严重的危险。

粉饰现实必然会导致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的提纲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在其发展中依靠的是在中农基本群众破产，即这些群众由于无产者化而解体的前提下形成的国内市场。相反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根本不同。这里市场的扩大不是由于基本农民群众的贫困和无产者化，而是由于中农和贫农生活福利的提高。”（中央的提纲，第一条）

后来中央不得不承认，富农的“生活福利”也在提高。这就是说，贫农、中农和富农的“生活福利”都在提高！这幅田园风光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并不存在。农村中在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开展着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3页。——编者注



阶级斗争。同时农村在无产者化，无力播种的农户在增多。中央没有看到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背后日益增长和尖锐化的阶级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没有阶级和根据大规模公有生产的原则组织农业时，才能谈得上全体居民群众生活福利平衡的提高。由列宁起草的党纲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纲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3. “经济命脉，首先是大工业，乃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中央的提纲，第二条)

这是对的。但是党应当知道，这是反对派的提法，而且起初遭到中央的反对。现在中央吸取了这个提法。但是单单承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大工业在事实上成为主导因素，需要有一个能够加强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阵地的明确的阶级政策。否则，关于“大工业是主导因素”的提法就会成为空洞的声明。关于“主导因素”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结成联盟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中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政策并非工业是“主导因素”的政策。这表现在工业不断落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在中央没有下决心为了更快地工业化而着手实行坚决的再分配国民收入(反对耐普曼、富农、官僚主义者)的阶级政策。

4. 中央的提纲中对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阶段的说明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没有说明。对经济过程所作的带有偏见的娓娓动听的说明是违背列宁主义精神的(“甜蜜蜜的共产主义谎话”——列宁语)。无产阶级除了知道自己的成就(这是无容置疑的)以外，应当知道自己的同盟者和阶级敌人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

## 二 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5. 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即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与否，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如何，取决于和他们的正确关系。列宁用下面的话最确切地表述了现阶段我们在农民方面的任务：“善于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和富农作斗争，牢牢地依靠贫农。”<sup>①</sup>反对派也正是这样看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的。

6. 1925年党内形成了另一个修正主义思潮。最初否认富农的存在。

“富农是吓人的东西，是旧世界的幽灵。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不是一个集团，甚至够不上一伙。这是一些垂死的个人。”<sup>②</sup>

后来制造出一种麻醉人心的理论，说富农会很好地长入社会主义。“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早就规定了的。”<sup>③</sup>

“我们给他(富农)帮助，而他也给我们帮助。到最后，也许富农的孙子还会因为我们这样对待富农而向我们道谢。”<sup>④</sup>

关于富农的这些“甜蜜蜜的谎话”(不是共产主义的谎话，而是资产阶级的谎话)和列宁学说的原理是根本矛盾的，所以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早在1925年4月就曾这样写到布哈林的理论：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564页。——作者注

② 波古舍夫斯基的文章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第10页。——作者注

③ 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第49页。——作者注

④ 布哈林的文章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作者注

“布哈林同志在另外一点上也是不正确的。他说，他不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拥护者。不管是不是拥护者，但农村中阶级斗争正在进行，也不可能不进行。”

我们知道，列宁对布哈林粉饰富农、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言论作了一针见血的反击：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地，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sup>①</sup>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大农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是雇有几个雇佣工人来经营的，他们所以同‘农民’有关，只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地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全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同这个阶层进行的斗争上，把农村居民中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脱出来，等等。”<sup>②</sup>

列宁写道：

“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富农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以前在欧洲的革命中，每当富农利用工人的软弱使共和制又退到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又退到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的时候，情形都是这样。……富农可以而且不难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们互相争吵，但是永远不会同工人阶级讲和。”（《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决战！》列宁研究院版第1—2页。）<sup>③</sup>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6—29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82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3卷第583、584页。——编者注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他就只能使革命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

7. 然后又在农业中指靠所谓殷实农民，即实质上指靠富农。

“我们农村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放松和取消许多妨碍富裕经济和富农经济增长的限制。应当对农民、对全体农民说：发财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有人逼迫我们。”这是布哈林同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前夕说的。

这个从法国资产阶级那里借用来的、布哈林仿佛已经抛弃了的口号，又重新由中央委员司尔佐夫在1927年西伯利亚边区代表会议上提出来了：“趁大好时光积累吧！”

这是重复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口号，即重复新资产阶级的口号，新资产阶级幻想依靠富农和耐普曼，依靠他们在经济上的发展，以便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上对工人政权施加压力。

过了两年，布哈林同志现在若无其事地突然声明说，应当“现在转向对富农及所有资产阶级分子施加压力。这是我们应当实行的转变，而且我们应当根据这个转变的精神来进行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同一位布哈林同志现在写道：“应当对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对富农更加紧进攻。”<sup>①</sup>

这是某些无原则的政治家善于转变的典型！

但这也说明，反对派并没有徒然地进行斗争，反对派是对的，因为反对派甚至能够逼迫布哈林在代表大会前不得不发表这种言论。

为什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宣布为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和“掠夺农民”的东西，现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却被宣布是正确的呢？布哈林写道：“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来了一个

---

<sup>①</sup> 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作者注

随机应变。我们解除了中农的许多羁绊，对中农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使富农有可能‘转过来’。”<sup>①</sup>

好一个随机应变！列宁有一次写道：“如果按照布哈林那样随机应变，就会把很好的革命断送掉。”<sup>②</sup>现在不禁令人想起列宁的这句话。布哈林是徒然地想用随机应变的话来掩盖这样的事实：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在农村问题上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现在应当在反对派批评的影响下急速加以改变。最后，中央向与富农作斗争的急剧转变（暂时还是口头上的）必然向现在领导党的政策的人提出下面的问题。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仍然有效。可是那又为什么要向这些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富农宣战呢？或者是宣布新方针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声明。

8. 崇拜富农的必然后果是脱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社会支柱的贫雇农。

“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贫农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游手好闲、简直可以称为懒汉的人？这些懒汉最能大喊大叫地说我们执行富农的政策。”中央书记之一柯秀尔同志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sup>③</sup>

资产阶级教授乌斯特里亚洛夫为此曾夸奖柯秀尔道：“由一位做地方实际工作的人员说出的这个神圣的真理很不合反对派官员们的口味。”<sup>④</sup>

“经营自然经济的农村贫民是不幸的生产上的残废者。”加里

---

① 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作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3页。——编者注

③ 《速记记录》第313页。——作者注

④ 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者注

宁同志这样说。<sup>①</sup>

“我们现在的农村痛恨富农，同样也看不起懒汉。对于在农忙时不和大家一样劳动，而‘到河边垂钓’或‘到树林里采蘑菇’的‘主人翁’，辛勤劳动的农户也只能如此对待……苏维埃政权同这样的‘贫农’当然是不能走一条路的。”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同志这样写道。<sup>②</sup>

“说无产阶级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贫农，这是老生常谈，这就象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按照道听途说的公式办事一样。说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贫农，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说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支柱只能是贫农，苏维埃政权仅仅依靠贫农就能够维持政权，这是否对呢？……在没有战争、没有人对我们进攻的和平时期，我们可以维持住政权，但是那时我们就是没有贫农也可以维持政权的……且举征召农民参军为例：在贫农中没有文化、能力差的人最多，而参军的是最强壮、最优秀的人……最后，谁在军队中起作用？是身体比较强壮、比较有文化的人……而你们怎么希望，在战时状态，在国家真正危险的时刻能够仅仅依靠贫农……”<sup>③</sup>

“贫农还有依赖心理，他们指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领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这种消极情绪和依赖心理应该从贫农意识中清除出去。”<sup>④</sup>

中央最有名的领导人的上述言论同列宁关于贫农的说法相距十万八千里，犹如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一样。这不是无产阶级对贫农的估价，而是富农的估价，是从

① 加里宁《论农村》1925年版第61页。——作者注

② 《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政策》1925年国家出版局版第42页。——作者注

③ 加里宁1927年春在特维尔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作者注

④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5页。——编者注

小业主的观点作的估价。

只有富农、小业主、小资产者在观察必然会削弱贫农经济的贫农无产者化的过程时，才会说贫农是“懒汉”、“依赖者”等等。

9. 在关于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上，也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倒向社会革命党人理论的表现。

斯大林同志在说到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写道：“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sup>①</sup>

“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sup>②</sup>

说这些话而一句也不提农村阶级斗争，不提必须向富农作坚决斗争的人，就简直是重弹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者、社会革命党人的老调。而居然还把这作为列宁主义呈献给党！事实上这是粉饰富农、掩盖他们使农村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企图的政策。我国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里被虔诚的希望掩盖和粉饰起来。无怪乎《舵报》<sup>135</sup>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读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富农的言论后写道：

“严格地说，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有权安心以待：时间和苏维埃政权本身在为他们效劳。”<sup>③</sup>

10. 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改造农业这一个基本原理，乃是修正主义。有人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和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19页。——编者注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79页。——编者注

③ 1927年10月16日社论。——作者注

来。事实上，列宁所说的合作社不是取消和代替电气化计划，而是对电气化计划的补充。

请看布哈林的说法：

“当我们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同志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曾有一个战略计划，而当他写论合作制的文章，即给我们留下在经济政策原理方面的最后遗嘱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战略计划。”<sup>①</sup> 中央的提纲对布哈林关于列宁仿佛曾有两个战略计划的臆想也表示支持（第十一条）。

对列宁思想的这种歪曲是与对“殷实的中农”的方针、与关于反对派“超工业化”思想的叫喊完全吻合的，这种歪曲是对小资产阶级向党施加的压力所作的直接让步。把“合作社计划”和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也就是否认大工业在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我们在俄国，对于这一点比以前知道得具体多了，我们现在所谈的已经不是模糊的或抽象的恢复大工业的方式，而是确定的、精确计算出来的、具体的电气化计划。”<sup>②</sup>

中央在反对派批评的压力下被迫退却，但企图以对反对派的攻击作廉价的报复：

“应当指出，反对派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相信能够通过合作社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这是放弃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因而是反对派对列宁主义的背弃。这种背弃是反对派否认有可能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的取消主义方针的必然结果。”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5 年第 8 期。——作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99 页。——编者注



只要看一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纲，就会相信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这里竭力把关于单一的农民群众不经过内部阶级斗争长入社会主义的典型社会革命党人的看法加在列宁身上，因而这是一种更加不可救药的诽谤。其实这里是掩盖富农的作用以及使合作社受自己控制、使合作社成为自己发财工具的意图。抛弃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取消主义者正是那些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两年内实际执行了掩盖富农的政策，向指出富农增长、富农积累及影响增长的人进行疯狂斗争的人。

11. 和我们国家机关的一定环节错综结合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依靠有这些修正主义倾向的官方方针，公开地力图把农村政策扭转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而富农及其思想代表则用对发展生产力、“一般”提高商品率的关心来掩盖自己的打算。其实富农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商品率的增加只会减少和阻碍所有其余农户生产力的发展。

中央委员会应当或者驳斥这些指责或者谴责修正主义者。这些指责有事实和文件的根据，是驳不倒的。所以只能实行后者。

### 三 关于农民的分化

12. 中央的提纲在农民分化问题上的看法是：

“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表现为削弱（‘冲刷’）中农而发展贫农和富农这两极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则相反，存在着中农集团加强的过程同时富农集团还靠富裕中农而暂时有某些增长，贫农集团在减少，一部分贫农无产者化，人数更多的一部分贫农则逐步转到中农集团里面去。

反对派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发展的

规律机械地完全搬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中来，因而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尾巴。”（中央的提纲，第七、八条）

为了弄清楚谁真正“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尾巴”，我们首先援引一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奥加诺夫斯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对分化过程所作的说明：

“对于从恢复时期初到 1926 年的实际材料的分析说明，在农村中发生的不是双方面的分化过程，而是单方面的‘普遍上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上层集团比别的集团增长得快些，但同时中农也在增长，而下层集团在减少。”

可见，正是中央的提纲束手无策地重复了资产阶级关于农业发展过程的旧理论，重复了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向（战争以前，革命以前，苏维埃政权以前）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维护的理论。“列宁主义者”莫洛托夫和一贯反对列宁的右翼民粹派奥加诺夫斯基在对我国农村发展的中心问题的看法上走到一起去了。两人都否认：（1）农村资本主义分化的存在；（2）“冲刷”中农的事实；两人都低估富农的增长，两人都看不见农村无产者化的现象。这种巧合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央在农民问题上的整个原则方针类似民粹主义，即类似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论。党应当完全清楚这种变动的危险，这种变动是小资产阶级包围的压力的结果。

然而现实驳倒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宁要奥加诺夫斯基而不要列宁、重复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调的共产党人。近年来农村在分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尽管关于农村分化的官方统计材料很不完全和很片面，但农村分化的速度和性质还是描画得相当清楚。

13. 1917—1918 年间，农村中随同十月革命而来的是人所共知的农村平均化现象。列宁到 1920 年时所说的农村“中农化”，正是指这一点。耕地多和耕畜多的农户大大减少了，无耕地无耕畜

的农户减少了。

这种平均化过程大概一直持续到1922年。在新经济政策下，分化过程又出现了。请看共产主义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对1924—1925年度预算的调查共同整理的材料。这些材料描绘了农户划分为社会集团的鲜明情景。这是在供应国家粮食和出口方面都起决定作用的那些经济地区的材料。

所有农户分为五类：一、无产者；二、半无产者；三、中农；四、业主；五、小资本主义。这里采用的把农户划分为各社会集团的方法有碍于准确确定富裕农户的数量和比重。然而，可能的修正不会改变基本的结论，因为很大一部分第四类的农户正在“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第五类去。

（《1927—1928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353页。）<sup>①</sup>

应当极其仔细地看这些数字：第一、因为这里初次认真尝试把所有农户划成各种社会集团；第二、因为这件工作是有权威的机关做的，绝对不可能怀疑它们夸大分化。

我们把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农户合为贫农一类，这类农户在上述地区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中农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即占一半，而在两个地区（高加索和乌克兰）少于全体农户的一半。最后，按照共产主义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分类，包括业主和小资本主义农户的这一类富裕农民集团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引用和解释这个表格时（《1927—1928年度控制数字》，第353—355页）写道：“资本主义上层掌握了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这个承认非常重要：它根本驳倒了仿佛反对派过高估计富农的说法。如果说国家计划委员会不得不承认正是反

---

<sup>①</sup> 附表见本书第843页。——编者注

	该类农户占 全地区总农 户的百分比	机器价值 的比重①	耕畜数量 的比重	直接税 的比重	该类农户 播种的平均数	播 种 的 重 比
北高加索						
一	19.3	1.7	1.7	2.8	2.3	7.8
二	16.8	6.0	7.2	5.5	4.0	11.6
三	40.3	34.0	43.2	35.3	5.7	39.2
四	18.3	40.8	33.3	40.6	9.1	29.1
五	5.3	17.5	14.6	16.4	12.6	11.7
乌克兰						
一	16.5	5.3	4.3	8.7	4.1	8.3
二	21.7	6.9	10.2	11.8	5.5	16.9
三	45.8	47.0	57.1	51.4	8.3	49.2
四	10.3	22.1	19.7	17.4	10.7	37.2
五	5.7	18.7	8.7	10.7	13.5	8.4
乌拉尔						
一	10.9	1.7	3.0	2.1	1.6	4.2
二	11.9	1.8	4.6	3.9	2.4	6.8
三	52.6	38.3	50.8	49.0	3.5	43.6
四	15.4	29.1	23.2	21.1	7.0	25.6
五	9.3	29.1	18.4	23.9	9.0	19.8
新西伯利亚区						
一	15.5	2.3	9.2	7.2	3.0	9.3
二	17.7	3.3	10.1	11.2	3.3	12.0
三	51.6	51.6	56.8	55.6	6.0	54.2
四	7.5	2.4	12.6	14.2	8.2	12.7
五	7.7	21.9	11.3	11.8	7.3	11.8

① 包括犁耙。

② 此处2.3+3.3=6.1显系2.8+3.3=6.1或2.3+3.8=6.1之误。——编者注

对派两年来一再肯定的道理，却又企图安慰自己说，“然而，基本财富并不在他们(资本主义上层)手中”，那就必须承认，这样安慰自己是没有用的。如果不仅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而且基本财富都转入了资本主义上层手中，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胜利。以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来安慰自己，是不明智的。必须：(1)承认反对派对富农在农村中的作用的估价是正确的；(2)让全党和工人群众知道这一点；(3)由此作出实际的和政治的结论，而不要安慰自己说，资本主义虽然夺取了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但没有全部夺得。

某一类农户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比重不仅取决于他们在经济中的比重，而且也取决于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比重。

生产资料中分配得最不平衡的是机器。贫农在机器总值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在乌克兰才占百分之十二。富裕农户在全部机器总值中占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在乌克兰地区，半数或半数以上的机器在他们手中。

耕畜的分配大致也和机器的分配一样，虽然某些地区贫农在这方面占的比重比机器分配方面大些。应该指出，关于耕畜的材料是用耕畜头数计算，而不是按价值计算，这是不一样的。富裕农户的马匹总是要好些，更值钱些。因此如果不按数量，而按质量和价值计算耕畜的分配，那么富裕农户的比重就会大大增加，而贫苦农户的比重就会下降。

播种面积的分配略有不同，虽然和上述比例关系很接近。贫农的播种面积占百分之十至二十五，中农在各地区约占一半，富裕农户占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五。贫农在播种面积上占的比重比在机器和马匹方面的比重要高些。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贫农虽然没有生产资料，但可以用按照奴役性条件从富农那里租用的牲口和农具来耕地。而且许多贫农农户播种的土地只是名义上属于他

们，而实际上是属于租土地的富裕农户的，因为富裕农户为了逃避纳税，便把出租的这片耕地不算作富裕农户的，而算作贫农的。统计材料没有估计到这一点。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基本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属于农村的富裕阶层。这些生产资料是富裕农户手中剥削贫农的工具。

14. 关于直接税这一栏值得注意。直接税应当成为调节农村中社会过程的有力工具之一。首先我们应当通过直接税来约束农村资本主义上层的剥削意图。然而，如果比较一下三类农户在占有生产资料和缴纳直接税中的比重，就可以看出，贫农缴纳的直接税不比富裕农户和中农少，甚至还要多。

税额负担与生产资料成正比，对于富裕农户不征收累进税。固然，这是 1925 年的情况，从那时以来对富裕农户的征税稍有增加，但是从那时以来分化的过程也大大发展了。

为数很大的间接税相对地增加了贫苦农民阶层的纳税负担。

15. 没有关于近两年半来分化过程的详细材料。上述分类是根据 1924—1925 年度的统计材料作出的。我们只有关于 1925 年至 1926 年各类集团耕地面积变化的材料。当然，耕地面积的多少并不和社会集团完全相符，然而，在社会集团和耕地数量之间无疑有着依从关系。

到 1925 年为止，各类集团耕地面积变动的特点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户减少，耕地多的农户增加，而且耕地多的农户的增加比无地或少地农户的减少要快得多。最近四年来无地和少地的农户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五；这一时期内拥有六至十俄亩土地的农户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至一百二十；拥有十俄亩和十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无地和少地的农户的减

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破产和消失。例如,在西伯利亚一年之内无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十五点八,拥有两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三点八;在北高加索,无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十四点一,拥有两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三点八。1925年,在大多数地区无地的农户开始增加。例如,根据春季重点调查的材料,无地农户的比重从1924年至1925年在消费地区从百分之二点一增加到百分之二点八,而在产粮地区从百分之四点八增加到百分之五点一。1926年,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境无地农户有所增加。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年 份	无 地 农 户	有0.1至2 俄亩的	有2—4 俄亩的	有4—6 俄亩的	有6—8 俄亩的	有8—10 俄亩的	有10俄亩 或10俄亩 以上 的
1925年……	4.7	34.0	34.1	15.7	6.3	2.6	2.8
1926年……	5.0	33.1	32.4	16.3	7.1	3.2	3.9
1926年的比重和 1925年比较增减 的百分比……	106.4	97.4	95.6	103.8	112.7	123.1	139.3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由于中农减少,两极的农户数量增加了。

少地的农户有某种程度的上升,这决不是说他们的经济独立性有所增加。从上述关于基本生产资料分配的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农户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在这个集团中,没有马匹没有农具的农户最多。这一类农户的绝大多数都是用租来的耕畜和农具耕种自己的份地。这是列宁称为有份地的雇农的那部分农民。

16. 出租土地的现象一年比一年增多。生产地区从1925年至1926年的材料说明租地农户从百分之十一点二增加到百分之十八点二,按照耕地面积划分如下:

农 户 类 种	产粮地区该类农户占的百分比		产粮地区租用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比		产粮地区出租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比	
	1925年	1926年	1925年	1926年	1925年	1926年
有 2 俄亩以下的……	31.1	29.6	4.1	3.4	42.5	44.4
有 2—6 俄亩的……	54.9	54.3	26.3	21.4	47.2	42.8
有 6 俄亩和 6 俄亩以上的……	14.0	16.1	69.6	75.2	10.3	12.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27年《中央统计局统计数字》)

1926年以前租佃的急剧增加是因为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资本主义租佃合法的决定已经产生了后果。根据显然缩小了的数字，甚至在1924—1925年度，当租佃半合法的时候，租地的总数就已达七百七十万俄亩。从租地数量增长的速度来看，1927年租地的数量约为一千五百万俄亩。

上述材料指出租地迅速集中的过程：四分之三的出租土地集中在百分之十六的上层农户手中。百分之十六的农户拥有百分之七十五点二的租用土地，而只出租百分之十二点八，少地的（不到两俄亩的）农户出租百分之四十四点四，仅租用百分之三点四，中农（有二至六俄亩的）出租百分之四十二点八，仅租用百分之二十一点四。

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的分化过程，而不是证明所有各类农民的普遍上升。一方面发生土地使用集中的过程，另一方面底层农户经济上依赖上层农户的程度在增加。

17. 随着土地使用和生产资料集中在上层集团手中，这些上层集团在越来越多地采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底层和中等农户或者经过完全破产和消失、或者经过腾出家庭个别成员而抛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这些“剩余的”人手陷入富农或“实力强大的”中农的奴役，或者进城去，而很大一部分得不到任何使用。这些事实



是决不能只用农业移民来说明的。它们和农村的分化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关于采用雇佣劳动的材料比关于租地的材料更加不完整。然而统计数字终究抓住了这些现象的趋向：雇佣定期工的农户从占生产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一·五增至百分之二·九，而雇佣零工的农户从百分之二·八增至百分之八·四。在各类农户中雇佣劳动的分配和租地的分配也都是极不平衡的。

各 类 农 户	雇佣定期工或长年工的农户的百分比	
	1925年	1926年
有 2 俄亩以下的……	9.6	7.5
有 2—6 俄亩的……	42.9	39.1
有 6 俄亩和 6 俄亩以上的……	47.5	53.4
	100.0	100.0

(1927年《中央统计局统计数字》)

18. 各类农户存粮的不平衡也证实了耕地和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衡。截至 1926 年 4 月 1 日为止，农村余粮的百分之五十八集中在百分之六的农户手中<sup>①</sup>。

1926—1927 采购年度末，存粮为八亿至九亿普特，而在今年的粮食采购工作结束后，达到十亿普特。这个存粮数比战前多，大大超过必要的储备量。这些存粮是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奴役贫农的工具和破坏我们经济计划的手段。这些存粮是富农手中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攻的重要工具。现在谁也不能辩驳的这一事实完全证实了反对派早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就提出的警告，完全证实了反对派当时就提醒党加以注意的前景。如果现在突然宣布“加紧”即加强、加速“进攻富农”的口号(见《真理报》)，那么这个口

<sup>①</sup> 《统计综览》1927 年第 4 期第 15 页。——作者注

号本身就证明：对富农的进攻已经迟了，在党的领导人向发出关于富农增长的信号的人进行疯狂斗争的时候，富农得到了毫无阻碍的发展。事实上“向左开火”的口号，向反对派作斗争，指责反对派“忘记了中农”是一个帷幕，它遮盖了富农及其在城市中的助手耐普曼加强的过程和这一过程的迅速发展。这就是中央近两年来的方针的客观结果。

19. 农户分裂的过程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分化的过程。

机器和信贷没有成为农业社会化的杠杆，而常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户手中，帮助他们剥削贫雇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随着实物盘剥的发展，货币高利贷也在发展。对中亚细亚产棉区约一千个农户的调查<sup>①</sup>说明，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农户不得不借高利贷。按每俄亩耕地平均计算欠高利贷者的债款数目，贫农最多。比较一下不同社会集团缴农业税的数目和给高利贷者的（超额的）利息数目，就可看出高利贷的掠夺性质。1926年贫苦农户给高利贷者的利息比农业税多三倍，中农多百分之五十，富裕农民多三分之一。

20. 革命使土地占有量得到平衡。但生产资料则没有平衡。而列宁写道：“很明显，既然有着财产差别和使这些差别更加尖锐的交换制度，土地占有上的任何平均都不能消除真正土地利用的不平衡。”只要把列宁这段话和中央的提纲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现在中央的多数人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多远。

不管这些使中农经济比重减少的过程发展得有多远，“中农仍然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集团。把中农吸引到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方面来，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指靠所谓‘殷实农民’实际上就是指靠中农阶层进一步的瓦解和破坏土地国有化”。

---

<sup>①</sup> 《农业信贷》杂志 1926年12月。——作者注

## 四 土地国有化

21. 农村中正在发展的租佃关系,现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不受苏维埃的领导和监督,而由越来越受富农影响的土地联合社支配),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转让土地时付款的决定,这一切都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出租土地的面积已达一千五百万俄亩之多。这样大量的土地面积有四分之三转归富裕农户使用。在这些基本事实面前,中央的提纲所提出的巩固国有化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而在有些场合下简直会使贫农失去土地。另一方面,中央的提纲所提出的关于租佃期限的那些限制本身固然是正确的,但远没有解决用发展租佃来曲解土地国有化的问题。

22. 可是,维护和巩固土地国有化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为土地国有化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苏维埃政权手中向上述的农村资本主义蜕化过程作斗争、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之一。党现在就应当制定一个广泛的国家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利用土地国有化来达到这个目的,并将此计划提交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讨论。彻底调整苏维埃国家(国有土地的主人和支配者)和利用这些土地的人之间的关系,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但现在就应当指出总的工作方向。农民群众(雇农、贫农、中农)应当有可能参加讨论和准备这些措施。

23. 所有这些措施应当保证:

(1) 土地仍归贫苦阶层使用。国家应当负责对这些阶层耕种土地的工作,首先是按集体的原则组织广泛的物质支援。

(2) 限制富农以及正在变成富农的农户的剥削意图。

(3) 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 广泛发展共耕社、合作社的经营形式, 以便尽快地过渡到集体农庄的经营形式。

苏维埃政权应当实行支配全国土地的权力, 以执行土地政策并向富农越来越想实际掌握(通过租佃形式等等)全国土地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

现有的土地联合社必须逐步改造成为集体使用国有的土地、把集体贯彻一系列经济措施作为自己任务的土地合作社。

巩固土地国有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应当是使土地联合社服从当地政权机关, 并规定由清洗了富农的地方苏维埃对调整土地使用和土地整理问题实行坚定的监督,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免受富农的侵犯。应当加强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在组织农村全部经济生活、首先在推行农业技术措施中的作用。它们应当成为组织农户的倡导者和农村中社会政策的执行者。

在实际执行这个制度时,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在各地应尽量支持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是无产阶级的支柱的那些农村阶层和经济形式。这个制度有可能使苏维埃政权掌握公开地和最直接地同农村中一切资本主义因素和过程作斗争的工具。

实行上述巩固土地国有化的纲领, 需要确切弄清楚土地的数量, 确定土地的质量, 并对土地作出评定。

为此必须加速土地整理和进行土地调查(质量和土地评定)。

土地整理工作应完全由国家拨款进行, 而且首先应当调整集体农庄和贫苦农户的土地, 以尽量保卫他们的利益。

同时, 必须着手废除按照经营的表面情况而不考虑收入多少规定的农业税, 因为它的大部分负担落在力量单薄的农户身上, 从而引起完全正当和合理的不满; 必须按土地质量和离销售市场的远近征收土地税(地租税)以代替农业税, 并且免除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的税。而对资本主义富农上层则另课以累进所

得税。

党应当给予一切旨在废除或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基础之一的土地国有化的倾向以致命的打击。

## 五 合 作 社

24. 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在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营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描述的，基本农民群众最易于接受的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是合作化。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整个苏维埃制度给予农民的巨大优越性。只有日益增长的农业机械化过程才能给社会主义生产合作化(集体化)创造日益广泛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方式本身的技术革命，如果没有农业机器，如果不过渡到多区轮作制，如果没有人工肥料等等，就不可能在真正的农业集体化方面展开顺利的和广泛的工作。

25. 供销合作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受社会主义经济因素、首先是大工业和工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直接影响；(2)农业的商业职能的合作化过程将逐步引起生产本身的合作化，加强生产的集体化。

农业合作社的阶级面貌将不仅由合作化农民各类农户的数量比重决定，而主要由他们的经济比重决定。

可是，关于农村不同社会阶层合作化以及合作社为他们服务的现有材料说明，在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中，农村的富裕阶层参加得比较多些。例如，包括全部农业合作社三分之二社员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业信贷合作社的材料，提供了截至1926年10月4日为止的情况：

### 按耕地面积划分的各类农户的比重

按耕地面积的分类	在所有农户中	合作社社员	债务人	贷款	每人平均的欠款数(卢布)
有2俄亩以下的……	36.6	30.9	31.6	28.9	37
有2—6俄亩的……	50.9	45.7	47.9	45.8	39
有6俄亩和6俄亩以上的……	12.5	23.4	20.5	26.3	57
	100.0	100.0	100.0	100.0	43

(《农业信贷》杂志 1926年8月。《关于合作社的成分》)

表格说明,富裕农户比贫农和中农合作化的程度要高,而且享受的信贷待遇要多。

1925年和1926年的材料的比较说明,富裕农户无论在债务人数目上或获得贷款的数目上的比重都有所增长。

	在合作社中的比重		债务人的比重		贷款总数的比重		每个农户贷款的平均数(卢布)	
	1925年	1926年	1925年	1926年	1925年	1926年	1925年	1926年
有2俄亩以下的…	35.0	31.0	30.6	29.3	32.8	27.4	33.9	39.8
有2—8俄亩的…	57.3	58.1	61.3	61.2	56.6	57.7	33.6	39.4
有8俄亩和8俄亩以上的…	7.7	10.9	8.1	9.5	10.6	14.9	46.8	68.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农业信贷》杂志 1927年9月)

把拥有二至八俄亩土地的农户划为中农是有倾向性的,因为这样缩小了富裕农民的比重,尽管如此,这个表格也说明合作社中富农的增长。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农民越是富有,他从现在的农业合作社(其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靠苏维埃国家拨给)取得的资金就越多。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贫农经济的发展以最大帮助的信贷，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富裕农户。

农业信贷应当不再主要是农村殷实的富裕集团的特权。必须停止目前这种状况，即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贫农的基金往往使用不当，并且替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服务。

26. 必须不仅大大增加给予贫农的拨款，而且要根本改变整个农业信贷的方向，以便给予贫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以长期低息的贷款，改变现有的担保制度。在专业农业合作社中，富裕农户比重的增加更加明显。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产奶区的奶品合作社的材料提供了下列情况：

按奶牛头数 分类的农户	比 重			
	在居民中	在奶品合作社社员中	产 奶 量	在合作社管理机关中
没有牛的……	18.9	1.6	—	2.1
有1—2头牛的……	74.7	70.8	51.3	48.2
有2头和2头牛以上的……	6.4	27.6	48.7	49.7
	100.0	100.0	100.0	100.0

(《奶品经济》杂志 1926 年第 19 期)

富裕农户在这里也占着和他们的数量不相称的地位，掌握了奶品合作社一半的管理，提供奶品总量的一半。其他各种专业合作社方面的材料也是这样。这些材料都说明，我们的农业合作社由于没有实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所以它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农村分化的过程。农业合作社对于农村富裕上层发展经济的帮助，比对贫农的帮助多些。我们的合作社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联合着农村力量强大的富裕阶层并为他们服务，掩盖这个事实是直接和列宁的观点相抵触的。为了使合作社完成列宁向它提出的那种伟大的社会主义任务，首先必须明确揭露现时合作社的缺点，不要用

列宁关于“真正居民群众的真正合作化”是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天才言论来掩盖下列事实：农村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目前还在利用合作社来达到自己组织和自己积累的目的。

党的任务在于，使农业合作社真正成为贫农和中农集团的联合组织，成为这些人反对日益增长的富农经济势力的工具。必须坚持不懈地吸收农业工人参加农村合作社的建设。

## 六 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27. 必须以更迅速地发展集体经济来对抗农村中日益增长的私营农场。

中央提纲的作者莫洛托夫同志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他在不久以前在这个极重要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根本错误的方针：

“……决不能陷入贫农要在目前条件下立即使广大农民群众实行集体化的幻想。”<sup>①</sup>

恰恰相反，在大规模公共生产基础上改造千百万最小的贫苦农户的基本道路正在于他们的集体化。

只有把贫农组织为集体农庄，才能在较大的程度上实现经济上援助贫农的任务。把贫农组织为集体农庄的任务，应该作为我们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只有使农村中党的机关以及合作社和苏维埃机关都来参加这项工作，政府从国家预算中拨出足够的款项，以十分优待的条件供应组织起来的集体以生产资料，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现在给贫农的拨款数目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分散到千百万农户，因而根本完不成多少实际支援的任务。必须年复一年地拨出大量款项不断地给予组织在集体农庄中的贫农以经济援

<sup>①</sup> 莫洛托夫《党的农村政策》国家出版局版第64—65页。——作者注



助。应当从来自农村、熟悉农村情况的人们当中培养集体经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应当在农村小学和农村青年学校中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

应当对国营农场的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

同时还必须更加经常地支援没有参加集体农庄的贫农，方法是完全免除他们的赋税，实行土地整理、对经济设施贷款、吸收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等相应的政策。

## 七 苏 维 埃

28. 1925年给予人数很多的农村剥削分子以选举权的“指令”，仅仅是官僚机关（一直包括它的最上层）对于不断发财致富的上层富裕农民的企求何等同情的最明显表现之一。这个实际上破坏了苏维埃宪法的指令的取消，无疑是反对派批评的结果。但是按照新指令实行的最初的改选，在许多地方已经暴露了受到上面鼓励的、尽量缩减富裕阶层中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数的意图。然而，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此。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比重不断增加，他们和官僚机构接近，领导的总方针不正确的情况下，富农和耐普曼甚至被剥夺了权利，也仍然能够在幕后至少影响基层苏维埃机关的成分和政策。

从1925年开始，后来由于反对派的反对而局部遏止的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帮手”以及市侩钻入基层苏维埃的过程，是一个极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不注意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严重的后果。

29. 遏止这种现象不能靠单纯在行政上“活跃”苏维埃的办法，而只能靠执行坚定的阶级政策，坚决反击新的剥削者，提高无

产阶级和贫农的积极性和他们在苏维埃国家一切机构中的作用等办法。

中央提纲的作者莫洛托夫同志认为，仿佛不能要求工人接近国家或国家接近工人，因为我们的国家本来就是工人的<sup>①</sup>，这种“理论”事先就使一切官僚主义病态神圣不可侵犯，它是最坏的官僚主义公式。严厉谴责这种以及与此类似的“理论”是通过整个国家机关在全部日常工作中接近工农基层的办法向官僚主义病态作真正斗争的必要条件。

现在官方同官僚主义所作的斗争，不是依靠劳动群众的阶级积极性，而是靠机关本身的努力，这样的斗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重大的结果，在许多场合下甚至会助长官僚主义。

必须：

(1)按照列宁主义精神，采取在真正争取限制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基础上，通过在党内、工会和苏维埃内坚持开展工人民主的办法同官僚作风进行斗争的坚定方针；

(2)贯彻使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接近国家并使机关绝对服从劳动群众的迫切利益的口号；

(3)提高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觉悟作为活跃苏维埃的基础；

(4)坚决制止对被选举出来的工作人员撤销苏维埃工作的做法，在真正绝对必需的情况下可以例外，但应向选民说明原因；

(5)应当争取使最落后的粗工、最愚昧的农妇根据亲身经验确信，他们在任何国家机关中都会得到关心、忠告以及可能的支持。

中央提纲关于农民积极分子的条文完全是从反对派这里剽窃

---

<sup>①</sup> 《真理报》1925年12月13日。——作者注

来的。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纲中说：

“应当提出造就非党雇农、贫农和与他们接近的中农积极分子的口号，来对抗缺乏明确阶级内容的‘通过活跃苏维埃造就非党农民积极分子’（斯大林—莫洛托夫语）的口号，因为这在事实上会加强农村上层的领导作用。”

## 八 税收和存粮

30. 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派曾提议免除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缴纳农业税。1926年4月，反对派又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改变现行的统一农业税的制度：免除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纳税，无论如何不要追加中农基本群众的税额。”

斯大林同志早在1926年4月反驳反对派关于免除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纳税的提议时曾这样说：

“他们（反对派）唯一能够想出来的，就是提议不是免除百分之二十五，而是免除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缴纳农业税……我们来分析这个提议。我可以肯定说，这个表面上完全无伤大体并仿佛是反对富农的措施，实际上是打击中农，打击工人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的联盟……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里的错误在于，他们事实上混淆了中农和富农，他们想要打击富农，实际上却在打击中农。因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提议在事实上是一个反对农民的提议。”<sup>①</sup>

斯大林同志没有注意到，他在这方面只是重复孟什维克马尔

---

<sup>①</sup> 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速记记录》第112页。  
——作者注

托夫的话，马尔托夫在过去反对列宁时曾说：“这种在一小撮富农和其余农民之间挖一道鸿沟的企图是空想。你们这样只会打击中农。”<sup>①</sup>

可见，一年多以前斯大林同志还在重复孟什维主义的陈词滥调，说反对派关于免除贫农纳税的提议仿佛是“反对农民的”提议。

现在，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中声明说，除了以前免除纳税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外，再免除百分之十的贫农纳税。这样，被宣布是“反对农民的提议”的反对派提议却被中央通过了。而且每个工人、每个贫农都清楚看到，这样做已经拖延了时日而且还是反对派施加压力的结果。

31. 中央还延误执行反对派早在七月全会上提出的另一个提议，这是不能容忍的。

农村中有了大量存粮。这些存粮集中在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并且远远超过必需的储备。另一方面，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仍嫌不足。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采购量比去年还少，而粮价却在上涨。农民卖粮的价格和消费者买粮的价格之间的悬殊太大。这种悬殊滋长了寄生性商业活动。富农存粮显然在阻碍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破坏苏维埃政权的计划。

必须通过征借的形式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存粮。这个措施只涉及到百分之十的农户，而能够提供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成为增加出口、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新动力。必须实行这个措施，这是工人阶级和贫农都关心的。

既然工人阶级从自己的低工资中还可以拿出钱来支持工业化

<sup>①</sup> 《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记录》第301页。——作者注

公债，那么使农村上层用自己的对于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一部分存粮来支持苏维埃国家，就不应有什么障碍了。为此只是不要限于口头上向富农进攻，而要立即采取实际行动。

## 九 必须端正政治路线

32. 虽然农业的恢复过程比较迅速，但是农业的商品率仍然很低：1925—1926 年度投入市场的农产品只占战前的百分之六十四，1926—1927 年度的出口量仅为 1913 年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二。其原因，除了农村本身总的需要量不断增加（人口的增长和农户的分散，而且在产粮区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农户购买粮食）以外，在于农业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在于富农的迅速增加的实物积累。这引起农业的自然经济化，尤其是使富农的实物积累更加增加。甚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也不得不承认，“一般工业品的不足，使城乡等价交换受到一定的限制，减低了可能提供的农产品商品量”（第 177 页）。这种现象破坏城乡结合，并加速农民的分化。

33. 中央的提纲说：

“虽然总的政策完全正确、无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和合作社对农业的影响日益增大，但是也必须指出一系列严重缺点、错误、歪曲以及有时严重违背党的政治路线的行为。”

这句话只有后半句是对的。恰恰是中央的总的政策不正确。因此实践中的“错误”、“歪曲”和严重缺点就必不可免了。我们的政策是由中央决定的，而中央企图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国家机关和主管部门身上，这是可耻的支吾搪塞。

中央列举了党的路线的“歪曲者”（农业机关、合作社和农业信

贷机关、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采购机关等等),从而也就是指责自己:仿佛除了中央以外所有的人都有过失。“过失者”的名单和“歪曲”的性质完全证实了反对派对中央农村工作总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某些主管部门的个别错误,而正是在于领导上的总路线,在于领导上的动摇、走弯路、偏离阶级路线。应该纠正的不仅是各主管部门的错误,而首先是中央的总路线。

“集中火力”反对所谓反对派的反中农倾向,实际上导致富农经济实力的发展,使富农对很大一部分中农的影响加强,对贫农的奴役加剧。

党在农村中的错误政策应当加以坚决修改,如果不公开承认近两年来采取的路线是错误的并加以谴责,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中央现在说,它至今一直都执行“向富农进攻”的路线,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中央的方针实际上不是限制农村资本主义,而是使它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现在才需要(对党是突然而来的)宣布,至少在口头上宣布“加强对资本主义因素、首先是对富农进攻”的口号。这是反对派的口号,这是正确的口号!但是中央从反对派这里窃取这个口号过于迟缓,而且缺乏诚意!党不可能相信,两年来执行了完全相反的政策领导人真正打算和真正能够执行反对派的这个口号。为了执行这个口号,应当领会反对派提出的建议。

在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党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领导雇农、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组织他们反对富农的剥削意图。

34. 农村雇佣劳动的人数达三百五十万,男女雇农为一百六十万。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雇农参加了工会。这些往往是奴役性的雇佣合同,未必进行过登记。雇农的工资往往低于国家规定的最

低标准，国营农场往往也不例外。平均的实际工资不高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作日很少少于十小时，大多数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工资发放不当，拖延过久。雇农困苦不堪的状况不仅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的结果，而且毫无疑问也是错误方针的后果，因为这种方针在实际上主要是照顾农村的上层，而不是照顾底层。必须全面系统地保卫雇农的利益，不仅防止富农、而且防止所谓殷实中农的侵犯。

35. 必须围绕着生动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来切实地、有计划地在各地牢固地把贫农组织起来；如改选，税收运动，影响对信贷、机器等的分配，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合作化，发放贫农合作化基金，等等。

假如我们不建立真正巩固的组织，不明确指出贫农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那么团结贫农仍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我们应当不断粉碎富农的基层组织（不论它们采用什么隐蔽的形式）。

雇农自然应当有完全独立的阶级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以外）。这就是工会。

中农基本群众应当组织在农村苏维埃和合作社周围。

而贫农，正因为他们是贫农，则需要有另外的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以外）。

必须把有关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税收和党的农村政策的各项基本指令提交贫雇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预先讨论。

贫雇农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不应是临时性的，而应是经常性的。

为了反对富农及富裕上层农民成立只能起反革命作用的“农民协会”的意图，贫农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今后应当创造条件来组织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应保证无产阶级的影响并且成为无产阶级

专政在农村执行其政策的支柱的“贫农协会”。在农村中贫农和中农与富农这两方面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贫农协会应当保证和那些反对富农的中农基本群众建立友好关系；贫农协会尽力支持中农的这个斗争（在合作社、苏维埃等等中），它是团结那些准备和苏维埃政权一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富农、投机商、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基本农民群众的中心。

36. 党应当通过正确的采购价格政策，组织对中农的信贷和合作化，来尽力促进中农经济的发展，不断地逐渐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村阶层过渡到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济方面去。

37. 党在对待日益增长的富农阶层方面的任务应当是尽量限制他们的剥削企图。绝对不许违背宪法中剥夺农村剥削阶层在苏维埃选举时选举权的条款。必须实行：高额累进税；保护雇佣劳动和调整农业工人工资的国家立法措施；在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方面正确的阶级政策。保护贫农免受奴役性盘剥，尤其是当贫农出租土地时应从立法上予以保护。应当改变农村机器供应的整个政策，要比以前更大地增加对贫农的供应。

38. 反对派在农民政策的争论问题上的观点已经完全证明是正确的。在反对派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对总路线所作的局部纠正，并没有阻止官方政策继续偏向“殷实的农民”。只要提到下面一点就够了，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加里宁的报告，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农村的分化和富农的增长。

这种政策只能有一个结果：丧失贫农，没有争得中农。

中央的提纲虽然某些条文在口头上“左倾”，但并没有使中央的政策发生转变。再免除百分之十的贫农的农业税，是直接从反对派的政纲中抄袭来的。这个措施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宣布向富农“进攻”，也是从反对派的武库中拿来的。中央的原则性方针既然否认农村资本主义分化的事实，掩盖农村中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真



相,就必然会在实际活动中采取错误的、机会主义的步骤。中央委员会对农村的阶级力量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这就使中央不可能在农村中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阶级路线。

对于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左的辞句和右的行动从来是形影相随的。广泛利用反对派政纲的一些条文,而又向党隐瞒这个政纲,同时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大批开除出党,这是每一个党员都不能回避的基本矛盾。

巴卡也夫、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叶夫多基莫夫、穆拉洛夫、斯米尔加、季诺维也夫、彼得松、托洛茨基

写于 1927 年 11 月。

译自《真理报》1927 年 11 月 5 日。

#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 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的提纲(二)<sup>①</sup>

## 必须先提出的一点意见

在党的正常发展条件下，党内少数人的提纲和一般任何文件都要在正式展开党代表大会前夕的争论以前予以公布。而争论的进行则应先于决定或预定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党内选举。不用说，进行争论的条件应当是：保证党内群众能够全面讨论所争论的问题。可是，任何一个这样的条件都丝毫没有遵守：

1. 支部的改选，出席区代表会议和县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以及出席区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是在争论之前或没有争论的情况下进行完毕或者正在进行的。

2. 这样，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预先就遏制了党内各种意见斗争的影响。争论必然是徒有虚名。它不可能对党代表大会有任何影响。这就是说，党员群众获得的不是立法作用，而是咨询作用。

3. 但是，就是这样的争论也被置于这样的境地：把徒有虚名的争论弄得特别尖锐（会议上的谩骂、吹口哨和破坏等等），同时把

<sup>①</sup> 《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发表这个提纲时所加的标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反提纲》。——编者注

争论的积极意义即教育意义缩小到最低限度。在提纲问题上也是完全如此。

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是在今年10月25日公布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被禁止提出和中央委员会的提纲相对立的提纲,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还拒绝了我们的建议:至少把我们政纲中涉及到中央委员会提纲也谈到的那些问题的有关部分作为反提纲公布出来。结果,反对派的反提纲在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三星期才加以公布,就是说在全国都已召开过基层党代表会议后才加以公布。而在苏联的边远地区,直到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动身以后才公布了反对派的反提纲。这个事实最明显、最清楚地说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纯粹是按机关作风进行准备工作的。

但是,无论准备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方法如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故。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赤裸裸的组织手段战胜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事。正确的政治路线始终都在排除一切障碍,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我们少数派被剥夺了影响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代表成分和大会未来决议的可能(这是和我们党的章程和传统相抵触的),因而我们向全党舆论、首先是向党的无产阶级核心的舆论提出我们的提纲。

## 一 中央委员会提纲的主要缺点

每一个工人党员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五年经济计划问题的提纲所期望的,完全不是李可夫同志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提纲中的东西。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担心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失业的情

况今后会怎样；难道前面就没有一线光明吗？现有“五年计划”方案的数字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关于这些五年计划又说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对这种问题没有作任何回答。

每一个共产党员还对自己提出另一个同样重要而且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最近几年内商品荒的情况将会怎样？今年年初，米高扬、李可夫和布哈林等同志在和反对派进行争论时，就绝对肯定地说，商品荒很快就会缓和。最近几年内工人和农民在这方面将会碰到怎样的情况呢？商品荒仅仅在米高扬和布哈林等同志的话里“消失掉”呢，还是商品的供应真正开始满足需求呢？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现有的三种五年计划草案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关于这几个五年计划方案说了些什么？在这五年内商品荒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指示中也没有作出任何的答案。

在其他许多迫切的问题上也完全一样，这些问题是：粮食价格的确实开始增长，粮食征购工作的困难，出口的缩减，卢布的购买力受到的威胁，等等。

中央委员会的提纲谈到必须“增加工人的居住面积”，但没有指出多大的面积。10月份对住宅建筑追加的五千万卢布投资，较之住宅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即使不发表告示，随着经济的普遍发展而应增加的拨款也不会比这部分资金少多少。

提纲中一般地谈到必须反对酗酒，但丝毫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从本预算年度和以后的预算年度内缩减白酒项目的收入，并相应缩小酿酒工业的生产计划。实际上，各个年度的和五年的经济计划都完全是以按人口平均的白酒消费量的增加为基础的。

总之，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的第一个主要缺点在于：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面前没有对任

何一个现有的五年计划草案负责，没有对这些五年计划草案所依据的基本思想说一句话；它也没有作出任何指示，说明计划草案应向哪方面修改。同时，在中央委员（李可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古比雪夫、米高扬等）指导下制订出来的、迄今已经发表的各部门的五年计划草案，都同中央委员会在党代表大会开幕前提出的提纲的良好愿望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此，如果各主管部门准备的五年计划新草案意外地成了“超工业化”的草案，而且象某些其他意外的纪念“礼品”一样跟今天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多大根据，没有多大现实性，那是不足为奇的。

整个提纲是对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方面各种问题的含糊不清的愿望的堆砌，完全没有给党和工人阶级指出能不能够和用什么方法真正实现这些愿望。领导整个国家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完全有可能，就其作用来说也有责任作出能为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所了解、不容许经济机关作任何曲解的明确具体的指示，因此指示提纲的模糊不清和不肯定的缺点就更加不能容忍了。但是，这种模糊不清和不肯定的缺点决不是偶然的。目的在于掩盖其经常左右摇摆，丧失拟定和捍卫无产阶级政策以反抗小资产阶级压力的能力以及作为必然后果的堕落（即对非无产阶级的压力节节让步）等行为。

## 二 苏联的经济计划和阶级斗争

提纲的第二个缺点在于起草人忘记了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在新经济政策发展的现阶段上，每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问题，尤其是整个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向那些本来就已经顺利地发财致富的人提出“发财吧”的口号，乃是轻而易举的。这个口号永远会受到城乡新资产阶级代表们的拥护，而且会被他们

百分之百地加以实现。最后(延迟了两年多)中央委员会在“宣言”和提纲中都宣布了排挤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认真看待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它要求改变整个政策,重新配置力量,使所有的国家机关有新的方针。关于这一点必须说得很明确。要知道,无论富农或者贫农都没有忘记,中央委员会两年来所捍卫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提纲起草人所以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方针,是以为改变政策似乎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不克服一些阶级的猛烈反抗和动员另一些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

近几年来,富农越来越厉害地对农村中的贫农和城市中的国家政权施加压力,并迫使国家政权改变它的经济计划和核算。

富农、私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国家和党的官僚制度的许多环节相接合,乃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确凿无疑的、因而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萌芽。

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为了认真地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特别是为了认真地使富农交纳附加税,首先必须揭露富农,其次必须查清富农所隐瞒的不断增加的收入。

没有贫雇农本身的积极性,就不可能用适当的办法使贫雇农免除富农的剥削。但是,要想使贫雇农能够说出自己的话并且真正帮助压制富农,就必须使贫雇农不再害怕富农。必须使贫雇农在最后不至于说:我揭露了富农,苏维埃政权却抛弃了我;我又和富农面对面了,现在没有人怜悯我,我已经无路可走,到处都是失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认真组织贫农向富农作阶级斗争。谁不坚决参加这种斗争,不考虑斗争的后果,不制订斗争的计划,他只会徒然地提出“压制富农”的口号。结果只不过是煽动性的空话而已。

城市内压制耐普曼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近几年来，在城市中耐普曼的卢布显然对工人的戈比施加了压力。它在住宅问题上、在国家机关里、在市场上、在学校里、在剧院里以及在其他地方也都施加了压力。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仅仅向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税收人员发布新的指令是不够的。只有愚蠢的官僚主义者才会认为，全部问题仅在于此。如果不在城市里激发工人的积极性，不在苏维埃中恢复工人民主制，不使一切苏维埃机关对工人选民负起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责任，那么压制耐普曼是不可能的。对于工会，首先是对于党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不解决这些最重大的阶级斗争问题，就不能执行稍为令人满意的经济五年计划。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对这些问题却只字不提。

谁战胜谁的问题要由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一切阵地上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即由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哪一种发展道路来分配国民收入、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还是与新资产阶级平分秋色的斗争来解决。在我们这个小农和最小农以及一般小业主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内，最重要的过程有时是分散和隐蔽地进行的，以便后来一下子“突然”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的自发性首先表现在农村的分化和私商的滋长上。农村的上层分子以及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国家经济机关的各种环节越来越密切地交错在一起。国家经济机关往往帮助新资产阶级用统计数字的迷雾来掩饰他们为增加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进行的得心应手的斗争。

国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的商业机关，占去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大大超过总产值的十分之一。而且，私人资本在商业流转额中近几年已大大超过了五分之一，其绝对数字超过了每年五十亿。大量消费者所必需的产品，迄今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从私商手中

获得的。这里是私商获取利润和积累的主要来源。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所谓农业各部门间、各地区间和各种季节间的“差价”,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的差价(走私),都是暴利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正在进行高利贷盘剥,并利用国家公债发财致富。

私商的作用在工业方面也很大。即使私商的作用最近相对地说来有所下降,但绝对地说来却是上升的。注册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每年的产值是四亿。小手工业的产值是十八亿。同时,非国营工业的产值超过工业品总产值的五分之一,约为广大市场商品量的百分之四十。这种工业大都同私人资本有某种联系。商业资本和手工业企业资本采取各种各样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剥削广大手工业者,这些剥削方式是新资产阶级进行积累的非常重要的、同时又是日益增大的源泉。国家机关的影响正在增加,可是,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病态也在随着滋长。乡村中资本主义的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以及城市中资本主义的绝对增长,使得我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自觉性也在增长。这些分子甚至企图(并且常常不无成效地)使一部分同他们在工作上和生活中有接触的共产党员堕落。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助长党内右倾分子和国内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的资产阶级的互相结合。

中央委员会在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继续攻击反对派,即攻击这样一部分共产党员,他们近年来坚决主张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也就是坚决主张把国民收入实行适当的再分配,他们认为不这样(再分配)就不能更快地实行工业化、减少失业和消除商品荒。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有清醒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压制党内始终坚持这种行动纲领以反对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的那一翼。恰恰相



反，日益增长的富农和耐普曼正在推动现在的党领导去迫害反对派。他们通过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里的官僚们对党施加压力。“第三种势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分子）急不可耐地希望粉碎列宁主义反对派，以便实现其经济纲领：解放富农和耐普曼，并通过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来和外国资本结合，等等。

为了正确地分配国民收入，以保证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急剧地改变总的政策方针。

### 三 官方的乐观主义是对敌人的帮助

提纲对阶级力量对比的总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它近几年来一贯粉饰真相。提纲中说：

“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配置的观点来看，我们所进入的时期的特点是：虽然城乡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相对说来有所下降，绝对说来还可能有所增长，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有了增强，无产阶级和广大贫农和中农的联盟更加巩固。”

这种对情况的“祝词式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这种估计是靠缩小危险而作出的，因而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麻痹无产阶级的警觉性。

工人党员在读过上面引用的中央委员会提纲中的几行字以后，一定会惊奇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的力量“相对说来有所下降”，而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增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改变方针，就是说为什么还要提出压制资产阶级各阶层而且要加紧压制这样的新口号呢？事情不是恰恰相反吗？就是说，不是正因为富农的力量和富农对无产阶级的压力都有了增加才不得不压制富农（现在仍停留在口头上）吗？

事情完全不是中央委员会指示中所描写的那个样子。

第一、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十分错误地把城市的资本主义和农村的资本主义看成一样，肯定说农村资本主义也仅仅是绝对地说来有所发展。事实上，农村资本主义无论是绝对地说来或是相对地说来都有所增长，而且增长得非常迅速，以至于苏维埃国家和国营工业对富农的原料资源和出口资源的依赖与日俱增。

第二、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成分对无产阶级压力的增长，决不会在经济统计的精确算术方面有所改变。支持生机勃勃的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足以使国内的一切资产阶级分子感到自己有力量，何况他们还感到在背后有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大后援。

第三、必须估计到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力量。世界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加紧进攻使国内的资产阶级更加大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政策引起的我国对外（中国等等）的一系列失败，使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国内外敌人总力量的对比更加恶化。显然，国内的资产阶级不象世界的资产阶级那样大胆、公开和无耻地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施加压力。但是，这两种压力是互相联系，同时并行的。

由此可见，非无产阶级力量对工人阶级的压力由于中央委员会政策的错误而加剧，它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但是，承认这一点对于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派来说就等于承认：在苏联内部发展问题上同反对派进行的一切争论中，反对派都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为了挡住反对派处处都有生活事实作为根据的批评，便从反对派的纲领中抄袭了压制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请把反对派的纲领同“宣言”比较一下）。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打算掩盖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破产，但却彻底陷入混乱。每个工人都明白，在政策上这样急剧转变（现在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唯一合

理的解释，就是承认了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的力量有所加强的事实。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则绝望地企图解释说，“加紧”压制富农和耐普曼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和无产阶级比较之下富农和耐普曼“削弱了”。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对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麻痹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和警惕性，因而破坏了对新“转变”的信任，暴露了这种“转变”只是政客的迂回手段。

现在的制度企图取消列宁在世时就存在的工人民主制，甚至在这种制度下，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进攻也开始激发了工人阶级最先进阶层的积极性。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在10月17日游行示威时对反对派表示了同情，这证明了他们已感到，他们的阶级统治由此受到真正的威胁。正是应当从这里找到摆脱面临的~~政治~~困难的途径。

#### 四 “本来的情况”

最后，中央委员会提纲的另一个缺点在于：它完全没有说明目前的经济状况。如果不对近两年内经济领导工作的总结作出评价，不估计到这种领导工作的错误，就不可能作出在经济上有根据的经济计划。

1927年7月全会的决议写道：

“……从初步的材料来看，本年度一般的经济总结是好的，今年经济活动的开展总的说来是没有危机的，同时证明了有计划领导我国经济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这种说法已被生活中的事实所推翻。

去年，官方报纸一致肯定说：国内的商品荒即使没有彻底根

除，那么至少是大大缓和了。其所以需要这种商品荒消除的理论，是为了反驳反对派关于工业落后于居民和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论点。

事实上，商品荒并没有丝毫缓和下来，在1926—1927经济年度上半年市场上所以出现表面稳定的现象，是因为采取了人为地缩减需要的措施。结果，商品荒在下半年就又充分表现出来。

商品荒最明显的表现是：城市里有排队现象，而农村里工业品的供应十分不足。官方的乐观主义者宣布的商业人民委员部对市场自发势力取得的胜利已经完全告吹。

1925—1926年度，国家和合作社收购的粮食是五亿八千四百四十万普特。另外，私商和小贩收购的粮食约为三亿普特。1926—1927年度，这些收购者从市场上所收购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少些。

尽管1927—1928年度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市场上的情况从9月底就已开始显著恶化。收购量正在下降，最近一个时期的收购量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如果注意到私商和小贩的收购比去年少得多，那么，收购差额的百分比就更大。粮食收购总量的下降，一方面是城乡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直接证明，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有威胁的新困难的来源。出口计划遭到失败，从而进口计划也遭到失败，也就是说，工业化因而速度减低，这就是这种状况的明显后果（1926—1927年度第四季度的粮食出口量仅占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三）。此外，收购价格和消费价格之间也有空前的悬殊。

“1927年，消费者每买一普特黑麦粉要比收购者在农民那里买一普特黑麦多付出一卢布十四戈比。小麦的差价达二卢布五十七戈比。这种差价比革命前增加了一倍多。”<sup>①</sup>

<sup>①</sup> 《真理报》1927年7月。——作者注

现在的经济领导人是不是了解这些现象的意义呢？不，没有了解。有人说，1927年人们就会“吃得很多”（见李可夫在普罗霍罗夫克的报告），战争的危險在扰乱经济（如果是这样，那么战时又会怎么样呢？幸好不是这样），机关不好（这当然是真的）。这些解释没有超出市侩小业主的议论水平。要解释粮食市场所发生的困难，有三个事实是有决定意义的：商品的不足（工业落后），富农贮备的积累（农村分化），资金周转方面的政策不审慎（纸币发行过多）。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一定会计使国家发生经济危机。

官方公布的、因而大家都熟悉的数字（下面我们只用这种材料）说明了如下的资金周转状况。

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在整个1926—1927年度内要发行一亿五千万卢布的纸币。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发行了三亿二千八百万卢布的纸币，而第四季度的发行额不是计划规定的七千五百万卢布，其实是两亿卢布。

在我国商业信贷的发展方面，情况也有了显著的恶化。信贷系统的财源（债券发行和活期存款）在1925—1926年度比上年度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而在1926—1927年度就更加糟糕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预定要使存款额在1926—1927年度增加两亿五千万卢布，实际增加额却同这个数字相差很远，这就引起了信贷紧张、信贷计划无法完成以及各个经济部门信贷工作紊乱。

近几年的预算是不合实际的，实际上是有亏空的。1925—1926年度预算的实际赤字约为两亿卢布。1926—1927年度预算的初步结算表明，铁路运输方面有很大亏空，不得不从银行借款一亿卢布左右来弥补运输方面的预算赤字。这种情况就是第三季度滥发纸币的原因之一。1926—1927年度的预算过分庞大，引起了间接税、铁路运费和其他税收的提高，这样，按照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计

算,就使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五。

党关于必须收入超过支出,以在1925—1926年度和1926—1927年度分别筹足一亿一千八百万卢布和一亿卢布预算准备金的指令,根本没有实现。

反对派已经看到,尽管收成很好,困难仍有可能增大。

“从实际上说,丰收在缺乏工业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意味着要把更大数量的粮食私酿白酒并增加城市排队争购的现象。从政治上说,丰收就将意味着农民反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sup>①</sup>

生活完全证实,反对派的担心是对的。斯大林同志企图歪曲所提警告的精神,用廉价的嘲笑来搪塞。

斯大林同志说:

“看来托洛茨基同志认为我国工业化必须经过某种所谓‘歉收’来实现。”<sup>②</sup>

现在的困难,是党领导人所表现的轻率态度的必然后果。

所有这些在经济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和过失,引起了商品-货币市场的紊乱,严重地削弱了纸币的信誉。农民对黄金的需求有了增长,农村把纸币脱手的现象已很普遍。由于农民不能用纸币换到商品,因而他们少卖自己的产品,结果使粮食和原料采购量下降,价格上涨,出口缩减,全部经济陷于紊乱。

在估计我们的经济状况和编制五年经济计划时能不能撇开这些事实?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事实太明显地暴露了中央近两年来的政策,便向党掩盖这些事实,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就是在党的面前公然犯罪。

---

① 托洛茨基同志对李可夫同志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见《中央委员会1926年四月全会速记记录》第164页。——作者注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8页。——编者注

## 五 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和商品荒

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了谋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的生产。这是衡量我们成绩的基本历史标准。业经公布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在这方面所描绘的情况如何呢？

目前水平还很低的工业品个人平均消费量，五年内总共只增加百分之十二。1931年棉织品的消费量将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七，仅为美国1923年的五分之一；煤的消费量将为德国1926年的七分之一，将为美国1923年的十七分之一；铄铁的消费量将为德国1926年的四分之一弱，将为美国1923年的百分之八点七弱；电力的生产将为德国1926年的三分之一，为美国1923年的七分之一；纸张的消费量到五年计划末将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三。已经公布的比较“乐观”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五年计划本质上没有改变上述的对比关系，例如，1931—1932年度棉织品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仅为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八。十月革命以后经过十五年居然完全是这样的！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提出这种缩手缩脚、悲观透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这种按人口计算的消费指标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同时，商品荒则不断加剧。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计算1930—1931年度商品赤字约为四亿卢布。然而这个数字是错误地缩小了的。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算1930—1931年度商品赤字为十五亿卢布，而商业人民委员部计算为十二亿卢布。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迁就上面的“乐观”要求而编制的最新方案尽量人为地缩小商品赤字，但也不能使之少于八亿卢布。比

例失调的现象这样便加剧起来，预先就肯定失去一切降低价格的希望。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意图，应当通过增加目前工人房租一倍半即大约每年四亿卢布的办法来消灭比例失调的现象。由于富裕居民有过剩的购买力，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们，包括共产党的官员们就企图削减工人的实际工资来纠正这种情况。难以相信，这种达到市场平衡的方法是由工人国家的负责机关提出的！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真正的商品赤字不是四亿卢布，而是更大得多的数字：八亿至十五亿。很明显，产生这种结果的计划不应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而应称为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计划。

随同工业品巨大赤字而来的必然是：农村上层的粮食囤积量增加，农民分化日益加剧，粮食和出口的困难不断增加，整个的结果是，对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压力日益加剧。

有没有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呢？有。中央的提纲有没有指出这种出路呢？丝毫没有，中央的提纲关于比例失调这个最重要和最尖锐的问题说了什么？除了一般的空洞说明以外，没有别的。而在这些一般说明的掩护下，实际上在增加间接税，尤其是酒类税，也就是推广对于国民经济最有害的缓和商品荒的方法。

**间接税**是我国预算收入的主要部分（运输业和邮电人民委员部除外）。间接税的比重不断增大，在1924—1925年度间接税在税收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五十五，在1925—1926年度占百分之六十四，在1926—1927年度占百分之六十七（百分数系根据副财政人民委员莫·弗鲁姆金发表在1927年10月1日《经济生活报》上的文章中的数字；关税也包括在间接税中）。

间接税的大部分来自城市，首先是来自工人阶级。这可由下列关于消费税分配的數字来说明：农业人口1924—1925年度平均



每人缴一卢布四十六戈比，1925—1926年度为两卢布六十四戈比；非农业人口1924—1925年度平均每人缴十二卢布九十三戈比，1925—1926年度为十八卢布九十八戈比。消费税和收入的百分比，在1925—1926年度比1924—1925年度工人增加了零点八（从五增为五点八），职员增加了一点三（从五点四增为六点七），而工商企业主增加了零点一（从六点六增为六点七）。（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计算1924—1925年度和1925—1926年度各社会集团纳税负担的经验》的材料）。可见，各阶级之间国民收入的分配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这就是说，国家机关大部分的开支由仅占全国有劳动能力人口八分之一的工人阶级负担。是提出有系统地逐渐用直接税代替间接税的问题的时候了。对这个业已成熟的问题，中央的提纲一直保持沉默。

酒。在间接税中间，酒类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央的提纲中正式宣布“反对酗酒”。这个对今后五年的新指令如何反映在酿酒业的五年计划上呢？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和消费量增加如下：纺织品百分之四十一，套鞋百分之八十八，玻璃百分之九十六，铤铁百分之一百一十三，肥皂百分之一百二十一，酒类百分之二百二十七。这样，最必需的物品生产反而比安排得十分妥善的酒类生产增长得慢些。况且，近几年来酒类的消费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已从1924—1925年度的零点六瓶增加为1925—1926年度的二点九瓶，1926—1927年度的四点三瓶<sup>①</sup>。按照五年计划，酿酒业成了“主导的”工业部门。可见，提纲中宣布的反对酗酒的斗争暂时只能通过按人口平均的酒的消费量比目前增加两倍的办法来进行。

<sup>①</sup>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73页。——作者注

## 六 基本投资

如果苏维埃政权不采取坚决的阶级政策来消除各五年计划预定的商品荒空前尖锐的前景，那么这种前景就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制度会遭到十分严重的震荡。看来，在这种前景的面前，中央应当从不断增加工业投资的坚决政策中寻找出路。

可是，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工业的投资年复一年地几乎没有增加（1927—1928年度为十一亿四千二百万，1930—1931年度为十二亿五百万），而在国民经济的总投资中所占的百分比从三十六点四降为二十七点八<sup>①</sup>。根据五年计划纲要，国家预算中对工业的纯投资在这几年内从二亿二千万减到九千万！<sup>②</sup>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新数字规定了基本投资额有比较大的增长（1927—1928年度为十二亿五千万，1930—1931年度为十五亿八千八百万）。且不说党不知道这种提高了的数字的实在根据，必须指出，就是在这种方案中从外面对工业的投资也是增加得很不够的（从1927—1928年度的一亿四千七百万增为1930—1931年度的二亿一百万）。

和以前的情况一样，这些数字在实际上还要小些<sup>③</sup>。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也不妙，根据这个计划，从外面对工业的投资从1927—1928年度的二亿八千五百三十万卢布减为1931—1932年度的一亿零四百五十万卢布<sup>④</sup>。工业本

①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83页。——作者注

② 同上，第147页。——作者注

③ 试比较一下《1925—1926年度和1926—1927年度工业和预算的计算平衡》，载于《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综合生产财政计划》第224、229和381页。——作者注

④ 同上，第125页。——作者注

身的资金即利润和折旧费在规定的基本投资中占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不断增加,从百分之七十五增至百分之九十五点五<sup>①</sup>。这就是说,预算越来越不成其为加速工业化和把富农及耐普曼的资金投入工业的工具。

中央的提纲在五年计划的这个重要问题上说了些什么?提纲提出什么基本投资的数字了吗?提出为消除商品荒而必需的工业投资数字了吗?没有。提纲只是模糊地指出:

“在把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工业的重新分配的同时,增加工业内部的积累,就能完成足以保证生产的必要增长及其合理化的工业基本投资额。”

可见,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切实的、具体的答复。但是谈到“主导因素——工业”和巩固城乡结合时,不善于指出防止商品荒增至十亿至十五亿卢布这个庞大数字的具体办法,就等于使党盲目地遭受巨大的经济震荡。

然而我们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预见到上述商品荒的那个五年计划中,委员会肯定,可以而且应当只靠工人阶级来治疗这种病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丝毫不指望剥夺城市资产阶级的收入,因为:

“第一、革命后新出现的耐普曼资产阶级在我国城市居民中很单薄,因此就不可能成为预算收入的源泉,第二、这根本不是独立的源泉,因为,我们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收入征税,反正只能来自农民和工人的劳动创造。”<sup>②</sup>

总而言之,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从资本家的收入中吸取资金用于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没有指望的,因为,第一、资本家收入为数

---

① 《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综合生产财政计划》第124页。——作者注

②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28页。——作者注

不多,第二、这些收入是由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创造的!

另一方面,“农村”(应读为富农)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少,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由此就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

“只有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业的劳动(应读为工人阶级)才能是预算收入和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源泉。”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并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但是其中表现的“思想总和”却是十分典型地说明了现在的经济领导的观点。这个五年计划很明显,它为企图通过加紧压迫工人拚体力的办法来堵塞我国发展中的矛盾的行为找根据,同时采用各种借口来保存资本主义阶层的积累。但是中央的提纲提出了什么来反对这种政策呢?什么也没有。中央的提纲是否给了这些倾向以坚决的反击呢?没有。中央的提纲是否提出一个解决工业基本投资的根本问题的独立计划呢?没有。这样,提纲就有助于非无产阶级倾向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对比关系的基本问题上实际上不断取得胜利。

## 七 工人状况和向七小时工作日过渡

工资。关于今后五年内可能提高工资的数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有的各种五年计划作了不同的回答。中央的提纲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即使是大致的数字指示,而只限于一些无内容的一般辞句。

而且,在目前所编制的各种五年计划中,劳动问题提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五年计划应当规定大力提高工资,就是说在实际上不断地,而

到五年计划未能大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可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各种五年计划方案却不能保证工人生活真正得到重大的改善，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完全没有谈到劳动保护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那就更不用说了。根据这些计划，五年内名义工资按前一种方案增加百分之三十三，按后一种方案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实际工资按前一种方案增加约百分之五十，按后一种方案增加百分之四十。可见，工资提高得很不够，而这也要在很大程度上靠减低物价来实现。

可是，目前的政策（商品荒的政策）却使大大降低物价从而提高实际工资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五年计划第一年显然考虑不周就是一个证明。原规定 1927—1928 年度名义工资增加百分之六点五，而实际工资增加百分之十一至十二。可是近来物价的波动使得这种提高实际工资的规定不现实了。

同时，从 1926 年开始的实际工资大大下降的情况直到 1927 年初才得到克服。1926—1927 年度前两季度每月工资按莫斯科卢布计算在大工业中平均为三十卢布六十七戈比和三十卢布三十三戈比，而 1925 年秋季为二十九卢布六十八戈比。据初步计算，第三季度工资为三十一卢布六十二戈比。可见，今年的实际工资只略为超过 1925 年秋季的水平。不言而喻，个别类型的工人，个别地区，首先是首都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资和一般物质生活水平无疑高于上述的平均水平。可是，另一方面，广大工人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比这些平均数字还要低得多。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在增加，工人体力的负担在加重。失业工人直接或间接地靠工人预算维持生活。现在实行的生产合理化必然使工人阶级状况恶化，因为没有同时大力发展工业、运输业等，以吸收被解雇的工人。普通工、季节工、女工和童工的物质生活状况尤其困难。

至于工人的居住条件，现在平均每个工人为九平方俄尺<sup>①</sup>。在城市中工人的居住面积比任何别的阶层都要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单是这一事实就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他阶级在物质生活上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日益加大。不仅如此，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到1931年年底住宅建设的投资约为七亿卢布，这样，一般居住面积的标准将比1926年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规定投资约十亿卢布，这样，五年之后仅能保持现在工人的居住标准。中央的提纲既不采纳这个草案，也不把它当作悲观的草案加以否定，指出靠什么来增加住宅建设，而只是在这个迫切的问题上表示增加工人居住面积的一般希望。至于在现有的工业化速度下怎样达到这点，提纲则只字不提。

更不能容许的是，提纲回避了失业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关于1927年失业现象的预言已经失败了。今年4月登记的失业者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五年计划说的一百一十三万一千人，而是一百四十七万八千人，而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1927年年初失业者的人数共为二百二十七万五千人，其中包括六十万季节工<sup>②</sup>。根据斯特卢米林同志的计算，在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方案中，向农村移民，如果农业吸收八百万工人和流入城市三百万人的话，“顶多也不会超过现在的数量”<sup>③</sup>。由此可见，即使为了保持现在城乡失业者的数量，也应当比现在所有的五年计划的方案更快更多地发展工业。

保险基金会为失业者服务的工作引起了失业者完全公正的责备。津贴的平均数约为战前的五个卢布。只有约百分之二十的失业的工会会员获得这种补助。

---

① 国家计划委员会1926—1927年度控制数字。——作者注

②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第93页。——作者注

③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6页。——作者注

城市中两百万失业工人和农村中十亿普特未动用的粮食储存，这就是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那些矛盾的最鲜明的情况，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在领导的错误所积累下来的。

什么是国家经济中的失业？

这首先是国家缺乏新的生产资金，缺乏新的资本。

什么是十亿普特未经动用的粮食储存？

这是苏维埃社会的死资本，它主要掌握在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手中。从扣除保险储备以后剩下的五亿普特中拿出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来，就能够使我们获得几亿卢布的新的生产资金（按国内价格计算）。这一大笔新资本就能够使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就业，把几亿卢布的追加商品投入市场，大大推进整个经济。反对派一分钟也不犹豫地愿意担负执行这个计划的责任，把这个计划作为自己的摆脱危机的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则束手无策地踏步不前，也注定要踏步不前，他们坚持自己的错误，使本来就很困难的状况更加恶化。把束手无策踏步不前当作是极其“谨慎”的那种政策是没有丝毫用处的！

\* \* \*

反对派在自己的政纲中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思想作为出发点：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必须使工人阶级根据切身的经验逐年逐月地实际上感觉和看到自己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自己在各个建设和创造活动部门中的作用不断增长。因此反对派反对通过压榨工人的办法来厉行节约或实行合理化。因此反对派要求更坚决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和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必要前提。

反对派的政纲说明了实际改善工人状况的措施的纲领。

反对派从自己的这个纲领出发，在讨论纪念宣言时建议关于工人问题的部分要以如下的实际建议为基础：

1. 根除任何延长八小时工作日的企图。不许滥收临时工和使常年工人变为季节工。取消在有害健康的车间违背原先规定而延长工作日的作法。

2. 承认最近的任务是至少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地提高工资。

3. 铲除合理化方面的官僚主义毛病。合理化应当和充分发展工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密切联系起来,和反对浪费工人阶级尤其是浪费熟练工人的生产力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4. 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失业后果;增加失业者、首先是失业工人的津贴;延长发给失业者津贴的期限一至一年半;坚决反对节约保险费;制定广泛考虑的多年社会工作计划,等等。

5. 不断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坚决执行房租问题上的阶级政策。不得把被精简和解雇的工人赶出现在的住所。

6. 集体合同应当在工人大会上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讨论。

7. 消除不断修改定额和计件工资额的作法。

8. 增加对安全设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投资。

9. 审查对劳动法令的一切说明,废除说明中导致劳动条件恶化的部分。

10. 在女工方面:争取同工同酬。

11. 确认学徒不发工资的作法是不能容许的。实际降低童工的工资是不能容许的。

12. 厉行节约决不应损害工人的生活利益。必须给工人们恢复被取消的“小事”(托儿所、电车票、延长休假期等等)。

13. 加强对企业工人的医疗工作(诊疗所、医院等等)。

14. 在工人居住区增加工人子弟学校……

反对派是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第二次会



议的共产党党组会议上(1927年10月15日)提出这些建议的,在这次会议上初次讨论了宣言的问题。

在这些提议中我们专门写了一条:

“在此以后,再实际改革工作日以进一步把工作日缩短到七小时。”

这些就是反对派对于改善工人状况问题的回答。

中央的多数派在这一点上始终指责反对派是煽动人心,维护无产阶级的“行会”利益,总是提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

不用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赞成缩短工作日。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当从八小时工作日改为七小时和六小时工作日。这是无可争辩的。如果是实际地认真地提出实行七小时工作日的问题,那么我们每个人当然都会认为有责任帮助贯彻执行。但是这个问题宣言提得极不明确。宣言实际上对这一点说了些什么呢?

“对于从事生产的工厂工人,保证在最近几年从八小时工作日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工资不予减少,为此责成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最多不超过一年,根据工厂企业重新装备和合理化进度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着手在个别工业部门逐步实行这项决定。”

总之,最多不超过一年,“着手”(!)从个别工业部门(没有说明哪些部门)开始“逐步”实行,这一切要看合理化发展、装备改善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而定。总之,“在最近几(多少?)年”保证实行七小时工作日。没有任何明确果断的意见。

在我们经济机关的五年计划内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无论在党或工会系统都没有事先和工人们进行讨论。如果这不是一些空话,不是代表大会前送的“红鸡蛋”,如果不会降低工资,等等,每一个工人、包括我们所有人当然都赞成七小时工作日。

两年来有人到处无中生有地叫喊说我们“煽动人心”,正是因

为我们提出工资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对此向我们大喊大叫地说，“钱从哪里来”。可是实行七小时工作日的钱又从哪里来？如果实行七小时工作日而不减少工人的工资，那么工业和运输业为此每年要多开支五亿。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些钱，那么就应当问一问工人自己：这些钱首先用在哪里，是用来提高工资，是用来建筑住宅，还是用来实行七小时工作日？中央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工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里不是外交秘密问题，不是和外国关系问题，可以用保密作借口。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开始压制富农、耐普曼、官僚主义者，如果认真修改预算，是可以找到钱的。

\* \* \*

现在的多数派的领导人就在一年以前是怎样考虑七小时工作日问题的，最好由布哈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 1926年 11月 2日会议上的发言来说明。

布哈林同志用下面这段话描绘了反对派的路线：

“我们怎么会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呢？要知道我们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我们要求免除百分之四十的贫农的税额，我们不想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sup>113</sup>。”

布哈林同志对此反驳道：

“请问……如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们有一个纯议会的资产阶级派别？（斯大林：“孟什维主义的派别。”）我且不说孟什维主义的，如果甚至有一个资产阶级派别？你们以为他们不会极力表示爱护工人？是的，他们是会赞成七小时工作日的……他们为什么说这种话？因为他们要依靠群众撵走我们。以后他们就会拿这种七小时工作日给他们瞧瞧！……”

托洛茨基同志（就反对派的观点）说道：‘这里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但这只是说明，你们不懂得政治力量发展的主要奥

妙。”<sup>①</sup>

这一番绝妙的话好象是专门为了帮助党了解布哈林充当其理论家的那个派别的政治发展“奥妙”而说的。在一年以前布哈林就提出七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作为进行社会煽动的最鲜明的范例。他不仅通过孟什维主义派别的口，而且通过纯粹资产阶级派别的口说出了这个口号。在他想来，某个集团可能进行这种公开的冒险，以便夺取（或者可能是掌握？）政权，然后再让工人们看看（照布哈林的说法：给他们瞧瞧），七小时工作日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可见，布哈林自己不得已而利用七小时工作日进行奥妙的煽动的前一年，就很明确而具体地说穿了这个奥妙。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布哈林常用的“形势变化”这一借口也帮不上忙了，形势变化使一两年前所谓反对派的煽动变成了现实。目前七小时工作日并没有实现：只是规定在“最近几年”实行。如果说就在一年以前布哈林还把七小时工作日口号当作恶意煽动的典型例子，那么现在应当作出结论说，形势确实急剧改变了，不过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党的政治方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醒和反对派的成长迫使斯大林的派别除了采用不负责任的煽动人心的政策之外又加上了迫害政策。

无论如何，党有权利说：

或者中央昨天说没有钱来更迅速地提高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对的；这样，宣布七小时工作日就是极端轻率的行为；

或者七小时工作日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指责反对派要求更有计划和更坚决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煽动人心，这是十分荒谬的。

只有纠正党的整个路线，才能加速工业化，改善工人群众的生

---

① 《速记记录》第 592—593 页。——作者注

活水平，为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准备条件。

## 八 我们困难的根源

我们经济困难的总的、基本的原因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近年来工业发展得太慢，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结果城市缺乏商品来交换农产品。错误的政治路线，尤其是错误的税收政策使富农易于把大部分粮食等储备集中在自己手中。这种比例失调的现象一直是寄生分子滋长、投机倒把、资本主义阶层获取巨额利润的根源。

同时，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也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增长。因此，国营经济在原料、出口、粮食储备方面日益依赖富农资本主义因素。

富农分子依靠自己日益加强的经济阵地和不断增多的储备，和城市中资本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的经济计划，富农实际上对于出口，从而对于基本投资和工业化的速度规定了限度，也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规定了限度。

出口发展缓慢，生产资料进口不足，缺乏资金修建新工厂、扩建和改建旧工厂，城乡失业人数不断增加，都和这些基本现象有直接的联系。

结果，在十周年末，我们不仅取得许多经济成就，例如，国营工业产量不断增加，基本投资和新建设有所增长，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绝对和相对增长的条件下城乡商品交流有所增加，中农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同时许多具有社会阶级性质的困难也无疑地加重了。

反对派要求更坚决一贯地在税收上压制富农和私商，压缩惊人的官僚机构，通过这些办法更迅速地发展工业。中央的多数派

指责反对派有“超工业化主义”，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多数派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的，想侥幸成功。现在的困难是党在领导工作中实行尾巴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

今年年初，农村中主要是富农和富裕农民手中的粮食实物储存达八亿至九亿普特。这些超过了必要储备量的储存还在继续迅速增长，到本农业年度末还要增加二亿至三亿普特，一共将超过十亿。这个事实是和农村的商品交流受到阻塞的危险标志，结果必然是播种面积停止增加。我们在这里面临着工业发展不够、不能保证提供用以换取农村粮食储存的物资的后果。工业发展缓慢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我们出口不足以及富农和富裕农民阶层破坏我们进出口计划的问题，是和农村中粮食储存积累的现象密切联系着的。加米涅夫同志在1925年秋季完全正确地解释了粮食出口计划没有完成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富农掌握了粮食储存，从而破坏了这个计划。当时对他群起而攻之，专门提出统计表予以“驳斥”。可是现在，农村中积存的粮食我们采购工作人员无法弄到，这种情况使得加米涅夫同志的论点变成每个经济工作人员的常识。不仅如此，接任他的职位的米高扬同志今年碰到了破坏最初的粮食出口计划的情况，碰上了破坏本来就大为削减了的进口计划的前景。这第二次“失算”更不可以原谅，因为这是在第一次“失算”之后两年，即在农村分化的后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发生的。米高扬同志在《真理报》第二五二号上的文章中指出，“我国对外贸易额是确定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限度（界限）”。这些限度由谁规定？对外贸易额一部分是由我国工业出口数字（占1925—1926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八）确定的，而主要是由农业出口量（占1925—1926年度整个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二）确定的。由于我们首先是从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取得供出口的多余粮食和原料，由于正是这些阶层掌

握最多的粮食，所以看来首先是富农和富裕农民通过出口来“调节”我们。对外贸易被我们看作是国营经济最重要经济命脉之一，这是正确的。我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使这个经济命脉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其所以重要，因为我们主要是农业国）转到我们阶级敌人手中。在这里，党和工人阶级充分看到了中央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在“向左开火”的口号下执行的那个政策的最危险的后果之一。现在每个普通工人都了解这个致命的后果了。这个后果就是：在有着十亿普特的实物储存的情况下削减了出口，进口最必需的原料，包括生产消费品的纺织工业、羊毛加工工业、皮革业所必需的原料有了困难，进口最必需的机器装备有了困难，在结算国外债务方面发生了困难，城乡商品荒有了发展。

中央近两年来经济政策的客观意义在于：在这个政策的庇护下，资本主义成分的阵地（首先是在农业中）大为加强，资本主义成分现在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计划公然施加压力，破坏这些计划。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这一点（见上面引用的米高扬同志的话以及他那篇文章的其他地方）。

只有仍然想做瞎子的人才会看不见，上述困难也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

这种局面不能长久拖下去，出路只有两条。

第一条出路就是反对派提出的向农村百分之十的富农和富裕农户征借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除了满足城市需要之外供应出口，用换得的外汇再多购买些工业原料和装备，从而在国内生产更多的商品以减少农村的商品荒和城市的粮食供应混乱。

谁拒绝走这条道路，谁就只有背离对外贸易垄断制，把外国资本吸引到进出口方面来，为农村输入外国商品，输出积存的粮食。中央现在的多数派由于在一切尖锐问题上惯于实行踏步不前的政

策，根本不能及时地找到不左不右的道路来解决问题。但是犹豫不决本身就会导致匆匆忙忙地、惊慌失措地和必然地在右倾政策的道路上作出决定。

反对派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仿佛中央决定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承认旧时的全部外债等等。废除或者“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思想从来没有在会议上或报刊上正式宣布过。但是在各主管部门的办公室里，在贸易工作人员、包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内的狭小圈子里，越来越公开承认“改革”意即“放宽”对外贸易制度是增加农业出口和发展全国生产力（当然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必要条件。中央政策的总方向及其客观后果比任何口头保证都更有力。反对派现在警告党防止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的向右转。

中央的提纲是怎样回答这些有关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的呢？没有什么回答！中央的提纲在回答所有困难问题时是这么说的：

“消除上述比例失调现象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在大力推行工业合理化和扩大工业的基础上，即在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的基础上减低工业品的成本；在农村中发展费劳力的作物和实行农业本身的工业化（首先通过发展农产品初步加工工业）；尽量吸收小额积蓄（内部公债、储蓄所、吸收合作社股金、建立合作工厂）并把它们和信贷制度联系起来。”

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所反映出来的计划工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模糊的指示？

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规定在工业方面降低出厂价格百分之十六点八，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五十点五<sup>①</sup>。最高国民

---

①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 155 页。——作者注

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规定降低工业品价格百分之十七点五<sup>①</sup>，提高生产率百分之五十点七<sup>②</sup>。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尚未公布的五年计划新方案规定降低出厂价格百分之二十二，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六十六。

在降低价格的同时，各种五年计划方案规定降低成本如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规定百分之十七点七<sup>③</sup>，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规定百分之十六点五<sup>④</sup>，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新方案规定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所有这些五年计划方案都认为，农业方面的价格仍然不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按人口平均计算提高百分之十五<sup>⑤</sup>。

对于这些规定首先应该说，近两年来降低成本的经验丝毫不能令人指望这个任务在现在的领导下能够解决。1925—1926年度曾预定降低成本百分之五至七，实际上成本却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七。

关于在1926—1927年度降低工业品成本百分之五的指示仍然没有实现。

在1926—1927年度上半年度，工业品成本不仅没有按照计划规定有所降低，而且甚至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二。下半年度的结果未必会有多大变化。在最好的情况下，全年也只能降低百分之一点五至二。

虽然遭到这样的挫折，工业部门通过降低价格的运动，仍降低了出厂价格约百分之五。结果却大大减少了工业的积累。合作社

---

①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第648页。——作者注

② 同上，第102页。——作者注

③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55页。——作者注

④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第407页。——作者注

⑤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2页。——作者注



和国营商业也不是靠节约和精简机构，而主要是靠减少积累来降低价格的。

这就是说，整个降低价格的运动是建立在纯粹行政压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套深思熟虑的经济措施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绕着圈子表面上降低价格的做法非常普遍。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提到官方价格指数时（在9月行情评论中）本来应当自己承认：

“工业品价格受到降低价格和禁止提高脱销商品价格的政策的影响，并不反映市场上工业品供求严重脱节的情况。”<sup>①</sup>

这是用官样文章遮遮盖盖地承认，广大消费者实际上感觉不到物价的真正降低。

同时，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在1927年比1926年秋季更加严重了。截至1927年7月1日为止，我们的批发价格比世界批发价格高一倍半，零售价格就更不用说了，其差距更大<sup>②</sup>。

降低成本、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是苏维埃政权可以而且应当执行的唯一政策。但是中央的提纲又忘记了下列小事：我国经济发展的矛盾，苏联的阶级形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利益的冲突。

很明显，降低成本和价格的先决条件首先是改建旧工厂和建设新工厂。可是中央的提纲却极力回避下列问题：为此必须事先把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把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从资本主义成分转入社会主义成分，从富农经济转入国营工业，把耐普曼的

---

① 《经济生活报》1927年10月27日。——作者注

② 《财政与国民经济》第42期。——作者注

积累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作为提高工人阶级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反对派早就主张采取这种措施，而我们却毫无希望地拖延下来，借口是如果触动富农和富裕农民，中农就会抱怨。

中央的提纲闭口不谈这点，必然把解决这个任务的重担压在工人阶级肩上。

实际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新方案规定，降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更严格的劳动定额，靠减少额外的工资开支（取消企业对公共事业、托儿所、休养所等等的开支），靠减少社会保险经费。

此外，中央的提纲不愿了解，并且根本不向党说明，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将不仅意味着扩大与农村的商品交流和缓和商品荒（这是必要和有益的），不仅意味着巩固和贫农及中农的结合并加强他们的经济（这是巨大的成就），而且也必然意味着给农村富农上层的积累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富农将能够用自己的储存换取更多的工业品，从而更加速自己的积累即加强对中农和贫农施加压力的工具，增加自己的比重。如果中央的提纲清楚这一点，就应当在提出降低成本和价格的政策的同时，规定一系列防止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利用这个正确政策的措施。

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应当做些什么呢？

应当尽力不断降低工业品成本，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这是无容争辩的。但仅仅这样还不能解决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时还必须在所有五年计划中规定，不断增加投入工业化的从殷实农户、富裕农户、尤其是富农的积累中取得的数以亿计的卢布，并且压制私商和“压缩”官僚主义。否则，在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条件下，发展工业的重担就会落到工人阶级肩上。此外，无论在任何五年计划方案中还是在中央的提纲中都甚至没有提出这

样的问题：由于农产品将和价格不断降低的工业品交换等等原因而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农村富裕农民的大量积累将投向何处。

## 九 资金从哪里来？

为了采取更大胆和更革命的办法来解决真正工业化和更快提高群众文化的任务，即决定社会主义专政命运的任务，所需资金从哪里来，反对派的回答是：

资金的基本源泉就是用正确利用预算、信贷和价格的办法再分配国民收入。资金的补充源泉应当是正确利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

1. 最近五年内每年从预算中投到工业化方面的纯投资可以而且应当达到五亿至十亿。

2. 必须通过税收系统：（1）实际对私营企业主各种超额利润征税不少于一亿五千万至两亿卢布，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有五千万；（2）为了增加出口，从约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十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的实物储存中征借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使我们除了满足城市需要之外，还能够从国外输入更多的工业原料和装备。

3. 在实际执行不断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以及缩小批发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的坚决政策时，应首先降低工人和农民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不要象现在这样使本来很低的质量更加下降），使物价的降低不影响国营工业必要的积累，主要办法就是增加商品、降低成本、减少杂费、精简官僚机构等等。

降低出厂价格的政策要更适合市场条件、更灵活、更加分别对待，即考虑到市场上每一件商品的状况，这样就可以使得现在完全

滋养私人资本和商业寄生集团的大量资金掌握在国营工业手中。

4. 根据斯大林和李可夫去年的号召应当每年提供三亿至四亿卢布的节约制度，实际上取得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厉行节约是一个阶级政策问题，它只有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才能实现。为此工人们应当大胆施加压力。每年减少非生产开支四亿卢布是完全可能的。

5. 善于利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借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合同等，就能够多提供一部分资金，而主要的是能够非常合理地利用我们自己的资金，通过新技术发挥其作用，加速我们发展的整个进程，从而巩固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独立。

6. 关于自下而上挑选人材以及关于他们之间不正确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财政问题。挑选得越糟糕，就越需要资金。官僚制度阻碍正确的挑选和正确的关系。

7. 经济领导的尾巴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损失千万卢布作为考虑不周、不协调、舍本逐末、行动落后的代价。据不完整的统计，单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考虑不周和缺乏计划所引起的我们工业、商业及其他企业人员的流动不定，就使国家经济损失了约五亿卢布<sup>①</sup>。

8. 来自税收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信贷应当成为国民收入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重新分配的日益重要的杠杆，这首先要求稳定通货和健全货币流通。

9. 实行更坚定的缩小投机和高利贷活动范围的阶级经济政策，会便于国家机关和信贷机关更顺利地动员私人积累，比现在更广泛得多地通过长期信贷的形式对工业进行投资。

10. 减少数额巨大的流通费用(占国民收入百分之十九，战前

<sup>①</sup> 《工商业报》1927年8月2日第173号。——作者注

则占百分之八点五)，加速国家资金的周转，这也是取得大量资金的源泉。

11. 实行酒类国家专卖制最初是作为试验，是为了把其大部分收入用于工业化事业，首先是用于发展冶金工业。实际上，酒类国家专卖制使工业化事业完全遭到了损害。应当承认这个试验是失败的。在苏维埃制度下，酒类国家专卖制不仅象沙皇制度下那样对于私人经济是一个损失，而且主要对于国营经济是一个损失。旷工增加、工作粗枝大叶、废品增加、机器损坏、工伤事故增多、火灾、斗殴、残废等等使我们每年损失几亿卢布。工业由于酒类所造成的亏损不比预算上的酒类收入少些，它比工业本身从预算中所得到的数目多好几倍。在最短期间(二至三年内)停止酒类国家专卖制自然就会增加工业化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这就是关于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的答案。说资源缺乏直接影响工业化速度，这是不对的。资金不多，但是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

\* \* \*

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方案应当坚决推翻，应当受到谴责，这些方案和“变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任务根本不相适应。

必须改变各阶级纳税负担的分配，加重富农和耐普曼的负担，减轻工人和贫农的负担。缩减间接税的比重。

保证货币绝对稳定。要巩固纸币，一方面需要减低物价，另一方面需要没有预算赤字。不容许利用发行纸币来弥补预算赤字。

应当有一个有严格目的、没有赤字、不容许任何多余和偶然项目的预算。

1927—1928年度的预算应当大大增加对国防(主要是军事工业)、一般工业、电气化、运输、住宅建设和农业集体化设施的投资。

坚决反击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行为。采取在加强经济的技术力量和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电气化和合理化的坚定方针。

## 十 两条道路

我国有两种互相排斥的基本立场。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种是力图发展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以及跟着他们走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阵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商品生产者的私人积极性和私人利益上面。这个阵营依靠“殷实的农民”，想使合作社、工业和对外贸易能为他们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当指望国家预算，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不应当破坏资本主义农场积累的利益。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在日益强大的小资产者看来意味着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精力。争取降低价格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意味着削减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以利于商业资本。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小资产者看来意味着分散工业，削弱计划原则，把重工业推到次要地位，就是说，仍得迁就殷实的农民，可望最近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道路。国内这股强大的潮流对我们党的某些人也有影响。

这些人的纲领在今天看来可能是怎样的呢？可以大胆地说，这个纲领大致会包括下列几点：

第一、削减已经制定的最低计划的基本投资；

第二、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重新分配这些已经削减的资金，多照顾消费品生产；

第三、从国外进口制成品；

第四、在信贷上压制工业；

第五、削减国家预算对工业的投资。

这个纲领将受到各种色彩的康德拉提也夫之流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个纲领要比布哈林的向富农及一般资本主义成分“加强进攻”更“具有生命力”。如果实行这个纲领，就等于使现在的困难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得到再生产，就等于施展更加右倾的新手腕，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新的打击。

无产阶级的道路可用列宁下面的话说明：“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反抗，保证自己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完全巩固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sup>①</sup>应当从这个角度着眼来规定党的全部政策（预算、税收、工业、农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等等）。反对派的基本方针就是如此。这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党领导的路线近两年来就是走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越来越走近第一种立场），走了短时期的左倾弯路，而深入了右倾弯路。无论是报纸上突然宣布的“急剧转变”或是中央给代表大会的提纲，都丝毫不能保证党在今后有一个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恰恰相反，口头上虽然宣传“转变”，但仍然象以前一样向左开火，而不是向右开火，甚至更加猛烈。

---

<sup>①</sup>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85页。——编者注

不过,虽然环境由于现在领导的严重错误而极其紧张,事情还是可以挽救的。应当沿列宁指出的方向改变党的领导的路线,而且要急剧改变。

为了组织正确分配国民收入的工作,以利于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

(1)谴责“向左开火”的口号;

(2)了解并宣布,危险来自右面,即来自日益增长的城乡资产阶级以及党内外支持他们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和半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

(3)不要向党隐瞒任何现有的困难;

(4)停止迫害号召全党对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危险和官僚危险进行无产阶级反击的反对派,向全党发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纲。

写于1927年11月。译自《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



#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摘录)

## ——对根本原则的批判

### · 编者按语 ·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和《现在怎么办?》两篇文章是托洛茨基于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写的,曾收入《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这里选了《纲领草案》第一部分的第五、六、七、八、九节和给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信《现在怎么办?》的第四、五、六、七、八、九节。

1927年底,托洛茨基及其党徒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共产国际也撤销了托洛茨基的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但是,托洛茨基死不悔改,在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前夕,又抛出这两篇文章,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发动猖狂进攻。

文章全面地攻击共产国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批准的纲领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路线,系统地阐述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谬论。托洛茨基在文章中攻击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是“民族改良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他认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以孤立、发展经济本身作为目标而和世界经济断绝联系”的。托洛茨基认为,只有等待国际革命,才能摆脱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也只有先进国家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苏联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托洛茨基在总结经验以制定新的战略方针的幌子下，攻击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的方针，把一些国家革命的失败都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

托洛茨基在《现在怎么办？》这封信中集中攻击和诬蔑联共（布）中央的路线，诽谤党的机关已经“官僚化”、“热月化”等等。

托洛茨基的这两篇文章，曾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散发，受到代表大会的坚决驳斥。

## 一 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

第六次代表大会议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纲领。纲领的性质可能长期决定并确立国际的面貌。纲领的重要性主要并不在于它表述一般理论概念的方式（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概括成篇”的问题，也就是把已经肯定获得的真理和概念用简洁的方式加以阐述的问题）；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是要为过去一个时期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取得的经验拟定一张损益表，特别是为最近充满着事件和错误的五年的革命斗争拟定一张损益表。共产国际未来几年的命运——从这个词的本意来说——决定于纲领对这些事件、错误和争论如何加以阐述并作出判断。

.....

### 5. 党的理论传统

纲领草案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话<sup>①</sup>里面故意使用“社会主义在

一个国家的胜利”的说法，以便和列宁在 1915 年写的那篇文章在表面上和纯粹文字上有相似之处。在讨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列宁那篇文章曾经被残酷地——且不说是罪恶地——加以滥用。草案在其他方面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引用”列宁的话来当作证明。这就是科学的“草案的方法”。

草案完全不顾列宁所说、所写和所做的一切，不顾党的纲领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纲领，不顾十月革命时期当这个问题被明确地（多么明确地！）提出时党的全体领导人毫无例外地表示的意见，不顾纲领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在 1924 年以前并包括 1924 年在内所讲的话。在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在列宁著作的宝库中，它一共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一段引自 1915 年写的论欧洲联邦的文章，另一段引自写于 1923 年而在列宁去世时还未写完的论合作制的文章——来替 1924 年底或 1925 年初为了进行反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紧急需要而创造的民族社会主义辩解。一切和这两段（每段不过几行）的引文发生矛盾的东西——整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被干脆抛在一边。这两段人为地摘引出来并且明显地和拙劣地加以错误解释的引文，被拿来当作新的、纯粹是修正主义的、从其政治后果来说又是具有无限影响的理论的基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做法，是力图用经院哲学和诡辩的手法把一种和本体绝不相容的树枝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的树干上去。如果嫁接成功，它将不可挽救地毒害和摧毁整棵树。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不是第一次）宣称：“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还在 1915 年就由

---

① 指纲领草案中以下一段话：“因此，决不能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看成是单一的、普遍同时发生的行动。因此，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是可能的。”——编者注

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sup>①</sup>

这就是承认在1915年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的问题上并不敢侵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整个传统。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但是，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本人过去所说的话对照起来，让我们看看列宁在1915年“第一次”说了些什么。

列宁在1915年是这样说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sup>②</sup>

列宁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只是：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的；而正由于这个事实，这个国家将和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对立的地位。无产阶级的国家要能够抵抗攻击并主动采取革命攻势，首先必须“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也就是说，组织从资本家手中接管过来的工厂的生产。这就是列宁所讲的全部意思。事实表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首先在俄国取得；第一个工人国家为了保卫自己，反对世界干涉，首先不得不“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或者建立“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托拉斯。由此可见，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并不是建立——更不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幻想，而是指某种现实得多的状况，即通过十月革命已经在我国存在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编者注

第一个时期所取得的东西。

这或许还需要加以证明吧？证明是如此之多，唯一的困难在于如何挑选最好的证明。

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文（1918年1月7日）中谈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sup>①</sup>。

同年——1918年——年初，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篇针对布哈林而写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sup>②</sup>

列宁怎么能够为“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确定一个如此短促的时期呢？他的这些话包含着什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内容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918年4月29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报告中所说的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立刻不同了。当时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sup>③</sup>

1919年12月3日，列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代表大会上甚至说得更加坦率。他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sup>④</sup>

列宁的这两种说法究竟是哪一种对呢？是说十二个月以内保证“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对，还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制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10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② 同上，第540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编者注

④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页。——编者注

度”的任务不是交给我们的儿子而是交给我们的孙子对呢？

列宁的两种说法都对，因为他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无法相提并论的阶段。

在第一种情况下，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并不是指一年以内甚至“几个月”以内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并不是阶级将被消灭，城乡矛盾将被消灭；他指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工厂企业将恢复生产，从而保证有可能实行城乡产品的交换。他预计的时间是很短促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理解他所想象的前景的可靠的钥匙。

当然，1918年初规定的这个时间，即使就这个起码的任务来说也是太短促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加以嘲笑的正是这种属于纯粹实践范围的“计算错误”。当时他说：“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sup>①</sup>但是，“我们对总的前途的看法还是正确的。我们一刻也不相信可以在十二个月以内，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把完成这个主要的最终目的的任务——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交给了整整三代人——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子，还有我们的孙子。

列宁在1915年的文章中谈到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指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我们在苏联现在已经实现的最起码的任务，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否则人们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认为按照列宁的意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把革命战争“推迟”到第三代去进行。

就1915年那段引文来说，这就是新理论的主要堡垒的悲惨处境。然而更悲惨的是：列宁写这段话时并不是指俄国而言。他是在谈欧洲的情况，和俄国加以比较。不仅从前面引用的专谈欧洲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59页。——编者注

联邦问题的文章的内容，而且从列宁当时的整个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几个月以后，在1915年11月20日，列宁专门谈到俄国的问题。他说：

“无产阶级的任务显然是由这种实际情况产生的。对君主制进行英勇忘我的革命斗争（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的口号，即“三条鲸鱼”），也就是争取领导一切民主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斗争。同时还要与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欧洲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争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军事危机加强了推动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左倾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就是俄国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客观基础。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还在大战以前，各先进国家的一切有威信的社会党人就承认了这一点。”<sup>①</sup>

由此可知，在1915年，列宁明明讲的是俄国的民主革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顺便地、仿佛谈的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似地提到西欧——以别于俄国并和俄国作为对比——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是，新理论的作者们，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对直截了当地谈到俄国的许多段话中的这一段话硬是不予理会，正如他们不理睬其他几百段话一样，正如他们不理睬列宁的全部著作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不但不注意这一段话，而且把另一段谈西欧问题的话硬扯过来，给它赋予一种它不可能包含也没有包含的意义，把这种附加的意义套在和这段话无关的俄国头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新理论。

在十月革命前夕的那个时期，列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呢？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离开瑞士的时候，给瑞士工人写了一封信。他说：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7—398页。——编者注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由于贵族地主还保持着大量土地，由于有了1905年的经验，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而把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sup>①</sup>

这个问题的一切因素都包括在这短短几行话里。如果象他们现在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认为列宁在1915年，在那个战争和反动的时期，就相信俄国无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在完成这项工作以后就可以向各个资产阶级国家宣战，那么在1917年初，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怎么能够这样断然地谈到落后的农民的俄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一个人至少要讲点道理，说得干脆一些，至少要对列宁表示一点尊敬。

再引更多的话就是多余的了。如果要全面概括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为条件所表达的经济政治观点，就需要另写一本书。这本书将包括许多题目，但是不包括在一个国家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列宁不知道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感觉有必要在这里谈谈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合作制》——，因为纲领草案看来从这篇遗著中引用了大量的话，即利用它的某些说法来达到和这篇文章毫不相干的目的。我们想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80—381页。——编者注



到的是纲领草案第五章所说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具有一切必要的足够的物质前提……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如果列宁病中口授并在他死后发表的这篇文章真的说过苏维埃国家具有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首先是生产前提来独立地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那么人们就只能猜测，或者是列宁在口授过程中说滑了边，或者是速记员在把速记符号变成文字时搞错了。无论如何，这两种猜测都比说列宁在仓猝挥笔的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他自己毕生的学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然而，幸好丝毫没有必要作出这样的解释。《论合作制》这篇卓越的虽然尚未完成的文章，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写的其他同样卓越的文章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好象是一本论述十月革命在西方和东方一系列革命中的地位<sup>①</sup>的尚未完成的书里面的一章。《论合作制》这篇文章根本没有说过修正列宁主义的人轻率地强加于它的那些话。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解释说：做“买卖”的合作社在工人国家里能够而且必须完全改变其社会作用；通过正确的政策，它们就可能使私有农民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结合起来。为了证明这个不容争辩的思想，列宁写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sup>①</sup>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编者注

这段话的本文包括一个未完成的短语〔“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从而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看到的是通过口授写下而未修改的草稿。因此,更不能容许死抱住这段话里面几个孤立的字眼不放,不去努力了解这篇文章的总的思想。然而,幸运的是,不仅这段引文的精神,甚至它的文字都没有给任何人象纲领草案的作者那样加以滥用的权利。列宁在谈到“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时,他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严格限制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已经拥有苏维埃政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不引起新的阶级动乱就通过细小分散的农民经济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篇文章完全是谈从私有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是谈实现这种过渡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即使欧洲无产阶级今天就已经取得胜利,并且用他们的技术知识来援助我们,列宁作为一种协调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组织方法而提出的合作制的问题仍然具有充分的意义。合作制指出了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在一旦出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包括电气化在内的先进技术就可以对千百万小农业生产单位进行重新改组,使它们联合起来。但是合作制不能代替技术,也不能创造技术。列宁并不是仅仅谈论一般的,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是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明确地列举了这些前提,即(1)“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这是一句没有经过修改的话);(2)“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3)“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4)“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只是在列举了这些纯粹政治性的条件以后——这里完全没有提物质条件——列宁才得出了他的结论,即:“这(即上述一切)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而没有任何其他意思。但是,列宁立刻补充说:“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单单有了政治条件,即

使是足够的条件，并不解决问题。文化问题仍然存在。列宁说：“只要”如此。他特别强调“只要”这个词，是为了说明我们缺乏的前提是极为重要的。列宁和我们同样清楚，文化是和技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使修正主义者回到现实中来。他说：“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sup>①</sup>只需要提一提电气化的问题就够了。附带说一句，列宁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如果不是存在一个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要对已经在走下坡路然而技术上仍然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不间断的和毫不调和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斗争的问题，那么，在有了“必需而且足够的”政治（然而不是物质）前提以后，我们就会把全副精力投入争取文化的斗争。

〔列宁在这篇文章结尾处特别强调指出〕，“假如……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sup>②</sup>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列宁论合作制的文章，即使抛开他的其他一切著作，也就知道这正是列宁的真正思想。纲领草案的作者们故意把列宁所说的我们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这句话拿出来，把基本的物质前提增加进去，尽管列宁另外明确地谈到了物质前提的问题，指出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正是我们在“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时——也就是说，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仍然必须争取的。对于纲领草案的作者们的提法，我们除了说是伪造以外还能够说什么呢？关于这种理论的第二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堡垒，情况就是如此。

这里我们故意没有谈到列宁从1905年到1923年写的无数文

---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8页。——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7页。——编者注

章和发表的无数演说。在这些文章和演说中，列宁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一再指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落后国家，是不可能从经济上打败资产阶级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本质上就是一项国际性的任务——列宁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新的民族反动乌托邦的鼓吹者可能显得“悲观”，但是从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来看却是十分乐观的。我们在这里仅仅集中讨论草案的作者们为了给自己的乌托邦创造“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挑选出来的几段话。而我们看到：他们的整个结构是一触即溃的。

但是，我们认为从列宁直接谈到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的话中至少引用一段是适当的。这段话不需要任何评论，不容许任何虚伪的解释。列宁说：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另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实现自己的专政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互相协议。……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协议，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sup>①</sup>

我们希望这段话使大家得到足够的教益。首先，在这段话里，列宁本人强调指出他所提出的概念已经“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加以发挥；其次，列宁不是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3—204页。方括号内的文字和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在1915年即十月革命的两年以前，而是在1921年即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指出这个前途的。

我们不揣冒昧地认为，就列宁来说，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了。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基本问题上，纲领草案的作者们过去是怎样看的呢？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1926年11月说道：“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就是在这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且这个任务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的。”<sup>①</sup>

我们已经知道，党从来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刚刚相反，正如列宁所说，“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党都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的。这个立场在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中得到了最高的表现。但是，人们会想象，至少斯大林本人“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建成”这个虚假的观念作为出发点的吧！让我们核对一下。

我们绝对无法知道斯大林在1905年或1915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没有任何有关的文件。但是，在1924年，斯大林在概括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看法时，说过下面这段话：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94页。——编者注

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斯大林《列宁和列宁主义》1924年俄文版第40页及以后各页）<sup>①</sup>

必须承认，这里对“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特征”概括得十分正确。在斯大林这本书的后来的版本中，这段话已经修改得和原来的刚刚相反了。不过一年，“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特征”就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不是根据1924年的版本，而是根据1926年的版本，通过决议的。

斯大林的情况就是如此。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了。肯定地说，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情况不是同样的悲惨，我们可能就此罢休了。

还留下一线希望：至少纲领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始终”是从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出发”的吧！让我们核对一下。

布哈林在1917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即使在落后的俄国，这个火车头的不可替换的司机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继续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财产关系范围以内。他们迈步走上政权，走向社会主义。然而在俄国正被‘提上日程’的这个任务，不可能在‘国家疆界以内’予以完成。工人阶级在这里碰见了一堵无法跨越的墙〔注意：‘一堵无法跨越的墙’——托洛茨基注〕，只有国际工人革命的撞墙车能够冲破这堵墙。”<sup>②</sup>

布哈林把自己的看法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这就是布哈林在

---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第6卷第95—96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② 布哈林《阶级斗争与俄国的革命》1917年俄文版第3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注

1917年即所谓列宁发生“变化”的1915年的两年以后所持的看法。但是，也许是十月革命给布哈林上了不同的一课吧？还是让我们来核对一下。

1919年，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刊物上谈到“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与世界革命”的问题时写道：

“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情况下，在各国资产阶级集团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斗争必然以几个文明国家中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结束。这是不言而喻的（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当时，这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他接着又说：

“在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准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曾经多次提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在—个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大多数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宁在1915年是怎样的呢？——托洛茨基注〕。从这里根本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在—个国家内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是不可能或不能容许的。”

对极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几个主要国家取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开始增加生产力的时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世界革命的全面发展以及各个工业国家和苏俄结成强有力的经济同盟是必要的。”<sup>①</sup>

布哈林断言只有在欧洲各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我们国家才会开始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事实上，这和被用来作为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一切控告——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提出的控告——的基础的说法是一样的。唯一的特点在于：靠健忘得救的布哈林是以

---

① 布哈林《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与世界革命》，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第5期第614页。——托洛茨基注

控诉者的身分挺身而出的。和这种可笑的情况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可悲的情况：在受到控告的人当中也有曾经几十次表达过同一个基本概念的列宁。

最后，在1921年，即所谓列宁已在1915年发生变化的六年以后，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纲领。这个纲领是由布哈林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拟订的。纲领第四段说：

“苏联的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在和世界资本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三年期间，无产阶级维护并加强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俄国虽然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是从工业角度来看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它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种革命发展的时代。”

仅仅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纲领（不是一篇随手写成的文章，而是一个纲领）中引出这段话，就使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企图证明党“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而且正是俄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作法变得荒唐可笑而且真正可耻。如果“始终”是这样看，那么布哈林为什么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呢？斯大林当时把眼睛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怎么可能批准这样一种异端邪说呢？党内怎么就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件“琐事”或表示反对呢？看来这岂不是一个恶毒的笑话而现在正变成对党、对党的历史以及对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嘲弄吗？难道现在不正是制止这一切的时候了吗？难道现在不正是告诉修正主义者“你们竟胆敢用列宁和党的理论传统作挡箭牌”的时候了吗？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为了给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提供基础，依靠健忘保持安全的布哈林断言：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中——而托洛茨基同志甚至



在今天还在鼓吹这个理论——还可以发现一种论点，认为由于我们经济落后，如果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必然灭亡。”<sup>①</sup>

在第七次全会上，我曾经谈到我在1905年至1906年期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缺陷。但是，当然，我甚至从未考虑抛弃这个理论中的任何具有根本性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曾经使我倾向并的确使我接近列宁，使我完全无法接受今天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不断革命论有两个基本论点。第一，尽管俄国在历史上是落后的，通过革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权以前就把政权转移到俄国无产阶级的手里去。其次，一个被无数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将碰到的那些矛盾，将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找到出路。第一个论点是以对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正确理解作为基础的。第二个论点则依靠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纽带的不可分割性具有正确的理解。布哈林说得对，甚至今天我仍然坚持不断革命论的这两个基本论点。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坚持这些论点。因为，依我看来，它们已经完全得到证实：从理论上得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的证实；在实践中得到十月革命的经验的证实。

## 6. “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何在？

以上的引语已经绰绰有余地说明了斯大林和布哈林昨天和今天的理论立场的特点。但是，为了确定他们所用的政治手段的性质，必须记得，斯大林和布哈林从反对派所写的文件中挑选出的言论是和他们自己在1925年以前所说的话（就这些话来看是和列宁完全一致的）绝对相同的，而他们就根据这些引语建立了关于我们

---

<sup>①</sup> 《记录》第115页。——托洛茨基注

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理论。看来在十月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上，反对派似乎和不承认俄国有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奥托·鲍威尔奉行同样的观点。人们真要以为印刷机是1924年才发明的，以为在这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注定是要湮没无闻的。全部赌注都押在健忘上了！

然而，在有关十月革命的性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已经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奥托·鲍威尔及第二国际的其他市侩算了账。在中央委员会授权我提出的关于新经济政策和世界革命前景的报告中，对于奥托·鲍威尔的立场已经根据我们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所表明的意见作了评价；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评价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我认为它在今天也是完全适合的。就布哈林本人来说，他拒绝澄清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因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许多同志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布哈林当时是同意我的演说的。下面就是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关于奥托·鲍威尔的话：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一方面在应景文章中承认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有用，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深信苏俄的演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这些愚蠢不堪而又自命不凡的胡扯家完全罪有应得地陷入了最可怜、最陈腐的矛盾。新经济政策是为了适应某些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条件而制定的。这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在政治考虑中不能忽视时间这样一个因素。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真正能够在欧洲继续存在一个或半个世纪，承认苏俄将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适应这个局面，那么问题就自行解决了。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是预先假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将要垮台，假定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复兴的新时代。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

如果奥托·鲍威尔在今天奥地利的生活中发现了任何奇迹似的资本主义复活的迹象，那末就只能说俄国的命运已经预先注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奇迹，也不相信有什么奇迹。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欧洲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的权力继续维持几十年，那在目前的世界条件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繁荣，而意味着欧洲的经济停滞和文化衰落。一般说来，不能否认这样一个过程有可能使苏俄掉进深渊。至于苏俄那时是否不得不经一个‘民主’阶段，或者遭到某种其他形式的毁灭，则是次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采取施本格勒的哲学。我们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新经济政策只是适应这种发展速度的一种办法。”<sup>①</sup>

这样提出问题就使我们回到了我们评价纲领草案的出发点：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考虑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必须以世界发展的整个趋势作为出发点；一个国家不管具有什么民族特点，都是包括在这个整体以内并且从属于这个整体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苏联排除在世界整体以外，排除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外；他们把苏联看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用经济“成熟性”这个孤零零的尺度来衡量它；他们宣称苏联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资本主义的蜕化。

纲领草案的作者们采用了同样的理论根据，把社会民主党那些理论家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全盘接收过来。他们也从世界整体和帝国主义时代“脱身而出”。他们从孤立发展的幻想出发，用孤零零的经济尺度来衡量世界革命的民族方面。但是他们作出的“判

---

<sup>①</sup> 托洛茨基《论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共产国际的五年》第491页。——托洛茨基注

决”是不同的。草案作者的“左倾”在于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评价翻了一个面。但是，无论你如何重新装扮它，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立场仍然一钱不值。大家必须采取列宁的立场，也就是把鲍威尔的估计和预测仅仅当作幼儿园的游戏而一笔勾销。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情况就是如此。应当认为和鲍威尔有联系的不是我们，而是草案的作者们自己。

## 7. 苏联对世界经济的依赖

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在那些预言家的先驱正是福尔马尔先生。在1878年写的一篇题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里，福尔马尔描述了德国——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比先进的英国的无产阶级还要发达得多——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景。在好几个地方，他肯定而且十分明确地谈到据斯大林说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福尔马尔在1878年就得出这个无法驳斥的结论：

“在当前普遍存在而且将来也会保持其力量的状况下，可以预见，社会主义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绝对谈不上的。”

在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时，福尔马尔说：“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我希望我已经证明这是最有可能虽然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这里我们可以把“孤立的国家”这个词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这个意义来说，福尔马尔表达了一个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熟知的、也是列宁在前面引用的1915年的文章中曾经表达过的不容驳斥的思想。

但是接着下来就纯粹是福尔马尔自己的思想了。附带说一句，和我们现在鼓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些人的提法比较起来，

福尔马尔的提法远不是那样片面和错误。福尔马尔在他的解释中以下列论点作为出发点之一：社会主义德国将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保持活跃的经济关系，同时具有技术远较发达而生产成本远较便宜的有利条件。这种解释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作为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显示它在生产上的巨大优越性，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就自行消失了：社会主义将以在市场用更低的价格销售货物的办法战胜资本主义。

布哈林是纲领第一个草案的作者，也是第二个草案的作者之一。他在解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时，完全从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思想出发。布哈林所写的一篇题为《论我们革命的性质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文章<sup>①</sup>是经院哲学加诡辩的典范，一切推理都是在孤立的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它的主要理由也是唯一理由是这样的：

“既然我们具有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本身不可能存在什么到此为止、往后不能继续建设的一个点。如果我们国家内部具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联合，以至每次和前一年比较起来我们都向前迈进了，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优势增加了，我们经济中的各个社会化了的部门都比私有资本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那么，我们在跨进每一个新的年代的时候都是拥有优势力量的。”

“既然我们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我们就行了。这种推理是无可指责的。从一个尚需证明的论点出发，布哈林建立了一个既没有任何入口也没有任何出口的自给自足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至于外部环境即整个世界的问题，布哈林和斯大林

---

<sup>①</sup> 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6 年第 19—20 期。——托洛茨基注

一样，都仅从干涉角度提到它。当布哈林在文章中谈到必须从国际因素中“脱身而出”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世界市场，而是军事干涉。布哈林没有必要从世界市场中脱身而出，因为他在整个解释中根本忘掉它了。根据这种方式，布哈林在俄国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鼓吹说：如果我们不受到干涉的阻碍，我们“即使用乌龟的速度”也将建成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毫不间断的斗争问题，社会主义只能以最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事实，一言以蔽之，一种社会组织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取代另一种社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学——所有这一切都完全被一笔抹煞了。革命的和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被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吝啬鬼的反动幻想取而代之；这种社会主义建立在技术很低的基础上，在国家范围内用“乌龟的速度”发展，它和外界的联系仅仅在于害怕干涉。拒绝接受这种丑化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的可怜说法，就被宣布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对于我们的观点的这种描绘是在前面引用的布哈林的文章中第一次普遍提出并予以“证实”的。历史将会记载：我们因为拒绝接受根据福尔马尔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重新拼凑起来的更不象样的东西，就陷入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如果俄国不是世界经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最薄弱的一环，然而仍然是一环——的话，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十月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事实绝对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排除在资本主义造成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以外。

就象仅在黄昏才飞出的聪明的蝙蝠一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原有的固定资本日益耗尽的我们的工业——其中三分之二具体表现了我国工业对世界工业的依赖——已经显示迫切需要恢复和扩大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时，是在对外贸易问题已经充分出现在我们的经济领导人面前时突然提出的。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列宁有机会向党发表演说  
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及时提出了警告，指出党将不得不经  
受另一次考试：“……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  
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sup>①</sup>

最近几年来，我们对外贸易的数字已经成为我们经济计划  
数字的关键。这个简单事实给孤立地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理  
论以无与伦比的致命打击。我们的经济——包括工业在内——的  
“最紧张的部位”是我们的进口贸易，而进口贸易则完全依靠我们  
的出口。由于一根链条的抵抗力总是按照它最薄弱的一环来衡量  
的，所以我们的经济计划的规模就要适应我们进口贸易的规模。

在《计划经济》杂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理论刊物）上面，我们  
读到一篇专谈计划制度问题的文章。文章说：

“……在拟订当前年度的控制数字时，我们在方法上必须以我  
们的进出口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出发点；在为各个工业部门——  
从而也就是为一般工业特别是新工业企业的建设——拟订的计划  
中，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方向”<sup>②</sup>，等等。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方法上采取的这种态度说得很干脆，所有  
有耳朵的人都可听到：控制数字决定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但是这些控制数字已经受到世界经济的控制；我们并没有因为变  
得更强大而摆脱孤立的恶性循环。

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它的进出口数字告诉我们：除了军事干涉  
以外，它还拥有其他具有说服力的手段。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  
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  
个意义来说，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也许并不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5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② 《计划经济》杂志1927年1月第27页。——托洛茨基注

是军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单单这个事实就说明：问题决不仅仅是对“本国”资产阶级取得孤立的经济胜利：“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一个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sup>①</sup> 这里涉及到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种社会制度只是刚刚开始<sup>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sup>进行建设，而另一种社会制度今天仍然有大得无可衡量的生产力作为依据。

如果任何人认为承认我们依赖世界市场（列宁直率地谈到过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靠）是一种“悲观”的表现，那就说明他自己在世界市场面前表现了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的胆怯，说明他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乐观——希望离开世界经济，躲到一丛小树后面去设法用自己的资源敷衍一下——是极为可怜的。

新的理论把苏联可能由于军事干涉而灭亡但决不会由于自己经济落后而灭亡这个异想天开的论点当作有关荣誉的问题。但是，由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保卫自己国家的决心必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奴隶进攻这个国家的决心，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军事干涉具有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威胁呢？因为敌人在技术上是无比强大的。布哈林仅仅在军事技术方面承认生产力的优势。他不愿意了解一台福特牌的拖拉机和一门克列索<sup>136</sup>制造的炮是同样危险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大炮仅仅有时可以加以利用，而拖拉机则经常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此外，拖拉机知道在它无计可施的时候背后还有大炮可供使用。

我们是第一个工人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和世界无产阶级都依靠世界资本。“联系”这个无足轻重的、中立的、受到官僚主义阉割的词得到传播，其目的只是为了掩饰这些“联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2页。——编者注



系”的沉重而危险的性质。如果我们按照世界的价格生产，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将远不象今天这样严重，虽然仍然是一种依赖。然而，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对外贸易垄断制本身就证明我们的依赖具有严重而危险的性质。这种垄断之所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因为目前力量对比是对我们不利的。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对外贸易垄断制只能调节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而不能消灭这种依赖。

〔列宁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sup>①</sup>

因此，主要的危险是从苏联的客观地位，即作为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的地位产生的。然而这些危险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这决定于两个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根结蒂，第二个因素，即整个世界经济的命运，当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是否会发生——在什么具体情况下可能发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经常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的情况，以至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灭亡呢？如果我们在有必要独立建立工业基础——从而对领导提出高得无可比拟的要求——的新阶段，善于管理经济，那么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将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更快的情况是否不可想象呢？如果不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根据干巴巴地断言我们的速度“本身是”足够的（更不用提所谓“乌龟的速度”的荒谬哲学了）。但是，要回答两种制度竞争的问题这个企图本身，就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78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使我们进入了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了由包括苏维埃共和国（但决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间或寻求国际支持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的革命国际采取行动和作出决定的领域。

纲领草案在谈到苏联的国家经济时，说它“正在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发展大规模工业”。我们必须承认，和纲领作者完全否认我们的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的相对系数问题的时期比较，这种把两种速度并列的企图是在原则上前进了一步。斯大林曾经说没有必要“硬把国际因素插进来”。布哈林则说：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即使用乌龟的速度”也行。几年来的原则争论正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从形式上说——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不仅在纲领中加进两种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而是深入到根本问题去，那就显然不容许在纲领的另一部分和资本主义世界毫无联系地、仅仅从内部关系出发谈什么“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就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问题作出决定，甚至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同样不能容许的。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制度、两个世界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发展进程；而在这个斗争中，无论我们在恢复时期增长系数有多高，一个无可争辩的基本事实仍然是：

“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资本来说，那么它现在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仍比苏维埃政权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sup>①</sup>

不同发展速度的相互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决定于我们是否能够达到“结合”，保证粮食的征收和增加进出口，换句话说，它不仅决定于我们国内的胜利——当然，这些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而且决定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决定于世界资本主义是停滞、上升还是崩溃，也就是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63页。——编者注

说,决定于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在世界经济政治斗争的范围内才能解决的。

## 8. 产生反动的乌托邦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生产力和国家疆界的矛盾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可以归结为:一方面引用列宁的一些话来加以诡辩的解释,另一方面则对“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作经院哲学式的解释。如果正确地解释这个历史规律和有关的引语,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根本相反的结论,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包括直到1925年以前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内的我们大家得出的结论。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也是时间不一的、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由于各国的相互依赖是极为紧密的,所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再一次比较仔细地看看纲领本文是怎样说的。我们已经在导言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帝国主义……使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间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论点是——无宁说原来打算成为——国际纲领的基础。但是,正是这个论点事先就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种反动理论而排斥、拒绝和抛到一边去了,因为这种理论不仅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也和这一发展已经取得的物质成果是互相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

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 1914 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到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地试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中去呢？或者说，是否我们应当放弃使国家疆界从而也使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疆界显得过分狭隘的、让生产力“肆意”发展的想法，而局限于——譬如说——受约束的、驯服的生产力即经济落后的技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许多工业部门我们现在就应当立即停止前进，而且逐渐降低到甚至比我们目前这样可怜的技术水平更低的水平去，因为目前的水平曾经使资产阶级的俄国和世界经济结成不可分离的纽带，使我国卷入为了扩张领土、使已经突破国家疆界的生产力获得新的领域的帝国主义战争漩涡中去。

在继承和恢复这些生产力以后，工人国家就不得不开展进出口贸易。

困难在于：纲领草案把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和国家疆界互不相容这一点机械地写进自己的内容，然后又提出论据似乎根本不存在这种互不相容的问题。整个草案基本上是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搬来的一些现成的革命论点，加上和这些革命论点绝不相容的机

会主义或中派主义的结论揉合而成的。因此必须密切注意纲领草案的主要倾向，而不要受草案所包含的孤立的革命论点的迷惑。

我们前面已经引用了草案第一章谈到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的话。这个思想在第四章里面说得更为露骨、更为明确：

“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几个个别国家内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成立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和已经存在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结成联盟的时候才能实现。”

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这几个字仅仅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说法，那么这就是一种谁也无法驳斥的一般叙述，虽然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且意味着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解释，那么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以国际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按狂喜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组成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联盟，其唯一区别在于这些公社将扩大到现在的民族国家的规模。

纲领草案极力采取折中的办法用旧的习惯的说法把新的说法掩盖起来，因此求助于下列论点：

“只在无产阶级得到完全的世界胜利与它的政权在全世界巩固以后，才会跟着有尽力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漫长时期。”

把这个论据当作理论上的盾牌，实际上只能暴露其基本矛盾。如果我们把这个论点解释为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只有当无产阶级至少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那么这就根本否定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回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以纲领草案各节中包含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新理论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前景则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在全世

界取得完全胜利以前，就有一些国家在本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然后以孩子搭积木的方式通过这些国家来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决不会是民族社会主义经济的总和。从根本方面来说，它只能在资本主义过去的整个发展所创造的世界劳动分工的土壤上形成。它的基本成分不会在一些单个国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以后就形成和建立起来，而是将在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中形成和建立。第一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经济上的胜利不是用它们接近自给自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程度来衡量，而是用这种专政本身在政治上的稳定程度和它在为将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基本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来衡量。

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在第五章里面得到了——假如可能的话——更明确因而也就更露骨的表现。在第五章里，纲领草案的作者们躲在从列宁的遗著中摘出并且被他们歪曲的一行半文字后面，宣称苏联

“……国内具有必要而且足够的物质前提，不仅可以推翻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且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究竟是由于什么情况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特别优越的历史条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草案第二章找到了答案：

〔1917年革命使〕“帝国主义的战线在它最弱的环节上——在沙皇的俄国——被突破了。”（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是列宁的光辉论点。它的意思是说：俄国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最落后的，经济上最软弱的。这正是俄国统治阶级首先垮台的原因。因为他们给这个国家原已不足的生产力加上了无法承受的负担。不平衡的间歇式的发展从而迫使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起来夺取政权。在过去，人们教导我们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位于“最弱的环节”的工人阶级和先进国家的

无产阶级比较起来，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将碰到最大的困难。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他们——当我们还远未克服我们的落后性以前——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将要超过我们，而且将要携带我们前进，使我们逐渐接近在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当我们大胆举行十月革命时，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党曾经在报刊上和会议上不是几十次而是几百次几千次地提出这个思想。但是从1925年以来，有人却企图用完全相反的思想取而代之。现在我们获悉：前沙皇俄国是“最弱的环节”，这个事实使作为沙皇俄国及其一切弱点的继承者的苏联无产阶级得到了无法估计的好处，也就是说，使他们不多不少恰好具有本国的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

可怜的英国不具备这种有利条件，因为它的生产力过分发达，几乎需要全世界为它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处理它的产品。如果大不列颠的生产力比较“有节制”，如果他们使工农业保持着相对平衡，那么英国无产阶级显然就可以在他们的受到海军保护、不致遭受外国干涉的“孤”岛上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了。

纲领草案第四章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三类：（1）“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2）“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国家（1917年以前的俄国、波兰等）”；（3）“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

尽管“1917年以前的俄国”和今天的中国远比今天的美国更为接近，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图解式的分类变成了草案其他部分所包括的虚假结论的来源的话，人们本来可以克制自己不提出任何严重的反对意见。由于草案宣称“中等”国家具有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那么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了。只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需要外来援助。我

们以后将要看到，纲领草案在另一章里正是这样描述这些国家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用这个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抛开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它的工农业的相互关系、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等其他条件不谈，那么我们会陷入新的同样严重的错误和矛盾。我们刚才谈到英国。英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它根本不可能在本岛的范围内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英国如果受到封锁，只要几个月它就会被扼杀。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生产力比较发达诚然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很大好处，使经济生活即使在遭受封锁时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灵活性。资产阶级德国战时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民族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些先进国家将意味着普遍走下坡路，意味着大规模降低生产力，也就是说，意味着某种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相反的结果。

纲领草案忘记了目前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互不相容这个根本论点。根据这个论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起的阻碍作用决不比不发达的生产力所起的阻碍作用小，虽然原因刚刚相反：后者不足以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对前者来说，作为这种基础却是大材小用。正是在最需要运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最需要重视这个规律的地方，这个规律却被置诸脑后。

仅仅从一个国家的工业是“成熟”还是“不成熟”来说，并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不成熟”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在苏联，某些工业部门极为不足，不能满足国内最起码的需要（特别是机械制造）；另一些工业部门却相反，如果不大量出口而且不断增加出口，它们在目前条件下就无法发展。这方面包括木材、石油和锰矿等非常重要的部门，农业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如果（相



对)“过多”的部门不能出口的话,甚至“不足”的部门也不能认真发展。在我们现时世界经济的具体地理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乌托邦或大西岛<sup>137</sup>上,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可能,在不同国家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由于某些部门发展不足,也可能由于其他部门发展“过多”。整个看来,这就是说,现代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

“帝国主义战争是什么呢?它是生产力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且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疆界。帝国主义战争说明民族国家的疆界使生产力受到了无法忍受的限制。我们始终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控制它本身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已经胀破资本主义国家疆界的生产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实体中结合起来。一切往后退向孤立国家的道路都已经堵塞了。……”<sup>①</sup>

在力图证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时,纲领草案犯了双重的、三重的以至四重的错误:它夸大了苏联的生产力;它故意不看各个工业部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它忽视国际劳动分工;最后,它还忘记了帝国主义时代内在的最重要的矛盾,即生产力和国家壁障的矛盾。

为了避免不加分析就放过任何一个论点,我们还需要追述布哈林为了捍卫新的理论而提出的另一个论点,一个具有概括性的论点。

布哈林说:从世界范围来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丝毫不比苏联目前存在的关系强。因此,如果由于落后的原因苏联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同样不可能的了。

---

<sup>①</sup> 托洛茨基的演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记录》第100页。——托洛茨基注

这个论点值得收入一切辩证法教科书里去，作为经院哲学思想方法的典型例子。

首先，整个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很可能和苏联的情况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世界革命决不是按照算术平均方法完成的。附带说一句，民族革命也不是这样完成的。所以十月革命首先是在无产阶级的彼得格勒发生和巩固地立定脚跟的，而并没有选择一个工农相互关系符合整个俄国一般情况的地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相继创立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以后，它们不得不花几年时间去推翻边远地区的资产阶级；苏联疆界以内建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现在这种相互关系仅仅是被叫做革命的这个过程的结果。革命并不是按照算术平均的方式发生的。它可以从一个比较不利的地区开始。但是，除非它在民族和世界战线的关键地区都已经立定脚跟，否则就不容许谈什么革命的完全胜利。

其次，如果有了“一般的”技术水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因素。此外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包围苏联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如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被推翻，这件事本身还不能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也不能改变苏联以及全世界的一般技术水平。尽管如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立即获得和目前完全不同、为目前情况绝对无法比拟的可能性，达到完全不同的无法比拟的规模。

第三，如果说每一个先进国家的生产力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国家疆界所能容纳的范围，那么按照布哈林的意见就应得出结论，认为一切国家生产力的总和已经超过我们星球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必须在太阳系范围内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我们再说一遍：以工人和农民的一般比例为出发点的布哈林

式的论点必须收进一切政治启蒙课本，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象现在这样维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为了证明经院式的诡辩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完全不相容的。

## 9. 这个问题只能在世界革命战场上解决

新的理论宣称：只要不遭到干涉，就可以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可以而且必须得出的结论（不管纲领草案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就是应当实行和外国资产阶级勾结的政策，以便避免干涉，因为这样做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也就是说，就可以解决主要的历史问题。因此，属于共产国际的各个政党的任务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它们的使命是保护苏联不遭受干涉，而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然，这不是主观意图的问题，而是政治思想的客观逻辑的问题。

斯大林说：“意见分歧在于：党认为这些〔内部〕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冲突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则认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够克服。”<sup>①</sup>

不错，这正是意见分歧所在。对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之间的分歧不可能有更好的更正确的说明了。如果我们的内部困难、障碍和矛盾基本上是世界矛盾的反映，可以仅仅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而不必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来解决，那么共产国际就成了一半是辅助性、一半是装饰性的机构，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可以四年召开一次，十年召开一次，或许根本不必召开了。即使我们补充说，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保护我们的建设

<sup>①</sup>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12页。——编者注

不遭受军事干涉，按照这种论断共产国际必须扮演和平主义的工具。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它作为世界革命工具的作用，不可避免会退居次要地位。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由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图（刚刚相反，纲领里面有些论点证明它的作者们具有很好的意图），但是这的确是根据新的理论立场的内在逻辑得出的结论。这个立场比最坏的主观意图还要危险一千倍。

事实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居然大胆地发展和维护了下列思想：

“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1〕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1〕，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①（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权利相信民族经济的微薄资源，但是决不能大胆地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寄予信心。如果不发生国际革命我们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那就放弃政权，放弃我们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而在十月革命中夺得的政权。如果我们从一个错误透顶的论点出发，就会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崩溃为结束！

当纲领草案说苏联的经济成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它表达的思想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新理论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在于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两个杠杆——一个是我们的经济成就，另一个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错误的估计。没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欧洲工人和全世界工人都必须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经济建设的杠杆是极为重要的。没有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它的垮台将使国

---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际革命遭到许多年都无法复原的打击。但是，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主要历史斗争的结局决定于第二个杠杆，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革命争夺的基地，根本不在于它能够独立于世界革命以外而建成社会主义的这个假设。

布哈林曾经不止一次以毫无根据地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腔调质问我们：

“如果已经有了先决条件、出发点和足够的基础，甚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那么，一超过就会使一切‘颠倒过来’的极限在哪里呢？这种极限是不存在的。”<sup>①</sup>

这是糟糕的几何学，不是历史的辩证法。这种“极限”是可以有的，而且可以有好几条极限，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此外还有军事的。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极限”有可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的长期的稳定和一次新的兴旺。结果，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转移到世界舞台上去了。资产阶级能不能获得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和统治的新时期呢？仅仅否认这种可能性，指望资本主义处于“毫无希望的地位”，那就完全是革命空谈。“绝对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列宁）目前欧洲各国阶级力量的不稳定的均势，正因为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存在下去。

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没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也就是说，没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苏联也可以维持下去，因为工人群众现在表现的积极同情保护我们不致遭受干涉。这种看法和他们的原则错误所蔓延出的一切看法一样，都表现了同样的盲目性。

---

<sup>①</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记录》第116页。——托洛茨基注

在社会民主党破坏欧洲无产阶级战后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以后，工人群众的积极同情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在这些年代里，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证明无力对工人国家进行大规模战争。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力量对比将继续存在许多年，譬如说，继续保持到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完全是鼠目寸光，只看到一个很小的局部情况就对整个发展曲线作出判断。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资产阶级也没有足以控制本国的充分信心，象这样不稳定的局面迟早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而突然结束，其结果不是有利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取得真正的长期的稳定，而这种稳定的基础将是人民群众遭到压制，殖民地人民遭到摧残……或许我们自己也要遭到摧残。“绝对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失败和革命领导的错误，欧洲资产阶级才能够找到摆脱自己的严重矛盾的持久的方法。但是翻过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只有当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一条摆脱目前这种不稳定的均势的出路时，才能阻止世界资本主义取得新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将会带来新的大动乱的时期）。

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说：“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sup>①</sup>

然而，我们国内的矛盾直接决定于欧洲和世界斗争的趋势。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为基础采取正确的国内政策，可能对这些矛盾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它们有所缓和。但是只有在克服阶级矛盾以后才能最终克服这些矛盾，而没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就谈不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25—326页。——编者注

上克服阶级矛盾。斯大林说得不错。分歧正在于此。这是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的根本分歧。

写于1928年6月。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36年纽约英文版第3、24—65页。

## 现在怎么办？（摘录）

### 四 群众的激进化和领导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1928年）在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上，无可否认地曾经企图向左转，也就是说，趋向于采纳反对派所维护的意见。尽管这种转变缺乏连贯性，但是，如果随着这种转变同时实行列宁战略思想的根本原则，即谴责错误的政策是为实行正确的政策铺平道路，那么人们或许可以说这种转变不止是一种征兆，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里的统一战线都是按照英俄委员会<sup>111</sup>的方式搞的。而英俄委员会的方针给英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和国民党的方针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几乎具有同样程度的灾难性。

就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来说，它不仅赞同所犯的一切错误，而且为新的、同样严重的错误准备了条件。

二月全会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比其他任何一种政治路线都更好地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统治制度。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决议包含下面这种论断：

“托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都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苏维埃政权上面。”<sup>①</sup>

<sup>①</sup> 《真理报》1928年2月19日。——托洛茨基注



某些人虽然丝毫不相信这种论断（因为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才可能相信反对派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苏维埃政权上面），但是由于驯服成性而举手赞成这种论断。经验证明，这种人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殊死斗争中并非总是有勇气奋起反抗的。

总起来说，二月全会象征着一种矛盾的、向左转的企图。从政治观点来看，这种企图决定于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主要是欧洲而特别是德国的工人阶级群众的情绪正在发生的无可否认的转变。对这种转变的性质和它开辟的前景缺乏明确的了解，就谈不上什么正确的领导。

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上发表演说时，更准确些说是在对反对派发动放肆的攻击时，曾经说道：

“托派分子没有看见国际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没有注意到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sup>①</sup>

然后他就按照惯例若有其事地进行论证，力图证明我们正在和希法亭一起埋葬世界革命。如果这里涉及的不是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第二大党，那么对这种信口雌黄的说法也许可以置之不理。这里所说的反对派没有看到的工人阶级激进化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就是台尔曼以及和他一伙的许多人在1921年、1925年、1926年和1927年也曾称之为“激进化”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共产党在1923年投降以后影响的衰退和社会民主党得到发展的事实都是不存在的。他们甚至也不问问自己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和一个连最起码的政治常识都不愿了解的人是很难谈话的。不幸的是，这不仅是台尔曼的问题，台尔曼这个人本身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塞马尔也是无足轻重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确是学习革命战略的学校，它教导人们如何区别事

---

<sup>①</sup> 《真理报》1928年2月17日。——托洛茨基注

物。无论什么工作，首要条件就是善于区别事物。在高潮时期，也有退潮时期。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者是交替而至的。从策略观点上说，必须使政策适应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同时在总的行动路线上则要保持夺取政权的方针，随时随地都要有所准备，以免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措手不及。第五次代表大会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完全颠倒过来。它完全不顾客观形势，用蛊惑人心的、千篇一律的词句代表对事物的分析，认为“工人阶级越来越激进化，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

实际上，德国工人阶级只是在过去一年当中才开始从1923年失败的后果中恢复过来。反对派是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在我们所发表而曾经为台尔曼所引用的一份文件中，我们说过下面这段话：

“欧洲工人阶级当中正在出现无可否认的向左转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罢工斗争的尖锐化和共产党获得的选票的增加。但是，这只是转变的最初阶段。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选民人数也在增加，其速度可以和共产党选票的增加并驾齐驱，并且部分地超过了后者。如果这个过程发展加深，我们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即〔群众〕开始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阶段。”<sup>①</sup>

根据德国和法国最近的选举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断言：我们对欧洲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所作的上述估计几乎可以说是不容争辩的。不幸的是，共产国际的报刊，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报刊在内，对无产阶级队伍中存在的情绪和倾向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严肃而透彻的、言之有据的、用数字加以证明的分析。就已经提供的统计数字来说，这些数字都是为了适应以维护领导“威信”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倾向。对于说明1923年至1928

---

① 托洛茨基《论新阶段》。——托洛茨基注

年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的极其重要的事实资料，如果这些资料驳斥了错误的判断和指令的话，他们一贯是悄悄放过而不置一词的。由于这一切原因，要判断群众激进化的力量、速度、范围及其可能性是极端困难的。

台尔曼没有任何权利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说：“……托洛茨基分子没有看见国际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我们不仅看到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激进化，而且早在去年就已经据此对局势作出了估计。这个估计已经完全为（1928年）5月德国国会选举所证实。这种激进化正在经历最初阶段，仍然在把群众引向社会民主党的轨道。在2月间，台尔曼拒绝看到这一点，他坚持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这样泛泛而谈的论断只是一种空洞的词句。如果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的社会民主党正在增强，人们能够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吗？

无论怎么说，群众的“激进化”尚需经过一个工人纷纷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的初步阶段，然后才会出现革命的形势。诚然，作为局部现象，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出现，但是这个潮流的主要发展方向还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把激进化的一个仍然属于半和平主义、半和敌人合作性质的开始阶段和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阶段混为一谈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必须学会如何区分事物。任何人如果只知道年复一年地重申“群众正在激进化，形势具有革命性”，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是一个只会敲着桌子激昂陈词的鼓动家；当革命真正到来时，他肯定会失之交臂。

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然而这根支柱本身也包含着矛盾。如果工人们正在从共产党转向社会民主党，那么人们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巩固。1924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台尔曼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人没有能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用谩骂来答复我们的论点和劝

告。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共产党的发展已经和社会民主党并驾齐驱，但是它的发展还没有直接削弱社会民主党。群众正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涌向这两个党；到目前为止，涌向社会民主党的人更多些。工人们抛弃资产阶级的政党，从政治上冷漠的状况中觉醒过来——这是造成这种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正在得到加强。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不能说是一种革命形势。必须学会如何区别事物。那么，应当如何说明目前形势的特点呢？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形势，其中包含着矛盾，群众还没有分化，还存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必须警惕地注视这个过程的发展，不要陶醉于陈腐的词句，经常作好准备，以待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仅仅因为投自己的票的选民人数增加就感到心满意足；它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工人的洪流，因为这股洪流为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工人们开始从社会民主党大批转向共产党以前（这样的时刻是必然会到来的），我们必须预计到社会民主党内部还会出现新的、巨大的磨擦，还会形成更深刻的联合和分裂，等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为共产党提供机会，使它可以按照“统一战线”的路线展开积极的、进攻性的策略行动，加速群众革命分化的过程，这主要是说，促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策略的运用”结果不过是共产党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仍然有可能向左走得很远），等待他们变得通情达理一些，那么我们就要倒霉了。我们知道这种“策略”曾经在1923年的萨克森小试牛刀<sup>138</sup>，而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则曾在英国和中国大规模地加以运用。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结果都错过了革命的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失败。

台尔曼的论断并不是他本人的；这一点可以从纲领草案中看出来。纲领草案说：

“日益加剧的群众激进化的过程，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及其权威的增长……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区一个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高涨起来。”

作为一种纲领性的概括，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仅出现过“日益加剧的激进化的过程”，而且出现过群众趋向右翼的时期，不仅有各国共产党影响上升的时期，而且有这种影响暂时下降的时期——特别是在发生程度不同的错误和投降的时候。将来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里只是根据时局作出判断的问题，那么就某些国家在某个具体时期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或多或少是正确的，而就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则是根本不正确的。即使如此，这种判断也属于决议的范围，而不属于纲领的范围。纲领是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的。不幸的是，在这五年期间，共产国际领导集团在辩证地对待革命形势消长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表现出理解力。在这些问题上，它永远停留在经院哲学的范围，不从根本上研究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阶段就谈什么“激进化”。

由于德国在世界大战时期遭受的失败，德国政治生活的特点表现在，它所经历的危机具有特殊的性质，使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面临肩负责任的形势。在战后最初的五年中，德国无产阶级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革命政党特别软弱；在其后五年中，这种失败则是由于领导的错误。

在1918年至1919年期间，有了革命的形势，但完全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到1921年开始退潮的时候，已经颇为强大的共产党曾经企图发动革命，虽然当时缺乏发动革命的直接前提。后来进行的准备工作（“为争取群众而斗争”）结果在党内造成了右倾偏向。在整个局势急剧地向左转的时候（1923年秋天），已经丧失革命能力和主动性的领导集团惨遭覆灭。右翼为左翼取而代之。

当左翼取得控制权时，革命已在退潮。然而左派拒绝理解这一点，顽固地坚持“准备起义的路线”。结果产生了新的错误，使党遭到削弱，使左派领导被推翻。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暗中依靠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断对左派进行无情的斗争，一直机械地翻来复去地说群众正在激进化，说革命已近在咫尺。

从德国共产党演变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不同派别随着政治曲线的升降而猝然地、交替地掌握权力的状况：每当政治曲线陡然上升或陡然下降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当它陡然趋向暂时“稳定”或者相反地陡然趋向革命危机的时候，当时占领导地位的集团就要遭到覆灭，把地位让给和它竞争的集团。右翼集团的弱点恰恰在于它不懂得如何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使一切活动转上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轨道；另一方面，左翼集团的弱点则在于它既不承认又不了解由于准备时期的客观形势而有必要动员群众为实现过渡性要求而斗争。这两个集团的弱点互为补充。既然形势每出现一次转折就要更换一次领导，党的领导干部就无法获得更广泛的经验：既有上升又有下降、既有高潮又有低潮、既有退却又有进攻的经验。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必须了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陡然的变化转折的时代，否则就无法受到教育。以乱碰乱撞的方式通过任命来挑选领袖，这种做法本身必然包含着领导集团一碰到重大社会危机就会遭到新的破产的潜在的危险。

领导意味着预见。对台尔曼的阿谀奉承必须适可而止了。台尔曼之所以受到赞美仅仅是因为他从阴沟里挖掘出最污浊的词句来攻击反对派，正如谭平山仅仅因为把台尔曼的谩骂译成了中文就在第七次全会上受到宠爱一样。必须告诉德国的党：台尔曼在2月间就政治形势作出的判断是庸俗的、武断的、不真实的。在错误造成的伤口愈合以前，必须公开承认过去五年所犯的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错误并且严肃认真地研究这些错误，战略上的经验教训

必须紧随着事态的发展加以总结才能扎实。必须停止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犯了错误就撤换党的领袖，或者由于这些领袖不赞成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惩办无产阶级革命家(比利时)<sup>139</sup>，就撤换他们作为惩罚的做法。必须让年轻的干部们自己走路；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不要强迫命令。必须停止仅仅以态度端正(即反对反对派)作为依据“指派”负责人的做法。必须永远抛弃中央委员会的委任制度。

## 五 苏联共产党目前这种向左转的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种概括的叙述中，我们必须简略地谈谈共产国际的政策及其制度，以便把领导集团向左转的情况弄清楚。既然这种趋势直接产生于造成苏联经济危机的那些条件，既然它是按照和国内问题有特殊关系的路线发展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更深入、更详尽地探讨一下过去——直到最近以前——对这些问题的提法，看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和措施中有什么新的因素。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看出今后应当奉行的正确的政策路线的轮廓。

\* \* \*

今年(1928年)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经历的完全异乎寻常的困难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在政治和党的领域中具有同样极其重要的意义。困难促进了向左转的变化。这并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这些困难本身为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和总的政策带来的利弊作了结论。

倘若无产阶级革命立刻扩大到各个先进国家，从战时共产主

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无需作很大的退却就能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扩大已经推迟了许多年。这使我们不得不在1921年春天实行影响深远的和长期的大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必不可少的退却所应达到的规模不只是从理论上、而且是从实践中逐渐探索出来的。1921年秋天就已经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的退却。

1921年10月29日，即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七个月以后，列宁在莫斯科省的会议上说道：

“今年春天我们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这种过渡，我们的这种退却……是不是已经够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了呢？不，这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象鸵鸟那样藏起来，如果我们不想表现得象那些看不见自己的失败的人，不怕正视危险，我们现在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购销和货币流通……因此，我们是处在还不得不退却的状态中，退却是为了在将来最终地转入进攻。”<sup>①</sup>

在同一篇演说中他接着说：

“1921年春天，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而现在，在1921年—1922年的冬天和春天，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要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进行工作和展开斗争。”<sup>②</sup>

直到第二年即1922年春天，列宁才决定发出停止退却的讯号。他第一次谈到这一点是在1922年3月6日在五金工人代表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72—7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74页。——编者注



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他说：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退却，即我们向资本家所作的让步已经结束了。……我希望而且相信，党代表大会会以俄国领导政党的名义正式作出这种宣告。”<sup>①</sup>

紧接着他就以他一贯的坦率和诚实作了真正列宁主义的解释：

“决不能把停止退却这句话理解为：我们已经打好新经济的基础，可以安心地前进了。不，基础还没有打好。”<sup>②</sup>

以列宁的报告作为基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注意到：过去一年来采取的和决定采取的措施，整个加起来，已经完成了党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作出的一切让步。代表大会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却已经结束。”<sup>③</sup>

因此，这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过周密准备的决议，预计到党所处的新的起点将提供展开社会主义攻势的可能性，虽然缓慢，但不需要作新的退却。

尽管如此，这个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所表示的期望，在这一点上证明是并不正确的。1925年春天又有必要作新的退却：允许农村中的富有阶级通过雇佣劳动和租赁土地的方式剥削比较贫苦的阶级。

这次新的、影响巨大的退却是列宁在1922年制定的战略计划没有预见到的。这次退却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过去为退却规定的期限“太短”（由于最起码的谨慎，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因为在1923年至1924年期间领导集团既不了解形势、也不了解它所担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记录》第143页。——托洛茨基注

负的任务，在“赢得”时间的幻想下丧失了时间。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1925年4月实行的新的、痛苦的退却并没有被称为——列宁会这样称它的——一次深刻的失败和退却，而是被当作结合的一个胜利，被认为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结构中的一个环节。正是针对这种做法，列宁一生曾经不断提出警告，特别是在1921年秋天——当时已经有必要继续实行并且加深那一年春天开始的退却。

列宁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在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取得一切教训。……不要怕承认失败，要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意见，认为承认失败就会象放弃阵地那样令人沮丧失望，削弱斗志，那就应该指出，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际方面来看，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sup>①</sup>

但是，列宁一离开领导岗位，这个值得重视的警告就被全部置诸脑后；到现在为止，任何时候也没有真正记得这个警告。

由于1925年4月的决定已经使农村日趋分化的现象合法化，为这种分化敞开了大门，所以结合意味着工人国家和富农之间的商品交换将不断增加。人们不但不承认这种可怕的危险，而且立即制造出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卑鄙理论。这种办法第一次作为脱离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而独立地“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71页。——编者注

办法，以党的名义一古脑儿提交给党的代表会议。由此可知，这种小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是不可争辩的——而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挫折，从而领导人认为有必要给无产阶级提供一种“精神”安慰，以便抵销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新的物质让步的影响。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6年1月）关于工业化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论点，几乎是逐字照抄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5年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某些思想。但是，在通过这个决议的同时，又展开了一个反对被戴上“超工业化分子”帽子的左翼的运动，也就是反对那些不愿意使已经通过的决议仅仅停留在纸上的人的运动；我们针对富农危险提出的警告被荒谬地称为“惊惶失措”；指出农村正在发生阶级分化的事实则被当作反苏宣传而加以惩处；要求加强对富农施加的压力以利于工业的发展则被扣上倾向“掠夺农民”的帽子（斯大林—李可夫—古比雪夫宣言）；这样一来，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对实际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党的民主和共产国际集体领导等等问题通过的某些其他决议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微不足道的了。

早在1923年春天就开始了结合问题的讨论。1926年，反对派以下列方式概括了这次讨论的内容：

“问：反对派的政策是否真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结合的危险呢？”

答：这种指责是彻头彻尾虚假的。结合当前受到的威胁一方面来自工业的落后，另一方面来自富农的发展。工业品的缺乏正在城乡之间造成裂痕。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富农正开始控制中农和贫农，使他们反对无产阶级。这种发展现在尚处于最初阶段。正是这种发展在威胁着结合。低估工业落后和富农增长的意义就无法对两个阶级的联盟——在我国条件下实行专政的基础——实

行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领导。”(《问与答》)

让我们在这里强调指出：尽管斗争十分激烈，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丝毫没有夸大。1926年，当我们挺身而出反对使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叛徒理论、反对这种只能为使我们长入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理论的时候，我们说富农的危险“尚处于最初阶段”。从1923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指出危险来自哪个方面。我们指出了这种危险发展的每一个新的阶段。如果领导的艺术不是善于及时认出危险——也就是说，当危险尚“处于最初阶段”的时候就能够看出危险——并且防止它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那么领导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要领导就要有预见——而不是迫害那些有预见性的人。

对党最不幸的是，上面引用过的那些话甚至不可能得到公布。由于传播了那些话，最优秀的战士已经被那些毫无思想、不愿意而且不能够考虑将来的官员开除出党。

在1926年12月9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布哈林就结合和粮食收购问题谴责了反对派。他说：

“我们的反对派用来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我这里想到的是1925年秋天)？他们当时说：矛盾正在疯狂地增加，而党的中央委员会却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说：几乎集中了全部余粮的富农已经组织‘粮食罢工’来反对我们，所以粮食收购情况才会这样糟糕。这是我们大家都听到了的。……按照反对派的估计，其他一切都不过是这一根本现象在政治上的表现。后来，同样是这些同志又插进来说：富农已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危险更增加了。同志们，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论断都是对的，我们今年就会碰到反对无产阶级的更强大的‘富农罢工’了……反对派诬蔑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发展，说我们在不断让步，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组织拒售粮食运动；实际结果证明情况

是刚刚相反的。……”<sup>①</sup>

从布哈林嘴里引来的仅仅这一段话，岂不就足以说明领导集团在有关我们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上是完全有眼无珠的吗？

可是，布哈林并不是一个例外。他不过从理论上“概括”了领导集团的昏愤。党和经济工作中最负责的领导人竞相宣称我们已经克服了危机（李可夫），说我们已经控制农民市场，粮食收购问题已经成为严格属于苏维埃机构范围的纯粹是组织工作的问题（米高扬）。中央委员会 1927 年七月全会的决议宣布：这一年经济活动的发展整个说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危机。与此同时，官方报刊异口同声地断言：农村中缺乏商品的情况如果不是完全消失了，至少已经有了很大的缓和。

为了和这一切意见相抗衡，反对派在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再次写道：

“粮食收购总额的下降一方面直接证明城乡关系中存在深刻的混乱。另一方面也是威胁我们的新困难的源泉。”

我们的困难根源是什么呢？反对派回答说：

“近年来工业发展过分迟缓，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原料方面、出口贸易方面和食物方面，国营经济对富农和资本主义分子的依赖日益增加。”

让我们同时回忆一下：反对派进行的最尖锐的干预就是 1927 年 11 月 7 日节日游行期间进行的那一次；而那次干预提出的最尖锐的口号是：“让我们把火力转向右派；转向富农、投机倒把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转向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转向在顿涅茨审判时期做组织工作或在打瞌睡的官僚主义者。”这场涉及革命的生死存亡的、非同小可的争论在 1927 年和 1928 年的冬天由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务的威胁而宣告结束。同时匆匆忙忙地

<sup>①</sup> 《记录》第 2 卷第 118 页。——托洛茨基注

签署了决定，要对那些和一般中派主义者的昏愤、特别是和布哈林的昏愤有所不同的“偏向”分子实行惩办，根据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放逐。

倘若不是反对派在此以前作了一系列的工作——从1923年的政纲起到1927年11月7日的标语牌为止；倘若不是反对派事前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倘若不是反对派在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提出了正当的警告；那么，粮食收购危机本来只会加速右倾道路的发展，进一步放任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在此以前的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甚至先锋队的先锋队，曾经不止一次以自己的毁灭作为代价才使本阶级重新前进一步，或阻止敌人的进攻。

## 六 进一步，退半步

同中国危机、英俄危机和其他危机不同，粮食收购危机是不能一言不发就轻轻放过的。这场危机提供了一种刺激，使政策趋向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在整個经济中，而且在每个工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新的政治时期是从粮食收购开始的。

1928年2月15日，在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党有幸在《真理报》上拜读到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很可以说是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政纲》的转述，其中一部分几乎是从《政纲》中逐字照抄来的。

这篇在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压力下写成的出人意料的社论宣布：

“在造成粮食收购困难的一系列原因中，必须特别指出下面这

一点。农村已经发展了，发财了。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三年丰收并不是毫无影响的。”

由此可知，农村拒绝为城市提供粮食是因为“农村已经发财了”。这就是说，它已经尽力实现布哈林的口号：“发财吧！”但是，农村富裕为什么会破坏而不是巩固结合呢？社论回答说：这是因为“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这样一来，认为这些年来中农已经增加而富农和贫农则相应减少的理论突然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垃圾而予以抛弃了。“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

但是，甚至农村富农发财的事实本身也不能说明城乡交流瓦解的原因。和富农结成的联盟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而粮食危机的出现是由于甚至这样一种结合也并不存在。因此，富农不仅得到了发展，发了财，而且并不感到有必要用自己囤积的天然产物来交换金币；至于他所需要并且可以从城市中得到的商品，他只需要付出一部分谷物就可以买到，而这些谷物对城市却是绝对不够的。《真理报》还提出了第二个原因——归根结蒂，这是造成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

“农民收入的增加……在工业品供应相对落后的状况下，使一般农民、特别是富农可以囤积粮食。”

现在情况就清楚了。根本原因在于工业落后，在于工业品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同属于合作社的贫农和中农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结合，甚至也没有同富农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结合。如果把我们刚才引用的《真理报》的两段话和前面一章引用的反对派文件中的话加以比较，那么，必须承认《真理报》实际上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我在《问与答》里所说的话和所表达的思想。而由于写了《问与答》这篇文章，受到的惩罚是开除出党。

但是，《真理报》社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它一方面仍然有保留地说富农不是“主要的粮食囤积者”，同时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经济

主宰，认为“富农和以高价收购谷物的城市投机商形成了结合”，而且“他们〔富农〕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这段叙述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农村中存在的关系的特点。它和官方近年来传播的所谓中农在经济中起着支配的、日益增加的作用的神话毫无共同之处。除此以外，它和被当作反党文件的我们的纲领是完全一致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十一年以后，看来富农仍然是“农村中的经济主宰”，而且“他们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从数字上说仍然是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的中农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受到富农的控制。关于富农并不是“粮食的主要囤积者”的有保留的说法丝毫不能使这种情况有所缓和，而是使它显得更为阴暗了。据说富农现在在粮食贸易中占百分之二十的比重。如果我们接受这个颇为可疑的数字，富农能够使中农在市场上“跟着他们走”，也就是领导他们破坏国家粮食收购工作的事实，就更加突出了。纽约的银行也并没占有流通中的全部商品；然而正是这些银行支配着全部商品。任何人如果企图提出百分之二十这个“并不太大”的数字当作证据，其结果仅仅强调说明：富农只需要拥有五分之一的粮食就足以在粮食市场上夺取支配一切的地位。这也说明，在工业落后的条件下，国家对农业经济所能发挥的影响是多么微弱。

另外一个必然的保留是：只有几个地区而不是全部地区都出现了富农起“领导”作用的现象。这种说法也帮不了什么忙；相反地，它倒是使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具有更尖锐的、令人震惊的含意。这“几个”地区已经足以根本动摇城乡之间的结合。如果这一过程以同样程度扩大到所有的地区，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经济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计平均数。这根本不是在我们前进时要从数量上精确地衡量这个极为复杂而广泛的过程的问题，而是必须确定这个过程的性质



的问题。这就是说，必须指出这种现象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今天是百分之二十；明天就可能大大增加。某些地区走在前面；另外一些地区落在后面。事实上，富农在农村中拥有的权威和使中农跟着他们走的可能性并不是直接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就后面这一点来说，我们拥有新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紧接着镇压富农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更尖锐更明确地出现这种现象的那些地区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们为比较“落后”的地区指出了道路——当然，这是说如果五年来、特别是从1925年4月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策还会继续实行的话。

新的“苏维埃”富农是损害了谁的利益才在农村中取得权威地位的呢？他们损害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工人国家及其工具——国营工业和合作制——的利益。如果富农获得了吸引中农跟着他们走的可能性，他们将领导中农来反对谁呢？反对工人国家！经济联盟之所以出现严重而深刻的破裂，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经济联盟的破裂是另一种巨大得多的危险——即政治联盟的破裂——的前提。

和1923年春天的情况不同，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预测事态发展的问题，也不是理论研究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经过严格核对的事实问题。尽管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尽管成立了受到国家保护的合作社，不过几年，工业发展的迟缓就已经把农村的控制权交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死敌。这个事实在1928年2月15日的《真理报》上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承认。

从这一切事实中，完全没有必要得出灰心丧气的结论。但是，首先必须把全部真实情况清楚地告诉党。不低估任何事实，也不美化任何事实。《真理报》社论虽然作了一些小小的、含糊其辞的保留，仍然是认真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正在于此。仅仅迈了这一步，它就大大缩短了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奉行的路线和过去五年

来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之间的距离。一切反对派人士对此只能表示欢迎。但是，在向前迈出这一步以后，接着至少退后了半步。由于采取了紧急的行政措施，从粮食收购观点来说，形势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时，代表官方乐观主义的机器立即重新开动起来。

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6月3日发展的最近一次纲领性宣言中说：

“在国内生产力普遍上升的基础上，尽管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富农的抵抗也增加了。”

如果是这样，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就没有大惊小怪的余地了。那么，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安心地继续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不要打断行动的路线。如果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富农——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在逐年下降，那么有什么理由要在富农面前如此突然地表现得“惊惶失措”呢？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于谁战胜谁。富农可以是“可怕的”，也可以是“无害的”，这完全取决于力量对比朝什么方向变化。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徒劳无益地企图在这方面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挽救点面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以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中日益超过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取得更大的优势的假设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实行粮食收购制时期所不得不奉行的整个行动方针已经从实践上否定了这个错误的论点，而《真理报》2月15日的社论肯定是对这个论点的公开驳斥。这在逻辑上怎么说得通呢？

如果在这三年丰收期间社会主义成分比非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或许我们仍然会发生商业和工业危机，表现为国营工业生产过剩，找不到相等的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我们发生的却是一次粮食收购危机。2月15日的《真理报》对这次危机作了正确的解释，指出这是由于农产品积累在农民特别是富农手中而缺乏相

等的工业品和它交换的结果。粮食收购危机——即结合的危机——由于三年丰收而更形严重。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总动力中，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和一般私有商品的成分比较起来已经削弱。

在一旦发现领导集团的盲目性以后，通过行政压力来纠正这种关系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这种纠正完全不能改变根本的结论。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已经有富农参预——即使仅仅是部分地参预——其中的政治力量。但是，不得不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武库中寻找应急的手段来加以应用，这个事实正好证明经济生活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利的变化。

然而另外还有一种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甚至更重要的准绳：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国民经济真正是在增长（这是真的），如果社会主义积累真正比私人积累增加得更快（象中央委员会违背事实所宣称的那样），那么就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已经恶化，为什么最近签订的集体合同变成了严重摩擦和激烈冲突的根源。当非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水平日益上升而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水平却日益下降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工人能够说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已经超过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而取得“优势”。这种影响工人切身利益的实践的准绳和理论上的准绳是完全协调的，是对中央委员会那种肤浅的形式上的乐观主义的一种驳斥。

在经济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这种客观证据面前，一切通过“统计数字”证明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更为突出的企图都是荒谬的。这样做等于一支军队的司令官在战斗中遭受损失以后，在被迫后撤并且放弃重要阵地以后，却企图利用巧妙的统计系数来证明优势在自己这一方面。不，富农已经证明（他们的论点比为适应乐观情绪而编造的统计数字更有说服力）：在使用经济武器的范围内，在

这场重要的战斗中，优势是在富农方面。劳动妇女的家庭预算也证明了这一点。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为活生生的经济进程所解决。如果数字和这场斗争产生的无可争辩的结果发生了矛盾，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证据发生了矛盾，那么这些数字就是骗人的，最多也只能说这些数字回答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的确，我们早在 1927 年就不仅有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完全可以容许的干涉的例子，而且有对统计数字进行完全不能容许的干涉的例子。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经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修饰过的统计资料几乎把富农完全“并吞”了。取得这场社会主义的胜利，只需要几天时间。

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统计数字也受到机关独断独行的做法的损害。即使我们把这些数字迎合需要的性质撇开不谈，仍然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统计数字，特别是我们所得到的关于最重要的过程的极为零碎的统计数字，总是落后于时间的。统计数字提供了这些过程在某一瞬间的横断面，没有抓住它们的发展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求助于理论。我们对这个过程的发展趋势作了正确的理论上的评价，事前就预计到：由于工业落后，即使丰收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也会促进农村中富农的发展和城市中排队买粮食的现象。事情发生了，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明。

从《真理报》2 月社论所总结的粮食收购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已经拥有带强迫性的、因此更加不可争辩的证据，说明随着国营经济的亏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所占的比重的下降——不平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与此同时，我们所得到的证据也说明农民的分化已经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至粮食收购工作的命运，即结合的命运已经处在拥有中农作为追随者的富农的直接支配之下。

如果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如果说我们目

前的经济的性质必然使资本主义势力有所增长,那么,过去一年来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和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有利于富农的变化就完全是领导集团奉行错误的阶级政策造成的结果。领导集团没有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有系统的调节,不是完全听之任之,就是歇斯底里地收紧缰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反对派从1923年以来就坚持指出,只有在有系统地逐年克服不平衡状态的基础上采取坚定的有计划的方针,我们才有可能使国营工业对农村发挥真正的领导作用;相反地,工业的落后必然会加深国内阶级矛盾,降低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达到的顶峰的比重。

因此,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企图采取的作法不同,我们并不把富农当作孤立的现象,而是以国营工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私有商品形式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作为基础来看待富农问题。在农村经济的范围内,我们也不是把富农看成孤立的现象,而是把他们和他们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农村的影响联系起来看。最后,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国内这两种带根本性的发展,而是把它们同通过进出口贸易而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看。

以这一切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在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写道:

“既然我们主要是从农村富裕阶层那里取得出口贸易所需的粮食和剩余原料,既然现在极力囤积粮食的正是这些阶层,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受到了主要是富农和富裕农民通过对外贸易实行的‘节制’。”

但是,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反对派提出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领导集团已经规定在将来某个时期讨论这些问题。有了前面所讲的一切,现在几乎完全不需要讨论这种荒谬的斯大林

主义的论点——每次出现需要亡羊补牢的情况，他们就向党提出这种论点。让我们仅仅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1928年3月9日，李可夫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就粮食收购问题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这次运动无疑具有突击工作的一切鲜明的特征。倘若有人问我：采取比较正常的方式，也就是说，不采取这种突击运动的方式来克服粮食收购危机是否更好些，那么我就会老实地回答说：是更好些。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失去时间，在粮食收购困难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睡大觉，我们没有及时采取为胜利地展开粮食收购运动所必需的一系列措施。”<sup>①</sup>

如果说这些话是从行政角度来认识这种延误，那么从政治角度来加以补充是并不困难的。为了及时实行必不可少的行政措施，就应当及时给党——国家机构的鼓舞者和指导者——提供有关总的方针的至少是粗略的资料，就象2月15日的《真理报》社论提供的资料那样。因此，这种延误并不属于行政的性质，而是属于党和政治的性质。反对派提出的原则性的警告本来应当及时认真地予以倾听，我们建议的实际措施本来应当得到严肃的讨论。

反对派去年提出了包括下列内容的建议，要求从百分之十的即最富裕的农民生产单位取得相当于一亿五千万到两亿普特粮食的强制性贷款。当时这个建议受到了严厉的攻击，被认为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他们教训党，认为对富农施加压力不可能不伤害中农（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或者说富农并不代表任何危险，因为——你们瞧——他们大概已经被约束在无产阶级专政范围以内了（布哈林）。但是今年就不得不求助于第一百零七条（即强制收购粮食的措施）<sup>140</sup>。在这样做以后，中央委

<sup>①</sup> 《真理报》1928年3月11日。——托洛茨基注

员会就不得不进行解释，认为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谈论是反革命的诽谤，虽然在这样做的前夕它还把反对派提出的更谨慎、更有系统的建议说成是战时共产主义。

只要不指白为黑、指鹿为马，那么正确的观点就应当是使我们有可能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对将来作出预见的观点。反对派的观点是符合这个定义的，然而官方统治集团的观点从来不符合这个定义。归根结蒂，事实比最高级的机关还要高出一头。在去年冬天开展了粮食收购运动以后，在这次运动给官方的政策和思想意识带来尖锐的危机以后，今天只有特权阶级歇斯底里症发作的人才会要求反对派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情况还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谁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和什么路线正确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在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出现转变的迹象以后，在最后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就是对党犯下最可鄙、最丑恶的罪行。党还没有机会查明情况。一切措施、争论和步骤是否真正有价值，完全取决于党是否澄清了自己的态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赢得原则性的阵地。未来尚未得到保证。每前进一步，接着就退后半步。

## 七 是机动手段还是新方针？

对目前这种向左转的变化应当如何估价呢？我们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同谋制定的机动手段，还是看成一种严肃的新方针，即恢复无产阶级路线和国际政策的方针呢？怀疑是完全合理的。

仅仅通过一个决议来分散党的注意力——这已经变成目前领导集团使用的根本方法。在工业化问题、贫农问题以及中国革命

问题上，他们通过了一个接一个的决定，其目的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说明情况和进行领导，而且刚刚相反，是为了弄虚作假，掩饰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列宁说过，在政治中，只有白痴才相信空话。即使是白痴，列宁死后的这个时期必然也教会他们如何克服这种易受欺骗的毛病。

这究竟是机动手段还是新方针的问题是一个涉及阶级相互关系及其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反映的问题。作为我国唯一的政党，苏联共产党通过党内各个集团而对不同阶级的压力作出不同的反应。

前面引用的《真理报》2月15日的“历史性”的社论，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在新的阶级集团在我们党内得到反映的问题上，作了值得注意的承认。这一点或许是这篇社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它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的组织中，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其他组织，最近都出现了某些党内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的阶级，不了解我们的阶级政策的基础，企图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工作：不触犯农村中的任何人，和富农和平相处，总的说来是要在农村的‘一切阶层’中保持声望。”

虽然这里指的是党员，但是上面这段话为新资产阶级即讲求实际的热月派<sup>117</sup>政客勾出了一幅几乎唯妙唯肖的画像，和共产党人的形象成为对比。然而，《真理报》完全没有解释这些分子是如何钻到党内来的。他们“出现了”——如此而已！他们从何而来呢？是通过什么门路进来的呢？他们是从党外渗透进来的吗？他们是怎样钻进来的呢？他们是从内部萌生出来的吗？从什么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呢？并且，请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党沿着它在农民问题上采取的路线不断“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下发生的。社论并没有接下去说明：为什么党居然可以不顾一再提出的警告，直到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sup>128</sup>和热月派分子已经在粮食收购政策上显



露出自己的行政权力的时候仍然加以忽视；为什么直到富农已经取得权威、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并且已经在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党还允许自己对他们视而不见。《真理报》对这一切完全未予解释。何必伤脑筋！1928年2月，我们才第一次听见中央机关报谈到我们早已知道而且不止一次指出过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列宁的党内不仅“出现了”而且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右翼，要求实行一种新的新经济政策，即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政策。

我在1927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曾经就这个问题写道：

“官方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在两个基本口号下进行的：反对两个政党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为反对两个政党而进行的虚假的斗争，掩饰了国内出现双重权力和在苏联共产党的旗帜掩护下在苏联共产党的右翼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在一系列办公室和书记的密室里，党的机关的扈从们正在和专家们，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教授们举行秘密会议，精心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方法和口号。这才是真正形成了第二个政党。这个党拼命想使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俯首听命于它，并且得到了部分的成功；它还力图铲除我们党的左翼。机构一方面掩饰这个第二党的形成，另一方面又指责反对派力图建立第二党——正因为反对派力图使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摆脱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压力，不这样做就绝对不可能挽救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如果认为只要使用蛊惑人心的词句，大谈党的不可分割性就可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幻想。究竟是一个党还是两个党的问题（按照唯物主义的、阶级的意义来看，而不是按照文字上的鼓动的意义来看），正取决于党内和无产阶级内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唤醒和动员进行抵抗的力量。”<sup>①</sup>

<sup>①</sup> 《论新阶段》。——托洛茨基注

6月间，斯大林曾经就第二党的问题对莫斯科最高学府的学生作过下述的解释：

“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经济，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经济。这些人不敢说要恢复地主经济，他们大概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可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更乐意说必须大力发展富农经济，以利于……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用不着证明，这种反动的‘计划’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sup>①</sup>

这番话不过是对《反对派政纲》第一章前言一部分内容的比较简单的阐述。我们并不隐蔽这一点只是由于，照我们看来，斯大林目前并没有因此遭到放逐的危险。诚然，斯大林在讲话中并没有公开提到形成第二党的问题。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党内有些“人”（什么人？）正在走富农资本主义经济路线，如果他们仅仅出于谨慎才不谈大规模地主经济；如果这些没有透露地址的“人”通过这个政纲而互相勾结起来，在粮食收购期间，在制定工业计划、工资标准等等期间以这个政纲作为指导，那么这些人正是新资产阶级政党即热月派的干部。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不走蒋介石、柏塞爾、富农以及官僚主义者的路线是可能的；应当说，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但是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又奉行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在《论新阶段》这份文件中表达的简单的思想。

由此可见，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而“出现”的右翼在粮食收购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6页。——编者注

期间第一次受到官方的注意。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再次证明了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团结。然而代表大会开过以后，第二天就发现富农之所以不为市场提供粮食，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是由于党内有势力的集团希望按照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戴季陶的指示，和一切阶级和平相处。无论是在所谓争论的时期还是在代表大会上，这些内部的国民党分子都没有发表意见。这些勇敢的“党员”当然是首先投票赞成把反对派当作“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他们也投票赞成一切左的决议，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决议是不起作用的。党内的热月派分子不是空谈家，而是行动家。他们和新的产业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官僚集团结成了特殊的联盟；他们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指导着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文化部门，甚至指导党的活动。但是，是否能够认为右翼分子十分软弱，不需要对他们进行斗争呢？

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目前向左转的整个趋势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初看起来，右翼似乎极其软弱。只要上面大吼一声就足以使粮食收购工作和——部分地说——整个对待农民的政策都立刻转上“左”的轨道。但是，结果来得异乎寻常的轻松，这个事实正应当成为一种警告，要求在有关右翼软弱性的问题上不要过分仓猝地作出结论。

右翼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孟什维克和调和主义性质的一翼，是拖着人往资产阶级方向走的一翼。在一个拥有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干部和几十万工人的政党里，如果右翼居然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公开按照自己的倾向办事，动员工人阶级群众，这将是一种绝对不可想象的现象。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作为非无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一种传导工具，右翼是强大的。这意味着党的右翼的力量存在于党外，存在于党的范围以外。它是官僚机构的力量，新业主的力

量,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正因为右翼是其他阶级的压力在党内的反映,它目前还没有能力公开提出自己的政纲,动员党的舆论。它需要一种掩护;它必须麻痹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使他们丧失警惕。机关的统治使它的两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机关大谈党的磐石般的团结,这就是在革命工人面前为右翼打掩护。同时,它又用打击反对派的方式恐吓工人,而反对派不过是无产阶级对本阶级专政的命运感到担心的有意识的表现。

机关和右翼之间存在的裂痕使右翼不得不缩短战线,边打边退,暂时观望一下,伺机再起。右翼分子很懂得:如果机关认真邀请党来分析局势,实行清党,铲除热月派分子,普通党员就会把右翼彻底清除出去,根本不需要求助于破坏者和暴徒。这样一来,党内就不再存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全世界资产阶级可以依靠的杠杆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肯定不会顿然消失,甚至也不会减少。但是它将不得不直接出面来反对党。这样,党就会面对面地看清敌人,从而可以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意图。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采取秘密的、地下的方式,通过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渗透而施加压力了。这种情况本身就等于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右派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另一事实:要求党对自己的思想和队伍进行认真的清洗是办不到的;由于采取的口号和追求的目标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至今一直主张的口号和目标,这些思想在最近几年来已经更加顽固得多了。如果要清洗,就必须剧烈地改变对待反对派的整个态度;否则中派主义机关毫无原则的丑态就会暴露无遗。右翼相信中派不敢大胆地改变立场。他们这样想是很有理由的。他们咬牙切齿地实行撤退,从而表明他们根本不愿意进行一场对他们自己和对中派都同样危险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对中派提出了要

求：不要改变党内的现状，也就是说，不要破坏右派和中派结成的反对左派的联盟；向左边倒的程度不要超过为目前这种紧急关头所绝对必须的程度；换句话说，要保持回头走老路并进而实行新的经济政策的可能性。

右派懂得，他们目前必须尽可能地对向左转的趋势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这<sup>只</sup>是<sup>一</sup>种<sup>机</sup>动<sup>手</sup>段<sup>。</sup>他们保持沉默，进行准备。他们期望左派进行的试验将由于外来的阶级反应、内部的磨擦、官僚机关的暗中抗拒、特别是中派主义天生的左右摇摆的倾向而以失败告终。右翼很熟悉他们的同盟者。在此期间，他们还极力损坏中派的名誉，向各方面表明中派并没有任何创造性，从一开始就只知道拾反对派的牙慧。

就中派来说，为了避免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们继续把反对派投入监狱。右派知道，机关给左派的打击越多，它对右派的依赖性也就越大。他们打算在左派的试验以失败告终时从防御转入进攻，实行报复（在目前的状况下，右派是坚决相信这一点的）。会发生这种情况吗？根本不能排除最后终于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要转变以党内保持现状为基础，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很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

这是否意味着目前这种摇摆没有发展成为左派路线的可能性呢？让我们坦率地说：既然这个问题取决于领导的预见性和一致性，不仅领导集团过去几年来奉行的政策，而且它目前的行为都使我们不得不对上述问题作出表示怀疑的答复。但是，中心问题正在于：开始时的机动手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深刻的政治上的摇摆，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越来越广泛的阶层都深深卷入其中。后面这些人对机动手段的运用，对领导集团为艺术而艺术地玩弄的领导艺术并不感兴趣；他们对转变所带来的客观的经济政治后果倒是感兴趣的。这方面情况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开始

实行这种转变的人的善意，他们的一贯性，总的说来是他们的意图，由于广泛得多的人的意志和利益的作用而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因此，否认目前这种摇摆有发展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

无论如何，反对派由于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必须尽力使目前这种摇摆发展下去，真正转上列宁主义的道路。这样一种结果将是最健康的，也就是说，将使党和专政只遭到最低限度的震动。这将是给党带来深刻改革的道路——也就是改革苏维埃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 八 目前危机的社会基础

党内斗争的杀伐之声仅仅是远为深刻的动乱的一种回音。各个阶级内部日积月累的变化如果不及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语言中得到表现，就会使整个十月革命面临痛苦的危机。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几乎还不到两个月，领导集团就迫不及待地代表大会期间还认为正确的方针断绝了关系。这种匆忙本身是一种明确无误的征兆，说明和整个国际形势相联系的国内阶级变化的过程已经达到一个危急的阶段，即从经济上的量变化为政治上的质变的阶段。这种情况是事前估计到的，从1923年以来已经多次加以阐述。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反对派在提纲中以下列方式表达了这个意见：

“在一个小农以至极小农和一般小业主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最重要的事件在一定时期以内是以极为分散和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后来却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爆发出来。”

很明显，仅仅对那些不善于在事态尚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就

对发展过程作出马克思主义的估计的人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富农率领中农进行的拒售粮食运动；沙赫特矿区专家和资本家的勾结<sup>141</sup>；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中有势力的集团为富农罢工提供的保护和半保护；共产党人对技术人员和职员暗中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居然能够视而不见；斯摩棱斯克及其他地方的恶棍在“铁的纪律”的幌子下所犯的肆无忌惮的罪行——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是极为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没有任何思想健全的共产党人胆敢说这都是偶然现象，说它们是没有代表性的，说它们并不是过去五年来的经济政治发展和党的领导集团的政策造成的。这些事实是可以而且应当预见到的。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提纲——这是谁都可以拿到的——说：

“富农、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同国家的而且还同党的官僚制度的许多环节相结合，乃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无疑问，因而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萌芽。”

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6月3日发表的宣言或通告承认在国家机构内，在党和工会内部，存在着“最恶劣的官僚主义”。这份通告企图把官僚主义解释为：（1）过去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残余；（2）是群众落后和愚昧的产物；（3）是由于他们“缺乏行政管理知识”；（4）是由于没有足够迅速地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上述四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而且都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存在官僚主义的原因。但是，它们都不能说明官僚主义会这样疯狂地、肆无忌惮地得到发展。过去五年来，群众的文化水平应当是提高了。党的机关应当已经学会更迅速地吸引群众来参加管理工作。新一代在苏维埃环境中培养起来的人应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旧职员的工作。既然如此，官僚主义就应当减少。但是，关键问题正在于官僚主义已经大大增加，已经成为“最恶劣的官僚主义”；它已

经使自上而下通过命令实行镇压等行政手段、恫吓、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压制、徇私舞弊、干部的互相串通勾结、谄上欺下等等成为一种制度。尽管苏维埃经济已经发展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而旧的阶级机构的这些倾向却异常迅速地重新抬头了。这个事实有它的阶级根源，也就是说，是由于业主的社会地位巩固了，是由于他们和国家机构有了紧密的联系，并且通过这个机构对党施加了压力。如果不理解政权日益官僚化的阶级根源，反对这种罪恶的斗争常常就象一座只会空转而不能磨粮食的风车。

工业发展的迟缓已经在价格上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剪刀差”。官僚主义者为降低价格而进行的斗争仅仅扰乱了市场，剥夺了工人而并未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农民从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大量利益正在遭受工业品价格的吞噬。这种情况损害了联盟，把农村中广大阶层驱赶到大喊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自由化口号的富农那边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商人找到了便于发展的土壤和掩护，国外的资产阶级也获得了一个基地。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是抱着绝大的希望走向革命的；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幻想。因此，在发展速度迟缓、物质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对苏维埃政权在较短时期内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能力所抱的期望必然会减少。

世界革命的失败，特别是过去几年来共产国际已经掌握领导权以后所遭受的失败，也造成了同样的趋势。这些失败不可能不给工人阶级对待世界革命的态度带来新的调子；在期望方面表现很大的保留；意气消沉的分子中间会产生怀疑；而在尚不成熟的人中间则会表现露骨的猜疑甚至激怒。

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估价会设法表现出来。如果表现在党内，最先进的阶层或许会对国际革命，特别是本国的革命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可能不象从前那样天真，那样得意洋洋，而是



比较带批判性，然而另一方面，会比从前更为平衡，更为稳健。但是，这些新的思想、判断、愿望和忧虑都受到压制，不能表达出来。无产阶级五年来生活在这样一个老的、著名的口号下面：“不要思想！领导比你更有头脑。”这种情况起初激起了愤怒，后来造成了消极被动情绪，最后则迫使人们蜷缩到政治外壳里过着限制重重的生活。四面八方的人都告诉工人说，以致工人自己最后也这么说：“要知道，现在不是 1918 年。”

不仅通过国家机构或工会，而且通过日常的经济生活和每天的生活状况，都可以感觉到无产阶级所占的比重下降了。和无产阶级敌对或半敌对的阶级和集团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小资产阶级和日益增强的中等资产阶级中间那些在政治上活跃的阶层表现的自信心增加了。后者已经恢复了他们和整个“机构”之间的友谊，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家庭纽带，坚决相信他们的日子正在到来。

苏联国际地位的恶化，世界资本主义在最老练、最疯狂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率领下施加的敌对的压力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使国内资产阶级里面最顽固的分子得以重新抬头。

这就是造成十月革命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场危机在富农最近举行的拒售粮食运动中和官僚主义者身上得到了部分的表现。党内危机是这种危机的最普遍、最危险的一种反映。

因此，不言而喻，现在尚不可能预测，至少是不能遥遥地预测，目前尚处于半隐蔽状态的走向双重权力的过程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公开表现到政治领域里来。这主要决定于国际形势，而不仅决定于国内的政策。有一点是清楚的：革命的路线并不是观望等待、东猜西想，一直等到不断增加的敌人抓住有利机会发动攻势；革命的路线要求我们自己在敌人——正如德国俗话所说——大大抬头以前就发动攻势。已经失去的年代是回不来的了。中央

委员会对于主要是由于它自己的政策而造成的险恶的形势终于发出了警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仅仅发出警报和一般性的呼吁是不够的。甚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当领导集团还把对富农施加压力的口号纯粹当作文字游戏的时候，反对派就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

“压制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如果认真对待的话，就要求改变整个政策，使所有国家机关奉行新的方针。必须确切而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要知道，无论是富农还是贫农都没有忘记，中央委员会在两年当中（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间）所坚持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提纲的作者们所以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方针，是以为改变政策似乎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不克服一些阶级的激烈反抗和动员另一些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

即使在目前，这些话仍然具有充分的力量。过去使党从列宁主义的道路上转上右派和中派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到的。为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建立一个有势力的、不“承认”阶级的集团并且使这个集团得到巩固；为了使党不正式注意这个集团的存在并且使领导集团可以多年否认它的存在；为了使这个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揭露出来的集团不是通过党、而是通过……粮食交易所而正式暴露出来——为了这一切就进行了五年的支持新方针的不断宣传，此外还加上斯大林主义者和布哈林主义者贩卖的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和嘲弄饥民寄生心理的成千上万私货；加上对统计机构的宰割（仅仅因为它们注意到了富农的存在）；加上没有头脑的干部的全面告捷；加上新的“讲坛社会主义者”<sup>10</sup>、马克思主义诡辩学家宣传学派的形成等等其他许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为了这一切而对无产阶级左翼进行了恶毒的、不顾后果的、粗暴的、背叛性的、专横的迫害。与此同时，党内一切

热月派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巩固（用《真理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是“出现了”），为自己建立了各种联系、纽带，取得了各方面的同情，把他们的根远远伸到党外，深深伸进广大的阶级土壤中去。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小小一纸通告——无论这份通告写得多么简短有力——所能消灭的。必须进行再教育。必须进行修正。必须重新排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深犁来耕耘这片荒草丛生的田地。

企图用反对派软弱无力的想法来麻痹自己和麻痹党，这和针对反对派进行的凶猛的斗争是无法调和的。反对派拥有曾经受过事件进程考验的行动纲领以及曾经在迫害的烈火中受过锻炼的、对党的忠诚毫不动摇的干部。这种干部代表着日益上升的历史路线，他们是推不倒、打不乱的。反对派是党的宝剑上的钢刃。破坏了这道钢刃，用来反对敌人宝剑就钝而无用了。反对派的问题是整个左派路线的枢纽。

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地发展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除外部和内部的危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是这种看法和布哈林主义的经院哲学给我们描绘得娓娓动听的绝望的宿命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危机是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决定它是无法摆脱危机的。这决不是说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政策无足轻重。正确的政策可以促进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错误的政策则使它们遭到毁灭或阻碍。

官方的经院哲学完全不能理解在机械决定论（宿命论）和主观自我意志之间还存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宿命论认为：“面临如此落后的状况，什么也办不成。”庸俗的主观主义认为：“这有何难！我们有决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局势和国内落后状况的依赖，那么，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你就可以爬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进入胜利的世界革命。”

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坚定而巩固地夺得政权以前，过渡性的苏维埃政权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统治政策的任务就是要防止苏维埃政权内部危机的积累，使它不至发展成为整个政权的危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维护、发展和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自觉。而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灵活而积极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的工具。

## 九 党的危机

一种正确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一样，不能仅仅依靠从1923年以来就没有得到公认的一种正确的表述来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只有在不断探明一切社会阶层的情况的基础上才是可以想象的。不仅如此，这种探索不能依靠行动迟缓、缺陷重重、态度僵硬而感觉迟钝的官僚机构作为媒介来完成，而必须通过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共产主义的侦察兵、开拓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来实现。在富农的作用日益增长的情况能够通过统计数字予以表现以前，在这种情况下为理论家概括总结并为政治家化为指示以前，党必须善于通过自己的无数触角感觉出来，发出警报。但是要做到这一切，整个党就必须感觉敏锐，行动灵活，首先必须敢于观察、敢于认识、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由于各个托拉斯和工厂之间的竞争，由于劳动群众所处的沉重的物质地位，由于劳苦人民中占重要地位的阶层的文化水平不够，我国国营工业是极为分散的。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工业的社会性质，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作用，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自愿的内部团结，取决于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干部、车间核心成员等等有意识地服从纪律，并且通过这一切来加以保证。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系统正在削弱、崩溃和瓦解，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不言而喻，国营工业、运输业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很快就会荡然无存了。托拉斯和各个工厂就会开始自行其是。目前已经如此薄弱的有计划的开端就会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将会达到除力量对比以外就毫无约束的程度。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开始将变成法律上的一纸空文，以后连这种法律上的存在也会被打而光。由此可见，在这里，问题也归结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有意地保持团结，必须保护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它不受官僚主义的侵蚀和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毒害。

作为一种制度来说，一种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如果党内缺乏制定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方法的话。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由于某种推动力的影响，官僚主义的领导可能胡乱碰上一条正确的路线。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实际上继续执行这条路线而不会在明天再次予以抛弃。

在党实行专政的条件下，领导集团手里集中了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政治组织也不曾单独掌握过的空前巨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领导方法是极为必要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官僚主义的每一种歪曲，每走错一步，都会立即在整个工人阶级当中引起反响。在此期间，在列宁去世以后，领导集团已经逐渐习惯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敌视，扩大为对自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保证措施的敌视，然而党要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繁荣发展，并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才有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

这是列宁在生命最后阶段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曾经充分考虑过它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列宁在第一次生病以后回来工作时，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党内官僚主义的滋长大为震惊。因此他才建议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当然，不是现

在存在的、和列宁设想完全相反的这种中央监察委员会。列宁曾经提醒过党：在历史上，征服者蜕化变质、接受被征服者的道德原则的例子并不罕见。每当他听到有故意冤枉好人或掌握权力的共产党人粗暴对待下级的消息（奥尔忠尼启泽打人事件<sup>142</sup>），他都会感到怒火中烧。他曾经针对斯大林的粗暴、针对内在品德上的残忍对党提出过警告。这种残忍和不忠顺是血缘姊妹，一旦掌握全部权力就会成为毁灭党的可怕工具。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列宁才热烈呼吁，要求注意文化和文化的发展——不是指布哈林现在玩弄的廉价的小玩意，而是要求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反对亚细亚式的道德原则，反对封建主义和粗俗习气的遗迹，反对干部利用群众的天真无知。

同时，在过去五年期间，党的机关却奉行着刚好相反的方针；它已经彻头彻尾地沾染了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残疾，更加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苦心孤诣地造成的特殊歪曲——欺骗、蒙蔽、两面三刀。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领导集团，这个集团不是有意识地实行党的民主，而是为了加强党的官僚制度而伪造和篡改列宁主义；在对待共产党人和工人方面极端地、令人不能容忍地滥用权力；通过欺骗手段操纵党的整个选举机构；在讨论过程中使用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政权可能引以为荣的、然而决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加以吹嘘的手段（挑选出来的打手，按照命令吹口哨，揶揄喧闹，把发言者推下讲台，以及其他类似的令人厌恶的行为）；最后一点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机关和党的关系上完全缺乏同志间的团结和真诚。

党的报刊已经在耸人听闻的揭露的幌子下公布了阿尔季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其他案件。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对腐化进行斗争的呼吁。问题到此似乎就算了结了，事实上是尚未开始。

首先，党内广大人士不能不感觉到，已经公布的只是一小部

分——并没有谈正在发生的总的情况，只是谈已经暴露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己的“斯摩棱斯克”事件，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甚至不是今年才有的。早在“自我批评”时代以前，赤塔、赫尔松、弗拉基米尔和其他许多地方都爆发了这种事件，只是立刻就被扑灭下去了；百分之百的区委书记都被揭露出来，他们曾经偷偷地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浪费大笔资财来维持自己家庭的仆从。每当这种事件暴露出来，都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成百的人，有时甚至上千的人，上千的党员对这些罪行了若指掌，但是都绝口不谈。他们保持沉默的时间常常长达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甚至报纸也提到过这种状况。但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因为要是这样做，就有必要完全重复反对派文件曾经非常谨慎温和地说过的那些话。不得出必要的结论，斯摩棱斯克和其他事件的暴露仍然只是耸人听闻的新闻。它们使党感到激动，并没有起教育作用，倒是分散了党的注意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关越脱离党的控制而独立，机关的扈从彼此之间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相互保险并不是地方性的“琐事”，而是官僚统治的根本特点。机关的某些扈从尽情干坏事，其他的人则保持沉默。党员群众呢？党员群众都吓怕了。真的，在曾经实现十月革命的列宁的党里，工人党员却害怕大声说出机关的某个百分之百的扈从是一个流氓、一个侵吞公款者、一个恶霸。这是“斯摩棱斯克”事件揭露出来以后提供的根本教训。受到这种教训而不感到羞愧，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从社会意义上说，阿尔季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等等事件的主角是谁呢？他是一个已经摆脱党的积极控制、已经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旗手的官僚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已经枯竭，在道德上则放荡不羁。他是一个享受特权、不负责任的干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极为粗野的人，一个酒囊饭袋，一个恶霸。一言以蔽之，是一

个杰尔治摩尔达<sup>143</sup>（见列宁论民族问题的信件。这封信没有向党公布）。但是我们的主角有他自己的“特色”：当他对人拳足交加、浪费国家资源或者是接受贿赂的时候，苏维埃的杰尔治摩尔达不是凭着“上帝的意志”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发誓赌咒。当下面有任何人企图指摘他的时候，他不是象过去那样大叫“造反啦！”而是狂呼“托派分子！”——于是就胜利了。

5月16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个领导人写的文章。文章从斯摩棱斯克事件中总结出下列教训：

“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我们对待那些明明知道弊病存在然而噤若寒蝉的党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态度。”

“改变我们的态度？”那么，对待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吗？是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雅柯夫列夫承认这一点。对于犯罪行为知情不报的人本身也应当被当作罪犯。唯一可以减轻他们的罪过的情况是他们本人愚昧无知或者是被恐怖镇慑住了。然而雅柯夫列夫指的不是愚昧无知的人，而是“党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恐怖，居然能够迫使工人党员对于按理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且对他们负责的个人所犯的罪行保持可耻的沉默呢？难道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不可能，因为这种恐怖是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那么，这是否是说：这种压力和恐怖来自其他的阶级？显然是这样的，因为超阶级的社会压力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党所受的压迫的阶级性在于：党的机关的扈从们狼狈为奸；党的机关有许多环节已经同国家官僚机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里的富农成为一体；世界资产阶级对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施加的压力——这一切凑起来就产生了通过党的机关对党施加压力的社会双重政权的基本因素。这种社会压力几年来已经有所增加；机关正是利用这种压力来威胁



党的无产阶级核心，迫害反对派，并且通过组织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一定限度内，外来阶级压力提高了机关的地位，使它站在党的头上，加强了它，并且使它具有信心。机关根本不考虑它自己的“权力”来自何处。它沾沾自喜地把它对党、对列宁主义取得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聪明机智。但是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而日益增加的压力已经超过这个限度，它所威胁的已经不只是机关的统治，而是比这重要得多的东西。现在已经开始感到尾大不掉之苦。

使绝大多数党员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不敢谈论党机关的扈从们所犯的罪行的局面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种局面也不是大笔一挥就可以消灭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机关内部强有力的官僚主义常规，而且有围绕这个机关形成的、由各种利益和联系交织成的一层硬壳。而我们的领导集团在自己的机关前面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类似历史规律的东西：领导集团对党的依赖越小，他们受机关束缚的程度就越大。所谓反对派想要削弱集中领导的一切说法都是荒谬绝伦的。没有铁一般的集中制，就不能想象会有一条无产阶级路线。但是，不幸的是，目前的领导恰恰只是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力量才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这就是说，对被人为地弄成一盘散沙的党员群众，它是有力的，但是对它自己的机关，它却毫无办法。

为了逃避他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后果，中派主义者特别强调“自我批评”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sup>①</sup>但是，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接近了他不得跨越的一个界限。因为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批评实际上首先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摆脱并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1页。——编者注

且彻底摧毁这样一些错误的幻想：例如“四个阶级的结合”；一国社会主义；保守的工会首領的“我们一定不要吓坏资产阶级”之类的口号；东方要建立“两个阶级”的政党；以及过去这个时期斯大林和布哈林强迫人们接受的其他反动废话。过去三年来，他们曾经使用孟什维主义的刀对中国革命任意加以宰割，直到扼杀革命为止。这才是真正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的手术刀的地方！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恰恰就禁止在这里运用这把手术刀。斯大林再次提出威胁，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sup>①</sup>来反对这种批评。他不懂得，根本不存在足以阻止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中取得胜利的力量或办法。

\* \* \*

在1927年召开的一次全会上，反对派在一篇演说中指出：反对派有权利呼吁党来反对领导。莫洛托夫在回答时说：“这是造反！”斯大林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要扫除这些干部，就必须发动内战。”<sup>②</sup>这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对统治机构的“超党派”、“超阶级”、自成一体性质的最完整最坦率的表述。这种思想和作为我们党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官僚主义超人的思想是产生目前这种零打碎敲的篡夺的泉源，并且在无意中为可能发生的全面篡夺准备条件。这种思想是在过去五年中形成的，是在永无休止的、虚伪的“重新估计”的过程中，在自上而下地加紧控制、任命人员和进行迫害的过程中，在伪造选举的过程中，在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撇在一边一年、两年或四年……的过程中形成的，简而言之，是在“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最上层来说，这是与日益和生活本身发生冲突的思想进行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7页。——编者注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50页。——编者注

的一场殊死斗争；从基础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争夺职务、争夺指挥权和争夺特权地位的一场疯狂的赌博。在这两种情况下，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反对派。提出的论点和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无需多说，党的机关的大多数扈从是忠诚老实的，是能够自我牺牲的。但是，整个问题在于制度。而制度却是一种必然会产生斯摩棱斯克事件的制度。

善意的干部认为解决最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公式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党必须回答说：“并不是你们必须实行改变，而是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你们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撤换你们。”

写于1928年7月12日。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36年纽约英文版第257—307页。

## 注 释

- 1 《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年由列宁创办。《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

《火星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倡议和在他的直接参与下制定了党纲草案，准备了在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一个专门的决议中宣布《火星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

但从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五十二号起，孟什维克在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下夺取了《火星报》，把它变成了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从这时起党内就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第2、7、26、514、620页。

- 2 《曙光》杂志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1901年至1902年由《火星报》编辑部在斯图加特出版。——第2页。
- 3 这个典故出自谢德林的寓言《熊都督》。一只叫做托普狄京第一的熊，被狮王派往森林里去当都督。它为了名登史册，扬言要搞大屠杀，结果却在睡眼朦胧中吃了只小黄雀。——第2页。
- 4 雅各宾派又称山岳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1794年热月反革命政变后被解散。——第3、14、168、202、224、310、403、444、724页。
- 5 这里指的是让·饶勒斯于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和他的拥护者。饶勒斯分子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在议会里同激进派组成“左派联盟”，

- 支持激进政府。1905年他的党同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领导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第4页。
- 6 《工人事业》是俄国经济派的杂志，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1899年4月至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第28页。
- 7 指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使《火星报》组织同一些其他的地方性组织联合而建立的组织委员会。它于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成立，在《火星报》（1903年1月15日第32号）上敦促各委员会和各地方组织共同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并为此请求能够承担共同的和统一的任务（虽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性）。《工人事业》杂志及其组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激烈反对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的计划。——第28页。
- 8 马尔托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反对“戒严状态”的斗争》（1904年日内瓦版）一书中的用语。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尔托夫就用这个词来诬蔑列宁的做法，说他想把戒严状态运用到党内来。——第29页。
- 9 暗指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的结束语。列宁在结束语中把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并且指出会出现第四个时期。列宁说：“我们深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深信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深信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所‘代替’。”（《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88页）——第29页。
- 10 讲坛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大学中的教授——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瓦格纳、施穆勒、布伦坦诺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的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32、977页。
- 11 卢比孔河是古代作为南阿尔卑斯高卢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境线的河流。——第43页。
- 12 米勒兰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而得名。

米勒兰于 1899 年参加了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并协助资产阶级执行其政策。

1900 年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关于社会党人是否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妥协性的决议。决议谴责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允许社会党人在“特殊”情况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法国社会党人利用这项附带条件,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进行辩护。——第 44 页。

- 13 全名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 1894 年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日内瓦成立。它印刷革命书刊, 出版《工作者》文集。最初联合会由劳动解放社领导, 它的出版物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后来由于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 1898 年 11 月劳动解放社在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声明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1900 年 4 月劳动解放社和同它观点一致的人退出了联合会, 并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解散联合会的决议。——第 48 页。
- 14 《解放》杂志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非法机关刊物, 1902—1905 年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第 49 页。
- 15 门诺派是新教再浸礼派中的一派, 因创始者荷兰人门诺·西蒙斯而得名。——第 61 页。
- 16 山岳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 因坐在会议大厅最高处而得名。大多数成员都参加雅各宾俱乐部。1792 年 10 月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 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第 61、168、726 页。
- 17 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派别。这一派别的首领有许多出身于吉伦特省, 所以称为吉伦特派。吉伦特派于 1792 年执政后反对进一步深入进行革命, 同雅各宾派和革命民主力量进行斗争。后来公开走上反革命和背叛民族的道路。——第 61、724 页。
- 18 劳动解放社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于 1883 年在日内瓦创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 一直存在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 年)。

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跨出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它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译成俄文，在国外刊印并在俄国秘密传播。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给了民粹主义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劳动解放社也有严重错误：民粹主义观点的残余、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这些错误成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一些成员后来的孟什维主义观点的胚胎。——第 68、550 页。

19 全名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由列宁发起于 1901 年 10 月成立。参加同盟的有《火星报》、《曙光》杂志的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包括劳动解放社）。同盟是《火星报》的国外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具有党章所规定的委员会的权利。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在同盟内隐藏起来，从内部来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第 68 页。

20 因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布朗基而得名。参见注 21。——第 77、136 页。

21 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布朗基为首的一个流派。

布朗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革命运动，两次被判死刑，差不多有半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列宁认为布朗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同时又坚决地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是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列宁全集》第 10 卷第 361 页）——第 77、171、220、560、810 页。

22 指托洛茨基自己。他曾作为西伯利亚联盟的代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他写了一篇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经过修改并增加了一篇跋以后于 1903 年在日内瓦出版。——第 82 页。

23 布朗热主义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的反动沙文主义运动，因其领导人布朗热将军而得名。

布朗热曾经批评执政的温和的共和派的政策，假装反对保皇派，企图借此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赢得威望，并且利用他们对政府的不

满来获取个人的名利。暗地里布朗热同保皇派保持联系，接受保皇派的津贴。

这一运动的口号是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和解散议会。由于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运动不久就瓦解了。——第 82 页。

- 24 《新时报》是俄国反动的贵族和官僚集团的日报，1868—1917 年在彼得堡出版。——第 86、508 页。
- 25 《我们的生活报》是靠近俄国立宪民主党左翼的报纸，从 1904 年 11 月 6 日（19 日）至 1906 年 7 月 11 日（24 日）在彼得堡不定期出版。——第 86 页。
- 26 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部族之一。五世纪初叶占据西班牙的一部分。439 年在非洲北部建立了王国。455 年占领罗马，使罗马遭受严重的破坏。533—534 年汪达尔人的国家被拜占廷征服。后来汪达尔人一词常常被用作野蛮行为的同义语。——第 88 页。
- 27 梅姆烈佐夫是俄国作家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中的人物。他是一个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因此梅姆烈佐夫一词是沙皇警察专横的同义语。——第 96 页。
- 28 《北极星》杂志是政治哲学杂志，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1905—1906 年在彼得堡出版。——第 100 页。
- 29 布里根杜马是 1905 年沙皇政府答应成立的咨议性“代议机关”。建立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和杜马选举条例是由内务大臣布里根主持的委员会拟订，并于 1905 年 8 月 6 日（公历 19 日）颁布的。布尔什维克宣布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旋风刮走了。”（《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253 页）——第 101 页。
- 30 据古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鲁斯特设置了一张床，强迫过路的人躺在他的床上，比床长的就砍掉他的脚，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普罗克鲁斯特床这个典故往往被用来譬喻范围过分狭小、同物体或现象不相称的情况。——第 101 页。
- 31 摩西是圣经传说中的先知，传说他使古代犹太人摆脱了埃及法老的迫害。——第 105 页。
- 32 故事出自圣经《出埃及记》。当法老追袭以色列人来到红海边时，摩西向海伸杖，海水便分成两半，以色列人就走了过去；而当埃及人也走下去时，他又向海伸杖，海水复合，将埃及人淹没。——第 105 页。



- 33 《开端报》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05年11—12月在彼得堡出版。——第106、216、372、731页。
- 34 《我们的言论报》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的报纸，1915—1916年在巴黎出版。——第119、179、250、255、272、280页。
- 35 巴贝夫密谋是1796年在法国发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这次运动由以巴贝夫为首的秘密团体“平等派”领导。“平等派”的目的是实现旨在通过对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改造以达到人们之间真正平等的革命。这次革命被设想为一次贫民起义，推翻执政府和建立劳动人民的革命专政，这一专政将实行一系列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措施。密谋于1796年5月泄露，参加者一部分被处死，一部分被流放。——第129页。
- 36 法朗吉是十九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种组织中有富人和穷人，有资本家和工人，人们共同劳动，集体消费，但并不废除私有制。全体成员的财产构成股份基金。法朗吉经营商业、农业和工业，所得的收入一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另一部分作为对技术和才能的报酬，再一部分作为资本的利润。傅立叶曾劝说并等候富人投资建立这种组织，但是他的希望没有实现。在他死后，他的门徒于三、四十年代在法国和美国作过几次失败的实验。——第129页。
- 37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是第二国际的执行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1905年至1912年，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148、804页。
- 38 《信使报》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日报，1906年5月17日（30日）至6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代替原来的《涅瓦报》。共出了二十五号。《信使报》停刊后孟什维克出版了《劳动呼声报》。——第152页。
- 39 《评论》是孟什维克的文集，1906年和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文集一共出了三册。——第152页。
- 40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代表俄国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政党，于1905年沙皇的10月17日（公历30日）诏书颁布后成立。被革命吓坏了的沙皇在诏书中答应给人民以公民权。十月党人在口头上承认诏书，事实上并不想对沙皇制度实行什么限制，他们完全拥护沙皇政府

的内外政策。从1906年秋天起，十月党成了执政党。俄国二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参加临时政府，积极反对俄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第157、274页。

- 41 劳动派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

劳动派要求按劳动额平均分配土地(由此得名劳动派)，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

在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一起投入了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第157页。

- 42 即1906年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土地问题，对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组织问题。

孟什维克在大会上占了多数，因而在许多问题上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土地纲领以及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等等)。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第164、656页。

- 43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它所联合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遭到代表大会的坚决拒绝，崩得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年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分子一直支持孟什维克，不断反对布尔什维克。崩得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崩得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要求相对立。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把崩得开除出党。崩得是托洛茨基组织的反党的八月联盟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1917年崩得支持反革命的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加入党的某些崩得分子是两面派，目的是要从内部破坏党。后来他们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第166页。

- 44 长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革命人民大众的最流行的称呼。人们把穿长裤的人叫做“长裤汉”，以别于穿短裤和丝袜的贵族和富有的资产者。——第168、191、202页。
- 45 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被驱散以后，杜马中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二百名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举行维堡会议，通过了《人民代表告人民书》，即所谓维堡宣言。宣言号召人民对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沙皇没有规定选举新的杜马以前不要纳税，新兵不要应征入伍。这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使民众脱离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积极的革命斗争。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承认“消极抵抗”“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第172页。
- 46 托洛茨基的这个提案是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所通过的组织章程的第七条的。该条规定中央委员会“任命在其监督下工作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托洛茨基援引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同《前进报》编辑部的冲突事件作为提案的理由（1905年《前进报》在埃斯内尔·库尔特为首的机会主义编辑部的控制下，采取了反对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立场，引起广大党员的不满，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解散了这个编辑部）。托洛茨基的提案企图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置于同等的地位，恢复两个中央。他的提案得到了孟什维克的支持，但为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所否决。——第174页。
- 47 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颁布新的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法。新选举法大大削减工农代表名额，从而保证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盘据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被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六三政变标志反革命势力的暂时胜利，并为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奠定了基础。——第178、276页。
- 48 《新时代》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178、200、372页。
- 49 巴枯宁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因米·亚·巴枯宁而得名。巴枯宁主义主张阶级平等，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鼓吹工人阶级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把国家看作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实现无政府状态。列宁称巴枯宁主义是“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列宁全集》第18卷第11页）。——第179页。

- 50 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是俄国自由派地主的非法政治团体，1903年11月成立。同盟的主要宗旨是在有限的立宪制基础上同沙皇政府进行勾结。1905年7月同“解放社”共同成立了立宪民主党组织委员会，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同盟即不再存在。——第185、203页。
- 51 “解放社”是1904年彼·司徒卢威在国外成立的自由保皇派组织。“解放社”拥护君主立宪，渴望同沙皇政府勾结，用假“民主主义”来掩饰其反对革命的斗争。“解放派”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第185、203页。
- 52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 hic salta! ——转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第197页。
- 53 一个法国人不知道俄国常见的酸果蔓是一种小灌木而错误地把它描写为一种大树。后来人们把“酸果蔓”一词用以形容外国人因不了解某国情况而发生的错误可笑的观念和现象。——第198页。
- 54 1905年1月9日枪杀示威群众的事件以后，由于罢工运动笼罩着彼得堡，于是在1月29日成立了以参议员尼·弗·施德洛夫斯基为首的政府委员会。表面上这个委员会是为了“查明工人不满的原因”而组织的，实际上是为了迷惑工人群众，使他们离开革命斗争。这个企图被揭穿之后，1905年2月该委员会被解散。——第200页。
- 55 十月十七日宣言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的十月政治罢工达到高潮时所颁布的宣言。沙皇允许人民有“公民自由”和成立“立法杜马”。这个宣言是专制政府所玩弄的政治手腕。沙皇政府企图赢得时间来聚集力量以便破坏罢工和进一步粉碎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彻底揭穿了这个宣言的欺骗人民的企图，号召无产阶级准备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第201页。
- 56 《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从1905年10月30日至12月27日以公报的形式出版，报道苏维埃活动的情况。——第201页。
- 57 内阁主义或称米勒兰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反动内阁而得名。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详见注12。——第213、232、300页。

- 58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1911年在日内瓦、巴黎出版。——第214页。
- 59 桑科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小说主人公唐·吉珂德的仆人，是一个纯朴谨慎的农民。——第219页。
- 60 “协会联合会”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于1905年5月在十四个协会的代表组成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这十四个协会是按职业如律师、作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成立的。代表大会要求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1906年底，协会联合会宣告解散。——第224页。
- 61 人民社会党人是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该党提出了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人民社会党人拒绝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性的原则，主张以赎买的办法征收地主的土地。列宁称人民社会党人是“市侩机会主义者”、“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社会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投入反革命阵营。——第224页。
- 62 《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是在罗莎·卢森堡参与下出版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杂志，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第225页。
- 63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内心矛盾、犹豫不决、耽于幻想而不能坚决行动的人的典型。——第238页。
- 64 最后通牒派是变相的召回派。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组织中进行活动。他们坚决拒绝参加杜马、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群众组织，力图把自己局限在秘密组织里。他们企图使党不能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使党脱离非党群众，遭受反动派的打击。
- 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只是形式上不同。他们主张先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不被接受，就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杜马中召回。列宁把最后通牒派叫做“羞答答的召回派”。——第238页。
- 65 反社会党人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

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反社会党人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44页。

- 66 《光线报》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1912—1913年在彼得堡出版。——第247页。
- 67 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不顾列宁的反对召开会议并作出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派，停止出版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报》和把属于布尔什维克的部分财产交中央委员会，其余的现款交第三者保管。结果这笔钱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考茨基、梅林、蔡特金保管。后来列宁利用这笔钱办了党报。托洛茨基在这里故意混淆视听，污蔑列宁。——第247页。
- 68 即1915年9月5—8日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考茨基主义多数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列宁把左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其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国际主义者的反战立场。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篇宣言，认为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代表会议谴责了“社会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和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号召欧洲工人展开反对战争的斗争，争取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代表会议选出了国际社会党委员会。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使国际主义分子分离出来并使他们团结起来，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没有采取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第250页。
- 69 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建立的革命组织，后来又称为斯巴达克派。详见注124。——第250页。
- 70 《共产党人》是列宁创办的杂志，1915年9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日内瓦出版。——第250页。

- 71 组织委员会是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1912年在孟什维克取消派以及一切反党集团和派别联合举行的八月会议上成立，到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改选后停止活动。——第255页。
- 72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从1908年2月出版到1917年1月，一共出了五十八号。创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各号移至国外出版，最初在巴黎，后来在日内瓦。自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第255、299页。
- 73 《我们的曙光》杂志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259页。
- 74 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欧洲人把北非的基本居民称为摩尔人。席勒的悲剧《热那亚的费埃斯柯的阴谋》中的“摩尔人已经干完了自己的事，摩尔人可以走开了”这句话已经成了典故，它比喻一个人完成了某种不光彩的任务之后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第268页。
- 75 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实行反动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颁布新的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法。六三政变开始了以“六三政制”著称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详见注47。——第273页。
- 76 进步党人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进步党人就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列宁全集》第18卷第496页）。1912年11月进步党人形成了独立的政党。——第274页。
- 77 1917年4月，丹麦社会民主党人柏格别尔格来到彼得格勒，代表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工人党的联合委员会邀请俄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共同讨论缔结和约问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都先后决定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并担任会议的发起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估计到社会沙文主义者一定会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因而坚决反对参加这个会议，并揭穿了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8月6日（19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问题时，加米涅夫号召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不同意加米涅夫的发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指斥了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决定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8月16日（29日）在《无产者报》上又刊载了列宁的一封信《论

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后来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没有开成。——第 282、566 页。

78 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7 年 3 月 2 日（15 日）至 1917 年 8 月 1 日（14 日）在彼得格勒出版。——第 283 页。

79 这里指的是列宁 1915 年 8 月 23 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四十四号上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第 299 页。

80 热那亚会议于 1922 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19 日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苏维埃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德国等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美国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

在会议上，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利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困难，强迫它接受条件苛刻的协定。它们要求偿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借的外债，要求把收归国有的企业等等归还给外国的企业主。

苏维埃代表团拒绝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理要求。由于法英两国对苏俄采取敌对立场，会议中断。这些问题被移交到 1922 年 6—7 月在海牙召开的专家会议上去讨论。海牙会议也和热那亚会议一样毫无结果。——第 302 页。

81 莫斯科会议是临时政府为了动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力量而在 1917 年 8 月 12 日（25 日）举行的。莫斯科国务会议的成员决定了它的反革命本质。参加会议的多半是商人和工业家、地主和银行家、沙皇杜马的成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也夫、卡列金等将军在会议上提出了镇压革命的计划。克伦斯基在演说中威胁说要镇压革命运动，说要用武力制止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企图。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宣言中号召无产阶级抗议莫斯科会议。——第 304 页。

82 根据传说，公元前 390 年，当高卢人进犯罗马时，卡皮托里（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城市的捍卫者驻守在这里）由于尤诺纳教堂里的鹅的叫声惊醒了卫兵而得救。——第 306 页。

83 1918 年 2 月 18 日，由于德国向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进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当天早晨和晚上都召开了会议。在早晨的这次会议上，列宁提议把讨论的问题归结为要不要发出建议和谈的电报，并让大家表示态度。托洛茨基反对发出建议和谈的电报。——第 319 页。

84 即乌克兰中央拉达，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1917 年 4 月在基辅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大会上成立。十月革命



- 胜利后，拉达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开始走上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1917年12月和1918年1月间，乌克兰各地发生了反对反革命的拉达的武装起义，并恢复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1月，在乌克兰的苏维埃军队转入进攻，1月26日（2月8日）占领了基辅，推翻了资产阶级拉达的统治。——第321、331页。
- 85 乌克兰中央拉达于1918年1月11日发表的第四宣言宣布乌克兰脱离俄国，以便与德帝国主义者进行谈判，由后者来占领乌克兰和消灭苏维埃政权。——第321页。
- 86 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及其家庭由于进行反革命活动，于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在烈韦里由爱斯兰苏维埃边区执行委员会予以逮捕。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表现在在烈韦里建立德国谍报中心和帮助德国人实行军事占领，为致德皇威廉的关于在爱斯兰建立以霍亨索伦皇室的一个成员为首的君主国的信征集签名，等等。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他们于1918年4月获释。——第328页。
- 87 交通总政治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1919年2月建立的直属俄共（布）中央的临时政治工作机关，1920年1月改组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处。建立交通总政治部的目的是采取非常措施，防止交通运输因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受到彻底破坏；在运输工人当中加强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加强铁路员工工会并把它变成进一步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工具。交通总政治部在铁路上实行军事纪律，使铁路完全服从战时任务。交通总政治部的特殊工作方法使交通运输业免于彻底崩溃，但同时却助长了官僚主义，产生了脱离群众、放弃工会工作的民主方法的倾向。1920年，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建设，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2月7日的决议，交通总政治部被撤销。——第336、352、367页。
- 88 工人反对派是1920年下半年在俄共（布）党内形成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首领是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等人。工人反对派提出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他们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意义；把工会同党和苏维埃国家对立起来，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工人反对派，并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是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后来，被打垮的工人反对派的余孽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勾结在一起。——第363、428、657页。

- 89 《打铁场》是文艺杂志，1920—1922年在莫斯科出版。——第390、394页。
- 90 谢拉皮翁兄弟派是1921年在苏俄出现的一个文学团体，提出文学不问政治的论点。该团体的名称取自德国小说家霍夫曼所著小说的书名。——第392页。
- 91 《红色处女地》是最早的一种苏维埃文学艺术和政论杂志，1921—1942年在莫斯科出版。——第392页。
- 92 “工人集团”是在1923年初由“工人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米雅斯尼柯夫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孟什维主义的地下反革命集团。参加者有因进行反党活动而被开除出党的人，持反对派观点的党员和非党员。“工人集团”的反革命宣言攻击共产国际，要求在苏联建立“新的苏维埃”，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人以政治活动自由。
- 1923年夏天，工人集团企图利用国内的经济困难组织总罢工，但得不到群众的任何支持。1923年9月工人集团的反革命活动被揭露并被取缔。——第437页。
- 93 指1921年3月德国中部地区工人举行的起义。由于德国共产党“左派”的错误，推动德国工人阶级过早地走上发动的道路。德国资产阶级利用这一点，煽动工人在不利的时机举行武装发动。虽然工人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是由于得不到其他工业区工人的支持，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列宁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同时批评了德国共产党“左派”的错误。列宁指出：“三月发动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领导者犯了错误，但这无关紧要。数十万工人英勇地进行了斗争。”（《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0页）——第450页。
- 94 《红色年鉴》是学术研究杂志，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会所属党史研究所机关刊物。1922—1934年和1936—1937年出版。——第454页。
- 95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据传说，阿基里斯除脚跟外，全身刀枪不入。他是由于被箭射中了他的脚跟，即他身上唯一致命的地方而死去的。后来人们用“阿基里斯之踵”来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最弱的一环。——第463页。
- 96 “六六六”是《新约全书》启示录第十三章中使用的一个神秘数字。该文用寓言形式把古罗马暴君尼禄皇帝比作猛兽，称之为“六六六”。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犹太人开始把他们的字母当作表示数目的符号来使用。

- 他们赋予每个字母一个数值，在谈到某种隐语时，用组成这个隐语的各个字母的数值之和来表示。尼禄皇帝一词的各个字母的数值之和恰好是“六六六”。——第 467 页。
- 97 第一一五七号命令是一项专管汽车修理的命令。——第 473 页。
- 98 法穆索夫是俄国著名作家格利鲍耶陀夫所著喜剧《聪明误》中的人物。他是俄国农奴制时代的一个贵族，以自信和自满著称，喜欢用自己庸俗的处世之道教育青年。——第 483 页。
- 99 1920 年苏波战争结束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 1921 年 3 月 18 日与波兰在里加签订了和约，即里加和约。这个条约宣布结束战争，并记载了苏波两国的国境线。波兰被迫放弃它对右岸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野心，而依照里加和约的规定，仍保有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里加和约的有效期限到 1939 年为止。1939 年 11 月，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根据这两个地区人民的意志加入了苏联。——第 505 页。
- 100 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是个多愁善感、虚假伪善的地主。马尼洛夫精神是马尼洛夫所特有的性格特征的总称，已经成为表明想入非非、游手好闲、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通用语。——第 510 页。
- 101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角，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奥勃洛摩夫精神这个词一般用来表明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和宗法式的落后性。——第 511 页。
- 102 连纳事件是指 1912 年 4 月 4 日沙皇政府对在英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俄国股东控制下的西伯利亚连纳金矿的工人所进行的屠杀。当时曾有六千工人参加罢工，在罢工期间，工人举行和平示威，抗议残酷剥削以及不堪忍受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遭到沙皇军队的射击，工人死伤五百余名。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用群众性的罢工和抗议性的示威游行来回答连纳惨案，因而形成了 1912—1914 年俄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开端。——第 542 页。
- 103 七月事变是指 1917 年 7 月 3—4 日（公历 16—17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游行示威所引起的事件。7 月 3 日（公历 16 日），维堡区工人和士兵开始了自发的反对临时政府的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很可能变成武装起义。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央委员会考虑了群众的

情绪以后,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使游行示威成为和平的、有组织的运动。这次游行示威是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者达五十万人以上。

临时政府下令开枪射击游行示威的群众,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被封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是这次反革命镇压的帮凶。

七月事变以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变成了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告终。布尔什维克党转入秘密状态,并开始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第 552 页。

- 104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于 1917 年 4 月 24—29 日(公历 5 月 7—12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举行的第一次公开的代表会议,它起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

代表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关于目前形势、关于战争、关于临时政府、关于苏维埃、关于土地问题、关于民族问题等等)上的路线。

列宁在报告中发挥了他在四月提纲中所阐述的原理,指出党的任务是要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党应该采取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当前任务。

代表会议通过了没收地主土地交农民委员会支配和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的决议。

斯大林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代表会议揭穿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达可夫、李可夫等人的反列宁的机会主义路线,一致拥护列宁,推行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路线。——第 560、619 页。

- 105 《新生活报》是孟什维克的日报,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机关报。这个集团联合了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拥护者和半孟什维克派的个别知识分子。该报于 1917 年 4 月在彼得格勒创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因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的立场,于 1918 年 7 月被封闭。——第 579 页。

- 106 这里日期有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致彼得格勒、莫斯科、莫斯科省、芬兰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致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致北方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即《论时局》）这封信写于1917年10月11日。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2页。——第608页。
- 107 据希腊神话，居住在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之王”宙斯是一个雷神，他手持闪电，愤怒时便雷霆大发。——第611页。
- 108 塔拉斯·布尔巴是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为自己的祖国而斗争的意志坚强的战士。——第614页。
- 109 波拿巴主义是大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波拿巴·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方法是各国资产阶级所惯用的统治方法，在一定阶段是反革命统治的主要形式。——第629、669、722页。
- 110 唐·吉珂德是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浪漫夸大、不切实际的人物。——第632页。
- 111 英俄委员会全称英俄统一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起，于1925年4月6日至8日在伦敦举行的英苏工会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英俄委员会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主席、书记和两个组织各推举委员三名组成。由于英国工联反动首领们的背叛政策，该委员会于1927年秋宣告结束。——第662、714、741、771、943页。
- 112 即红色工会国际，是革命的工会国际联合组织，1921年成立，1937年底解散。工会国际团结了革命的工会，坚持了共产国际的立场。——第663页。
- 113 阿姆斯特丹国际是1919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国际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改良主义工会国际联合组织。阿姆斯特丹国际奉行改良主义政策，公开和资产阶级合作，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姆斯特丹国际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1945年12月14日，由于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阿姆斯特丹国际才正式解散。——第663、741、786、889页。

- 114 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起在彼得格勒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从1917年8月1日(14日)起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8年3月12日在莫斯科以《农、工、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当时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的机关报。从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以后,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1938年1月起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机关报,以《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简称《消息报》。——第677页。
- 115 门罗主义是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所阐述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门罗主义宣布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它的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实质就是美国以南北美洲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许其他国家染指。后来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国在西半球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698页。
- 116 雅罗斯拉夫车站事件是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组织的一次反党政治示威事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派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斯米尔加到远东工作,但他一连几个星期对中央的决定实行怠工。1927年6月9日,在斯米尔加动身的时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在车站组织的、以给斯米尔加送行为借口的反党政治示威。托洛茨基在雅罗斯拉夫车站向参加示威的人发表了演说。参加这次示威的除了派别机关召集的反对派分子外,还有当时在车站上的普通群众。——第712页。
- 117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推翻雅各宾专政的反革命政变的参加者,称为热月派。热月派后来成为蜕化分子的同义语。——第725、745、807、819、967页。
- 118 波拿巴派是在第一帝国(1804—1814年)和第二帝国(1852—1870年)覆灭后拥护在法国恢复波拿巴王朝的人。——第725页。
- 119 指热月派于法国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实行的反革命政变。这次政变处死了大批革命的雅各宾派如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托洛茨基用这个词来污蔑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原来的组织形式和旗号之下,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反动势力正在成长起来。——第725页。
- 120 《新生活报》是列宁领导下出版的第一份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实际上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12月在彼得堡出版。  
——第731页。

- 121 八月联盟是1912年托洛茨基组织的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和派别的无原则的联盟。反党的八月联盟中包括有取消派分子、站在取消派立场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召回派分子。1913—1914年间，反党的八月联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打击下崩溃了。——第731页。
- 122 维也纳代表会议是在1912年8月12日(25日)—20日(9月2日)取消派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代表会议，大部分代表都居住在国外，同俄国国内的党的地方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企图用这次会议来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会议通过的反党纲领，暴露了这次会议的机会主义性质。纲领没有提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民族自决权等革命口号，而是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改土地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主义的要求。托洛茨基在会议上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统一”与“和解”的虚伪的言辞来掩盖他取消地下党的企图。反党的八月联盟就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组织起来的。——第732页。
- 123 《新世界报》是由一批俄国侨民出版的孟什维克倾向的报纸，1911—1917年在纽约出版。——第733页。
- 124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大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在它的周围，形成国际派。从1916年起，国际派开始出版了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1918年11月，在德国革命过程中斯巴达克派形成了斯巴达克联盟。同年12月建立德国共产党。——第733页。
- 125 总委员会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第一届于1921年选出。——第741、799、822页。
- 126 这里指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派别之一，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在工人当中散布有可能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幻想，主张“和平地”用基尔特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鼓吹在现有工联的基础上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门的生产者联合会，即所谓“基尔特”，由这种“基尔特”来管理工业生

产。基尔特社会主义鼓吹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实行“产业民主”或“产业自治”，引诱工人阶级脱离革命斗争。——第745页。

127 热月政变是热月派于法国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实行的反革命政变。详见注119。——第766、825页。

128 因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政论家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而得名。尼·乌斯特里亚洛夫在确信不能用外国武装干涉的办法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以后，就转而采取同苏维埃政府合作的立场。他指望通过在苏维埃体制内部工作，资本主义就会向苏维埃机体逐渐渗透而导致复辟。——第767、967页。

129 路标转换派是由一伙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俄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集团。1921年，这个集团在布拉格出版《路标转换》文集，以后于1921—1922年又在巴黎出版《路标转换》杂志，路标转换派之名即由此而来。路标转换派确信不能用外国武装干涉的办法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以后，就指望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会使苏维埃政权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第772页。

130 崩得分子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的成员。详见注43。——第784页。

131 即《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是由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文件。制定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当时成批地想要参加共产国际的中派分子。这样的中派分子的党派中有英国独立工党、意大利社会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等。可参看《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1—187页。——第796页。

132 《纽约时报》是美国的日报。1851年创刊。该报同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集团都有联系，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宣传美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方针。——第803页。

133 《工人报》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88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列宁称之为“维也纳社会主义叛徒”的报纸。

1934年该报被封闭。1945年复刊，成为奥地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第803页。

134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派别之一。详见注126。——第807页。

135 《舵报》是白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于1920年11月至1931年10月在



柏林出版。——第 838 页。

- 136 克列索是法国的一个地方。施奈德公司在那里设立的钢铁和兵工厂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厂之一。——第 927 页。
- 137 大西岛是神话中的岛屿，传说位于大西洋中。柏拉图和古代其他作家曾经提到过它，说它是在一次地震后沉没的。——第 936 页。
- 138 1923 年，德国共产党人曾经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在萨克森州议会和政府中构成大多数。但是德国共产党在右派分子布兰德勒等人领导下，向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不抵抗路线投降，终于导致失败。——第 947 页。
- 139 托洛茨基在这里指的是被开除出党的原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于 1927 年 11 月 27 日通过决议，反对联共(布)把加米涅夫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把穆拉洛夫等人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的措施。1928 年 3 月，支持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这些比共领导人被开除出党。——第 950 页。
- 140 即苏联刑法第一百零七条。该条规定在富农和投机分子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时，由法庭判处没收其余粮。——第 965 页。
- 141 指 1928 年在顿涅茨矿区沙赫特区发现的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矿山的事件。这些专家秉承外国军事间谍机关的旨意，用错误的方法采煤，减少产量，损坏机器，甚至炸毁和火烧矿井、工厂和电站。他们还用恶化劳动条件的办法引起工人的不满情绪。——第 974 页。
- 142 有一次在关于格鲁吉亚民族问题的争论中，当双方的争论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了一个反对他的格鲁吉亚青年的耳光。当时由中央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一个委员会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列宁。1922 年 12 月 30 日列宁在他的一份口授记录中提到了这件事：“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泽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经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628 页）——第 981 页。
- 143 杰尔治摩尔达是果戈里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警察，体格粗壮，膂力过人，愚蠢而又粗野，动辄挥拳打人。——第 983 页。

## 人名索引

### A

阿布拉莫维奇,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 (Абрамович, 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1880—1963)——俄国崩得派首领之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1920年移居德国,和马尔托夫出版孟什维克的反革命的《社会主义通报》。1923年是统一的第二国际执行局的组织者和成员之一。三十年代迁居美国。——第166页。

阿德勒,维克多 (Adler, Victor 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1889—1895年曾与恩格斯通信,恩格斯逝世后转到改良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18年任奥地利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长。——第419页。

阿夫杰也夫,伊·阿·(Авдеев, И.А.)——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联共(布)中央委员。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第752页。

阿基莫夫(Акимов 1872—1921)(真名马赫诺韦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Махновец, 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经济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极端机会主义者。在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反火星派分子,大会后是孟什维主义极右翼的代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退党。——第2—3页。

阿克雪里罗得,巴维尔·波里索维奇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1928)——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七十年代是民粹派。1883年参加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是《火星报》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首领之一。1912年参加反党的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敌视苏维埃政权。——第17、35、38、41、45、74—75、78、259、273、276、730页。

阿列克谢也夫,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 (Алексее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7—1918)——沙俄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古拉二世的参谋长。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最高总司令,后来任临时政府军事顾问。十月革命后同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一起在北高加索组织反革命白卫“志愿军”,进行武装叛乱。——第289页。

阿列克辛斯基,格里哥里·阿列克谢也维奇 (Алексин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生于187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反革命分子。1905—1907年

革命时期是布尔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召回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7月同军事反间谍机关一起编造文件，诬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8年4月逃往国外。——第152—154、162、164、174页。

阿斯特罗夫(Астров 死于1922年)(真名波韦斯，伊萨克·谢尔盖也维奇 Повес, Исаак Сергеевич)——俄国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第273页。

阿特兰蒂库斯——见巴洛德。

埃尔科利——见陶里亚蒂。

爱尔威，古斯塔夫(Hervé, Gustave)——法国社会党人，政论家，律师。1906年创办《社会战争报》宣传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和布尔什维克。1918年被开除出社会党。——第269、292页。

艾伯特，弗里德里希(Ebert, Friedrich 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之一。1891年入党。1905年起是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13年起是执行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初期担任帝国首相，领导所谓的“人民代表委员会”；1919年1月勾结反动军方镇压了柏林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1919—1925年任德国总统。在其总统任内，社会民主党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残酷镇压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第451页。

安东诺夫，阿·斯·(Антонов, А.С.)——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20年是坦波夫省富农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反苏维埃叛乱的军事首领。——第673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 Вл-

ад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4—1936)——1917年5月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堡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攻击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陆海军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参加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至5月是南俄苏维埃军队司令；1919年1月至6月是乌克兰战线司令。1922—1924年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23—1927年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第498页。

奥弗相尼科夫(Овсянников)——第504页。

奥加诺夫斯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Оган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生于1874年)——苏联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1917年以前是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1915—1916年主持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统计局。1917年是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土地总委员会委员。1921—1924年是农业人民委员部统计处处长。后来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商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委从事学术和教学工作。——第841页。

奥拉尔，弗朗索瓦·维克多·阿尔丰斯(Aulard, François Victor Alphonse 1849—1928)——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激进党党员。1886—1922年任索邦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曾任“法国革命史研究会”首席秘书和《法国革命》杂志主编。主要著作是《法国革命政治史》(1901年)。——第727页。

奥里明斯基，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Ольминский, 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1863—1933)——俄国革命运动最老的活动家之一，职业革命家，作家。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委。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在巴库进行党的工作。1911—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报纸和杂志的工作。1915—1917年做党的工作。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后来主持俄共(布)中央党史研究部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编辑，列宁研究院院委会委员。——第370—371页。

奥尔忠尼启泽，格里哥里·康斯坦丁诺维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86—1937)——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党中央俄国局委员。十月革命后任乌克兰和南俄特派专员。国内战争时期任集团军和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先后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主席、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1926年起历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1926年起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第593、711—712、716、718、729—737、981页。

奥索夫斯基(Оссовский)——托洛茨基分子。他的企图论证苏联应建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反革命“理论”被称为“奥索夫斯基主义”。1926年8月被开除出联共(布)。——第657页。

奥霍特尼科夫(Охотников 生于1897年)。——第716页。

##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1760—1797)(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

nçois Noël)——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是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反映了新兴法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号召用革命的方法消灭私有制。他的观点是他在1796年所领导的“平等派的密谋”的纲领。密谋是一次乌托邦共产主义革命运动。1796年5月密谋泄露，第二年5月27日巴贝夫被杀害。——第129页。

巴甫洛夫，伊万·彼得罗维奇(Павлов,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动物和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创立者。1890年起任军医学院教授。1906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终生从事研究工作，在血液循环生理、消化生理和高级神经活动这三个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打下了科学基础。——第395页。

巴甫洛维奇——见克拉西柯夫。

巴卡也夫，伊万·彼得罗维奇(Бакаев,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1887—193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第三师(乌拉尔战线)和第二师(彼得格勒战线)政委。1919—1920年是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主席。以后是列宁格勒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是反对中央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团员，代表大会后加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第716、752、864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敌人。1849年5月参加德累斯顿起义，10月在德国被

捕，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忏悔书》，背叛革命。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到伦敦，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进行阴谋破坏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24、35页。

巴洛德，卡尔(Balod, Karl 1864—1931)——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生于拉脱维亚。1905年起是柏林大学教授，1919—1931年是拉脱维亚大学教授。写过一些经济问题方面的著作，其中有《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产和消费》一书。——第129—132页。

白里安，阿里斯蒂德(Briand, Aristide 1862—193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律师。法国社会党书记。1902年当选为议员，成为公开敌视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客。1906年因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被开除出社会党。1909—1911年任“三个叛徒(白里安、米勒兰、维维安尼)内阁”总理。1909—1931年间任总理十一次，任外交部长十七次。——第281页。

保罗-邦库尔，约瑟夫(Paul-Boncour, Joseph 1873—197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国会议员。1916—1931年和1945年以后是社会党人。1931—1938年是共和派社会党人首领之一。曾任总理、陆军部长和外交部长。1932—1936年是法国驻国际联盟代表。——第798页。

鲍尔温，斯坦利(Baldwin, Standley 1867—1947)——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1923—1924年、1924—1929年和1935—1937年任英国首相。任内镇压1926年英国无产阶级的总罢

工，干涉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制造了1927年的英苏断交。是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的“绥靖政策”的鼓吹者和执行者之一。——第662页。

鲍威尔，奥托(Bauer, Otto 1882—1938) (维贝尔·亨利希 Weber Heinrich)——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首领之一，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炮制者之一。1918—1919年任奥地利共和国外交部长。1921年是第二国际的创建人之一。主张议会斗争和和平过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曾参与镇压奥地利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第666、668—669、678、797、803、921—923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年、1891年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列宁批评了他的错误，肯定了他的功绩。——第61、87、419页。

贝勒斯，约翰(Bellers, John)——英国教友会的一个地主。——第129—130页。  
比岑科，阿娜斯塔西娅·阿列克谢也夫娜(Биценко, Анастас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生于1875年)——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作为左派社会

革命党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工作，曾作为苏维埃代表团团员参加布列斯特和谈。比岑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多数尖锐对立，主张缔结和约，完全接受列宁的纲领。1918年七月事变以后因在一系列问题上同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意见不一致而退党，1918年11月加入俄共(布)。——第318页。

彼得罗夫斯基，德·阿·(Петровский, Д. А. 1886—1937)——1902年至1919年是崩得分子。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1924年是共和国军事学校管理总局委员和局长。1924年至1930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后来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学校管理总局局长。——第801页。

彼得罗夫斯基，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Петров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78—1958)——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团。1914年被捕。1917—1919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19—1939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26—1939年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1940年起任苏联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第786页。

彼得松，阿·阿·(Петерсон, А. А.)——曾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第752、864页。

彼舍霍诺夫，阿列克塞·瓦西里也维奇(Пешехонов, 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7—1933)——九十年代是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1904年起任《俄国财富》杂志编委。1906年起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首领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粮食部长。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第602页。

俾斯麦，奥托(Bismark, Otto 1815—1896)——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年)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年)。代表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用铁血手段实现了德国的统一。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镇压工人运动。——第98、107、146页。

毕洛夫，伯恩哈德(Bülow, Bernhard 1849—1929)——德国政治活动家。1897—1900年任外交大臣。1900—1909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他曾提出为德帝国主义的利益而重新瓜分世界的庞大的侵略纲领。毕洛夫政府的政策旨在加强德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和扩张殖民地，因而使英德和俄德之间的矛盾益形尖锐。——第87、132页。

别德内依，杰米扬(Белный, Демьян 1883—1945)(真名普里德沃罗夫，叶菲姆·阿列克谢也维奇 Придворов, Ефим Алексеевич)——苏维埃俄罗斯诗人。1911年起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发表诗和寓言。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时期参加红军，写诗歌颂革命战士，讽刺敌人。后期作品反映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中的精神面貌。著名的诗有《送行》、《大街》、《速度》等。——第393页。

别尔嘉也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4—1948)——俄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秘论者。早期是合法马

- 克思主义者。后来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寻神说的一个代表人物。极端仇视十月革命，1922年被驱逐出国。——第72页。
- 波克罗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Покр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8—1932）——苏联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905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后任莫斯科省人民委员会主席。1918年初作为苏维埃代表团团员参加布列斯特和谈，短时间加入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签订和约。1918年起至去世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3—1927年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第318页。
- 波隆斯卡娅，伊丽莎白·格里哥里也夫娜（Полонская, Елизавет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生于1890年）——苏维埃俄罗斯女诗人。在创作生涯中受到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极大影响。——第393页。
- 波洛夫策夫，普·阿·（Половцев, П.А. 生于1874年）——俄国将军，1917年夏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在七月事变中指挥开枪射击彼得格勒的和平示威者和捣毁《真理报》编辑部。十月革命后是白俄分子。——第306页。
- 伯恩斯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81—1890年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恩格斯逝世后，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1899年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1902年以后曾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71—73、77、419、475、698页。
- 伯尔契（Birch）——美国共产党人，曾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693页。
- 柏塞尔，艾伯特·阿瑟（Purcell, Albert Arthur 1872—1936）——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英国社会党党员。1924—1927年是阿姆斯特丹国际主席。英俄统一委员会创建人之一。1926年英国全国总罢工期间支持右派首领。——第662、714—716、722、732、737、741—742、746、811、820、822、969页。
- 勃罗伊多（Бройдо）——第716页。
- 博尔迪加，亚马多（Bordiga, Amadeo 1889—1970）——1910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加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以前是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共产国际第二、四、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30年因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第657页。
- 博尔夏特，尤利安（Borchardt, Julian 1868—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在《德国国际主义社会党人》杂志周围形成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派别，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但是博尔夏特及其派别不理解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和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在战争快要结束时转到工团主义立场上去了。战后博尔夏特脱离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第251页。
- 布尔加柯夫，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Булгак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1—1944)——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九十年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驳斥民粹派关于俄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后来转向批判马克思主义,最后公开赞扬资本主义。1905年革命失败后参加立宪民主党,宣扬哲学神秘主义。1918年起成为宗教活动者。1922年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被驱逐出国。——第71—72页。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莫斯科工人区进行宣传工作。1911年侨居国外,研究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国家、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上反对列宁的思想。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真理报》主编等职。1918年组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先是采取“缓冲”立场,后来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1928年与李可夫等人结成右倾反党集团。1929年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主席团。1937年被清除出党。1938年被判处死刑。——第345、347、362、364、427、472、511、520、524、526、664、686—687、693、720、733、741—743、771—772、787、797、804、809、819—820、824、833—836、838—839、867、889—890、902、906—907、917—921、924—925、927、929—930、932、936—937、940、955—958、965、981、985页。

布兰德勒,亨利希(Brandler, Heinrich 1881—1967)——189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斯巴达克联盟。德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是德共党员。1919—1923年是德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1921年持“左派”立场。1922—1923年犯过许多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年被开除出党。——第736页。

布兰特(Brandt)——波兰共产党人。曾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693页。

布里根,亚历山大·格里哥里也维奇(Булыг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51—1919)——俄国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大地主。1905年受沙皇委托主持起草关于召开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令草案。但是这个杜马还没有召开就被革命粉碎了。——第101页。

布里瓦尔(Brival)——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右翼,热月派分子,国民公会秘书。——第725—726页。

布伦坦诺,路约(Brentano, Lujo 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教授。鼓吹放弃阶级斗争,认为通过组织改良主义工会和工厂立法就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在土地问题上维护反动的小农经济稳固论和荒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晚年公开颂扬帝国主义。——第475页。

## C

蔡特金,克拉拉(Zetkin, Clara 1857—193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188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属左翼。积极参加反对伯恩施坦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1916年参加



创建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底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1921年起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领导国际妇女书记处。

——第247、256页。

策烈铁里,伊拉克利·格奥尔基也维奇(Церетели, 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1882—1959)——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护国派。同年5—7月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七月事变后任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反革命政府首脑之一。苏维埃政权在格鲁吉亚胜利后逃往国外。——第119—120、158、160—161、283—284、300、305—310、313、566、587、602、732、822页。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49—1919)——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早期是民粹派。1883年参加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首领之一。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第48、730页。

查扬诺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Чая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1888年)——苏联经济学家。农业经济文献中的所谓新民粹派代表之一。反革命组织“劳动农民党”的首领之一。敌视十月革命,反对把土地交给农民。无产阶级革命后提出富农合作制的思想。积极支持富农向苏维埃合作社渗透。联共(布)党内右倾的幕后思想鼓舞者。——第786页。

##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在《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揭示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学说和著作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达尔文学说的某些错误和不足方面。——第730页。

达尼洛夫——见唐恩。

达申斯基,伊格纳齐(Daszynski, Ignacy 1886—1936)——波兰政治活动家。1892—1919年领导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后来是统一波兰社会党(右派)首领之一。从1919年起三次当选为波兰议会议员,并担任波兰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1920年任波兰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副总理。支持波兰皮尔苏茨基的法西斯政变和法西斯制度。——第145页。

大卫,爱德华(David, Eduard 1836—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经济学家。1903年起是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9年参加德意志共和国第一届联合政府,1919—1920年任内务部长,1922—1927年任政府驻黑森的代表。列宁说他是“毕生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运动的分子”。——第294页。

戴季陶——第970页。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派右翼领袖。1792年共和国建立后任司法部长,后来是国民公会巴黎代

表，公安委员会委员。在外敌入侵、国势危殆时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但在革命后期表现动摇，要求削弱革命专政，成为新富有的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1794年4月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第66、724页。

杜鲍夫斯科伊 (Дубовской)——第390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 (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 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重农学派的最大的代表。他在担任财政总稽核 (1774—1776年) 时曾进行过一些进步改革 (废除谷物贸易的限制，取消行会团体和同业公会等)。——第58页。

杜尔诺沃，彼得·尼古拉也维奇 (Дурново,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4—1915)——沙俄的反动官僚代表人物。1905—1906年任内务大臣，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06年随维特内阁辞职，被任命为国务会议成员。——第105页。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65—1919)——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九十年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后为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成为乌克兰反革命势力的骨干分子，曾任资产阶级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的财政部长。他在九十年代的主要著作有《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过去和现在的俄国工厂》等。——第124页。

多加多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Додог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军役。1918年起在喀山任工会理事会主席，

后任鞑靼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1930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曾任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在工会问题上曾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第786页。

## E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78、96、98、100、311、387、419、550、567、680、698、791、806、907、923、930页。

## F

费舍，路特 (Fischer, Ruth 1895—1961)——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首领之一。1924年费舍—马斯洛夫集团窃取了德共中央的领导权，阻挠党在革命低潮时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反对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1925年被解除领导职务，1926年因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第657页。

费谢列夫，姆·斯·(Фишелев, М.С.)——第620—821、827页。

冯玉祥——第742、820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 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 (1848—1916年)。对内实行镇压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对巴尔干实行扩张政策，同沙俄的利益发生冲突，把奥匈帝国拖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145页。

弗兰格尔，彼得·尼古拉也维奇 (Врангель,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8—1928)——沙俄将军。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是英法美帝国

主义的走狗，俄国南部反革命首领之一。1920年4—11月是俄国南部反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被红军击溃后逃往国外。——第338、358、818—819、825、828页。

弗鲁姆金，莫伊塞·伊里奇(Фрумкин, Моисей Ильич 1878—1939)——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直到1922年)。1920年是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后来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晚些时候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副财政人民委员和其他负责的职务。——第879页。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奥地利医生和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理论的创立者，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所谓的弗洛伊德学说的观点的体系。——第388、395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改良主义首领之一。1879—1880年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718、923—925页。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描绘了一切人类才能都可得到发挥的未来社会的情景。他认为由工业和农业生产部门组成的“法郎吉”即协作社是新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个社会将建立一种和谐的制度，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劳动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劳

动生产率很高，实行按劳动、资本和技能分配的原则。他已有了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以及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思想萌芽。但他始终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没有想到用革命的方法，而只是以对人的重新教育和用慈善家的资金组织“法郎吉”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主要著作有《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和《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世界》。——第129—130、132页。

## G

盖得，茹尔(Guesde, Jules 1845—1922) (真名巴季尔，马蒂约·茹尔 Basile, Mathieu Jules)——法国工人党创建人之一，第二国际首领之一。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拥护巴黎公社。1877年创办《平等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878年和拉法格等人创建法国工人党，曾反对党内机会主义。1901年参加创建法兰西社会党。二十世纪初逐渐转向机会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第288、300、419页。

盖森，约瑟夫·弗拉基米罗维奇(Гессен, Иосиф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66—1943)——俄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立宪民主党创建人和首领之一，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同米留可夫一起编辑过《人民自由报》，后来编辑《言语报》。十月革命后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积极帮助白卫将军尤登尼奇，后来是白俄分子，在言论中恶毒污蔑布尔什维克。——第101页。

高尔察克，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3—1920)——沙俄海军上将。1918—1919年是俄国反革命头子之一，依靠美帝国主义和协约国的支持，在鄂木斯克建立伪军事独裁政权，僭称“俄国最高执政者和陆海军总司令”，曾占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一带。1919年被红军击溃，次年1月被擒，2月被枪决。——第338、358页。

高尔基，马克西姆(Горький, Максим 1868—1936)(真名彼什科夫，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Пешков,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1892年起开始发表作品。1901年起因参加革命工作几次被捕。1905年和列宁会面，思想上受很大影响。1906年发表长篇小说《母亲》，反映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十月革命后参加社会主义文化活动。1934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其他重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反映资产阶级家庭三代历史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描写革命前四十年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许多政论、特写、回忆录、文学论文等。——第399页。

戈洛晓金，菲力浦·伊萨也维奇(Голощёкин, Филипп Исаевич 1876—1941)——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1906年起是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09年是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12年在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俄共(布)乌拉尔区域委员会书记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委员、萨马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布)哈萨克斯坦边区委员会书记。从1933年起是苏联

人民委员会所属的首席国家仲裁人。——第825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德国诗人和思想家。他的后期最重要的著作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尔的求学时代》、《威廉·迈斯特尔的漫游年代》和诗剧《浮士德》，描述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德国生活，解决了一些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文化、经济、美学等问题。——第390、399页。

格拉茨，古斯塔夫(Gratz, Gustav 1875—1946)——奥匈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917年是匈牙利财政大臣，1921年是外交大臣。1924—1939年是“匈牙利国内德国人国民教育协会”主席。——第323页。

格拉兹曼，姆·斯·(Глазман, М.С. 死于1924年)——托洛茨基的亲密同事。——第603页。

格里姆(Гримм)——俄国自由派作家，《北极星》杂志撰稿人。——第100页。

龚帕斯，赛米尔(Gompers, Samuel 1850—1924)——美国工会运动的反动头子，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建人之一。从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时起至1924年任联合会主席(中间间断一年)，推行同资本家实行阶级合作的方针，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敌视俄国十月革命。——第347页。

古比雪夫，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Куйбышев, 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88—1935)——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在萨马拉组织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内战时期是红军的领导

者和组织者之一。历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第 630、710、868、954 页。

古尔柯,弗拉基米尔·约瑟佛维奇(Гурко, Владимир Иосифович 1863—1927)——沙俄反动人物。1902 年被任命为内务部地方自治司司长,1906 年任副内务大臣。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反对土地法案,维护农奴主-地主的利益。1912 年被选为国务会议成员,敌视十月革命,在南俄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以后流亡国外。——第 305 页。

古洛夫,格·(Гулов, Г.)——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十月革命的参加者。——第 485、678 页。

古契柯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уч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62—1936)——俄国大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十月党的组织者和首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任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1915—1917 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1917 年 8 月参加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逃往国外。——第 184、274、327、559 页。

郭茨,阿布拉姆·拉法伊洛维奇(Гоц, Абрам Рафаилович 1882—1940)——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1917 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领袖,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加入反革命组织,曾策划士官生叛乱。1920 年被判刑。——第 305 页。

## Н

哈拉托夫,阿尔帖米·巴格拉托维奇(Халатов, Артемий Багратович 1896—1938)——1917 年起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十月革命后曾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红军粮食供应总局局长、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国家出版社管理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院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论工资问题》、《列宁和劳动生产率》、《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等许多通俗小册子。——第 477 页。

哈里斯(Harris)——加拿大人。——第 649 页。

海德(Heide)——奥地利人。——第 649 页。

海涅,沃尔弗于格(Heine, Wolfgang 1861—1944)——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律师。在党内属于极端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 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曾任普鲁士政府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第 41—43 页。

韩德逊,阿瑟(Henderson, Arthur 1863—1935)——英国工党右翼首领之一。1911—1934 年是工党书记。1908—1910 年和 1914—1917 年是工党议会党团领袖。1915—1916 年在阿斯奎斯的联合政府中先后任教育大臣和邮政大臣,1916—1917 年在劳合-乔治内阁中任不管部大臣。1924 年任麦克唐纳第一届内阁的内政大臣,1929—1931 年任麦克唐纳第二届内阁的外交大臣。——第 288 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

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34年被捕,1842年从流放地回莫斯科。1847年因遭受沙皇政府迫害流亡国外。1853年在伦敦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后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杂志。——第24页。

赫列勃尼科夫, 维利米尔 (Хлебников, Велимир 1885—1922)(真名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 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俄国诗人,俄国未来主义的创始人。在世界大战和革命前夜意识到资产阶级文化要衰败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绪的典型代表。渴望改造诗的内容和形式,否定象征主义的传统和原则。屏弃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同情十月革命。但在他的笔下,革命只是对统治阶级罪恶的一种惩罚。——第397页。

赫列尔,阿·姆·(Геллер, А.М. 1891—1935)——在俄国出生,1916年起侨居意大利,参加意大利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1920年回到苏维埃俄国。1920年起担任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第602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他的历史功绩是深刻地全面地研究了辩证法。但是黑格尔辩证法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同他的保守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是密不可分的。他在政治观点上是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等。——第600页。

霍夫曼,麦克斯(Hoffmann, Max 1869—

1927)——德国将军。1916年9月起任参谋长,实际上是德国东线的总指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二阶段担任德国的代表。——第330、498、500、503页。

霍亨索伦——见威廉二世。

## J

基洛夫, 谢尔盖·米朗诺维奇 (Киров, 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1886—1934)——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直接参加了彼得格勒的十月战斗。1921—1925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省委书记,积极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作斗争。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同年12月1日被反革命分子暗杀。——第786页。

吉洪诺夫,尼古拉·谢苗诺维奇(Тихонов, 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生于1896年)——苏维埃俄罗斯作家,诗人。国内战争时参加过红军。战争结束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早期诗集有《友人的影子》、《游牧者》、《战争》等。卫国战争中写了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战后出版了诗集《格鲁吉亚的春天》、《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两股巨流》等。——第393页。

吉维列戈夫(Дживелегов)——《立宪国家》文集的作者。——第107页。

季诺维也夫,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Зиновьев,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前夕同加米涅夫一起反对武装起义,并向敌人泄露了

起义计划。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1925年参加组织“新反对派”，1926年是托季反党联盟头子之一。1927年因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来两次恢复党籍，又两次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捕，1936年被判处死刑。——第321、362—365、369、569、571、579、658、694、699、706—707、711—712、718、720、732、744、748、752、819、858、864、964页。

加邦，格奥尔基·阿波洛诺维奇(Гапон, Георгий Аполлонович 1870—1906)——俄国神甫，沙皇暗探局的特务。挑动彼得堡工人于1905年1月9日举行游行向沙皇请愿，造成枪杀工人的惨剧。逃往国外后与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回国后特务面目暴露，被社会革命党人处死。——第87页。

加里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Калинин,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75—1946)——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1905—1907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时任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长。1919年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19年起是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起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第713—714、786、836—837、863页。

加利费，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古斯特(Galliffet, Gaston Alexandre August 1830—1909)——法国将军。在1870年色当战役中被俘。后被普鲁士军队放回，参加反对公社的战争，是镇压巴

黎公社的主要刽子手之一。——第99页。

加米涅夫，列甫·波里索维奇(Каменев, 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前夕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武装起义，并向敌人泄露了起义计划。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1925年参加组织“新反对派”，1926年是托季反党联盟头子之一。1927年因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来两次恢复党籍，又两次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捕，1936年被判处死刑。——第363、507—508、528、554、561—562、566、569、571、579、658、661、721、744、752、858、864、892、964页。

蒋介石——第732、738、742、746、808、820、822、969—970页。

杰克逊(Jackson)——英国伦敦《工人星期日》编辑。——第628页。

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1877—1926)——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95年参加社会民主党组织，后积极投入波兰和俄国革命运动。191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任交通人民委员。1924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年7月20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表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演说后因心脏病逝世。——第469、473页。

捷列申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Те-

рещенко,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生于 1888 年)——俄国最大的糖厂主和大富翁。1917 年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中先后任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第 282—283 页。

## К

卡尔塔舍夫, 安东·弗拉基米罗维奇 (Карташев, Анто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生于 1875 年)——俄国立宪民主党人, 教会史教授。1917 年任沙皇主教公会总监, 临时政府宗教部长。后来是尤登尼奇白卫政府成员。——第 589 页。

卡茨, 伊万 (Katz, Iwan)——德国共产党极左派首领之一。公开叛党。1926 年被开除出党。——第 799 页。

卡冈诺维奇, 拉扎尔·莫伊谢也维奇 (Каганович, 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生于 1893 年)——1911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下新城、沃罗涅什、土尔克斯坦担任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1922 年起在俄共(布)中央工作。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等职。1957 年 7 月被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解除中央领导职务。——第 782、786、790 页。

卡列金,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Каледин,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1861—1918)——沙俄将军, 顿河哥萨克军首领。1917 年 8 月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提出镇压革命的全面纲领, 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骨干分子。十月革命后是顿

河哥萨克反革命势力的头子之一, 参与组织白卫“志愿军”, 发动哥萨克叛乱。叛乱失败后自杀。——第 580 页。

卡烈林,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Карелин,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91—1938)——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 该党中央委员。1917 年 12 月参加人民委员会, 任国家产业人民委员。布列斯特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员, 反对签订和约, 1918 年 3 月退出人民委员会。是 1918 年 7 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谋划者之一, 叛乱平定后逃往国外。——第 318 页。

卡烈也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Карее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50—1931)——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社会学中的主观学派的代表之一。1879 年起先后任华沙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教授。1905 年加入立宪民主党。从九十年代起反对马克思主义。写了很多历史著作。1910 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第 403 页。

卡缅斯基, 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Камен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4—1961)——苏维埃俄罗斯诗人, 未来派作家。二十世纪初小资产阶级颓废知识分子文艺情绪的代表。1910 年同赫列勃尼科夫组织了一个名为“立体未来主义者”的文学团体。1911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窑洞》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城市的反感和使现代人回到大自然怀抱中去的幻想。——第 397 页。

卡明斯基, 格里哥里·纳乌莫维奇 (Камин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1895—1939)——191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 年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区域局委员, 后来是土拉委员会书记。1929 年是联共



(布)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党的第十四次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第786页。

卡佩尔(Капел)。——第716页。

康德拉提也夫,尼古拉·德米特里也维奇(Кондрать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生于1892年)——苏联经济学家。曾任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教授等职。1920—1928年主持经济循环研究。主张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对对外贸易垄断制持反对立场。——第786、820、902页。

考茨基,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首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来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3—191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写了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也暴露了一些机会主义观点。1910年以后逐渐转到机会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提出“超帝国主义论”。大战期间打着“中派”立场的旗号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以后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等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41、43、46、119—121、142、146、178—179、247、258、371、419、557、638、664、668、670、678、698、700、732、797、799页。

考夫曼,亚历山大·阿尔卡季也维奇(Кауф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 Аркадьевич 1864—1919)——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的创建人和首领之一。1887—1906年在农业和国家产业部供职。曾参加制定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方案,宣扬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和谐。——第102—

103页。

柯尔什,卡尔(Korsch, Karl)——德国市侩哲学家,教授。德国共产党极左派首领之一,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叛徒。1926年被清除出德共和共产国际。——第657、799页。

柯拉罗夫,瓦西里·彼得罗维奇(Коларов, 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19—1923年任保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人民解放斗争的组织者之一。1946—1947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1947—1949年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外交部长,1949年7月至逝世任部长会议主席。——第706、709页。

柯斯特罗夫,阿恩(Костров, Ан 1870—1953)(真名饶尔丹尼亚,诺依·尼古拉也维奇 Жордания, Ной Николаеви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1906年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力主取消秘密革命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梯弗利斯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18—1921年是格鲁吉亚反革命的孟什维克政府的头子。1921年逃往国外。——第161、163页。

柯秀尔,斯坦尼斯拉夫·维肯蒂也维奇(Косиор, 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1889—1939)——1907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顿巴斯、哈尔科夫、基辅和莫斯科做过党的工作。1917年二月

革命后是布尔什维克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18年起历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聂伯河右岸地下区域委员会书记、乌共(布)中央书记、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俄共(布)中央书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第836页。

科尔尼洛夫，拉甫尔·格奥尔基也维奇(Корнилов, 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1870—1918)——沙俄将军，君主派。1917年7—8月任俄军最高总司令，8月发动反革命叛乱。后来在顿河参加组织白卫“志愿军”，任司令，在战斗中被击毙。——第556、565、567—568、576、578、593页。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1872—1959)——苏联科学家，动力学家，科学院院士。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曾参加建设俄国第一批巨型电站。1920年根据列宁的委托，领导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1921—1930年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来领导中央动力委员会和动力总局。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第866、868页。

克拉斯诺夫，彼得·尼古拉也维奇(Краснов,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9—1947)——沙俄将军。1917年8月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骨干分子。1917年11月指挥哥萨克部队攻打彼得格勒，被击溃。1918—1919年指挥顿河哥萨克白匪军。1919年逃往国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41—1945年为法西斯德国效劳。被苏军俘获后判处绞刑。

——第511页。

克拉西柯夫，彼得·阿纳尼也维奇(Красиков, Петр Ананьевич 1870—1939)——1892年加入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1900年加入《火星报》组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火星报多数派。代表大会后积极参加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写了著名的《给同志们的信》。1917年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时任肃反审理委员会主席。1924年起任苏联最高法院检察长。1933—193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第49—50页。

克拉辛，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Красин, 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1870—1926)——189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1918年起历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驻英国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驻法国全权代表等。——第730—731页。

克雷让诺夫斯基(Крыжановский)——第602页。

克里格(Кriegge)——德国教授，参加布列斯特和谈的德国代表团顾问。——第330页。

克里文柯，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Кривенко,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7—1906)——俄国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人物。《祖国纪事》杂志撰稿人，自由主义民粹派杂志《俄国财富》和自由资产阶级报纸《祖国之子报》编辑之一。宣扬阶级合作，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克里文柯的观点曾受到列宁的尖锐批判。——第79页。

克里沃夫，季莫费·斯切潘诺维奇(Кривов, Тимоф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生于

1886年)——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是党中央乌拉尔局书记。1921年是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1922年是俄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3—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党纪委员会委员。1926—1934年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和副工农人民检查委员。1934—1936年是副财政人民委员。——第731—732页。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扎曼(Clemenceau, Georges Benjamin 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激进党首领。1876年起为议会议员。1906—1909年任总理。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推行对工人阶级残酷镇压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极端的沙文主义者。1917—1920年再度任总理,在国内建立军事专制制度。1919—1920年主持巴黎和会,参与炮制凡尔赛和约,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2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退出政界。——第751页。

克柳耶夫,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Клю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87—1937)——苏维埃俄罗斯诗人。出身农民。作品中反映出他崇尚农村旧习,厌恶城市和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未来抱有反动的乌托邦观念。——第397页。

克鲁泡特金,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72年在瑞士加入巴枯宁派。回国后,因参加民粹派运动于1874年被捕监禁。1876年逃往国外,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沙文主义者。1917

年二月革命后回国。1920年在给欧洲工人的信中承认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并号召工人阻止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第724页。

克鲁普斯卡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Крупская,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1869—1939)——苏联教育家,列宁的夫人和最亲密的助手。189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曾任《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秘书。十月革命后任副教育人民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第656、833页。

克鲁乔内赫,阿列克塞·叶利谢也维奇(Кручёных, Алексей Елисеевич 生于1886年)——苏维埃俄罗斯诗人。俄罗斯最早的未来主义者之一,代表生活浪漫的艺术家的最腐朽团体的情绪。——第397页。

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1881—1970)——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首脑,1917年3月起为社会革命党人。1912—1917年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曾领导劳动派党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极端的护国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在临时政府中,1917年3—5月任司法部长,5—9月任陆海军部长,7月21日起一度任总理,9月12日起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1918年逃往国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第120、274、282、284、309—310、344、507—508、568、584、586—588、822页。

库兹米切夫(Кузмичев)——第716页。  
库克,阿瑟·詹姆斯(Cook, Arthur James

1884—1931)——英国工会运动活动家。1905年加入独立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属于左派。1924年是矿工联合会书记。1926年矿工罢工期间曾执行坚决的策略,但在斗争尖锐化时向矿工联合会领导中的右派投降。此后公开转向阶级合作的立场。——第742、746页。

库诺,威廉(Cuno, Wilhelm 1876—1933)——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918—1920年任汉堡-美洲轮船公司经理。1920年起从事国务工作,1922年11月在阶级斗争急剧尖锐化和新的革命危机增长的形势下成为政府首脑。1923年8月由于强大的工人罢工运动的压力而辞职。以后继续在汉堡-美洲轮船公司任职。——第451页。

库通,若尔日·奥古斯特(Couthon, Georges-Auguste 1755—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的领导人之一。任公安委员会委员时积极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在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和罗伯斯比尔等人同被处死。——第725页。

库西宁,奥托·威廉莫维奇(Куусинен, Отто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1881—1964)——芬兰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921年至1939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之一。1940—1958年任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从1941年起是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1958年和从1957年起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1962年是苏联议员团主席。——第693、732、820页。

## L

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Радек, 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85—1939)——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但表现出向中派动摇。1917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23年起是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1926年参加托季反党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判刑。——第250—251、323、325、395、504—505页。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时期曾领导波尔多无产阶级为保卫公社而斗争。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和葡萄牙,积极反对巴枯宁主义。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组织者之一和代表,1891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写过许多著作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但在民族和土地等理论问题上持有错误观点。——第419页。

拉费斯(Рафес)——第801、820、824页。

拉福勒特,罗伯特·马里恩(La Follette, Robert Marion 1855—1925)——美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85—1891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01年、1903年和1905年三度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州长。从1905年起任参议员。1924年作为进步党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

选,被击败。——第697页。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Раковский, 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1873—1941)——九十年代初起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17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27年因积极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反党活动而被开除出党,1935年恢复党籍。1938年因参加“右派与托派同盟”的活动,被判徒刑。——第250、752、864页。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人运动中一种机会主义——拉萨尔主义的创始人。1848—1849年曾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1863年)和主席(1863—1864年)。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主张通过普选权实现“自由国家”和通过普鲁士王国政府资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来解放工人。——第59、89、106、114、144、195—196、212、217、232页。

拉舍维奇,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Лашевич,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是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副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1926年是“新反对派”骨干分子,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而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后

来恢复党籍。——第716页。

兰茨贝尔格,奥托(Landsberg, Otto 生于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修正主义者,律师,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采取极右立场。1919年任谢德曼内阁司法部长。1920—1924年任德国驻比利时大使。——第289、294页。

勒巴,菲利浦·弗朗索瓦·约瑟夫(Lebas, Phillipp François Joseph 1765—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1792年当选为国民公会委员。同年任社会保安委员会委员。1793年以国民公会委员身份被派往革命法国的莱茵军团和阿尔登军团。热月政变时在试图组织抵抗反革命分子这一点上显示了巨大的勇气,但劝说罗伯斯比尔号召军队和人民的尝试没有成功,因而自杀。——第726页。

劳合-乔治,戴维(Lloyd George, David 1863—1945)——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党领袖。曾任贸易大臣和财政大臣。1916—1922年任首相。俄国十月革命后是凡尔赛体系的炮制者之一和对苏俄武装干涉的策划者之一。——第269—270、281、302、307页。

雷梅勒,赫尔曼(Remmele, Hermann)——曾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第693、695页。

累德堡,格奥尔格(Ledebour, Georg 1850—194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律师。1900—1918年是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齐美尔瓦尔德右派首领之一。191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加入国会的“社会民主劳动派”,这一派后来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1931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希

特勒上台后流亡瑞士。——第 557 页。

李伯尔(Либер 1880—1937)(真名戈尔德曼,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 Гольдман, 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俄国崩得派和孟什维克党首领之一。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崩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1912 年是托洛茨基八月联盟的骨干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 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坚持孟什维克的反动立场,支持临时政府。极端仇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第 305 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848 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68—1900 年先后任《民主周刊》、《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编辑。在某些问题上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 年、1891 年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889 年参加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积极反对军国主义。——第 232、419 页。

李卜克内西,卡尔(Liebkecht, Karl 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军国主义。1912 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在掠夺战争中支持本国政府。1914 年 12 月 2 日在整个国会中只有

他一人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参加创建国际派和斯巴达克联盟。1916 年被判处苦役。获释后积极参加领导德国十一月革命并从事建立德国共产党的工作。1919 年 1 月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第 256—258、313、731、733、743 页。

李可夫,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Р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1—1938)——1899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 年二月革命后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十月革命后曾任内务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28 年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之一。1937 年被捕,1938 年被判处死刑。——第 477、660、661、682、720、771、785—786、866—868、876—877、899、954、956、965 页。

李斯特,弗兰茨·冯(Liszt, Franz von 1851—1919)——德国法学家。曾在吉森、马尔堡、哈雷和柏林各大学任教授。德国研究刑法的社会学学派领袖。资产阶级的国际法权威之一。——第 297 页。

李沃夫,格奥尔基·叶甫盖尼也维奇(Львов, 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1861—1925)——俄国大地主,立宪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后来是地方自治机关和市政公所联合会的主席之一。1917 年 3—7 月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是七月事变时血腥镇压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主谋者之一。十月革命后逃往法国,参加组织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第 307 页。

里德,托马斯·梅恩(Reid, Thomas

Mayne 1818—1883)——英国作家。著有许多惊险小说，如《头皮猎取者》、《喜马拉雅山历险记》、《无头骑士》等。——第427页。

里泽(Riese)——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德国代表。德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第694页。

利鲍, 亚历山大·费利克斯·约瑟夫(Ribot, Alexandre-Félix-Joseph 1842—1923)——法国国家活动家。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1892—1893年、1895年和1917年任内阁总理，多次担任法国内阁部长。——第281、283、307页。

利兹金, 格·亚·(Лиздин, Г. Я.)——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第752页。

利沙加勒, 普罗斯比尔·奥利维埃(Lissagaray, Prosper Olivier 1838—1901)——法国新闻记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1871—1880年侨居伦敦，《1871年公社史》一书的作者。1881年起是巴黎《斗争报》的编辑。——第96页。

连茨涅尔(Ленцнер)——第602页。

连施, 保尔(Lensch, Paul 1873—192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5—1913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机关报《莱比锡人民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转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战后任鲁尔大工业资本家的报纸《德意志总汇报》主编。1922年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00页。

梁赞诺夫(Рязанов 1870—1938)(真名戈尔登达赫,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 Гольдендах, 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接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担任工会领导工作。1918年初因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而暂时退党；在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时期持反党立场。1921年起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1931年2月因协助孟什维克反革命活动被联共(布)开除。——第347—348页。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1870—1924)——第3—5、14、16—17、21—23、25—26、32—33、35、38、40—48、50—54、60—61、68—71、73—76、78、82、165、225—226、228、247—251、321—324、326、331、363—364、366、371、411、427、433、441、451、453—455、459—460、462、472、484—486、491—517、525、531—532、538、548、550—551、553—567、569—571、573—574、576—577、581—585、593、597—599、601—602、607—608、611—616、618—621、623、625、629—630、657、664、669、671—685、688、690、695—701、704、706、715、718、720、723、728、730—733、735、740、743—744、748、751—752、765—766、770、772—774、776、779—786、788、791—792、796、798、800—801、803—811、813、816、819、821、830—834、836—841、849、852、854—855、859、874、902—903、906—916、919—921、923、925—928、930—933、940—941、943、951—953、967—968、980—983页。

列诺得尔, 比埃尔(Rennaudel, Pierre 1871—1935)——法国社会党改良主义首领之一，新闻工作者。曾任《人道报》编辑和社长。1914—1919年和1924

- 年是众议院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33年被开除出党。——第283页。
- 柳斯尼亚(Liusnia)——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第146、178页。
- 林格尼克, 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Ленгник, Фридрих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1873—1936)——俄国布尔什维克。1893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同年被捕。1899年于西伯利亚流放地在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上签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缺席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1903—1904年在国外积极参加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十月革命后在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担任负责工作。——第41—42、820页。
- 龙格, 让(Longuet, Jean 1876—1938)——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首领之一。1914年和1924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20年起是法国社会党的中派首领之一。三十年代主张社会党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第557页。
- 卢森堡, 罗莎(Luxemburg, Rosa 1871—1919)(笔名尤尼乌斯 Junius)——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导人之一, 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生于波兰。1893年参加创建和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898年移居德国, 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对伯恩斯坦主义和米勒兰主义进行了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参加创建国际派和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参加领导德国十一月革命。1919年1月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列宁对卢森堡评价很高, 同时也批评了她在一些问题上
- 的错误观点。——第43、120、166、178、313、372、731页。
- 鲁麦尔, 伊·(Румер, И.)——第180、603页。
- 路德, 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的活动的家, 路德主义的创始人, 害怕人民运动的德国中产阶级的思想家。强烈谴责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方法。在德国1525年的农民战争时期, 是起义农民的凶恶敌人。——第103、210页。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年)。在他统治的时期, 开始了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93年1月21日根据国民公会的决议, 被判处死刑。——第193页。
- 吕勒, 奥托(Rühle, Otto 1874—1943)——德国左翼社会民主党人, 政论家和教育家。1912年起是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国际主义立场, 在国会投票反对军事拨款。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德共分裂后, 1920年初参加创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后来被开除, 回到社会民主党。——第256页。
- 罗伯斯比尔, 奥古斯丁(Robespierre, Augustin 1763—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派;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弟弟, 称小罗伯斯比尔。——第726页。
-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玛丽·伊西多尔(Robespierre, Maximilien Marie Isidore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和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1793—1794年领导雅各宾政府, 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 平定吉伦特派的反革命叛乱, 粉碎欧洲君主国的武装干涉。由于镇压极左派而



陷于孤立。1794年7月27日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政府，他和他的拥护者被捕，次日被处死。——第61、63、66、69、724—727页。

罗兰-霍尔斯特，罕丽达 (Roland-Holst, Henriette 1869—1952)——荷兰社会党人，女作家。属于荷兰社会民主党左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采取中派立场，后来是国际主义者。1918—1927年加入荷兰共产党并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1927年退出共产党，后来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第250—251页。

罗曼诺夫 (Романов)——俄国沙皇。——第273页。

罗日柯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Рождк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8—1927)——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脱离布尔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入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曾任临时政府邮电部副部长。敌视十月革命。1922年脱离孟什维克，从事教学研究和著述活动。——第122—126页。

罗斯梅，阿尔弗雷德 (Rosmer, Alfred 1877—1964)——法国工团主义者。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法国总工会的活动。曾参加红色国际工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托派国际书记处的建立者之一。1924年和莫纳特一起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1925年起和莫纳特共同出版托派机关报《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污蔑国际共运的宣传。——第251页。

罗森贝格，阿图尔 (Rosenberg, Arthur)——德国共产党极左派。曾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委员。——第799页。

罗文斯卡娅 (Ровенская)——第602页。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 (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认为劳资间的矛盾可以由普鲁士容克国家实行一系列改革而得到解决；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人民群众消费不足。——第102—103页。

洛佐夫斯基 (Лозовский 1878—1952) (真名德里佐，索洛蒙·阿布拉莫维奇 Дридзо, 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7月被选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0年任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坚持列宁的路线。1921—1937年任工会国际总书记。1939—1946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41—1948年兼任苏联情报局副局长、局长。——第346—347、354、580页。

## M

马尔丁诺夫 (Мартьянов 1865—1935) (真名皮凯尔，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 Пикер, 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俄国经济派的首领之一，孟什维克的著名活动家，后为共产党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反火星派分子，大会后是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中派立场。十月革命后脱离孟什维克，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年起是《共产国际》杂志编委。——第2、160、169、171—172、214—216、225、273、288、564、772、801、804、

808、820、824 页。

马尔金,尼古拉·格里哥里也维奇(Маркин, 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93—1918)——1916年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在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中进行工作。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后来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年10月在与白匪作战中牺牲。——第509页。

马尔托夫,尔·(Мартов, Л. 1873—1923)(真名策杰尔包姆,尤利·奥西波维奇 Целербаум, 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00年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领导机会主义少数派,从此以后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的领导人之一和孟什维克报刊的编辑。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编辑《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参加反党的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中派立场。十月革命后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1920年移居德国。——第33、45、50、119、155、161、225、250、273、276、288、313—314、732、858—859页。

马赫诺,奈斯托尔·伊万诺维奇(Махно, Нестор Иванович 1884—1934)——1918—1921年间乌克兰无政府主义富农反革命匪帮的头子。马赫诺匪帮袭击苏维埃机关,残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921年春这个匪帮被红军全歼,马赫诺本人逃往国外。——第673页。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第47、67、81、96、98、102—103、111—113、121—123、125—126、138、196、199、207、212、217、305、387、419、453、459、473、550、567、597、606、680、715、718、776、791、806、907、920、923、925、930—932、984页。

马列茨基,德·(Маретский, Д.)——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布李集团成员。——第781页。

马斯洛夫,阿尔卡季(Maslow, Arcady 生于1891年)——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首领之一。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底因派别分裂活动被撤销领导职务,不久被开除出德共和共产国际。以后退出政治活动。——第657、752、800页。

马斯洛夫,彼得·巴甫洛维奇(Маслов,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1867—1946)——俄国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写过一些土地问题的著作,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提出过孟什维主义的土地方公有纲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第199页。

马雅可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Маяк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93—1930)——苏维埃俄罗斯诗人。少年时代参加革命,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创作了许多歌颂人民胜利、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批评官僚主义、市侩作风和揭露敌人、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诗篇。他的代表作有诗《向左进行曲》、《一亿五千万》、《开会迷》、《苏联护照》、《列宁》、《放开嗓子唱》、《好》,剧本《臭虫》、《澡堂》等。斯大林对马雅可夫斯基有很高的评价。——第393页。

麦考密克,赛勒斯·霍尔(MacCormick, Cyrus Hall 1809—1884)——美国发明家。收割机的发明人。——第649页。

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齐(MacDonald, James Ramsay 1866—1937)——英国独立工党和工党创建人和首领之一。推行极端机会主义路线,宣扬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分裂工人阶级队伍。1924年和1929—1931年两度任工党内阁首相。1931—1935年任保守党操纵的“国民政府”首相。——第557、638页。

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Мануильский, 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1883—195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执委会书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职。1953年因重病退休。——第696—697页。

梅德维捷夫,谢尔盖·巴甫洛维奇(Медвед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1920—1922年任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后来从事经济工作。是反党集团“工人反对派”首领之一,后来是“新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1933年清党时被开除出党。——第657页。

梅尔黑姆,阿尔丰斯(Merrheim, Alphonse 1881—1925)——法国工会活动家,工团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是法国工团主义运动左翼领导人之一,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右派。1916年底转到中派和平主义立场,1918年初转到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和改良主义立场。——第250—251、256页。

梅林,弗兰茨(Mehring, Franz 1846—

1919)——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政论家和历史学家。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多年为《新时代》杂志撰稿和主编《莱比锡人民报》。积极反对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批判考茨基主义,但同时也犯有德国左派不敢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的错误。一贯维护国际主义,参加创建国际派,是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之一。对创建德国共产党起了卓越的作用。写有《马克思传》和许多有关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第178、313、459、698页。

美尔尼昌斯基,格里哥里·纳坦诺维奇(Мельничан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Натанович 1886—1937)——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俄国南方、下新城和西伯利亚做党的工作。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1918—1920年作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担任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后仍从事工会和经济工作。——第786页。

米尔巴赫,威廉(Mirbach, Wilhelm 1871—1918)——德国外交家。1915—1917年是德国驻雅典大使。1918年4月起是德国驻莫斯科大使。1918年7月6日被旨在挑起德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战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杀。——第330页。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Микоян, 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1895—1978)——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库等地担任过党的领导工作。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

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对外贸易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主席团委员等职。——第786、867—868、892—893、956页。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52—1904)——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理论家，政论家，实证论哲学家，社会学中的主观学派的代表之一。1868年起为《祖国纪事》撰稿，后任编辑。七十年代末参加民意党。1892年起主持《俄国财富》杂志，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第79页。

米勒兰，亚历山大·埃蒂耶纳(Millereand, Alexandre Etienne 1859—1943)——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律师和政论家。1885年起为众议院议员。九十年代参加社会党，领导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99年参加以瓦尔德克-卢梭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内阁，任工商部长，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剑子手加利费合作。列宁指出，米勒兰作出了“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1904年被开除出法国社会党，参与组织“独立社会党人”集团。后来多次参加政府，参与策划反苏维埃的武装干涉。1920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20—1924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25—1927年为参议员。——第71—72、99页。

米留可夫，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Милу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首领，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曾任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二月革命

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执行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帝国主义政策；1917年8月参加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是外国武装干涉的帮凶，以后逃往国外。——第101、167—168、171—173、274、281、284、305、309、327、559页。

米柳亭，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Мил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84—1938)——先是孟什维克，1910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参加人民委员会，任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起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央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著有许多经济问题的著作。——第507页。

米雅斯尼柯夫，格·伊·(Мясников, Г. И. 1889—194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在彼得格勒工作。“工人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1922年因反党活动和经常破坏党纪而被开除出党，以后是反革命的“工人集团”的组织者。后来移居国外。——第426页。

明仁斯基，维亚切斯拉夫·鲁道佛维奇(Менжинский, 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1874—1934)——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雅罗斯拉夫里和彼得堡做过党的工作。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柏林总领事。从1919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1923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1926年起任该局局长。——第819页。

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生于1890年)(真名斯克里亚宾，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苏联政治活动家。1906年

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喀山、沃洛格达省、彼得堡等地进行革命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时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十月革命时是领导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等职。1957年7月被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以后曾任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首席代表。1962年退休。——第720—721、740—741、748、777、782、786、790、841、855、857—858、985页。

莫纳特,比埃尔(Monatte, Pierre 1881—1960)——法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1904—1914年是法国总工会领导人之一。1921—1924年是法共《人道报》编辑部成员,1923—1924年是法共党员。1924年组织托派集团,反对党的路线,为此被开除出党。1925年起出版托派机关报《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污蔑国际共运的宣传。——第251、256页。

莫依先科,克·弗·(Моисеенко, К. В.)——1917年加入俄共(布)。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第672、675—677页。

墨索里尼,本尼托(Mussolini, Benito 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战犯之一。早年是意大利社会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开除出党。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首创者,1922年发动政变夺得政权,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1940年追随

法西斯德国参加世界大战。1943年由于军事失利和国内人民反法西斯运动高涨,墨索里尼独裁政权垮台。1945年4月被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第402页。

姆拉契科夫斯基,谢尔盖·维塔利也维奇(Мрачковский, Сергей Витальевич 1888—1936)——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拉尔州委员会巡回鼓动员。十月革命后在红军中担任各种政治职务和指挥工作。1923年是托洛茨基派的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其后受监禁。1929年获释并重新入党。1936年因进行反党反苏维埃活动再次被开除出党;1936年8月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被判处死刑。——第716、820—821、824、826—827页。

穆拉洛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Мурал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时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是莫斯科军区司令,后来是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因积极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于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第716、752、864页。

穆拉维约夫,米哈伊尔·阿尔帖米也维奇(Муравьев, 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1880—1918)——沙俄军队中校。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克伦斯基进攻彼得格勒时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参加保卫彼得格勒。1918年6月任东方战线司令。7月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逃往辛比尔斯克,企图在军队中发动叛乱,被击毙。——第511页。

##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年、1815年)。法国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军。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自称第一执政。1804年称帝。建立集中的军事官僚国家机构,颁布《拿破仑法典》,维护大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被放逐于厄尔巴岛。1815年率军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之役战败后,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第109、454、727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国皇帝(1852—1870年),拿破仑第一的侄子。法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848—1851年),1851年12月2日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1852年12月称帝。——第146页。

涅恰也夫(Нечаев)——第820页。

诺根,维克多·巴甫洛维奇(Ногин, 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1878—1924)——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1917年9月任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人民委员。1918年起历任副劳动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全俄纺织业辛迪加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第563、569页。

诺伊曼,海因茨(Neumann, Heinz)——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第801、820页。

## P

帕尔乌斯(Парвус 1869—1924)(真名格尔方德,亚历山大·拉扎烈维奇 Гельфанд, Александр Лазаревич)——生于俄国。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属该党左翼。1905年回到俄国,是孟什维克,提出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退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做军火投机生意,发了横财。1915年起在柏林出版反动的《钟声》杂志。——第43、106、214—215、255—256页。

帕日特诺夫,康斯坦丁·阿列克谢也维奇(Пажитн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еевич 1879—1964)——苏联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有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思想史以及俄国革命前工人阶级状况和国民经济状况的学术著作。1906年发表了《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十月革命后在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任教和工作。——第199页。

潘涅库克,安东尼(Pannekoek, Antoine 1873—1960)——荷兰社会民主党人。1907年参加创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1909年参加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党(论坛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理论刊物《先驱》的出版工作。1918年参加创建荷兰共产党,1921年以前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工作。后来坚持极左的宗派主义立场,反对共产国际纲领,受到列宁的批判。1921年退出共产党。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第250—251页。

佩珀,约翰(Pepper, John)(真名波加尼,

约瑟夫 Pogány, Joseph)——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幸存者。1919年加入共产党。1919年和1921年是共产国际驻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党的代表。1922年在美国当选为美国工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成为它的政治委员会书记。后来作为机会主义派别的头子被清除出党。——第693、697—698、801、820、824页。

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Пятаков, 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1890—1937)——1910年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1918年任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0年起历任中央顿巴斯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国家计委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3年起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1937年被判处死刑。——第658、752页。

皮利尼亚克(Пильняк 1894—1937)(真名沃高,波里斯·安德烈也维奇 Вогау, 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苏维埃俄罗斯作家。因中篇小说《赤贫年代》而著名。他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被十月革命打倒的人和社会阶级。他的中篇小说《红色的树》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庸俗的歪曲,引起苏联舆论界的愤慨。——第392—393、397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n,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1783—1801年和1804—1806年任首相。是反对革命的法国和后来的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国家联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第727页。

平克顿,艾伦(Pinkerton, Allen 1819—

1884)——美国密探,1850年建立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关于平克顿及其事务所活动的侦探小说,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曾风行一时。——第427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86—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军事政治方面的工作。1918年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纲领。1923年起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1937年被判刑。——第820、824、827页。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1883年组织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当时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首领。1905—1907年俄国革命时期反对列宁的民主革命的策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第3—5、26、79、160、170、174、179、218—221、259、273—274、288页。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俄国诗人,俄国新文学的奠基者。和十二月党人有密切交往。曾被流放南方。他的诗抨击农奴制度、同情人民、歌颂自由和进步。诗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否定沙皇专制,

歌颂人民的力量。《寄西伯利亚囚徒》、《阿利昂》等诗表示坚持十二月党人思想。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和历史纪事《普加乔夫》叙述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此外还有中短篇小说、叙事诗、童话诗和数百首抒情诗。——第399页。

## Q

齐赫泽,尼古拉·谢苗诺维奇(Чхеидзе, 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1864—1926)——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第四届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党团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中派立场,事实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时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员,护国派,全力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是格鲁吉亚反革命孟什维克政府主席。1921年移居巴黎。——第246、371页。

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Черн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6—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和理论家之一。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镇压农民。1918年参与策划反革命叛乱。1920年逃往国外,继续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第120、300、310、327、480、566、602、796页。

切列万宁,恩·(Череванин, Н. 1868—1938)(真名利普金,费多尔·安德烈也维奇 Липкин, Фё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俄国政论家,孟什维克首领之一,极端的取消派。1912年反党的八月代表会议后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组委会)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是孟什维克中央

机关报《工人报》编辑,孟什维克中央委员。敌视十月革命。——第31、178、199—201、208—209、214—216、219—223页。

邱巴尔,弗拉斯·雅柯夫列维奇(Чубарь, Влас Яковлевич 1891—1941)——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2年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领导中央顿巴斯煤炭工业管理局。1923年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1938年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7—1938年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21—1934年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起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起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第786页。

屈尔曼,理查(Kühlmann, Richard 1873—1948)——1917年8月—1918年7月任德国外交大臣,曾率领德国代表团参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持反苏维埃政权的立场。——第498—499页。

## R

饶勒斯,让(Jaurès, Jean 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活动家,法国社会党右翼改良派领袖,历史学家。1885年起多次当选为议会议员,属资产阶级共和派。1902年创建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并编辑法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1905年法国社会党同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领导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后,成为法国统一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1914年因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而被暗杀。——第41—43、61、71—73、



87、724 页。

日沃夫(Живов)——第 790 页。

## S

萨尔基斯,德·阿·(Саркис, Д.А.)  
——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在联共(布)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第 820、824 页。

萨尔蒂柯夫(Салтыков)——俄国贵族,  
伯爵。——第 188 页。

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米哈伊尔·叶甫格  
拉佛维奇(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и-  
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1826—1889)——  
俄国讽刺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运用  
讽刺手法尖刻地批判了俄国的专制农  
奴制度。1848 年因发表抨击沙皇制  
度的小说而被捕,流放七年。1856 年  
初返回彼得堡,用谢德林这个笔名发  
表了《外省散记》,在六十至八十年  
代创作了《一个城市的历史》、《果  
洛夫廖夫老爷们》等长篇小说。——  
第 2、483 页。

萨季林(Садирин)——第 786 页。

萨莫伊洛,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  
奇(Самойло,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  
вич 1869—1963)——苏联军事活  
动家,空军中将,教授。1944 年起是  
共产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总  
参谋部和大本营的侦察部门工作,后  
来任第十军参谋长,少将。十月革命  
后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曾参加布  
列斯特和谈。1918 年 2 月后在苏  
维埃军队中任参谋长、司令、总参  
谋长等职。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教  
授。1948 年退休。著有许多军事著  
作和回忆录。——第 502 页。

塞马尔,比埃尔(Semard, Pierre 1887—  
1942)——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916  
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20 年起是法  
国共产党党员,法共创建人之一。1924 年

起是法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  
员会政治局委员。1924—1930 年是  
法共中央总书记和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委员。1936 年起是法国和阿尔  
及利亚铁路工人统一联合会总书  
记和法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9 年 10 月被达拉第政府逮捕,  
1940 年被“维希”政府引渡给德  
国法西斯占领者,1942 年被杀害。  
——第 944 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Cer-  
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  
1616)——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著  
有著名小说《唐·吉珂德》。在这部  
小说中描写了西班牙人民生活的广  
阔的现实主义情景,指出了封建制  
度在历史上必遭灭亡和金钱势力的  
增长。——第 219 页。

桑巴,马赛尔(Sembat, Marcel 1862—  
1922)——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曾  
参加布朗基派组织,为社会党和左  
翼激进刊物撰稿。1893 年起是众  
议院议员。1905 年法国统一社会  
党成立后,是该党改良派首领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  
义者。1914—1917 年任法帝国主义  
“国防政府”公共工程部长。——  
第 300 页。

沙罗夫,亚·弗·(Шаров, Я.В.)  
——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在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  
开除出党。——第 820、824 页。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n  
1564—1616)——英国诗人和剧作  
家。他的最著名的悲剧《哈姆雷特》、  
《奥赛罗》和《李尔王》,反映了正  
在成长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各种矛盾,  
描写了人在被自私自利、谎言、贪  
财和权势统治的世界里的悲惨处  
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  
作品有很高的评价。——第

390、399 页。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 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和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国民公会委员。1793 年任公安委员会委员。革命军战胜外国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在热月 9 日政变后和罗伯斯比尔一起被捕并被处死。——第 726 页。

什基里亚托夫, 马特维·费多罗维奇( Шкирятов, Матв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883—1954)——1906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1918 年起任缝纫工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 年起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1922 年起历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主席、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第 713 页。

什克洛夫斯基, 格里哥里·李沃维奇( Шклов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Львович 1875—1937)——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5 年从事外交工作。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 年因参加托季反对派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职务。——第 732 页。

什麦拉里, 鲍胡米尔( Smeral, Bohumir 1880—1941)——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运动活动家,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897 年加入捷克社会民主党, 是党的领导人之一。1921 年捷克共产党成立后是党中央委员。1921—1929 年和从 1935 年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709、801、820、824 页。

什瓦尔茨( Schwartz)——德国共产党极左派首领之一, 共产主义的叛徒。后被清除出党。——第 799 页。

什维尔尼克,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Шверник,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8—1970)——1905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彼得堡、土拉、萨马拉等地做过党的地下工作。1923 年以后曾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联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五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主席、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等职。——第 825 页。

施本格勒, 奥斯渥德( Spengler, Oswald 1880—1936)——德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者。宣称科学和哲学是宗教的产物, 否认现实的客观存在。认为关于世界的任何观念都带有主观的和任意的性质。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宣称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没落。仇视马克思主义, 为德国军国主义辩护。主要著作有《西方的没落》。——第 922 页。

施德洛夫斯基,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 Шид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43—1907)——俄国地主, 参政员, 国务会议成员。1905 年 1 月 29 日被任命为“立即查明圣彼得堡市及其四郊工人不满的原因并寻求将来消除这些不满的办法”的政府特别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于 1905 年 2 月 20 日被沙皇政府解散。——第 200 页。

施略普尼柯夫, 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 Шляпн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1885—1937)——1901 年加入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后来从事工会工作和经济工作。1920—1922年是反党集团“工人反对派”的头子。1933年被开除出党。——第348—349、363、657页。

施米特，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Шмидт,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86—1940)——1905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4—1917年是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书记。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书记。1918—1928年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后来是劳动人民委员。从1928年起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参加过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反对派，很快就退出了。——第820页。

施穆勒，古斯塔夫·冯(Schmoller, Gustav von 1838—191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新历史学派的领袖，教授。他论证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采用的“历史统计法”，因而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国民经济史，归结为经济过程的简单描述。他把国民经济生活现象看作是伦理现象和法律现象，认为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性质、女工和童工的使用、工人问题等，都“取决于道德和法律，取决于当时的文化思想”。——第32—33页。

施泰纳，鲁道夫(Steiner, Rudolf 1861—1925)——德国哲学家。1890年至1897年研究和编辑歌德的博物学著作。后来发表一系列著作宣扬他自己的学说——“人智学”，即人类智慧论：把人类看成这门“精神科学”所研究的一切知觉的中心，企图从人的性质中推断出世界的性质。——第238页。

施泰因贝尔格，伊萨克·扎哈罗维奇

(Штейнберг, Исаак Захарович)——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职业是律师。1918年是司法人民委员。疯狂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和约批准后和其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彻底粉碎后流亡国外，领导参加第二半国际的社会革命党人。——第510页。

施特恩，维克托(Stern, Victor 1885—1958)——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曾作为奥地利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当过编辑，获教授称号。——第693页。

施蒂克戈尔德(Штыкгольд)——第820页。

施托克曼(Stockman)——第99页。

司尔佐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Сырцов,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1893—1938)——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是俄共(布)顿河局委员，顿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参加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在1920—1921年工会争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纲领。1921—1926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是诺根军事化工厂厂长。——第835页。

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哈多维奇(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俄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02年起编辑《解放》杂志，1904—1905年是自由君主派组织“解放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之一。1905年立宪民主党成立后，是该党中央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是俄国帝

国主义的思想家之一。十月革命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革命政府，敌视苏维埃政权，后逃往国外。——第5、72、86—87、101、105、163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是自身的原因，是万物存在的原因。认为思维和广延性是自然界的属性。在认识论方面是唯理论的拥护者，认为正确的认识无须借助感觉而可由理性获得。主要著作有《伦理学》。——第210页。

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Сталин,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1879—1953)——第495、667、671、680、685、690、693、695、699、704—705、707—708、717—718、723、732—734、736、743、748—749、771—772、774、781、783—788、796—797、800、803—813、816、820—822、825—827、838、858—859、871、877、889—890、899、906—907、916—917、919—920、923—924、929—930、932、938—940、941、954、964—965、968—969、981、984—985页。

斯捷茨基，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Стецкий,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896—1938)——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在红军中担任军事政治工作和司令部工作。1921—1923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6—1930年是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和列宁格勒区域委员会报刊部和宣传部部长。在党的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第十五次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781页。

斯柯别列夫，马特维·伊万诺维奇(Скобелев, 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5—1939)——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孟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5—8月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十月革命后退山孟什维克，1922年加入联共(布)，在经济部门担任负责工作。——第282、587页。

斯克雷普尼克，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Скрыпник,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72—1933)——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俄国许多城市做过党的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担任乌克兰的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曾当选为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第741页。

斯列普柯夫，阿·恩·(Слепков, А.Н.)——1919年加入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责任指导员，《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和《真理报》编委。布李集团成员。——第781页。

斯米尔加，伊万·捷尼索维奇(Смилга, Иван Тенисович 1892—1938)——1907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芬兰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在1920—1921年工会争论期间拥护托洛茨基的纲领。后因积极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党。——第712—713、715—717、752、864页。

斯米尔诺夫，阿列克塞(Смирнов, Алексей 生于1873年)——俄国统计

学家,参加立宪民主党。1899—1906年在雅罗斯拉夫里和弗拉基米尔省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以后至1908年,在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编辑部工作。1908年赴美国。回国后在坦波夫任律师。——第172页。

斯米尔诺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Смир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877—193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副农业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1928年加入布李集团。——第786、837页。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第17页。

斯皮里多诺娃,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Спиридонова, 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1884—1941)——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1917年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曾参加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叛乱,叛乱平定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后来退出政治活动。——第502页。

斯特卢米林,斯坦尼斯拉夫·古斯塔沃维奇(Струмилин, Станислав Густавович 1877—1974)——苏联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科学院院士。1899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905年及晚些时候在彼得堡的孟什维克组织中工作。十月革命后脱离孟什维克,1923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苏联国家计委(1921—1937年和1943—1951年)、苏联科学院工作,并在莫斯科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任教。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工作、苏联国民经济史和统计学的著作。——第885页。

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也维奇(Столыпин,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1862—1911)——俄国反动官僚,大地主。1906—1911年任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杜马,颁布新选举法,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8—1912年)。屠杀工农群众,残酷镇压革命运动。颁布新土地法,培植富农作为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中的支柱。但是通过自上进行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改革来巩固专制制度的企图遭到完全失败。1911年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第239、244、393页。

斯维尔德洛夫,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Свердлов, 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5—1919)——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党中央成立的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成员。1917年11月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称他是“忠心耿耿的革命家”,“非凡的天才组织家”。——第511、516—517页。

斯文胡伍德,佩尔·埃文德(Svinhufvud, Pehr Eyvind 1861—1944)——芬兰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917—1918年

为芬兰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芬兰工人革命。1931—1937年任芬兰共和国总统。——第326—327、331页。

苏，欧仁(Sue, Eugène 1804—1857)——法国作家。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描写了资本主义城市下层社会的贫困和堕落，他用道德问题来遮掩社会问题，经常陷于庸俗和鄙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进行了批判。——第198页。

苏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469—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所有制贵族阶级的思想家。最早研究古代辩证法(即利用和对手辩论来揭露矛盾的方法求得真理的艺术)的哲学家之一。——第16页。

苏汉诺夫，尼·(Суханов, Н. 1882—1940)(真名吉姆美尔，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Гиммер,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俄国农业经济学家，政论家，早期是民粹派，后来是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31年因领导孟什维克地下组织而被判刑。——第492—493、495、602页。

苏瓦林，波里斯(Souvarine, Boris)——法国社会党人，新闻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托洛茨基的拥护者。1921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因进行托派活动于1924年被开除出党。后来是法国托派首领之一，在资产阶级报刊上撰文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第657页。

索尔茨，阿朗·亚历山大罗维奇(Сольц, А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2—1945)——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和

党的负责工作。从1920年起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从1921年起是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最高法院成员；后来在苏联检查署担任负责工作。——第724—726、733页。

索柯里尼柯夫(Сокольников 1888—1939)(真名勃里连特，格里哥里·雅柯夫列维奇 Бриллиант,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1905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从事党政工作。1922—1926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25年参加“新反对派”，后来加入托季反党联盟。1937年被判刑。——第658页。

索林，弗拉基米尔·哥尔杰也维奇(Сорин, Владимир Гордеевич 1893—1944)——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加入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1920—1925年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从1924年起在列宁研究院工作，后在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第601页。

索洛维约夫，克·斯·(Соловьев, К. С.)——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第751页。

## T

台尔曼，恩斯特(Thälmann, Ernst 1886—1944)——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04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工作，反对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的沙文主义。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1923年领导汉堡工

人起义。1925年当选为德共主席。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委员。1933年被捕，1944年被害。——第694、944—947、949页。

泰罗，弗雷德里克·温斯洛(Taylor, Frederick Winslow 1856—1915)——美国工程师。创造了充分利用工作日和合理使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的劳动组织制度，名为“泰罗制”。它在一定程度上曾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却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使资本家得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血汗。——第357页。

谭平山——第949页。

唐恩，费·伊·(Дан, Ф.И. 1871—1947)(真名古尔维奇，费多尔·伊里奇 Гурвич, Федор Ильич)——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在国外领导取消派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1922年初被驱逐出境。——第119、152、162、200、225、306、313、480、497、588、602页。

唐生智——第742页。

陶里亚蒂，帕尔米罗(Togliatti, Palmiro 1893—1964)——1914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和葛兰西共同创办《新秩序》周刊，为建立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作了准备。1922年当选为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当选为意共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是意共总书记。1924年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是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年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44—1946年在意大利联合政府中担任过部长和副总理的职务。——第694页。

特烈波夫，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Трепов, Дмитрий Федорович 1855—1906)——1896—1905年间任莫斯科市警察总监。1905年1月起任拥有独裁全权的彼得堡总督。镇压1905年革命的刽子手。在1905年十月总罢工时期曾发布命令：“不放空枪，不惜子弹。”——第210页。

特伦，阿尔伯(Treint, Albert 生于1889年)——法国教师。1910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升为上尉，获荣誉军团勋章。法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法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是书记。1926年被撤销政治局职务，1927年被开除出党。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有过短时间的联系。1934年又加入社会党。——第693页。

特罗胥，路易·茹尔(Trochu, Louis-Jules 1815—189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帝国覆灭后的国防政府首脑，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870年9月—1871年1月)，背叛性地破坏被普鲁士军队包围的巴黎的城防。——第17页。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1832年和1834年任内务大臣，残酷镇压里昂和巴黎人民的起义。1836年和1840年任首相。1871年2月任资产阶级政府首脑，血腥镇压巴黎公社。1871—1873年任第三共和国总统。——第98、107页。

梯什卡，扬(Tyszka, Jan 1867—1919)(真名约吉希斯，利奥 Jogiches, Leo)

——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参加创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0年起是该党总委员会委员。反对国际工运中的修正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组织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德共中央书记。1919年3月被捕，在狱中被杀害。——第178页。

提列特，本杰明 (Tillett, Benjamin 1860—1943)——英国新工联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工党创始人之一。1887—1922年是码头工人工会书记。1928—1929年是运输工人工会理事会理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工党议员(1917—1924年和1929—1931年)。——第820页。

托马斯，詹姆斯·亨利 (Thomas, James Henry, 1874—194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工会活动家，工党首领之一，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鼓吹者。长期担任工会领导工作。1910—1936年是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20—1924年是改良主义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主席。二十年代同改良派首领一起破坏英国工人的罢工运动。在麦克唐纳的所谓的“国民政府”和鲍尔温的保守党政府中担任过大臣职务。——第662、715页。

托姆斯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 (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1880—1936)——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不止一次地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政策，支持“民主集中派”，坚持工会脱离党的领导所谓的“独

立性”。1928—1929年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之一。——第345—348、353、367、715、742、786、824页。

陀思妥也夫斯基，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1—1881)——俄国作家。1849年因参加革命团体被判死刑，后改判四年苦役。流放期间对革命失去信心。流放归来后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宣扬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反动哲学。反动小说《魔鬼》露骨地反对革命运动。著名的作品有《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第399页。

## W

瓦尔德克-卢梭，比埃尔·玛丽·勒奈·厄内斯特 (Waldeck-Rousseau, Pierre Marie Rene Ernest 1846—1904)——法国国家活动家。1881年和1883—1885年任内务部长。1889—1902年任内阁总理，参加这个政府的有摧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和社会主义的叛徒米勒兰。——第99页。

瓦尔登 (Вальден)——第511页。

瓦尔丁 (Вардин 1890—1943) (真名姆格拉泽，伊拉里昂·维萨里昂诺维奇 Мгеладзе, Илл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1907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做过报纸编辑和党的工作。1918年曾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1925年是“新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后来参加托季联盟。因进行反党反苏活动，于1935年被判刑。——第605—606、608—615、618—621页。

瓦尔扎尔，瓦西里·叶哥罗维奇 (Варзар, Василий Егорович 1851—1940)——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特别致力于革命前俄国工业统计的组织



研究。十月革命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工作，并在高等院校任教。——第702页。

瓦连廷( Валентин 1873—1922 ) (真名戈尔德贝尔格，约瑟夫·彼得罗维奇 Гольденберг，Иосиф Петрович)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脱离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护国派。1917—1919年加入新生活派。1920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第155页。

瓦西里也夫——见林格尼克。

瓦扬，爱德华( Vaillant, Edouard 1840—1915 ) ——法国社会党人，布朗基主义者，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1871年积极参加巴黎公社活动，是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1871—1872年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901年是法兰西社会党创建人之一。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合并后，在很多原则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300页。

王德威尔得，埃米尔( Vandervelde, Emile 1866—1938 ) ——比利时工人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首领之一。1894年起为议员。1900年为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历任司法大臣、外交大臣、卫生大臣等职。敌视俄国十月革命，积极支持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第259、269、285、288页。

威尔逊，伍德罗( Wilson, Woodrow 1856—1924 )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民主党人。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在总统任内镇压国内工人运动，推行扩张政策，对拉丁美洲各国进行武装干涉，促成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后是美国武装干涉苏俄的策划者之一。1918年1月提出旨在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在巴黎和会(1919—1920年)上支持日本，牺牲中国利益。——第281、307页。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859—1941 ) ——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1888—1918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和分裂工人运动的反动政策，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力图重新瓜分世界。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往荷兰。——第132、145、499、504、673页。

维贝尔，赫尔曼( Weber, Hermann ) ——德国共产党极左派首领之一。——第657页。

维特，谢尔盖·尤利也维奇( Витте, 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1849—1915 ) ——俄国官僚，代表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利益。曾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会议主席等职，采取适应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种种措施，参与镇压1905—1907年的革命。——第101、105、109页。

魏奥维奇，沃亚( Вуйович, Voya ) ——南斯拉夫人，参加法国共产党的活动。曾任青年共产国际总书记。1927年是支持托洛茨基的唯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季诺维也夫分子被开除。1928年承认错误，退出政治活动。后来死在西伯利亚。——第820页。

汪精卫——第732、738、742、746、820页。  
沃隆斯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

(Воро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84—1943)——苏维埃俄罗斯文艺批评家,政论家,作家。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编辑《工人边疆区报》。1921—1927年任《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并领导环形出版社。1925—1928年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因此被开除出党。以后脱离这个派别,恢复了党籍。追随托洛茨基,认为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文化并反对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中的思想领导权。——第392页。

沃罗比约夫,维肯蒂·阿·(Воробьев, Викентий А. 1896—1937)——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9月至1918年底是《乌拉尔工人报》编辑、区域党委会委员和乌拉尔区域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9年是《农村共产党人报》编辑。1920—1922年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乌拉尔局委员。因进行派别活动于1927年被开除出联共(布),1928年恢复党籍。——第723页。

沃洛达尔斯基,弗·(Володарский, В. 1891—1918)(真名戈尔德施坦,莫伊塞·马尔科维奇 Гольдштейн, 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1917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3年侨居美国,曾在纽约《新世界》编辑部工作。十月革命后是报刊和宣传鼓动事务委员,彼得格勒《红色报》编辑。1918年6月20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第733页。

沃伊柯夫,彼得·拉扎烈维奇(Войков, Петр Лазаревич 1888—1927)——苏俄外交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成为布尔什维克。曾任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在华沙被白卫分子刺杀。——第799页。

沃伊廷斯基,弗拉基米尔·萨韦利也维奇(Войтин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Савельевич 生于1885年)——1905年初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09年春因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案件被军事法庭判处苦役徒刑。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10月参加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为镇压十月武装起义而对彼得格勒的反革命武装进军,同克拉斯诺夫将军一起被捕,获释后去格鲁吉亚,编辑孟什维克报纸《斗争报》。后来逃往国外。——第305页。

乌尔邦斯,胡戈(Urbans, Hugo)——起初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2—1923年是汉堡党组织书记。1926年11月作为“左倾”派别分子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后来是托洛茨基叛徒集团“列宁崩得”的领导人之一。——第657、752、800页。

乌格拉诺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Угла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6—1940)——1907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下新城省委、莫斯科市委书记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等职。1928年参加布李集团。1932年因反革命集团案件被开除出党,以后恢复党籍,1936年再度被开除出党。——第782、786、790页。

乌里茨基,莫伊塞·索洛蒙诺维奇(Урицкий, 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73—1918)——俄国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九十年代参加革命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区联派,并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1917

年10月是领导起义的党总部成员。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18年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8月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第250、581页。

乌斯特里亚洛夫，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Устрялов，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1890年）——俄国法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人。1918年在西伯利亚时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东方部主任，出版《俄国事业报》，并在高尔察克伪政府领导出版局。高尔察克被粉碎后逃到哈尔滨。1921—1922年为在布拉格和巴黎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和杂志撰稿，是路标转换派思想家之一。1920—1934年任哈尔滨大学教授。1935年回苏联后在高等院校任教。1937年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捕判刑。——第723—725、772—774、786、820、825、836、871页。

## X

西哀士，艾曼纽尔·约瑟夫（Sieyès，Emmanuel Joseph 1748—1836）——法国神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的作者，1795年宪法的起草人之一。在执政府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促成了雾月18日政变（1799年），从而建立起拿破仑·波拿巴的专政。——第18页。

西佐夫（Сизов）——第386页。

希法亭，鲁道夫（Hilferding，Rudolf 1877—1941）——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曾任《前进报》编辑。1910年发表《金融资本》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鼓吹“有组织的资本

主义”论，颂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17年起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二十年代曾任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部长。法西斯上台后流亡法国。——第572、797、944页。

希克斯，乔治（Hicks，George 生于1879年）——英国工会运动改良派领袖。1919年任工会总书记，建筑业工人全国联合会主席。1921年是英国工联总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是总委员会主席和总委员会出席英俄委员会会议的代表。1926年总罢工期间采取投降主义立场。是革命工会运动的死敌。——第741—742、820、822页。

谢德林——见萨尔蒂柯夫-谢德林。

谢德曼，菲利浦（Scheidemann，Philipp 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右翼首领之一。190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1911年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13年起是该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极端的沙文主义者。1918年10月参加帝国主义政府，任国务大臣；同年11月参加所谓的“人民代表委员会”，参与迫害斯巴达克派。1919年2—6月任魏玛共和国联合政府总理，血腥镇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283、289、291页。

谢烈布里亚科夫，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Серебряков，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9—1920年任俄共（布）莫斯科省委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1年起在交通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纲领。1923年起是托洛茨基反对

派的骨干分子。1937年被判处死刑。

——第820、824、827页。

谢姆柯夫斯基(Семковский 1882—1937)(真名勃朗施坦,谢苗·尤利也维奇 Бронштейн, Семен Юльевич)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

1907年流亡国外,参加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工作。1912年参加反党的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1917年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第273页。

谢韦里亚宁(Северяни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第26页。

辛格尔,保尔(Singer, Paul 1844—1911)

——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87年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是执行委员会主席;1884年起是国会议员;1885年起是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419页。

兴登堡,保尔(Hindenburg, Paul 1847—

1934)——德国元帅,德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反动分子的代表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军东线司令、总参谋长。俄国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组织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参加镇压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1925—1934年任魏玛共和国总统。1933年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使政权完全转入法西斯分子手中。——第273页。

休特古姆,阿尔伯特(Süderkum, Albert 1871—194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修正主义者。曾任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宣扬帝国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1918—1920年任普鲁士财政

部长。列宁把他列入“德皇和资产阶级的卑鄙走狗组成的”匪帮。“休特古姆”一词已成为极端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通称。——第255页。

## У

雅柯夫列夫,雅柯夫·阿尔卡季也维奇(Яковлев, 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1896—

1939)——191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任哈尔科夫革命委员会主席、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委书记和基辅省委书记、第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许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著作,其中包括反对托派的小册子。——第714、729、983页。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мельян Миха-

йлович 1878—1943)——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基辅、敖德萨、土拉、莫斯科、雅罗斯拉夫里等地做过党的工作。是1917年10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20—1922年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担任党的工作。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写有许多关于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历史著作。——第730、732、825页。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年)。

企图利用警察手段来巩固专制政体,保护支持皇位的贵族阶级的特权。颁布了一些把农民束缚在农村和缩小以前在地方自治及城市自治方面、在司法

方面所实行的改革，建立了地方行政长官制度，把农民置于其监督之下。——第188页。

扬松，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Янсо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2—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3—1927年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是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8—1930年是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0—1931年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4年是苏联水运人民委员，1934年起是北方海上航线管理局副局长。在党的第十二至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711—712、720、726、826页。

叶弗烈莫夫，伊万·尼古拉也维奇(Ефремов,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生于1866年)——俄国大地主，第一、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和平革新”党的组织者之一，以后是资产阶级进步党的首领。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国家杜马执行委员会委员，临时政府成员。——第306页。

叶夫多基莫夫，格里哥里·叶列麦也维奇(Евдокимов, Григорий Еремеевич 1884—1936)——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红军中担任军事、政治工作。1925年任列宁格勒党委书记，“新反对派”和托季联盟骨干分子。1927年在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派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第658、752、864页。

叶姆沙诺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Емш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91—1941)——1917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7—1920年在皮尔姆

铁路管理局工作。1920—1921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副交通人民委员，后来在交通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第472—473页。

叶赛宁，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Есенин,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95—1925)——苏维埃俄罗斯诗人。早期诗作主要描写农村自然景色。曾参加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意象派。作品中流露悲观情绪。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部分诗中，企图反映新的革命生活，如长诗《苏维埃俄罗斯》等。但仍留恋革命前宗法制农村的田园生活。最后自杀。——第393页。

伊万诺夫，弗谢沃洛德·维亚切斯拉沃维奇(Иванов, Всеволод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1895—1963)——苏维埃俄罗斯作家。他的早期创作中的优秀作品描绘了人民群众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的英勇斗争，如《游击队员》、《装甲列车》。此外还著有其他长篇小说、随笔、政论文章和高尔基回忆录等。——第392—393页。

伊斯特曼，麦克斯(Eastman, Max 生于1883年)——美国托派分子。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23年退出。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末日》等书中攻击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译有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出版有诗集多卷。——第628—632页。

易卜生，亨利克(Ibsen, Henrik 1828—1906)——挪威戏剧家。他的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剧本《恋爱悲剧》、《社会支柱》和《玩偶之家》，暴露了资产阶级道德和事业的缺点，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虚伪。——第390页。

英克平，艾伯特(Inkpin, Albert 1884—1944)——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904

年加入社会民主联盟。1913年任英国社会党总书记，英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0—1929年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反对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集团。——第628页。

约吉希斯——见梯什卡。

约诺夫，费多尔·马尔科维奇(Ионов, Федор Маркович 1870—192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崩得派首领之一，后来是共产党员。1903年当选为崩得中央委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崩得派代表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崩得的国际主义派。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第259页。

越飞，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Иоффе, 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1883—1927)——九十年代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同区联派一起被接受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是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团员。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18年4月至11月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柏林全权代表。——第318页。

## Z

赞科夫，亚历山大(Цан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1879—1960)——保加利亚法西斯头子，屠杀保加利亚人民的刽子手。发动了1923年6月9日的法西斯政变，残酷地镇压了1923年的九月起义。1923—1926年主持法西斯政府。1944年法西斯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后逃往希特勒德国，以后逃往奥地利美国占领区。

——第545页。

泽克特，汉斯(Seeckt, Hans 1866—1936)——德国上将。1926年以前曾任德国第四军、第十一军参谋长，国防军司令。1923年秋在尖锐政治危机时刻掌握了德国的全部行政权力，镇压了革命运动。1934—1935年在蒋介石“围剿”苏区时任德国驻国民党政府军事使团首席军事顾问。——第451页。

扎尔金德，伊万·阿布拉莫维奇(Залкинд, Иван Абрамович 1885—1928)——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1907年革命。1917年11月底以后曾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年是苏俄驻瑞士代表。——第509页。

扎赫尔-马佐赫，万达(Sacher-Masoch, Wanda 生于1847年)(真名屈梅林，奥罗拉·冯 Kümelin, Aurora von)——德国女作家，德国作家列奥波德·冯·扎赫尔-马佐赫的妻子。著有《我的一生的忏悔。回忆录》(1906年)等。——第236页。

张伯伦，尼维尔(Chamberlain, Neville 1869—1940)——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保守党领袖。1937—1940年任英国首相，采取了一系列减少工资和失业救济金的措施，推行鼓励法西斯侵略者的政策，竭力唆使德国侵略苏联。——第714—715、727、800、808页。

张作霖——第794页。

仲马，亚历山大(大仲马)(Dumas-pere, Alexandre 1803—1870)——法国作家，长篇历史冒险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在这一方面的著名作品有《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第198页。

# 托洛茨基年表

(1879—1940)

- 1879年10月26日 生于南俄草原杨努夫卡村富农家庭。
- 1888—1895年 在敖德萨的圣保罗实科学学校学习。
- 1896—1897年 转学尼古拉也夫城。开始接触工人运动,组织“南俄工人同盟”。
- 1898—1899年 1月被捕。先囚禁在尼古拉也夫城,后转押在敖德萨监狱。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四年。在莫斯科流放犯监狱关了半年。写关于尼古拉也夫城工人运动的小册子。  
在莫斯科狱中与亚历山德娜·列沃夫娜·索柯洛夫斯卡娅结婚。
- 1900—1902年 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为伊尔库茨克的《东方评论》撰稿,笔名安蒂德·奥托。
- 1902年秋 自西伯利亚脱逃。护照署名托洛茨基,此后一直沿用此名。在萨马拉正式加入《火星报》,笔名彼罗(笔尖)。逃亡国外,经苏黎世、巴黎到伦敦,第一次见到列宁,并结识查苏里奇和马尔托夫等人。开始为《火星报》撰稿。
- 1903年
- 3月 列席《火星报》编辑部会议,无表决权。后随报迁往日内瓦。
- 7—8月 以西伯利亚代表的身分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问题时,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发表机会主义观点,在党章问题上站在马尔托夫一边,反对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
- 9月13—20日 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十七名少数派分子(孟什维克)会议,会议通过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一同起草的《关于党

- 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成立孟什维克的派别中央“少数派委员会”，托为其成员。会后不久，“少数派委员会”篡夺了《火星报》的领导权。
- 1904年 出版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
- 1905年 俄国“一月九日事件”后于2月回国，在彼得堡活动，5月迁居芬兰，出版小册子《一月九日以前》，由帕尔乌斯作序。10月罢工高潮时重返彼得堡。
- 11月 与帕尔乌斯合编《俄罗斯报》，与孟什维克合办《开端报》，同时为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撰稿。
- 12月 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被捕。
- 1906年 在彼得堡狱中写《总结与展望》。出文集《我们的革命》。9月被判处长期流放。
- 1907年
- 2月 在流放途中从别列左沃脱逃，侨居芬兰的阿格尔堡。写《往返》和《革命中的俄国》。
- 4月 以梯弗利斯代表的身分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持“中派”立场。会后经柏林赴瑞士萨克逊，侨居在希尔希贝克。
- 8月 出席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 10月 定居维也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1908年 从10月起在维也纳出版派别性俄文报纸《真理报》（1908年10月—1912年5月）。
- 1909年6月 发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攻击列宁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
- 10月 在德累斯顿以德文出版《一九〇五年》。
- 1910年
- 1月 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在动摇分子的支持下，全会决定拨款帮助托洛茨基的《真理报》，派加米涅夫为参加该报编辑部工作的中央代表。
- 8月 赶走中央派驻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的代表加米涅夫。
- 8月28日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匿名文章



- 《本报俄国通讯员来稿》。
- 9月 在德国《新时代》上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向》一文。
- 11月26日 托洛茨基办的维也纳俱乐部开幕，宣布筹备了一笔用来准备和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全党性的基金。
- 1911年
- 年初 在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和波克罗夫斯基等人在波伦亚创办的党校讲课。
- 7月 在致第二国际的长信中大肆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 1912年
- 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举行第六次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
- 3月 参加在巴黎召开的有崩得国外委员会、前进派、社会民主党呼声派、托洛茨基派、孟什维克护党派和调和派参加的代表会议。在德国《前进报》上发表《俄国党内生活所见》的匿名文章。
- 8月 纠集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和崩得派等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结成“八月联盟”，建立“组委会”，提出宪制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和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主义要求。
- 9月 应资产阶级民主派《基辅思想报》的约请，去巴尔干任军事通讯员，笔名安季德·奥托。
- 1913年
- 2月 在《光线报》上发表《一个党还是两个党？》一文。
- 4月 在致齐赫泽的信中恶毒攻击列宁。
- 1914年
- 2—7月 在彼得堡出版《斗争》杂志。
- 7月 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布鲁塞尔召集的会议，在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德参与下建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布鲁塞尔联盟”（“七·三”联盟）。
- 8月3日 离维也纳去苏黎世。在瑞士社会党工作。
- 9月 写《战争与国际》一书，12月以德文出版。

11月19日 以《基辅思想报》通讯员资格去法国。参加《呼声报》的工作。

#### 1915年

1月 《呼声报》改名为《我们的言论报》，由托洛茨基主编。  
9月5—8日 出席在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同考茨基派站在一起，反对列宁为代表的左派提出的反战宣言和决议草案，为会议起草妥协性的总宣言。

#### 1916年

9月 《我们的言论报》被封，托洛茨基被从法国驱逐出境。  
11月 经西班牙乘船去纽约。

#### 1917年

1月 在纽约参加《新世界报》工作。  
3月27日 离纽约回俄国。  
4月3日 被英国政府扣留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解往阿默斯特，关在德俘集中营，四月底获释。  
5月 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2日 在《真理报》发表《必须立即从实际上统一起来》的答问。  
7月23日 七月事变后，被临时政府以间谍罪逮捕。  
7月26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与区联  
—8月3日 派一起被接受入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出版《和平纲领》。  
9月初 获释出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10月10日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1月8日 任外交人民委员。

(以下新历)

12月 任苏俄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

1918年2月10日 德方提出最后通牒，托洛茨基违抗列宁指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声明退出战争，同时全面复员军队。

- 2月22—24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立即接受德国和约建议的决定。托洛茨基在表决时弃权。
- 3月6—8日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决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托洛茨基在会上继续为自己的立场辩解。
- 3月 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
- 9月6日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托洛茨基任主席。
- 1919年**
- 2—4月 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发动叛乱，进攻到伏尔加河畔。托洛茨基离莫斯科去前线巡视。
- 4月 红军在东线反攻，大败白军。托洛茨基向中央建议停止追击白军，把军队从东线调往南线，但未被采纳。他提出辞职，中央未批准，被责令停止参加对东线战事的领导。
- 7—10月 邓尼金从俄国南方进攻。南线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连受挫折，白军进逼莫斯科。中央派斯大林接替他指挥南线战事。
- 冬** 在乌拉尔指导经济工作。
- 1920年**
- 1月 回莫斯科，负责恢复交通运输工作。
- 2月 向中央提出《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的提纲。
- 5月 写完《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 8月 指挥对波战争。
- 11月8日 向中央全会提出《工会及其今后任务》提纲初稿。
- 12月25日 发表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
- 1921年**
- 2月1日 与布哈林等联名在《真理报》上发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
- 3月8—16日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做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 12月 致信奥里明斯基，声称他过去对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

## 1922 年

- 1 月 12 日 为《1905 年》一书作序。  
2 月 20 日 写完《帝国主义和革命之间(从格鲁吉亚的局部例子看革命的基本问题)》。

## 1923 年

- 4 月 17—  
25 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做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在大会前起草的一个提纲中提出“工业专政”的口号。  
9 月 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与《党的艺术政策》等文章。  
10 月 8 日 致信党中央。攻击党的机关干部和党内民主制度。  
10 月 15 日 一批反对派分子向中央发表《四十六人声明》，托洛茨基本人虽未签名，但实际上是幕后策划者。  
12 月 8 日 写《新方针》(给党的会议的信)，越过中央直接分发给各地区的党组织和支部。  
12 月 11 日 在《真理报》上发表《新方针(一)》(给党的会议的信)。  
12 月 28 日 发表《新方针(二)》(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  
12 月 29 日 发表《新方针(三)》(关于党内新老两辈问题、党的社会成分)。

## 1924 年

- 1 月 出版小册子《新方针》。  
赴南方苏呼姆疗养。  
4 月 出版《论列宁》一书。  
4 月 17 日 从疗养地回莫斯科。  
5 月 23—  
31 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企图就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挑起争论，但未得逞。  
9 月 发表《1917 年》一书序言《十月的教训》，挑起新的争论。

## 1925 年

- 1 月 15 日 写信给俄共(布)中央全会，为他的反党言行辩护。  
1 月 17—  
20 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给予最严厉的警告，

并确认他不宜担任军队的领导职务。托洛茨基称病未出席会议。

- 1月26日**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 5月** 任租借权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 7月** 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关于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
- 11月** 发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
- 12月28日** 联共(布)中央紧急全会，讨论“新反对派”问题。会上多数主张改组“新反对派”控制的《列宁格勒真理报》。托洛茨基和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等发表声明，反对由中央任命该报主编。

#### 1926年

- 4月6—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全会期间开始形成“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盟”。
- 4月中旬** 赴柏林养病。回国后要求苏联与英俄委员会断绝关系。
- 6月** 反对派在莫斯科郊区树林开会，制订反中央的行动计划。
- 7月** 提出《十三人宣言》。
- 7月14—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托洛茨基派与“新反对派”正式结成没有保留意见的“托季联盟”。
- 10月4日** 反对派向联共(布)中央提出关于“和平”的声明，要求停止所谓“党内纠纷”，搞好“共同工作”。
- 10月16日** 托洛茨基等六名反对派首领发表“声明”，表示放弃派别活动，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 10月23—2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向反对派首领提出警告，撤销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 10月26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 11月3日 在会上发言,集中攻击“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 11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托洛茨基发  
12月16日 言,继续攻击“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 1927年

- 5月中旬 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关于《中国革命和斯大林提纲》的提纲。
- 1月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通过撤销托洛茨基的  
3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托洛茨基在会上发言。
- 5月25日 提出“八十四人宣言”。
- 6月9日 借口为托洛茨基分子斯米尔加送行,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举行反党政治示威,托洛茨基发表演说。
- 6月 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诬蔑党是热月党。
- 6月27日 反对派提出《十五人政纲》。
- 7月11日 致信奥尔忠尼启泽,要求在苏联进行所谓“克列孟梭式的实验”。
- 7月29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反对派发表  
8月9日 “声明”,提出消灭派别活动因素的“诺言”。
- 9月 向联共(布)提交《反对派政纲》。
- 10月21日 致信党史委员会。
- 10月21—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托  
23日 洛茨基在会上发言,继续向党进攻。
- 10月 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反党演说。
- 11月5日 《真理报》争论专页上发表《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
- 11月7日 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反对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反苏游行。
- 11月11日 召开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要求托洛茨基停止召开非法的反党会议,不把党内争论扩大到党外。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退出会场,数小时后提出书面答复,拒绝中央的要求。

- 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通过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决定。
- 11月17日 《真理报》争论专页上发表《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反提纲》。
- 12月18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反对派》的决议，批准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决定。

#### 1928年

- 1月17日 从莫斯科流放到阿拉木图。
- 6月 写《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 7月12日 写给共产国际六大的信《现在怎么办?》。
- 8月17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 9月1日 向大会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受到大会的驳斥和拒绝。

#### 1929年

- 1月18日 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 1月22日 离阿拉木图，去土耳其。
- 2月12日 抵君士坦丁堡。侨居普林基博岛。
- 7月 出版《反对派通报》。
- 9月 写完《自传》。
- 11月 写完《不断革命》。

#### 1930年

- 3月 为《不断革命》一书德文版写“前言”。
- 5月 成立左派反对派国际局。

#### 1931年

- 2月15日 写完《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二月革命”。

#### 1932年

- 2月 被剥夺苏联公民权。
- 5月 写完《俄国革命史》第二卷“十月革命”。

#### 1933年

- 春 《反对派通报》改在巴黎出版。
- 10月1日 写成《苏联和第四国际》，提出建立第四国际的问题。

#### 1934年

- 7月 《新国际》创刊。着手筹建第四国际。

## 1935 年

2月7日— 在法国写作《流亡日记》。

9月8日

## 1936 年

8月 写完《被背叛了的革命》。

12月19日 离开奥斯陆去墨西哥。在此以前在桑德卑被拘押四个月。

## 1937 年

1月10日 侨居在墨西哥小镇考约阿康。

10月 发表《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一文，出版文集《斯大林伪造学派》。

## 1938 年

9月3日 “第四国际”（又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巴黎正式宣告成立。大会通过了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的《过渡纲领》（全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 1939 年

6月 撰文纪念《反对派通报》创刊十周年。

## 1940 年

5月 第四国际召开紧急大会。通过《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

8月20— 遇刺伤重而死。

21日